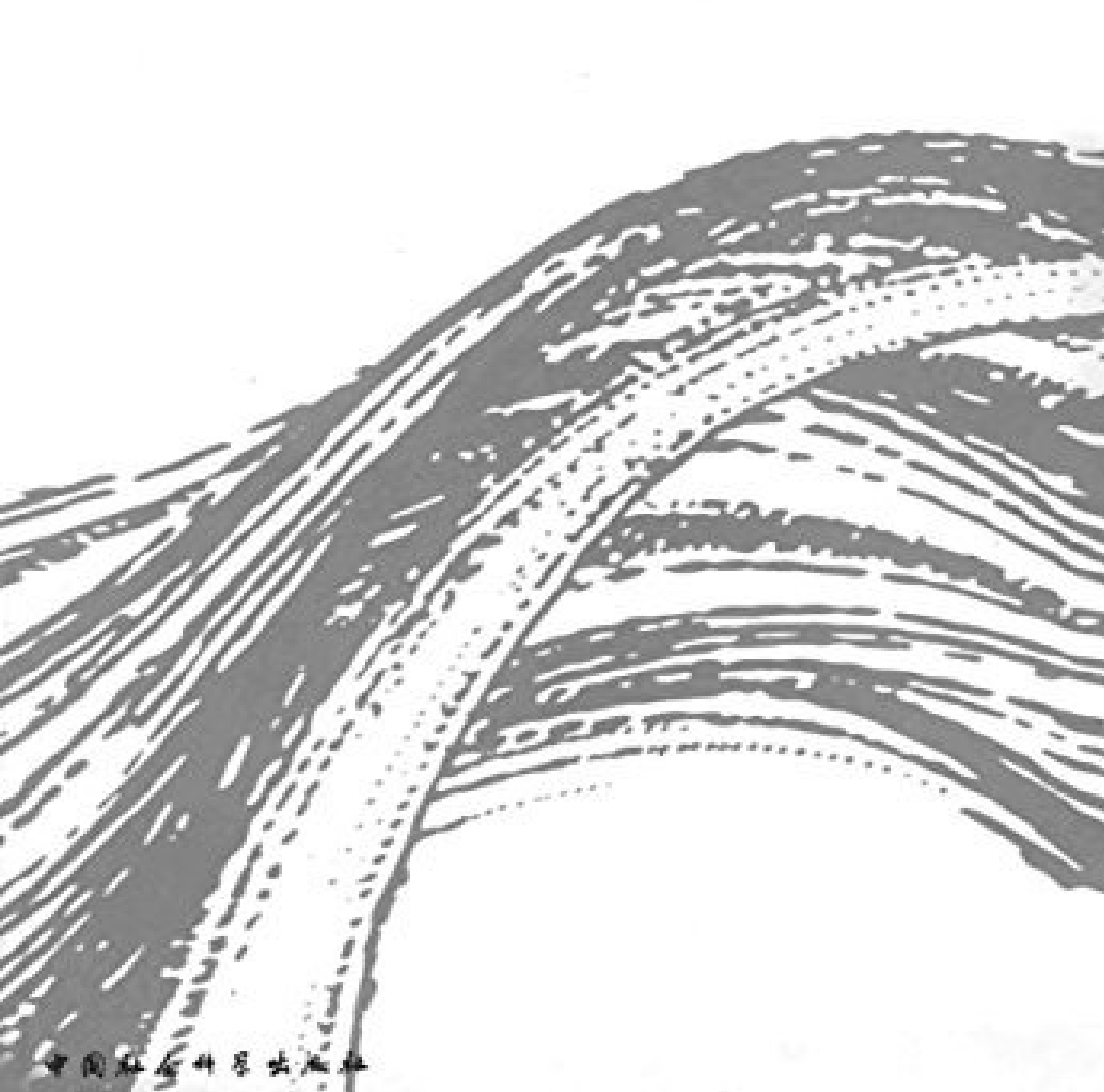
刘小萌 著

中国知青口述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点击图片到招财猫咪网下载您需要的免费PDF电子书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知青口述史
作者：刘小萌　著
设计：姚成号
ISBN：7-5004-4078-2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字数：532千字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费孝通 题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目录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序　　言

刘小萌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共有1700万以上城市知识青年走向农村、走向边疆。这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对中国的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这场运动落下帷幕到现在，又是二十多个年头过去了。当初的“知识青年”早已不再年轻，即便如此，他们对人对己，还依旧以“知青”相称。这说明，“知青”一称已超出当初年龄的限定，而成为城市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一代人的专称。

知青返城以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但同时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知青”问题重新凸显出来，“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即便已霜染双鬓，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产生心灵上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仍是一个在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称谓。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我对知青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缘起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得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青”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做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存有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1998年，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初澜》和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一并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计划再写一部《中国知青史》的续篇，书名都想好了，就叫《落潮》吧，主要写知青返城20年来的坎坷历程，与前面的《初澜》、《大潮》，不是正好形成比较完整的三部曲嘛！

随即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各级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各级政府已不再把知青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政府部门可以把下岗工人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做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哪些新的资料，也许还会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岁月如歌——参加2001年在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时的合影（右起：刘小萌、潘平、侯隽、李南、定宜庄、杨健）

当然，这还只是酝酿阶段，真正下决心把这事做起来，还应归功于2001年12月在福建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这个论坛是由厦门知青作家谢春池发起组织的，可以说汇集了与“知青”话题有关的各方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面人士——

侯隽在中国知青史上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1962年她从北京良乡高中毕业后，到河北省宝坻县安家落户。那时，城市知青下乡插队还未提上日程。1963年夏，国家开始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长期工作，侯隽因此具有了典型意义。在以后的年代里，她的名字始终跟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象征。

曲折，堪称“文化大革命”中“下乡”第一人。1967年10月9日，他和另外九名北京“老三届”学生主动要求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在他们的身后，1400万知青走向农村和边疆，由此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曲折的命运就像他的名字所寓意的，足够曲折。在经历官场上的种种蹭蹬之后，他终于在90年代“下了海”。

在那次会上，我还有幸结识了福建晋江安海知青联谊会的代表郑梦彪。这个来自东南沿海文化古镇的汉子，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高大的个子，豪爽的谈吐，诙谐的调侃，不过，令我唏嘘不已的，还是他的苦难身世和坎坷经历。

再有上海知青丁惠民，在1978—1979年云南农场知青的请愿罢工活动中，身为总指挥的他，振臂一呼，数万知青云随影从。随着云南农场知青的大返城，他的名字也永远载入了史册。

湖南知青郭晓鸣，这位被戏称为“湖南钢材大王”的企业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经营上的如何成功，而是他对“知青事业”的执著。他在长沙办着一个“知青酒家”，赔本赚吆喝，要的就是这“知青”的品牌；他“养”着一个知青合唱团，投入的是金钱和精力，产出的是文化和交情；他积极参与“第二故乡行”，用慷慨的捐献实践“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长沙知青酒家外景

当时我就想，有这么多知青朋友近在咫尺，是多好的条件，为什么不把口述史做起来呢？感谢谢春池和厦门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使我找到知青口述史的起点。

二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内容和特点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有海外华人学者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轻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从学习雷锋的小学生到戴袖章的红卫兵，从拿锄头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失业的回乡青年，26位后毛泽东时期成名的中国作家，畅谈他们的文学道路与‘文化大革命’经历，既是口述历史，也是第一手的史料。”印在扉页的这段话，概括了全书的内容。是书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关注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于“劫后的辉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

本书一共收录13位知青的口述。中国有一千七百多万知青，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称得上是一部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应该说，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要精益求精，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选定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的知青典型，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折，内蒙古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

张韧，知青中的“大姐”，1962年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但未上，执意下乡，曾担任省团委书记、县委副书记、省计委商贸处处长……如今正在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站“最后一班岗”。张韧的口头语是“喜欢挑战”，不论是栖身“草野”，还是身居“庙堂”，一直与书籍为伴。所以，她的思维一直很活跃，不愿守成，热衷开拓。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猖獗年代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做“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了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灾。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守共产主义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儿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嘛！

安海燕，是另一种类型的知青典型。她脾气温和，柔中有刚。13岁时遭遇“文化大革命”动乱，靠捡破烂养活全家；17岁下乡当赤脚医生，因成绩突出成了典型；80年代，她放弃已有的名利到海南闯天下，如今已是颇有业绩的企业家。

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命运浮沉以及近二十年来的奋斗历程，在一代人中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风起云涌的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其中最著名的有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场知青欧阳琏。欧阳琏，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他穿着那身褪色的劳动布工装、踽踽独行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时，你绝不会想到，当年，为了新疆兵团几万上海知青的命运，他曾抱定必死的决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为了这，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这，他也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敬重。我还采访了王良德——1979年春新疆上海知青北京上访团的负责人，他的回忆，为还原那段历史补充了宝贵的资料。另外，我把20世纪80年代中叶在北京等地进行请愿上访的核心人物之一庄伟亮也列为采访对象。他不是那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而是特殊时期一个知青群体的优秀代表。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国知青史上，永远有他们不可磨灭的篇章。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张玲，一位普普通通的女人，用她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话语，讲述了一段足以打动心弦的故事：两次结婚，第一次嫁给一个农民；回到北京后，“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她放一张床的地方……”第二次结婚，知青们为她举办了一个足够风光的婚礼。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下，年过半百的她第一次披上了婚纱。对过去的经历，她从不怨天尤人，思维是内省式的，“不管多么困难，也要履行好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还有小月，一位在东北兵团为扑灭山火而被毁容的女人。她在花季的年岁，突遭狂风骤雨的摧残，从此与“幸福”二字绝缘。她叙说了毁容后的痛苦，也叙说了冷漠和歧视带来的伤害。

我所采访的以上几类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表述都极具个性。对上山下乡运动肯定也罢，否定也罢，对那个时期的政策感激也罢，诅咒也罢，在本书中，都得到如实的反映。社会在前进，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不能不带有今天的烙印，但社会的发展也带来日益多元的观念与需求，已不能强求人们认识一律。本书希望紧紧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身其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角度的深度再现。

按照口述的要求，我的工作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步，采访录音。先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这项工作从2002年1月启动，到年底基本完成。将近12个月里，足迹所及，包括上海、泉州、厦门、福州、沈阳、桂林、广州、昆明、赤峰、长沙、武汉、大连，有些地方还去了两次，采访知青近三十人。

第二步，将录音整理成文字。这是一项费时费力有时又很单调的工作。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妹妹刘小茁女士，因为所有录音的初步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整理工作都是由她完成的。我所采访的知青，分散各地，说话南腔北调，声调有高有低，给整理带来很大难度。然而，经过她的辛勤劳动，风格迥异的话语都变成了一行行清新隽美的文字。小苗15岁就在“工宣队”的强制下到延安安塞插队，新挖的窑洞还没搬进去，窑洞就塌了，如果没有那个“万幸”，后果可想而知。后来，她转回老家，又进工厂，一直在外地，直到47岁提前“内退”。可以说，她与千千万万“下岗”、“内退”的女知青们，有着相同或类似的命运。我完全明白，她不辞劳苦地为我整理资料，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她也是知青。

录音形成文字后，我再核对一遍，形成口述的原始稿。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实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这样，就形成了初步修订稿。全部整理工作，均有保留的录音带作为原始依据。

第四步，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

本书收入口述13篇，只是全部口述的一部分。部分口述没有收入，有多方面原因，一个是有关1966年夏秋之际北京赴疆支边青年的口述，他们的情况比较特殊，反映的问题也比较尖锐，我准备单独结集出版；第二，有些稿子不够理想，尚有待补充；另外，个别受访者身份比较敏感，或涉及个人隐私，或新遭不幸。凡属于这些情况的，我都决定暂不发表。

我的采访，采取了多样的形式。对知青典型，一般是请他们围绕上山下乡运动讲述自己的经历；对民间知青领袖，请他们围绕重大事件做专题性口述；对一些普通的知青，考虑到他们一生的坎坷多与幼年的家境特别是家庭出身有直接联系，近年的境遇又最值得关注，所以，对他们的采访大多采取生命史的形式，即从幼年的记忆开始，直到现在。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与上海的“新疆人”座谈

做口述史是人与人、而且通常是与陌生人交往的过程。一般说来，对一个陌生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乃至隐私，即便不是那种生性内向、拘谨的人，恐怕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的采访却很少尴尬，开场白也是直来直去，省去了许多俗套和应酬。为什么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都是知青，彼此有基本的认同。在上海采访，一些从新疆兵团回来的老知青对我发问：“你觉得上海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我既不愿撒谎又不愿直言，只好敷衍说：“我老婆是上海人，可是我跟上海人不怎么交往。”话音未落，没想到他们齐声赞同：“你这话说对了！”他们说：“上海人不把我们看做上海人，管我们叫‘新疆人’。我们跟他们也不是一路的。”这些知青在跟我谈话过程中始终自称“新疆人”，因为他们有新疆的长期经历，返城（不少人还属于“非法倒流”的）后多数处境不佳，沦为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颇受一些人的白眼。但他们的行为方式跟李伯重先生所论的那种上海“小男人”完全是两回事，非常豪爽，非常真诚，非常好客，跟北方人真是没有什么区别。我第一次去上海采访时，还没有课题经费资助，就住在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上海知青家里，三口人两间房，住的条件差了一点，可是他们一家人盛情相邀，非让住在他家，每天就像贵宾似的供着我，那种真挚的情感让我特别感动。

三　口述的价值与局限

通过口述还原历史，在海内外都不是什么稀罕事，而且有愈来愈热的趋势。所以我想结合做知青口述史的心得，对口述的价值与局限略作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说明。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学者说那是由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著《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近些年来，口述史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乃至文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已是不争的事实。[1]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哪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稗官者言，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

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略而不计的。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反观历史。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兴起，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空间。

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通过口述方法，发现并矫正文献记载的缺失，对于包括知青史在内的当代史研究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或者欧阳琏本人了。通过这次采访欧阳琏和他的群体，使我增进了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弥补了诸多缺憾。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现，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有时也难免偏激，或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也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都不能不在采访者的心中卷起涟漪。



在云南大理“洋人街”与经商的原上海知青合影

“文化大革命”中及“文化大革命”后，官方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油，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

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做“政治工具”，从个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做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乐、优点和缺点，他们有极富个性的方面，而且在同辈中多数还是很出色的。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不过，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

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不是有那么一句格言吗——“笔写的，斧头也砍不掉”。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外，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采访的知青典型，有的人尽量回避谈“文化大革命”中犯过的那些错误，这让我联想到知青回忆录中的“失忆”现象。有些失忆，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一些受访者在谈到对自己不利或者能勾起痛苦回忆的情节时，自觉不自觉地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采访过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访，他给我讲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动。第二次采访，他重提这段历史，却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不禁一愣：“您这次说得怎么跟上回不一样啊？”没想到他轻轻一乐：“哦，上次讲糊涂了，搀了不少小说的内容。”我只好追问：“那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当然……”还有一位知青，我后来发现，他的口述隐去了“文化大革命”中一段很惨痛的家事。我采访的一个知青，有一个很隐私的事儿，审核定稿时，他提出要删去这一段。我提出可以用假名，这样就没必要隐瞒了，但他不同意。最后，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一个细节就这么删去了。口述者选择性地讲述历史，隐瞒不想说的部分，自然有他的考虑。但不管怎么说，都给口述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还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口述时讲得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他核实，却被他大刀阔斧地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该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做出种种删改，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他所讲述的，已是一个变了味儿的故事。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理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的优势，口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

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不是也有选择吗？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完全真实吗？至于哪种方法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恐怕永远也说不清。我想，对于研究者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两者彼此印证，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

[1]在这方面的文章有：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也是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定宜庄等《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口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口述》，载《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杨祥银《中外口述史学概述》，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9日；杨立文《口述历史刍议》，载《纵横》2002年第8期。关于口述历史的规范化要求，可参考［美］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2000年铅印本。可供参考的成果有叶宋曼瑛《也是家乡》，三联书店（香港）1994年版；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以文学兼口述的形式，披露了大饥荒年代一段最黑暗最血腥的内幕，尤其值得一读。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导　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概述

席卷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前后历时20年之久，不仅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震动和深远影响，在世界上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

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阶段性。

50年代初起，国家逐步明确了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向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变得空前狭窄，众多青年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就业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全国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回乡知青人数更多。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搞农业，长期安家落户。提出的口号则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仍是摆在第一位的选择，下乡则是第二位的。

60年代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虽然只是初澜，却为即将掀起的高潮准备了条件。它在动员、安置知青的一系列制度和措施上，都被作为成功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扬光大。

短短几年里，推进上山下乡的努力已经遇到很大阻力。一旦“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平地而起，下乡知青就用“返城风”的形式表达了他们积蓄的不满。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泽东关于"再教育"的语录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各地学校基本停课，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这三年的城镇初、高中毕业生累计400万人，留在城市，无所事事，上山下乡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惟一可行的"就业"途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再教育"号召，全国很快出现了一个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热潮。从此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成为一项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有14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意味着十分之一以上的城镇人口在这种形式下被送往乡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既是对50年代以来上山下乡活动的继承、发展，又带有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点。

首先，这是一场在“左”的理论指导下的运动。毛泽东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制度前提下提出的“再教育”理论，扭曲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的正常关系，把两者的关系明确为被教育与教育的关系。在这种理论笼罩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当做一场改造人的运动，下乡知识青年被要求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而且，只有在阶级斗争的所谓“大风大浪”中，才能最终实现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其结果，加重了下乡知青的思想困惑和精神沮丧，不少政治上充满热情而又幼稚、盲从的青年被导入歧途。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对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本来是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而推进的上山下乡运动，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声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一层又一层神圣的迷彩。对上山下乡的态度，被说成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大问题”；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被当做判断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基本标准。在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进一步把所谓“扎根”与“拔根”提到“复辟”与“反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使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被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问题。

从具体做法上讲，“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带有更明显的强制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只是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的多种手段之一，在是否下乡这一点上，被动员者还拥有一定的选择权。“文化大革命”中，不少地方对毕业生采取“一锅端”、“一刀切”的极端做法，不顾青年本身及家庭的具体情况，一概要求上山下乡。然而，运动每推进一步，遇到的阻力就增加几分；阻力每增加几分，动员者势必增加强制的力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运动陷入的一个怪圈，也是招致社会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

由于这场运动，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农村，遇到一系列问题：多数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医疗、住房、婚姻等方面存在不少困难；文化生活贫乏，许多可以造就的人才被迫中断了学业；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原本学到的科学文化知识走向退化。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缺乏基本的法律保证，下乡青年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不少青年受到迫害。农村的艰苦环境，各种意外事故的侵袭，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使一些青年英年早逝。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青年，不可胜数。

与这场运动相得益彰的是“走后门”之风的畅行。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工农画等号”、“与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等极“左”口号辉映下，是政治特权淋漓尽致的高扬。同是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征兵、入党、提干等方面没有公平竞争的机缘。“血统论”的肆虐，对众多家庭出身有玷的青年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他们的家长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伤害。知青下乡插队后，大多数人入不敷出，在不同程度上仰赖父母的贴补帮衬。多子女家庭经济负担尤为沉重。许多青年下乡初不过十五六岁，尚无独立自理能力即被送往农村、边疆，父母亦无可奈何，日日为远行的子女黯然神伤，梦牵魂绕，精神上年深日久的煎熬，徒令华发早生。

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牵动了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不同程度地承受到它的影响。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做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毛泽东明确无误地要求农民“欢迎他们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指知识青年）去”，并赋予农民实施“再教育”的神圣使命。这种政治上的荣誉，以及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往往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文化大革命”后期，知青下乡改为就近安置，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在这些地方，知青的到来形成与农民争工分、争土地、争口粮的情况，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国家花了许多钱，却没有真正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知识青年大举返城，滞留当地的寥寥无几。国家不得不千方百计为他们重新安排就业，以前的开支大部分付诸东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加重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人才断层。许多知青文化基础单薄，回城就业时年龄偏大，难以胜任技术性工作。1978年，有人将上述问题归纳为“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预示着持续10年之久、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由此引发的在社会政治、经济诸领域的巨大变化，对积弊丛生、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沉重的一击。虽然在1976年以后的三年多中，这场运动沿着惯性的轨道继续滑行，但是它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这是运动的最后阶段。1977年起，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逐年锐减。到1979年底，已有700多万在乡知识青年乘着席卷全国的“返城风”实现了回城的夙愿。1980年，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明确指示停止让城市青年下乡种地的办法，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画上了一个句号。

上山下乡运动的寿终正寝，并不意味着知识青年问题的圆满解决。尽管绝大多数下乡青年陆续返回了城市或者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80年代，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的请愿上访活动，在陕西、山西等地的北京知青的请愿上访活动，几起几落，持续时间长，牵涉范围广，都是历史后遗症所激起的必然反弹。90年代以来，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老知青一直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奔走呼号。近些年来，大批当年的知青首当其冲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阐明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教训和严重后果，不等于抹煞下乡知识青年在艰苦条件下为建设农村、开发边疆所做出的贡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内容上相互关联、含义又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人们不会忘记，许多知识青年在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农民送医送药、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等方面取得的出色成绩。青春的闪光永远值得珍视，特别是在那个使千百万人命运蹉跎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的特殊年代。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我这个人喜欢新鲜”

——张韧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赵令如

采访时间：2002年3月15日

采访地点：上海文汇新民报业大厦

［采访前记］　张韧，知青的大姐，1962年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不上，执意下乡。从农村出来后，她调换过不同的岗位，尝试过不同的工作，曾担任安徽省团委书记、当涂县委副书记、省计委商贸处处长……如今，正在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站“最后一班岗”。她的口头禅是“喜欢挑战”，在应对新挑战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新落成的上海报业集团大厦矗立在黄浦区，大厦的内外装修设计是在张韧领导下完成的。那天，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参观大厦。大厦外观呈“高山流水”造型，大厅是高敞透明的穹顶。晴天，阳光灿烂，头顶白云蓝天；雨天，流水哗哗。置身其间，别有一番情趣。会议室有的设计成英、美风格；有的设计成潜水艇式样，背景是大海蓝天……看得出，张韧对蓝色情有独钟。两间大会议室，一间装饰着按贝多芬四部交响曲为主题设计的浮雕，一间装饰着根据中国十个古代神话绘成的国画。中西合璧，相得益彰。几十年来，不论是栖身“草野”，还是身居“庙堂”，张韧一直与书籍为伴，所以，她的思维活跃，设计也绝不落俗套。

张韧早已离开了农村，但在感情上却无法割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挂着她请画师画的一幅油画——农村池塘边的树林。世界是五彩缤纷的，同样是农村，它给有的人留下的印象是晦暗的，但在张韧眼里，它的色调却是明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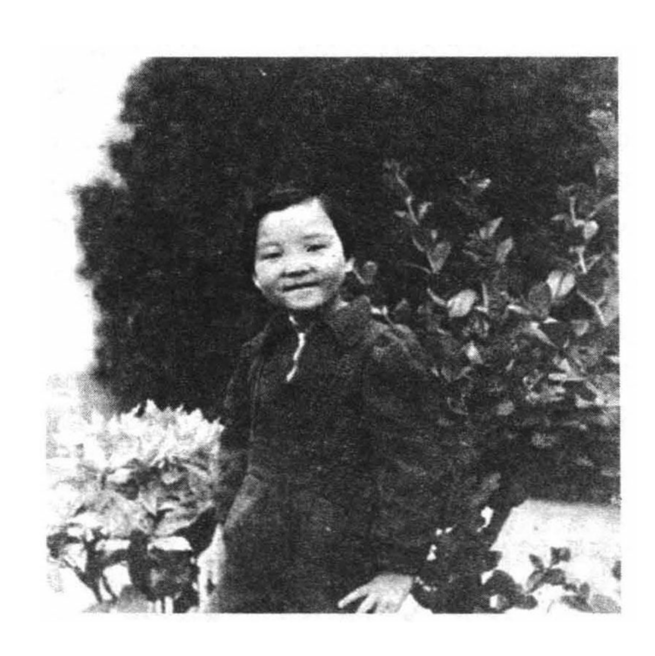
官方传媒树立的典型，多是千人一腔，缺乏个性化语言，缺乏独立的思想，这几乎是一个通病。张韧的口述，有助于人们摆脱偏见，了解知青典型那真实的一面。

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燕子[1]下乡比我们早，那是50年代的事了。我们在60年代上学的时候就知道邢燕子，还有徐建春[2]。我跟侯隽是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年级，我们都是1962年高中毕业下的乡。对当初的决定不存在什么后悔不后悔的问题，从繁华的大城市到农村去落户，并不像现在有的人想得那么痛苦那么难。这在当时是比较在理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当时有个大环境，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注重对青年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的培养，虽然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总的来讲，我们都抱有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希望自己对国家有所作为。二是当时国家确实需要人到农村去，去了，有一种“帮上忙了”的感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我当时在华东师大二附中，是全国重点。我们班的风气比较好，同学们积极向上。记得有一个因陈毅副总理著名讲话引起的“红”与“专”的讨论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最后的结论是不能只红不专，也不能只专不红，必须又红又专。另外就是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热爱集体，而且学习一定要好，学习不好没前途。所以，我们那时候学习都很卖力呀。在那么一种氛围中，我们要选择一个对祖国有利的方向，大家绝对是既羡慕又鼓励的。譬如有两三个男同学，为了国防上的需要，没等毕业就当兵走了，包括我现在的丈夫，当时是我的同班同学。我那时候的选择是愿意到农村去，如果去不了就上大学。没有一天把上大学和到农村去对立起来。我下乡以后，上海《青年报》就我的选择展开一个讨论，说这值得不值得？我自己认为：这两个不是对立的，都值得嘛。上大学我一定会上一个很好的大学，要求下乡也是满足自己的心愿，要干也一定能干好。当时一腔热血，我现在对自己有一腔热血还是满意的。



八岁，在上海的家里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农村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中央做出了一个决议，就是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全党支持农业。[3]那是农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了，我就要走。当时学生下乡没途径，因我母亲作为干部要求下乡，她属徐汇区，我是一边到徐汇区委申请下乡，一边参加高考，而且还考了两次。为什么呢？那时候艺术院校比普通高校先招生，我先考艺术院校，考了以后，担心万一考不取，因为喜欢做老师，又报考了师范大学。徐汇区委说，你真想下乡吗？我说真想。他们又问：你不想上学了？我说我也考啦。当时号召毕业生“一颗红心，两种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准备"，我不就有这"两种准备"嘛。

两场高考参加下来，真是非常非常巧。那天上午，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们学校，学校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我，说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接到高校录取通知的。就在那天下午，徐汇区委又通知我说：你反复要求下乡，我们考虑同意你了。

到底是上大学还是下乡劳动？这下只能选一个啦。我想，大学以后还可以上，下乡可只有这个机会。这样，我就找到上海戏剧学院，找到我们那个系的主任。我说："我想不来了。"她说："这怎么行？"我说："我下乡去。""哎哟，你这个学生，你别开玩笑，我们是很严肃的啊。我们在全国只招收十几个人，录取了12人，加上预科留下的3个人一共15人。我给你说，你走了以后我也不会再补人了，因为我们是坚持质量的，你的条件不错，我们还打算叫你做团支部书记。"我那时候也很有意思，就说："这么着吧，我很喜爱这个专业，能不能给我保留一年学籍？我先到农村干一年，现在农村是比较困难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去出力，然后再回来在你这儿上学。""你想得倒很好，但这是绝对行不通的。"系主任说。我又到了徐汇区委，他们得知我已考上大学，就劝我别下乡了。我说："我的申请是真的，考取了大学还要去，以后不会怪你们的。"

我们班里有两三个同学，在我申请下乡时都跟我挂号了，说："只要同意你下乡，我们就跟你一块儿走。"那时候我们的思想确实是很健康的，最后他们都被大学录取了，他们的家庭都不让他们去当农民，都说："你不要跟她开玩笑了。"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好，我是干部子弟。那几个同学中有一个没有父母，是姐姐抚养大的，他考取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姐姐说："我辛辛苦苦的又做爹又做妈的，从小学上到现在，你竟然考取了大学又不上？！"他这样是不能跟他姐姐交代的。另外一个同学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他非常想跟我一块儿下乡，但是他的后母有顾虑："如果你下乡的话，人家会认为是我这后母不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就说我："你呀，就是没有社会经验，你看你的同学虽是满腔热忱愿意一块儿走，但他们考取了大学，你应该劝他们去上，要考虑他们家庭的情况。"那两个同学后来就去上学了。

1962年9月，我跟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块儿，到安徽省肥西县袁店公社唐旭生产队安家落户。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插队这一说。那时候上海号召居民下乡，就是因为国家有困难。我妈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她想，我是共产党员，应该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她在一个厂里工作，率先报了名。本来是可以不办退职的，因为不了解中央的有关文件，就办了退职手续。我父母当时不在一起，父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亲也不反对。我妹妹初中毕业，弟弟是初中生，当时我们想叫他们两个就不要去了，因为年龄还小。但妹妹也坚决要去，弟弟的班主任愿意留他一块儿生活，可弟弟执意要跟我们一起走。所以，我们是姐弟三人和我妈下的乡。

两年后，我和母亲让弟弟参军了，他在部队里提了干部，后来又上学，他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妹妹念了当地的农垦学校，我说：“你还是继续学习，你太小。”农垦学校是自己养活自己的，1963年那种模式，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也就是半工半读。1970年，她在当地招工，当上了小学教师。

从1962年到1970年，我一直在种地，母亲也一直在农村。我们那个地方还可以，以种水稻为主。下乡前，我满脑子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憧憬，虽知艰苦一点儿，但对自己如何如何大干一番浮想联翩。去了以后，农村的现状和我头脑中的想像截然相反，冲得我目瞪口呆。虽然国家讲农业比较困难，需要发展农业，但是我绝对没想到，农村里会饿死那么多的人。我的班主任比我年长，他也有亲戚在农村，临走的时候再三关照我，户口不要转下去，粮票多带一点儿。他是在暗喻农村中存在的某种情况，可是又不敢跟我直说。当时我就感到很奇怪，多带一点儿粮票可以，既然到农村去了，把户口还搁在上海干吗？到了乡下才知道，肥西县是当年搞“共产风”的“重灾区”，所以死的人很多，有的户成为绝户，个别的村庄成为绝村。我从高埂上往下看，有的地方一片“汪洋”，那不是水呀，是坟头啊，那坟头连绵几里。农民告诉我说，这还是家里有人埋的，还有人死了以后，家里没人埋他呀。那时候我才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农业是根本，光有大城市不行呀；才明白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呀；才知道农业的困难严重到什么程度。我更一心一意地愿意为改变这个面貌出力了。

你问我对知青下乡到底怎么看，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当时国家的急需以外，本质的认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很多的课本里边，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都有这一条。可以很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一条没错，直到现在也这么认为。凡是有知识有作为的青年，一定要接触民众，一定要懂得中国国情，要不然你不一定能实现良好的愿望，更无法成为栋梁。现在都讲精英，精英们了解国情就更是不可缺少的。

此外，就一般情况说，对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社会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自由。比如，我们看到国外有些青年离开城市去做乡村医生、乡村教师，有的人离开人群去与动物、植物为伴，做某类“志愿者”。大家都看到了，接受了，认为很自然。可是我国的青年中如果有人执意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就麻烦了，要么捧得很高，让他被“曝”得难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受，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外界影响，或者不想这样做下去了，但被“架”着下不了台；要么就是被猜疑、评议、非难包围着，也很难受。江泽民主席说，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也要让青年人选择多样的生活。“运动”式已经不存在，时代在进步，当代的青年更可以自主选择和追求变化。不过，我想不管是谁，如果一生一世钻在一个角落里或者只能干一种事，对这样的人生总是不甘心的吧？

二　农村八年

当农民的第一步，是自己养活自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戴个眼镜靠什么吃呀？生产队给我评了个三分半的基分，干一天，记三分半工。我不信学不会，咬着牙顶，半年下来，从评五分到七分到七分半，一年下来，我可以拿八分工一天了，那是女劳力的最高基本分。有时候我还加点儿脏活累活干，比如挑河泥时我就下水田倒河泥，出粪窖时我就站在粪缸底起粪，还能加分，一天能拿个10—12分。10分一个劳动日叫一个工，我那个时候完全靠工分，一年做不到80个劳动日，就不能养活自己，我必须做到160个劳动日，才能把分给我和母亲两个人的粮和草挑回家。我母亲在家里种些菜，养些羊养些鸡是必不可少的，我回来有饭吃。后来往往到省、县开会，就得把公家发的补贴费交给队里，队里折成工分给记上。我在肥西举目无亲，但我还可以呀，170个工，180个工，190个工也做过，我什么都肯干，生产队长动不动就让我“牵头”带着一拨女劳力去干个什么。

能养活自己了，在生产队里就算上个人，以后，队里看我有公正心，就让我当记工员。另外，秋天看场地，夏天看瓜田，那时脑子里没有“得罪人”这个概念，无意当中惹恼了谁也不知道，总觉得乡亲们还信任我，干得特别认真，就这样，渐渐有了发言权。

那时我心里很明白，与工农相结合，首先是向工农学习，但不等于学得跟农民一模一样就是结合好了，毕竟我们是有知识的青年农民。我开始“不安分”，外面有了脱粒机，我就向省里关心我的安置办公室要求。结果，一个农机厂送了一台，脱粒机运到离我们庄最近的公路边，还有十里小路要抬进来，队里对这台机器有没有用拿不准，反正是送的吧，派两个人抬了回来。那是台脚踩脱粒机（因为我们这个区都不通电），我在上海师大二附中下乡时，在奉贤秋收时用过，所以一上手就会用。大家一看，这比手里抱着稻把子弯着腰往地下摔掼脱稻粒子可是又省劲又干净，恨不得个个都上机子脱粒。外面兴新式种棉，我知道跟大家讲也没用，就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先试。果然，棉铃多，棉桃大。跟我要好的吴基英吃过中午饭总跑到我这儿来，我告诉她怎么先营养棉种，怎么打公权保母权摘顶芽什么的，她全盘接受了这种60年代的先进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方法。以后，不用费大劲儿，队里的棉花就普遍这么种了。



早春二月做水田埂（1964年）

最难的是引进良种。当地的“小冬稻”、“小红稻”米质好，但生长期长，产量太低。从现在追求米质看，还真是好品种。可当年如果不追求产量，粮食不够吃，收入也上不去，一定要选高产良种，这就是时代不同吧。我一个人跑到三十多里外的舒城良种场求教。为什么一个人去？别人家的青年不便叫，免得他受讽刺打击。自己去了，万一没搞成，我一人知道就行了。舒城农场场长真热情啊，让我看，给我讲，送了一大袋种子还招待了一顿饭，我挑着两小箩稻种，心里轻松兴奋，30里地没感觉就回来了。当时国内的媒体集中宣传了几个知青，我这“上海姑娘”也是其中一个，名声大了，在社会上干什么都很顺，在家门口就增加压力了。多数人已经把我当同类，但少数人不高兴，说：上海人不在上海过，放到乡里来，肯定是犯了错误；上海人来种了我们的地，有什么好在报上老登的？共产党给她什么好处？我深深知道，外面越是把我从众人堆里挑出来“显摆”，我融合的难度就越大，我想做点儿有利于生产的事，千万不能摆出一副“起作用”的样子，就要裹在大家里面“顺着纹路”一步步做。所以，带回了“农垦58”晚稻种后，我就约了几个庄上的小青年，说：“试试吧，人家种了真的多收稻子。”又对胆子小的队长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说：“我们不要记工分，不要队里的肥，不耽误出工，收了稻归生产队，试试看嘛。”队长给了块最偏远、难灌水的畈田，我们三四个人就做起了这块田。每当他们在生产队收了工又跑到这块拐角田上干的时候，我心里有一股对不住他们的心情，因为他们不去自留地干，也有家庭压力啊，庄子里还有人话里有话地说：“祖祖辈辈留下的种好好的，我们不要野种。”那时，一切都押在秋天“开宝”啊，如果搞砸了，我自己好说，可还有几个小青年呢，别让他们难受。当然，我也不是一点儿底也没有，良种就是良种嘛。就在1964年夏秋之季，省里下放了一个合肥知青小组六人到我们庄，有了新的力量，搞试验田就不是原来孤孤单单三四个人，一去就是一帮了。第一次试种的“农垦58”收割了，那块拐角田，原来最多收300斤，我们一次收下了六百多斤，这还不是“农垦58”的高产数。已经不用我们多费口舌了，谁不想多收粮呢？

1965年，省里又下放了一个淮南知青小组到邻庄，这些“文化大革命”前来的知青都是自愿下来的，多数人高中毕业，大家都想干点儿事，我们就一起搞文化活动，糊纸船、扎灯笼，演节目。南腔北调加外语，黄梅戏三句半，什么都有。各庄的乡亲们买了蜡烛等我们去“闹花船”，我们一个庄一个庄跑，演完走的时候，后面就加上一串人跟着，就这样，越走队伍越长，在窄窄的田埂小路上红闪闪一长溜，现在想起来，比在大剧院看戏还美！

就在我们想再有点儿出息的时候，“四清”[4]开始了。1966年初，我被抽到“四清”工作队，到了定远县，户口转到团省委。没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四清”也搞不下去了，我听到我母亲在乡里挨批斗，说她是“资格最老的当权派”，她不过是个不脱产的党支部委员，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我要求重新回到袁店塘旭去，团省委同意了，我的户口转回农村，这一下，乡里的几个造反派有了新的兴奋点。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蹲者为张韧）（196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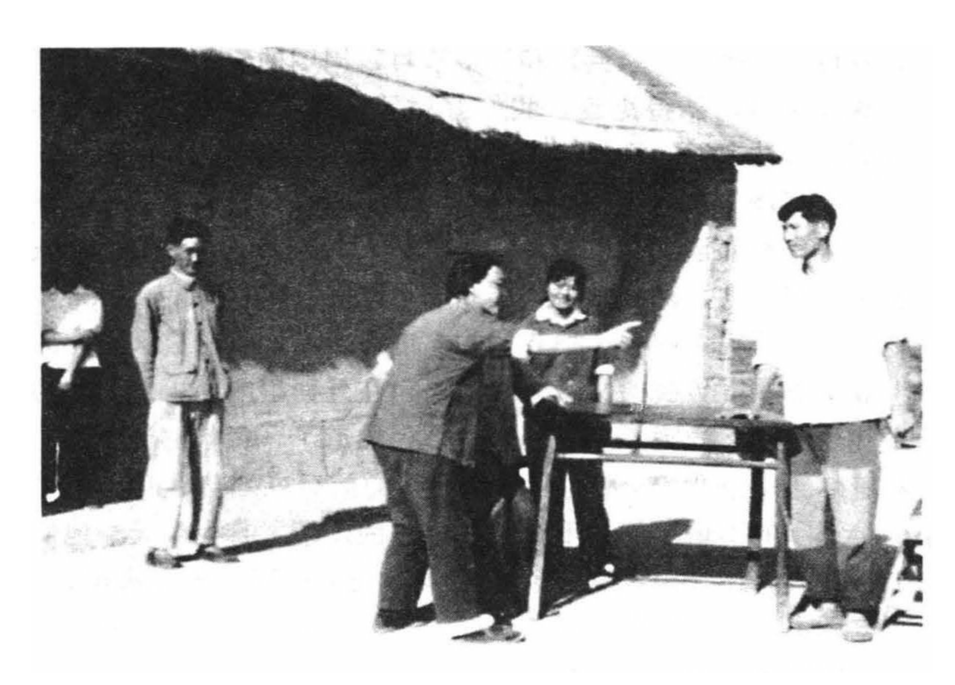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一来，知名一点儿的知青就和很多人一样挂块牌挨斗了。我的牌子是“刘少奇的黑典型”，我反对炮轰省委，就说是“老保”。当时斗我的是农村里的造反派，我们那个地方的造反派连10个人都不到，有一个是小学教师，还有一个是街上不务正业的人，他是团员，跟人家有夫之妇搞不正当关系，被女家庄子上的人知道后给揍了一顿。事后，团支部就讨论这事，说这还行啊，开除团籍。我是大队的团支部副书记，被记恨上了。

其实说来说去，我没什么罪行好说。斗争时说你是什么罪名就是什么罪名。然后就给我挂一块“修正主义黑典型”的牌子，用铁丝套在颈子上，再插一根铁杆，意思就是“铁杆老保”。还吊了一个瓶子，你不是下乡吗？你不是出名了吗？你下乡捞油水来了，其实我那油水就是工分，除了工分我啥也没有。

说说斗我的那一段？我到现在想起来也不觉得苦。为什么？第一，我没干坏事，心里很亮堂。当时农村没有街就游乡，一游就是来回10里路，那时候我觉得你们这么斗我肯定是没道理，我不服输，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喊口号，我喊“共产党万岁”，你敢不跟我喊吗？他们跟在我的后面走，被我喊急了，就喊“打倒张韧”！我说那我也喊一下“打倒张韧”，也没什么。当时斗人很时髦，我也没当回事。可是晚上他们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开批斗会，非要我承认是“欺骗毛主席”，我就认真了。我是在1964年6月团的“九大”会上，与二十多个青年被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接见的，我曾蹲在他老人家身边照了一张相。我当时惟一嘱咐自己要完成的事就是代表安徽省青年当面向主席问个好。我可能有各种缺点错误，但我绝不存在欺骗。所以，批斗会一直僵持到夜里，最后以我检讨“我没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对不起毛主席”结束。我们那儿的造反派这点还不错，都是在晚上搞“业余批斗”，要是每天白天斗，不让我下地，就完了。第二，我也很感动。开始，我妈被他们斗了，因为她是老革命嘛，腿斗坏了。我把她送到上海，她们厂里把她送到医院去。我一个人在家，不知道害怕，也没什么顾虑。那些农村老太太很有意思，她们到门外来看了，自言自语地说，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我开始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悟过来，原来她们怕我要自尽呢。一个姑娘家给游了乡嘛！当时我真的没有“自杀”这个概念。斗完了回来把那个牌子一摘，把那个铁杆放下来，抄起扁担挑水，煮饭吃啊，然后我再去干活，工分还照拿。到了晚上，那些大姐、大嫂到我后门来看一看，不敢多说，端一碗菜给你。你说我心里多温暖，劲头就更足了。你说你老斗我也没意思嘛，我不怕你斗，你还有意思吗？



排练“沙家浜”，“张导”在指手画脚（1968年）

特别是我们粮站的一个李大妈，夏天我干活儿回来浑身都潮了，收工以后还要挑井水、烧开水；还要煮饭、洗衣服，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晚上还得挨斗，大妈就在门边等着，看我挑着箩走过她家门口，就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一把拉我进去，打一大盆子水让我洗澡，让我很感动啊。干了一天活儿往那水里一泡，那个温暖劲儿那个舒服劲儿……我在洗澡，她就把我衣服搓了。洗完澡以后，她对我说：“你不怕，就在这儿吃。”我说：“留我吃饭，你不怕吗？”“我不怕，我怕什么呀？”就这么着，开始吃大妈的饭。我天天把自己种的菜，园子里的辣椒啊、扁豆什么的放到她家，再带米去，干脆享受。李大妈后来搬到肥西三河镇，我三十多年没见她了，我一定要到三河去一趟，不然心里总有个事儿。

我不过是个知青，没有什么好斗的，确实大家也跟我挺不错，就那么几个人，跟农民也是没有感情的，他们是漂在那儿的，所以那个“造反”活动也搞不长。你泄了气没劲儿了，我的劲儿可来了，就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沙家浜》和许多节目，周围的青年呼的一下都来了，比我挨斗以前靠得更近。我好好过了一把导演瘾，还兼服装道具。我们的《沙家浜》排得非常有意思，很多地方都请我们去演。到了那儿，人家烧一大锅饭，煮一大锅白菜萝卜招待我们。我们的号召力真大，各庄都来请我，也不说“黑”的人不能请了。我们的队伍一出动就是三四十人，都是农村青年和下乡知青，唱地方戏，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交了很多朋友，把我的知名度在本乡本土给搞大了。原来报纸上登了那些宣传我的文章，我的名声在外面很响亮，但周围的公社还不知道我什么样呢。这下子，各乡都知道了，每年都让我们去演戏，打着灯笼来请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前后三四年，我和乡里老的小的、识字的不识字的结下了很深很深的友情。直到今天，他们有人到上海看病，还是跟我联系，还是我帮他们张罗。现在有电话了，电话来电话去，我跟这些老朋友说好了，等油菜花开的时候我回去看看。当年的青年，现在也都有五六十岁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带娃娃到部队探亲（1971年）

1969年，我爱人还在部队，我们申请结婚，部队来人调查。老公社书记廖自坤，自己当时还在靠边站，他对来外调的人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斗她的话是不对的，人家这几年在农村是扎扎实实地干活儿，做了好多好事。”这个老书记的骨头真硬呀，在关键时候为“黑典型”正名，我到现在都惦记他。在安徽时，回肥西先去看他；到了上海，我们经常通电话。去年，我老母亲八十多了，老父亲也八十好几了，专门从上海跑到我落户的地方去看望廖自坤老同志。见面时，老书记的眼泪掉下来了，三个老人的手握在一起。这种感情，我认为是极大的享受，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共患难，没有那样一批正直的农民、青年和干部，如果我没有把那个地方当做自己的家乡并付出劳动，绝对不会说40年了我们还保持这样深的友谊。你今天倒霉了也好，走运了也好，有钱了也好，没钱了也好，都不影响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对我来讲，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当农民八年，到省里工作以后有时还回肥西，到袁店。记得1991年，和庄子里的人聊天，他们说：“张韧，我们就是想不通，你们那个时候演出一分钱没有，唱戏的衣服是家里做的，道具是把自己家里的藤椅子搬过来，一个冬天那藤椅子就坐坏了，排戏是收工以后在你家排，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是啊，那时下工以后天就黑了，岗头上的、畈上的冲冲澡就到我家来了，排戏排到凌晨两三点，天刚蒙蒙亮就从我家直接下田栽秧了，那么大的劲儿，不睡觉就那么干。现在的老头老太太想不通啊：“你们那时候一分钱不要，送戏给我们看，可是现在这帮小家伙，有钱组织也没人干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970年10月，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离开土地了。

我从农村出来后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安徽日报》。怎么进去的呢？那时候不是搞“掺沙子”[5]吗？就是吸收一些政治条件、文笔好的工农兵到报社工作。《安徽日报》向我约过稿，他们向省委推荐的时候就推荐了我，认为这个人年轻、能写、有生活。省委呢，同意了，发了一个调令到县委。县委一看，要把张韧调走，就没有放。一晃就过了八个月。这个过程我一无所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结婚了，我爱人从部队跑到我们乡下结的婚。后来，《安徽日报》通知我去送稿。报社人说：“怎么？调你，你怎么也不来？”“调我什么呀？”“调你到报社工作呀。”我说：“就是不在农村了，上你《安徽日报》来？”他们说：“是啊。”我说：“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去问县委，据我们所知，省委是同意的。”我又跑到县里去，找到县委书记说：“是不是省里调我到《安徽日报》去工作？”他说：“是啊，调令在我这儿八个月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走啊？”他跟我商量：“他们能叫你干，你到我县里来干就是了。”我那时候还是农民嘛。这个时候我就有感觉了，调我到省里工作我为什么不去呢？我的初衷就是可以干这个也可以干那个。当初我愿意到农村去，现在调我到省报工作我也愿意去。结婚要怀孕啊，我一想，那孩子将来到报社不也很好吗？这时思想开始复杂一点了。县委书记原来是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我就说：“你是不是反对？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调走了，非把我留在这干吗？”他只好说：“好好好，那你走吧。”放我走的时候，我已怀上小孩了。报社的人开玩笑说，来了一个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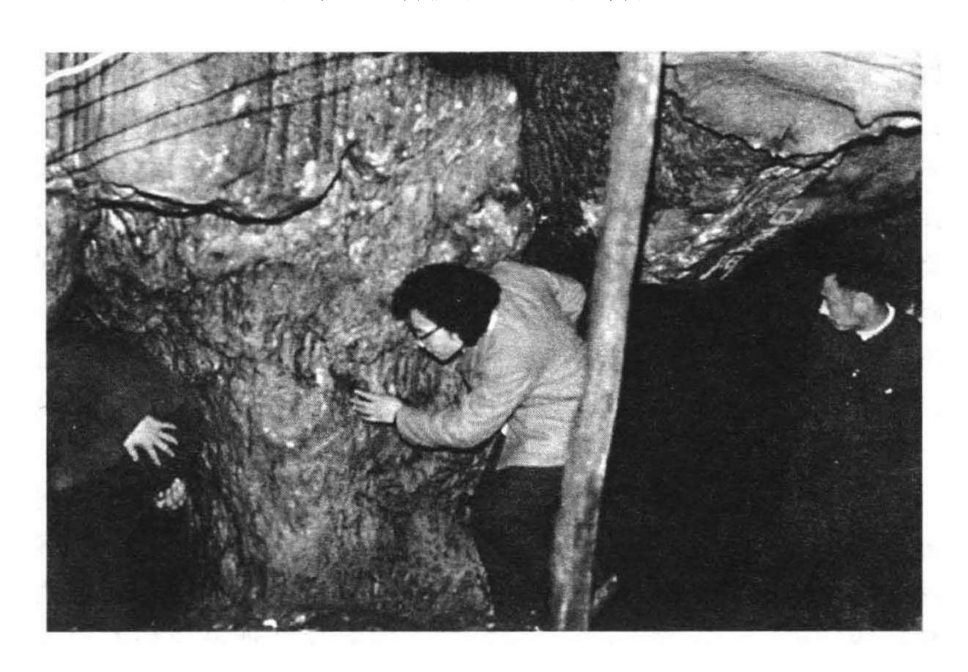
这个世界上就是故事多，后来，我们的孩子就报考了新闻系，毕业后进报社当了记者。

我到《安徽日报》三年，是理论部的编辑记者，也是报社党委委员。1973年重组团省委时，我调任团省委副书记。在报社和团省委，又是一干八年。这八年中，我有“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也有“走麦城”的经历，故事不少，不过今天就不跟你讲了，一来太啰唆，二来，故事都让你表完了，我自己就没了，我还要留一点儿等退休以后自己来做这个活儿呢。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阜南县讲授农业区划业务知识



在山区调查农业资源（1985年）

三　第一冲击波

1978年，省委安排我们几个到基层任职，为照顾我，让我去省里的一个大厂，在合肥市。我心里掂量掂量，还是打了报告，要求去农村，毕竟，那是我熟悉的地方。省委分管书记赵守一批示、赞成、支持。1978年9月底，我离开省城，去芜湖地委和当涂县委报到，岗位是县委副书记。那年我35岁。过了国庆节，县委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为期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三个月。我在的那个班，多为县委书记。大家主学哲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每天听听议议，读读写写，早出操，晚娱乐，倒也自在。

12月的一个清晨，我吸着冬日的寒气绕着操场跑步，听到大喇叭里播出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我心想，这下学习要换新内容了，但是还没意识到，今后我将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县委书记一样，面临着建国以来历任县委书记所没经历过的工作环境。党校当晚就熄不了灯了。大家拿着报纸，凭着直觉激动起来，东一摊西一圈地自发讨论：“经济为全党中心，那阶级斗争算第几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不就穷的穷、富的富吗？”有的人在经过一夜“理性”思考后，第二天深沉地问：“今后集中抓经济工作，究竟是厂长大还是书记大？”“党员能不能先富起来？这算带头转移重点的好同志还是私心太重？”哈，讨论时间不够用了！饭桌上、宿舍里、走廊外甚至厕所里一片争辩声、宣告声、疑问声和开心的哄笑声。尽管大家一时还消化不透三中全会公报，但全体学员对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群情欢腾，完全接受，都认为：人折腾人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第二年麦收后，当涂县委的难题就开始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搞大包干的风声悄悄地、但是飞快地传遍农户：“听说省里不反对……”——县委很清楚，安徽有几个县已经“放”掉了。省委的态度是坚持“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允许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体制。问题在于当涂怎么办？当时，县委一班人总的不想放，因为1978年，当涂工农业总产值近三个亿，其中县级工业一亿，全省第一，就是在全国，也小有名气，正要往新目标冲呢，这集体一散伙，还搞什么？据说江苏华西就是因为集体的底子厚，散不了。可是，这风起云涌的大包干勾住了农民的心，当涂又不如华西，我们顶得住吗？再说，我们县委不想放手大包干，究竟算是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还是“当涂特殊论”在作怪？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秋天，县委书记让我回合肥时找省委书记聊聊，他说：“你是女同志，年轻人，好说一些，问个底吧。”我找到了省委顾卓新书记，他是个坚毅爽快的北方人，不假思索地给我交了底：“当涂可以再看一看。如果你们集体生产搞得下去，省委不会说你们‘左’。如果你们都搞了大包干，也不会说你们放弃集体经济成果。要看多数老百姓的意向，看实践效果。”这番话，暖得我感到坐着的板凳都快化开了。这一刻，我这个年龄虽不大，却已领受过“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各样批判的干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解放的感觉！回到县里一传达，大家也都感到轻松，都说：省委不给我们扣帽子，我们互相之间也别扣，边干边研究。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979年冬，每年例行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召开了。大会上，县委的意见不太明朗，仍倾向维护集体生产方式。讨论时，社队干部吵了个一塌糊涂。有的为县委不明确而发火发急，有的为集体积累将付诸东流痛心疾首。有的问：“包产到户了，队里的公用仓库怎么办？拖拉机分给谁？”有的说：“你操什么心？只要同意大包干，我就有办法分！”有的骂：“你小子吃现成饭不知创业难！”有的笑：“你老家伙死脑子一条道走不到头！”嘿，炸锅了！当然，也有人盘着腿抽闷烟，有人干脆开溜。这会差点儿开不下去了。

县委决定，一边组织春耕生产，一边深入调查研究。1980年开春时，局势更加明朗。无论圩里还是岗上，许多农民不出工了，他们背靠山墙晒太阳，软抗。社队干部说话已不灵，县化肥厂的化肥也难卖动，农民很清楚，全省多数农村实行了大包干，他们也要走这条路。县委一看，耽误生产啦，不行！立即放了个“响爆竹”：各社各队都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决定生产形式，但不能一窝蜂吃光用光分光。

像雪崩一样，不少社队20年一贯制的集体出工一夜之间就取消了；像春笋一样，许许多多的新形式新办法一夜之间就生长出来了。本来最伤神的问题是好地孬地分不均，农民弄了个最简单公平的办法——抓阄；本来最担心的是防汛大堤没人修，农民自定新政策——有人出人，没人花钱雇人；本来抓“双抢”要费劲开誓师大会，层层动员，这年夏收夏种时节，当干部的、做工人的、捧书本的，都早早赶回家“支农”了。

当然，集体经济的坛坛罐罐也被打碎了一些，有的孤寡老人一时没人照应；县财政花几百万元进口的插秧机只能先靠边，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那些产品好、管理好、有市场的社队企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后来发展成上规模的乡镇企业。毕竟，农民是识货的。这一年，农业总产值仍有上升。

1981年，当涂全县平稳地实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大概是最后一批吧。就这样，这一混合着怀疑与希望，交织着激情与欢乐，追求着发展和解放的农村改革第一乐章告一段落。也许，在今天看来，当时我们这些“县太爷”们未免可笑还有点儿蠢，可是，处于农村改革第一冲击波旋涡之中的我，至今想起这一段来，仍然回味无穷。

在当涂县委工作的三年，是我又一段终身难忘的时光，除了经受农村经济转型的急风暴雨，还经受了抗洪抢险的狂风巨浪。但是三年以后，是我主动要求离开当涂的，这是我第一次向组织要求离开基层工作，为什么呢？为了要上大学。

四　第三次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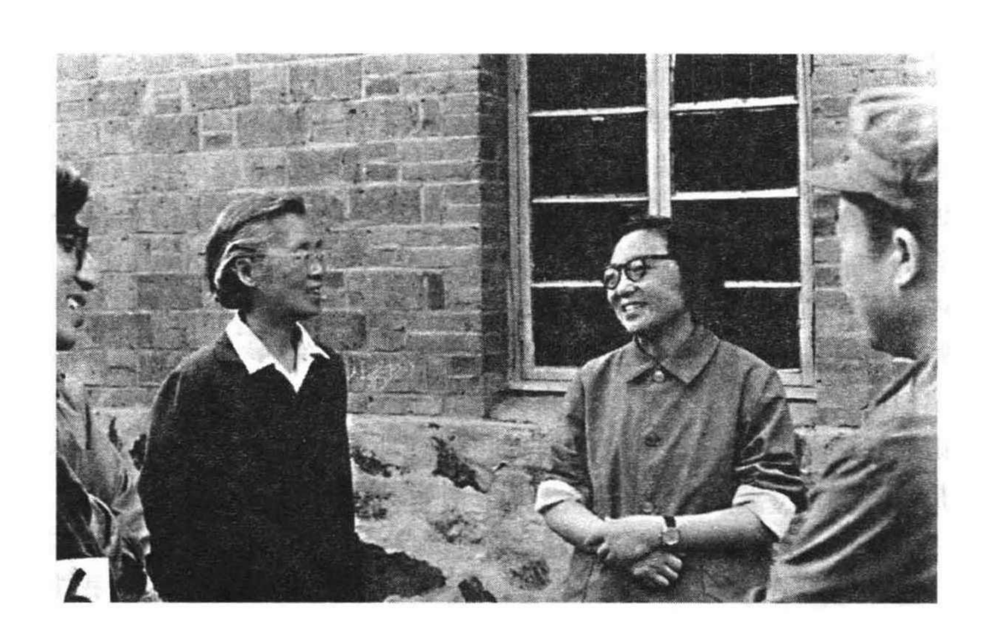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我觉得在农村学习是我们的好时光，一个人一天不看书很难过，到现在也是这样子，哪怕再晚回家，也要靠在床上看一会儿书，这一天才算完了，要不这一天就有事还没干，哪怕少看一点儿。那时候，体力劳动强度大，又远离城市的文化生活，精神的东西特别需要。我们这些人是过惯了文化生活的人，所以下乡时我把家里所有的书大概装了16箱，全部挑下去了，把两个书橱也搬下去了。农民们一看书橱说：“这都是地主家的东西，你们家在上海肯定成分高。”我每天晚上看书，我的老师和同学特别好，什么《新华活页文选》啦，中外名著啦，不断地给我寄。我不断地看，他们就不断地寄。有时候我还写一些小散文、小型文艺节目。当然，特别累的时候，一回来身子像散了架似的，就不行了。直到现在我还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就是喜欢听下雨声。因为在农村，下雨的时候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去干活，雨天其实是很安静的，就在家里翻书，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这种学习我觉得不够，还需要系统学习。1965年到省城开代表会，了解到合肥师范大学中文系招函授生，我就去考了。因为我中文底子比较好，通过考试是比较容易的。学院把教材寄到我的家里来，我做了作业寄回去，老师批改后再寄回来。老师批得很认真，本期题目做得不理想他在后面批上，做得好的他也勾上，就这样到了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一闹起来就不行了，大学梦想又破灭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说我已经学了一年了，半途而废不是我的原因，可以算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不要，因为这学历名不副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说是某某大学毕业的。

到当涂县委当副书记那段时间我没有上大学，也没有听课，但是那时候我跑到党校去给干部们讲课。我说我来试一试，讲历史呀，讲管理呀……要讲，得自己先学，先搜集资料。讲计划生育课要讲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我就猛翻书，把来龙去脉查一查，讲清楚在计划生育问题上中国为什么走了弯路。我喜欢把各种现成的材料整合起来，作为我的课来说一说。在县委，我还分管教育、科委，中学上理化课我也要去听，老师说你来吧。我去听他的课，听完之后就跟他讨论，我是个学生嘛，我就说，你讲的什么地方很透，什么地方学生的思维没跟上，希望怎么讲。老师说，你不像个听课的县委书记，倒像个化学老师，还跟我讨论这？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当涂县接待作曲家瞿希贤（1980年）

我上高中时，老师经常强调：你能听懂我的课，做我的作业，不是好学生；你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才是好学生。我们那些老师到底是华东师大教育出来的，水平都很高。我那时的学习就是有点儿不服气，“不吃别人嚼过的馍”，我很欣赏焦裕禄讲过的这句话，就是要自己学，要有自己的学习方法。我通过思考写出的东西，绝对不抄别人一句话，一定是我自己的话。就是现在工作中给大家讲话，我也不念文件套条文，我要说我自己的话。青年时代接受的良好教育使我要求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对新事物的浓厚兴趣。我是学习的最大受益者，学习使我的思想年轻。

后来机遇就来了。1978—1981年，我在安徽当涂县工作了三年，那时候在职干部也可以考大学了，但是在县里不行，省城行。我第一次向组织上要求离开基层工作，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呢？为了要上大学。我跟省里说，有一句话在县里不敢讲，不敢讲想学习。县里会说，你怎么那么自私啊？我说我没有啊，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啊，他当兵在省军区，我在县里带着孩子、老母亲，三年了，能不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呀？省委书记张劲夫很支持。当时比较年轻的县委书记特别是女的也不多，要离开也不容易。我当时38岁了，又是女同志。我提出这个要求后，劲夫书记拿到常委会上讨论，通过了。

回到合肥后我就准备考大学，那个时候真是想上大学，这等于是第三次高考了。省里分管领导不同意我脱产上农学院农经系，只让我业余学习，我就报了安徽省直机关业余大学，1982、1983年，成人大学必须得参加统一考试。这可是个大关。不过，我下乡离开上海时就把课本随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身带着，以后走到哪儿搬到哪儿，一直没扔。虽然用不着，我就是喜欢它，我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看着它高兴啊！所以1981年回来、1982年准备考的时候，手头就有书。虽说过去了20年，基本定理、基本公式也没多大变化，“文化大革命”中是个空白嘛。考试内容和普通高校差不多，数学、语文、地理、历史、生物、政治都考，还考了一门逻辑。复习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是一种享受啊。心里说，看到那些“老朋友”还能认识吗，那些公式、习题什么的？我年轻时数学学得不太好，现在看起来怎么那么明白啊。复习功课时，我也感到初中高中底子打得好，这确实对一个人很重要。考了七门，每门平均80分以上。1982年，39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正儿八经的大学生，1987年毕业。

这时候我特别想做学生，你知道离开课堂时间久了以后，再回去做学生的感觉特别好，真是如饥似渴，老是想着学的那些东西，听课特别带劲儿。出差啊，开会啊，耽误几天，回来一使劲儿就补上了。老师爱惜我，愿意给我开小灶补课。同班的同学，包括我原来在团省委的干事，现在跟我是同学了，坐在一个课堂里，他们还招呼我呢：“你有什么心得可想着我们一点儿啊。”考试的时候非要跟我一块儿复习，知道我能抓住重点。所以毕业的时候，考试的成绩都很好。

这时候得了好成绩，跟小时候得好成绩的感觉不一样，感到特别甜美，我又回到一个系统学习知识的时代。我从当涂县出来以后，组织上先后安排了两个岗位，都是新开辟的岗位，一个是农业区划，做资源普查和区域规划，在全省做大量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各类农业资源调查，然后把它综合起来，考虑如何因地制宜进行开发。那段时间，我的农业科学知识、综合分析能力、布局的概念、发挥地区优势的概念有了很大提高。还摸索了一套课题及项目的管理办法，大家在一起干得很有劲儿，包括原农业部长何康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都很关心和称赞。

做了大概五年吧，1986年，省计委把我调去搞以数学模型为主要手段的经济预测。以后又把计算机中心和经济预测中心合并为安徽省信息中心。计委主任、副主任把我找去了，他们说：你这人爱学习，接受新东西快，我们给你换个岗位。我说：你能不能先说说预测中心的工作面、研究对象是什么？什么叫经济信息预测，这是干什么的呀？两位领导说：“老实告诉你，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就因为你愿意学习，你去搞清楚了再来告诉我们。”今年春节回去，我去看老领导，我说：你们把一个没摸过计算机的人派去搞这个，你们当时怎么跟我交代任务的，你们还记得吧？你们还说“我们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他们一听都笑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日本研修信息系统建设（1990年）

那个工作对我是很强的挑战。以往做农业区划，我还不太陌生，毕竟在农村干过几年，经济预测信息中心可是完全陌生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到1988年，信息中心还是顺利组建起来了。那个挑战我觉得刺激，我这个人喜欢挑战。

1990年，我参加第三批全国赴日研修团，到日本参加了一个多月的信息系统管理干部研修。天天听课，讲世界上关于这一行的理念和信息系统的开发、应用。开始正课在东京上，后来到大阪考察，把日本的几大公司日立呀、三菱呀全部都考察一遍。当时我就想，你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有时候也要问老师刁一点的问题。最后，由我写一个本团的研修结业小结，因为是结合中国实际写的，日本人也似懂非懂。

全国第三批研修团，有包括中央部委来的学员共二十多人，我是团长。他们开始都挺奇怪，怎么弄了个“土”安徽人来当我们团长？结果，我叫他们都高高兴兴地听我的，那我就最得意了，这也是一次挑战吧。那是信息系统“六四”以后第一次组织大团出去研修，用的是日本的基金。日本人当时的心态也有些微妙，有点儿傲，我们这个团团结得很好，学习得很好，把我们中国人的很多优点展示给日本人看。最后，那些日本人都喜欢上我们这个集体了，围着我们团团转。以后他们每次到中国来，都要来看我。几年后我迁移到上海了，他们还要“把张团长找来”。在东京学习之余，我们搞文化交流，写毛笔字，我说，我算一个。我们也就是老高中的底子，写毛笔字比起现在的大学生要好，比起老人要差一点儿。日本人都傻眼了，他们见了老师毕恭毕敬。我们这个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团很活跃，卡拉OK不是日本发明的吗？我们唱得比他们好，唱了一个又一个。比唱歌他们也傻眼了，最后晚上也不回家了，陪着我们。日本人对我们非常佩服，很喜欢我们的氛围。

1970年以来，我经历过十三四个岗位，行业跨度大，客观工作逼着我学习，学习伴随着工作每天迎面而来，推动我们跟着时代走。我总觉得我还是个知青，因为有知识，所以总年青，因为年青，所以总想学。现在学习有困难了，因为得了比较重的颈椎病，看文字的东西时间不能长，但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学。这个时代发展变化太快，我不想被时代甩远，许多高精尖的东西我已经学不了了，但总可以尽自己的可能多学一点儿，千万不能让脑子老掉了。

五　回到上海

1992年，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到了上海。她应该算是上海知青子女，但一直没有回上海，在安徽跟着我们也很好嘛，她考大学上的是军队院校，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时她到上海实习，留在上海工作了。我就想了：女儿在上海，我和丈夫一个在合肥一个老在军队里移来动去，一家分三个地方，我和丈夫都50岁了，这不是个长久办法。我对丈夫说："咱们俩商量一下，是不是转业？如果继续留在部队，五十二三岁就该把你养起来了。你50岁转到地方还能找工作，过了50岁哪儿也不接收了。"他就提出来转业，他是从上海当兵的，转业转回上海，我就成了随军家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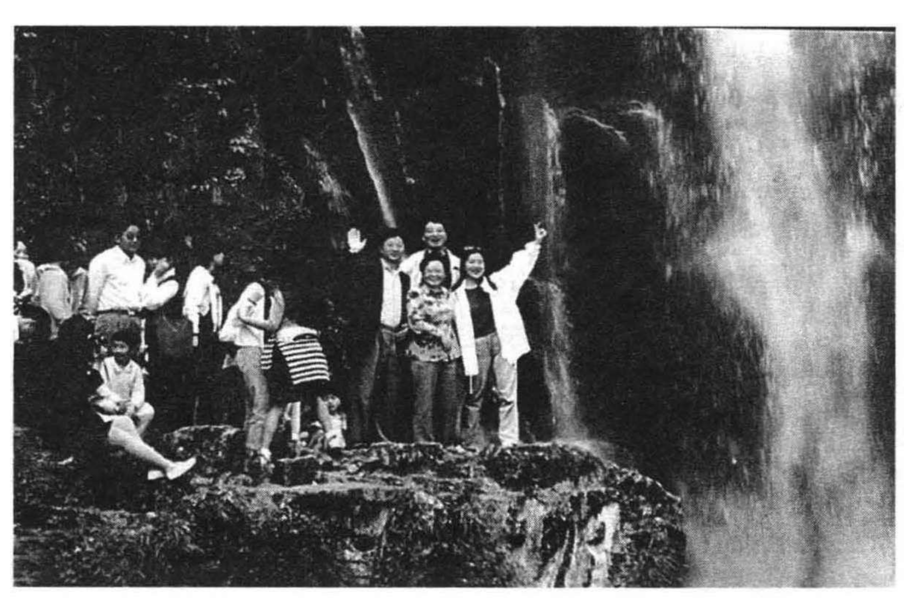
回来以后，广电局要干部，领导说，你们两个都合适，但只能来一个。我说，他去，当兵的先到位吧。我的档案可以送出去，对方可以选，我也可以选。结果三个单位约我谈，都看我的经历丰富，我还得过好几个科技奖，有安徽科技成果奖、论文奖，农业的有，信息的也有。工作单位嘛，有的是"清水衙门"，有的很有腐败条件，比如省计委商贸处，反正，角色繁多。

但是我很喜欢选择。我绝对没有这个心态，说我在安徽怎么怎么的，要组织上给我分配什么工作。我愿意把档案拿出来，互相挑选。我喜欢挑战，我喜欢选择。很多人都误解我们，认为这些人仅仅是党的驯服工具啊，是老古板啊，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受过的那些教育，让我们成为很鲜活的一个人。因为华亭旅游集团先通知我去谈话，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党委书记和人事处长让我自我介绍，我有这种意识，说了我很多优点、优势。在我们这种年龄，一般是很客气的，我没故作谦虚，我就说我做过什么，写过什么，评过什么。我大学一毕业就破格评了高级经济师，论文拿出来一大摞。他们说："够了，够了，太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多了，用不着再介绍了。我们都知道你在省里结合实践工作出过有分量的东西。”然后，那位党委书记说：“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缺点啊。”我说我的缺点是改不掉的，如果这个班子团结，我是越干越有劲；只要这个班子有问题，我就想逃，我就赶快走。人的矛盾我受不了，我绝对是很难受很痛苦，党内矛盾我不行。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看到这个我让，我逃。他们笑了，就说：这样吧，我们开党委会研究一下再通知你。我的档案去了一个星期，他们跟我谈话，谈话后一个星期，他们说：“赶快来，一个条件，不要等了，你先来上班，关系慢慢转。”有人很奇怪：怎么没转关系就来上班？我无所谓，先上班有什么的？这边不给工资那边给，我来看看适应适应。所以，这次改行转轨是很愉快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和青年人在一起最开心（1998年）

旅游管理工作，从1993年到1995年，这工作很有意思、很有劲儿的。我做宣传，做企业形象，把上海搞旅游的新闻记者都联系上了。没想到后来我到报社，这些旅游记者变成我的同事了。我说，我那时候给你们“行贿”，请你们吃饭，让你们帮我们写稿子，现在我要求你们不要接受人家的礼金，我的屁股转过来啦。他们都笑。我的朋友们说，这饭不是好吃的。我说，有什么不好吃的？那时候请你们吃饭，也没请你们办坏事，有什么关系啊？只要不收钱就行。

怎么又到报社去的？那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在搞干部交流时推荐的。市委宣传系统也搞跨行业交流。从高校进机关，从经济领域进机关。一翻我的档案，有《安徽日报》这个经历。1991年我在计划委员会时还创办过《市场报》，不要让人家认为计委就是只搞指令性计划的嘛，计委是引导大家走市场经济的，省计委主任很支持，说：“好！”我成了第一任社长。经市委组织部提名推荐，上海市委研究后，1995年8月就将我从华亭集团调到《新民晚报》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这对我又是一次挑战，因为《新民晚报》有七十多年历史，藏龙卧虎，社会影响很大。而我在安徽呆了31年，回沪不久，能不能站住脚？加之，当纪委书记也是头一回，能不能把握得住？第一天到报社，有人听说来的是个老知青，就说“来了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可是时间不长，他们认为我是那个可以在一块儿玩儿的老张。

1998年7月，上海市把《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组合成一个报业集团，我任集团纪委书记，一直工作到现在。2003年7月，我就60岁了，可以回家了。我很期望这一天，因为我本性比较散漫，虽然在认认真真坐班，但心里是很讨厌坐班的，现在的“规定动作”做完后，我终于可以“自选动作”了，干我喜欢的事。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研究报业大楼的装修

从2000年开始到2001年、2002年，我两次要求退休。我说：“中央规定，女同志处级以上，如果身体健康、工作需要、本人自愿，可以干到60岁，没讲一定要干到60岁。我现在下来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我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应该让年轻人充分利用这个位置。第二，工作起来也力不从心了，这包括身体条件、知识结构。现在报纸上的生化、证券、计算机、汽车信息，自己看不懂的多，感到不带劲儿了。自己下属办的报纸登的东西，自己都看不懂了，说明已不能适应这种大的报业集团领导层。第三，我可能还有其他优势，是在这个岗位上不能发挥的。我退下去，有利于干部的年轻化，有利于发挥我的其他才能。我绝不是意志衰退，也不是装腔作势。现在叫我回家我永不埋怨你们，我不后悔，这行了吧？”领导说得也很有意思：“你愿意，你想得通，社会上会怎么看？怎么别人都是到60岁，为什么你女同志不到60岁就下？他们会认为我们对你怎么样了，对我们有看法。你算了吧，你能干多少干多少，也没压你嘛。”其实是我自己心里有压力，因为我干一件事情，总愿意尽自己能力发挥到极致。当上级决定由我负责修建现在的这幢48层的报业大厦后，我到北京跑了一圈，把政协大楼看了，把新外交部看了。去了深圳考察，又把过去跑各个国家时自己因喜爱而搜集的建筑美术、装潢的资料拿来反复琢磨。我拼了很多力气，然后装建成了一座大家都认为还可以的大楼。世界上二十几个国家搞新闻的都到这儿来过，包括默多克新闻集团和美国的几家大报团，来了以后，他们都赞赏我们的报业和这幢报业大厦。我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会建楼，因为比我们这幢大厦好的多得是，我想说，我要干就要干到一定的份儿上，没能力做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到很高的水平，自己心里不舒服，就不如不做。我应付现在的工作，谁都会说我应付得还可以。但是我觉得，要再上台阶也难了，做纪检工作也得掌握新知识。说实在话，如果要我现在学现代财务，要我学金融什么的，我对它一点儿也不懂，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我想，人有追求才有生活质量，哪怕我回家也没关系的，退休以后也可以有力所能及的追求，但是不要再去做那些自己确实难以做到的事情。退休了也可以是新的开始，当然现在还没退休，我还是咬着牙吧，完成岗位职责。

坦白地说，知识青年当中我是比较幸运的，虽然经受了很多磨难和坎坷（许多“走麦城”的事还没说），但今天有较好的境遇。人的道路与客观大环境和自身的德、才及机遇有关系，许多老知青，他们自身的条件比我好，但没有机遇。客观是埋怨不上的，客观是一种必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原本是健康的、自然的，一大批文武兼备的新人可以成长起来。但这个“如果”是不存在的，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是有其历史必然的。也许中国的改革早一点儿快一点儿，更多的同龄人就能在中青年时期发挥出人生的价值，但是这个“也许”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渐进，急性子的人要想明白一点儿，都急性子是要翻船的！渐进比激进好，渐进呢看来慢一点儿，实际是顺一点儿地往上走。何况现在从整个经济发展来说，发展得也不算慢。所以，有时候要离开自己的心情，离开所属的这个圈子看一看。当然，世界上没有急性子也不行。

我不是“老三届”[6]，我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数量不多，有思想基础。八年当农民和那以后的奋斗，满足了我对生活释放自己能量的追求，我要让我自己干得过瘾，干到“超载”。当然，现在也得有“自知之明”，量力而行了。

但是对“老三届”，我感到历史上没有个明确的提法，舆论上也不尽公平，非常希望来一个公平。我认为，对于“老三届”自身一些优秀的东西，社会应该给予明朗的、公开的承认。就像邓小平估价三年自然灾害时城里人下乡那样，他说，中央一声号召，全国3000万人到农村去了。起码说大家爱国，为大局利益做出了行动，为解决国家困难做出了贡献。其实那千千万万人中，也有被动的，也有刑满释放的，也有在城里生活不下去的，但那是另一码事，大部分是响应中央的号召的。“老三届”下去更有所不同。固然有当时“文化大革命”引起的中国社会问题，要将青年人流引向农村，但“老三届”是满怀一腔热血，要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献身，他们有的步行千里奔农村，有的写血书要求去边疆，去了也都舍下身子为改变当地面貌拼死拼活干，与农民结成友谊，这难道不是现实？这难道都是牺牲品？甚至都是极“左”？毛泽东主席和中央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以及后来不得不采取大搞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与青年自身的追求是要分开看的，不能因错误的运动而抹杀了青年一代的主流。千千万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后，他们对农村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江西青年对我说：上海青年到江西插队，对我们老家有好处，我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就是上海知青教的，我们当地的小学老师那时自己都不会。“老三届”知青和“新三届”知青也有所不同。“新三届”年纪小，无可奈何地被动下乡，自身优势少，农民视为负担，社会大环境不好，他们受的伤更多些。我理解“老三届”，我和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好朋友，有共同语言。有些人讲到“老三届”，或悲悯，或摇摇头说：“‘左’！幼稚！”我听不下去，这些人脱离历史社会，脱离这一代优秀青年的实际，用概念套。我想问一问：现在的“老三届”，不论他是比较顺的还是比较坎坷的，不论他是生活质量不错的还是比较贫困的，不管他在什么岗位，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大家一说是插兄插妹就有一种无形的亲热，都有一种不可排解的情结？比如，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队落户的青年，回到上海后每年年初四聚会一次，大家自掏钱AA制，一来二百多人，已经坚持了10年，而且每人每次捐30元给蒙城的贫困失学少年念书。是什么将他们长期凝聚在一起？是对火热青春的自豪，是对理想的执著，也是对艰难岁月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亲身感受，是图解不了的。他们之中许多人已经退休了，但仍然还抱着一份社会责任感，仍然关心比他们弱的人，这难道不是最可贵的吗？这不正是少数自翊为高贵的精英所贫缺的吗？总之，我爱我的弟妹——“老三届”们，很爱。至于后来知青的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其分水岭，主要在于有没有上大学。上了大学的，正赶上国家知识分子断层，干部断档，他们及时地补进去了。现在党和政府部门中的中高级干部、基层领导，大学、研究院所中，知青出身的很多，还有一大批作家、文化人。而没有条件进大学的，或当时顶替父母回城工作的，由于文化低、年龄大，又遇上企业转制，生活困难，子女教育、看病吃药都有问题。这种分化，是社会尤其是大转型中的社会必然遇到的问题，也只有靠整个社会的进步才能逐步改变，也许还要一二代人。所以，往往心情是一回事，规律又是另一回事。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草原深处（1999年）

你问为什么很长时间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走出光环。“文化大革命”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宣传，一方面为我打开了通向社会的大门，也让我套上了“先进典型”、“代表人物”的光环，让我与社会隔了一层，除了农村家门口的乡亲以外，走出去，别人都投以特殊的眼光，我觉得不自在。尤其1970年以后，我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我不希望别人以为我是靠什么什么名分为资本的，而是希望别人承认我是以自己的实际能力来胜任各个工作岗位的。我不希望别人是因我的过去而接受我的领导，而是凭我现实的言行真心愿意和我合作。所以，在当涂、在计委、在上海，都曾有作家或记者来联系，说要写一写，我都明确谢绝了。倒不是不珍惜过去，过去的岁月使我锻炼了在社会上自立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帮可以共患难的朋友，这就足够了。老在那儿翻仓库数元宝也没意思，要用有限的精力干今天，学明天。有的人要写我的今天，那就更不必了，那么一来，不就又像天天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了吗？我特别想以我本来的自然面貌自主自在地生活和工作，何况，新时代里，比我们强，比我们新的人物太多太多了。回上海后的10年，我接受过两位记者的采访。一次是刚回沪，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文汇报》的陆幸生不知从哪儿听到了，当时我在华亭集团，那天他从老远的浦东骑摩托来。那时，没大桥，没高架路，没陆家嘴的隧道，他到浦西靠西郊的地方找到我家，找了三个多小时，吃了苦，我又听说他是下乡到黑龙江的知青，于心不忍，就把真实思想告诉他，也说了一点儿简况，他很理解我的“走出光环”的想法，他在整篇报道侯隽、董加耕时，只挂上了我的一小段情况，白白让人家说他“上海记者不重视上海知青”，我却很感谢他的知青情谊。再后来，《文汇报》《新民晚报》组成报业集团，我们竟在一个单位了，我们之间不是记者与被报道对象的关系，也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知青老友加同事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当过兵的人和下过乡的人之间才有。另一次，是上级领导安排报道一下上海的新文化建筑，其中也包括文汇新民报业大厦一篇，当然我最清楚情况，也没有推辞的必要，反正不是以写个人为主的。

今天倒是不由地给你讲了这么多，这是破例了。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快要退休了，没有“光环”的威胁了。二是你要通过形形色色的知青来反映我们这个丰富多彩的群体和社会，我算是品种之一吧，又是口述，比较自然。说不定还能消除一些被别人硬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呢。其实，我们和我们上一代打江山的那辈人一样，有很强的信念和意志，也有很强的个性，信不信由你。

---

[1]邢燕子，著名知青典型，河北宝坻（今属天津）人。她的父亲是天津市某厂副厂长，母亲也在城市工作。1958年，她从学校毕业后坚决要求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经济困难时期坚持留在农村，组成“燕子突击队”，与困难顽强斗争。1960年，经过媒体宣传，成为一代青年的楷模。

[2]徐建春，著名知青典型，山东掖县人。1951年小学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从此在全国出现学习徐建春的热潮。她是全国最早树立的知识青年典型，还是全国劳动模范。

[3]196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方针的重大改变。

[4]“四清”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中，把“四清”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场在极左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蒙受了不应有的打击。

[5]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就是掺沙子。以后，把“掺沙子”的含义加以引申，如选派工人、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代表进入文化、教育、宣传、行政等单位，都叫“掺沙子”。

[6]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大批中学毕业生不能正常升学或分配。到1968年秋，积压在校的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已达1000万人（其中城镇中学毕业生累计400万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以后把这三届毕业生统称“老三届”。因为城镇中的“老三届”绝大多数有过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上山下乡的经历，所以在很多场合，“老三届”又成了“知识青年”的同义词。与“老三届”相对，又有“新三届”之称，一般是指1969、1970、1971年毕业生，称作“新三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

——曲折口述

访谈人：刘小萌　李南

时间：2002年3月7日

地点：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院

［采访前记］　在知青历史中，有一个人物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曲折。按说，人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曲折”的名字里，浓缩的却是他的全部人生。

在“文化大革命”掀起的上山下乡高潮中充当开路先锋的，就是以曲折为首的10名北京中学生。曲折所以最先跨出这一步，是与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是北京二十五中高中三年级学生。运动初期，在各个中学，一批应届高中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反党分子”、“野心家”。曲折和同班同学李冬民（后来的北京市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也在其内。他们在校内被批斗达四十余天。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严厉指责派工作组的做法，指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即，全国形势陡然一变，曲折等人的罪名一扫而光，成为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段起伏跌宕的经历，增加了曲折及其战友对毛泽东的虔诚、热爱和感激的心情。“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解放了曲折”[1]，这确实反映了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1967年3月，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一批崭露头角的学生领袖跻身于它的领导机关。李冬民担任红代会的主要负责人，曲折作为红代会政治部负责人，主管红代会的报纸——《兵团战报》。以后，因为对学生中旷日持久的“派仗”感到厌倦，曲折等人于7月发出了关于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进而又提出实现思想革命化，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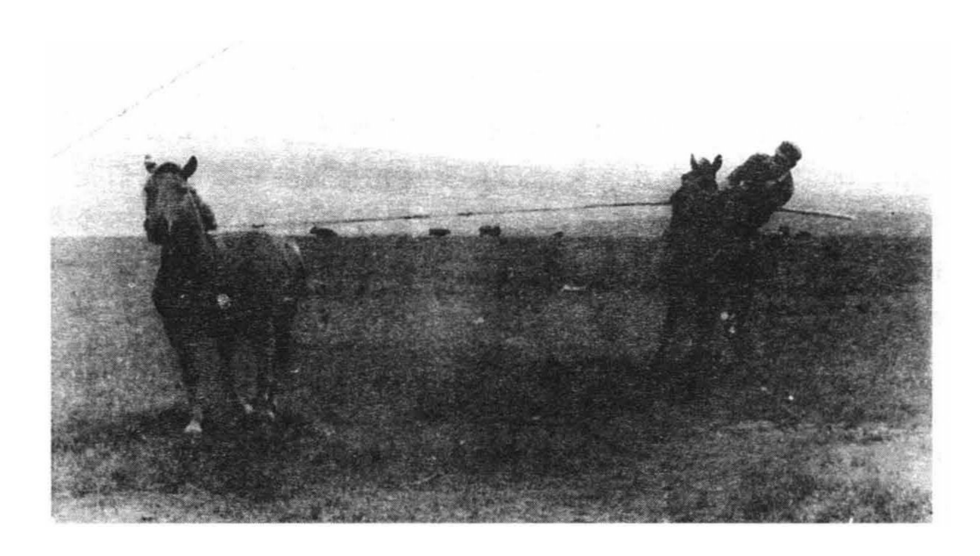
在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上，曲折等人深受20世纪60年代初期官方树立的上山下乡典型人物的影响。而广大农村缺乏知识，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而又迫切需要知识青年的现状，也促使他们做出走上山下乡道路的决定。[2]此外，1967年初官方旨在动员返城老知青重新回到农村而开展的有关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宣传，对他们的选择也产生了直接影响。5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强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广大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当曲折等人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提出到边疆插队的志愿时，就是以这篇社论为依据的。

曲折等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北京市革委会的全力支持。10月8日，北京市革委会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座谈会中赞扬他们是“开路先锋”，预祝他们打好第一炮，以后把经验写回来，“发动不少的人再到那里去”[3]。足见官方对他们的支持，是与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的棘手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1967年下半年，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已经普遍感到六六、六七届中学毕业生大批滞留学校造成的压力，所以，官方急切地希望曲折等人的行动能够带动更多的毕业生到农村和边疆去。另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考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行动，打退“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指那些20世纪60年代初下乡、又趁“文化大革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命”初期的混乱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把那股歪风打下去”。在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的讲话中，与倒流回城的老知青们展开的斗争被夸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套住飞奔的骏马

1967年10月9日，曲折和九名同伴启程离京。临行前，他们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上千人的欢送队伍前，向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像庄严宣誓。誓词说：“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心甘情愿！”“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曲折10人在掀开上山下乡历史崭新一页的同时，还创造了这种独特的政治仪式。如果不是有过亲身经历的知识青年，未必能够理解在这篇由颂誉之辞和豪言壮语编织的红色誓文中，会凝聚着那么多虔诚、炽热、圣洁的情感，那么强的自信与盲从。从此，一批又一批北京知青在奔赴农村和边疆之前，都必须到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这样一场仪式。

曲折等人动身前往内蒙古牧区时，声势造得很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都及时进行了专题报道，充分肯定了他们选择的道路。中学红代会机关报《兵团战报》高兴地预言：“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市、全国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正在轰轰烈烈地兴起。”[4]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不可能存在纯自发的行动。曲折等人在当时，也并非全然没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

曲折10人的行动，代表了一代城镇青年的方向。在他们的身后，一共有一千四百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足迹遍布农村和边疆。

1968年8月我下乡的地点也是内蒙古牧区，但比起曲折他们来，整整晚了10个月。在当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差，意味着你在革命的道路上已落后了一大截。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到草原后的第一次劳动，是牵着牛车一步三蹭地捡牛粪。望着漫无边际的荒草，想起一个星期前还坐着无轨电车在马路上穿行的情景，我心里就像塞了团棉花，不是滋味……说实在话，下乡之初，我就缺乏曲折那种因理想主义而迸发出的激情。

几十年过去了，似乎在转瞬之间。

90年代，因为研究上山下乡运动史的关系，参加知青的一些聚会，与曲折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过一二面，都没有深谈。直到2001年底，在福建作家谢春池组织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上，我们才开始有了真正的交往。通过访谈，我发现，曲折阅历之丰富，远超出我当初的想像——从“文化大革命”前的好学生到工作组黑名单上的“反革命”；从叱咤风云的红卫兵领袖到下乡的急先锋；从知青典型到“挖肃”的领导；从自治区头号人物的秘书到劳动服务公司的经理；从地矿部的笔杆子到下海经商——在人生的几起几落中，还穿插着理想与忠诚、亲情与友爱、造谣与中伤、欢愉与希望、成功与失败……这些旋律与音符的有机组合，把他的曲折人生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

经历曲折而不沮丧，环境变了，年龄大了，惟独积极进取的精神没有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拳拳之心没有变，这是曲折的一个优点，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

曲折长于叙说，记忆力又好，说起那些陈年往事或者什么逸闻趣事，总是绘声绘色。他的口述，内容精彩，对于启迪人们深刻反省过去的那段历史，是很有价值的。

一　幸福的学校生活

我在小学、中学一共读了12年书，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我感觉这是很幸福的12年。不管是在小学还是在中学，我都是好学生，老师喜欢，同学喜欢，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小学在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小学，一年级当了班主席，这一当就是六年。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从三年级开始先当中队长，四年级就是大队主席了，一直当到小学毕业。



小学时的曲折

升中学时让自己报志愿，我想报男四中或一零一中学。老师说：“你到那儿上学太远，不如找个近点儿的。”近点儿的有什么理想的学校呢？挑来挑去挑了二十五中。为什么挑二十五中呢？因为它当时搞教学改革，进行十年一贯制的教育。我觉得在中学可以少上一年，初中和高中五年就可以毕业了，所以考了二十五中。

进了二十五中，初中一年级我当大队长，初二时还当了大队主席。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初二第一学期，第一批加入共青团。1963年初三毕业时，市教育局决定停止十年一贯制试验，四个试验班中有一半的学生未经升学考试直接升入本校高中，我是其中之一。高中一年级时，我担任少先队辅导员，高二、高三时又当了班主席。中小学整整12年，我确确实实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受过挫折。

当时受的教育，素质教育的成分相对大一些。比如说，课外活动比较多。小学四年级时我参加了小学生合唱团，五年级时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分在低声部。合唱团唱的都是很好的歌，基本都是流行的少儿歌曲，《山歌向着青天唱》、《三面红旗万万岁》、《向着东方》、《学习刘文学》等等。初中二年级时，参加了航海队，在北京后海学习舰船知识、划舢板。初三暑期，学习报务。高中一年级参加跳伞训练，每周到伞塔去练习，后来因为视力问题没能参加飞机跳伞。而后，又参加了北京市科协的中学生物小组，对于生物学，那时就很喜欢，一直到现在我从事生物技术开发方面的业务，跟当年的兴趣、爱好都有关系。中学时我还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小提琴，有时参加节假日的演出。整个学校生活都非常幸福、充实。

今年春节期间，我夫人郭兆英的十几个同学到我家来，其中两个就是原来生物小组的，我们还一起参加过1965年的生物夏令营。夏令营设在和鹫峰毗邻的金山。鹫峰位于西郊北安河，生长在峭拔峰顶上的两株树冠巨大的古松，远远望去，犹如两只钩喙箭翎、昂首张嗔的山鹫，这大概就是鹫峰得名的由来。鹫峰孤峰峻岭，绿荫匝地，是避暑的好去处。我们的夏令营办得非常好，辅导员、老师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早晨起床时，辅导员进到各宿舍，统一测量脉搏，午休后也如此，观察每人的健康状况。上山观日出，凌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爬到峰顶，太阳还没出来呢。过一会儿，太阳喷薄欲出，半空金光，驱走黑暗。那情景，真是壮观！上午按照老师的要求捕捉昆虫，采集植物，带回去做标本。下午天气比较热，一般是专家来讲课。

不过，那毕竟是红彤彤的年代，没有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听政治报告，参加反帝反修的演讲和宣传，参加示威游行，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学校里都经历过的政治实践。即便在夏令营，政治活动也没有停止过。1965年生物夏令营期间，正好赶上美国轰炸越南17度线以北，这是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的。广播当天，夏令营的小营员们立即在老师组织下召开声讨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

我第一次提出上山下乡是1960年，还是上初一的时候。那时候，知识青年的榜样是邢燕子。政治课上讲的是国家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当时正值困难时期，粮食奇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缺，饥荒遍地，人们吃不饱饭。老师在政治课上强调我国农业基础特别薄弱，要全党大办农业。我感到农村特别需要有志气的人。当时是农业集体化的快速发展时期，而且公社的规模越搞越大，就连会计出纳都难找。你想想，邢燕子作为知青典型，她下乡时才小学五年级。所以，我觉得应该承担国家的困难，到农村去，就提出了下乡申请。班主任马老师给我做工作说：现在你们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有更重要的任务。我问：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他说：两弹上天，粮棉过关。这是一个非常尖端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就这样，我打消了下乡的念头，继续踏踏实实地学习。

这样到了1963年，我还是非常想到农业第一线赶紧为国家做贡献。我有个同学叫王惠民，在大佛寺西街和作家赵树理住在同一个院子，经过他介绍，我有时到赵树理家去玩。有一次，我对赵树理说：“我在1960年就提出了上山下乡，学校没同意，现在初中毕业了，挺想上山下乡的。”他告诉我：“东北的大庆油田已经开发出来了，那儿需要人，如果想走，这条路倒是可以。”那时，大庆油田还处于保密状态，我以前不知道，第一次从他那儿听说了大庆。这段时间很短，还没容我好好思考，就一下子转到高中了。我继续上高中，学习还有股子劲头。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我认为“两弹上天”不再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我的事业还是争取“粮棉过关”，更坚定了上山下乡的决心。所以，一等到高三毕业，我就把自己的书拿给别的同学去复习了。那年毕业工作进行得早，4月份就开始准备高考了，别人都埋头准备高考，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不准备考。那些天，我每天在学校里干活，垫操场什么的，优哉游哉地成了自由人，就等着分配时卷铺盖走人。班主任李老师曾建议我报考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我说：“现在农村的问题始终没解决，我特别想上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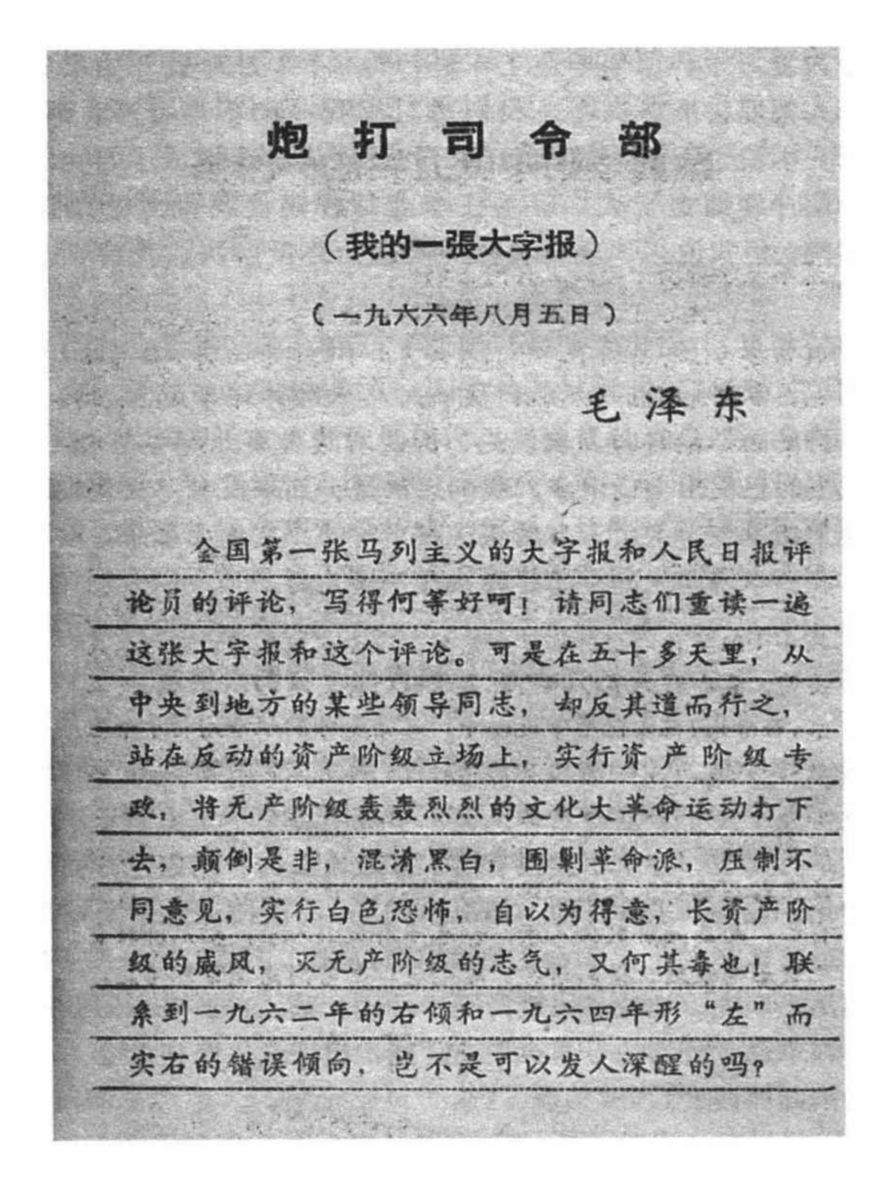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翻看那些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5]火药味越来越大。班上有些喜欢文科的同学也时时发表议论，但我对这种事儿却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当时已提出上山下乡。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也会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想法跟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关联。我的学习与志向是始终联系在一块儿的。

二　“文化大革命”狂飙改变了我的人生路

1966年5月，学生的思想已相当活跃，“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复习功课的高三毕业生也拿不定主意了：今年还会不会举行高考？心里不是很有底。多数人认为，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没有变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化。但是到了6月初，情况不同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狂飙引向全国。千百万人——不分年龄、阅历、职业、地位、民族乃至于性别，陷入前所未有的狂躁和冲动中。在革命大批判的号角声中，学生走出课堂，杀向社会。一代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張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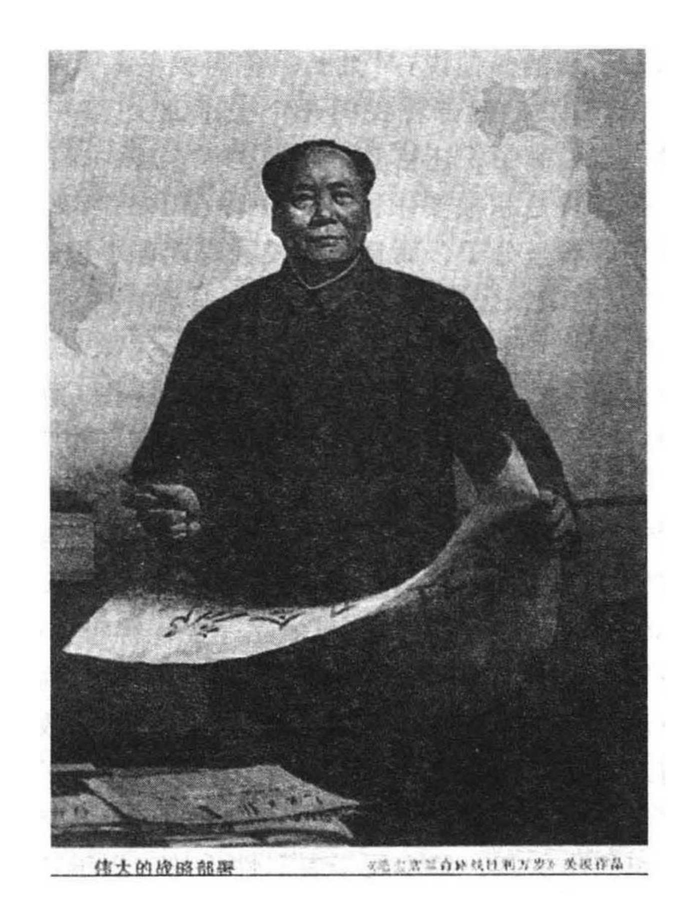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

在新的形势下，我也不在学校里干活了，我要参加运动，我是班主席呀！但在6月7日以前，我是属于“保守”的那一类。6月3日开始，学校里很多人贴大字报，我觉得有些大字报言辞过激，对党支部、对学校的说法过头，于是就在6月4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意思是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学校党支部和学校领导，应从爱护的角度去批评。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教室西面的过道里，但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其他大字报淹没了。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叫韩越，他对我们这些学生一向很不错的。他说：“曲折，你再找些人，咱们去北大看看。”这样，党支部书记就带着我们几个去了北大。一看那大字报，在很多地方都已经贴满了，还密密麻麻挂了很多层，而且开始涉及一些上层人物。我当时是积极要求入党的，曾在1965年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是党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学校教育改革小组成员。回来后我就问书记：“我们学校怎么办？”书记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事情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比较混乱，党支部应该出来领导。他说不行，党支部不能做这些工作，现在老师也好，学生也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好，给党支部提了些意见，你们也应当和广大师生站在一起。

我一看党支部书记撒手不管了，就在班上和李冬民等几位班干部商议是不是以班为单位搞成一个组织，成立一个战斗队，大家都同意。“他们成立了那么多组织，我们也成立一个，就叫‘东风战斗组’吧！”“战斗组”成立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大字报，而且是大小结合。大块文章以李冬民为主来写，因为他早对教育制度改革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对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攻击有力，由他起草了《向修正主义开火——关于我国教育制度改革问题的看法》，一写就是上万字，很长。我负责组织小文章，基本属于表态性质的，属于一种“短剑”，他们写的属于“长剑”。这样，“东风战斗组”就在6月7日成立了。

别的组织都是你一个人、他一个人或两三人的，力量很分散。只有我们的组织是以班为单位，原来的班干部就是“东风战斗组”的领导成员，一共六七个领导成员，做好了分工，这下子，马上在学校起了主导作用。当时，大字报在校园内满天飞，乱七八糟的，没有人记录，也没有人管理。到了8日，我觉得学校里不能没人管，就倡导组织大字报管理委员会，先串联了一些老师，得到他们的支持，又把在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一些人找到一起征求意见，基本确定了大字报管委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6月8日晚上7点钟召开全校师生大会，由我主持，先由部分候选人对当前的运动作表态性发言，接着对大字报管委会委员进行提名，我念完名单，说：“同意的请举手。”“哗”，大家都举了手。通过这种方式，成立了大字报管委会。大字报管委会有11名成员，我们班有我一个，侯子贞一个，其他都是别班的学生和老师。会上还选举了管委会主席，经我提议，由最早在学校贴大字报的高三一班的白克刚同学担任。

管委会成立的第二天，工作组进校，没想到很快就出了问题。对工作组进校，我脑子里当时想这是好事，欢迎！这样就列队把工作组欢迎进来了。工作组是由共青团和工会系统派下来的，刚刚结束在郊区的“四清”。他们一进校，就搞“扎根串联”，分头谈话。我觉得工作组对一些问题处理得不太合适，比如说学校大白天壁垒森严，把大门关上，只留一道小缝，谁进来谁登记。我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就找工作组谈，提出意见和建议。工作组当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表面上不理睬我们，暗地里却开始对我们班进行分化。我和李冬民晚上经常不回家，住在学校里，有时上午回家一趟，他们就利用这段时间找个别人谈话，进行分化瓦解。

工作组做分化工作，最初不是在我们班，而是在大字报管委会。管委会的分化工作完成后，开始筹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在全校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各个班统计一下。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整我们了，没想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到这么一选，我和侯子贞又都当选了，这是工作组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威信比较高，而且在运动中总的来说大家都觉得比较可信，而且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工作组认为选举结果不能接受，就利用手段把一些同学拉过去了，以后就操纵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对我们进行批斗。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搞突然袭击，限制人身自由。

6月24日晚上，他们通知我和李冬民到图书馆参加一个会，这个会由工作组策划、革委会的头头主持，这个会的惟一内容是揭发我们的“问题”，还有录音。当场我们和他们吵了起来。中途我们去找工作组，指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很明显，工作组已经把我们当敌人看待了。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我和侯子贞被停职反省。紧接着，他们在7月8日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批斗会，参加大会的，不光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别的学校也找来了，大约有5000人。开始，我们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是会议开始时才把我们“揪”到台前的。这次会议从早上8点开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虽然我和李冬民在会议上据理力争，驳斥诬蔑不实之词，但这次会议还是把我、李冬民和另两位同学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我的关键“罪行”是：第一，反党。具体证据是：反工作组。我们向团中央反映过工作组压制学生的做法，团中央把材料转给了工作组，这就是反工作组，而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第二，反社会主义。证据是：1965年召开三届人大时，周恩来总理讲了教育制度改革问题，提出了一个双轨制[6]，也就是全日制正规教育与半工半读教育并行。我当时提出一个不同意见：学校的教育应当广泛地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如果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脱离的话，学生毕业以后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的需要。为什么全日制学校就不能搞半工半读呢？就不能跟社会实践结合呢？应该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第三，反毛泽东思想。根据是：上高三时，有一篇课文《论人的阶级性》，是选自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老师讲课时赞扬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如果改变一个词，都会使整篇文章黯然失色。我当时就举手了，说：“老师，我不认为改动几个词就会是那样。”老师说：“你要是那么认为的话，你就改改试试。”下来后我把那篇文章给改了。上课时，老师问：“你改得怎么样了？”我把自己改的几段念了一下，老师问同学改得怎么样，同学们都笑了。当时我还有个进一步的意见，就即兴发表出来：“老师，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任何事物它不可能静止在这点上不往前走，它是发展的。”我还得寸进尺道：“别说这篇文章不能改，刘主席在1962年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他自己已经做了非常大的修改。不光刘主席的文章可以改，毛主席的文章也可以改。比如说他写的《井冈山的斗争》，讲的是1928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的事，在中国那个特定环境下写的东西，如果我们在今天的环境下运用它，在很多方面都要做修改。这篇文章对现在的大部分亚非拉地区可能是适用的，但是适用的只是一部分，大部分不适合他们的情况，如果要指导今天的斗争，就必须对它进行修改。”这意见是公开发表的，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一来，就成了反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的具体罪证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根据，是我曾主张取消团徽。我说过：团徽有个好的作用，就是能督促团员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它也有副作用，就是助长人的虚荣心。我是共青团员，所以我主张取消。他们在批判我的时候就说：这团徽是什么？你好好看看！那是一个红太阳，那是一面红旗，那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你要取消团徽就是诋毁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思想！所以，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是板上钉钉的。

有了以上几条罪名，他们就组织人不断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在四十多天的时间里，他们每天派人跟踪盯梢，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批判。斗到后来，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再也揭发不出新的问题了。我当时感觉不太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一些原来特别要好的同学揭发我，过去我所热爱的老师揭发我，甚至我所崇敬的德高望重的校长也上台揭发我！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是坏人吗？我在批斗会上跟校长吵，他揭发我，说我说过工作组坏话，这话我确实说了，但当时就是不承认：“我没有说过这话，校长在这儿造谣。”校长急于洗刷自己，气得直哆嗦，大声喊：“是真的，他说啦！”

那段时间，同学们没人敢跟我们接触了，谁跟我们接触就要受审查。一天，一个同班同学突然找我，问我现在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感觉就像过去苏联搞肃反扩大化，这回又搞扩大化，搞错了。”他问：“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说：“可能得蹲监狱吧！蹲几年以后出来接着干。”没想到第二天他就揭发了。但是，当时我一点儿都没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我从骨子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信毛泽东思想，根本不会怀疑它，更不用说反对了。

这种情况到了7月29日，毛主席、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学生代表，我们向学校革委会提出要求，作为少数派参加会议，但得到回绝，理由很简单：“你们属于反革命！你们属于运动后期处理的右派分子！”结果没能参加。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红卫兵宣传画

8月8日，“十六条”[7]出来了，红卫兵[8]也发动起来了，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文化大革命”形势陡然发生变化。红卫兵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当时，我们要求参加运动的权利，要求参加红卫兵组织，但由于我们是“反革命”，没有人要。这样一来，就迫使我们开始筹备自己的红卫兵组织。

李冬民和我是筹备活动的主力，8月11日，我们在本校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刚开始有六个人，很快发展到了十几个人，后来又发展到几十人。以这个组织为依托，李冬民又串联外校与我们观点相近的学生，先后在景山中学、鼓楼农工民主党总部等地开了几次筹备会，最后于9月16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兵团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纠察组等部门，李冬民是兵团负责人。联络组领导成员为兵团的核心，我没参加，但我负责宣传部，并由我起草兵团宣言。

红卫兵首都兵团基本上是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压制的一些人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成立以后，很快受到北京市和“中央文革”[9]的关注。它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有几个特点：第一，兵团的骨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打击的人，所以，这些人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坚定；第二，这部分人的出身、成分已不受“红五类”的局限，对鼓吹“血统论”的对联[10]是坚决反对的；第三，这个组织从成立之日起一直到最后，从来没有受过高校学生控制。当时，高校一、二、三司[11]都有人找到我们，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纳入他们的轨道，但我们根本不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北京的中学红卫兵运动，从来没有跟大学搅在一起。这一点，与外地是不同的。

兵团成立不久，领导层便有了矛盾，一些人权力欲急剧膨胀，排挤李冬民和我。10月，李冬民去了哈尔滨和鹤岗。我随班集体到延庆县下乡劳动。过去，每年秋季都组织去农村劳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样做的人比较少。这次干的活儿是大田整理，劳动量特别大，每天干活儿吃得也多。我住的那家农民姓白，那家的老妈妈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换着花样儿做。今天问你：“喜欢吃面条吗？”“喜欢吃。”“那我压面条。”“喜欢吃疙瘩汤吗？”“喜欢吃。”“好，做疙瘩汤。”每天换着样做好吃的，跟农民的关系特别好。那时知道农村也搞“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晚上开斗争大会。我们不参加，晚上干什么？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当中要保护农民的劳动果实，当时玉米收了垛成大垛，我们天黑以后就去值勤，两个人值一宿，防止坏人点火搞破坏。

等到回校以后，我开始着手组织长征串联。很快，我就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长征宣传队，事先对行军的目的、任务、组织机构、行军路线、紧急情况的处置等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10月22日一大早，我们一行人挑着行李、乐器和宣传品从北京出发，向江西井冈山进发了。有个姓满的女孩子，是由她的哥哥领来的，她哥哥对我说：“曲折，我把妹妹交给你了，你带好！”那孩子还不满15岁，是宣传队里最小的，最大的是应届高三毕业生。二十多人的队伍，我是头儿，是组织者，觉得责任特别大。

第一天我们走到大红门，走得脚起泡了，肩膀磨得生疼生疼的。我挑的是一架扬琴，还带着宣传品。放下行李，我们给当地农民演出了一场节目，有舞蹈、独唱、重唱、小合唱，还有器乐合奏，很受农民欢迎。后来，我们到了武清县。武清县有进出北京的列车，我们在列车上做演出宣传，列车长给我们提了个要求：你们别走了，就跟我们火车走，你们在这火车上做宣传啊，我们的秩序特别好，也便于管理。于是，临时开了个会，我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说：“好，我们跟着走吧！”这样，我们乘车一下子就到了浦口，然后乘渡轮过长江，来到南京。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我们是首都红卫兵宣传队，准备的节目比较充分，演唱的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样一些很流行的革命歌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舞蹈，我演出的节目是唱歌。我是组织者又是领队，总感觉自己的责任重大。

在南京时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到一个剧场去，里面有一些专业演员正在演出，舞姿左扭右扭的，这些演员对外国的东西吸收得多了一点儿，大家当时不能接受。于是马上写了一个宣言，一个同学站起来大声宣布：“请你们停止演出！”台上正在表演呢，第一声没有反应，第二声还是没有反应，第三声就不一样了，演出戛然而止。我们二十几人站起来，宣读了我们对这个演出的意见，接下来我们给观众演，结果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出完毕，许多观众冲上台和我们握手，后来还有人写信支持我们。我们在南京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

之后，我们到了上海。在上海，有一段整顿时间。当时，首都兵团有人在北京不起好作用，有的人对继续走下去不放心，要求回去，这支宣传队的分裂已不可避免。我也觉得宣传队继续往下走，非常艰苦，精简一下也好，所以当时开了个会，让愿意回去的都回去，但是也有些人不愿意回去，其中年纪小点儿的，我就动员他们回北京。

大部分人决定回北京后，我觉得压力减轻了，我们剩下的人从上海出发，直奔江西。我们没坐火车，完全是徒步走过去的。怎么设计路线呢？比如从上海到井冈山之间，我先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直线，考虑到可能的突发事件，如有人生病等等，虽然是逢山过山，逢河过河，但离主干线不能太远，大致上是并行的。就这样，我们在11月初出发了，12月到了江西。那时每天走60华里至90华里，路程总计不到2000华里。

说起来，一路上每天都有故事。在这里，我就讲一个：上饶之前是玉山，玉山之前是长山，长山离玉山90华里，玉山离上饶90华里。这段路程我计划用两天走完，一天走90华里。这时，有人病了。我说：“你留下看病吧，病好后你到上饶去找我们。”到上饶什么地方找呢？我想了个主意：在距上饶零公里地方最近的电线杆子上，贴个告示，告知我们的去处。定好以后，我们就启程了。

出去还不到40华里，又有一个男生病了，现在说起来叫胃痉挛，那时不懂，大家都很害怕。我决定：四个人都不走了，全部回长山。谁知两个女孩子中有个叫李军武的，特别好强，她那年才16岁，她不同意回去，把双手往腰间一叉，很严肃地说：“你别以为离开了你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我就不能革命了。”执意往前走。我磨破嘴皮子，也说服不了她，到底一个人往前走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这时，另一个女生问我：“曲折，到底怎么办？”我只好说：“你跟她走。”她说：“我们俩去哪儿呀？”我说：“你随她走，她走哪儿你跟到哪儿。”她说：“那以后怎么办？”我说：“你别管了，我去找你们就行了。”当时，根本不知道可能走到什么地方。

我把那个生病的男同学送回长山后，原来留下看病的那个同学问我：“曲折，她俩走了你放心吗？”我说：“不放心，可又能怎么办呢？你放心，我一定找到她们。”就这样，我把他们两个留在医院看病，又开始往玉山赶。

路上没有车，我只能徒步追赶，走过40里路以后，天已经很晚了，接着往前走，不断向农民打听：“你们看到两个女孩子没有？”“没看见。”有人提醒我：“别往前走了，前面山里有豹子。”走着走着天全黑了，下起了小雨，整个背包全湿了，沉甸甸的。那段路是碎石铺的，夜色中看起来有点儿发白，走起来脚步声“刷刷”的。

路上只要碰到人就打听，都说没看到。我一步不停地往前赶，不找到她们我是不会停下来的。走到大约晚上9点钟左右，路过一个村子，又问了一个人，还是说没看见。我想：可能上什么地方呢？就是想像不出她俩到了什么地方。走到玉山就是90华里啊，我觉得她们还到不了那地方。

后来路过一个比较大的村子，我从那村子穿过去，大约有两里路，忽听村子里隐隐传出一阵歌声，特别亲切。在那个山村里头有人唱《在北京的金山上》，当时感觉心里热乎乎的。再一听那歌声好像有点儿熟，这不是李军武的声音吗？我连忙寻着歌声往回走。走到一户人家，门儿虚掩着，两扇门黑黑的，轻轻推开一看，挤挤挨挨坐了一地人，左边摆着一个发黑的桌子，上面放着一架马灯，她们俩正在给大家演节目呢。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画《救星》

我一进屋，人们的目光全朝我看来，只有她们俩全然不知。我没吭声，慢慢走到桌前，把背包往地上一放，她俩一扭头才发现我，“哇”的一声都哭了。这时农民才知道，我们三个是一伙的。我说：你们接着演吧。后来，农民们说：“演得挺好的，就是太晚了，你们休息吧！”贫协主席和党支部书记给我们安排了住宿。

第二天继续往前走，第三天到了江西上饶，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开始时住在地质队，后来又住在部队。从上饶又接着走，到了铅山、永平。到了那儿就接到通知，说井冈山正闹瘟疫，不能再往前去了。既然这样，我们就留在当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吧。

当地有个912地质队，我们就住在那里。队里分保守派、工人赤卫队、还有什么造反派，好多派组织，还驻有一支军宣队[12]。我们五个人，到底怎么办？集体一商量，我说：咱们五个人，每个人到一个岗位去劳动。有的人到机修车间，有的跟车运输，我到了碎样车间。碎样车间粉尘大，容易得矽肺病，所以经常领口罩。工作就是将岩芯粉碎后，拿到化验室检验里面的成分。我们五个人五个岗位，每个人参加一个组织，在非常短的几天里，我们就对各组织的状况了如指掌了。

我们跟地质队职工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关系处得非常好，我们说话他们也听。我们除了参加政治活动以外，更多的是参加生产劳动和其他一些活动，还参加了一次救火。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那天晚上我们都睡在山上，全是竹子搭的房子，在树林当中建的竹棚，风景非常美。夜里听见“啪、啪”的枪声，我说：“坏了，出事了，赶紧起来。”宿舍的人全起来了。西边的半边天都红了，肯定是失火了。我们跑步到总部，取上灭火器就往山上跑，一刻不停，等跑到位于山上的三号机台时，都快吐血了，山太高了。

那次参加救火给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工人们在生死关头，在严峻考验的时刻，过去的派别争斗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他们也不分派了。三号井架着火以后，上面架着的木板着着火一块一块地往下落，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往上攀爬，把机台旁的柴油桶挪开，把着火的木板往下扔，最终把火扑灭了。

失火的原因是，夜间值班人员用一个脸盆盛了多半盆柴油，然后弄个大的捻儿伸出来取亮，值班人员点捻时柴油往下滴，不料，往下滴的油点带着火苗往下走，机台底下全是木板地，结果，“哗”的一下子就引着了。

我们在912地质队参加生产活动比较多，像魏京生，他就是在那儿学会的开车。我们也参加了地质队的运动，整个地质队，各个分队、车间里都分成不同观点、不同派。我们在那里主持过不同派别之间的谈判，后来又替受压的一派打抱不平，在我们的支持下，那派组织很快壮大起来。不久，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性大串联[13]。1967年3月，我们从江西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后，全班同学又聚集到一块儿，分手时间虽不长，大家都有一种历尽沧桑之感，成熟了许多。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的人，回到学校后主动表示：“当初大家批斗我们，是出于一个良好的愿望，出发点还是好的，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背什么包袱，不能说你们有什么错误，不要再做什么检查了。”我们的这种表态，使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又团结到我们的周围。

当时，学校的原工作组也在做检查，让我们去参加会。我和李冬民都表了态：对工作组不要揪住不放，工作组也是在执行上边的指示，他们也没有什么选择，应该到此为止了。我们一回来，很快把遗留问题化解了，所以工作组对我们也很好。这样，我们的威信就上来了。在筹备中学红代会的工作中，许多同学主动参加了其中的工作。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召集的红代会筹备会议上，争论比较大的是“联动”[14]问题。一部分人提出，在中学红代会成立纲领和宣言中应当对“联动”进行严厉批判。我不同意，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联动’在去年12月还有所表现，后来就没什么了，现在也不能形成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多大的力量，不要在这上面下很大的功夫。”当时，我负责中学红代会成立宣言的起草，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但是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坚持认为“联动”还没有被批判，与我的看法不同。我提出，如果这样的话，起草工作我就不参加了。你想，“联动”沉寂好几个月了，现在把问题又重新拾起来，合适吗？

当时还剩下一个组织问题，就是中学红代会领导人的组成问题。我主动提出不参加。这样，中学红代会常委里还有我们班的两个人：李冬民、秦喜昌。其他常委是各个学校的。核心组成员有李冬民、程金香、刘龙江、陈永康等人。

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的时间是1967年3月25日。在成立大会上，我和秦喜昌担任司仪，由我宣读红代会宣言。闭会前，我们请周恩来总理带领大家唱《国际歌》。总理亲切地指指我：“你给起个头。”在他的指挥下，全场唱起了《国际歌》。

红代会成立后，我的任务是在本校参加斗批改，但还分管红代会政治部。本来红代会这个部门应由师大附中何芳芳负责，她是常委，而我不是，但她到山西闹革命去了，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在这阶段，中学红代会的机关报《首都兵团战报》由我主持。这个时候，报纸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一种“新思潮”。这个新思潮的主要观点是，“文化革命”是一次权力再分配，这个思潮认为解放以前是地主阶级、资本家掌权，解放后整个位置颠倒了，原来的贫农、原来的穷苦人变成了统治者，现在又面临着再一次的权力分配，要把这部分人打下去。我们开会分析了这篇文章[15]，然后组织批判。执笔写批判文章的是后来写《王府怪影》的男八中学生计三猛。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中学文革报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創刊号　　1967年1月18日

毛主席語录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

世界是属于你們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們的。

《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

1966年9月开始筹办报纸时，首先碰到的就是钱的问题。我和李冬民两人四处找钱，结果只找了几百块钱，就先用这些钱买了几令纸。中央文革有个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去要钱，说要办报纸。接待人员让我提个计划，我一张口就要三万块钱。那在当时，可是个巨大的数目。他说：你要得太多了，不好批。过了很久以后才把《兵团战报》办起来。当时办报的都是中学里的一些笔杆子，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在从事文字工作，有的当了报社的社长，有的当了总编，也有资深记者。朱唯红是当时的编辑，后到山西插队，几年前在江苏省委党校工作时因白血病去世，她生前也写了不少文章。

4月初，因为江青和戚本禹的两次讲话，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16]，从此攻讦不休。在学校里，我们是中学红代会（四四派）的支持者。原来，我们不是有一个“东风战斗组”吗？后来“东风战斗组”扩展成“东风兵团”，人多了，我仍然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四三”、“四四”派之间这么一闹，我觉得没劲了，认为在学校里没有出路，思路又转到上山下乡上来了。

回顾“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我想说：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培养的这一代人中，我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在这代人中，我们不少人思想成熟得比较早。上小学时老师讲过杨朱的故事，杨朱曾说，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事，他不做。[17]老师却教育我们要有为人民献身的精神。我小学四到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王德增曾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官，解放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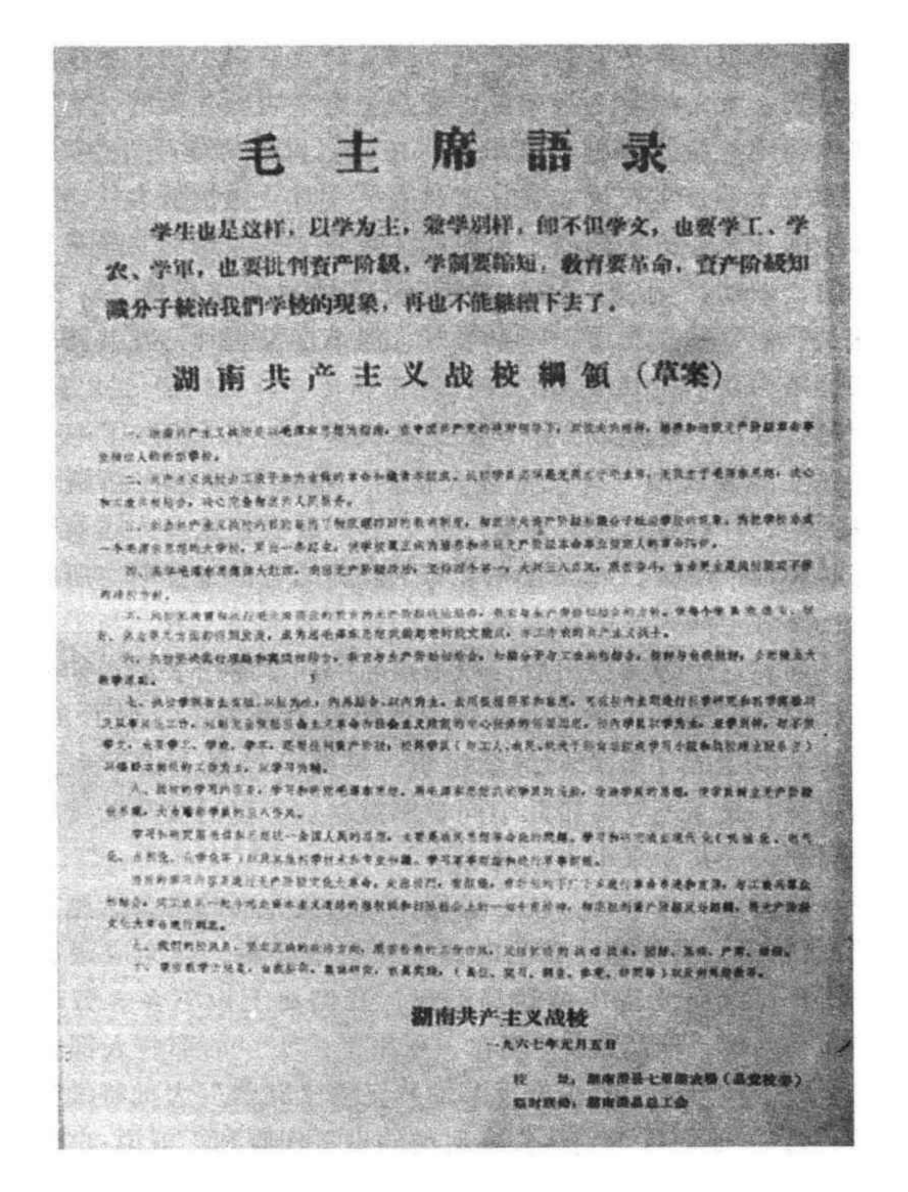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当过派出所所长，1957年来到我们学校，月工资99元，在那时是很高的。他对我影响很大：他爱国、敬业、能吃苦，为了辅导学生，他经常很晚才离开学校，大炼钢铁时衣服上到处都是被铁花烧的洞。他对我说过：育人者可以做样子给校长看，给参观的人看，可是他欺骗不了自己的学生，学生早晚要长大成人，可以对老师做出评判。

三　吹响上山下乡的号角

自从学生们卷入派仗，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那时就有一个想法，应该走出学校去。怎么走出学校呢？最初的想法是要创办一所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学校，一所红卫兵大学。我把自己的想法在班上说了一下，大家跟我开玩笑说：曲折要学武训办义学。当时我走访了不少有志搞教改的学生，包括去南方搞过调查的彭小萌。但很难取得一致的认识。我的同学刘崇威说，女八中有个叫郭兆英的，有同样想法，可以找她一块儿聊聊。郭兆英是在校入党的好学生，学习突出，班里的学生干部，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她担任主任。后来她眼看学生间斗来斗去，就当了逍遥派，带着一些人到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访问，做社会调查。4月，郭兆英就到我们学校来了，交换想法，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印象很好，但谁也没想到，在共同的志向中后来会结为伴侣，共度人生。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毛主席語录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軍，也要批判資产阶級，学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继續下去了。

湖南共产主义战校綱領（草案）

湖南共产主义战校

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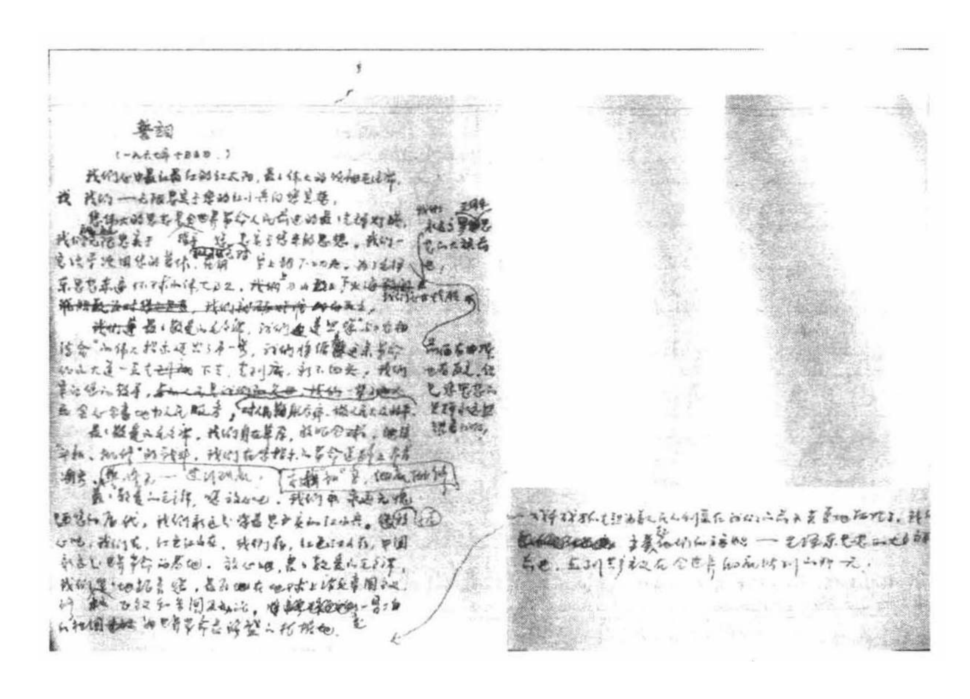
湖南共产主义战校纲领

当时我考虑，还是创办一所红卫兵大学。6月，我发了一个兴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有三百多人报名，校址初步选在新疆。问题是：办大学，你教什么呢？再有一个，当时看我们这些人还属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还没有一个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啊。所以后来就提出：办红卫兵大学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成为工农，与工人农民结合在一起。这个想法提出后，原来报名的同学纷纷表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了。真正当农民，他们就不愿去了。到了8月份，这些人基本就退光了。我们继续组织，思路已经是上山下乡。郭兆英、胡志坚、我，还有本校几个同学愿意参加，以后又陆陆续续吸收了几个同学，一共十来个人，决心走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于是我们在一起学习，统一思想，做物质方面的准备。原来准备“十一”以前走，去新疆。我当时跟上边有些接触，认为应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就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我们要上山下乡。劳动局一听，特别感兴趣。他们说：“现在，原来上山下乡的那些人都在闹回城，把上山下乡当成‘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批特批呢，你们还要下去？”他们认识到这件事对他们做工作有利，就说：“能不能这样，我们也汇报一下，看看怎么安排，别着急。”我说：“那可以，请给我们一个答复。”他们很快就向上头汇报了。当时负责文教口的是赵唯理，汇报给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丁国钰。不久，北京市的意见传达下来：“领导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们去的地方能不能调整一下？不要去新疆了，是否可以去内蒙古，那儿的情况好一点儿，内蒙古已成立革委会筹备小组，比较稳定。”我征求大家的意见，都说：上山下乡这条路子怎么都是走，和工农结合嘛！我们要求到边疆去，如果选内蒙古也可以。很快给他们回了话，北京一方立即和内蒙古联系，内蒙古方面很快就把这事儿落实了，还派过两个人来接我们，都是锡盟安置办公室的。

“十一”那天，我去天安门观礼台，看了盛大的游行。“十一”后开始起草上山下乡的誓言。通过誓言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青年都是非常真诚的，他们真心实意准备到边疆去吃苦。


誓詞

曲折起草的“誓词”

10月7日开家长会，杨振祥介绍了我们将要去的白音宝力格生产队的情况，市安办马友超讲述了市里的意见，然后是家长表态。本来计划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走11人，家长会后少了一人，家长不让去，剩下10个人。临行前在市委召开座谈会，丁国钰等领导都参加了，我们表表态，他们发表些意见，主旨是：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要向当地群众学习，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在天安门前宣誓

9日早上，我们10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宣誓。在“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下，由我领誓。送行的起码有两千人，并不是刻意组织的，有本校的同学，红代会的战友，还有几个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围观的人也比较多。宣誓以后上了车，没有一个人哭，心里充溢着一种很崇高的使命感，我们要去做一件很伟大的事业。汽车开动以后，两个来送行的同班同学说什么也不下车了，非要跟着走。车过德胜门，我才硬把他们从车上推下去了。这时眼泪就止不住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真深啊。

当天到了张家口，住在六十五军，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请苻先辉军长给我们讲长征故事。他希望我们时刻准备迎接困难，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背诵了红军过草地时做的一首小诗：“天做帐篷地做床，广阔的草原当楼房，倾盆大雨似淋浴，狂风呼啸我乘凉。”我到牧区后，把这首诗谱了曲，自己经常唱。苻军长还透露：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时，讲了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样，我们头脑就更清醒了：不管到什么地方，决不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参与地方任何一派。

11日早晨从张家口出发前，听到电台广播首都红卫兵小将赴边疆插队的消息，大家备受鼓舞。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们10个人的自发行动，被传播到全国各地，被赋予了更多的官方色彩，并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一千多万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

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出发前，中央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中央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后来得知，10日那天晚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学教师代表，会上有人把这事汇报了。陈伯达等人当即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陈还指示说：新闻单位应做些宣传。第二天，消息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而且是第一版。[18]

这一广播、一登报，影响就大了。为什么紧随我们之后，首都第二批知青一下就起来了？原来的顾虑没有了，什么“斗、批、改”任务呀，大方向问题呀，中央支不支持呀，这行动对不对呀等等顾虑，都一扫而光了，中央明确表态支持。所以，很快就有了第二批，他们的方向有两个，一是东北，一是内蒙古。

从张家口出发，在坝上瞻仰了苏军烈士墓，这时正是雨雪交加。离开北京时，天气还很暖和，可到了海拔一千多米的坝上，立刻就变冷了。在这里，我们告别了送行的战友李冬民等同学，继续乘车前行。一路上，大草原莽莽苍苍，人烟稀少，偶尔见到骑马的牧民，我们都激动地挥手致意。感觉太棒了，纵然你有浑身的劲儿，在这里也使不完，边疆的条件虽然恶劣，但我们有决心建设它、改造它。

汽车队行抵锡林浩特市，住在师范学校。第二天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的群众差不多有两万人，这和传媒的宣传有直接的关系。在欢迎大会上，我代表知青讲了话，呼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扫除派性。当时我们在师范学校住下后，地方上的两派都来找我们，希望支持他们。因为《人民日报》发布了消息，他们认为我们下到锡盟有很深的背景。其实有什么背景？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劝他们消除派性，实行联合。

10月14日，我们一行人经白音乌拉镇径直来到白音宝力格公社。没想到公社那么开阔，面积远超过内地的一个县。在长满青草的公社的院子里，牧民嘎日布为我们唱了一首歌，哎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歌声，人也是那么美。晚上开欢迎会前，我临时抱佛脚，现学了几句蒙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把这几句话全部用汉字标下音来，在发言中第一次用蒙语说了这么三句话，也不知道参加会的人听懂了没有，我只想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我们与牧民休戚与共的决心。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0月15日到了目的地白音宝力格大队。一下车，大家就忙着扫院子、挖厕所。我们住的大队部（有蒙古包也有土房）同时也是饲料基地。当时收获时节已过，大家什么活儿都抢着干，收草木栖、垛麦垛，非常积极，很快就把活儿干完了。

早在1965年，大队就安置过一批知青，是从林西下来的，有十来个人。队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刚来时决心可大啦，豪言壮语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可还不到一年，全走了。

大队认为前一拨知青之所以没留住，是因为在生活上没有给予很好的照顾。所以等我们到了以后，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一开始还专门有一个人给我们做饭。刚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脑子里全然没有做饭、做家务的意识。没过几天，队里的负责人德全问我：“你们谁做饭啊？”我说：“噢，对了，得做饭，该我们自己做饭了。”他问：有粮食吗？我说没有。他说：“得去买粮食啊！”我说：“去哪儿买呀？”他说：“公社那儿有粮店，到那儿买了粮食，就可以做饭了。”我就找他要了一匹马，这是我第一次骑马，骑上去感觉挺不错。马开始往公社走，可是只走了二三百米就不走了，回过头来往回走，这马总在那儿吃料，特别恋家。我们知青点离公社特别近，大约四千多米，我只好拉着马去公社。等回来时，粮食驮在马背上，我骑上马，马归心似箭，走得飞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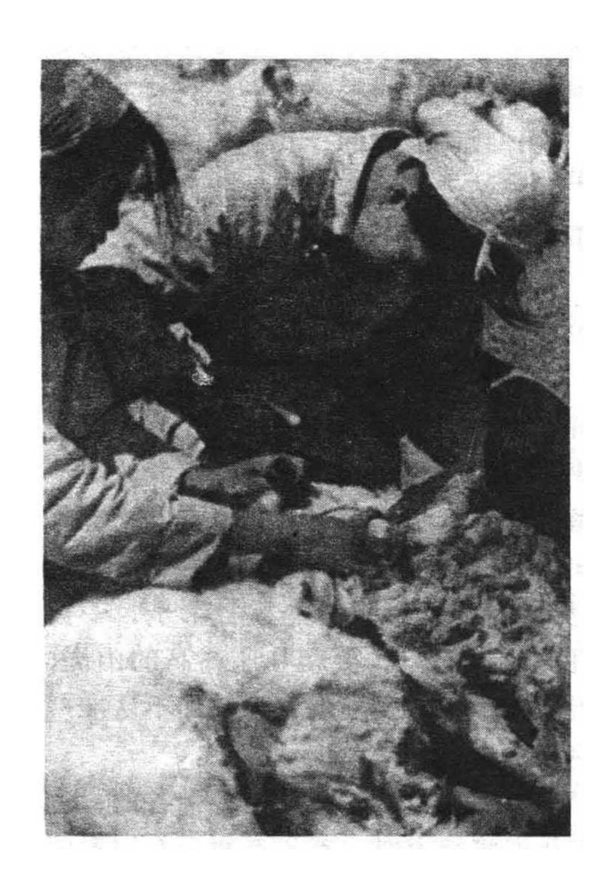
饲料地的活儿干完以后，队上领导说：“今年的活儿干完了，你们就在这儿住，队里给你们准备好了煤，赶快生火，肉也给你们弄来了。过了这个冬天，明年再开展工作。”我不同意，要求到基层参加生产活动。他们说不行，太苦啦，现在雪这么大，下去吃不了这个苦。我就去做领导班子的工作，说：牧民能做的，我们也能够做。最后，他们动心了，同意男知青去配种站，女知青留下。我又举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男同志能做的事女同志也能去做。这样，连续天天去做工作，一说就说到人家睡觉，第二天再接着说，最后，领导班子终于同意了，男知青的一个蒙古包在一个点儿上，女知青的一个蒙古包在另一个点儿上。

这以后，就再没有队里的特殊照顾了。一住进蒙古包，首先就得想法儿找羊粪牛粪取暖，并解决吃饭的问题。男知青里除了我，其他人基本都不会做饭，我还得把做饭的事承担起来。女知青有时把冻好的饺子送给我们。在配种站，知青们直接参加生产活动，感觉挺有意思。到了11月，配种结束了。男知青分成两拨，一拨打苇子，一拨采石头。我属于采石头的。从驻地到采石点，要爬一座高高的山岗，路上的雪几乎没到膝盖，脚印很清晰，当时我发现，如果你不认准一个目标径直地往前走，这条路绝难走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不久就发现一个问题，知青与牧民在生活、劳动上各干各的，达不到结合的目的。这样，配种工作即将结束时，首先有两个女知青住到牧民家去了。开始时，知青内部有争论，我属于支持的。不久，她俩汇报说，在牧民家感觉特别好，也很安全（本来她们担心不安全）。在会上，我们决定全体知青下到牧民家去。

1968年元旦，我们开会布置插包的事。会开到很晚，大家都睡了，只有我们三个负责人——我、郭兆英、胡志坚一直守候到天亮。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到各家。队里给挑的都是家境很不错的家庭，贫协主席呀，党支部书记呀，党员家呀。我分的那家牧民很年轻，男的叫桑布，比我小一岁，他妻子比我还小，他非要知青到他家去住不可。



剪羊毛

我不会说蒙话，他汉话一句都不会，一住进这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尊重人家，人家让你吃你就吃，让你喝你就喝，不要让人家觉得被看不起。好，这茶就喝多了，喝多了就得上厕所，一出门，他家女人就跟出来。我前面走，她后面跟着。我说：“你回去吧，我有点儿事儿。”她听不懂，我往前走，还跟着。后来我跟她说：“我上厕所，上厕所——你明白吗？你回去吧！”她微笑着看着我。前头大约500米左右地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方有个小山包，我再往前走，她就不跟了，在蒙古包不远处等着。我一直走到小山包后头上了厕所回来。没想到一会儿又得去，她还是如此。这次我可受不了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天骑着马找民兵连长去了。他会几句汉话，可说得不太好。我把前一天的经历对他讲了，开始他听不明白，我再说一遍，后来他明白了，笑着说道：“家里脑亥（蒙语：狗）白那（有）吧，脑亥（狗）浑哈吉那（咬人）吧？她怕狗咬你，给你看狗哪！”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就这样，我在那家住了几个月。他们两个那么年轻，为什么非要找一个知识青年去放羊呢？很长时间不得其解。

放羊时也遇到好多事。有一次放羊，与一个牧民小青年就伴，他放一群羊，我放一群羊，他放山那边，我放山这边。我们带着狗去打猎，不想我的羊群出事了，五只羊的眼睛让鹰啄着吃了，受伤的羊趴在地上，眼眶里流着血，看上去挺恐怖的。从那以后，我放羊时不再像牧民“嗷呜”“嗷呜”吆喝着赶羊，而是学鹰叫，羊真害怕。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是一场大灾。放牧羊群是最艰苦的。大队的牛群基本放在沙柳林里，外面风天雪地，里面却风平浪静。放牛的牧民党员多一些，劳动强度没有放羊大。我想，知青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就去找牧民，学习用蒙语背毛主席语录：“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这类的语录背了好几段，然后去做大队书记的工作，意思说：你是共产党员，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到羊群去。那么大的风，羊群都顺着跑。放羊的人早晨出去，很晚才回来，吃不上，烧不上，生活非常苦，希望干部们能体谅这部分人的困难。说完我就到生产第一线去了。我的蒙语就是这么学的。那些日子虽然很苦，却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这么大的天灾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因为雪太深，羊吃不上草，牧民必须频繁搬家换草场。可是队里有辆大车是仁钦赶的，他当过土匪，平日还挺横，动不动就撂挑子。有一次他嫌搬家麻烦不愿意出车，民兵连长吉仁台一气之下就夺了他的鞭子。大车没人赶了，大家都很着急，我和宁华（也是知青）挑起了这副担子。大队保管董日布教我们辕马怎么套，打里马怎么吆喝，很快就学会了。

整个1968年夏秋两季，我参加的劳动有两类：一是在查干淖尔和阿尔善宝力格搭棚盖圈。二是在饲料地种燕麦、草木栖、蔬菜，十来亩地的菜，有二十多种，全都种成功了，有萝卜、胡萝卜、圆白菜、大白菜、小白菜、葱、韭菜等等。胡萝卜长得非常大，结了好几万斤。为了储存胡萝卜，我又设计菜窖，准备冬天用。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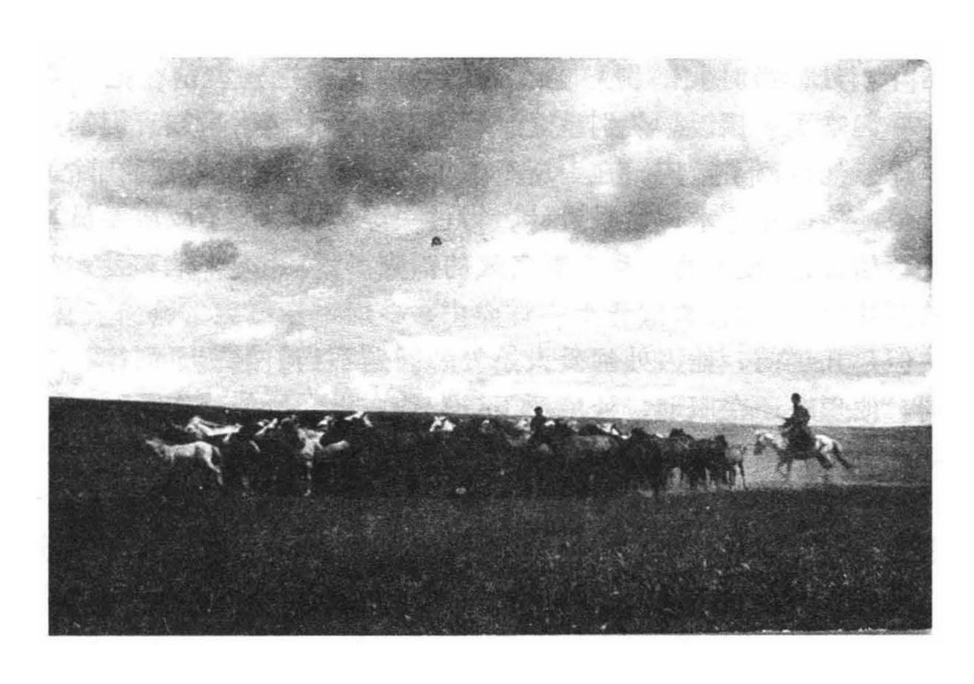
当时，队里还有三个比我们早去的知青，其中两个是锡盟多伦县的，是盟里安排她们去的，为的是让她们在生活上给我们做示范。但我们跟这两个人心理上距离有点儿远，感觉她们婆婆妈妈的，整天忙着做饭，等我们去配种站时，她们没跟我们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们离开了白音宝力格。

我要说的是另一位从四川来的蒙族知青，汉名叫黄继光，与堵枪眼的志愿军英雄同姓同名，蒙古名字叫铁木尔格日勒，1946年生人。他的父亲是一个模范司机，母亲是一位贤惠厚道的女人。他是1965年告别家人一个人千里迢迢从重庆挑着担子来的，他来这儿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寻根。他虽然是蒙族但不会说蒙话，蒙话是到牧区后现学的。关于祖上的事他说不很清楚，只知道元朝时他的祖上还在北京，而且是有名的大户，但后来不知怎么就到重庆去了。他对草原、对牧民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深厚感情。

他比我们差不多早到了一年，我们一到，他就热情地给我们介绍队里的情况，公社的情况，张三、李四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等等。知青刚去都想骑马，但马还没分配给个人，他就拿自己的灰马让大家骑。他下乡后几乎没干过放羊、放牛、放马这类活儿，就当了额木沁（赤脚医生），骑着马，到处串包，为牧民看病。

黄继光在草原上的故事挺多。我给他讲过草木栖营养价值高，草木栖不如紫花苜蓿，但紫花苜蓿我们那里比较少，主要是草木栖。我在1967年12月专门到内蒙古农牧学院找了许多这方面的书，我们队在饲料基地种了100亩左右的草木栖，头一年就长一米多高，到第二年长到两米多高。因为我说过草木栖营养价值高，黄继光特别逗，他就把草木栖割下来煮着吃，那味道是苦的，他居然吃了好几顿。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牧马的知青

继光为人正直，为朋友两肋插刀，也容易冲动。1968年，达青牧场来了一批知青，为了跟他们交朋友，他几乎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给了他们，自己一贫如洗。1970年郭兆英被抽到旗里工作，他知道我跟郭兆英关系挺好，就对我说：“我想送给郭兆英一个布斯（蒙语：腰带）。”我说：“你留着用吧，如果要送，你送她本人吧。”他说：“不行，得你给她拿去。”我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到旗里去，你经常买药就过去了，你过去送给她就得了。”他的火上来了：“你送不送？”我说：“现在真没有时间。”“你真的不送？！”他“啪”的一脚就把火炉盖踢开，把布斯扔到火里给烧了，搞得我很尴尬。

继光很有艺术天赋，他给我写信，或给他人写信，总要在信封上画一只口里衔着信的飞翔着的鸽子，画得美极了。大概是1974年吧，他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他画了一幅阴云密布、大雨倾泻而下的草原，表达他对总理的怀念。后来，他把这幅画送给了我们。毕业后他又回到西乌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78年1月，当时我随领导坐直升机到西乌旗视察灾情，把他叫去了，一起吃了一顿饭。久别重逢，我们高兴极了。后来知青们都离开了草原，他也回了重庆，在一所石油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师。除了作画，他还搞插花艺术、盆景设计，得过一等奖，当上了政协委员。他给我写信说：“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了。”还寄来他和爱人、孩子的照片。

但是几年前，他因处理爱人婚外恋问题不当，触犯了刑律，被判了刑。他现在还在服刑，处境还不错。他在看守所依然作画。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入狱后，他妹妹给我打过电话，问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她说，前些年协和医院给他的初步诊断有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但这个诊断书找不到了。这样，我们给写了一个证明，说明他有时有过激行为。比如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学习时，跟老师在一块儿喝酒，老师不喝，说：“你们喝吧，我不喝。”他就急了：“你不喝酒，你说喝什么吧！”老师开了句玩笑：“我喝血。”“真的吗？”说罢，他拿刀子“啪”割破了胳臂，流了一杯子血，对老师说：“你喝吧！”第二天，他到我家去，胳臂打着绷带。问他怎么了，他就把这过程跟我讲了。

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以前有书信往来。入狱后，去年我给他写过一封比较长的信，至今没有回音。这是难以忘却的一个朋友。其实，几十年的世事沧桑，许多知青都有过坎坷的经历。

话说回来。1968年6月，我随西乌旗安置办的同志到北京，和吴小明在北京一些中学和大学做过多场报告，介绍我们在牧区的情况。吴小明是宝日格斯台牧场插队知青，报纸上宣传过她的事迹。我们在北京做了一个来月的宣传，然后回到草原。这次宣传推动了1968年8月那批知青的下乡工作。

1968年我们在政治上参加的一个活动，就是划阶级。解放以后，内蒙古牧区的工作一直比较稳妥，没有划分过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了批判重点，牧区划阶级随之提上日程。[19]公社对这件事有周密部署，要求把牧民在解放前后三年的经济状况作为划阶级的依据。这样就需要派人去调查，调查该人在1945年前后家里雇了几个人，有多少牲畜。我积极参与了这项活动。

1968年8月在阿布嘎旗召开划阶级现场经验交流会，这样的会，还有先代会，我都不参加，这次会有一个女知青去了。她在会上话讲过了头，如说我们队总结了牧主剥削牧民的几十种形式。领导们一听如获至宝，就问她到底有哪几十种形式。她慌了手脚，说：“我没有掌握，是我们那儿曲折总结的。”于是，领导连夜派车找到我。通过调查，我们确实总结了牧主剥削的一些形式，如放苏鲁克、过继子女呀等等，但是哪有那么多形式呀！我把情况对来人讲了，对方不听，最后我只好到会上做了一番陈述。

草原上划阶级的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破坏性更大的“挖肃”运动[20]又一步步逼近蒙古包。知青“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看到夜晚不断有信号弹升空，于是今天怀疑这个，明天怀疑那个。一个知青说队里有敌台，亲自跑到西乌旗去报告，怀疑包日胡家有人把电台藏到棺材里去了，旗里闻讯立即派人到队上掘坟。来的人到了坟上，谁也不敢动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最后还是叫黄继光把坟里的骨头全拉出来了，结果也没发现电台。这事是继光事后亲口告诉我的。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件事竟然成了我的重要罪状之一。

我不同意胡乱猜疑，认为这样做非常错误，就写了一篇《还我阶级斗争的本来面目》的文章交给公社的领导，我认为，你谁都怀疑就麻烦了。可是有人特别敏感，什么都看做“阶级斗争现象”，真是不得了！

这年10月18日，公社贫协召开了审定各队阶级成分的会议，我作为知青代表、公社革委会常委参加了会议，会议进行得比较顺利，还认识了其他队的一些牧民。会后，主持公社工作的副主任德力格尔朝格图给我看了内蒙古革委会动员“挖肃”的文件，还提出让我做专案组的组长。但我没听从他的意见，仍然回生产队了。

队里决定从10月份开始在饲料基地打三眼井，我提出保证12月26日完工，作为向毛主席生日的献礼。于是我组织了一批知识青年还有“四类分子”[21]开始了艰苦的打井劳动。说起来比较简单，每个人把自己的口粮带去，我和宁华每人再拿去一只羊，然后知青和“四类分子”分别伙食统一劳动。劳动是超强度的，白天干，吃过晚饭挑起马灯继续干，有的知青累得趴在地上半天都起不来。时间紧迫，也没有时间去参加“挖肃”了。有知青问我：“曲折，你看，他们都参加运动去了，咱们怎么办？”我说：“让他们去抓革命吧，咱们促生产。”这三眼井，终于在毛主席生日这一天完工了，我们这天吃了开工以来的惟一的一顿饺子，以示庆贺。

四　在公社革委会的日子

我们公社是1968年3月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我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了革委会，担任常委。随着“挖肃”运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干部受到株连，到后来，连日常工作也没人管了，都被抓起来“专政”了。很快到了年底，公社的军宣队到队里找我：“公社的那些领导都有问题呀，你是常委，请你到公社去主持工作。”我给他们解释：“我是知青代表，对情况不太了解。”我不愿意去。

1968年12月26日以后，军宣队又找我好几次，眼看拖不下去了，我决定到外面走走，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和胡志坚到锡林浩特去了一趟，住在大车马店，找到锡盟革委会。有个革委会成员（我记不起名字了）说：“有个知青叫刘小布的，你们北京一块儿来的，他们那儿死了人了。自古以来中国有句话，杀人得偿命。”我当时就跟他争起来了。我说：“国民党害了那么多人，谁偿命了？你们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讲这话有点儿太早。”那时候就是想了解运动情况，当时看到盟里正批斗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人，什么“内人党魁”啊、“内人党婆”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结论，只好打道回府。

转年1月初，军宣队又找来了，说：“曲折，你这人太不像话了，现在常委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还不去？”又给我说了好些大道理。去吧，这样我就到了公社。

公社当时领导运动的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军宣队、工宣队和贫宣队，再有就是我和还没有被关押审查的其他委员。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情况。头一天四处看看，第二天看材料。一看，问题严重了！所有材料都是张三、李四交代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展了谁加入“新内人党”，有党章、党纲，还有活动，看的都是这些情况。但是我自己有一条原则：在执行上边那套指令的同时，也要执行政策。当时在公社“挖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以张景业为首的梅花派，他们大打出手，严刑逼供。这大约和张景业的个人野心有关系，他说过，他要通过“挖肃”弄个县长当当。他需要“政绩”。

第一天到公社就看见公社招待所里关了一些人，走进第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女的在那儿躺着。我问怎么回事，他们给我介绍说，此人是前公社主任莲花。我问：“她是什么问题？”他们说：“内人党魁。”“现在怎么了？”“绝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家有孩子没有？”“有。”“把她家孩子叫来。”叫来了一个小女孩儿。我说：“你妈好几天没吃饭了，你知道吗？”“知道。”“给你妈熬点儿奶茶去，多放点儿奶。”那孩子走了。接着，我让人找到队里的女知青郑晓东，然后从拖拉机站找了拖拉机，对供销社的吴殿科说：“你们俩把她送到西乌旗医院，不要出问题。”我当时这样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人是不能这么死的，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人一旦死了，将来谁还搞得清楚？自此以后，七八年没见过这个莲花。1969年5月以后，听说她率领队伍到呼市和北京上访去了。再次见到她是在70年代后期，她到呼市开会，住在小白楼，我听说她来了就去看她。她当时约我，回白音宝力格时一定要找她，然后我们一起骑马去看望那布其，可惜那时候我太忙，没抽出时间来。

那时我不住公社，经常回队里去。一次刚到公社，就听到有人大声惨叫：“哎哟，哎哟。”一开门，见几个人正在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金财，边打边问：“你没有政治问题？”“没有。”“咣”，打人者上去就是一脚。我说：“你们出来一下。”他们说：“干什么？”我说：“你们怎么打人呀？！”“哎，打人怎么啦？阶级敌人打他怎么啦？！”我说：“这有政策呀，要文斗不要武斗啊，你们怎么能武斗啊？而且说了不能搞逼供信呀！”他们说：“你站在哪边儿呀？你跟阶级敌人站在一块儿，还是和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们站在一块儿？！”我据理力争：“这不是跟谁站在一起的问题，我同意‘挖肃’，但是不能这么做。”结果他们弄来一帮子人，说我是“白音宝力格地区的高锦明[22]，右倾机会主义！”那时候，高锦明实际上也是“左”的，有人却攻他是右倾。

过两天再到公社，又遇到新问题。他们又抓了一个人，是邮电局的，叫德格都。我说：“这里的工作由我负责，你们抓人没通过我，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呀？”那些人不吭声。“谁拿着关人的钥匙呢？谁拿着呢？给我！”我把门打开：“德格都，你回家，没事儿了！”他汉话不太好，犹犹豫豫地走了。那些人对我更不满了，批判更加厉害了。有个叫吴占德的，是革委会里惟一支持我的人，他说：“曲折做得对。”结果他们贴大标语，说吴占德也是“内人党”，吴占德怕揪斗，连忙剃了光头。谁支持我，他们就抓谁。说我支持“内人党”，可是他们没有任何根据呀！确确实实他们认为我有什么背景，所以才不敢对我下手。

我再去公社时，他们又把德格都抓起来了。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是什么呢？我认为：“挖肃”大方向是对的，应该支持，至于一些具体的执行政策方面的问题，该说话时要说话，对那些随便抓人打人的事，我是绝看不惯的，但也没有完全制止。我想，这么做会不会阻碍革命的发展呢？既然说话不管事，干脆就少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是有错误、有教训的。第一，当时各个生产队都在搞“挖肃”，生产队往公社报材料，基本上都是要求对张三或李四的问题进行审查。根据上面下来的文件，对怀疑有问题的人，有70%的把握就可以报批。公社革委会成员归旗里管，这些人基本是在我去公社之前由梅花派私下找旗里批的，然后由他们审查，再强加给公社。一般干部和生产队干部由公社自已批，其中有些就是经我召开会议批准的。旗和公社两级批准审查的先后共有二十来个人，以公社干部为主，还有少数生产队的人。这些人在身心各个方面都受到极大的伤害。农业队有个叫张希朋的人，汉族，当时是队革委会的负责人，在队里有威望，因支持另一派，被梅花派打得很厉害。有一天我刚到公社，就听说张希朋喝“敌百虫”自杀了，这“敌百虫”是我提供给他们灭虱子的，当时我心里怦怦直跳，紧张到了极点。我蹬蹬蹬跑到卫生院，一看他正在床上坐着呢。“张希朋，你怎么了？”我质问到。他说：“曲折呀，我实在受不了了，昨天晚上，他们打我。”我说：“张希朋，我给你说清楚，不管你问题有多大，不能走这条路，你走这条路就永远说不清楚了。”他后来就挺过来了。还有老劳动模范那布其（她当时任公社革委会主任，但未主持工作），虽然没被隔离审查，没挨过打，但在队里受了批判，我也批判过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由于许多人在逼供下“揭发”她是“新内人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党”成员，在上级征询中共“九大”代表人选意见时，我没同意她当党代表。第二，由于屡遭造反派批判，对自己坚持政策的正确做法也曾产生怀疑。我不同意搞逼供信，自己不会去打人，也不会指使别人这样干。但动摇的结果，是对违反政策的行为不敢坚决制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我坚决一些，损失还可以减少。

我所在的公社，两派斗争非常严重，后果也非常严重，但在“挖肃”期间没有因冤案而死人，这真是万幸。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我去主持工作，公社发生的情况会严重得多。全自治区范围挖“新内人党”一共死了一万多人。1973年我在政研室调查落实民族政策情况时，也调查过“挖肃”的情况，一些地方和单位搞逼供信令人发指，多人致死致残，情况真是太可怕了！

滕海清、吴涛两位首长的“三七指示”（3月7日）即“挖肃已经扩大化，不要再挖了”的指示于3月9日传达到我们公社，公社的“挖肃”即停止下来，并陆续解除对一些人的审查，但没有平反。到此时，在公社起重大作用的军宣队、贫宣队等已撤得一干二净。到了5月22日以后，中央“五二二”批示就下来了，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领导犯了“扩大化错误”，要求给打成“新内人党”的人平反。[23]文件下来后，6月7日，公社的平反大会由我召集主持，那布其参加了会议，支持了我。当时公社除了我，再没有人能组织这样的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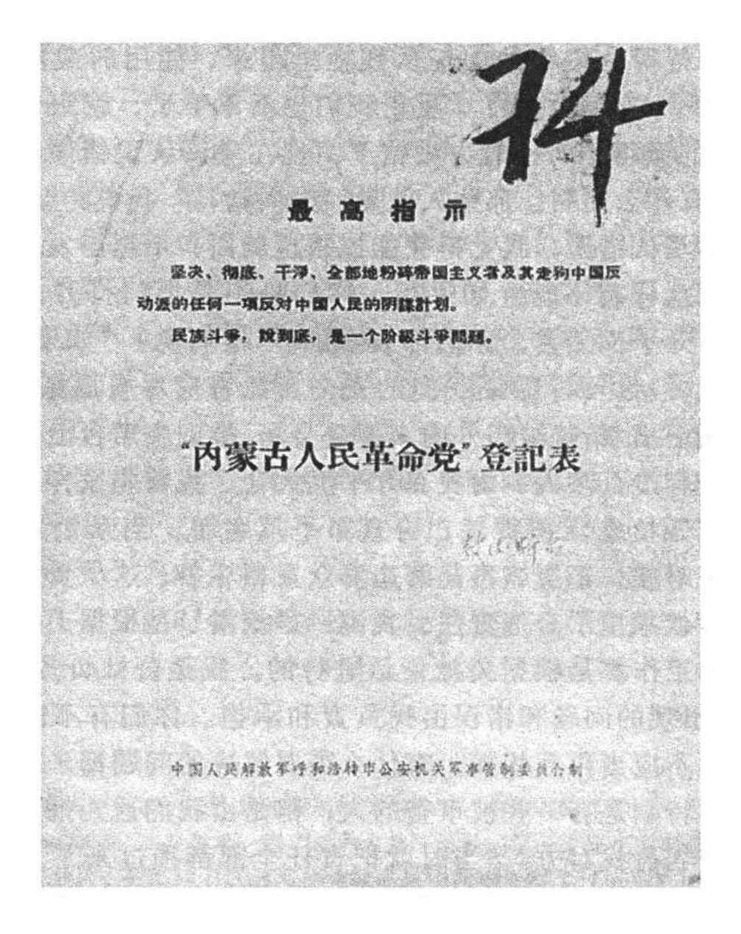
可是，在平反的时候又遇到新问题：原来在“挖肃”中挖得比较厉害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的员工，当时就躲到信用社的钱柜里头，把大门锁死。围在外面的牧民、农民有二百多人，不少人拿着芟刀铁锹。我到公社就遇到这么一个紧急情况，马上要出人命了！你想啊，人们要往里攻打，里面拼死抵抗，怎么能不出人命啊！这时我先做外边的工作，说：“你们给我时间做他们的工作，你们两边儿应该谈谈。”他们说：“那些人怎么处理？”我说：“不管怎么处置，你们首先应当认识到一点，过去他们搞逼供信是错误的，你们不能再用错误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样，先让外边的人从原地后撤20米。然后，我就进了信用社。一敲门，里面问：“谁呀？”我回答：“曲折。”一个人把门开个小缝，说：“进来。”赶紧把大门关上。进去一看，拿着棍棒、梭镖的人正从钱柜里出来，能用的武器都拿在手里，有十来个人。他们说：“反正我们也活不了了，就跟他们拼了！”我说：“你们做得不对，过去做错了，现在应该认识错误。”他们说：“认识这些有什么用啊，那些人就是‘内人党’。”我说：“这样吧，如果你们能够承认错误，我觉得我能控制这局面，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如果行，你们是不是把门打开，一块儿出去，由我召开平反大会，你们都去参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加。”他们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同意，但你可得保证我们的安全。”我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结果这些人一出来，就被门外的人押赴会场，推到主席台上低头弯腰。

礼堂能容二百多人，由我召开平反大会。我首先发言，先传达中央指示，后做检查承担责任，再宣布平反名单，当众销毁材料。我想，在这个时候，不应当再让两边群众互相斗争，这个责任我应当拿过来，当时就承担了全部责任，我说：“‘挖肃’是根据上级的指示做的，具体的工作都是根据公社指示进行的。我是公社负责人，因此，‘挖肃’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由我负责和承担。你们有不同的意见都应当找我，不应当再互相找，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来找我，这事情我负责。特别是有一些被审查的人，都是由我们这儿批的，更应当找我，不应当再找对方。”当时就把责任全部都揽过来了。会议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涉及到一部分人对错误的认识，你想啊，他们有民愤啊，底下的人觉得这样不解气，就要冲上台去揍他们。我当然是拦着啦！于是又对我不满：“你是在庇护他们，你跟他们完全是一伙儿的！”有人还上来拉扯我。那布其就不让他们这么做。我们的知青这时就上台保护我。知青上来后，一些人又拉扯知青。这一拉不要紧，我们大队的牧民全上来了，站了一排。有牧民说：“你们敢碰我们知识青年一个指头，决不饶你们。”那些人一看害怕了。当场知青们全都感动得哭了，没有一个不掉泪的。我们跟牧民就是这么一种关系。经过“挖肃”以后，我们跟牧民的关系还是那么铁，那么贴心，那么让人感动。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最高指示

坚决、彻底、干淨、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謀計划。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个阶級斗爭問題。

“內蒙古人民革命党”登記表

中国人民解放軍呼和浩特市公安机关軍事管制委員会制

“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自治区清查“内人党”的登记表

这个会散了以后，我接受大家的质询。有的要求解决具体问题：“根据什么审查我？”“我被关了怎么办？”“我被关被押期间的工资怎么办？”也有的发泄自己的愤慨，都来找。当时他们似乎商量好了，分拨儿来找我，这里头什么人都有。结果，我就站在公社院子里，一个个地解答问题，忙得整整一天不吃不喝。接近傍晚的时候，公社有个叫毛凤武的工人，突然冲到人群里来，“曲折，你他妈的给他们解决问题，我的问题为什么不给解决？”他满身酒气，两眼通红，一手拿着匕首，一手抓着我的脖领子。我说：“你撒手，有什么话你说。”看热闹围观的人不是挺多吗，他又冲那些人去了：“你们看什么？我要求他给解决问题，你们看什么？！”说罢，就拉着我的脖领子，往公社宿舍区水井那边拖。拖着拖着他看围观的人跟不上了，离得挺远的，就跟我说：“曲折，你们大队牧民接你来了。”我说：“在什么地方？”他说：“就在这排房子前头。”我到那儿一看，我们大队的牧民和知青早等在那儿了，问我是骑马走还是坐车走。我那天真给他们折腾得够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就说：“坐车走吧。”

6月，草原已是一片绿色，早开的鲜花散发着沁人的芳香，美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了。可是我的心绪特别不好。一路上回想自己到草原一年多的经历，感觉1969年1月以来的几个月我干得很不好，《东方红》唱的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草原应当由于我们的到来而更加光明，可是这几个月却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我不但没有改变它，而且还成了这黑暗的附庸，我十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培育关怀我的党和人民。我极少流泪，但那时，我哭了。

我是公社领导全部被隔离审查以后到公社主持工作的。虽然在工作决策上军宣队、贫宣队起了重大作用，严重的派性左右着运动，但我没有推诿，而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当时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争取稳定的局面。但我万万没想到，若干年以后它带给我的是一颗难以吞咽的苦果。拨乱反正以后，它让个别犯有错误的人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我，更让心怀叵测的人加以利用。当然，了解我的牧民、公社干部不是这样，他们实事求是，说真话。我现在回到我们队、我们公社，那里的领导群众对我都非常好，甭管当初是哪派的。我觉得这很自然，我们跟牧民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我参加“挖肃”就是这么个过程。

那以后，我很少去公社。那时，公社的原有领导都去上访了，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早就没了踪影。公社没人管，但老百姓有事还来找我。当时我们公社在民政方面还兼管达青牧场、军马场等单位。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还承担起了办理结婚登记、判决离婚案的事。在我手里判过三个离婚案子。举个例子：军马场有一对夫妇找到我要求离婚，这是我办的第一宗离婚案。女的说：“如果政府真要不判我离婚，今天就不活了，就去死！”我对《婚姻法》不懂，怎么办呢？当时就给西乌旗政府打了个电话，请示像这种离婚案到底应当怎么判。西乌旗的答复非常简单：“这个问题你就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吧。”这个原则话告诉我了，但我不知道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该怎么体现。没办法，只好把原来在公社工作过的老人找到一块儿，一个是请他们帮我找找《婚姻法》，再一个就是请他们在我判案时坐在后边听着，帮着出出主意。

看了《婚姻法》，我也明白点儿了，就把那对夫妇找来。先让女方讲，女方就说男的怎么欺骗了她，如何如何，与她感情不好，虐待她了，她还带着孩子。接着再问男方，男方说：“我有错误，但是对她还是一如既往，我不同意离婚。”一个坚决要离，不离就死；一个不同意离婚。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起来比较困难。我考虑来考虑去，先劝他们别离，但觉得女方更占理，就说：“好了，你俩意见陈述完了，现在先退出，政府的意见过一个小时后再给你们谈。”我跟几个旁听的干部商量，他们也挺为难。后来我说：他们俩还能过好日子吗？到了这个程度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了，你再让她跟那个男的过，没法过。而且男的也承认，女方说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判他们离婚。财产和孩子问题比较简单，财产没多少，就一架缝纫机，就这么一个孩子，如果他们俩商量通了，咱们就给他们判了。我这么一说，他们都同意：“这样好！”我说：“那好，把他们叫来。”他俩进来后，我郑重其是地宣读了我们的决定：“下面宣布一下政府的决定：同意你们离婚。”男的听了垂头丧气的，开始问孩子怎么处置。孩子比较小，由女方抚养，男方负担一定抚养费。当时就判了，两人拿着离婚协议书，一前一后走了。

1969年12月19日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24]以后，公社恢复了秩序，我参加了公社和生产队领导班子的重组选举工作。1970年10月我入了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公社党委成立时，我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1971年，西乌旗党委和新革委会相继成立，我作为知青代表，成为西乌旗革委会常委和旗委的候补委员，盟革委会重建时我当选为委员。那会儿进入西乌旗领导机构的有三名知青，金河公社的陈朋山进入贫协，巴拉根牧场的丁继红任旗委常委，我在旗革委会，我们只是开重要会议时才来，不参加实际工作。

等到1971年，盟里来了调令，调我到盟里工作。调令寄到公社，我没有理睬它。当时根本就没有走的想法，也不愿意走，我当时的志向是在公社做一番事业，正在兴头上。那个时候我们搞了一套规划，我考虑要做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引进良种牛，安排我们队的知青高峰做兽医，重点搞品种改良。那时候，荷兰牛很便宜，在北京的奶牛场买一头小牛才几十块钱，长到四个月，个头跟内蒙古的三岁牛一样。

还有饲料基地的事，着手更早。1968年夏季，我们收获了很多草木栖籽，整个一屋子，用麻袋都摞起来，就盼着下雨。天一下雨，我和宁华赶着车，到阿山宝力格。那地方有泉水，泉水流经的地方非常湿润，我们就到那地方把草籽种下去，用齿子在地上挖沟，把籽撒上了。第二年一看，哎呀，全长出来了。

我在公社农业队也做了一个规划，在他们那儿也蹲过点儿。农业队开了4000亩地，它前面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水泡子，每年靠从克什克腾旗下来的一条河临时截一下水，然后把水灌到几千亩地里。后来我琢磨应当在那儿搞一个永久的堤坝，水泡子的中心有一个小岛，将来可以建个亭子，给老人休闲是特别好的地方。当时脑子里想法很多。为了绿化，还给农业队弄了两万多棵果树苗。

我们还想在公社西北方向种植一个林带，阻止冬天的风雪往里边走，原来也种过树，可是因为风太大，树长不起来。可是离它不远的拖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拉机站，院里面的杨树却长得很粗，高高的，长得非常好，说明只要积极创造条件，还是可以植树改善环境的。我的心思全部都在这上头。

当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要改变一个地区的面貌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创造典型的方法来解决，你要造出一个典型来，这个典型就可以带动整个面儿，我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个工作。你说你有抱负，想给国家做出贡献，通过什么方式做呀？所以那时候我不愿意走。上级几次谈话以后就跟我摊牌了，话讲得就比较重了：“是你听党的，还是党听你的？！”我这人组织观念强，没有办法，最终还是走了。

我们是自愿来到草原的，但离开草原却不是我的本意。我是骑马走的，马也不愿意走。走到西乌旗，然后再让别人把马给牵回来。走时没带多少行李，书啊、蒙古袍啊等等，都让知青为我保管，随时准备回来呢，这样就到了锡林浩特。

在锡林浩特，我被分配到革委会写作组。在写作组，我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我给盟里写了一份万言书，内容涉及发展以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问题、关于少数民族干部培养问题等等。关于锡盟建设，我提出了新的思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战略蓝图。还有一件事情是对李萍萍的先进事迹进行调查。李萍萍是一名品质优秀、热心助人、热爱集体的知青典型，把她的事迹送到广交会去展览。我在盟里只待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林彪事件”发生后，锡盟革委会就把干部分成几部分，一部分叫“深入敌后”，一部分叫“坚持地方”，还有一部分撤到后方。档案已经运往后方了，确确实实是准备打了。我属于“深入敌后”的部分，负责机关保卫工作。建立了一个排，我是一个班的班长，并兼任全排的政治工作。那时我们就进山了，把山洞打开，往里面储存了大量的水、粮食，每天住在山洞里。枪和子弹也都发了。白天没事就打黄羊，把肉吃了，头割下来吊在树上，当靶子打。

就在这时，盟里田处长坐吉普车来找我，说：“你坐车回去吧，你的工作有调动。”我知道要调我到自治区政研室以后，提出回生产队。他们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想去政策研究室。”他们说：“这样吧，我们请示一下。”他们请示后答复说：“同意曲折回生产队，但是两天以后回去。”等于是让我回去探视一下。我想，总比不让回去强吧！这样，就从锡林浩特回到西乌旗。刚到西乌旗又接到电话指示：“请曲折同志在西乌旗参加文件学习。”这是10月初啊，开始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就留在当地学习。学习完毕，从队里拿了东西回到锡盟，又从盟里调到自治区，进了政策研究室。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五　在自治区的酸甜苦辣

从上山下乡一直到现在，感觉自己进步最快、收获最大或者说心情最好的时候，就是1971年10月到1973年10月在政策研究室那段时间。负责我们政研室工作的领导叫王家祥，他原是北京军区宣传部的部长，时任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区党委秘书长。他倡导在政研室必须要有民主空气，要有讲真话、坚持真理的勇气。政研室的其他领导，无论军队的还是地方的，都讲究民主决策，在工作和生活上都严于律己，关心下属。

用几个字来概括当时的政研室就是：团结、思想活跃、办事效率高。举个例子。1973年政研室开会分析形势时，袁俊芳就明确指出：现在的形势是极“左”，制造张铁生事件是一种反动行为，不管什么人，就是政治局的人这样做我也坚持认为是反动行为，这些人是党内的毒瘤，必须清除。1974年天下大乱时，更有人明确主张追究江青、张春桥等人给国家造成破坏的刑事责任。在当时有多少个单位能够让人发表这样尖锐的意见？在当时的政研室就可以。

那时的很多领导都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到呼和浩特市不久，正赶上自治区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有一天，政研室派我去参加一个小会，做记录，写会议纪要。与会的人我基本都不认识，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的人主持会议，后来得知，那人就是赵紫阳。会议晚上7点来钟开始。与会的有各盟、市的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会议开到晚上11点来钟，决定了18个问题，都是关于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会议的效率这么高，主持人对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决定问题这么快，让我感受非常深刻。当时，赵紫阳是自治区分管农牧业的书记。1972年赵紫阳书记调走后，赵辛初接替了他的工作。我在1973年随他到武川县。他和农民交朋友、深入基层、不搞特殊化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当时财办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姜习，要求自己很严格，从不占公家的便宜，即使参加自治区的招待活动，也一定自己掏腰包。

我在政研室期间参加了工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手工业政策还有少数民族政策的调查研究。那时候为什么提高比较快？可能跟环境以及对自己要求有关系。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都比我年龄大，是从机关各部门抽调过来的优秀工作者，他们经验丰富，不少人都是才华出众、出口成章，和他们在一起，我必须向他们学习，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比如，我要求自己开会发言不讲重复的话，不讲重复的思想，必须标新立异。因此，每次会议我提出的观点都很新颖，都能对别人有所启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971年前后，自治区机关调来一批知青，在政治部宣传部有郭兆英、何芳芳、李惠明、黄若因、陈振山、刘宏春，在外办有杨丽华、路书奇、张权，在政研室有黑秀珩、贾素玲等等，1973年又调来张晓芳、林山、崔维德等一大批知青。这些人差不多都是知青中的骨干。

在这些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得到提拔的，1973年10月提为革委会秘书处副处长。提拔后就遇到一件事儿：尤太忠[25]司令员的秘书回家探亲，身边没人，王家祥主任让我替他一段时间。就这样，在这年的11月我去给尤司令员当秘书了，没想到一当就是五年。从那时到1978年10月，除了1974年他安排我先后到呼市机床附件厂、巴盟五原县参加劳动和运动以外，基本都在他的身边。开始是我和潘秘书两个人，我不熟悉秘书业务，潘秘书带我，潘秘书调走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做秘书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解放后发生动荡转折最激烈的时刻。那时候发生的事让人难以忘怀，随便讲几件吧。

那是1973年。毛主席关注知青的事，4月份在给李庆霖的信里说：“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11月份我去替补秘书工作，内蒙古建设兵团送来一份材料，兵团二师反映，有一个战士叫叶彩革，探亲回来随身带的东西多了不少，有手表、钢笔、收音机，还有人在北京看见过她。兵团战士都挺穷的，哪来那么多东西？马上对她进行审查。她扛不住了，就交代：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把她叫去了，毛主席亲自问他：在兵团，连长对你怎么样？指导员对你怎么样？伙食怎么样呀？吃什么呀？最后还送给她几样东西——钢笔、手表、收音机。主席说：送一支笔，是让你好好学习；送收音机是让你关心国家大事；送手表是让你抓紧时间好好工作。事情捅出来后，这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兵团领导没有把握，把材料送到尤司令员这儿，请示怎么办。首长让我给中办打电话，请示汪东兴主任。后来回话了：“有这事情，但是不要再查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时，我正随尤司令员在和林格尔县乃只盖公社蹲点。尤司令员接电话首先知道了这个噩耗，我知道后，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了，特别敬爱的人去世了，感情上承受不了。我注意到，尤司令员也非常难过。稍微平静了一点儿，他来了，说：“小曲，咱们怎么办哪？”我讲了总理去世后中央出现的几种可能性，其中包括张春桥取而代之，我说：如果张春桥当总理，您一是辞职不干了，二是应该行动，和其他领导一起把他赶下去。他说我的分析有道理。我们朝夕相处，我知道他对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对小平同志非常崇敬。到中央开“反击右倾翻案风”[26]的会，带回了一摞文件，包括“梁效”[27]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东西。一回呼市，我就把这些东西往文件柜里一锁，既不提醒首长传达，也不向其他人透露。首长完全清楚我的做法，也从来没要过。我们就是这样心照不宣。1976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尤司令员正在北京。他认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自治区对用诗歌等各种形式参加悼念活动的人，一个也没整。

同年9月毛主席一去世，江青、王洪文想把大权拿过来，通过王洪文秘书米士奇给各省的秘书打招呼。他们也给我打了电话，要我把本地情况、边境情况等直接向他们汇报，单线联系。我这个人，为什么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就在这儿，不管你是哪儿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他讲，有一个情况跟你说明一下，关于边境一线的情况是由内蒙古军区向军委直接做汇报，不需要经过我；关于内蒙古的社情，公安局直接向公安部做汇报，也不需要通过我。接了这么个电话，我又是怎么答复的，我原原本本向自治区党委秘书长等领导做了汇报，一汇报，他们蹿了，因为我是自作主张啊，而且答复也太直露了。这件事，我在中央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时候，写了证词。

1976年10月8日上午，尤司令员把我叫去，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开心，他问我：“小曲，你猜猜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高兴？”我一下就猜着了：“那几个家伙完蛋了！”“对！中央前天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那天，我们喝了很多茅台酒，别提多痛快了。

这是一个变动非常大的时期，尤司令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内蒙古工作了八年。在我看来，除了保证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外，还有三项工作，尤司令员是功不可没的。

第一件，解放干部，大量少数民族干部是那时解放的。尤司令员是1971年调到内蒙古的，在他之前，“前指”首长是郑维山。尤接任后要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很不容易。

第二件，给所谓“内人党”冤案彻底平反。过去下达的口径非常清楚，“内人党”不是没有，只是“扩大化”了。1975年7月到1976年，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将来恐怕永远说不清楚。有些人精神上总有压力，被人怀疑是“内人党”，得不到信任。尤司令员认为，应当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带着秘书长侯永、政研室王海文专程到北京向中央报告，请求彻底解决这个冤案。这为以后中央为“乌兰夫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内人党”等重大冤案彻底平反打下了基础。

第三件，恢复内蒙古自治区版图。1969年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时，整个东半边划归沈阳军区，那时候珍宝岛已打起来了，中间一块儿划归北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京军区，西半边归兰州军区。几个盟分别划归了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甘肃省。[28]尤司令员认为：应当恢复原来的版图，这样做对内蒙古的发展建设有好处。现在地方这么小，可能靠东北这块儿地方得到的支持多一点儿，西边却未必，作为一个民族自治区要考虑民族情感。我觉得，他这几年为自治区的发展是做了很大贡献的。

这段时间，我的工作非常勤奋，经常通宵达旦。我认为我的工作哪怕提前一分钟，也会对整个形势的好转有所帮助。经常是第二天开会，头天晚上按照领导的意图写出讲话稿，然后白天再跟着听会，听反应。

1973年以后，尤司令员曾多次向中央提出辞去地方上的职务，均未获准。觊觎他的领导位置的，“四人帮”被粉碎前是内蒙古的造反派，他们罗列了尤司令的多种“罪名”，包括重用我这样的“坏人”，企图置他于死地。在中央的支持下，那些人没有得逞。“四人帮”粉碎后，个别被解放出来的人急于恢复自己的权力，他们不能容忍尤司令员等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于是向中央最高领导递材料，说尤太忠在内蒙古八年，推行的是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组织上则是重用了一大批坏人，还罗列了一些人名，这些人从副省级、局级、处级到一般干部，我作为“残酷镇压人民的打人凶手”列入其中。二十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他们所攻击的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人才。但在当时，这些不实之词却使一些人蒙受不白之冤，承受了巨大压力。而我本人也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1978年10月，尤司令员离开内蒙古，大批干部群众到车站送行。早在1976年前后，他和内蒙古军区的滕政委几次让我参军，我都没同意，因为我喜欢经济工作，对军队工作不熟悉。他调走时，因为上面“舍卒保车”的需要，我不可能随他回北京了。他问我：“我走了，你怎么办哪？”我说：“您放心，我心胸坦荡，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知道，一场暴风雨正等着我。但是我没想到，在自治区党委领导知情的情况下，对我的停职审、查批判前后竟进行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这期间，我不能复职工作，也不让上学，有时春节也不准探亲。我多次约见自治区领导，一次都没让见。

事实上，尤司令员一走，就开始对我进行有计划的审查了。一些人为了达到目的，证明我是坏人，早已杜撰了种种罪行，最严重的有五条：第一，贪污盗窃，约合人民币五万元；第二，奸污妇女，致使妇女怀孕；第三，放火，烧伤牧民；第四，非常严重地侮辱少数民族妇女，在“挖肃”的时候，给妇女身上披上羊皮，让公羊强奸；第五，有几条人命。这些“罪行”，是通过以下形式“揭发”的：有大字报，有上层领导人的报告，有自治区政协某副主席在全国政协的发言和简报，有境外报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发的消息，也有发给省市一把手的文件。于是，一些人根据这些，强烈要求自治区对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法办。我想，其中只要有一条成立，就可以置我于死地。

回想那段时间，我的妻子郭兆英在北京为我奔走呼吁，天天为我提心吊胆，我只身在呼市同一股强大的势力周旋，我们只能以书信互相鼓励。但我是幸运的，我身边总有那么多好朋友。

尤司令员调走后，先回北京军区，后到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当司令员。他时时关心着我，有一次我因骨折回北京，他还专程到家里来看我。但我从来没跟他讲过我遇到的这些困难。我这人就是这样，认为自己能解决问题。

1979年春节快到了，秘书处组织舞会，我在旁边观看。那时第一批到牧区调查我的人已经回来了。调查组的巴根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应当特别高兴才对。”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调查你，你知道吗？”“知道调查我，又能怎么样？”他说：“我跟你讲，牧民们都说你的好话，说你在那里表现好。”听了这话，我的确很感动。

有一次办公厅开会批判我，会开到很晚，面对那么多的诬蔑，我心绪难平。在漆黑的夜里，我独自步行到赛马场，想用这种办法驱散心中的烦闷。回到单身宿舍时，已是夜里，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不睡觉在等着我回来，我回来了，他们高兴极了，没有人布置，有的怕我吃不下饭专门为我熬了粥，有的怕我经不住打击专门陪我来说话，当时的情景真令人感动。

1979年春节到了，办公厅不准我回京探亲。肖庆宝约我大年三十到他家吃年夜饭；印钟芳约我大年初一到她家吃八珍鸡，他们两口子本来都不喝酒，为了我，他们喝了；回到机关时，已经下午四五点钟，林世忠处长坐在台阶上，他看见我就站起来说：“我等了你好久了，中午就找了你一趟，走，跟我去喝酒。”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喝了差不多两瓶泸州老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我骑车走的时候已经12点了。

过了节，对我的审查又开始了。调查一次不行，两次不行，有人就说：我就不信找不出问题来。到后来上边就施压，谁不按他们的意思说就开除谁党籍，压力非常大。结果下面个别人开始说一些假话，又鼓动人到呼市来“反映曲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态度一直很明确，觉得自己光明磊落，没什么可怕的。我要求跟审查我的人直接对话，我说：“既然你调查我，就说明我有问题，我究竟有哪些问题，你应当首先跟我来对质。你还没跟我对质，就提出要开除党籍、撤职法办，你都要把我法办了，还不跟我对质，这样行吗？！”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经过我的再三要求，最后他们同意谈话核实。当然，核实并没有一个平等的地位，那些人像法官一样端坐在一排，让我坐在对面。开始对质了，对方就说了：“曲折，尤太忠在内蒙古做了大量坏事，你清楚，告诉你，要老实交代！”我提出只讲我的问题。于是他们就说：“先说说你带红卫兵砸公社的大庙，里边的金银珠宝、财产一共五万多块钱，你把这些东西拿哪儿去了？！”我反过来问了：“我先问一个基本事实，我是什么时候到内蒙古来的？”“我们已经查清楚了，你是1967年10月份来的。”我说：“再问一下，那大庙是什么时候砸的？”“1966年8月。”我说：“这就对了，大庙被砸，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说：“那不管，群众有反映，我们相信群众。”再如人命问题，说我在1972年逼死了达布希勒图生产队吴长林的姐姐，我问他们：“1972年我在哪儿？”回答：“你在政研室。”我又说：“那跟我有关系吗？”我跟你们讲啊，他们就是蛮不讲理，我当时非常气愤。

这期间，在秘书处是不能工作了，他们就让我到农牧大院食堂当采购，兼收大院管理费，这原来是两个人的工作，现在让我一个人来做。自治区农牧大院，共有二十来个单位，还有家属院，多少年该收的费用收不上来，包括各户的电费。我去了以后，好几年没收上来的费用，两个星期全部收完了，对他们来讲这真不可思议。他们就开始查账，他们把几本发票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我这样做，是想证明我的能力和价值。我当采购员总能买到好肉。肉店的人不认识我，每次下雪，我都为肉店去扫雪，运肉的时候我帮助搬运，他们对我有好感，所以我买肉时总能买到好的，有时还让我挑。这让一些人羡慕不已。

80年代初，办公厅为解决子女就业问题成立了劳动服务公司。机关就拨了几十万块钱成立了一个商场，采购力量不足，请我去帮忙采购，福州、佳木斯……哪儿都跑，我采购的商品畅销率达到80%以上。很快，我们商场在呼和浩特市就小有名气了，叫新时代商场。那时有的人都把那个商场叫北京商场。商场要打名气、树形象，应该进哪些商品？呼和浩特人特别喜欢北京的商品。我准备从与消费者最贴近的商品做起。从北京进卫生纸、卫生巾。在北京，一卷手纸卖一毛五，呼市也卖一毛五，内蒙人买东西，一买就买一大捆。我就借着这个打影响吧！还从北京的天源酱园进了很多酱菜。卖酱菜的现场，也和现在一样，摆着一些小碟，顾客在买之前可以品尝，喜欢哪个就买哪个，很快就造出了影响。

在和其他商场竞争中，我注意降低成本。比如当时流行一种带灯的衣架，在北京东边高碑店有一个厂家，进货时我就问了：“呼和浩特有没有人进货？”“有。”“什么地方的？”“联营商场。”“什么价格进的？”一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查，进价31块钱，我的进价是29块钱，整比他们少两块。原来他们来了两个采购员，进货时，这个厂送给他们每人一个灯架，进价就偏高了。在呼市，看他们的衣架卖36块，我就卖35块，比他低一块，他们卖到35块，我就卖34块。我想，你能赔本卖吗？后来，呼市大街上很多骑自行车的人扛着衣架，都是从我这儿买的。你别小看这一块钱，那时候就起作用。

因为商场搞得不错，那边整我的要把我开除党籍、撤职查办，这边商场却把我选为经理，还当选为支部委员。当时，自治区领导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过头做法开始有所醒悟，在几千人的干部大会上还宣读了那布其写给自治区领导的信，说明我没有打过她。上面有人说曲折不好，这样下面就得想办法整啊，争取立功啊。但我的那些“问题”总没法落实，因为这不是真的呀。处分我的意见在我所在的秘书处支部根本通不过。支部开会讨论对我的处分，却不让我本人参加。党章里有规定，应让本人参加，他们不让我参加，主要是怕我的申辩让他们下不了台。结果会一开完，支部的一位同事就跟我说：“跟你说说开会的情况，他们说你在牧区时批判过人？”我说：“对，批判过。”“他们说批判的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我说：“是，批判过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我们当时就问了，怎么批的？他们说在蒙古包里开的批判会。我就问那个调查的人：‘批判是不是动手来着？’调查的人说：‘没动手。’‘那怎么批判他们？被批判的人是什么样？’‘被批判的人在那儿坐着。批判的人发言，说党支部书记搞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说：“你知道我们发什么言吗？我们说，曲折这种行为不但不应该批判，而且应当表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样做的人有多少？结果，支部会开不下去，吵起来了，大家都说，你们根据这个就处分人，这是什么问题呀？我们工作当中谁没开过批判会呀？像曲折这种行为应当表扬，怎么给处分呢？”结果，在党支部通不过对我的处分。

办公厅党组就直接报给自治区党委。后来，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给办公厅党组一个批复，明确指出不同意给曲折处分。没办法了，于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我小鞋穿。办公厅党组下发了一个文：“免去曲折同志秘书处副处长职务，另行安排工作。”我找政治处和政府副秘书长，问：“为什么免去我的职务？是因为我有什么错误，还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够？”他们回答：“我们没说你有错误，我们也认为你的工作能力很强，这样做是对青年干部的爱护培养，干部要听从党的安排，能上能下嘛。”这个权在他们把持之下，你能说什么？

我和郭兆英向中央领导和中央有关部门反映过他们的错误做法，反映过政府办公厅党组的一些问题，虽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已经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布，可是一些部门竟然违反准则，将我们的信转到被告人手里，他们不仅全部否认错误事实，而且在对待我的态度上更加变本加厉，使我的处境更加困难。

到1983年，我在办公厅拿着每月43元的工资，在商场干活儿，我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安排。我也没能讨到“一个满意的说法”。当时，我找了自治区的一位副书记，他说：“鉴于你的这种情况，在自治区机关安排适当工作有一定困难。你看能不能考虑到和林格尔县或清水河县这样的地方去当副县长、县长？”到草原来的时候，我义无反顾。但是离开内蒙古，却经过激烈反复的思想斗争。但我考虑好了，决心离开。当时我提出，我不能在内蒙古干了，但要求清理档案，给我一个客观的结论和鉴定。他同意了。临走前办公厅通知我：你的档案已经清理干净了，鉴定也写好了，你来看一下。我看过，鉴定写得非常好，写了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工作出色等等好话。于是，我办理了调离手续，怀着重打鼓另开张的心情回到北京。万万没想到，我被骗了。回到北京后才知道，我的档案里没有这个鉴定，为了不暴露免去我职务的错误做法，他们甚至将政研室的鉴定、我的任职决定也一并拿掉了。因此我回来的时候，是一般工作人员。后来整党的时候，办公厅将本已撤出的诬陷材料几乎原封不动地转到了地质矿产部，借地矿部的手，继续加害于我。他们得逞了。

几年前，自治区人事局的一位干部见到我，跟我说了一句：“曲折，内蒙古对不起你。”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

六　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

1983年10月，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在地矿部政治部工作。一点儿不客气地说，我这段的工作很出色。第二年做地矿系统的改革调查，我和夏殿权下去一个星期，回来交了七份调查报告，都是很有分量的。孙大光部长、朱训副部长都做了批示。1985年，我重被任命为副处长，同年，主持了地矿部系统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提出很多新颖的观点。我和田潮、韩海青在九个省做调查，直接访谈三百多人，全是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很多人谈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你想想，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在那里成了家，有了孩子，但爱人没有工作，孩子没有学上，你想这些人怎么办？可是地质队死死抓住他们不放。

我们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很快完成了一份一万五千多字的报告。完成后我跟调研室同事们吹：“这是一篇马列主义的文章，经得起历史考验。”现在已经17年了，事实证明其中的观点是正确的。部领导很重视这篇文章，根据其中反映的问题，分别同一些地质局的领导谈过话。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政研室主任方克定看了报告后在会上讲：“这个报告，是地矿部有史以来一个里程碑式的报告，从来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谈知识分子问题。”

在内部管理方面我们也有创新。夏殿权到《中国地质报》做副社长以后，我是政治部调研室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们调查的任务很多，为使每个人都能掌握全面情况，又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搞调查，我们实行了一个“轮流值班负责制”，就是在我最终负领导责任的前提下，值班的人员对调研室的工作负全责，值班人员每月轮换一次。这样做效果不错，可惜没多久我就离开了。

整党开始的时候，我是秘书处的成员，参加了整党初期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领导就让我把工作交给别人，我就知道是内蒙古那边出了问题。内蒙古的朋友给我来信儿：“部里来人调查你了，办公厅的那些人把过去整你的材料都给了他们，里面净是污蔑之词，让他们带回北京了。自治区纪检委的同志对来人说：内蒙古整了曲折好几年，你们还整啊？”

很快，领导就找我谈话了：“曲折，你不能在现在的岗位上工作了。你看还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工作啊？”我知道，那些仍然按照极“左”思维模式干事的人，已经把我定成控制使用对象了，对他们，一切申辩都无济于事，我更不敢奢望在领导层有敢于主持正义的人。我提出愿意为地矿部发展多种经营、解决富余人员问题做贡献。这个事情归劳动人事司管，于是我去了，成立了劳动服务中心，后改称劳力中心。

在这里，我创办了《多种经营与劳动服务》内部刊物，参与组织了多次全国地矿系统的多种经营会议和展览。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地矿系统发展多种经营的问题，1987年，我撰写了《论富余劳动力的产生与转移》的论文，连续三期，每期半个版登在《中国地质报》上。那时地矿部已经出现结构性人员过剩，但是领导的指导思想还是加强地质工作，增加工作量，以解决人员的出路问题。这个思路是错误的，因为结构性的富余人员只能向其他产业转移。分管这摊工作的林君孚司长当时不同意我的意见，甚至多种经营他都不同意提，我们争论得很厉害。1990年我们在一个会议上遇到了，他对我说：“老曲，现在我认识到，你对了，我错了。”

1988年夏天，原地矿部政治部副主任张涛准备到部属公司去工作，希望我帮他一段时间，两三年。当时民政部政研室主任许承琪请我去办《社会保障报》，我已经考虑走了，准备去民政部。张涛当时也在替人受过，我觉得他挺苦的，在他的盛情相邀下，最后我决定还是先帮他一段时间，就这样到了公司。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公司，我当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分管非金属部和公关部。干得也是热火朝天，在三年的时间主持建了两个新型煤厂，一个无水去油乳厂，引进了两项技术，还在清华大学建了一个实验室。

七　“下海”以来的重新创业

1991年9月，我“下海”了。我能够迈出这勇敢的一步，一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二是有郭兆英的支持，三是有朋友的帮助，大环境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

我来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社会调查研究所（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它是老同学李冬民在1985年创办的，是我国第一家开展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的民办机构。

“文化大革命”时期，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领袖，1968年参军，70年代回京当工人，仍热心于政治活动，对“四人帮”一伙的反动行径早有认识和批判，长时间被盯梢、控制。我当时曾为此事找过谢静宜的秘书和丁国钰，提出应解除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没起作用。1977年初，冬民因为强烈要求小平出来工作，被当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逮捕入狱，连累了一批人。当时的解释是：如果采纳这个意见，让小平出来工作，他们就会把右派政变的帽子强加给中央，进而打倒中央，让“四人帮”重新上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被释放，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下文，为李冬民平反。之后，他研修毛泽东哲学思想和社会学，并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创办了这个所。创办初期他就希望我过去，可我那个时候正在忙“国家”的事。1991年，我参加了他主办的苏联东欧市场经济研讨会，他又提出让我过去，那时我已经在公司干了两年多，自信心比较强，对“下海”已没有什么顾虑，况且又是跟老朋友在一起，就同意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郭兆英等在知青坟祭奠

从去社调所到现在，已经11年，我想总的谈一谈这段经历。相比之下，到社调所以前的24年，耽误了不少时间，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五年，真的没有多大意义。那些人吃人民的、穿人民的，但不会为人民办实事，除了弄权整人，没有别的本事。我费了五年时间跟他们周旋、让他们摆布，值吗？当然，我改变不了历史。

在社调所，我担任副所长，协助所长开展调查业务，进行内部管理。当时的调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行业调查，二是个案调查，其中的连接点是产品调查。社调所调查所依靠的，是几年来在社会调查培训班上培训出来的人员，以及国家统计局的部分调查系统。1991年11月，在社调所建立自己的调查系统之前，叶朝林巧妙地利用学生家长的评价意见取得了一组对部分商品的评价数据，社调所从这儿找到了一条大规模进行产品评价的路子。到1992年，评价的商品已经有百种以上。个案调查服务，比如对瑞士雷达表、先锋财务软件等也搞得有声有色。当时，这在国内属于“首开纪录”，新闻性比较强，报纸、电视台纷纷报道，一些部门，像轻工总会也把调查情况送到领导的案头，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社调所的影响，比以前更大了，实力也比以前更强了。有两个情况可以说明。一是国家工商局商标局决定在全国评选驰名商标，社调所和中央电视台等几个单位并列成为其选定的评定单位。再一个，1992年，在有其他单位竞争的情况下，社调所被国家人事部门确定为《中国人才报》的承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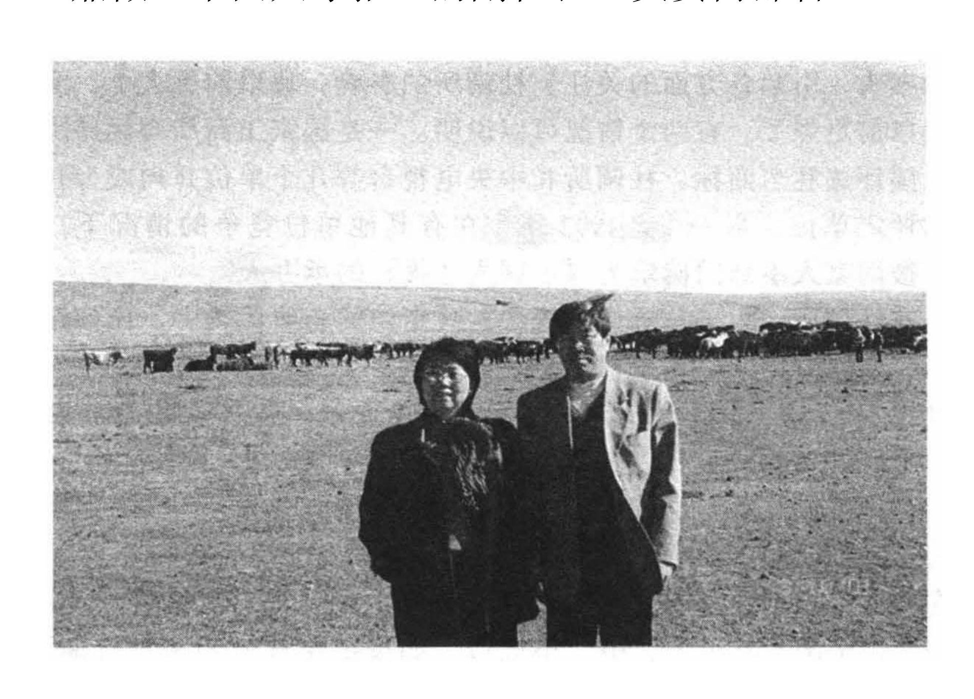
在社调所，为了开展调查服务，我走访的企业比较多，比如红豆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团、娃哈哈集团、北京衬衫厂、天坛衬衫厂、上海协昌缝纫机厂、长春铃木、大连九星等等，拜访了不少企业家。我在这些企业家身上，看到许多我要学习的东西。

在调查方法上，也摸索了一些东西。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完全按照书本搞抽样调查有时就不太现实，虽然从理论上讲应当这么做，但是在实践中推不开，原因在什么地方？你的网络不健全，成本太高。比如说，全国668座大、中、小城市，如按抽样框的要求进行抽样，然后再派人到那儿做抽样调查，那不太现实，特别是在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我们就研究，适合中国的调查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一套设想，后来就这样做了。我讲得比较简单：假设有一个班四十多人，我们想了解全班对班主任老师的看法，当然最好四十多人都了解，准确率大，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写，又想了解大家对老师的看法，就要搞随机抽样，这样就涉及抽样量的大小。假如只抽三个样，这三个样都是对老师意见比较大的学生，那么对老师的看法就缺乏准确性。比较好的办法是选三个样：对老师意见较大的，对老师反映较好的，对老师看法一般的。如果找这么三个人，结果就不一样了，大体上可以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这样的方式就带有中国特色。

还有，对一种产品是不是名牌的鉴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基本穷尽这些因素，取得这些数据以后，然后做分析，仍然有根据经验判断的问题。我们就从这些经验当中，找到一个判断的尺度，一个客观的评判标准，那是主观意志代替不了的。我对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很喜欢。在这期间，还兼做《中国人才报》的副社长，负责内部管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重返草原（曲折、郭兆英夫妇）

1994年夏天，我和郭兆英又去了一趟草原。在锡林浩特，发现那儿的信息工作极端滞后。回来后，我离开社调所，和其他朋友创办了“北京市普瑞治信息服务中心”。中心做了一些行业信息服务工作，比如：摩托车行业、劳动防护用品行业、服装行业等等，也开展一些定向服务。我们还从企业形象策划扩展到城市形象策划，在1996年策划并组织召开了全国城市形象策划工作会议，为茅台酒厂在北京国际饭店门前设计树立了“中华爵”，还为王府井大街进行过形象策划。

1997年，应朋友之邀到“戴梦得”帮助做股票上市工作。我作为公司上市工作的主要操作者之一，从1997年4月开始策划上市方案，到1999年6月企业在上交所上市，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应当说，我在这两年当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在企业重组、资本运作方面。“戴梦得”是搞珠宝首饰的，成立比较晚，公司很小，评估资产1600万，本身又是非国有企业，上市几乎不可能。但是它想上市，为了达到上市的标准，只能走“借壳上市”的路子。于是，和募集成立的浙江惠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地矿宝石总公司等进行了重组。由于所有制结构、产品结构、资产状况存在的差异特别大，所以操作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我们做成功了，1999年6月上市，融资三亿多元。上市时，我的职务是董事会秘书兼总裁办公室主任。这两年我做了不少文案工作，其中我满意一点的，是《我国珠宝行业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战略取向》这篇文章，文章在内部使用，没有发表。上市以后，我认为该做的工作完成了，很快提出辞职。领导一再挽留，那儿给我的工资待遇也很高，但我不安于这种平淡的生活，决意要出来。董事会开会肯定了我的工作，批准了我的辞职报告，公司总部为我召开了盛大的欢送会。

离开“戴梦得”以后，我主要做两件事。

第一，成立了一个生物技术公司。开始，我们和一位科学家合作，也准备做核酸制品，进行了市场调研以后，感到市场不错。但是后来咨询了美国强生公司的有关人士，他告诉我们，美国没有这种保健品，而且DNA和RNA如何被人体吸收并去营养基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考虑到三株口服液、沈阳飞龙这些企业的教训，我们下决心不上这个项目，开始寻找其他项目。一个朋友对蔬菜的营养强化问题研究了多年，并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项目不错，对提高人民的健康有好处。在他的基础上，我研究出一种“富硒全营养素食颗粒”，这种产品面对广大工薪阶层，是一种科技含量较高、极富营养的食品，有广阔的市场前途。我们正在开发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融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第二，开展了一些咨询工作。出来以后给中地工程集团做发展战略。1997年2月，我们第一次给它做，当时它的资产有一亿多，到2000年，集团资产就达到了十几亿。后来集团要求继续做2001年到2005年的发展战略，这样又做了一个。到2005年，中地工程集团的资产应该可以达到60个亿。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变原来的那套机制。

原则上讲，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像这种竞争性行业里的国有企业，是没有什么独立发展战略的。比如说，你现在是企业的一把手，这个企业的理念、主导思想基本上体现了你的思想、你的理念，如果有一天，上级主管部门把张三或李四调来，把你换一下位置，公司的战略就完全变了。那你的战略为什么不稳定呢？因为你的股东只有一个，他一人说话就算数。一股独大也不行，也是一家说了算。如果有多家股东，而股东们追求的就是企业效益的最大化，那你的战略就好实施，是公司的最佳选择。

此外，我还参与了为北京日报集团、南京创瑞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科达晨鹿电子有限公司、中矿金业公司、中国报道杂志社等单位所做的咨询活动。

这两年我也做了一些策划方案，但是基本上没有实施。

人活在这个世上应该自在一点儿，所谓自在一点儿的最高境界当然就是为所欲为，在事业上干你自己想干的事情。人和人之间的个性差异特别大，人人都应当有所追求，追求自己认为高尚的事情、值得追求的事情。有了追求，一个人就会乐此不疲。我们看一个人打麻将，从晚上7点打到第二天早上5点，简直苦不堪言。但对喜欢打麻将的人来说，这是再高兴不过的事情，因为他乐此而不疲。成就事业的过程，也是艺术创作的过程。一个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应当在事业创造过程当中得到一些乐趣，我追求的就是这种东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太大了。其中什么变化最大？我认为人的观念变化最大。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的追求、人们的价值观、人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等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翻天覆地，转了一百八十度。

2001年12月，我在厦门召开的“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上有一个发言，我说：我们亲身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历史。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历史把我们送到今天这个动荡的、多极化的世界；一个信仰多元化、价值观取向多元化的世界；一个日新月异的、躁动不安的、竞争激烈的世界。在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感叹这一代人做出的牺牲，经历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磨难，做出的贡献，还有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抵制十年动乱的人群里，在拨乱反正的潮流里，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一代人始终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今天，在国家复兴崛起的进程中，我们当中有的人事业有成，如日中天；有的人正处在事业发展的冲刺阶段；有的在为生计奔波；有的还在重新开始；有的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大环境的藩篱，决定了多数人的命运取向，人们很难改变它。但凭借二十多年来觉醒了的自由意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来把握机会，改变命运。无论在哪种平凡的岗位上，面对现实、奋斗、求索，始终是这代人的主题曲。我想，面对祖国，面对未来，面对父母、爱人和孩子，我们完全有资格说：我们努力过了，竭尽了自己的所能。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的主流在长期的生活中确实形成了一种共识、认知和传统的话，我认为它的精髓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奋斗不止。我喜欢《共和国之恋》这首歌，里面有两句歌词是这代人主体的写照：

纵然是凄风苦雨，
我也不会离你而去，
当世界向你微笑，
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纵然我扑倒在地，
一颗心依然举着你，
晨曦中你拔地而起，
我就在你的形象里。

---

[1]《飞向草原的雄鹰——记到内蒙插队的第一批首都中学红卫兵》，载《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

[2]曲折：《发端：1967年10月9日》，载《草原启示录》，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

[3]《北京市革委会领导接见首都第一批插队知青座谈会原始记录》，1967年10月8日。

[4]《兵团战报》、《中学红卫兵报》合刊，1967年11月1日。

[5]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出版了杂文集《燕山夜话》，他还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陆续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江青等人直接策划下，把上述文章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邓、吴、廖诬蔑为“三家村反党集团”。

[6]“双轨制”是对两种并行的教育制度的通俗说法，即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存，最早是由刘少奇在1958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

[7]“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纲领。

[8]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由大、中学生自发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最初是1966年5月29日晚上，由清华附中十几个学生发起组织的，以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支持下迅速发展到全国。

[9]“中央文革”，即“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于1966年5月，名义上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毛泽东一人。

[10]对联，指1966年下半年部分干部子女大力鼓吹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是血统论思潮的集中表现。

[11]高校一、二、三司，指首都高等学校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第三司令部，是跨校际派性组织。

[12]军宣队，“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派驻大、中、小学及其他单位，领导“斗、批、改”的组织。

[13]全国性大串联，1966年下半年，在毛泽东支持下，北京的红卫兵走向全国，传播“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到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大串联出现高潮。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

[14]联动，全称“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派别组织。

[15]指遇罗克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出身论》，发表于1967年1月28日《中学文革报》的创刊号上。

[16]四三、四四两派，北京中学红卫兵的两派组织，分别以江青在1967年4月3日和4月4日的讲话作为本组织合法性的依据。

[17]杨朱，战国初哲学家，主张“贵生”、“重己”、“为我”，重视个人的权利，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孟子抨击他的话。

[18]此事详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年版。

[19]1968年7月20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制定了《关于在牧区划分和清理阶级成分的几项政策规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以前在牧区实行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决定在牧区划分阶级，斗牧主，分牲畜。在牧区划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贫牧等两个阶级、六个阶层。

[20]“挖肃”运动的全称是“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主要指1968—1969年全内蒙古掀起的一场旨在深挖“新内人党”的运动。运动中许多蒙古族干部、群众受到残酷迫害，甚至致死、致残。参见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4页。

[21]四类分子，指“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四类人。同时还有“五类分子”一说，指四类分子外加右派分子。此外还有“反动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种种身份，均属政治上的贱民。

[22]高锦明，“文化大革命”初先后担任内蒙古党委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1968年挖“新内人党”的运动愈演愈烈，制造了大批冤案。高锦明在9月25日的讲话中提出了防“左”的意见，说不能再挖了，再挖就挖到自己头上了。当时内蒙古的主要领导人滕海清不仅不接受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防“左”的意见，反而提出反右倾的口号，批判高锦明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23]从1968年5月13日到19日，中共中央领导周恩来等多次接见内蒙古自治区负责人，指出，“在滕海清同志‘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内蒙古犯了严重的逼、供、信、扩大化、违反政策的错误”，并要求：挖“新内人党”运动，第一要停止下来，第二要给搞错的平反，第三要放人。5月19日，滕海清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古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几点意见》，毛泽东批示：照办。此即“五二二”批示。

[24]军管，指派遣人民解放军官兵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等实行军事管制，是“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执行所谓“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任务之一。“挖肃”运动停止后，内蒙古的局势趋于混乱。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组成内蒙古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1972年1月，军管结束。

[25]尤太忠，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1年5月起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78年10月调离。

[26]全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1976年初毛泽东发动的一场以批判邓小平为中心的政治运动。

[27]梁效，“两校”的谐音，“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臭名昭著的大批判组的笔名。

[28]1969年，中共中央决定，将内蒙古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哲里木盟和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划归吉林省，呼伦贝尔盟和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划归黑龙江省，额济纳旗和阿拉善右旗划归甘肃省，阿拉善左旗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1979年7月，又将上述盟、旗、县重新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迟到的婚纱

——张玲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时间：2002年2月24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豆腐池

［采访前记］　张玲讲的都是普通的人，说的都是普通的事。因为普通，才与百姓的生活相通，才具有典型性。这是我选择她做口述的理由。

在张玲的口述中，引起我关注的首先是婚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多少知青在农村结了婚，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按照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1974年末，全国已婚知青有48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7.1%）；1975年增至61.4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8.1%）；1976年为72.6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9%）；1977年达到创纪录的86.1万人（占全部在乡知青的10%）。[1]这一统计，只限于留在农村的知青，考虑到一部分已婚青年已陆续回城或上调，估计在农村期间结婚的知青人数应在百万人以上。

这一百多万人的婚姻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知青与农民类型又包括男知青娶女农民，女知青嫁男农民两种形式。其中，女知青嫁给农民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女农民的人数。[2]我当初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档案；张玲的口述，则为了解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婚姻形态，特别是作为当事者的女知青的心态历程，提供了翔实、具体的个案。

张玲是1968年9月从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的，第二年的10月，也就是她刚满20岁的时候，与村里的青年李刚小订了婚。与农民结合，意味着将终生厮守脚下那一方土地，意味着完全割断与城市生活藕断丝连的联系，一切关于前途的憧憬，以及对招工、招生、返城的企盼也将随之化为齑粉。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知青走上了这条前景并不光明的道路呢？笔者曾将女知青选择这条道路归结为两条主要原因，首先是不堪农村艰苦劳作的重负，其次是“血统论”的压力。[3]而张玲决定在农村“扎根”，除了前面提到的一般性原因外，还有特殊的理由：下乡前精神受到过刺激，因此不愿回北京。

张玲考虑问题总是很实际，一旦决定留在农村，马上想到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最好的劳动力，以便生活上有依靠。对方是中农，没有参军要求，这也让她觉得满意。再者，双方家庭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自己家是成分不好，对方的母亲则有“作风问题”。张玲希望用这种形式上的平等，作为共度平生的起点，“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张玲谈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态：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

虽然当时的官方传媒积极鼓励知青在农村“扎根”，但对于成千上万女知青而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言，在农村结婚，并不会成为一个可资炫耀的政治资本，不过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开始。婚后不久，张玲就发现丈夫有赌博的毛病，屡教不改，气得她自杀过。过着清贫的生活，她毫无怨言，努力适应着农民媳妇的角色，“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她在口述中，一再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这包括妻子的责任、儿媳的责任，母亲的责任。她最看重的要数后者：“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

那么，作为婚姻中的一方，对双方在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社会经历等方面的差距，又是怎么看的呢？张玲承认，知青找农民，彼此间绝对有差异。但至少她个人认为，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她认为，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主要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张玲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已婚知青在返城过程中遇到的更多磨难。因为是已婚，只能就近分配，而且是条件很差的“大集体”；为了给孩子转户口，不得不跟丈夫办了假离婚；以后是把丈夫的户口也从农村办出来；再以后，为了把孩子户口转回北京上学，自己主动辞退工作，在北京办了假接收。她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为了满足这个小家生存的基本条件，而每采取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像张玲的这种经历，在“老三届”知青中应该说并不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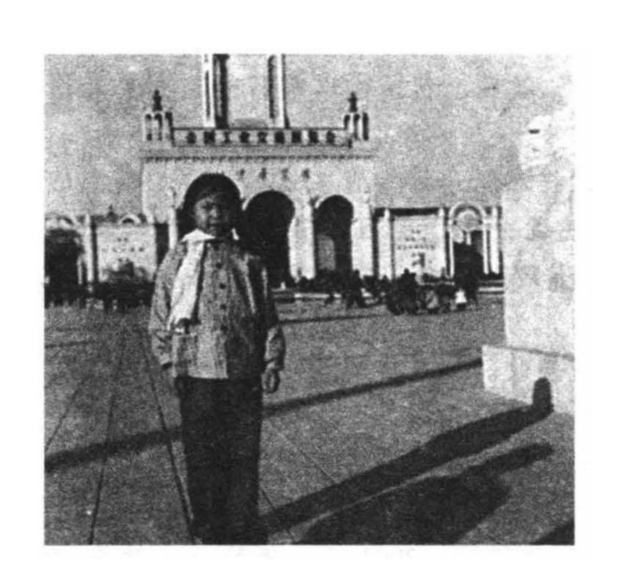
然而，当她终于把户口弄回北京后却发现，在偌大的北京城里，竟“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刚小死后，2001年，张玲与比她小10岁的吴春海结了婚。春海1960年生人，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脑筋不如常人。但春海的一间平房使她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

张玲的命运虽没有大起大落，也并非平淡无奇。一些知青朋友们得知她的第二次婚姻时，热心地为她举办了一次热闹的婚礼。张玲将这次“迟到的婚纱”概括为三个“第一次”：这一辈子第一次穿二百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婚礼。

一　我没有金色的外衣

我出身在一个资本家家庭，在那个时代，出身不好，就好比没有金色的外衣。五十多岁的人了，虽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小的沟沟坎坎也过了不少。这么多年，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向别人好好说说，不为别的，说出来痛快，省得憋在心里。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7岁时摄于北京展览馆前

还是从家世谈起吧。我家祖籍河北东光县大宁庄，爷爷辈挺贫穷的，为了日后能有个人支撑这个家，就决定培养我爸，凑钱送他上私塾。我爸这人也争气，年轻时孤身一人来北京闯，通过介绍进了一家德国洋行，自学的外语，然后就能直接和洋人交流了。他在这家洋行一干就是20年，先学徒后来一直跑外。凭本事吃饭，当然是很辛苦的，但收入也不低，后来就用多年积攒的薪水，与别人合股经营化工原料，起名达隆商行，地点就在前门外，现在还有门脸呢，叫什么化工燃料公司。多少年了，改来改去，还是搞化工。我爸的事业等于刚开始，还没怎么着呢，就碰上了解放，他顺理成章成了资本家。

我是1949年9月25日出生的，与共和国同龄。上小学后，在班里学习一直比较出色，二年级开始当班长，三年级是中队长。1959年，上小学三年级，迎接少先队10年大庆，要选代表上人民大会堂，还有毛主席接见，听说这消息，别提多振奋了。同学们都以为会选我去，因为我拔尖啊。结果批下来之后，是两个出身好的同学去了。人家说，我出身不好不能去。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学的课文，有一篇写的是地主，有一篇写的是资本家，都是很丑恶的形象。小时候不懂什么叫出身，这次不让去人民大会堂，才意识到自己出身不好。

我记得那个场景特清楚，回家时我爸正挨那儿坐着。在这之前，人民大会堂刚建完还没开放的时候，组织工商界人士参观，我爸也兴冲冲地去了。回来以后还给我讲呢：里面怎么怎么好，穿的钉子鞋，怕把地板碰坏了，干脆就提了着鞋，光着脚走了一圈，特新鲜。我当时还说：“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怎么不让我去？”等到我告诉他“去人民大会堂没有我，说我出身不好”时，我爸看着我笑着说：“没关系，长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大当上劳动模范就能进去。”

我一向好强，出身这事儿出来后，情绪挺低落。那会儿我在姥姥家住着，我爸身边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觉得闷得慌，就说：“我帮你转回来吧，咱俩在一块儿，每礼拜都看电影，有个伴儿。”家里大人也觉得，转个学校可能就没有人再提出身的事了。这样，四年级就转到我爸这边，上了离家不远的遂安伯小学。

那时候，虽然开始感受到出身的阴影，生活还是挺优越的，“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我爸有定息，三个月取一回，二百多块钱，合每月70来块钱。加上爸妈的工资，收入就算挺高的了，所以没有受过什么苦。到了过年，大人领着去百货大楼买衣服，穿得漂漂亮亮。我上学为什么一直能当干部？一个是自身的能力还行，一个是穿得干净利落，脚上是皮鞋，显得很出众。当时倒没觉得什么，后来一回想，才知道是那么回事。

那个时期，好多工农人家生活条件很差。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关素琴，离家远，中午不回去，带的饭就是窝头什么的。我很热情地招呼她：“走吧，走吧，上我们家去。”她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多年后她提起，那会儿家里老吃杂和面，看见我家老吃面条，特羡慕。

转到遂安伯小学，我连着三年当大队长。初中考上女一中，升入初二年满15岁，从大队长的职务退下来，又继续当了两年班干部。后来怎么撤下来的？有一个同学说：“你出身不好，就不要当班干部了。”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中了。我喜欢体育，那会儿还当着体育委员呢。让我下来，我是这么说的：“当这个班干部也够累的，早就不想当了。”

我小时候就爱张罗事儿。刚到女一中报到，一进教室，就看见桌椅板凳满世界摆得乱七八糟，别的同学都在那戳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摆桌椅、扫地，我一动同学们就跟着动。也许有的人知道这个事该干，可是缺乏主动性。就这样，很自然的我就给选成班干部了。那会儿倒没说什么出身，发展团员才看出身呢。当班干部时，没有人因为我的出身对我有什么偏见或者歧视，同学们比较友善，但是有的班就因为这个闹意见。为了入团，我写过申请书，还写过对家庭的认识，当然入不了。我在班里的学习不是拔尖的，也算中上等，后来班里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同学倒先入了团，出身好嘛。

“文化大革命”初的许多经历已经淡忘了，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红卫兵抄家的那一幕。1967年夏天，我听到对过那个院子传出的声音特别嘈杂，因为听我妈说过，那个院里的老太太是给我接生的，使我对那家老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平时很少到邻居家串门，就是因为有这么一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层关系，不由的就走进那个院里去了。心想：别是老太太出什么事了？进去一看，当院站着好多人。院子里有个高台，几个红卫兵雄赳赳地站在上头，旁边一个人双手从背后捆着，红卫兵一边喊着一边打他，其中一个拿着带铁头的棍子。他身上被打得一道子、一道子的，红卫兵口里喊着：你承认不承认你是狗崽子？我没看见老太太，遭毒打的是她儿子，大概三四十岁的样子，他媳妇的头发已经被剪了，也在旁边捆着。红卫兵打得他浑身是血，问他什么他也不吭声，红卫兵就往他伤口上撒盐，撒完了再接着打。还有人领着喊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后来听说，他是地主出身，所以骂他是“狗崽子”。我进去一看这情景，不敢看了，但是院子门口有人把着，只准进不准出。最后打得他不动了，红卫兵这才撤走。



红卫兵抄家封门

回家以后，我就跟我妈说：“快让我爸回老家吧。他家离我们家这么近，红卫兵到咱家来怎么办？”那会儿，我对“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感到很模糊，我是站在红卫兵一边“革命”呢还是站在我爸这边维护亲情？我没法选择。受了那么多年的政治教育，“革命”这个词对青年学生是挺有吸引力的，可是我就是怕看那种打人的情景。

在家里几个孩子中我最小，但是有决定事务的能力。我妈一听，第二天就送我爸回老家了。我妈一回来我就问：“路上有什么事没有？”她说：“到车站了，人家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资本家，让人家抽了两鞭子，还在背心上写了字。”我心说了，这老头儿太实在，他随便说个别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的出身，就不会挨打了，怎么就承认是资本家？他回到老家，农民可能不像城市里这种人，他们起码没有红卫兵的鞭子。第二天，听说对面院里的那个中年人被活活打死了，他母亲是我的接生婆，再也没见踪影。



正在抄家的红卫兵

说起来我妈也是苦出身，小时候靠打粥维生。日伪时期，家家关门闭户，有位好心的校长看她聪明伶俐，免费让她进学校读书。我妈写的字还是有点儿老式的那种。她嫁给我爸后，对未来的生活有过幸福的憧憬，解放后一直在努力工作，就因为嫁给了资本家，后半辈子没少受罪。“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起来写检查，一些人由着性子折腾她，整整一个冬天把她圈在屋里，枕头都没有，枕鞋帮子，裤腰带都没收了，怕她自杀。那个冬天真把她给冻坏了，亏的自小受苦，能扛。

二　我选择了在农村“扎根”

1967年串联回来，学校说要“复课闹革命”，接着给毕业生办学习班，动员上山下乡。我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咱和生产建设兵团搭不上，出身好的才能去，开始就报了去汤原农场、还有东北的一个什么电厂，觉得比插队的大拨儿轰好一点儿。报来报去都没有批准。当时还有人说：“这批内蒙古的不走，下批就是山西了。”这帮人就说：“可能内蒙古还好点儿？还是赶快走吧！”最后报名去了内蒙占土默特左旗。

在这之前我爸回老家了，按政策我也可以回去投奔他。我就想：他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是自己的父亲，要是农民批斗他，我该站在哪一边？实在没法抉择，干脆躲得远远的，起码是看不见了。我就跟学校要求去插队。当时我们班七个女生一块儿走的，正好分到一个生产队。这是1968年的9月。

后来我问我妈：“我爸回老家怎么样了？”她说，村里许多人都是本家，有亲戚关系，对你爸特好，因为他岁数挺大了，不让出去劳动，甚至拿他“当神供着”。这倒不是因为他辈分大，当年他在城里挣钱，接济过村里的乡亲，有一年遭灾，还送给每家两块大洋。多年以后，乡亲们还念着这份情。我一听，心里才塌实了。



下乡前与同学合影于天安门广场（前排右三为张玲）

自从回了老家，我爸的经济收入就断了，全靠我妈挣的三四十块钱，每月再给我爸寄生活费，就剩不了多少钱了。我，还有我二姐，都面临着下乡插队，家里哪有钱呀？走的时候行李特别简单。大姐给带了一点儿剩衣服，人家不穿的绒衣，我们都当好东西。

插队第一年，国家发给生活安家费，我们知青小组买供应粮吃，一起劳动，还没有显出什么差别。可到第二年生活费没了，吃什么呀？吃你头一年挣的工分。我呢？干到第一年的5月份就病倒了。下乡前我受过刺激，精神状态不是太正常，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恢复了，这刺激大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概一生都得留在心里头。当时我躺了十多天，知青对我很照顾，但再照顾，你不出去劳动，工分没有啊，让别人分给你点儿工分，那不可能啊。

干活儿也干不了，我就说回家看病去吧，破衣烂衫的，扣子也掉了，恍恍惚惚地回到北京，下车后站都站不稳了。当时手里还有点儿钱，我记得路费就是11块多。出了火车站，为了省钱，走着回的家。我妈给我买早点，几个油饼一下子就吃光了，我妈都觉得邪乎。在农村，饿呀，既消耗体力又吃不好。

当时盛行针灸，又便宜，我每天扎针去。有一次，我恍恍惚惚地骑着车去，回来却忘了骑车，忽忽悠悠地走到家了，第二天才想起来，赶快去找车，还没丢。治了一段时间，病好一点儿了。一天，我发现家里的床没了，搭了个板子，就问："那个床呢？"我妈说："那床给卖了，看病用了。"这时家里的拮据显现出来了。我回来的生活和看病，全靠我妈的几十块钱，她除了每月给我爸寄生活费，自己还得生活呢，还得养我姥姥呢。我一回来，家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从那开始，我才对钱有了考虑，以前从来没想过。家里穷得快揭不开锅了，不能再增加母亲的负担了，我就想着回农村去。

有个同学正好也要回去，说："咱们扒车去。"我们一共八个人，有一块儿的，也有别的学校的。跟着他们进的哪个车站，不记得了，反正扒的是货车。他们扒车，好像不是第一次了。尾车的列车员不错，让我们上去了。可是刚走到张家口，那车就停了，车站上大喇叭里喊的什么也听不清楚。听见远处有喊声，声音越来越近，待会儿，一队解放军过来了，让我们下去。我说，咳，闹了半天，那喇叭里喊的是让咱们下去，咱们还在这儿傻坐着呢。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走，两边都是解放军，就跟押送俘虏似的。解放军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些知识青年，怎么天不怕地不怕？"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没钱啊！"还跟他们胡搅蛮缠："我们回去是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你不让我们回去啊？我们又不是干别的去，我们没钱也得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个小战士看上去也就是十七八，我心想，你还没我大呢，教训我？！

其实身上还是带了车钱，我记得带了18块钱，以防万一。钱就在手里捏着。后来去吃饭，他们问："你们没钱买票，怎么有钱吃饭啊？""不吃饭还不饿死？！"最后他们把我们八个人分开，谁到哪儿，谁到哪儿，一拨一拨送上客车，也没买票。

我在北京大概住了两个月，回到村里，已经是8月，秋天了嘛。有一个知青的身体很不好，怎么办？我那时还当着知青小组长，知青有什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么事都管着。我就说：“不行，咱们去找知青办吧。”我们俩从村里走到察素齐，有30里地。察素齐是旗政府的所在地，到了那儿才知道，知青办任务完成，已经撤销了。那我们找谁去啊？这不成了没人管了吗？我们俩只好又往回走，路上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小青年骑着车，我就说：“哎，带我们一段，顺路吧？”那男孩子一看带俩女知青，北京的，呵，这高兴，这个乐。当时我挺胖的，那个小青年带着我晃晃悠悠的，我怕他把我扔了，就说：“下来，下来，我带你吧！”我带着他走了一程，连说带笑的，骑着车来回地扭，最后还是摔了一跤，特逗。

回到村里，那个女知青去挑水，挑不动，把水桶都给扔了，身体弱到那个地步，自己觉得没有指望，吃了安眠药。幸亏知青发现及时，赶快抠她的嗓子眼，竟给抠出来了。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后来“知青办”也就恢复了。

我们队分值挺低，一个工分就合几分钱，村里给我评的是一天4.6分，知青干得好点儿的，能给到7分。因为我老生病，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一年口粮的。到了第二年，知青该自己养活自己了，菜钱开始分摊，谁有20块拿20块，有10块拿10块，就是我一分钱也没有。当时同学还是那种心态：“哎，你就吃吧。”可是我这人特别要强，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一次两次，哪能长期白吃呢？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只吃粮食不吃菜。同学们还不理解：“又不是不让你吃。”

正好是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去看场院，从外边回来，碰上了李刚小他妈，也就是我后来的婆婆。当时村里那些好心人，对我们知青可好了，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们送去。对别人家送的吃的，我们都痛快地收下了，惟独这一次，刚小他妈煮了10个鸡蛋送来，家里的知青说什么也不收。我从外边回来，她兜着鸡蛋正怏怏地往回走，碰上我了，就跟我说：“张玲，我送了点儿鸡蛋他们没要，给你吧。”知青为什么不收她的鸡蛋？她名声不好，也就是作风有问题，没人爱搭理她。我当时正在困难的时候，也顾不了那许多，就收下了。

从我们下乡之后，刚小就一直帮助我们，他是汉民，那个村里蒙民比较多。我们遇到什么事比如烟筒堵了、炕冒烟了，他都来帮忙。有时，别人老远地看着，他不在乎，走过来关心地问问，跟我们没有什么界限。他祖辈是从山西过去的，好像内蒙古那边的汉人大部分都是从山西过去的，解放以后还有一部分贫民是政府给迁过去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这样，蒙族人是双份自留地，汉人都是一份。

我把鸡蛋拿进屋，她们就跟我叨叨这事，说：“刚才刚小他妈送鸡蛋，没要。”我说：“你们不要，我可要了。”正说着，刚小来了，算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他正好10个人，一人一个鸡蛋，分着吃了。

他妈看见我要了她的东西，乘我看场的时候，就让她的女儿给我送烙饼啊、馅饼啊，当时真是救济了我。她这个人虽说作风有问题，但是挺热心、也挺能干，再说我对人从来有自己的见解，投桃报李，人之长情嘛，跟她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她有什么活儿也叫我去帮着干，我都不在乎。因为我在村里边都跑遍了，跟大人串，跟小孩玩儿，这一方面是排解压抑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多找点儿乐子。知青的圈子毕竟太小了，有时听她们在那儿说这个那个的，心里就特别烦。

我跟农村的孩子交往挺乐和，村里边都是些你你我我的琐事，谁跟谁相好了，谁家的东西丢了、怀疑是谁拿走了等等，闹出好些矛盾，但这些倒不是主要的。对于知青，农民没有家庭出身这个概念，都是我自己说，自己坦白，比如跟书记说话，我先说自己的出身不好，那会儿不由得就说出来了，不说出来好像你要隐瞒什么似的，其实人家才不管你这些事呢。

村里成分最高的才是富裕中农，他们没有地主这个概念，听你说起这些事，还觉得挺新鲜，但是对当时内蒙古大揪特揪的“内人党”，他们挺在乎，谁都怕沾包，扣上“叛国”的帽子。我不是爱骑马吗，看见马过来了，就说：“我骑马吧。”旁边有个蒙族老头赶紧过来说：“踩着我的腿上去。”蒙族人特别实在，他给我当了一个台阶我就上去了，后来他们说那个老头是富裕中农。



知青集体户屋前留影（左一为张玲）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知青组，我还当着伙食委员，有一天，一个同学建议：“咱们是不是改善伙食啊？”改善伙食还不好说，那就买只鸡去吧，于是就去买鸡。有一家人鸡喂得最好，捡肥的买了一只。等到吃完鸡，有个同学就问我了：“你走的什么路线？他们家是富裕中农啊，你怎么不到贫下中农家买鸡去？”这事给我的印象特深。

回过来再说刚小。1969年10月份，我俩的婚事儿就定了。我们那个地方的女知青，5月份就有结婚的，但她不是我们公社的。我们村就我一个与农民结婚的，在公社里我也算早婚。我们那儿还有一个女知青，已经跟当地青年搞了一阵子对象，后来可以病退回城了，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别看我了，你回去吧，你身体又不好。能回北京还不回北京，在这结什么婚？”我劝她，最后她就走了。

我决定在农村“扎根”，有多方面的考虑：一个是下乡前精神受过刺激，留下了后遗症。开始时我特能干，后来连锄头把儿都拿不住了。那件事对我影响太大了，如果我是一个正常人，身体又好，可能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了。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既丧失了劳动能力，又没有经济来源，只有走这条路。我觉得既然决定留在农村，就要找个岁数合适的，有的人面相老，跟个老公公似的，肯定不行。刚小和我的年岁差不多，他是村里最好的劳动力，生活上有依靠。他不是贫农，是中农出身，按说中农也可以参军，但比贫下中农还是费点儿事啊，可他没有参军要求，我觉得这点儿也很合适。再有一个，无论是他们家还是我们家，都有一些扯不清的麻烦事，我家是成分不好，而他妈的作风问题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想，我们俩应该甩掉包袱，靠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生活。

小组的同学对我挺关心的，她们不愿意看着我在农村结婚。当时已经有了病退和困退回城的政策，她们就给我争取了病退指标，直到该办户口了，才告诉我。她们说：“回城的指标已经给你要了，就剩办户口了。”我一听，不仅不感谢，还大骂她们“卑鄙无耻”！因为这是背着我干的事啊。我气冲冲找到生产队，“啪”的一脚就把门给踢开了，说：“谁也不许给我往回办！”为什么铁了心不回北京？我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这里不便明说，但肯定跟其他知青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说起领结婚证那才逗呢，去了三次。第一次去领证，人家说：“现在提倡晚婚，国家有这个政策。”我说：“晚婚晚到什么时候？”他也说不出来。我那会儿20岁，刚够结婚的那条杠杠，刚小比我大一岁。结果把我们的申请打回来了。第二次再去，人家说刚小他妈有问题。一听说我和刚小要结婚，和他妈有关系的那个羊倌儿就找到公社去了，说刚小要结婚了，刚小妈还欠他一条条绒裤子、几斗粮食呢，必须先把债还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上。我心说了，我们结婚，跟他有什么关系呀？他为什么告？后来我明白了，我要是进了刚小家的门，对他的“偷情”肯定有妨碍。后来那个羊倌儿还把我叫去，要我别找刚小，又说如果一定要找的话也没关系，但是，“我去了你就得离开”。我那会儿含含糊糊的，也没吭声。当时的想法是，你有千言万语，我有一定之规。第三次找到公社，人家又问：“你妈同意不同意？你们家人同意不同意？”我赶快给我妈写信，不久来了一封信，表示同意，还叮嘱要节约闹革命，婚事从简。这次我拿着信到公社，总算办成了。

从决定这件终身大事到操办婚事，前后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小家选了个日子，结婚时就快过年了。同学们不在，都回北京过年了。我们的婚礼成了全村的一个聚会。当时我妈说要节约，我想大伙儿都想热闹，我自己在这儿，办就办呗，先借了一部分钱买黄米、粉条子，忙着置备东西。他的一个结拜哥帮着来弄。婚礼那天，全村人都搭了礼，每人一块钱的份子，热闹极了。虽然我和刚小是同村，还是派了迎亲的大车，拉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那天最高兴的应该是刚小妈了，儿子娶了北京知青，在全村是第一号，面子上很光彩。后来我们村再没有女知青与农民结婚。女知青结婚都是“新事新办”，不要嫁妆，农民乐得省一大笔钱。我的全部“嫁妆”，也就是从北京带的两床旧被子，过门后我把其中一床给了小叔子，把他高兴坏了。结婚那天，我穿的还是知青那身破棉袄，刚小家也没办法。婚礼上，我们俩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主持人又让我向搭了礼的亲戚乡邻们鞠躬，被我拒绝了。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村外大野地，痛哭了一场。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因为这是在没有出路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这一辈子就得留在农村了，今后面临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法想像。我觉得，就是一个火坑也得往里跳，确实也没别的路。

婚后十几天，就发现刚小有赌博的恶习。当面数落他，他不承认，过后依然如故。以后，只要发现他深夜不归，就出去找他，但多少年里，没有一次抓个正着的。他们的赌场选得很隐秘，屋子窗户外面蒙着厚厚的帘子，不透一丝亮光。有时在地窖、野外的山旮旯。后来，再找不到他，我干脆扯着嗓门在家门口喊：“刚小——刚小——”全村不过四五十户，赌友听见我的喊声，就会催他赶紧回家。刚小是村子里最棒的劳力，人也很勤快，就是因为好赌，家里没了安生日子。因为他屡教不改，我气得自杀过，一瓶安眠药，才吃掉了四片，剩下的96片我一口气全吞了下去。慢慢的两腿发软，动也动不了了。幸亏被及时抢救，才保住了命。这以后，我也不想死了，何况还有了孩子。

第一个孩子是在1970年冬天出生的，农村坐月子有吃100个鸡蛋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说法，但我一个鸡蛋也没吃过，头几天就是喝点儿红糖水，接着一些天吃细面条。冬天坐月子可把我冻惨了。结婚时，我住的还是刚小家的旧偏房，第二年我们盖了新房，当然是土坯的。内蒙古的冬天特冷，北风呼啸，遍地积雪，夜晚温度足有零下三四十度。新房坐落在村东，更感到风头的强劲。为了挣点儿钱，刚小的妈和妹妹一边照顾我坐月子，一边给过往拉甜菜的大车老板做饭。新房本来就潮，做饭的灶台又在屋里，每天做饭的蒸气呼呼往上冒，屋里就更潮了。屋里本来就冷，温度降下来后，蒸气马上在北墙上结了冰，一天接着一天，冰越结越厚，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慢慢融化。这一冬，我在屋里穿着厚厚的棉袄，身上披着被子，每天都这样熬着。把孩子放在炕头上，这里挨近灶台，做饭后有些余温，上面盖上棉被和他们家的破皮袍。我时不时把手伸到孩子身子底下摸一摸，看看有没有温度。

熬过这年冬天，心里忽然产生回北京探亲的强烈愿望。下乡一年多，时间不算太长，但经过结婚、生育等人生的大事，我已从天真无邪的城市少女变成了每日围着灶台转的农家妇女，对过去的生活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在“广阔天地”的磨砺下，我已经脱胎成另外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都时时感到陌生的人。

那年春天，上级知青办为照顾有生活困难的知青，发给我30元补助款。我用15元给小姑子看了病，剩下的钱留作回北京的路费。但是，当我提出带孩子回京时，却遭到刚小家一致的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心，担心我一去不复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们最终同意了我的要求，但是把孩子扣下了。即便这样，我还是毅然离家踏上返京的路程。

从村子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为了赶10点多钟的火车，我起了个大早，一路上，眼前不时浮现孩子红扑扑的笑脸，腿上像灌满了铅般的沉重。在车站排队买票，从队尾到队头，足足排了四五次，每次轮到卖票窗口，都拿不出勇气来掏钱买票。前面是望眼欲穿的家，后面是牵肠挂肚的孩子，一股难以割舍的亲情，犹如两只无形的大手撕扯着我的心……南去北京的火车在小站只停留一二分钟就启动了，望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我不禁号啕大哭，站上的人都困惑地看着我，但是又有谁能洞悉我内心的苦痛呢？从上午到下午，我在车站外的土坡后足足哭了半天，泪流干了，心里好受了一些。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村里时，已是深夜了。回到家，发现婆婆把孩子抱到他们屋子去了，我那屋他们也占了。可是我没回城增加了他们对我的信任。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你走了，也就不回来了。看到我回来，他们了解张玲了。

这件事过去没说过，后来孩子大了，才讲给他们听。孩子大了，难免有代沟，讲给他们听，是为了让他们知道当一个母亲有多么难，特别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是在那么一种困难的情况下。只要你是母亲，就要紧紧抱着你的孩子。我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不如这孩子重要，各种苦衷和乐趣都集中在这里边。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认识的话，你的人生道路绝对就是偏了。最近，有位老师送给我一幅版画，画面是一个慈祥的妇女搂抱着自己的孩子，名字就叫"母亲"。这位老师的用心，我是挺理解的。

1971年秋天有了点儿收成，我带着孩子回了趟家。那些年，我妈自己承受着种种苦难不说，不知为这个破碎的家操了多少心，流了多少泪，她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几个孩子上。"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就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小鸡，受到母亲的精心呵护。只有到下乡离家，天各一方，特别是自己也身为人母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母爱的博大。

后来的日子逐渐好了一点儿。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刚小改掉赌博的习惯，原以为我这心血没有白费，我这知青也没白待在这儿，结果却发现他根本没改，老是为他担着心。他有时输了钱，心情不好，回来就跟我吵，弄得我胆战心惊的。我们的生活是挺困难，可有时候也改善一下。孩子有病了，吃点儿面条，我说你就坐下来高高兴兴地吃，哎哟，又吵得翻了天，没有一天安定日子。按当地习惯，过年吃年饭，全家人围坐一起烤旺火，吃饺子。一步一步安排得好好的，谁知他又去赌了。

有一年，公社抓赌，他和几个人被抓了个正着，就在那儿挂着牌子挨斗。没有灯怎么办？就弄个大棉花球点着。然后把他弄到公社办学习班，整整劳动一个月，也没工分，白给人家干，到时候还得拿钱赎他去。我春天买了一头小猪，好不容易喂到秋天，原想年底卖个好价钱，没办法，和闺女一块儿赶到集上把猪卖了。我闺女那会儿才几岁呀。刚小这一个月不挣工分，还得给公社罚款30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赌债要还，等于这猪白喂了。卖了九十多块钱，交了罚款，替他还了四十多块钱的赌债，剩下点儿钱给闺女买了一件小褂子穿，这一年的辛苦就全没了。如果没有这一档子事，那日子不是挺好？到过年一杀猪，吃肉也好，卖钱也好，不是挺好的事？全没啦。

要说刚小这人挺能干，出门总闲不住，稍带着捡粪，一堆一堆的。他积的粪，交给队里，就够我一年的口粮钱。他要是不赌，挺好的日子。我们有双份的自留地，地上的肥特多，庄稼绿油油的。后来我们的户口从村里调出来后，有人看着那地收成好，争着抢着要了，种了两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那肥没跟上。好庄稼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结婚后，知青们对我挺好的。以后几年，她们每走一个，就给我留点儿东西，粮食、衣服什么的。知青的粮食富裕，最后把小组余剩的几百斤粮食都留给我了。有一年收成不好，我连购返销粮的钱都没有，实在没办法了，就跟刘菲借了40块钱。当时的40块钱就等于是救命的钱了，我们家已经断粮了。

我本不应该是那种生活状况，就是因为刚小好赌。多年以后，见到同组的焦淑英，她提起有一次公社给知青发下来困难补助，她没有要，都给我了。我说：“不知道啊，没见着。”原来刚小拿到钱后也没告诉我。她们对刚小的印象特别好，我生活的这些苦处没法儿跟她们诉，她们好像还觉得是我在那儿吵吵闹闹，是病给闹的。实际上我是一个塌实过日子的人，虽然有病，可很有理智。后来有一个同学回北京，到我妈那儿串门，一看见我写的信，就说：“张玲没病呀。”这些同学特好，每年都到我家看我妈，不管她们对我怎么看法，一直都关心我。

有时候，我去知青小组，她们就留我吃饭。吃饭回来，刚小就嘲笑我嘴馋。我很要强，以后就再也不去知青小组吃饭了。我怕他对知青产生戒心，也不让他对我有一点儿分心，我特别注意这点。我简直做到就像过去的那种旧媳妇一样，在家里对公婆、对丈夫、对子女呀尽心尽力。你要维持这个家，就必须这么做。

知青找了当地的农民，绝对是有差异。如果刚小不耍钱，其他的事我都能处理好，换了别人不知道能不能？刘菲是名人之后，她爷爷刘半农，坟墓就在香山顶上；二爷刘天华，也埋在香山最高处。二胡的十大名曲不就是刘天华创作的吗？我看过刘天华的一本传记，说他最初娶的媳妇是农村的，后来要去法国留学了，人家猜他会变心啊，他就请朋友参加生日聚会，大家问给谁过生日，他留了一个空位子给媳妇，原来是她的生日。他用这个行动表示对媳妇的一片忠诚。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婚姻问题我反复想过，跟农民结婚当然有积极的一面，你有一些新的东西，他没看到过，通过婚姻他了解了，可是深层的东西不会因为这个改变吧。从大的方面说，农村更不会因为你找了农村的青年有什么改变。“文化大革命”以后，农民比以前富裕了，是因为制度上的改革，完全是另一回事。

三　进了铁路的“大集体”

我在农村一直生活到1979年，上边终于发话，要给我们这些在农村扎根多年的老知青安排工作。以前，我想都不敢想这事，因为在农村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1970年出生的，老二是1972年冬天出生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的，除了带孩子，还要喂猪、做饭，伺候公婆、男人，天天如此，和其他农妇没有两样。这次忽然说要给安排工作，还说是最后一次，如果不走以后国家就不管分配了。这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意外之喜，说什么也不能错过。那时我的身体也是不太好，还是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老远的路，去领指标、填表。

上边拨给知青的就业指标都在在呼和浩特市，一个是轻化，一个是二轻，还有一个是什么三产，几个国营单位条件都不错。可是，虽然填了那个表，临走却换了地方。管事的说，你们几个成了家的，人家没法安排住处。也可能是我们的招工指标被别人顶替了，反正是没有要。因为上边有政策，对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必须安排工作，正好赶上铁路上想给本系统无业职工子女办一个“大集体”[4]厂子，需要通过查素齐劳动局批准，劳动局就提出：“只要你们接受这部分知青，我就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谈的，反正最后把我们都鼓捣进了呼和浩特铁路局吉宁铁路段的“大集体”单位。按说不应该是这个结果，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是正式指标，怎么就成了“大集体”呢？我们真够傻的，一听说铁路单位还倍儿高兴，这下回家可方便了。1980年5月我到厂子报到。一同报到的有12个北京女知青，差不多都是在在农村结婚多年的。

一直到19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我在这个“大集体”整整干了八年。“大集体”的待遇跟国有单位绝对不一样，白手起家，自负盈亏，头三个月都开不了支，生产、管理没有一点儿“王法”，整个一个“土”政策。有个女知青叫孙保华，干了一个月，说她有病，又把她送回农村了。后来我回去看她，一点点启发她说：“你还记得咱们拿铁锹在铁路上干活儿扔石头吗？”她说：“怎么不记得啊。”接着又问：“你们开支了吗？”她还记着白干了一段儿活没开支的事呢。时间长了，还不发工资，我们就开始闹腾，闹腾来闹腾去答应先借给每人10块钱，后来才慢慢地开了支。钱也不多，得把一段儿活儿干完交了工，人家才给你工钱。

说是进了厂子，连个稳定的住处都没有，上哪儿施工就住哪儿，临时搭个帐篷。任务主要是维修铁路，也就是筛石头，清筛，把土筛出来再把石头搁回去。铺设新铁路的活也干过，从抬土、抬石头到铺钢轨，那钢轨多沉呀，好多人抬一根，还有那洋灰枕，女的跟男的、个高的跟个低的，大家一个样，多沉呀。我的腰就是那会儿压坏的。我们一个个的腰都是这样，腰椎受强压，关节受损。内蒙古的冬天可冷呢，没钱买棉鞋，鞋都张着嘴了，拿铁丝、拿绳凑合勒一勒，脚指头冻得一直麻着，摸着没感觉，跟“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在白毛风天遭的罪没什么两样。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那时候工资拖了好几个月，家里也没钱。我从村里出来时，家里还欠着人家200块钱的账，都是刚小赌钱赌的。后来我就说，这怎么干活儿呀，脚都冻坏了，硬跟刚小要了五块钱。我记得特清楚，有了这点儿钱也舍不得买东西，鞋带都舍不得买，绑根绳。留着几个钢镚子，凑够了，买张邮票，给北京发封信。

就这样，在线路上干了两年，定期回家去看看，总算有了点儿工资，比在农村好过些。在农村一直就没钱，年终分红，也就10块8块的。但是，流动作业的苦没少受，尤其冬天太难熬。后来成立皮件厂，把我们安置到那儿，工作条件有了改善，但房子不够住，一些人继续住帐篷。我就赶上住帐篷了，四面透风，冻得够戗。

我的户口从农村出来后落在呼市吉宁段，属大集体户口。人家不是说孩子随母亲吗？但孩子的户口没上来，派出所不给办，说哺乳时期随母亲，年龄一大就不符合转户口的条件。1980、1981两年，我在线路上跑，还顾不上孩子户口的事，当时孩子就跟我住帐篷，都上学了。1982年以后开始安定下来，就想着法把孩子户口从农村弄出来。我想了个辙，要求办离婚手续。这在当地早有先例，有的是真离婚，有的是假离婚。离婚的条件是：所有财产归男方，孩子归女方。就这么写的。我就要那俩孩子。孩子归我了，当然得给他们上户口。

看别人办得挺容易，到我这儿可难了。公社管事的是刚小的亲戚，他不给办，说刚小有赌的毛病，离了婚只有打光棍。我跟他说这是假离婚，为的是给孩子上户口。他还是不听。后来我找了一桶奶子，托村民政给他写了一封信，讲明原由，总算给办了。厂子里我们一共八个知青，我是最后一个办成的。孩子的户口给上了，粮食关系又不给上，又费了好多周折，求人送礼，才办成粮食关系。当时粮食关系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户口，只好把孩子户口也上到集体户口上。

办完孩子户口，接下来该考虑刚小的问题。我带孩子出来之后，刚小也不愿在村里待着了，出来找事干。过了一段时间，有些正式工开始在铁路旁边盖小房，路边有的是空地，没人管。我们也顺势盖了一间小房。有住处了，这才又想着给刚小弄户口。有好多国营厂子，对知青照顾特好，想方设法给他们的农村配偶安排工作，至少是个临时工。我们那儿可没这好事，几个知青都像是“后娘生的”。厂子对他们自己的子女很照顾，但这帮子知青是没办法带进来的，就事事卡你。我们曾要求跟男人对换，我们留在家里，让男的出来干活儿，上面就是不同意。

当时酱油厂的女知青也在跑给男方上户口的事，有一个提议给国务院写信。我说：“你要敢发，我就敢写。”我觉得书面材料比较起作用，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能把道理讲清楚，容易打动人。信是这样写的：上山下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干部子女走的不少，可谁设身处地想想我们这些百姓子女的处境呢？我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找了个农村青年，本来已经够苦的了，难道还让我们当现代的陈世美，把他们抛弃不成？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我们都是很有良心的，但长期两地分居的困难不应该尽快解决吗？我大笔一挥，写了十几页，都是积蓄心中想倾诉的话，下面是我们几个人的签名。工区里的知青们读着信就哭了。管不管用，发了再说，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挺大的事，因为是发给国务院的。

我们原来也考虑过去静坐、去卧轨，想来想去，觉得这样做不妥，才决定一起给国务院写信。后来回到北京，我为住房的事还给北京市委写过信。其实给上面的信都能寄到，就看他理睬不理睬你。我想，书面文字是比较有分量的，能把意思说清楚，如果四处瞎跑，上面觉得你是在闹事，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难。

给国务院的信发出没多久，上边就批准给农村配偶上户口。究竟写的信起没起作用，我们也不知道。

我是在1982年办的假离婚，后来给刚小上了户口也没再办复婚。当初开那个离婚证只是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在户口本上我们还是两口子。把刚小户口从农村转出来，主要是让他心里塌实，没有多大的实际好处。我当时还留了个心眼，说咱们不如两边干，这边挣着钱，那边自留地留着，多好的事啊！我的脑瓜还是比较灵活的。他不行啊，看见人家户口都转了，他也得上啊！其实他一上户口，自留地也没了。户口是上了，工作不给解决呀，都是自己干，后来就想着做点儿小买卖，收鸡蛋卖鸡蛋，在厂子边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

1984年以后，我们生活基本上比较平稳了，心里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刚小买卖做得红火一时，杀羊卖肉，谁也卖不过他。买肉馅的顾客来了，他白给你铰，别人的羊肉半天卖不出去，他的羊肉一会儿就出去了。他做买卖在行，人也好，又能干。1985年，正好铁路沿线改造，在我们搭小棚的地方盖起两幢楼房，我们作为拆迁户第一次住进了楼房。现在那儿还有我们两居室呢。如果当初没在那儿盖房，拆迁也没我的戏。我们自己有了房子，户口才迁到了一块儿。

四　办假接收回北京

1988年，我把自己和孩子的户口办回北京，主要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刚小的户口不好办，就先那么拖着。那会儿两个孩子都大了，如果初二插班的话，学校还能收，到了初三就不收了。

转户口必须先有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只好办假接收，因为没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接收单位不给落户口。我费了好长时间，找了一个假接收单位，开了证明，总算把户口落下了。接着，赶快安排孩子上学。儿子从没离开过我，原来担心他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没想到他上学还混得不错，学校挺重视他，升旗还让他去。这孩子特老实，很快入了团，学习成绩越来越好，我就塌实了。

女儿转到女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老师都特好，过去教过我的老师挺帮忙，本来插班是要交钱的，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大家出于同情心，就把孩子给收下了。

我妈的生活一直不好，如果不是她做监护人，孩子也回不来啊，孩子们在北京上学，对她是新的负担。我就给刚小去信，要他给我妈买个彩电。我结婚的时候连彩礼都没要，得让我妈高兴高兴啊。那时刚小买卖做得好，心情舒畅，没有赌钱，就给寄来2000块。那阵子，我经常给他写信，说你要是再赌博的话，我就不回去了。可把他吓着了，真经了心了，一段时间里戒了赌，才能攒些钱。

把子女安顿好以后，我就决定回内蒙古。我是1990年过完年回去的，在北京一待两年多。我在北京办的是假接收，自己和儿女的户口虽然办回来了，我却成了不折不扣的失业者。临回北京，我曾跟单位要求，能不能给报销一次路费。在厂子里干了八年，还没给报销过路费呢，知青回家探亲，都是自费。知青们说：“上班的，四年有一回探亲假，咱们这算什么？！”厂子还真把我的路费给报销了。

回去后我就是养病，躺了一年，身体弱，一直怕风。好在刚小很能干，他做买卖，我在家里料理，帮他剔羊肉。他弄来鸡蛋，我帮着卖。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就专心对付他。那几年，是我生活中最安定的一段日子。到1992年，我们就没有欠账了，还断断续续攒了些钱。我从来没见过存折，那时有了第一个存折，3000块钱，挺高兴，他也没去赌。

1992年，我给春节晚会写了一封信。晚会上常有宣传戒赌的节目，因为我找的男人是农村的，又深受赌博之害，在信里就把我们的情况介绍了一下。那一年，还真播了一个四川皮影戏，演得活灵活现的。戏里的男主人好赌，老婆惩罚他，让他顶灯，从板凳地下钻来钻去……我想肯定是收到我的信了，给演了这么一段。当时还播了一首戒赌的歌，好像是什么《年年岁岁真情在》，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刚小是不是跟我的心情一样呢？我还给他上电台点播。我的意思是，不管费多大力，只要他戒了赌，以后就能有一个安定日子。其实，我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刚小对我的一番苦心根本就是无所谓，瞎掰。

1993年的买卖不太好做，买东西的人少了。买卖总是开始时好做，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越做下去越赚不了多少钱了，刚小的干劲也就差了。我说：实在不好做，咱们门前摆个车摊，这岁数也大了，你想下去收鸡蛋，就跑一回，不愿意跑，就在这儿修个车，你有力气，这也能干啊，还能跟大伙接触。我给他想了这么一个碴儿，他不干。

一次，有人来买鸡蛋，我一看，哪儿还有鸡蛋？他根本就没收回来，两个篓子都空着，车也在那儿，就是人没了。哎呀，我的心里“咯噔”一惊，就知道不对碴儿。对他好赌这点，我特别敏感。一个是买卖不太好做，就有点儿放松。再一个，我们当时帮他叔伯兄弟找了个媳妇，这叔伯兄弟的父母都死了，是我给张罗的这事，办得挺好的，还给他出了1000块钱。谁知这媳妇待了10天就跑了，人家说是“放鹰”[5]的。刚小受不了这个刺激。人在强刺激下，意志又没了，就像吸毒的复吸，刚小又落入赌博的深渊。从此，买卖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1995年，我正在北京看病，他来北京看看，临走时将历年积攒和子女挣的一万多元钱都拿走了，说是要“做大买卖”。那年头，一万元可不是个小数，“万元户”还是个很值得羡慕的称号呢！可没过多久，就传来噩耗，说刚小脑溢血突然病逝了。他回去后，据说买卖进行得不顺利，心情自然不好，加上经常酗酒，身体里潜在的病状一下子爆发了。刚小的丧事是在村子里办的，儿女怕加重我的病，没让我回去，他们回去办的丧事。说实在的，刚小应该算是个不错的男人，一表人才，能干，勤快，心眼灵，待朋友真诚，如果不是陷入赌博泥潭难以自拔的话，恐怕不会是这么一种结局。

要说刚小父母，对我一直特别好。出来后，我跟村儿里没断了联系，1988年回访过一次，1998年又回去一次，是在刚小去世三年之后回去的。村儿里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些新房子了。从1968年到1979年，我在村里生活了11年，以后到了呼市，还断不了常回村里看看。最后那次我回去，往各家串门，正站在院子里说话，老书记他们在外边一听就说：“张玲回来了！”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谁，隔了那么多年，还能听出我的声音来，就熟悉到这种程度！

五　迟到的婚纱

刚小一死，我完全没了经济来源，再加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住处，这段日子对我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我爸有一个院子，刚解放就上交了，剩下三间北房也被人给占了。后来落实政策要回来了，两间由我哥哥住着，剩下那间算是我们的，可是又被我妈单位换走了。等于我们住着公房，原来那间私房也要不回来了，这中间的关系特别乱。那间公房到底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有多大？说起来吓你一跳，也就是八平方米的一间小耳房。我妈已经七十多岁，我只能挤在她的单人床上一起睡。我妈本来身体不好，再加上不得休息，身体状况就更差了。我看总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就只身到小汤山疗养院照顾一个癌症病人，临时找个栖身的去处。以后，病人去世，小汤山不能再住了，我又去给亲戚带孩子，过着“打游击”的生活。

我的这些困难，被我以前的校友田小野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中她也是在土旗插队。1998年初我们集体返乡途中，她带着深切的同情倾听了我这些年的坎坷经历，在当年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我的遭遇，文中写道：“如今，张玲户口回到了北京，但在北京她却没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床。”报道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引起许多有过知青经历的人的关注。一位素昧平生的老知青赵昌明几经周折找到我，对我的处境表示关切。

不久，昌明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对方也是老三届，同病相怜，很容易就坐到一起，但是没有谈成，据说是嫌我身体不好。后来昌明才告诉我实情，对方是因为我没有工作。前面说到，我在1988年把户口转回北京时不得不辞掉了工作，从此失业。我这人不懂政策，但总有个疑问：国家让我们户口回北京，本意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困难，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制造新的难题呢？许多转回户口的老知青，也遇到与我类似的困难。昌明在告诉对方嫌我没工作时曾问我：“你为什么不办养老保险？”按政策，外地职工退休回北京，只要续交一部分养老保险金，到50岁时就能逐年领取养老金。这个政策，我过去竟不知道。

为了申请补办养老保险，我简直跑断了腿，先后找过人才流动中心、劳动局，所有接待的人都很原则地告诉我，申请不合规定，因为档案里放着我的辞职报告，属于主动辞职。不管我怎么解释，说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原单位写好后放在里面的，都无济于事。我这人过去比较爱看小说，眼看希望破灭，忽然想起梁晓声小说里有一位知青私拆档案，抽出里面黑材料的情节，精神为之一振，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冒险一试。于是，我找个理由从街道提出档案，档案当然是密封的，我设法把档案袋的一边弄湿后揭开，取出辞职信，再重新封好。后来，我把档案交到人才流动中心，居然没被发现。

好事多磨，接下来的难题是一次性缴纳九千多元，以便续上中断了10年的工龄。这时的我囊中羞涩，哪能一下子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老同学闻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中学同学蒋金锐借给我2000元，没有利息，也没有还款期限；插队好友刘菲也雪里送炭，送来了6000元，同样没有利息。刘菲是工薪阶层，又是单亲家庭，需要供养儿子上大学，自己并不富裕。正是由于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在2000年办成了领取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养老金的手续。当年在内蒙古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二三百元，去年领的养老金是每月六百多元，今年又长到了七百多元。生活终于有了稳定来源，是我原先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回过头再提与吴春海结婚的事。[6]春海1960年生人，整整小我10岁。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脑筋不如常人。过去干过临时工，烧锅炉需要上岗技术证，春海干不了，只能做锅炉工的助手，推煤。这是力气活，春海最不惜的就是力气，但还是干不长。不是因为他自己捅了漏子，就是老实巴交的被人欺负。他父母生前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把自己十多米的住房指名留给了他。好在他弟弟春明很照顾他，春海得以衣食无忧。

与春海相识还是赵昌明的介绍人。昌明家与春海家是街坊，常到他弟弟春明开的小铺买东西，一来二去听说了春海的情况。有次到铺子里买烟，碰巧春海正在，见有顾客，还一个劲儿往里让。昌明见他人憨厚，生活又能自理，就起了给我介绍的意。说到这儿，我必须表达对昌明的感激之情。昌明与我素昧平生，得知我的坎坷经历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我，热心帮我介绍对象，还指点我补办养老保险。其实，他自己活得也很难，原来是校办工厂的业务员，后来下岗，找了个看自行车的差使。

昌明给我介绍春海，女儿不大满意，嫌他没有工作。我说，既然提了，就去看看，这样就约了日子见面。春海家住什刹海前井胡同，我家住鼓楼大街豆腐池附近，离北海都不远，我们就上北海溜达。我一个人说呀说，春海只会一声接一声地“嗯”。就说这岁数，我说你是1959年的，我比你大10岁呢。他说，那他们怎么说比我大9岁呀。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无所谓。”他特爱说“无所谓”。我问：“你会做饭啊？”他说：“会做饭。”我说：“走，上你家瞧瞧去。”我这人就是，办事从来就不带拖拉的。他特高兴，就领我去了。

进了大门，穿过一条狭窄的通道，就是他的家。外间接出的厨房，完全遮挡了屋内的阳光，白天在里面也需要开灯。我说：“哎呀，住窑洞来了。”再一看床上铺的被褥，别提有多脏。那些天，我因为照顾家里病人特别累，进屋休息，没多会儿竟打起盹来了。一会儿功夫，春海就把饭做好了。蒸的米饭，炒了两个菜，一个是青椒肉丝，一个肉片豆角，饭菜可口。真没想到，春海还有这么一手，我对他的生活能力彻底放心了。心里说，这人不用别人怎么帮他，顶多收拾收拾屋子就行了。

和春海的事最初没跟儿子提起，只是说“我给你们找了个做饭的吴叔叔”。当时儿子和儿媳刚来北京，孩子很小，儿媳不会做饭，吴叔叔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天天过来给他们做饭，一来二去，很快熟了。儿子的心特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总是说这个人不错。春海天天过来给做饭、买菜、换煤气，家里这摊事他全包了。你想，这一家人回来吃饭，挺重要的事。因为我弄这一摊事儿弄不了，身体不太好。后来儿媳妇学会做饭了，不用他帮了，而是做好以后说：“让吴叔叔过来吃饭吧。”他们对“吴叔叔”的印象就是朴实、勤快。过了子女这一关，我和春海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和春海熟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被褥拆洗得干干净净。春海很要强，很有股男人的劲儿，他不愿靠我工资生活，总想出去找工作。街道安排他到王府饭店当清洁工，挺干净的墙，本来应该用干布擦，他却拿湿布擦，越擦越黑。很快人家就把他辞了。回到家，他也不说原因，只是一个劲地说“热”、“热”……后来我才弄明白，他身子胖，怕热，干活又不惜力，一热就赤膊上阵。你想，那种人来人往的地方能光膀子吗？

有一天，一个同学的爱人请吃饭，问我春海的“低补”办下来没有，我告诉他还没有。他说：“你那不是雪上加霜嘛。”意思是说我刚有了退休金，生活才有转机，又找了春海，春海没有经济来源呀。我心说了：“加霜就加霜，人要雪，我要霜吧。”我这人受过那么多苦，也能承受，跟心态有关系，一直心态特别好。我认为婚姻是没法后悔的，甭管多难还得继续走下去。

我和春海住到一起，也没办结婚登记。我觉得这不过是个手续，没多大实际意义，再说，交三百多元办手续，也舍不得。另外，担心这样会影响春海申请最低补助。左思右想，还是一切从简吧。我们的事引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知青的关心。田小野、张援等人希望给我举办一个特殊的婚礼，并在小野的知青网站上发了一个通知。反应之强烈出乎意料。

2001年1月7日，新世纪的第一个星期日。这天下起罕见的大雪，城里道路泥泞，交通阻塞，我真担心婚礼的冷落。毕竟，在答应要来的宾客中，几乎没有我们的亲属。没想到，那么多朋友冒雪赶来参加我们的“世纪婚礼”。回想过去的大半辈子，的确是受了不少苦，但沉浸在欢快的婚礼进行曲和宾客的笑语中，我一时又觉得自己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许多人的经历尽管比我还坎坷，但他们受到过如此诚挚深厚的关爱吗？婚礼上，我高兴地告诉来宾：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穿二百多元的红衣服，第一次涂胭脂抹口红，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参加我的婚礼，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热闹！

婚礼头两天，网友疏桐特意陪我到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烫的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理发师傅问：“瞧你们的亲热劲，是不是姐妹呀？”我回答：“哪儿呀！我俩认识还不到一个钟头呢。”理发师傅听了莫名其妙。我在婚礼上穿的那件大红“嫁妆”，也是疏桐为我买的。

那天为我化妆的史宝嘉，是位女律师。听到婚礼消息，她立即给担任康宁婚庆公司经理的弟弟打了电话，请他义务为我主持婚礼。他满口应承，不仅精心准备了全套婚礼道具，还提前约见我们，做好各项准备。婚礼结束后，他特意送给我一大束鲜花，要我带回家，还说那对红蜡烛至少可以点24小时不灭呢。我和史宝嘉原来没有交往，和她弟弟就更不沾边了，这份盛情可叫我怎么还呀！



婚庆仪式上的张玲夫妇

我妈2000年7月住公寓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待着，春海那个活儿又指不上。正好有一个知青在那儿扫北海，说有一个人不干了，我就去了。才挣四百多，每星期有一天休息，但是哪个人休息，别人也得替他扫地，弄垃圾箱。节假日比较累，干到10月份，天气比较凉了。干活一出汗，凉风一吹，就觉得难受。最后一天，扫垃圾都没人了，就我一个人了，我想倒垃圾，都提不动了，只好拉着走，拉到垃圾车那儿，往上一扔，全撒了，那袋子都破了，哎呀，最后一点儿力气都使完了，收拾收拾又都给装进去。那会儿天黑得早，下班的时候都7点了，白塔的灯都亮了。更衣室还让人给锁上，我又去找人要钥匙。那天特惨。第二天是我休息，觉得起不来了，不行了，又挣扎着去辞工作。临时工有个好处，辞职最容易，但是你不干也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

春海是坐不住的人，先是替摆报摊的送报纸，基本是义务性质，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时摊主高兴，多少给几个钱。他也替人卖过报，先是在西直门，后来改在地安门。春明不放心，几次到他卖报的地方偷偷看：“嘿，人家卖报一个劲吆喝，他倒好，像电线杆似的干戳着……”春海却乐呵呵地说：“吆喝不吆喝一个样，每天买我报的就那么几个人。”反正一个月下来，卖报也就挣几十块钱，可是他挺热心干这个。

现在，春海每天上个小闹钟，清晨4点准时起床，先四处溜达溜达，捡饮料瓶子，大早晨起来没人的时候电影院旁边净是瓶，一个劲儿捡呗。然后早、午两次给报摊的人送报。别看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活儿，他的态度却特认真，每天哪种报取了多少份，在小本子上记得清清楚楚。有时候还记拾废品卖了多少钱，还算呢，算不过来我帮他算。我说找个看车的什么事，他还不愿意干。我就说：“你觉得好就行，看车还得给人家操心，就甭管钱多钱少，自己高兴就行。”对他的要求不能太强制了。

他每月卖瓶子的钱也就是几十元，不过挣个烟钱，这使他很满足，就好像他是这一家的主人。就这样，我说也行了。他爱玩游戏机，开始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这儿，就按那个。后来那个坏了，我姐姐家原来买了一个学习机，没人用了，我把那个搬来了。现在他又玩电视里的游戏机，玩得好着呢！现在经济上比过去好多了，精神状况也不一样，还是那句老话：“知足者常乐。”

---

[1]国务院知青办：《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81年铅印本，第42—43页。

[2]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1—512、515页。

[3]同上书，第518—519页。

[4]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按所有制关系分为国有（即所谓“全民所有制”）、集体两大类。后者又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别。一般，由大中城市区和县以上单位举办的集体企业称“大集体”；由街道或相当于街道的单位办的集体企业称小集体。小集体企业普遍规模小，条件差，收入低。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807—808页。

[5]农村中一种男女合伙骗人的伎俩，即先通过买卖婚姻形式将女骗子“嫁”到男家，然后在男骗子的接应下，伺机将男家钱财席卷一空。女骗子叫“鹰”，喻其吃饱即远扬；男骗子则叫“放鹰的”。

[6]关于张玲的婚事，可参考田小野《命运让她半生备受艰辛，网络为她张罗特殊婚礼》，载《南方周末》2001年1月22日。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一场大火改变了我的人生

——小月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某市属单位

［采访前记］　应口述者要求，本文主人公小月使用的是假名。在所有受访者中，我与小月是来往比较多的。最初是通过田小野的介绍，我跟她建立了联系。

小月的父亲，是一所大学的名教授，她的童年，是在阳光、鲜花和歌声中度过的。但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却将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先是母亲因为没有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自尽身亡，身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继而“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高帽，进了“牛棚”。小月详细讲述了参加父亲批斗会时的内心冲突，一面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面是“大义灭亲”的说教。像绝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她选择了“大义灭亲”。但此举留给她的创痛却是永久的。

1969年，一心跟党走的小月，响应号召下放到东北边疆，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她对前途重新燃起希望，谁知1970年的一场山火，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为了扑灭山火，小月的两名战友李晓军、张梅玲失去了年轻生命，她则被严重烧伤，面部毁容。19岁的花季年华，从此与“幸福”两字绝缘……

以后的几十年里，小月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人情的冷暖。不用说，许多朋友和同事给过她热情的关爱，但是也有那么一些人，仅仅因为她的面部被毁容，就无情地往她心头的创口上不断地撒盐。岁月如梭，如今的小月，年过五十，孤身一人，百病缠身。2002年底，她参加了职称评定考试，成绩优秀，并与单位签了为期两年的聘任合同。听到这个消息，我曾为她高兴，因为至少在可预期的两年里，长期困扰她的“下岗”问题是不复存在了。但高兴没多久，她就听说，自己所在的那个“岗”，随时有撤销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她就只有“待岗”了。以她目前的年龄、身体状况，“待岗”后重新上岗的可能微乎其微。考虑再三，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提前内退”。提前内退虽不如在职，毕竟还可以享受一些优惠条件，比起“待岗”那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哈哈滋味来，可能还好一些吧。2003年春节前，小月打来电话，说她已办好提前内退的手续……

小月的口述一气呵成，从内容到文字都很生动，一稿出来后，我和编辑都表示满意，她却不愿就此打住，又花了很多力气，对原稿做了大的改动。随着来往的增多，我对小月有了更多了解。面对常人难以承受的重重困难，她所表现出的那种自强自立，令我动容。如果没有那场山火，小月将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山火，她使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与顽强。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小月的口述已远远超出知青历史的范畴，当她陈述因面部毁容而受尽白眼、嘲讽、冷遇、打击时，实际涉及了一个人间关爱的普遍性主题。歌声里唱的是“让世界充满爱”，但真正置身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你却发现，人们最缺少的，往往正是那种能够包容一切的关爱，那种对弱者的普遍同情与帮助。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倾听小月的述说，有更多的人成为她的好朋友。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一　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各种运动分不开

我从小到大一直属于比较淘气的女孩子，甚至人家觉得我有一点儿男孩子的性格，但是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我比较聪明。我干任何一件事，接受能力都挺强的，但功课并不是很好，因为是淘气的孩子嘛。我们家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二。我有一个阳光灿烂的童年，小时候我很爱笑，一些在别人看来并不值得高兴的事，也会引起我发笑。父亲不解地说：“一天到晚老傻笑些什么？”以后，父亲就一直称我为“傻呵呵”。虽然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我还是快乐的。

我父亲当初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要说起来，既算清华校友也算北大校友。而我的母亲、舅舅、姑姑、姑父，都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成长的。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的，又一起投奔了解放区。母亲姓何，在读书时就参加了进步组织，姥姥家的人很为她担心，认为是不务正业，因为国民党抓的就是这种人。母亲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改姓何为姓柯。

上大学的时候，父亲跟李政道是同班同学，原来是学物理的，一个挺有天赋的人，特聪明。在学校的时候，大家给他起的外号叫“百科全书”。在解放区，他也算是很有文化的干部了，一解放，就分配到人民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里研究马列主义哲学。50年代，咱们和苏联挺要好，他又跟苏联专家一起搞哲学。这个时候，他在哲学界就脱颖而出了。他是属于那种比较一帆风顺的人，说白点儿，就是爬得很快，也得罪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前，父亲已是系主任了，并已报批教授，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范围内都取消了职称，军队也取消了军衔，父亲的教授职称也就不存在了。

父亲与艾思奇等人一起写过不少书，也为邓拓主编的《前线》写过稿子。母亲去世后，他为减轻家庭的拖累，找到当时的市委书记邓拓，请他帮忙，将我的弟弟、妹妹转到全日制寄宿学校读书。为此，父亲又成了邓拓线上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尽了一切非人的凌辱，作为一个“黑典型”、“反动学术权威”，受过多次批斗。造反派把他的双手涂满了墨汁，说他是什么“反动黑手”。在高校两派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竟被装入麻袋，从墙头上像白菜一样扔过去。即便是这样，父亲也认为自己一生坦荡，党和组织定会还他一个清白。他多次表示，绝不会自杀。一次他被“解放”出来，受命打扫卫生。从不会做家务的父亲回来时蓬头垢面，他认为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还兴奋地对我说：“你看爸爸还不老吧？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童年和父亲的合影



在母亲的怀抱里

被父亲株连，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无一例外，全都插队。即使是满怀豪情，也难挥去离家的惆怅和对前途的迷茫，何况我们的走也只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的选择。作为"黑帮"子女，这是惟一的出路，因此内心的感受和思想的复杂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当我们费尽周折回来后，有一天，弟弟以调侃的口吻对父亲说："老爷子，您怎么这么傻呀？您当初要是跟李政道一块儿走，我们这些子女现在什么样？您看子女有给您争气的吗？""您的孩子，全都成农民了！"说这话时，我们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都刚从农村回来，什么都不行，都是白丁一个。



小月（右一）和奶奶、妈妈、姐姐的合影

在兵团期间，因父亲的株连我备受歧视，说实话，那时为和家庭划清界线，我既不敢写文章，也很少给家里写信，生怕笔误给人以口实上纲上线。日子一长提笔忘字，心里常常有种恐惧感，恐怕自己变成文盲，与当地目不识丁的农民一样。

从小咱们受的学校教育就是一心跟着共产党，连父母的教育都是这样。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其实特简单，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让人伤感的。我们家的整个历史，跟各种运动分不开。在“反右”以后、“文化大革命”以前，当然也有一些政治运动，那时我年纪小，也弄不清楚都是什么运动，反正是学校里的运动。母亲原来是学文学的，很聪明，口才好，文笔也不错，字写得也漂亮，全国的方言基本上都听得懂。50年代，她先在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吴玉章做助手，后来到父亲所在的高校任中文系教员，20世纪60年代初，担任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在一次运动中，系里整了一位老教授，整得很苦，是整错了，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书记的她代表组织去向老教授道歉。人家是一个挺耿直的老头子，怎么道歉就是不接受。老头子说了：“我对你没意见，你也没整我，我是对这种事儿不满意，道歉我不接受。”我妈就觉得：一个党的书记，工作没做好，很内疚。那天，我觉得挺奇怪的。从小到大，父母很少给我们零花钱。要说我们家不算是经济多么紧张，那个时代都那样。记得那天母亲把我和妹妹都叫过来，当时我11岁，妹妹9岁，母亲给我们一人两毛钱。我觉得非常奇怪，说：“妈，你从来不给我们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钱，怎么今儿给钱呀？”母亲说：“很久不给你们零花钱了。”当时我们还小，没有那么多心眼儿，不会想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那天晚上，母亲就用一根绳子把自己系在下水道的管子上。出事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浑身筛糠似地发抖。母亲留下一封遗书，意思是对父亲说：我对不起你，如果有来世，我还嫁给你。

可怜的弟弟当时还上幼儿园，大了都记不起母亲的模样。当时我们党从“左”的状况下扭转过来，政治环境逐渐宽松，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上，邓小平还就母亲的事发表意见，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中，高校不应发生这样的事，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此事。但终无结果。直到今天，父亲也是一头雾水，成为终身的憾事。母亲为什么自杀？她有四个孩子和幸福美满的家庭，她很单纯，觉得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党。很久以后，父亲曾经跟我提起，母亲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进入解放区之前对父亲说过：咱俩比赛，看谁先入党。她就是那种积极向上、要强的人。当时我觉得他们大人还有点儿孩子气。

母亲是学文学的，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过很多故事，比如《大卫·柯波菲尔》。我没看过那个小说，内容却记得很清楚。当大卫·柯波菲尔的母亲要死的时候，继父把他弄到一个寄宿学校，等于让他跟母亲见最后一面。那个黑人女佣不是特胖吗，她紧紧地抱着大卫·柯波菲尔，以致衣服扣因为这么一抱就绷开了。母亲每次给我们讲故事都绘声绘色，我到现在都记得。她讲过许多伤感的故事，唱过一些凄美的歌，印象非常深刻。

父亲不论是在学术界或仕途上都比较顺，也就容易遭到嫉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成为革命的对象。父亲出身不好，我爷爷是从商的，而父亲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台湾，在一所中学教授历史和数学，填出身时他一直填的是自由职业者。

实际上，我的父母跟他们的家庭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们早都投奔解放区了，没要家里的财产。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家庭照样作为一种“罪恶”落在我们头上。再说高校分成好几派，既有保父亲的也有反父亲的，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周总理曾为父亲辩解说：“他写过《把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的文章，在推广大众哲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是做了一些贡献的嘛。”接着，江青也发表意见说：“这个人，你们不要保了，他跟戚本禹他们是有联系的。”其实，父亲根本没见过戚本禹，只是因学术关系与红旗杂志社、中央党校等一些领导有业务交往，也许交往到后来彼此就成了朋友，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关峰、戚本禹相继倒台，给我父亲又加上了一条罪状，等于又跟他们沾上了。最后弄得伤痕累累、臭不可闻了。作为这样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一个人的子女，怎么可能不被株连呢？



进入兵团的小月



身穿兵团服的小月

因为这样的出身，我受过打击，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还没下乡之前在学校，一次庆祝党的生日，大家一起颂扬党的功绩。我发言时说：“党的伟大就在于她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率领人民群众向前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进……"好，可不得了了，谁说党有缺点错误？她是"黑帮狗崽子"！当时真整哪！压力挺大。我是真心地歌颂党的伟大，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我只是个初中生呀！

那个年代我对党的忠诚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父亲受批斗的时候，我每次都跟着抓他的学生一起走。大学生见我是个孩子，对我说："回去吧，你放心，我们不会打你爸爸的。"我的回答令他们大感意外："我不回去，我也要革命。他是他，我是我，我要和他划清界线。"因为这个，全家人，包括我的奶奶、姑姑，都不理解我，也一直怨恨我。觉得你爸爸都那么倒霉了，你还落井下石？可是我从小到大，包括父母和老师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都是大义灭亲。就是说，你的至亲好友犯了罪，你都要毫不犹豫地跟他们划清界线。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党的女儿马小翠的故事。她的一个亲戚是地主，她的父母早死了，她就在这家长大，后来把亲戚干的所有坏事都告发给党了，她的亲戚想害死她。学习党的女儿马小翠，为了党的事业大义灭亲。从小到大，我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我爸要是对不起这个国家和社会主义，不管怎么样，我也得打倒他呀。可是当父亲双手涂了墨汁，被当做"反革命黑手"批斗时，我虽然站在那儿，也跟人喊口号："打倒××！打倒××！"但我的心却在滴血，在流泪。所有的人都在那儿侮辱父亲，作为女儿我不仅没能帮助他，还跟着喊口号，你说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没有人能理解我。直到现在，我跟一些亲属还存在着隔阂。谁来弥补？别人根本不原谅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卑鄙的人。

上大学后，一次与英语教师闲谈，无意中得知老师竟与我姑姑是大学同窗。当老师从姑姑那里得知我那段与父亲"决裂"的往事，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做，同时又痛心地谈起她自己的女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义灭亲"的"壮举"。老师责备我对父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不明白，我怎么样表现都入不了党——当时可不就想入党这件事吗，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但就是得不到党的信任，还受到各种歧视，这一切不都是父母给我带来的吗？老师说："那不是因为你父亲，而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天啊，难道我应该承担历史的责任吗？在茫茫人海中，类似的情况还有的是。过去那个时代留给人们的伤害，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一代的悲剧和重负之一，就是为了理想和荣誉过多地参与了政治，而最终又被残酷无情的政治惩罚。更具悲剧色彩的是，老师的女儿也是与我同在一个农场的知青，父一代子一代的悲剧，在两个不同的家庭上演着。

二　无情大火吞噬了年轻生命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四个孩子无一遗漏全部下了乡，"狗崽子"是不可能留城的，尽管北京有政策，每家可以留一个，但我们不可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能留。

我是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当时心里非常明白，知道自己绝对不可能留城。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绝对是黑帮，而且我想通过下乡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我总去找学校管分配的老师强调：“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批斗父亲时我跟着跑这件事，学校都知道，还把我作为一种典型。老师跟北大荒来接学生的人说：“这孩子我们了解，能跟她父亲划清界限，挺好的，你们应该要。”学校推荐我这么好那么好，后来就作为具有革命性的、与反革命家长划清界限的典型被兵团接收，去了北大荒。

刚到了那儿还挺高兴，可是真没想到，兵团把知青还分成好几类，有的叫兵团战士，有的叫非兵团战士，这就等于把人分成两类。出身好的是兵团战士，出身不好的不是。实际上干的都是农活儿，工资也一样，就是在名义上被划入另类。每次开贫下中农会，出身好的允许去，出身不好的不许参加，我就属于那另类。在农场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实际上她是个很普通的人，人群中谁也不会注意到她，但忽然一夜之间她成了名人，一个坏典型，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某连队有个女知青不是兵团战士。其实这个坏典型什么坏事也没做过，在一次铡草时，她的手不幸被铡断，从此成了残废。

以前我每次填出身都填“革干”[1]，因为父亲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东北农场，出身按爷爷算。他们说：“你爷爷干吗的？”我说：“我没见过我爷爷，他解放以前就死了。”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填资本家吧。”没办法，只好填了资本家。[2]为此，贫下中农会也不能参加。我总这么想：偶然成必然，正是因为这么个出身，正是因为我们这种非常纯洁的心灵，所以总是积极向上，努力想洗刷自己。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李晓军像



张梅玲像

李晓军的父亲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以前是中学老师。因为我俩中学是同班，相同的遭遇把我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父亲起码原来是革命干部，又是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晓军的处境比我还不如。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一次她找我，说：“我要去喂猪。”因为喂猪那活儿又脏又臭没人干，我们就找指导员使劲儿地要求。指导员倒是挺高兴的，他是部队复转军人，有一种老百姓的淳朴。人家不因为你出身不好就低看你，挺高兴地就把我们分到那儿去了。我们又找他要求：越苦越累的活儿越要干，要改造思想。人家大概觉得这俩北京孩子挺积极，所以对我们印象也算比较好，但是整个社会背景你还是脱不开的。

那时兵团不允许知青回北京。人都有一种思乡情，还有一个思家情，就说这家再穷再破也好，就说这家是所谓地、富、反、坏、右也好，毕竟你是从小到大在家里长大的，思念肯定会有的。有一次，我们连一个同学终于获准回家探亲了，我们所有的同学都高兴，就跟自己要回家似的，都跑到她那儿去了，跟她说你给我带什么什么。等于她是受了重托的，在北京把我们所有的家挨着走了一遍。不久，听说她要回来了，又迫不及待地想见她，了解家里的情况。我那时忍不住了，想去火车站接她。驻地离火车站挺远，要用一天时间。我们喂猪有一点是特殊的，就是歇大礼拜。什么叫大礼拜呢？10天一休息。喂猪的人，不能说我这一休就把猪饿着，所以采取轮休。三个人轮着，10天能休一天。正好赶上秋天农忙，我要休假去火车站接人。可是一到农忙连大礼拜都没有了，不允许休假了。其实，忙不忙的这猪也是这么喂。当时的人们都挺“左”，我属于个性强的人，就说：“指导员，反正我跟你说过了，跟你请过假了。”指导员说：“我可没准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还真去了火车站。回来以后，指导员就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知青无组织、无纪律，就在这大忙季节……”在底下好多人交头接耳，都问：“谁呀？”我那时很诚实，就说：“那个人就是我。”人家都不信：“你别开玩笑了。”“真的！真的！就是我。”谁也不相信。后来李晓军找到我，非常诚恳地说：“你怎么能干这事呢？咱们都挺进步的！你还犯这种错误……”离开北大荒多年了，然而那片油黑的土地却常使我魂牵梦绕。虽然那里留给我的痛苦多于欢乐，但我毕竟从那里第一次走向生活，那里留下我一去不返的青春岁月，也沉睡着我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

1969年10月19日是个极普通的日子。我们正在喂猪，“不好了，草甸子着火了”！只见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晓军抄起扫把，我拎条麻袋冲了出去。回想当时的情景，我最初的一闪念是高兴，考验我们的时刻终于到了。没人组织，没人号召，面对一片火海只有七个人，五个北京知青，一位本地青年和一位大嫂。在那动荡的年代，“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决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成为时代的座右铭。

大火即将吞没2400亩大豆，也威胁着村舍住地。我甚至为能有机会向党和人民表示自己的忠诚、以青春和热血洗刷凭空加在我身上的耻辱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而感到庆幸。浓烟呛得喘不过气，烈火烧得睁不开眼，几百度的高温使人窒息难忍，烈火烧身的痛苦使人本能地后退。我听见晓军在鼓励我：“小月，坚持住！”我感到她是在向我暗示，只能用行动证明我们不是“狗崽子”了，关键时刻我们有和工农后代一样的热血和肝胆。往日的屈辱、压抑一起涌上心头，我忍着难言的痛楚疯狂地抡着麻袋，甚至感到一种洗刷灵魂的快乐。晓军一下又一下挥动扫把，烈火燃着了掀起的衣角、烧秃了手中的扫把，她好像全然不知，奋力高呼“下定决心……”我随着她一起呼喊“……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情的火舌窜入口中，我不知自己是怎样喊出来的，声音是那么凄厉吓人。想用死来证明自己的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中我们惟一的选择。

突然，晓军身上起火了，我拼命地朝她呼喊：“李晓军，快打滚！”她倒在滚烫的大地上，我知道她是在为父亲赎那并不存在的“罪”。记得当年她曾写下一首小诗：“站在猪圈宝书捧，眼观全球干劲冲，养猪喂猪为革命，掏出红心献出忠。”她是怀着怎样一种赤诚渴望着理解与信任！我的手、脚、脸已全部烧伤，好像有无数把利刃在割着。我不顾一切随着翻滚的晓军奔跑，却不知该怎样帮助她。到底是高中生多几分沉稳，老崔用手拍打着她身上的火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往日活泼的“小鸡”？她的脸如同黑铁浇铸的面具，双手的皮肤全部剥落下来，就像一副手套挂在指尖上，剧痛使她如同秋风中的树叶簌簌发抖。

远处传来大嫂悲痛的哭声：“小张不行了！”晓军用严重烧伤的双手推着我们说：“不要管我，快去救火！不要管我，快救小张！”没人注意到大火卷过之后，张梅玲已经倒在焦黑的土地上，没来得及实现她救火的愿望，甚至都来不及哼一声。她的皮肤烧焦了，肌肉炸裂了，一截短辫散落在身旁，全身只剩下一条腰带和一双鞋底，她全身赤裸洁白刺目，四肢挛缩着一动不动。可当时我以为她还活着，我觉得很害羞，一个姑娘就这么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可我又找不到什么可以盖在她的身上。

眼前的情景使我惊呆了，刚才还是两个活生生的同学，转瞬之间都倒在冒着黑烟的大地上，难割难舍的同学情揪住了我的心。我真想拉晓军起来，一起向梅玲道个歉。就在这天早晨，梅玲来猪舍看望我们，可能因为出身好及其他原因，她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成为营妇女干事。时代背景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同学间原本融洽的友情蒙上了阴影，我们都不愿理她，甚至还说了些挖苦的话。可这究竟为了什么？浓烟遮盖了天日，空气中弥漫着肌肉烧焦的气息，四周一片昏暗。我看看这个，又望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望那个，心里一片迷茫，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我们应是极好的朋友，那隔阂本不该存在。无情的大火吞噬了一切，也烧去由出身造成的隔阂。

有人在哭。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哭，是因为我们负了伤？可到了医院我们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健康？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烈火在瞬间完全改变了我的容貌，那年我才19岁。

闻讯赶来的人们背起我和晓军。梅玲已经不能背了，伸手只能抓落她剥脱的皮肤，人们脱下衣服套在锹把上抬起梅玲，烧成液体的脂肪从她身上流淌着，点点滴滴洒在长满毛刺的苍耳草上，脱落的皮肤随着担架的起伏晃动。多少年过去了，一位当年抬担架的哈尔滨知青对我说，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他都不能吃肉，端起碗，就是肌肉烧焦的气味，那惨烈的一幕给他的刺激太强烈了。

几个青壮年男职工轮流背着我，踏着齐腰的荒草，深一脚浅一脚走几步就要换一下，我伏在他们的脊背上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身子软软的不断从脊背上滑落，稍一用力好像全身的血管都会爆裂开，肿胀的脸封住了眼睛。我不知道他们是谁，只能听见沉重的喘息声，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知青们目睹这种惨状不禁失声痛哭，一位男知青怒吼道：“哭什么！我们首都的红卫兵，决不给毛主席丢脸。”四周一片沉寂，烧灼的痛苦如万箭穿心，我更牵挂着晓军，因为只有我才知道她心里比身体更重的创伤。我问：“晓军，你痛吗？”她回答：“不痛。”那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到，只有经过烧伤的人才能体会到那是怎样一种痛苦。由于呼口号时火灼伤了她的喉咙，烧焦了她的舌头，喉头水肿窒息，嗓子里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咯咯声，难耐的焦渴，使她含混不清地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要喝水，我要喝好多好多的凉水。”那以后的情景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尽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火势并没有丝毫的减弱。那火又烧了几天几夜才在拖拉机翻起的防火道前熄灭。大火卷起的灰烟随风飘出几十里以外。或许历史和我们开了个残酷的玩笑，那场使我们生离死别的大火竟是一个牧牛人在百无聊赖之际点燃老鼠取乐引起的。

现在冷静一点儿来看，有人认为不值得。当时宣传什么口号啊？——“我赞成的口号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时候把人的生命看得不珍贵。珍宝岛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口号：“不能伤祖国的一草一木。”珍宝岛离我们农场不远，往珍宝岛进部队的时候，大批的部队从我们农场往前拉，野战医院就设在我们团部，对我们影响特大。那会儿的战士真有这样的，“叭”——苏联兵的枪弹打来了，他挺身护住大树，被打死了。你觉得他们愚昧吗？不能这么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当时就是这种教育。后来又说了，“不能伤祖国的一草一木”只是一个激励斗志的口号，不是让你们白白牺牲生命。我们是要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可是那个时候，没人告诉我们这个，也没人教给我们这个，完全出于一腔热血和真诚去这么做。

三　我和晓军、梅玲

数月后，我偶然在与病友聊天时听到晓军、梅玲牺牲的消息，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就在那天早上，我们还一起有说有笑，听到着火的呼喊，灵巧的晓军还三下两下爬上草垛向远处张望，我双手抓满麦草几次都滑落下来。或许我的样子太滑稽，晓军开心地朝着我笑。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眼前还晃动着她们的身影，耳边还响着她们的说笑声。长期以来遭受歧视的压抑，烧伤带来的心灵肉体的痛苦，失去同学、朋友的悲哀如同决堤的洪水，我号啕痛哭。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病房门口挤满了人。

我的同学、战友李晓军和张梅玲就这样去了，她们去得太早，她们还年轻，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带着对理想的追求，融入她们所热爱的黑土地。她们同生于1949年10月，与我们的共和国同龄。

第二天，我突然不肯换药，大夫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反复地问：“你为什么骗我？为什么骗我呀？”我抱着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告诉我晓军、梅玲还活着。大夫看我挺固执，无可奈何地说：“如果我骗你，也是不得已。”当一切都得到证实，就像做梦似的，觉得是电影吧？是演戏吧？怎么会是现实呢？一觉醒来人们会说你是做了一个梦，可梅玲、晓军真的走了。那是我一生最惨的悲号，既为了同学朋友的离去，也为自己早逝的青春年华。大夫递给我一条毛巾，并不住地劝我，我不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捂住脸的毛巾像钢锉一样扎着脸。我不断地哭喊：“早知这样，为什么不给晓军喝水呀？让她受了那么多的罪。”第二天，我的脸由于淤血成了黑紫色，可怕地肿胀起来。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少年时代的小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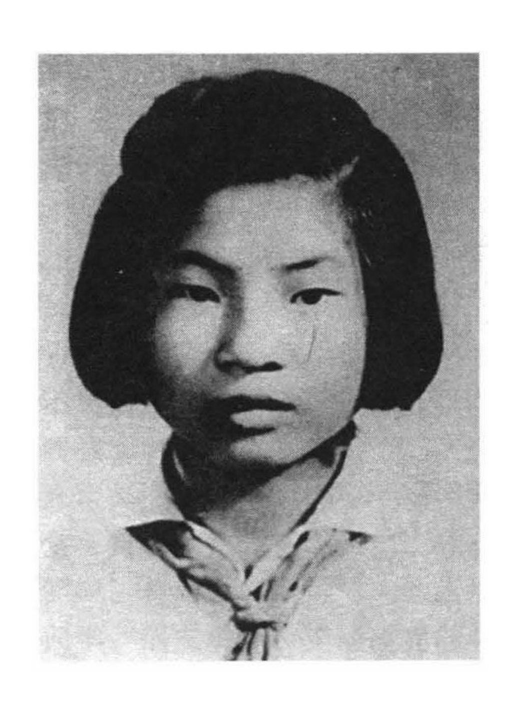
少年时代的张梅玲

记得晓军入院时，因呼吸道严重烧伤，憋闷使她常常不由自主猛地坐起来。大夫劝她忍耐一下，她就顺从地躺下。她的气管被切开了，吸氧机也上来了，听着那风箱般的喘息，我既为晓军的伤势担心，又因为受到干扰而烦躁。我只有绷紧每一根神经，才能忍受那炼狱般的折磨。当病房突然安静下来后，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时晓军在同一个病房中死去了，我却不知道。醒来以后，我不断地问：“晓军呢？”我老觉得对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不起她呀，甚至有一段时间总觉得是我把她害死的。我恨自己为什么那么自私，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没能帮助她。

晓军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她妈一个人负担她、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爷爷、奶奶。她妈是“右派”的老婆，所以被逼无奈离婚了，不离婚不行啊。爷爷奶奶都跟晓军的妈妈过，人家要是真离婚能这样吗？！晓军的妈妈在建筑工地当小工，虽然一贫如洗，但是她特刚强，晓军从来都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你根本不觉得她家有多困难。她跟她妈两个人的三件衣服来回倒着穿，因为其中有一件是要换洗的，她从来干净利落。晓军人品好，功课也好，在小学的时候就是班干部，到中学后是我们的中队委。我本来以为她是一帆风顺的，但第一次踏进她的家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凳架起木板是她的床铺，肥皂箱是装衣服的地方。虽然家中的一切都是破旧的，但却干净得一尘不染。在这个简陋的家中，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尊和在逆境中不屈服命运的欲望。



少年时代的李晓军

那时，北大荒雁窝岛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稚嫩的首都中学生，在无数次软磨硬泡下，晓军先走了，也许命运使我们从此分开。晓军掩饰着自己的悲哀，极力装出笑容从车窗中探出身来说要在北大荒迎接我，我只是默默地点头，生怕一张嘴就哭出声来。当我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时，为了我和晓军的友谊，接知青的老杜特地把我们分在一个连。难忘1968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毕竟是不满18岁独自到一个陌生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地方闯荡人生，心中难免凄凉。卡车还没驶入连队，依稀可见村落房舍，不由一阵惆怅。突然，有人一遍遍高喊我的名字，晓军手举着红灯笼向着卡车奔来，我一声声地回应着……直到现在，我也常常不敢相信我们分别已经久远，闭上眼睛晓军就在面前。

我与晓军也不是没有过矛盾。晓军的生活负担重，在这个缺少父亲的家庭里，母亲把她看做成人，有什么事都和她商量。作为家庭的支柱，她要带弟弟妹妹，还要做家务，她像工农子弟，身体素质好。而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贫血，还有哮喘病，体质较差，中、小学一直免体育。到农场后，这种身体的差异就明显了。猪棚有一个本地的大嫂带我们俩，她特别喜欢晓军，疏远我。人家就看干活儿，哪个干活儿好，“倍儿棒”！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常为了些小事闹别扭，很久谁也不理谁。有一天，晓军找到我，谈我们的理想，坚信凭自己这一代的努力，可以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相知在那孤单寂寞的岁月，她受歧视，我遭冷落，于是，我们走到了一起。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彼此之间，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我庆幸自己在那凄苦的日子里，拥有世间最纯真的友谊。

到现在我都觉得晓军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血统论”的滋味我们都不陌生，不同的是晓军没有牢骚，没有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她小巧麻利，和泥脱坯，排水挖沟，扛麻袋，样样走在前头。大伙都亲昵地称她为“小鸡”。她用苦干赢得人们的信任，被选为农工排排长。她受过太多的挫折，早已学会用微笑对待苦难。

相比之下，似乎梅玲是幸运的，好像命运对她格外关爱，然而没人知道，她承载着那个年龄不应承载的沉重。不能说梅玲是一个不好的人，她是属于挺单纯、挺执著的人，但是论素质或是才学，她跟晓军比真差得很多。可是那个时代，她就是营的妇女干事，实际上她自己也觉得很吃力。那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远离她，这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不满和反抗，把她推得那么高她又没有那种能力。但是我觉得她是无辜的。现在我也很佩服梅玲，她被烧得那样，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先去救她的。那是个思想禁锢的年代，或许是因为她赤裸着身体，男同志不好意思上前，或许是她的地位拉开了与大家的距离。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她躺在那儿，都去先救助晓军。这就是老百姓的心理，正常吗？可是她是无辜的。想起来我就觉得难过。我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觉得梅玲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她怎么就死了？救火是她的本意，但是她没来得及实现自己的愿望。我问了当时去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说：她没有冲过来，一下子给卷到火里，也可能是绊了一个跟头，那是荒草甸子，一下就完了。但我认为她是个英雄。正如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毛主席所说的：“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她是个没来得及实现愿望的英雄。

梅玲哥哥和我谈起，她曾给家里写过许多信。那不断的提升，在旧日好友和同学之间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也给她带来痛苦。难以承受的重负，使她感到困惑。但这一切都不是她的过错，她不应该承载那份沉重。可恨的“血统论”既伤了我们，又害了梅玲。

事后，贫农出身的张梅玲荣立二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李晓军却因为她的出身而无声无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她静静地长眠于地下，白桦林成为她永恒的背景，她不知道死后社会是怎样不公正地对待她。知青们对此愤愤不平，难道洒尽鲜血也不能抹去笼罩在她身上的阴影？献出生命还不足以证明她的真诚？人们都说，心诚石头也会开花的。北大荒人没有忘记她，在晓军走后很长的日子里，常常有陌生人望着我烧伤的脸称我为李晓军，虽然那称呼让我肝肠寸断，但我还是不忍把谜底揭穿，就让她永远活在那里，与热爱她的北大荒人做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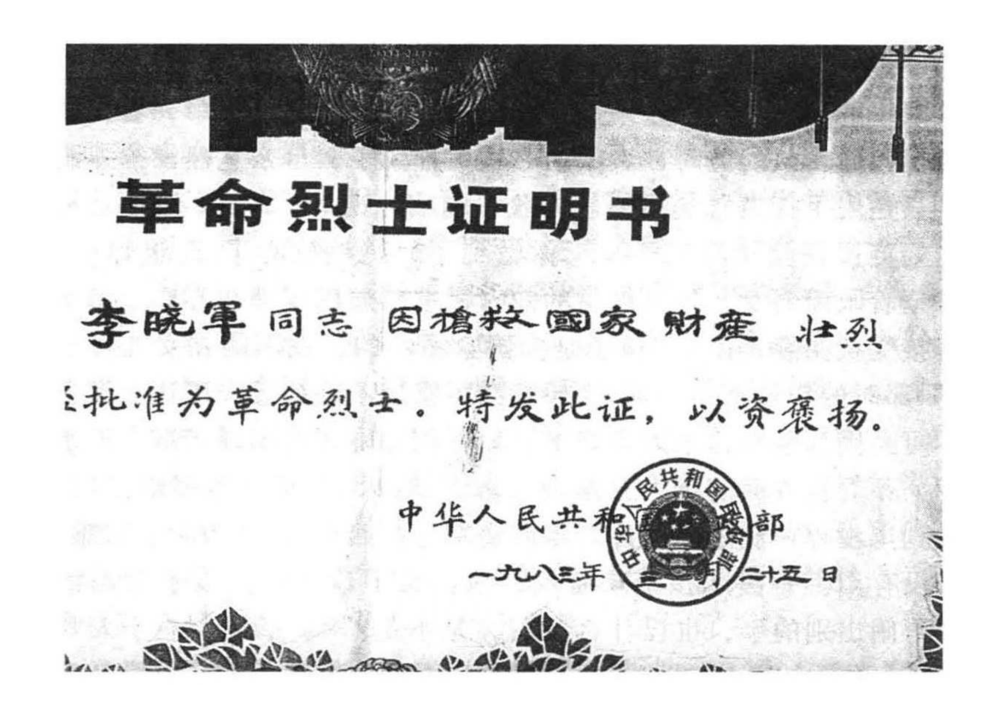
晓军的母亲从北京赶来了，当她掀起晓军身上的被单，看到被烧成焦炭无法辨认的脸时，大家的心猛然抽紧了，母亲竟然没掉一滴眼泪，只是用手抚摸着晓军僵硬的脸，喃喃地说：“孩子，你不是常说要向刘英俊叔叔学习吗？今天你做到了，妈就放心了。”追悼会上，母亲望着眼前与女儿年龄相仿的知青，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怎么也不肯接受抚恤金，说：“孩子是为国家牺牲的，我不能在女儿身上沾光。”那时的领导有一个观念，“右派”家属不许接近，不让大家去看她，可是因为晓军这个人太好了，知青把对晓军的那种感情全给她母亲了，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去跟她亲近。她妈妈也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从头到尾没掉一滴眼泪。许多年后晓军母亲回忆说：“当时心里难过，可又没有泪。一拨儿孩子来看我，他们又不让接近。孩子已经牺牲了，再闹出别的事，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晓军母亲一个人默默地走了，作为一个底层妇女，她顶着“右派”家属的帽子忍辱负重多年，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这么多年来我老觉得晓军很委屈，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和她家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晓军父亲说：“孩子牺牲时我并不知道，兵团没有通知我。虽然我处于那种状况下，但总是她的父亲呀！总感到孩子是受了我的株连。能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青春，这是她应该做的，也因为受了我的株连，她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拖拖了这么多年。”晓军父亲平反后，不断给农场写信，要求对她的死给一个公平的说法。她父亲很有文才，在信里写着，党的政策是怎么怎么说的，我们孩子的命都没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就不能对她有一个说法、有一个结论吗？没有什么比性命更宝贵的了。1983年，黑龙江省政府追授李晓军革命烈士称号。虽然这对于死者已没有意义，但对当年共同奋斗过的知青却是一种慰藉，因为这毕竟体现了历史的公正。

我说起这事啊就觉得很悲惨。晓军的父亲在她上小学时就被打成了“右派”，离开家以后他们父女俩再没见过面，直到晓军死时她爸还在劳改。到现在，她爸连她的墓都没去看过一眼。没有人请他去，谁掏这笔钱？那边谁接待他？以前他爸还老说要去看看，我说等有了时间陪您去。现在她爸也不想去了，八十多岁了，他说：“我这个年龄跑不动了，再说身体也不行了，我怕受累也怕受刺激……”



革命烈士证明书

李晓军同志因抢救国家财产壮烈

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

中华人民共和　　部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李晓军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那场大火使我失去了朝夕相伴的同学和朋友，也使我原本光滑圆润的脸斑痕满面，从此走向坎坷的人生。我不知用怎样的语言描述一个19岁风华正茂的少女当时复杂的心境，但我从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乞求人们对那个时代行为的理解和同情。

四　残酷的镜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烈火在一瞬间会改变一个人的容貌。烧伤病人都是没有镜子的。我看过好多的电影，包括《夜半歌声》的沈丹苹……那时候我没有镜子，也不觉得奇怪，病房里谁给你搁个镜子啊？医生怕我接受不了现实，几次换药时都对我说：“你脸上可能要留下伤疤的。”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天真地以为，出院后会和从前一样，只是留下点儿小痕迹，笑着说：“没关系，留了疤不是照样为人民服务吗？”

烧伤后大夫不让探视，一是怕病人感染，二是怕外界的刺激，因为烧伤病人的感染是致命的。好多同学来看我，大夫就是不让进。一次，我犯纪律上车站接过的那个同学来了，大夫也不让进。我发烧有一个多月了，眼睛睁不开，就听见她在外面大声哭喊：“我是她的同学啊！”

有一天，队里一个宁波知青把门推开一条缝，我这是第一次看见连队的人，心里挺高兴。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就“啊”的一声尖叫，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怎么了，在我心里，我还是从前的模样，发生什么事了？救火事件在农场影响挺大，当时团里领导都来了，说“一定要尽力抢救”。医生、护士对我都非常好，我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异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吓着别人，也被别人吓着。

我第一次照镜子是烧伤以后很久了。我上医生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好多面镜子，是患者送的“救死扶伤”呀、“医术高明”呀那种。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头肿得很大，当时我就傻了，木呆呆的，不认识镜子里的人是谁。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大夫老跟我开玩笑，管我叫“大头翁”。脸上的皮肤烧焦了，只有坏死的肌肉和皮肤脱落后才长出的鲜红的嫩肉。我觉得自己的脸像铁面人似的带着一个硬硬的假面具，难受极了，可也拿不下来。翻着的皮肤，渗出的体液，涂上的药液，脸上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坑坑洼洼，耳朵也烧卷了。虽然理智上知道镜子里的人是我，可从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医生护士见我这个模样不害怕吗？他们对我这么好，这不是面对一个鬼吗？真的，当时我难过极了，可是一滴眼泪都不敢流，甚至连一句懊丧的话都不敢说。为什么呢？人家肯定会说我是资产阶级思想，“你一个资产阶级狗崽子，怎么还会想到这儿？”虽然人的正常感情我都有，但是一点儿都不能流露，全都得强压在心里。

由于烧伤了面部，散落的头发常常会粘在伤口上，给换药带来麻烦。大夫觉得伤口不好处理，就把前半拉的头剃了，后半拉留着，像清朝人似的。你别笑，“文化大革命”时期称这为“阴阳头”。我非常忌讳，一出去，人家能不把我当成牛鬼蛇神？我就大声喊：“都剃光！都剃光！”大夫安慰说：“没关系，不久头发就会长出来。”可我心里就是接受不了。最后真是都剃光了。好长时间人家都不知道我是男是女，甚至也不知道我是老是少。从脸上，你根本就看不出我有多大，有时候一说话人家一听声音，才说：“哎哟，你是个女同志啊。”从那一刻起，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青春从此结束了，永远定格在19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那个年代治疗烧伤没有特效药，尤其是感染以后，只是大量上激素、抗生素，体重一下升到140斤。输了很长时间的液，其实并不对症，当最后拔出针管的时候，胳膊已经僵住不能动了，护士只好轻轻地帮我活动，浑身都在颤抖。

住院期间非常盼望家里亲人来看我，可没人来。谁又会通知家里呢？父亲是“黑帮”，奶奶是“黑帮”的母亲，还要接受家属委员会的监督。兄弟姐妹全都在农村，姐姐在云南，我在黑龙江，两个人互通一封信，正常的话，我接到她的信给她写，她接了我的信给我写，一个月才能收到。一封信从我这儿走到她那儿要半个月的时间，她的信走到我这儿也是这么长时间。弟弟在北京郊区插队，妹妹在吉林，实际上都很远。妹妹在我烧伤以前来过，走的时候离我烧伤不到一个月。妹妹来的时候，是她想家我也想家，谁也见不到谁。我老觉得离吉林挺近的，实际上当时没有直通的火车，绕来绕去，她走的路比从北京到我那儿都不近，车票费是一样的。我们兄弟姐妹从小都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所以彼此的同学之间也互相认识。妹妹从我那儿走了不久，就回北京了。刚一下车有人对她说：“听说你姐姐烧伤了，烧得和鬼一样。”

烧伤后许多人都认不出我，到处盛传我烧得像鬼一样。一个与我不同连队的男同学对我说：“所有的人都说，你烧伤了以后都认不出了，可是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眼睛是心灵之窗，不管你的面貌怎么样，我看你的眼神，觉得你还是你。”

小时候我是个阳光女孩，邻居们都挺喜欢我，一些叔叔阿姨觉得我聪明漂亮，长大一定会有出息。儿童时代，我喜欢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东西，美术、文学、唱歌、跳舞。很小的时候不穿芭蕾舞鞋，我就能用脚尖立起来。但“文化大革命”把我的一切幻想和理想全毁了。烧伤使我的人生又一次改写，我的很多同学，尤其是一些男同学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不是烧伤，你的生活应该是美好的。”

烧伤以后多少次，老师、同学，甚至家人都不认识我，有的时候人家会说：“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同学的父母问我：“你是谁？”每次我都难过极了，觉得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还是坚持忍住。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挺坚强的，这么大的事，居然能够不掉一滴眼泪，在烧伤前后，为了我自己，我真的一滴眼泪都没掉过。那时才19岁啊，一个19岁的女孩子……后来，我吓过很多人，那么多的人也吓过我。我不敢天黑的时候出去，只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出去，让人家在很远的地方就看清楚我，为的是不让人家吓着我。因为有的时候，人家发出的那种尖叫，常常把我吓一大跳。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我记得，那时八个样板戏老是演，每次，当小常宝一唱那个“早日还我女儿装”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难过，尽管那样我也没哭过。也不是说光有痛苦没有快乐，为什么呢？毕竟我是女孩子，跟知青也好，跟过去的同学也好，在一起走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搂在一块儿，都是同学嘛，挺亲的。有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奇怪，那个男的怎么老跟一帮女的搂在一起啊？因为我的头发剃了，给人感觉是个男的，等到听我说话或者一乐的时候，就说：“啊，你是个女的呀！”这个时候我就哈哈大笑了，觉得好像是一件挺开心好玩的事。

五　沉默就是最大的反抗

负伤后，我被批准加入了渴望已久的共青团。出院后农场办了一个张梅玲事迹展览，我成了展览馆的讲解员。出于宣传的需要，人为地把李晓军的壮举全部加在张梅玲身上。在展览中，晓军只有一个画面，我的名字也只出现了一次，就一句话：“张梅玲、李晓军、小月一起救火。”这个展览馆大概保存了三年。

其实我心里不愿被展览，毁容对我的打击已经够大了，尤其是让我讲一些并不真实的东西，可我又能说什么呢？上面定好的东西强加给我。让我讲用，我曾经进行抵制，但不讲不行。后来我采取一种什么措施呢？上讲台的第一天，我侧着脸对着讲台，故意嘟哝着，谁也听不清我说的是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权利，我的权利就像鲁迅说的：沉默是最大的反抗。我从什么时候产生反抗意识的呢？就是看他们对晓军不公。现在我不能说这是不是叫反思，有没有这种觉悟我不敢说。社会是残酷的，一位留京的同班男生对我说：“让活人给死人讲用，也够难受的，说一些不是自己想说的话。”那个时候多少次让我去讲用，真的不愿意去，觉得自己像一个傀儡。我特能理解张铁生、黄帅这一类的人，社会给他那么大的压力，逼着他去，是他愿意的吗？也有人找我，说：“我不是来采访你的先进事迹的，你是个怕死鬼。看现在把你宣传得什么似的，为什么她俩都死了，就你活着？你要是英勇一点儿是不是也死了？你是不是怕死才活下来？”我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过当英雄，我也不可能当英雄。是谁把我弄到这个境地的？”我去找营长：“谁让你们宣传我了？我愿意了吗？我是一个普通人，过一个普通人的日子不行吗？”营长说：“不是说谁想当英雄就当，宣传不是你要求的，是我们领导要这样做的，一切后果领导担着，甭管人家说什么。有一点我要跟你说句实话，叫死了的英雄好当，活着的模范难做。为什么？每个人对于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模范都有不同的模式，你没照着他的模式去做，他就会觉得你不像一个英雄。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挑他什么呀？对活着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不要管，什么事由我们兜着，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

这件事出了以后，宣扬我，使我难过的事太多了。你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正是爱说爱跳的年龄，可是一旦有真诚的流露，“不成熟啊，不稳重啊”，就会听到这种批评。如果你的本性受到压抑，成了沉默寡言的人，别人又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这么难接近啊？”我是近视眼，但干农活时从不戴眼镜。烧伤后，一下子视力减了好多。有时候遇着人了，看不清，没打招呼。有人就说：“骄傲了吧，凡人不理吧。”我觉得我承受的东西太多了，许多是我不想也不该承受的。

从那一刻起，我特别体会人世间的炎凉。我一直是“黑帮”的“狗崽子”，有些人不管在哪儿受了委屈都可以在你的身上出出气，因为尽管你不是“黑帮”，也是入了另册的人。曾经有一个人拿着中共九大党章，故意当着我的面念，党员的入党条件就是年满18岁的中国工人、农民什么什么一大堆。那言外之意是你不够格。这个人就跟我同一个宿舍。在我烧伤以后，她上医院去看我，还到处跟人说：“我们俩是好朋友。”实际是想借别人的光环照亮她自己。我心里都明白，世态炎凉看得太多了。原来恨不得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忽然一夜之间变成了我的挚友。我真感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当然，我也有许多真正的朋友，不论你是“狗崽子”也好，你是“好汉”也罢，我们之间依然真诚。不管上面怎样宣传，朋友从不认为我是英雄，我也从来不那么看待自己，我依然是从前的我。就像你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不是说出身不好就走到一起了，是社会逼着你走到这一步，像我和晓军就是这样。

我们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是共产党亲手培养起来的一代，从小就立志建设共产主义，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极富革命理想的一代，顽强、勇敢、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于青少年时代的全部生活中，尽管经受了正常年代一个人一生都难以经历的社会动荡与人生变化，但少年时期打在身上的烙印却很少磨灭。那时候，入党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有个叫晓晖的知青和我一个连队，她积极向上，各方面都非常出色，每次发展党员，连队里的人都推荐她。由于出身的原因，指导员找她谈话：“晓晖同志，你要准备做一辈子党外人士。”烧伤以后我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营长找我：“你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书？”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些关系，可能比其他出身不好的人多一点政治承受能力，我其实心里很明白，即便写了也未必会发展。但最后我还是写了，也确实没发展，多少年也没有发展。以后我就说：“我觉得我不够格。”我当时还有一点真诚，因为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觉得党员这个称号很神圣。我对营长说：“晓晖那么出色，连里所有人都认为她应该成为党员，还是没希望。我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什么还要去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做那种不可能的事呢？”没想到，这么一句话，等于给指导员穿了小鞋。你知道当时怎么宣传的呀？什么“要团结绝大多数的革命同志”，“团结群众中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有一个针对我这种人的称谓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营长就去找那个指导员说，即便是这样，这种话你怎么能随便说呢？“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是我们那一代的口头禅。我们追求苦难，因为我们要在困境中锤炼自己。当我们中有人成为时代的宠儿时，又必然有人成为不幸时代的不幸者。为理想，我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可还是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自上大学以后，我再也没写过入党申请书。

六　上大学的一波三折

一说1975年上大学的事又特可笑，今年春节父亲提起这段往事还耿耿于怀呢。当年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上学，后来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我算“可教子女”，在我们农场又算有特殊贡献的。我们营长是一个很好的人，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得替你今后考虑，一个女孩子这么年轻就毁容，将来的生活怎么办？如果你看上了哪个小伙子，跟我们说，我们领导去做工作。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听他讲完这话以后，我心里特悲哀，觉得这一生到此就完结了。结不了婚成不了家，即使能找个丈夫嫁个人，还得领导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家。我说过，从来没为自己的事流过泪，可那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哭。人家说一件什么事，就好像是冲着我，我觉得这一生就此画句号了，没有前途了。但是，尽管有再多的悲哀，我都埋藏在心里，这叫什么？咬碎牙咽到肚子里呀。我们一块儿的知青都知道，我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从不流泪。我有时蒙着被子哭，在被窝里啜泣不让人知道，有时半夜睡梦中就哭醒了。营长还说：“你不要急于答复我，考虑好了再跟我说。”当时已经有工农兵大学生[3]了，我说：“营长，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结，还想为社会和国家多做点贡献，我想上学。尽管我已经毁容了，姑娘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但还有聪明才智，我并不笨，我想用自己的智慧为社会服务。”营长说：“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这点儿权力还是有的嘛。”

1973年开始推荐我上大学，但因为父亲的缘故，哪个学校都不要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好多人都不愿意当老师。“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老师，说什么臭知识分子啊，肆意贬低他们。我想，上学既然这么难，干脆报师范吧。最后给我来一个什么答复？“当老师要五官端正，您这样怎么能当老师呢”？连着两年，都没上成。第三年，也就是1975年，我已经25岁了，按照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25岁是最后年限，超过这个年龄就没戏了。那一年也不知怎么的，忽然改成自愿报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名、群众推荐，一律要票数，你够了票数才能推荐上去，领导也很难做主。我觉得是最后一年了，又报了名。

烧伤后我一直感到很压抑，迫于环境，许多想法藏在心里不能说也不敢说，有些人不理解我还在背后偷偷议论说：“她有精神病吧？”但真正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很正常。同宿舍的秀华为我辩护道：“她一点儿也不怪，其实很优秀，你们谁能受到这种打击，还能像她现在这样，我就佩服她。”我听到议论的时候，也就是一笑了之。因为有这些舆论，担心大家不会推荐我，可是没有想到，我的票数还是最多。现在我还说这句话，老百姓真好！好多老百姓都说：“就是小月吧，我们就推荐她。”大家看的是什么？是你的付出。票数统计完了以后，领导内部又出现了分歧。有的领导说：“今年不能让她去，头两年都推荐了她，没去成，把名额给耽误了。”大概还是营长的作用，意思是只要有可能就要让我去。但是没想到，所有的关卡都通过了，最后政审一关又过不了。

我作为“可教子女”上学，得有一个父亲单位的结论拿到这边来，说明父亲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这个我回了趟北京。大学还在军管，我跟父亲一起去找军代表。[4]父亲说：“我这算怎么回事儿？现在都影响我女儿了，你怎么也得给我个结论吧？”军代表说什么：“结论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我爸受了这么多年压力，一直逆来顺受，那次可是急了，拍桌子了：“你怎么这样啊？这关系的不光是我的问题了，现在还影响到我的子女了！”我怕他跟军代表弄僵了，事情就更难办了。我说：“爸，您别急，也不必生气。”又对军代表说：“今天不是让您做结论。当然了，做结论是一级领导或者是一级政府的事，不是一个人能做的。您是不是觉得我是无辜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觉得我是无辜的。现在这件事跟我的前途有直接关系，那么我希望您写一个证明，我父亲是什么情况就写什么情况。他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好，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就可以上大学；如果他是‘敌我矛盾’，我作为‘可教子女’也可以上大学。我现在不是要求您给他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您总可以给开一个证明吧？”好，他就开了。我拿回来一看，你知道他证明怎么写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带回的证明又不行，因为他既不是“敌我”又不是“人民内部”。要是“敌我矛盾”，我按“可教子女”有特殊贡献的推荐，按“人民内部矛盾”更不用说了，偏偏两边都挨不上。真是把你气得没辙。最后，我跟招生的人央求，我们领导也帮着说：“您呐，就按‘敌我矛盾’得了，我们认了，我们愿意‘敌我矛盾’。”最后死乞白赖地就这么去了，说我有特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贡献。

最后还有一个报专业问题。有很多我喜欢的专业，但热门的不能报。我原来想学外语，后来一想，不能考外语。为什么？最起码口译这工作我就不适合，只剩下一个笔译了，就等于今后的路子特窄。我愿意路子能宽一点儿，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能够游刃有余的。后来一想，干脆报生物化学吧。那年招生专业有低温物理、生物化学，还有一个哲学，我对哲学已经是没感觉了，认为它在中国没有出路，完全是秉承当权者的意旨，什么“批林批孔”、“批形而上学”等等，哪还有一点儿学术味道？所以，在三个专业里我选了生物化学。

进到学校时，我还没有整容，同学们都觉得我很怪异，因公受伤的事在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有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做些解释。在农场，我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离开的时候档案里没有这方面材料，根本没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总觉得你肯定是有一些背景来的，大多数也属于“表现突出”的。所以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们认可，人们觉得这还是可信的，要不然怎么会弄这么一个人来上学？

七　顽强人生

1979年大学毕业后，凡是像我们兵团回来的，学这个专业的，全部都分在卫生系统。不论是卫生部所属医疗系统也好，还是北京市卫生局系统也好，惟独把我分到环卫局。

上学期间，我在班里的成绩以及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同学们公认这一点。毕业分配把我弄到环卫局，也不明白是干什么的，报到后才知道，敢情是个“垃圾站”。当时“垃圾站”占了一块农民的地，刚开始盖房子。他们告诉我今后的工作，就是处理粪便和垃圾。那个时候中国对垃圾的处理，研究和机械化都谈不上。我一到那儿报到就傻了眼了。那个时候，北京的同学办完毕业手续好多人还没报到，外地的同学还在北京没有走，我属于急性子，率先报了到，等回校一说，所有的同学都觉得奇怪：“怎么就把你弄到那儿去了？”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调了包”。我听了后如五雷轰顶。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忍受屈辱、磨难，无休止地挣扎。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惟一拥有的就是聪明才智，我用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么一个水准本来挺好的，想凭自己的努力体现人生的价值，可社会连机会都不给我一个。当儿时的信仰在步入社会破灭以后，个人价值的寻求和生存需要的选择越来越凸显出来。那会儿连死的心都有。我把自己封闭起来，许久朋友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们这代人承担了国家50年建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设、改革所必须付出的牺牲，在任何时候都无条件地以自我牺牲的方式维护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让命运抛掷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也坚守着曾经的理想。当我再一次从阴影中走出的时候，一个同学对我说：“突然没了你的消息，也找不到你，就猜到你肯定遇到事了。”

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因烧伤毁容的脸总让人家觉得奇怪。我又开始跟人解释，但跟上大学时就不一样了。上大学时，同学们都知道，你不是有背景，就是表现好，都是挺特殊的人。可一到工作单位，你这么怪里怪气的人，别人就觉得：你这事儿，怎么档案里没有记载？我就跟一个说谎者似的，喋喋不休地去跟人解释。人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我觉得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样。无奈，1983年我回了一趟农场，要求给我落实政策。农场的人事干部觉得很奇怪：“你现在不是国家干部吗？也有工资，还想要什么？”我说：“不是想要什么，而是我应该有什么！因公受伤就不应该有个记载吗？”

当时农场的党委书记早就换了，我在那儿的时候还有军人呢，是沈阳军区派来的。所以我还得自我介绍，我是谁谁谁，哪年哪年，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件事在农场影响挺大的，现任书记说他听说过。我说：“那就好，我跟您的沟通也就容易了。”那时候我脸上的疤痕比现在严重，我就说：“您是一个有儿女的人，如果我是您的女儿，现在这个样子，您会是什么心情？”那个书记很通情达理，他说：“但凡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农场为此发了一个文件，文中说：“小月同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英勇救火中被烧伤，实属英雄之举，定为因工负伤，为妥善处理，农场根据立功批准权限给予补办立三等功一次的手续。”到此为止，事情似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张梅玲、李晓军的烈士称号是黑龙江省政府授予的，而我的三等功是农场批准的，社会上根本不承认。烧伤后我曾先后六次住院，做双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术数次，离开农场后许多手术都是自费，不仅要独自承受烧伤带来的各种压力和手术的身心痛苦，还要被扣工资、奖金。

这就是我得到的。你说我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痛苦，是经济损失，是不理解和唾弃，是孤身一人，没有家庭。一个女人被毁容了，还能怎样呢？多少次我都是自己去住院去看病。我现在还有一些自己花钱看伤的票据，没人给你报。人家说了：“你这不算公费医疗，你这叫美容整形。”我总不明白，我是给共产党干的吧？不是给国民党干的吧？不是给资本家干的吧？我怎么就讨不到一个说法呢？现在好像所有的不是都在我身上，人们都在指责我不对，因为我不是为这个单位付出的，那我又是为了谁呢？每次住院也好，做手术也好，只有我一个人，手术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签字自己签，也没人看护。哪一个单位的公伤，都会派人照顾的。我没有啊，我就这么一个人扛着，甚至整形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大夫都说：“你是工伤，怎么自费呀？这么多年，你是我见到的头一个。”当时在手术台上，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不是因为伤痛，什么伤痛我都能抗，但是这种心理的伤害，真的难以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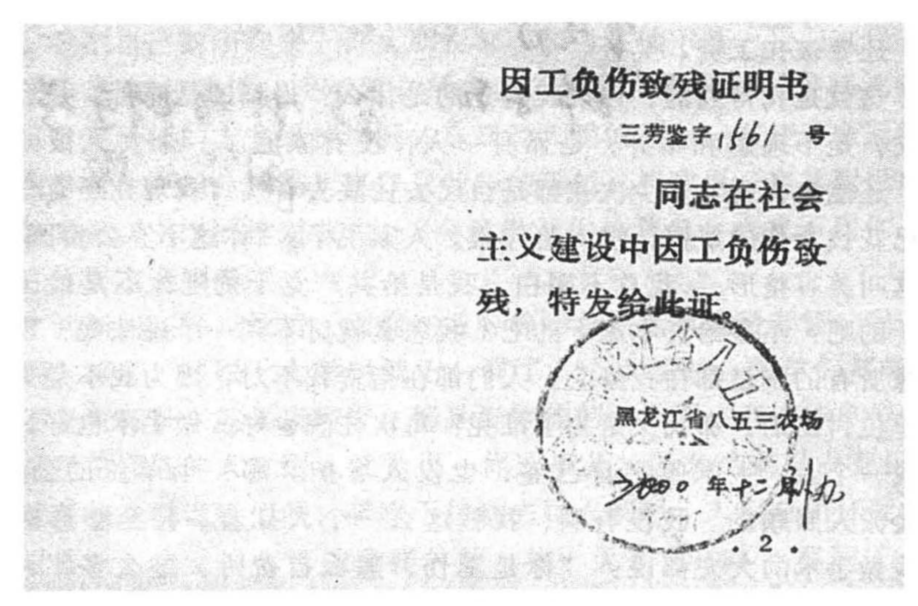


姓名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50.7		
籍贯	北京市		
何时参加工作	1968.7		
何时转为固定工			
负伤的时间、地点及原因	[illegible]		

·3·

负伤时所在单位及证明人	[illegible]
医疗终结时间及残废情形	[illegible]
残废等级	伍级
退休时间	—
发证机关	853 农场
发证时间	2000年12月 补办
填发人	[illegible]

·4·



因工负伤致残证明书

三劳鉴字1561 号

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因工负伤致残，特发给此证。

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

2000 年十二月[illegible]

·2·

小月的伤残证明（真实姓名已修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职工因工负伤致残审批表

证书号码：

姓名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50.7
本人成份	学生	何时怎样来场	1968.7				
何时参加工作	1968.7	何时转为固定工	1968.7	是否会员			
工种级别		基本工资		原籍	北京市		
现工作单位		文化程度		何时退休			
负伤时间、地点及原因	1969年10月9日在[illegible]一队因发生特大火灾，该同志在救火中被火烧伤。						
负伤时所在单位及证明人	[illegible]						
基层单位意见							
医疗终结时间、及残废情形	（此项由职工医院填写并盖章）颜面总处烧伤瘢痕挛缩，四肢缺损，[illegible]烧伤达20%，三度烧伤15%左右。[illegible]评为公伤致残五级。						
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意见	根据劳险字（1992）第40号GB/T16180—1996（[illegible]）文件规定，经[illegible]评定为伍级伤残。						
残废等级		残废金额					
备考							

填发人：

小月的伤残证明（真实姓名已修掉）

为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万般无奈，我只好与农场联系，希望能得到使社会认可的结果。他们说：“你看，事情过去了那么多年，农场的能量有限，我们实在力所不及。”他说这个，我也相信，但是我怎么办呢？我都五十多岁了，人生不过两件事，一个是家一个是业，我是既没有家也没有业。什么我都没有，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记得佛经中有句格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说佛为普度众生要承受世间的一切苦难，或许我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我怎么就不明白，我就跟堂·吉诃德一样[5]，到处是敌人，可我拿着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矛刺向谁？找谁去呀？我找谁，谁都可以三言五语把我搪塞回来。晓军的爸爸就是写的信，可人家是死了人的好说话，可我还活着，还得自己给自己说，说重了也不是，说轻了也不是。说重了，好像你这个人把名利呀、荣誉呀看得太过了。回到单位，把那些资料装在档案里了，单位领导不能不承认这件事，但承认没有任何用，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关照。在单位，人家看你这个样总是不顺眼。但是这种事谁也不会说，包括出差、进修任何机会都没有。上学的时候我是班里的佼佼者，后来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补课考试，我在单位里每次考试都是头几名，就是这样，任何机会都不给我。惟一有一次让我讲课，讲课的效果挺好，觉得讲得真不错，可没有用。每年单位都有外语进修的名额，为了表示公正，都先在内部进行考试。有一年我报了名，单位居然就没组织考试。管教学的同志对我说："我看你就算了，以后任何学习的事儿你也不要报名了。你知道这次为什么不组织外语考试？就因为你报名了，无论是科里还是单位都不会让你去的。"我真不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我这个人挺要强的，工作上也很努力，烧伤后我知道自己只剩下勤奋和才智了，可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得不到与他人一样的平等，我从来就没奢望过组织对我有所关照，但连起码的平等都没有。我也知道现在人们可以说，隶属你的成就你没有，你参加过什么学术会议？不是我不参加，是不让我参加。有人说，我的样子有损于单位的形象。当然有人也会这么说，你不要抱怨社会，你没有能耐，你有能耐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我给你打个比喻，假设我是个外科大夫，我再有能耐，这一辈子没做过一个手术，能耐在哪儿呢？不是我不做，是不给我机会，剥夺了我的权利。

每逢兵团战友聚会，大家常常关心地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常常自嘲地说："时代的巨轮让我晕船了，失去了当年的壮志和勇敢。"1997年我回插队的农场。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是小月吧？"让我感动的是个司机，他回头一看说："我知道你。"我说不可能，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年轻，也就是30岁的样子。我说："你今年有多大？救火那年你多大？"他说："我一岁。"我说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他说是从农场的有关记载上读到的，也是听父母讲的。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当时才一岁的孩子还能记得这件事。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小月在晓军、梅玲墓前

那次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想去饶河农场，我跟他一起去的。接待的人一看我这脸，就说：“我认识你。二十多年以前，你来过我们这儿。”那么多年了，人家还记得我，还很尊敬地“大姐”“大姐”地叫我。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触，觉得自己的付出也值。有人说我傻，我觉得我不傻。多少老百姓，真好啊。

两个难友的墓都去看了，已经倒塌了。尤其晓军的那个墓，连墓碑都没有了，完全是一杯黄土，有好多蒿草。梅玲的墓碑还在，名字还在上面。我觉得这都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对照非常鲜明。你看晓军，历史对她那么不公正，难道还有谁去把她的碑推倒？肯定没有，但奇怪的是她的碑没有了。梅玲身后被追认了那么多的荣誉，没有谁去刻意维护她的墓碑，可墓碑现在还在。奇怪啊，落魄的人永远受着不公的待遇。梅玲、晓军死的时候，你知道抚恤金给了多少？合起来也就几百块钱，两个鲜活的生命就没有了。

我工作后先后换过几个单位，每到一个单位好多人都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有几次党员开会，人家特地来通知我，说在哪儿哪儿开会。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问：“开什么会呀？”人家说：“党员开会没通知你？”我就笑了，说：“我不是党员，但是你通知我，我很高兴。”最起码我明白，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个党员，有这点我就知足了。

八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太大的地方

烧伤时我很年轻，不曾想到会对今后有什么影响，现在细想起来，当年营长担心一个姑娘毁容后嫁不出去不无道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长，朋友、亲人也很担心，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个家？在兵团时，我的一个男同学就对别人说过：“我很同情小月，但让我为她做牺牲，我办不到。”那弦外之音我明白。我从不希望谁为我做牺牲，也不想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只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家，彼此之间是平等的，然而多少年过去了，终无结果。

“文化大革命”后整形医院还没恢复，首都医院有个整形门诊，我流着泪恳求大夫，只想恢复原来的样子，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医生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面部神经多，血管丰富，治疗起来非常痛苦，为防止手术失败，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点来，所以手术需要多次。以后，我又在整形医院做植眉术，未能成功。一个人没有眉毛看起来很别扭。在刚开始有文眉术时，我就文了眉，虽然那眉文得挺“楞”，但毕竟有了自己的眉毛。那次文眉用去我两个月的收入。

“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这个阳光女孩的命运，付出得比常人大，却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独身好像对社会欠了债，人们觉得你没有家庭之累，每逢单位义务劳动或者加班，我都是首选，生活遇到困难却无人分担。甚至独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许多工龄短、职称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结婚就可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请就是不行。快五十岁了仍与七十多岁的父亲、继母挤住一处，我常担心到年老时无安身立命之所。世纪末，在福利分房即将结束时，我终于分到了一套远郊的房子，虽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费三个钟头，其中还有一段路不通车，许多人嫌远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窝”呀！

我与普通人一样渴望有个家，而烈火改变了我的一生。为追求理想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难道就没有追求生活的勇气？我参加过电视征婚，虽然一开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没有结果，但追求生活的幸福就像攀登山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峰顶，但每前进一步都比原来站得高。只要自己努力过，当生命结束时心里也不会留有遗憾。鲁迅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或许我注定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在充满荆棘的荒原上踽踽独行。

当年我是出于一种奉献精神，从未想过回报，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力和其他人一样为社会尽力。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因负伤及屡次手术带来的身心伤害渐渐显现出来。1994年一次我乘地铁时，突然觉得一瞬间好像呼吸停止了，胸部像有什么东西被勒住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双手像纸一样白，喷射性呕吐，脏物溅在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上。我的意识还没丧失，感觉稍好一点儿了，我扶着东西一步步地蹭回家，躺了两天，不见起色，心跳得像敲鼓。一做心电图，大夫责备说：“一看就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怎么才来呀！”其实我早就有感觉，只是不知道是什么病，也不知看什么科。曾有几次晕倒在外头，缓过来只能自己挪回家。有时严重得竟没力气去医院，很长时间脸像白血病人一样毫无血色，大约有两三年不能正常上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20世纪90年代中期，突然老是腰痛，我以为年龄大，关节不好使了，就咬牙使劲活动腰，蹲在地上擦地，又去爬山，结果越弄越糟糕。最后去医院看病简直就没法走，跟残废了似的，腿肿得厉害。大夫还没做检查就说：“你是腰椎间盘突出，要卧床。”我说：“不可能啊，你没做检查怎么能知道？”“你回去卧床，半个月以后来看，要是不好再照片子。”就是那样，我一天没休，拖着半个身子去上班。一做CT，果不其然，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医生拿着片子感到很惊奇，问：“是你的吗？”“我不可能拿着别人的片子来看病。”我说。他又问：“你是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我独身，但凡家里有人，我也走不来。”所以有的时候我说腰椎间盘突出，别人还不相信：“你不严重，你看你能走，我这儿就不能动。”我说：“我有什么病？只要能站起来没摔倒，就是挺好。”

腰还没好，又查出子宫肌瘤。妇科主任用手一摸就说：“耽误了，马上住院。”做B超时，一个30岁左右的男大夫惊讶地喊起来：“快看，她的瘤子怎么这么大呀！”也许是我经常出入医院，也无数次地经历生死的场面，使我对生命有与常人不同的体验，我平静得似乎他是在说别人，没有一丝恐惧感。大手术前我坚持自己签字，告诉主任我是单身。大夫说：“看了手术通知单，你就不敢上手术台了。”我说：“您小看我了，我已经多次为自己签通知单了。”手术后，我心里沉甸甸的，还没品尝过婚姻的美好，还没有自己的孩子，就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利。我非常喜欢孩子，见到小孩就想去抱，因为烧伤也常遇到难堪，只能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弟弟有了孩子，我喜欢得恨不能天天抱在怀里亲个够。小侄女一生下来就长在这个家里，从不会觉得我有什么异常。我一直怀着做母亲的梦，现在连梦也破灭了。

当我还没从心灵的打击和疾病的折磨中恢复过来，科里就因我身体不好把我上交了。正当我被突然的打击搞蒙了时，一个知青来我们单位办事。他向同事打听：“你们单位有个叫小月的吧？那是我们的英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啊！请代我向她问好！”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一丝安慰，觉得自己并不孤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问好的人是谁。

2001年底，我又因病毒感染急诊住院。出院后，一天病假没敢歇。出院不到一个星期，头重脚轻把脚崴了，肿得老高，鞋、袜子都穿不进去，只好“打的”上班。那时候买不了菜，吃饭也很困难。因为交通不便，我们那里有一种农民开的“摩的”，我让他在菜摊前给我停一下。我就在车上问那卖菜的：“白菜多少钱一斤？你找两棵大个的给我扔上来。”他们扔上来两棵菜，我就不用下车了。就这两棵白菜，我吃了一个多月。我这个人，只要站起来没摔倒就是胜利。

知青是背负沉重十字架的一代，永远在替父辈、自己甚至是后代偿还债务，身上有着抹不去的悲剧色彩。该长身体时自然灾害，该懂事时搞“文化大革命”，该学知识时去插队，该成家时晚婚，人到中年又下岗。共和国整个遍体鳞伤的烙印都在我们身上清晰地烙着、印着。

每逢住院、手术，北大荒荒友晓晖都来关照。她不无担心地对我说：“真怕有一天，你死在屋里没人知道。”其实她的担心并不是我所忧虑的。我知道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已没什么可以奉献的了，也知道生命离开自己时会很凄凉，但我还是决定捐献遗体，把这作为对社会最后的回报，我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朋友们说：“你别太悲观了，你走时我们都会去送你的。”我淡淡一笑：“我走了，谁来通知你们呀？”其实我并不悲观，只是敢于正视现实罢了，希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只对朋友说：“在我走的时候，劳你打个电话，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了。”我已为自己选好生命最后的停靠站。

我们这一代有许多共有的名字：共和国同龄人、老三届、知识青年。从任何方面而言，我们都不具备与国家、与时代讨价还价的条件，惟一支撑我们的是坚强的意志和艰苦岁月的磨炼。从炼狱中走出的我们，已不再怕炼狱的烈火。虽然我已开始步入老年，仍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独行，我已习惯陌生人的指指点点，接受路人好奇或怜悯的目光，敢于坦然地回视对方。我知道命运不会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当年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轻易地烧掉了人生最宝贵的信念，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现在的青年怎样生活。可当年我们的热情、真诚和执著，正是今天的人们所极为缺少的。

没人去追寻历史的责任，忘不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同赴火海的知青。纵然我们对历史有过怨言，也在挫折里将一切看淡，然而内心深处还是忘不了那生与死、血与火和那片黑土地。我喜欢一首叫《小草》的歌，它唱出了卑微中的顽强。我觉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没有花香，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

[1]“革干”，全称“革命干部”。

[2]这种荒谬绝伦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普遍。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331—332页。

[3]“文化大革命”中废除旧的高考制度，在“教育革命”思想下建立的新制度规定：学生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为与过去的大学生相区别，这部分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同时废除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4]“文化大革命”中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简称“军管”。被军管的地区和单位，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人员（即所谓“军代表”）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掌握一切权力。

[5]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主持正义，四处打抱不平，但耽于幻想，脱离实际，结果在现实面前四处碰壁。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坎坷中重塑人生

——刘继业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采访地点：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9号翔云楼宾馆1110房间

采访时间：2002年3月29日

［采访前记］　如今50岁上下的人，几乎都知道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刘继业等人的名字，这些“文化大革命”后期崛起于辽东大地的知青典型，曾是那个时代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然而，曾几何时，风云突变，他们从浪尖瞬间跌落到谷底。岁月流迁，物换星移，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在茫茫人海中，他们的踪迹已难寻觅。为了完成知青口述史，我却必须找到他们，为了了解历史的真相，也为了了解他们的现状。

这个过程颇费周折，多亏邱新睦、冯宁宁二位的帮忙。新睦是原沈阳知青，现在美国一所大学工作，任南加州中国知青协会会长，该会编有一份图文并茂的会刊，从第四期改名《知青》，成为联结中外知青的一条纽带。新睦对国内知青研究动态非常关注，2001年秋季他回国探亲，特地到北京、武汉、重庆等地一转，结识了不少知青朋友——学者、名人、活动家……在北京的聚会上，我们初次相识，海阔天空穷聊一气，犹如久别重逢的好友。

新睦的知青朋友中，有一位冯宁宁女士，在辽宁省电视台专题部工作，有意拍摄知青题材专题片。经新睦介绍，她来京与我联系，相约于国子监街上一茶馆。茶馆环境高雅舒适，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来中国旅游、大把花钱的老外，偏偏进去了我们两个“冤大头”，一壶茶没喝完，足足花了宁宁一百多元。但那次畅谈还是很投机，知青题材片拍不拍是将来的事，反正多了一位很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宁宁是资深记者，在辽沈大地交游广，神通大，于是我请她帮助寻找张铁生等人的下落。不久，宁宁来电：“已联系到刘继业，并通过他联系上张铁生、吴献忠二位，订在本周见面。”我闻讯大喜，连夜赶赴沈阳。

2002年3月27日，如期与继业见面。过去一直误以为继业是位叱咤风云的女将，谁知推门一看，却是位头戴无檐儿贝雷帽、温文儒雅、架一副秀边眼镜的男同胞。不久，铁生亦赶来，他的身体已发福，开始秃顶，面色黑，自述面相比我和继业都老。不用说，历经苦难使然。铁生与继业亦多时未见，寒暄之余，铁生揶揄道：“继业，你过去看上去总是两眼放光，如今怎么两眼无神了？”继业闻言，不仅不恼，反而大喜：“你这话算是说对了！这是我有意修行的结果。我现在心态非常平和，不知何为得失，早没有了锋芒……”

其实，在当年辽宁的知青典型中，继业并不算张扬的一个。按说，在那些频频见诸报端的典型中，惟独继业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文化素质最高，但官方报纸排起座次来，吴献忠、张铁生、柴春泽等初中生小字辈都排在他的前头。这大概与他比较平实的秉性有关吧。不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继业还是吃了不少苦头。大小会批斗，戴过“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蹲过几年大牢。党籍当然也没有了。出狱后，他不怨天尤人，在单位积极肯干，得到同事的敬重。他通过自学高考，取得了大学学历；还通过国家考试，获得了高级经济师职称，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继业很谦虚，把这种比较圆满的结局归结为“遇到了贵人”。难得的是，他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十分关心他。这一点，对他渡过人生的难关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些年来，继业的生活一直保持低调，尤其远离媒体，如果你用网络去搜索，绝对找不到一篇有关他的报道。我们彼此熟悉后，继业告诉我，他先去省图书馆，查了我写的书，确信我是个历史学者以后，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答应见面的。其实，像吴献忠、张铁生等人，对媒体也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一方面是为了躲避媒体炒作，减少“麻烦”；另一方面也是逐渐适应了“忘却”，担心结痂的伤口重新流血。不过，继业确实很有大哥的面子，在他的执意坚持下，吴献忠、张铁生总算同意跟我见面。

继业很健谈，对于“有没有知青情结”的提问，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知青情结很难说清，这还需要一定的岁月，但很重要。当年的知青，无论现在是富的还是穷的，是有地位的还是没有地位的，都认为与上山下乡有不解之缘。成功者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那段艰苦岁月的磨炼，下岗失业者则将自己的落魄归结为那段偏离正常成长道路的耽搁。”我想，他的这段话是很有些道理的。

继业的妻子沈庆林的经历也很不简单。“文化大革命”初，她从北京下放到吉林插队，以后转插到辽宁铁岭。第一个不简单，与继业一样，她也是招工回城后又要求第二次下乡的，没有这个第二次，也就不会有两个人的姻缘。第二个不简单，继业被捕入狱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带着孩子愣是坚持在农村，她坚信继业不是“反革命”，四处上访，吃尽了苦头，一直等到继业出狱。第三不简单，落实政策回到沈阳后，她一边干着又脏又累的体力活，一边自学大学英语，拿了大专文凭不算，40岁上居然远跨重洋去美国自费留学，又是一番求学打工的艰苦历程，最终苦尽甜来，找到了理想工作，大儿子在美国也学业有成。

一　两次下乡，一个志向

我是1968年8月下乡的，下到昌图县四合公社。这以前我是在辽宁大学附中上高三，也就是现在的120中学。那时快高考了，要填志愿了嘛，一切都准备好了。当时，我已经受了下乡思潮的影响。我是六六届的，我们学校六五届、六四届的高中生就已经有下乡的了。六五届的学生会主席李克宽，按理说也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了，人家不上大学，也下乡了。铁岭那儿有个叫养猪沟的地方，就在那儿落户，他属于极少的一部分人，应该讲是非常优秀的。他们的行动，对我们那几届影响挺大。再有，我们班有一个思想比较成熟的团支部书记叫赵姗姗，是牧虹的女儿（牧虹是《团结就是力量》的作者，那可是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歌曲，整整鼓舞了几代中国人）。赵姗姗学习挺好，她提出下乡就像当年老一辈上延安，那口号是很神圣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也认为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65年末1966年初，我们遇到了一个到农村去的机会，参加了“四清”。本来，只有大学生才允许参加“四清”，就因为我们是辽大附中的，又是高中学生，好像是趋向于成熟的阶段了吧，所以让我们也到铁岭去搞了一段“四清”，叫“坐车”，等于是实习。当时那种大的社会背景就强调这种社会实践。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欢呼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大游行

我住在一个小队，帮助那个小队的队长，叫个什么词儿呢？——“爬坡”，也就是“过关”的意思。是个老的小队长，上岁数了。老爷子是中农，那年头不是“三年困难”刚过嘛，农民积极开荒，老爷子就把他家土改前的那块地给开出来了。我就帮他提高认识，说你这是什么想法？别的地你为什么不开，单把原来你家那块地整出来了？是不是想着以后土地分到户的时候，你的地就行了？生地和熟地可是不一样啊。

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对农村有了了解。开社员会时，满屋子人卷烟，不分男女，呼呼地抽，这是东北一大怪嘛。我摸着黑儿还得记录，小油灯一点，没有多少亮儿。那时自己很投入，精神上也很充实。

到了1966年上半年，高三毕业班已经准备高考了，随着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这之前，姚文元发表了《评海瑞罢官》，那时我正在乡下呢，因为比较喜欢文、史、哲，所以对姚文元并不陌生，但是也没有把这事往心里去。返校不久，社会就开始乱了，学习也完全中断了。

到了1968年，就面临下乡了。团支部书记赵姗姗当时已经有了对象，她比我们年龄大，最后也没下乡，而是跟对象去了“小三线”，我们这些人就“呼噜呼噜”都上山下乡了。

知青十几个人一个集体户，都是初中生，就我一个高中生，成了老大哥了。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青参加的第一个运动叫“一打三反”，组成各种宣传队。农村里也有派系斗争，我凭自己的直觉，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和党支部保持了一致，但是和党支部对立的那一派也就成了我们的对立面。

这段日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现在回想起来有好些很荒诞的事。我举个例子。那时候中共召开“九大”，消息传来，村里准备开会庆祝。党支部书记叫吴殿生，是个老同志，1948年就参加了革命。老爷子现在已经七十多了，当年也就是四十多岁。他家离大队部不远，那天晚上，他第一个到了会场，看没人到，就躺在炕上休息。随后有人到了，一看还没上人呢，就问了一句：“别人怎么都没来？”他说：“哎，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不想这话被对立面抓到了：“庆祝‘九大’，你还整个‘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就说他对“九大”的态度有问题。这个支部书记虽然没被扳倒，但总有人给他捣点儿蛋。

有一年春旱，好不容易来了一场透雨，党委书记唐庚寅高兴极了，那能不高兴吗，久旱遇甘霖嘛！就站在公社院里顺口说了一句：“这场雨，比多少毛主席语录都管用啊！”当时有派性斗争，有人就揪住这句话不放，狠狠整他。这两件小事说明，当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多么不正常，已经完全政治化了，而且是被扭曲的。

我在生产队干得不错，后来公社组织“三宣队”，也就是干宣队、军宣队、贫宣队，我算贫宣队的知青代表。“三宣队”包括市交通局、市水利局的老同志，部队的一名小战士，还有贫下中农，一起在公社供销社搞“一打三反”。再往后，有干部提议：“继业这人表现不错，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上公社吧。”这样，1970年我就抽到公社去了，专门搞报道，是工分干部。我在公社待的时间不长，第二年就回城当工人了。

当时对回城是非常犹豫的，要不就不会有下一段儿第二次下乡的事儿了。我给家里人写信，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家哥儿四个，我是老大，家里有家里的难处，再说我已经25岁，也不算小了。老母亲当然愿意我回去。但是，在农村一晃三年，还没干啥事呢，确确实实觉得意犹未尽。我进的沈阳机车车辆厂是个国有大厂，铁道部下属的，条件很好。因为咱念过点书啊，念到高中，所以师傅也好，领导也好，对我都挺好。师傅真是手把手教啊，希望我成为一个优秀的铆工。但是回城以后，心里总是躁动不安的，总觉得离开农村这事儿干得不怎么样。从感情到思想上，一直扯不断和农村的联系，在厂里待了大概两年半吧，回去过好几次。

后来，到1974年的时候，我决定重新回到农村去，为此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包括最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在乡政府当干事，他们都表示支持，这样，我再次提出上山下乡的申请。当时有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就是在“批林批孔”运动[1]中，一些已经回城的知青提出“反潮流”的口号。南京大学政教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因主动纠正自己“走后门”上学的错误，申请退学并重新到农村插队落户，一举成为全国的典型。在他的带动下，各地都有一些已经上学、参军、进工厂的知青，闻风而动，重新返回农村。[2]

这第二次下乡，完全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并且深刻影响了我的终生。千里姻缘一线牵，再次下乡不久，我就结识了后来相濡以沫数十年的妻子沈庆林。

庆林是北京知青，女二中的，1969年下乡到吉林扶余。她姨是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后来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工作，有一个儿子，当时小啊，庆林比她表弟年长好几岁。她姨家老的老小的小，被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也就是插队落户，她姨就说：“庆林，你过来吧，在一起大家有个照应。”就把庆林的户口从扶余转到法库县秀水河子彭家堡大队，这地方在历史上还有点儿名，林彪当年在那儿指挥过秀水河战役。庆林是1973年转过来的，她在农村干得非常好，属牛的嘛，办事特别塌实认真。1974年就被抽调到铁岭的工厂了。用赵本山的话讲：“铁岭——大地方！”

这真是巧合。1974年，我从沈阳返回昌图。庆林不是招工到铁岭了吗，不久也从那儿返回法库去了。她对插队的地方也是感情特别深，虽然她姨已经不在农村了。当时还有一个知青叫王忠启，也从城市重返铁岭了，报纸报道过。我们三个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时的。回去时，地区知青办的头头对我讲：“欢迎完你，还要欢迎沈庆林呢！”沈庆林何许人也，当时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们俩一个在法库，一个在昌图，又是怎么认识的呢？

昌图和法库，同属铁岭地区。返乡以后，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就立我为省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省知青典型，庆林也成为省知青典型。这样一来二往，不断在一起开会，就给我们牵出了这么一段姻缘。1975年末，我们结了婚。婚后，我就从昌图转到庆林那儿去了。因为我那儿的条件比她那儿好，她就说：“你得先来帮我，在艰苦的地方干一番事业。”她那儿也有知青点。

二　卷入政治旋涡

1976年前后，辽宁的知青典型在政治舞台上是比较活跃的，像张铁生、吴献忠、柴春泽等人，都是全国闻名的人物。

我是怎么跟铁生熟悉的？1974年，当时沈阳农学院的校长苏才请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过去给毕业生讲一讲，不是面临“四个面向”问题嘛，现身说法吧。正好铁生从外面回来，听了我的报告，被打动了。铁生说：“我听报告一般听不到头，就出来了，但是你的报告我认真听了。”当时还讲了一些玩笑话，一起吃饭，这就算认识了。你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上写的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参与的几件事情，有些事我亲自参加了，有些事没有。有几个大事儿，我跟你简单说一说。

第一个，19名知青典型写“向邓小平猛烈开火”公开信。[3]好像是1976年夏天，接到省里通知，到现在的沈阳迎宾馆当时叫“安乐窝”开会。我记得主题就是“反右倾”。这个事肯定是从上头下来的，是团省委和省知青办召集的这个会，鉴于19人的影响，就把这帮人整去了，但有的人压根儿就没到会。

是谁做的传达记不清了，传达毛远新和李伯秋的讲话，李伯秋当时是省委书记。会上，第一次听到“邓纳吉”的提法。说“邓纳吉要重新上台”。就这个报告来讲，内容是触目惊心的，挺新鲜。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个提法？让邓纳吉重新上台，就是政变啊！会上是怎么提起写这封信的，始作俑者是谁？现在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原来说让春泽起草，他那时候不是忙着给武汉的知青张静写信吗，前后写了七封，大概是抽不出时间吧，最后这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事后他们回忆，都说：“那时候的印象，就是你点子特别多。”写就写吧，我就起了个草，起草以后给大家念了念，征求一下意见，就拿给《辽宁日报》的朱士良了，他当时是记者，让他修改去吧！

等发表出来一看，与原稿比，改动相当大。咱们打个比方：原稿如果是“民间艺术”，正式稿就是“学问派”；原文很直白，正式稿的文字已经很规范了。这封公开信的基调，就是批“邓纳吉”。先在《辽宁日报》登了，接着中央和29个省、市的报纸转载，全是在头版，产生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所以，“文化大革命”后给我定罪的时候，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朱士良后来也被“扫了一膀子”。但那是记者的本职啊，所以也没遭大难。

第二个事儿，知青“大闹”锦州市委。[4]现在的说法，这是在辽宁省委主要领导唆使下有组织搞的。首先从我个人来讲，去是去了，但肯定不是他们组织去的。我去锦州有啥前提呢？快到“八一八”了，为了纪念毛泽东接见红卫兵10周年，《人民日报》留了800字到1000字的版面，指明是给辽宁留的，写辽宁的知青典型。新华社记者苏树翘找我去了，说：“你跟我走吧，下去采访一下知青。”他知道我熟悉知青情况啊。第一站到开原，采访了黄旗寨公社的高晓天。接下来找谁？刘香玉和吴献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忠。为了采访，我俩就到黑山县耿屯找吴献忠去了。到那儿一问，都在锦州呢，说是知青开什么会，这样我们哥儿俩又赶到锦州。所以说，去锦州完全是偶然的。到那儿才得知，锦州市委有啥“问题”，知青们跟他们正掰扯呢。那天晚上，知青们坐在一起研究这个事，到底怎么办？我还谈了几条意见，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也是对的，用现在的话说：“有话好好说。”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挺困，说完就躺在沙发里眯着了。至于《人民日报》约的稿子后来写没写成，登没登我就不管了。献忠她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跟市里闹僵？也不清楚。这件事，献忠是当事人，你可以问问她。

第三个事儿，和铁生到省里表态。9月9日，毛泽东老人家去世的那天，实际上也是很凑巧的事，铁生送一个姓宋的毕业生到我那儿去。我是1974年入的党，那会儿在村里大队当书记呢。和铁生一起来的，还有县委书记。中午12点钟，接到县委电话：地委转省委办公厅紧急通知，下午2点转播重要新闻。一听，毛主席去世，大家都惊呆了。铁生对我说：咱们得去沈阳一趟。那时我俩正在公社呢。你就是编剧也不能编得这么巧。后来我一回想起这事来，自己都笑——惊叹偶然的力量。我俩就一起去了。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去省里听听消息，当时也急于想知道最新消息。从个人意识上，对毛远新、“四人帮”他们这条线，跟邓小平、老干部那条线的斗争，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从整个舆论上来讲已经反映出来了。

连夜赶到省里，先到省知青办再到团省委，铁生老弟“堂堂堂”就把华国锋给抖搂出来了。[5]实际在这之前，铁生个别跟我谈，就说过这个事。我觉得可能是他的一种直觉，铁生政治上的直感性是非常强的。是不是有上边的消息来源？不清楚。但他有他的想法。实际对华国锋，从我个人来讲，对他能了解多少？但有一条，对华国锋能不能当一把手，我当时确实怀疑。说白了，对华国锋有没有这个能力，是有怀疑的。他从中央的第六位，“噌”的一家伙干到第一位，而且在中央工作的时间那么短，能够驾驭这条大船吗？

后来到省知青办，铁生又在那儿说了说，就回去了。这件事，人家当场有笔录啊，因为你是反映问题去了，应该有记录的。可他反映的是中央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当时他讲：“我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讲的。国家开人大的时候，我也提出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抛开它的实质性内容，按程序来讲是合法的。他主要就是提了一个华国锋问题，华国锋接班不符合程序。现在难得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很难在符合程序的情况下谈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铁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一个“顶天”的政治问题啊。毛泽东老人家都对华国锋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了：“你办事，我放心。”你要反对，好哇，这还了得！是不是？你小子……他出了这个问题，除了有认识上的原因外，也有性格上的问题。

你问我当时对“四人帮”和毛远新他们产生没产生过怀疑，这要分两方面说，一方面是理论上认不认同，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是深信不疑的。另一方面，就个人来讲，在粉碎“四人帮”以前，我对“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印象并不好。对江青印象不好，对王洪文印象不好，对姚文元也是一般般。但我对张春桥的印象好，认为他理论有水平，文风朴实。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四人帮”的危害。归根结底，当时自己更适合毛泽东的那种思考方式，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防止共产党走向反面，共产党不要走向反面，不要从真老虎变成假老虎。我是这么个思维，这是最大的问题。

三　坎坷中见真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辽宁的知青典型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铁生、献忠、春泽、我相继被捕。以后，在看守所待了两年。

1977年5月，在锦州、铁岭分别召开批斗大会，我在铁岭，献忠在锦州，两地各有170万人收听大会实况广播。我们的罪名如出一辙——“新生反革命分子”。我一个人站在台上挨斗，现场有一千多人，整个电影院都坐满了，在下面各个乡架起大喇叭，设立分会场。我开过玩笑嘛：此生惟一的、也是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170万个工日。这170万人按半天工，二分之一还85万个工呢，那么我就耽误了85万个工日，多么大的损失啊。我是“反革命”嘛，戴着铐子。

给我定了八条罪状。第一条，跟铁生一起，反对华国锋；第二条，起草19名知青的公开信；第三条，“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么一说真是太狂妄了；第四条，说我说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哪有那回事？包括一个报告文学里面胡诌八扯的，说我拿着盒子枪啊什么的。那时候我还在昌图呢，就给我安排到法库去了。这报告文学啊，大概是在1980、1981年时写的，登在《人民文学》上，你可以去查。另外几条记不清楚了，反正一共八条。

关在铁岭看守所里，失去了自由，但是看守所的警察不错。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他们对我非常尊重。刚开始，几个人看着我，怕我寻短见，晚上四个人，上半夜俩人，下半夜俩人。其实我进去第一天，躺下就睡着了。就那么过了两年多，在看守所读《毛选》、《新华字典》。

就像你书里写的，政府后来对犯了错误的知青典型重新落实政策。“反革命”的帽子是没有了，但在监狱的两年最终没个说法，啥也不算。原先宣布开除党籍了，后来又改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取消党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籍”。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损失也给了一些补偿。工作上是全省范围内重新安排，基本是哪儿来哪儿去。我就回了沈阳。献忠呢，让回抚顺，大概还包括战风梅。这几个人里，铁生判得最重，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回到沈阳，一般单位不敢接收。后来分到了建工局，也分不下去啊，有的公司不敢要。在建工局各大公司的经理学习班上（当年还办学习班呢），沈阳工业安装公司经理陈兴久先生就说：“我要。”按老百姓话讲，我这是“遇到贵人了”。他不仅表示要我，在经理学习班上还讲：“他这个人特别有才。我不让他当工人，直接到我经理办公室当调研员。”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事情。陈兴久是怎么了解我的？直到他去世，我们俩都没谈过这事。这情况还是后来听当时主持会议的人说的。两三年前他去世时，我在献给他的花束上写了一句：“献给曾经给予我们重大帮助的人，献给一位智者。”属名是我和沈庆林。

在经理办当调研员不到一年，就有人向上写密告信，说陈兴久用人不当，而且在使用上无所顾忌，比如经理办公会，让我做记录。实际上也仅仅是做记录而已，可是就有人写信。后来我才知道，这封信也被有独立见解的人压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压不住了。建工局出面，派了一个处长来，直接找。陈经理万般无奈，就说：“这怎么办？你看看先上哪儿去啊？到检测站去吧。那里工作条件较好，收入较高。”

在经理办，还结识了一位老同志，办公室主任，叫尹桂云。老太太对我非常好，到现在也是，忘年之交。老太太本身的经历就很曲折，是经过风浪的人，总是鼓励我，叫我看远一点儿，不要在意身边的是是非非。总工卞继周，老南开大学毕业的，拍拍我的肩膀：“啊，不要当个事儿啊。”就这一句话，我记了这么多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安装公司的小报上提了一句话：“长者风度。”老爷子本人就是长者风度，虽然只是一句话，让我受用一辈子。这样我就下了基层，搞探伤，也就是钢铁探伤，用X光，后来用超声波……

干了时间不太长，就干预算员。让我干这个，人家头头也得下决心呢。好像你不当工人就不行似的。过了一段以后，混乱稍稍过去，陈经理说：“继业，你回来吧，回计划处吧。”当时我就提了“三不”：不熟悉工作，经济不合算……表示推辞。陈经理说：“你在那个地方憋着吧，视野太窄，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他的意思很明显，是希望我看得远一点儿。他是石匠出身，当过沈阳市建工局办公室主任。他首先是有天赋，有潜质，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学习和思索。就是现在你到公司去打听这个人，口碑特别好，帅才，而且他的意见和战略决定，让全公司受益匪浅。比如我们现在有个大的基地，有沈阳中山公园这么大，就是他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生前做的决定，把那个倒闭的厂子收了过来。

1985年左右，我回到计划处。陈经理多次想提拔使用我，也向上面提过这个问题，上面的态度是不敢定，既不同意，也不反对。陈经理毕竟也是一个历尽风霜的人，最终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就在计划处一直工作，后来爱人和大孩子出国了，我到美国待了两年多。1994年回来后，安装公司对我应该说是相当不薄，这个时候经理已经换了，叫郭树升。老爷子铆工出身，那是什么人物呢？我评价：“养子当如孙仲谋，交友当如郭树升。”那真是侠肝义胆。多年前，他还在分公司当一把手、我们彼此还只是初交时，他就对我有“雪中送炭”之恩。现在回来了，应我的要求去搞教育，后来他又亲自提议，叫我去理化检测中心当一把手。那时候，我的身体不太好，刚做了大手术。我说：“身体不行，不能当一把，让我当二把吧。”老爷子这个决定，说实在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肯定得到了公司其他领导的支持。当然有人会说了，这是你的人缘好，能干。但首先是郭老爷子铮铮铁骨，没有这一点，就我个人来讲，再有能耐也是白搭。后来把检测中心和培训中心合在一起，继续让我在这个地方当一把手。

干了两年多吧，郭老爷子退了，原来的党委书记鞠保义兼董事长，他上来后，就找我，说：“继业兄啊，你上总公司吧。多挑点担子，任副总经济师，把企管这一摊搞起来。给我当参谋，出出主意。”我在搞培训时，工作得到了建设部、省厅的好评。在计划处的时候，获得过国家安装协会的现代化管理二等奖，省、市的一等奖。那时高级职称也考下来了，领导挺器重，这不，一直干到现在。

这20年，有三个人——陈兴久、郭树升，鞠保义，还包括现在的总经理王长利，都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帮助。

回过头来再说说庆林。我受难的时候，数她受的压力大。她那会儿还在农村。坦率讲，当初我们结婚时，确实可以用“无私”来形容自己。那时候完全有条件盖新房，县里已经讲了：你们可以盖房子嘛，安家了嘛。但我们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这个念头。现在回想起来，一个是观念问题，另一个呢？不懂得生活。就在知青点旧房安了家，后来才引发了一连串的厄难。

把我抓起来时，大儿子出生才73天。村里大喇叭整天对着知青点播呀，净是批判我的内容。但是庆林讲了：“我一听啊就知道，哪些话是你说的，那些话是瞎编的。”其实，1976年前后，我写的东西非常少，你去琢磨吧。在这一点上，我是很谨慎的。你知道，我不是不能写，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几乎不写，主要是没那个兴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大队党支部书记那时还年轻，他愣把庆林撵出了青年点，行李扔到街上。那会儿孩子才多大，刚周岁吧？庆林没有住处，只好花几百块钱买了间小“趴趴房”。她为什么不带孩子回北京？一个是她说“我得等继业的结论”；另一个是跟她“死心眼”的性格有关，不等出个结果决不罢休。为我的事，她一直告到公安部去了。她的性格特倔，人家调查的人拍桌子，她也跟人家拍桌子。买的破房子很快塌架了，只好搬到老乡家去住，她是“反革命家属”啊，大队又给老乡施加压力。没办法，只好又买房子。

最后我们临回城的时候，把当年扔她行李的那个书记请去了。他对庆林说：“老姐，实在对不起！我后半生再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了。”他年轻，总还是归于年轻吧。我遭难的时候，有四家贫下中农，叫孩子和庆林做伴儿，天天这样。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们。去年招工的时候，我还特地跑回去。为啥到法库招工？到别的地方也可以招嘛。就是因为感念法库的乡亲。下去后，对秀水乡干部讲了：你问一下这四家，看他们有没有适合的孩子，有适合的孩子，在可能情况下，我肯定会要。我想应该报答他们，他们救过庆林嘛。

我出狱返城，庆林也回来了。比较起来，我的命运是比较好的，挺顺的。但是她老是挺曲折，分到安装公司锅炉处下属的一个单位，效益不好，还是个“小集体”性质。这“小集体”的帽子对庆林刺激很大。铸炉的活儿特别累，给锅炉砌砖，但她特能干。休息的时候，大家都玩儿，只有她例外。后来有人讲：沈大姐坐着就看书啊，学英语，背单词。

到沈阳后搬过好几次家。先回老妈家，弟弟结婚时，没地方住了，我住到公司机关，她回姨家，两人就分开了。尹桂云当办公室主任时，给我在南运河旁边找了一个简易房，就是临时房，油毡纸的。后来清理南运河，把简易房都扒了。那时候真到了非常惨的地步，门全扒了，雪花都飘进来，就剩我这一间了。我们没地儿住，只好把大孩子也托付出去。二孩子跟着他奶奶呢，大孩子托付在她姨那儿。我们不想让孩子看到生活是如此残酷，不想让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其实大儿子一直跟着我们俩。那时候，我真是仰天长叹，热泪纵横啊！

庆林她性子急啊，闯建工局的办公会去了。领导班子正开会，她去了就开门：“这里谁当官？谁坐镇？我是沈庆林。沈庆林不知道？就是刘继业的媳妇啊。”她找到局长，把困难一说，局长找来办公室主任，这个老头立刻给公司打电话，才暂时安排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建工局长后来还问这个事呢：“落没落实啊？”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给我们安排到沈阳郊区的一个基地，是个水房，打水的地方。那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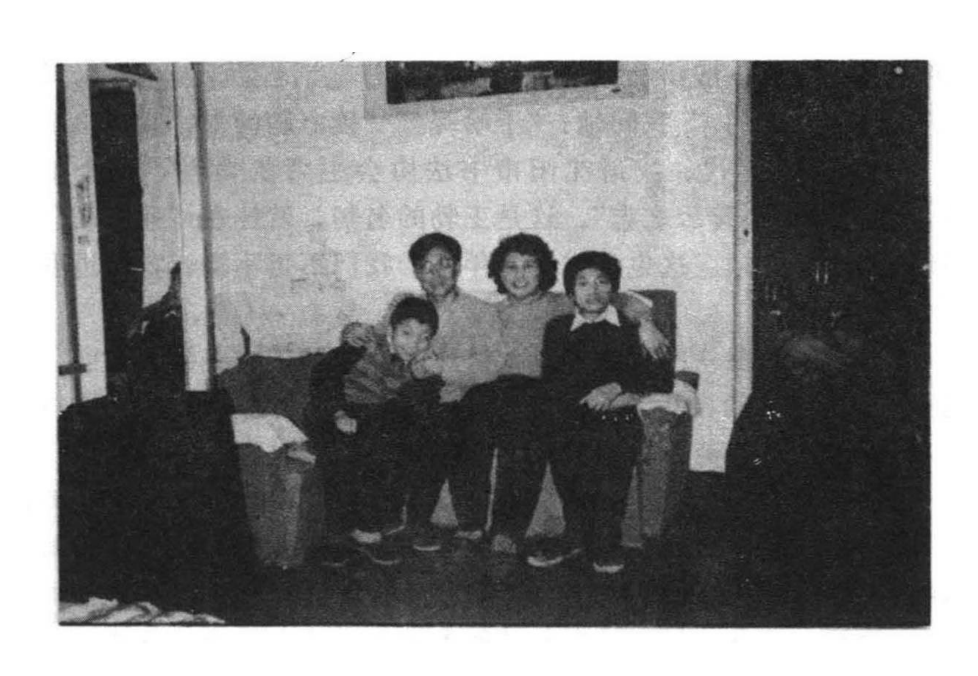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时间，我们都在自学，10月份自学考试，小屋里冷啊，拿小褥子把膝盖盖上。夏天热的时候，复习功课，一手拿书，一手拿扇子。轰啥呀？苍蝇，那地方脏，苍蝇嗡嗡的。那时，我干活儿在八棵树，听课到烟厂，你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这路线整个斜穿沈阳城啊。干活儿干到4点多，骑上自行车往烟厂赶，有几十里地，听完课再赶几十里地回住的地方，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学习整整五年，风雨无阻。

庆林学英语，总是回到家一边做饭一边听。睡觉前还要听耳机子。四年就是这么学的。她报的是大连外语学院，自学考试。后来单位看她学英语有点儿成绩了，就把她调到公司开发办，搞一些文字翻译工作。有一件事对她刺激很大：单位派人去孟加拉考察，按理来说应该让她去，她搞翻译的嘛，但是就因为是刘继业的爱人，不让去。她说，孟加拉算什么？我还要去美国呢！那是1990年的事。另外，有人动不动就用“小集体”的身份要挟她：“你是小集体的，不行就打发回去……”一件很简单的小事，都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对于这种等级歧视，她确实是深恶痛绝。

后来水房不让住了，又搬到雅号叫“亚明湖”的地方。那地方名字倒是好听，其实条件很差。地势低洼，人讲话了：下起雨来，大马路比小马路高，小马路比胡同高，胡同比院高，院比屋高。我们的后窗户和后边的地面几乎在一个水平面上，是个小平房，大概有13平方米的样子，是伪满时期的马圈。那时候我老母亲也在那儿，她领着两个孙子在里面“坚壁”睡，我和庆林睡折叠沙发。安排他娘仨儿先睡了，安排好了，我们才能把沙发拉开。有朋友说：“你们家真不简单，这样的条件，出了两个大学生……”我开玩笑说：“咱们家门槛子高啊。”门槛子不高不行啊！雨下大了，外面就成河了，得用高门槛挡水。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锅碗瓢盆丁零当啷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全家福

庆林的父亲是民主党派，1957年被打成“右派”，实际上她们家是书香门第。父亲的经历和自己的处境，对庆林是个刺激。她说：“为了争这口气，也非得出去。”她是1991年考托福出去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人一看见她，都乐啊。她1949年生人。人家问：“多大了？”“42岁了。”她回答。“42岁，女的，还出国念书？”但是我理解她，只要有高尚的理想，就要奔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管遇到多大困难！

这些年，我们的情况逐渐改善。庆林到美国学的是工商管理，后来改行学电脑，把电脑工程师的证全考下来了。现在，她在美国一家医院兼养老院，就是护理老人的那么一个医院，做电脑工程师。1992年，大孩子和我一起去美国，他在那儿读高中和大学，就留在那儿了。现在二孩子送北京念书去了。我是地道的中国造，死心塌地的爱国主义者。前年我又去了一次美国，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年我留下一句话：“为了全家整体素质的提高，需要有一段牺牲和拼搏的时光。”

庆林在美国也受了不少苦，最后能在那儿稳定下来，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真有一股拼命的精神。有一次打电话告诉我：“三天没出门了，披头散发的。”我问她：“干啥呢？”“读电脑的书，鼓捣电脑。”

20世纪80年代，我请沈阳市书法协会主席董文写了一个条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王勃的名句，就挂在“亚明湖”的陋室里，用以自勉。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折不挠、积极进取的一个概括吧。

这些年，昌图一次没回去过。法库呢，大孩子去美国读书前，为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让他记住自己的出生地，带他回去了一次，让老乡帮他挖了一抔土，带走了。他在美国学的会计，大学毕业后，对事业也很投入。

19名知青典型，当年红极一时，现在的情况怎样呢？凡是知道的，最后提一下。献忠，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她现在还属于创业阶段。春泽在赤峰，电大老师。铁生是事业有成了，禾丰公司的股东，他原来是自己干，后来和其他人合伙，前一阵当过总裁。刘香玉情况不明。战凤梅在丹东电大当老师，研究“钱学”，前年见到她了。戈克俭在鞍山，在乡镇企业局任副局长。张强是省科委副厅级巡视员，前一阵子担任综合处处长。高晓天最近没消息了，原来在省乡镇企业局。姚德纯，大家开玩笑，说他是“世界名人”了，当年是赤脚医生，现在是世界中医学会理事，前年在法国拿了一个什么银奖，自己有股份制医院，在沈阳。孙贵勤如果现在没退的话，是本溪市草市政府的总支书记。王冬梅在大连当记者。汪涛干得也不错，在沈阳市监察局当一把手，当局长……总起来看，知青典型多数还干得很不错。

但是，从深层次看，已有很大不同了，而且将继续有不同——歧路亡羊嘛。19只羊，各有各的路，各有各的心态。我目前的心态如何？诗言志。我就把去年写给一位小友的诗——《清远》，作为结束语吧：

大雪静飘独品茗，
三山四水二指掌；
蟹眼珍珠松风紧，
齿颊生香任督通。
细啜不记利害事，
豪饮谁计是非名？
英雄回首羽仙志，
不忘携手一茶僮。

---

[1]1974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把批林彪与批孔孟之道连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形成一场新的政治运动。

[2]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38—545页。

[3]指辽宁吴献忠、柴春泽、张铁生等19名知青代表联合署名的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刊布于1976年7月13日《辽宁日报》，后经姚文元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58—559页。

[4]关于本事件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560、569页。

[5]春野、方雷所著《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5页）收有张铁生9月9日在辽宁省团委的谈话记录，可以参考。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我想用这个证明，我没有倒下”

——吴献忠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刘继业

地点：沈阳市翔云楼宾馆1110室

时间：2002年3月29日上午

［采访前记］　在当年的辽宁知青典型中，吴献忠是最出名的一个。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我用了不少笔墨，写了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在毛远新等人操纵下的种种作为，所依据的资料，档案也好、报纸也好，都是官方的。这种资料来源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同样是这个人，“文化大革命”中的传媒可以把他吹得天花乱坠，“文化大革命”后的传媒又能把他描绘成跳梁小丑。典型，实际是任由当权者塑造的玩物，政治上的利用价值一旦丧失，也就变得一文不值。那么，真正的吴献忠是怎样的？这二十多年，她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通过刘继业的介绍，吴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献忠对我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显然“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已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变更的事实。关于那段历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将来还是有人要研究这段历史的，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资料。这番话，可能打动了她。



右三为美国南加州知青联谊会会长邱新睦，右五为吴献忠，左二为刘继业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老知青们的聚会（右一为吴献忠）

献忠一旦打开话匣子，就是滔滔不绝的，语速很快，说明思路的敏捷。我请她重点谈了几个事，一个是1976年前后辽宁知青典型参与的政治上的几件大事，一个是她狱中几年的生活，再一个是她近几年创办食品有限公司的状况。

通过谈话，我发现她是一个有个性、执著而缺少圆通的入。毛泽东曾提倡过那种在命运面前撞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的精神，献忠所富有的大概就是这种精神。她一再强调，对以前的所作所为从不后悔，因为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决定的，这包括下乡不后悔，不上大学留在农村不后悔，甚至蹲了监狱也不后悔。

她的执著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我问她：共产党已经不要你了，那你还信共产主义吗？她肯定地说了一个字“信”，还说党早晚会把她请回去的。我又问：你现在是公司的董事长了，继业也是股东，按过去的理论，这可是资本家啊，难道跟你的共产主义信仰不矛盾吗？她的词儿来得真快：“马克思早就说过：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前夜。”换句话说，当资本家也能保持共产主义信仰，恩格斯不就是资本家吗？我又问了：许多知青下乡初期，跟你的思想一样，以后在农村多年，目睹社会的黑暗，对“左”的东西逐渐有了认识，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你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没有注意到种种黑暗吗？她的回答更绝：“现在社会上的黑暗不是更多吗？！”总之，纵使你有千言万语，反正她有一定之规。

说实在话，我与献忠在思想观念乃至对历史的看法上有着深刻的歧异，但对于她那种执著和精神上的独立，不能不从心里给予足够的尊重。在一个日趋多元的社会里，为什么偏要强求大家想法一致呢？只求一个“真”字，不是就足够了吗？当然，也会有入认为她的看法迂腐，或者顽固。

献忠创办企业经历了许多困难，同样百折不挠。她说，如果有了钱，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一座知青大厦，从服务到设备，什么都是一流的，有钱的知青来，没钱的知青也来，大家欢聚一堂……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样美好的理想，同样博大的胸怀，我衷心希望献忠梦想成真。

一　当年的是与非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976年，辽宁的知青典型在政治上比较活跃，或者说出尽了风头。那时候，他们是时代的宠儿，获得了巨大的荣耀。但是随着形势的巨变，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又成了历史的"罪人"、"四人帮"的爪牙，甚至十恶不赦的"新生反革命分子"。关于这段历史，自有历史学家去研究，我这里，只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历史的真相，做一点点补充。

第一，1976年锦州知青会。关于这次会，继业已经从他的角度做了一些说明。作为当事者之一，我了解的情况比他多一些。

最初，省知青办准备在锦州开一次知青代表会，就通知了我，但我根本不想去。一般的会实在没有办法的，我才去，那时候还在地里干活儿呢，确实是想争分夺秒，因为事情挺多，要干点儿实事。所以，直到知青代表会开会了，我还没到会。有多少人参加会，也不清楚。知青办知道我挺犟的，不去就不去吧。但是后来春泽去了，铁生也去了。春泽去了不说，还给锦州市委、知青办提意见：你锦州开知青会，吴献忠是锦州的典型、全省的典型，她都不参加，你们这个知青会到底是怎么地？[1]这样一来，知青办受不了了，赶紧打电话，说："你赶紧过来吧，春泽他们都过来了。你说你不参加，这有点儿说不过去呀。"县委现派车到大队把我接过去的。

那时候，会议已经开了一天半了。市委的报告引起知青代表的不满，给市委领导提了一些意见，关系紧张了一些，但是根本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抢话筒这个事确实存在，这个青年想说什么，那个青年想说什么，这事有，但是根本就不是说想夺市委的权，造市委的反。就是针对市委某些领导，他的子女不下乡，对"走后门"现象提了一些意见。仅此而已。但是你要看后来的报纸，把我写的就是"预谋夺锦州市委的权"。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有啥预谋？根本咱就不想参加那个会，不想夺市委的权啊。谁想夺权呢？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咱锦州后来不就发生地震了吗，一地震，会就散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锦州夺权”成了我的三大“罪状”之一。进了看守所，找我谈的时候，我把知青会的全过程说了一遍。办案人员原先以为我参加这个会是有预谋的，是要抢班夺权。我在交代材料中写的：“没有预谋。”纯粹是偶然，根本就不想参加这个会。春泽一去给烧了把火，才把我给煽去了。如果像报纸上说的那样，我是什么“总指挥”，能事先没有预谋吗？能不按时参加会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办案人员了解了情况，才明白了。

第二，1976年19名知青典型写公开信的事。当时省里开知青会，详细过程记不太清了，把我抓进看守所，没有把这作为一条。在公开信上署名的19名知青典型中，我的名字排在第一。说心里话，那些人都了解我，我这个人是实实在在干的，大伙儿都认为我和有些人不同，挺克己的。

第三，参加工农干部学习班的事。毛远新办的省工农干部学习班，主要目的是培训青年干部。学习班吸收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参加，也是为市委、市政府的班子培养后备力量。现在要培养哪个干部不也是上中央党校，上这个党校那个党校，让他学习吗？当时去的是南湖的党校。学习班后期要到各个市实践，进行调查，参与市委领导班子的会。给我们这个权利，要不咱们能参加市委领导班子的会吗？

我是第六学习组组长，带领六名成员组成赴锦州调查组。调查完了回到沈阳，毛远新亲自听汇报，我们讲了锦州市委班子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汇报过程，也不像后来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金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得纯是锦州造反派的一个头，也参加汇报，讲了一通，他的派性比较严重。毛远新当时就批评他：“金老师，你不要搞派性嘛。大字报是一个武器，无产阶级可以用它，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我认为这话没什么毛病。把我抓起来以后，问我毛远新的讲话内容，我说你就查我的日记，市委领导、省委领导讲话我基本上都记，记的速度比较快。我感到毛远新的讲话超过了一般人的思维。不是说毛远新他怎么怎么地，我这个人向来就是这样，在牢里戴着手铐子我就这么说。有人说：“你态度得好。”我说：“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好就是实事求是，如果你要我说什么我就顺着你的思路说，那就太不好了。”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主席逝世时，我是县常委，同时在大队当书记，在生产第一线。铁生上省里反映对华国锋的看法，我并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之间再没有联系。

很快，在锦州召开了县、团级干部打招呼会，传达中央的文件，主要是说粉碎了“四人帮”，华国锋当了主席，毛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还谈到毛远新反对毛主席。听完了文件，组织座谈，叫大家表态，就是让表态坚决拥护粉碎“四人帮”啊，欢迎华国锋当主席呀。因为我不理解，所以没表态。我当时认为，要说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当主席，这个我没有理由不拥护，要是你让我像无限信赖毛主席那样，对华主席无限信赖、无限崇拜，四个无限嘛，我做不到。我的“反动言论”的原话是这样的：“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让华国锋当主席，我拥护，但我没达到无限信赖。”后头还有一句话：“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经过长期实践，林彪不是写在党章上了吗？王洪文不是被主席选拔的吗？后来怎么变了呢？培养可靠接班人，不是得经过长期实践才能看出来吗？”接下来还有两个问号：“毛远新能反对毛主席吗？华国锋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这要经过长期的实践。”

在党内应该可以说话呀，按组织程序，我这么说没毛病啊。说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我确实不相信。我跟毛远新在省里开过几次会，开“十大”我们也是一个组的，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对毛主席的言论。另外，在中央文件里也没举出确凿的证据让你相信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不可能反对毛主席一样，也不会相信毛远新反对毛主席。我这些话说得太直了，因为我就没有想当官啊。

监委专门给我办了一个学习班，帮助“转弯子”，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公社党委书记、县里头一些部门的领导都来找我谈话。县委书记对我特别好，他说：“献忠啊，怎样了，你得赶紧转弯啊，你要不转弯，要想打倒一个人那还不容易吗？”公社党委书记说：“献忠啊，你得转弯啊，咋的你也得转弯啊！”我说：“你要是说服我，我就转弯。你说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服不了我，我不可能糊里八涂地跟着你们说。”结果我把观点一说，这些人全都同意我的观点了。后来这些人一下子全都给打倒了，县委书记撤了，公社党委书记也撤了，团县委书记、县妇联主任等等全部一下子都拿下了。他们同情我，有些还是朋友，当然他们被撤职可能也有其他一些原因。结果，二三十年没有再起来。

二　狱中三年

我在县里办学习班，一两个月后仍没转弯，最后就进了看守所，当时定的是“现行反革命”啊，一关就是三年半。抓我时定了三条“罪状”：一条是我不相信毛远新能反对毛主席；第二条是锦州知青会“预谋夺市委的权”；第三条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转弯”。

我这个人是这样，在你没说服我之前，我不会盲目服从的。包括到现在，有的人对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我从来不否定，我这个人挺自信。对过去走过的道路，包括不上大学、不去当工人、扎根农村，有人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因为那是我自觉做的。又问：“你进看守所，当了三年半犯人，你后悔不？”我也不后悔。我走过的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自觉去做的。那些盲目的人才会后悔，自觉去做还会后悔吗？我不后悔，因为我认为，在看守所的这三年半是一个难得的生活经历。

在锦州，按“现行反革命”批斗，连续转十多个公社，每天一个公社。上午四个小时在台上低着头，让我坐着我也不坐，坚持站着。会上有人给我乱扣一气，根本不是我的事，都扣在我身上。不管他们说啥，我不吱声。专案组这些人挺好，他们知道有些人的话特别离谱，明明不是你弄的事，他给你捏造啊。专案组怕我想不通啊，事先提醒我：批判的时候，有些言辞可能有水分，可能让你接受不了……你要正确对待啊。我说我想得最开，能正确对待。他们批判我，把什么罪责都安在我身上，对他们是一个解脱，横竖我一个人蹲看守所啊。这些人当然都是一些熟人和朋友，不是熟人和朋友能批我吗？

有一次，县里组织知青批判我，事先公安人员告诉我：“今天的批判会，不像别的场合，你要有思想准备。”因为知青好冲动啊，他们担心知青动手打，或者是骂，担心我受不了，因为咱毕竟属于政治犯，过去从没受过这种侮辱。当时真想不通啊，和那些贪污盗窃小偷流氓啊关在一起，跟她们躺在一个床上就觉得对自己是个侮辱，怎么能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后来自己尽量调整，也就想通了。公安人员怕我理解不了，事先给我做工作，我说：没事，我相信党，相信政府。

到了县政府，就见人挤得满满的，都在大门外头。我进不去了，前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面没有道啊，警察就在前面开路。知青们都紧挨着我，都想看到我啊，谁也想看一看。等把我带进会场，两边的人都不在座位上了，挤到道两边，就这样好不容易才走到主席台上。让我感动的是，这一道上，没有一个人骂我，没有一个人吐唾沫，更没有一个人动手打我。就是这一下，公安人员特受感动。过去开会批判那些作风不好的，这个那个的犯人，都是满身唾沫，打的什么是的……

在黑山监狱的三年，跟继业的情况一样，就那么关着，也不定罪。以后宣布开除党籍，跟刑事犯关在一起，什么流氓啊、小偷啊。她们对我不错，咱和她们也不一样，她们也用不着提防咱们，我认为我是知识分子。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党要我当学生，我就当个好学生；党要我下乡，我就当个好知青；党让我当干部，我就当个好干部；党让我当犯人，我就当个好犯人。出狱以后，要我当工人，我就当个好工人。

在狱中，政治上没受什么侮辱，他们不打你，也不侮辱你，就是没有自由。每天到时候发饭，一坐就坐到晚上，然后睡觉。我生性喜欢热闹，有的人理解不了，有一次，看牢的人大声叫：“四号！”她叫你号啊，还说：“现在你的心情如何？那个时候你在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会议，今天你在地狱。那不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吗？”还说，“有什么感想，待会儿告诉我”。对她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开始的时候天天批斗，还不错呢。后来也不批斗了，天天在里面这么坐着写材料，跟谁握过一次手都要写清楚。像“四人帮”、毛远新、李素文等人的情况，都得调查啊，天天还得接待那些来调查的人。环境太潮湿，见不到阳光，上茅子出去也就是一会儿，成天就这么坐着，能不得病吗？判刑以后在劳改队，还能够活动，见阳光的机会还能多点儿。

我始终有信念，如果没有信念，在狱里三年多怎么能熬过来？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因为牢里潮湿，总也不见阳光，结果得了两个病，一个手一沾凉水就来例假，比如洗脸洗手沾点儿凉水，或者洗衣服用点儿凉水，只要一沾凉水就来例假。再有一个，一喝凉水就拉肚子，因为水污浊得不行，而且饭发到女号的时候，基本上就凉了，有的时候水还不开。这样，一喝就拉肚子。

到后来，我的一条腿就不能动了，失去知觉了，穿裤子时，得把腿这么抬着穿，走道呢腿就这么拖着，差一点儿就瘫痪了。如果我没有毅力，那就完了。那么我得感谢谁呢？有一位姓刘的管教对我很好，她了解我，她在看守所期间，处处照顾我。自从我进去以后，女犯洗头次数就增加了，每个礼拜洗一次，以前是一个月一次。这样，在看守所期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间，头发愣没生虱子。有一次得痢疾，每次去厕所都必须报到，一会儿一报到，看守就说："你不用报到了，想去就去吧。"后来刘管教带我到县医院，住了几天院，让我特受感动。但还是落下一个拉肚子的毛病，所以我现在走到哪儿都带着水杯，特别讲究卫生。

提起这个病腿，还要感谢一个人，是省里公安系统的一个老头，是处长吧，到锦州看守所视察工作，正好赶上我们女号放茅，见我拖着条腿就那么走，他就走到我跟前："你过来，你这个腿多长时间了？"我说："快半年了。"他又问："以前有过这毛病吗？""那哪儿有哇。"他就知道这是受潮弄的，再不采取措施，将来就是出去了也是残废。

回牢房不久，听到走廊传来皮鞋的"咔咔"声，原来所长陪着老头来到女号。把门一开，老头说："你过来，从外表来看，你这不是大病。"他马上吩咐所长："从明天开始，每天早上你们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放她出去，让她晒太阳，晚上下班之前，再把她叫回来。"这半年，我出去晒太阳、活动，包括大家告诉我怎么锻炼，渐渐的，这条腿又有了知觉。我在看守所里帮着干点儿活，给食堂买点儿菜，帮着送送水。咱干啥都认真，又累得患了骨膜炎。

等把我放出来的时候，跟我谈，说是免予起诉，狱中的这三年半算下乡工龄。经济上是这种情况，其他人不都是在找吗？要求补偿。实际上这事儿你不找，也没人给你办。说老实话，我根本就不去找，当时没考虑到钱的问题，我对这个就无所谓。但是党籍没恢复，原来不是开除吗？最后改成劝退。要我签字的时候，我签啦，但是怎么签的呢？——"我不同意吴献忠被取消党员资格。理由有三：第一条，我不是所谓'三突'突出来的党员，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第二条，党章规定，党员犯错误，有开除、严重警告，我既然没有受处分，你有什么理由取消我的党员资格？第三条，我本身够一个党员的标准。"后来纪委的对我这么说："我们都知道，你够个党员。"我的情况，黑山、锦州的党政机关都清楚，他们说："我们都知道你够，但是你也得跟着大气候，谁也不敢替你说这话。"

三　后半生的选择

我是1980年7月放出来的。当时征求我的意见："你出去以后准备上哪儿？"我说还是回农村。他们说："情况都变了，你回农村也没有知青点了。再说了，你回去怎么也得包几亩地，但是让你包几亩地你还反对。""如果不能回农村就去农场。"我说，还给省政府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农场，只要搞农业就行，我当时就是这个愿望。随后让我在黑山县棉织厂待分配一年。后来省里特批，根据我的要求，分到锦州农业科学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研究所，是国营单位，不用分红，也不用搞包产。我就在那儿当了一名农民工。

开始分到大豆组，然后是花生组，都是油料作物嘛，一块儿试验，一块儿不实验，搞对照，都让我管，连烤种带其他工作，我全部都给拿下来了。一个苗园里一个垅要有50棵苗，我留55棵，最后呢，每棵苗都长得绿油油的。收获的时候，我一个人就扬了两万斤豆子，累得够呛。别人都惊呆了，一个女同志，怎么弄啊？有一次评选“你心目当中的好党员”，有人竟然提我。我说：“我也不是啊。”“那是我心目中的党员。”为了能恢复党籍，一些好心人帮着我四处找，我说：我自己认为我是个党员，至于组织上承认不承认，那是组织上的事，而且我相信，党总有一天要找到我的。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恢复不恢复，无所谓呀。

我是怎么想的？党内有些干部贪污腐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但这是个别人的事。我相信，人民心目中的党员，应该是大公无私的，不谋私利的。因为有这种信念，就能把社会和一切问题看得很透，对于个人的利益得失无所谓了。

我在科研所一待就是10年，那段时间相当长啊。

20世纪90年代初调回抚顺市，很大程度是因为婚姻的破裂。我们俩是在1982年结婚的，婚后的生活，我发现我们俩的距离太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出了离婚。孩子1983年1月出生，当时只有六岁，法庭要调解，我说：如果法庭不同意我们俩离婚，那我宁可再蹲20年监狱，决不再跟他过一天。我这个人不像有的人闹离婚，谁一劝又回来了，我不是这样的。

孩子的爸坚决不同意离婚，说：你应该给我一次机会。我说，不能再给你机会了，机会给你太多了。而且我忍让的程度，一般女人都达不到，一般的情况下，我能忍的都忍了，可是实在让我忍不下去并提出离婚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了。本来法庭都是劝和，但看我的决心挺大，却决定劝离，劝孩子他爸说：“你就同意吧，你俩的差距太大了。”他说：“我不同意，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同意，吴献忠是最好的妻子。”

他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家挺困难的，我住了这么多年，一点儿都没有隔阂。他爸爸过生日，我骑自行车跑很远，买点儿肉，买点儿菜，给他包饺子，处得都不错。他爸说：“如果你俩离婚的话，宁可跟我儿子断绝关系，也不和你断绝关系。”他弟弟也是这样，跟我处得很好。

法庭判离婚，征求我对家产的意见。我说，家产我一点儿不要。孩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子他爸说啥呢？——“我也不要”！一般打离婚，都是夫妇俩争家产，我们却是互相让。他们又问：“孩子谁要？”“我要！”我要孩子，但是抚养费不要。我要得起孩子就能养起。最后法庭判了，孩子归我。

回到抚顺，市里挺关照，让我挑单位，说：“你经过这么多年的坎坷，照顾照顾你，效益好的工厂啊都可以……”我说，还是搞农吧，只要是农口就行。那时，咱们农垦局准备在抚顺办一个百万鸡场，当时还是一片平地，由荷兰投资，搞联营。我一看，就相中了这个单位。为了新的创业，孩子也没管，留给我妹妹，我就上班了，一直干到整个鸡场建完，盖了饲料厂。

后来为什么又从鸡场退出，创办现在这个知青食品公司呢？

作为知青的典型，我始终认为这不是个人的事，实际是这一代人的代表。从看守所出来以后，就想为知青做点儿什么，一直没有机会。我寻思，通过我的努力，将来搞一个知青大厦。现在有农垦大厦，有工会大厦，怎么就没有一个知青大厦呢？如果有了这么一个大厦，从设计到建筑，直到整个经营，完全按照我所想的那样，也不是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图纸的设计要独特，因为它要给历史留下点儿什么；整个的服务要是一流的，要有最低廉的价格，让知青有钱的来，没有钱的也来，让所有的知青都有机会来我这儿集合。我一直都在勾画这个蓝图，让它越来越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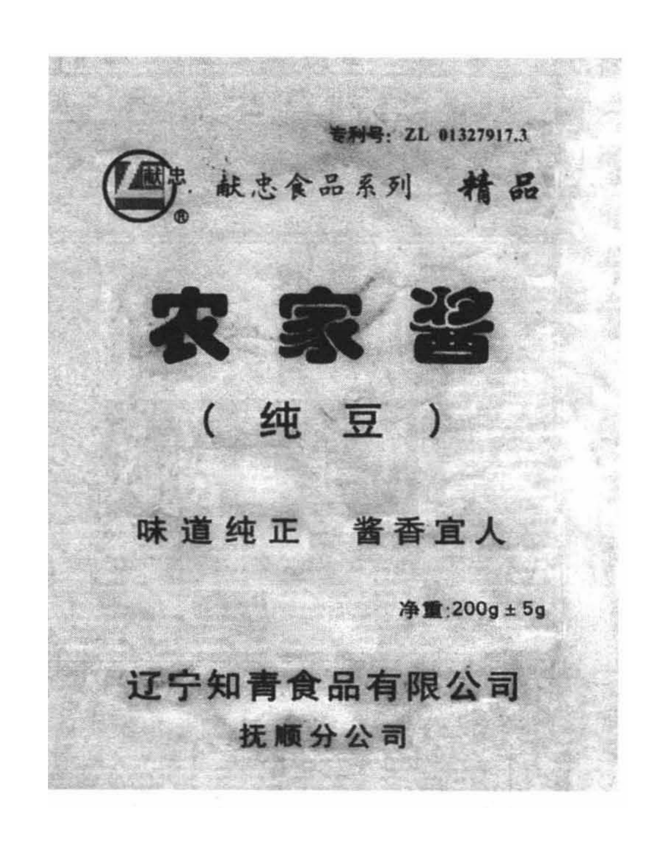
1998年9月，创办了辽宁知青食品公司，是股份制，由我担任董事长。当初办这个公司，就想到用“知青”这个名称，商标也是我自己花很长时间设计的：外边一个圆，中间一个方，外圆内方，圆代表天，方代表地，然后在这个方形图案上有一条“L”形的路，“L”不就是辽宁的“辽”的第一个字母吗？另外，老知青的“老”字不也是用这个字母打头吗？这是我的创意，不解释，别人看不懂。我到北京注册时原想用“知青”品牌，加急查询的结果，“知青”品牌在四川已经被注册了。怎么办？我考虑“献忠”这两字不会有重复，一查，果然，就把它注册了。

咱们这个公司在省里也注了册，地点在沈阳市，抚顺是分公司。规模还不是很大，才开始起步，继业也是股东呢。我们的股东都是几千块钱起家，就这么一点点地靠发奋去做。我是从为知青办事这个角度来办这个公司的，为了给社会留下一个好的品牌，我们要用一生的努力呵护它，不能让它沾上当前市场经济的那些污点。

我的产品包括农家酱、豆制精品、熟食系列，红香猪蹄啊、五香鸡肝啊，还有香玉米、黏玉米系列，卖得相当好。我的产品特点是啥呢？所有产品都不含人工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防腐剂是什么样的？到现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我也不清楚，因为根本没有它。我们的设备虽然不是多先进，但我是在用自己的心灵来控制它。我这个人有洁癖，特别好干净。所以我这儿的食品一出锅，谁也不许用手直接去摸，必须套上薄膜，保证每个环节都达到卫生标准。比如说这个“纯豆农家酱”，是用优质大豆为原料。市场上的酱大概有上百种吧，一般都是用农村大酱为原料，像我这样用纯大豆做成大酱块子发酵，然后放到大缸里晒、闷，这样做的可能就是我这一家。一吃你就能感觉到，这是正宗的。再一个，我用的水是浑河源头无污染的泉水。



“献忠食品系列”之一“农家酱”。献忠设计的商标见左上角

当然，我们现在还处在创业阶段，非常艰难。继业知道，要不是咬牙挺着，早就垮了，太艰苦了。有个媒体看好我们的产品，说很有发展前途，马上要来采访。我一打听，得要不少钱，就说：算了，暂时不搞广告，还是用这笔资金扎扎实实地把厂子办好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吗？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JIAONING ECONOMIC DAILY

辽宁经济日报

吴献忠

从知青典型到民企董事长



走过金钱

抚顺日报

周末特刊

吴献忠：

从知青到董事

从知青典型到董事长

我决心把厂子办好，生产绿色食品，弘扬知青品牌，也弘扬知青艰苦奋斗的精神。还希望用这个来证明，尽管经历了许多坎坷、许多挫折，我始终没有倒下。其实，所谓倒下，都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的。

工作太忙，对孩子实在没有工夫管了，全靠他自己。现在他考上了锦州医学院，考了五百多分，这孩子比较聪明。这些年，跟村里还有一些联系，以前也看过他们几次，老人基本上都没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怎么地是东北方言，即怎么回事。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坎坷人生路，拳拳赤子心

——柴春泽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边全有

采访时间：2002年6月12日下午

采访地点：内蒙古赤峰市粮食宾馆204室

［采访前记］　2002年6月11日，为采访知青史中的名人柴春泽，我专程去了一趟内蒙古赤峰。赤峰是塞外历史名城，以红山文化、辽代文化闻名。正是初夏时节，气候宜人，但城市环境实在不敢恭维，车辆破旧，旅游业落后。一大早，春泽和他的好友边全有来接站。春泽很忙，在电视大学赤峰分校带着10个班。接完站，他又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

“文化大革命”末期，在赤峰翁牛特旗（当时属辽宁）插队的柴春泽，因写信给为他“走后门”的父亲，表示“思想上的彻底决裂”而名声鹊起。以后，他为当地农村办了许多好事，也在“极左派”领导人的操纵、授意下说过错话、做过错事，“文化大革命”后因此受到清查，吃了不少苦头。好在赤峰划归内蒙古以后，新的领导对他的处境很关心，给他落实了政策，还保留了党籍。在当年辽宁省最走红的几个知青典型中，他的结局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在经历人生大起大落、饱尝世态炎凉以后，多数知青典型早已心灰意冷，很少跟外界交往，以致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春泽却不同，他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还积极扩大与各地知青的交往，交了许多的朋友。1997年，春泽和他的爱人刘立新创办了一个信息服务小报，上面除了有关知青的内容，还刊载电大、舞蹈和商业的信息，以后改为专门刊登知青信息。小报免费寄给全国各地的知青，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密切了各地知青的联系。我与春泽的相识，就是通过这份小报。

6月12日下午，我请春泽做口述，主要提了几方面问题：在返城问题上与父亲是怎么发生矛盾的，后来又是怎么被上级领导发现的；1976年前后与辽宁知青典型有关的几大事件真相；“文化大革命”后受审查和解脱的过程；在电大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对于春泽这些年来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一些报刊已有报道。我最感动的是他说的那句话：“如果说当年对知青犯了错误，现在带的学生，他们的父母许多都是我们这样的知青，现在努力工作，就算是对当年错误的一点补偿吧。”话语不多，当是肺腑之言。

晚上拜访春泽家，房间不大，约六七十平方米，干净整洁。关于春泽的妻子刘立新，过去已有多篇报道。我在采访辽宁知青典型中发现过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刘继业的妻子沈庆林、张铁生的妻子董礼萍，还是春泽的妻子刘立新，都是名副其实的贤妻良母。春泽出狱后曾一度精神不太正常，后来之所以能痊愈，并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有两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一个是立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爱，支持他考取电大，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一个是在关键时刻总是遇到好人，从市里的老领导，一直到单位的同事，对他都很关心。

春泽、立新的女儿已上大连理工学院，正在读新闻专业大专，准备升本科，外语已达到六级。说起女儿，春泽很自豪，他说女儿很聪明，口才好。立新的民族成分是回族，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说自己是回族。问为什么？回答说：“大民族要照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顾少数民族。”

在插过队的翁牛特旗，春泽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当年在他领导下试种水稻，是史无前例的一件新鲜事，第一年搞试验，第二年就种了一千七百多亩，第三年扩大到7000亩，直到今天推广到全旗二十多万亩。水稻的种植，给当地的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巨变。

现在，春泽和立新身体都不太好，是当年劳累所致。立新总是鼓励春泽出去跳舞，一则健身，二则消除心里的压抑，春泽也是乐此不疲，自述“一听到音乐，心里的烦恼就无影无踪了”。后来，春泽担任了市里国标交谊舞学会副秘书长。“春泽热衷与异性跳舞，会不会‘见异思迁’？”对于我的玩笑话，立新显得底气十足，表示“对他很放心”……

在赤峰的短短两天，我还结识了春泽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前面提到的边全有。全有兄弟姐妹一共有10个，他老大，家境贫寒，本来应该照顾，但因为出身不好，只好下乡。下乡期间，与春泽在一个知青点，因为表现好，没有受到歧视，还跟春泽结成“铁哥们儿”。后来招工到旗邮电局，每天骑车送信，顺便找了当地一个漂亮姑娘。提起这件事，全有至今还很得意。调回赤峰后，因为经济压力，他很早就办了停薪留职，做起了羊绒生意。开始几年，事业发达，近几年来，却越来越不景气，手头压了四五十万元的羊绒产品，这些产品因设计过时，一时很难找到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这几年一直在“吃老本”，但有房有车，衣食无忧，对现状倒还满意。

再一位是“红色资本家”姜宝泰。这“红色资本家”的帽子，还是我给戴的。他当年是大连市的知青典型，主动请缨，带着一拨人到翁旗“战天斗地”。高中就入了党，下放到农村后由大队书记干到公社副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辽宁的知青典型顷刻间几乎垮光了，宝泰成了少数仅存的“硕果”。原因是，第一，1978年省里召集知青典型攻击“邓纳吉（按指邓小平）”，他因故没有去；第二，上级组织批老干部、“还乡团”，他因为工作忙，又没去。因为一年里有这两档子阴错阳差的事，粉碎“四人帮”后，记者请他介绍跟“四人帮”对着干的经验，被他一笑了之。

宝泰很有经济头脑，在农村时就组织知青搞副业，挣了不少钱。返城以后从建筑公司的领导岗位上辞职“下海”，逐步发展起自己的建筑、房地产公司，公司里用着不少知青。这些年，一直在给第二故乡做好事，无偿提供农机具。他对“无商不奸”的话颇不以为然，自认“不是奸商是情商”。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在赤峰采访时与原内蒙古、辽宁知青合影（右起依次为：张莉、边全有、刘小萌、柴春泽、姜宝泰）

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到年年评先进的好学生、好干部，再到一个自愿下乡的学生党员、知青的典型，宝泰的人生在旧体制下一直是一帆风顺的。难得的是，到了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他又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在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中，像宝泰这种经历的并不多见。

以下是柴春泽的口述。

一 “我写了拒绝父亲回城意见的信”

我于1952年出生在干部家庭。父亲柴文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武工队连长，解放后在热河省委党校毕业后调赤峰县工业总支工作，公私合营时作为公方代表到赤峰县永和营子煤矿接管煤矿。从小，我们全家就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我从小学到中学，转学达13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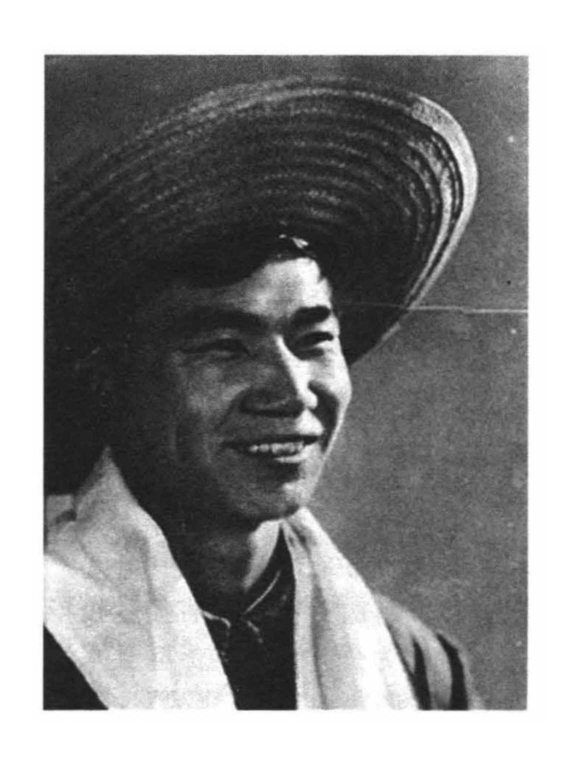
我母亲张瑞兰，比父亲小12岁，解放初期曾在河北省滦平县做共青团工作，后因病退职。父亲工作忙，我们弟兄姐妹五个，母亲为我们操了不少心。

1969年6月我转入赤峰六中，不久昭乌达盟划归辽宁省。1971年7月1日后，当地开始转播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节目。辽宁省工宣队进驻昭盟，当时的六中无团组织，红卫兵取代了团组织。学生们长期不能安心学习，我当时渴望学习文化知识，刚入学时，曾利用暑假在教室看书学习。开学后，我就和同班同学到那些长期不到校上课的同学家去，请他们回校，搞好“复课闹革命”。有的班级，把上课老师给气走了。我们除了学校安排的课外，还自己组织学生上课，或到办公室请老师来讲课，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学校对我们班反映很好。由于我为“复课闹革命”做了一些工作，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代理排长（当时学校是按排、连设置），排就是班，不久重新整顿红卫兵组织，我先后担任了连、营和校红卫兵团长。

1970年5月，昭乌达盟赤峰市（县级市）红代会成立，我作为赤峰六中的代表，被选调到市红代会任副主任。当时的红代会除组织全市红卫兵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外，有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公、检、法和军管会维持市内交通秩序。



在农村时的柴春泽

市红代会从各校抽调排以上红卫兵干部300人组成红代会“战备执勤连”，由我兼任连长。因为这项工作，我们经常协助公安、交通部门维持秩序，全市红卫兵都认识我了。1971年中学毕业时，盟市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大家都说“市红代会柴春泽下乡，我们就下乡，他不下我们也不下”。就这样，盟市领导找我谈，动员我带头下乡。

其实，我当时并不想下乡，想去当兵。1970年底征兵时，我向武装部领导提出了申请。武装部部长康占才兼任市革委会主任，他说：“骨干不能都走”，只批了一个第一副主任阮德明参军。阮德明后来当了沈阳军区军务部兵员处团职干部。第二年，我在全市红卫兵注视下只有带头下乡这条路了。

我是赤峰县干部子女，按规定，赤峰县干部子女可以到离家较近的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赤峰县下乡，可我所在的学校定点却是翁牛特旗，我只能顾全大局带头下乡到离家较远、风沙大的翁牛特旗玉田皋。

1971年12月，我和赤峰六中六十几名毕业生，参加完盟市县联合召开的欢送下乡大会后，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欢送大会上，我代表下乡知青讲话，时任盟军分区副政委、盟革委会副主任的陈金元讲话时说：“祝同志们上山下乡一路顺风。”可我们下乡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玉田皋乡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东南部，老哈河北岸，红山水库下游，全乡人口七千左右，土地面积25万亩，其中半流动沙丘和风蚀沙地就达17万亩。全部为旱田，以种植玉米为主，平均亩产不足百斤。我下乡的玉田皋大队当时有六千二百余亩地，总产56万斤，亩产平均不到91斤，下乡不久，正赶上公社号召“抗灾渡荒学大寨”。

在农村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凉土坑，有时吃的是玉米饭泡盐水，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长不放心，有些知青也动摇了。从1972年秋起，一些知青开始自己联系，转点到条件较好的地方，一些家长也盼着子女早日回城工作。

今天看起来这是十分正常的，而我作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当时想的就是尽量稳住下乡知青，因为当时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又在传达中央26号文件，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复信，我就动员知青还是安心在农村。

这年的上半年，赤峰市为动员滞留在城里的知青下乡，通知我回市里帮助做动员工作，安排我去各街道参加会议，用自己下乡的现身说法动员青年下乡。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与同学们合影

1973年下半年，辽宁省开展向吴献忠学习的活动，动员知青扎根农村。这年的8月末，昭盟团委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号召全盟知青学习吴献忠，盟团委知青办通知我作为知青代表到会发言。我在会上表了决心，提出“扎根农村奋斗60年”。回到知青点后，收到父亲给我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还盖着印章，显然信中有密，点内的知青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想，也许他们知道了信中的内容。打开一看，是父亲决定让我服从他和煤炭局的意见，准备招工回城。

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同意父亲意见离开农村回城的，如果回城，知青们会怎么看我？于是，我写信拒绝了父亲让我回城的意见。有不少观点都是在盟里开会发言时讲过的。9月2日的一个雨休天，我一口气写完了这封信，为使知青点同学相信我扎根农村决心是真的，又主持召开全点知青大会，在会上公布了和父亲的通信。

知青们都惊呆了，女知青刘英说：“柴春泽是不是疯了？”会上，我说，这封信我不发，请团支部书记刘立新同志去邮局发。会后，刘立新就照办了。不久，辽宁省知青办派人来昭盟调查知青工作，从筹备全盟知青会的同志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省知青办的人说：“柴春泽是不是昭盟的吴献忠啊！”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1974年冬柴春泽父子摄于知青点

11月，旗盟都召开了知青代表会议，会议安排我大会发言时，建议我讲一下和父亲通信的事。我那时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给别人的信都抄在日记本上。在会上发言时，我就全文念了父亲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反响很大。当时，上海、北京等地知青慰问团成员也参加了大会，一些代表要求印发我和父亲的通信。《辽宁日报》驻赤峰记者站记者陈连仲、金敬芝写了内参，新华社也写了内参，内参一发，辽宁省委领导就知道了。但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昭乌达报》很快发了《中共昭乌达盟委通知》，通知号召学习我给父亲的回信。《辽宁日报》头版以《小将的挑战》为通栏标题，刊发了我和父亲的通信。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对我给父亲的复信做了全面报道。紧接着，中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都来采访，本地区和辽宁省各地，还有外省一些知青和应届毕业生，陆续来玉田皋青年点参观。为搞好接待，公社向盟旗打报告，建立了公社接待站，接待站内设招待所。我除在本地做报告外，还应邀到北京、天津等地做报告。北京团市委、知青办，天津工、青、妇组织和知青办都先后召开大型报告会，请我去讲。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友好条约，中国也积极对日本展开外交活动，来访的日本代表团向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表示，日本更愿与中国友好，希望中国派青年代表团赴日访问，以促进日中友好条约的缔结。邓小平指示，由中联部负责组织中国访日青年代表团。中联部决定由当时设在中联部的工、青、妇组负责拟名单组团，代表团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辽宁省代表是我和时任辽宁团省委书记的魏礼玲，我是作为知青代表参加的。我们团的团长是广东

免费PDF电子书下载请到“招财猫咪网”（www.wljz.top）

省团委书记梁秀珍，副团长是云南省团委书记金桂仙。同年3月，对日本进行了20天访问，先后去了东京、京都、高智、高松、奈良、高智、青年岗、山梨等地。

山梨县组织了300人的报告会，安排我讲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当我讲到拒绝父亲让我回城一事时，日本的青年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响。后来知道，在日本，儿子拒绝父亲意见是十分正常的事。会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秘程志迈对我说："柴春泽，你讲了那么多，日本报纸只报道了你一句话，中国知青柴春泽先生讲以农业为基础，日本青年对此有同感。"

日本青年在恳谈会上也向我们提问题，他们问：中国知青是否都是自愿下乡，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压着你们，不去不行？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就回答："不是，没有什么力量压着，中国知青都是自愿上山下乡。"因为有纪律，在国外，不允许讲不利于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话。日本青年问我，人民公社的劳动日值多少钱？我回答说："两元。"其实不是，而是不足五毛。

出国前，在中联部对我们进行了近二十天的封闭式培训。特别强调纪律，其中讲到朱克家1974年访日时，对日本青年说："中国知青也有私心。"结果日本报纸纷纷转载，说"朱克家承认中国知青有私心。"这事在当时成了不得了的大事，让我们吸取教训。

日本青年问我："柴先生，你看这里风景如何？"我不敢说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只好说："这里的风景是好，但是有雾，我们那里的风景好，没有雾。"以此表示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



1975年4月访问日本时摄于静冈县

我问日本一女青年在什么单位上班，她说在她父亲工厂里当工人。问她工资多少，说和其他职工一样。我当时就不理解了，父亲是大资本家，亲女儿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企业里当工人呢？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使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参观大型工厂时，看到穿西服的人接待我们，我心里就想，日本工人阶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穿着破衣服，外宾来了一定不让见，统统被赶走了，于是悄悄地问大使馆的人员。使馆的人说："这里不是你想的那样，这里是日本的现代化工厂。在我国几千人的工厂，这里只需几十个人，全是自动化控制，这些人就是工人。"这番话，让我暗自吃了一惊。

日本青年问："柴先生，你看这工厂怎么样？"我只是说："日本工人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日本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就是不敢说日本科技进步，更不敢说好。日方通过播放录像片，组织实地考察，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先进设备，我们是不懂也装懂，假装满不在乎，似乎这些东西在我们中国都有，有的比你们还好，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

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当时"左"到什么程度。

访日回国后，地方党政领导十分重视，让我先给盟委常委们介绍访日情况，然后，再开盟直机关干部大会，常委们事先规定了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那天，盟委组织部等部门的领导特意到车站接我。到宾馆后，我取出从日本带回来的茶叶，一边给他们沏茶，一边

说："请用茶，这虽然是日本产的，但它是日本农民种的。"事隔10年后，市里研究我调电大工作时，一个当事人在说起我因受影响而说错话、办错事时，特别引用了他亲耳听到的我说的这句话，引得大家捧腹大笑。

二　难忘玉田皋

下乡时，我曾做过农村基层领导工作，最初是当知青点负责人，这就需要团结大多数。我在农村工作中，比较注意团结当时被认为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我在实践中感到，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大都智商高、聪明、懂管理、会经营。

边全有和我一起下乡，曾一度因家庭出身不好，有包袱。但他会木工活，又会修鞋，我就让他当了"五七维修组组长"；搞科学种田，派他出去开会、学习，他十分感动。几十年后在知青返乡大会发言中他还说："我出身不好，但春泽在青年点没有歧视我……"

聪明而又足智多谋的王钟，出身富农，开始也有包袱，但他和我是知心朋友。开始，王钟任大队民兵连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大队支部副书记，知青共大校长，返城后先后任市区书店经理、书记，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处长，现在是报业中心主任。

曾经有人说我是口头革命派，即文章中写抓走资派，但在本地不抓。为什么？我在农村工作实践中想到，要想搞好一个地方的生产，光靠知青不行，必须调动本地干部、群众。辽宁省搞知青"挑重担"，即选派大批知青到生产队当队长，一些干得出色的知青都注意调动本地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我这里要改种稻田，要动员群众搞农田建设，如果头天晚上定准谁是走资派揪出来，第二天就会有一大批人不出工。因为农村宗族观念强，谁家的二大爷被撤职了，被批斗了，他的同姓亲属就没有参加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了。因此，清查"四人帮"时，专案组同志总问我："你在文章中总讲抓'走资派'，为什么不见你在本队抓走资派？"我说，我觉得农村干部没啥问题，有人无非好吃请、喝点儿酒，"酒盅一摸什么都说，饭碗一端政策放宽"。批评一下算了，不能当"走资派"打。因此，我与农村干部关系处得一直不错。我那里也搞知青"挑重担"，有沈阳、上海、辽宁、抚顺下乡知青派到生产队当副队长，一把手都是本地干部，知青当队长只抓学习理论，这样不至于耽误生产。

在由知青组成的青年队，我建立了一所"农民业余理论学校"，把知青派到各生产队，再从各生产队选派农村青年到青年点，业余理论学校除了学理论，还让他们学文化，抚顺知青王维仁曾担任过文化课教员。

1975年末，盟委、旗委决定在我们公社办知青"共大"，计划把各地

知青点点长选送来学习培养，回去带好知青。可各地选送时，不仅送骨干，为甩包袱，把一些纪律散漫的青年也送来了，增加了“共大”的负担。

早在1974年，昭乌达盟军分区就授予我们知青点为持枪民兵排。当时每人都有枪，还带有刺刀，有的知青手里还有打靶时剩余的子弹，但从未出过事，知青打架动手不动刀枪。现在想起来也后怕，那出事可就不得了。

粉碎“四人帮”后，调查时说我们发枪，要重上井冈山，不仅如此，还与上海民兵发枪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事实。毛主席逝世后，上面通知一级战备，我们本身是持枪民兵排，有站岗任务，不能乱联系。

在农村下乡的日子里，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就是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做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问心无愧。

1972年秋季的一天，我顶着漫天风沙跑到公社，提出要见公社领导。我当时只是知青点负责人，公社领导从旗里开会回来听说我找他，以为知青点又出了什么问题，派公安助理向我了解情况。我说不是有什么“案件”，我想找公社领导提建议：这里风沙太大，应大搞植树造林；这里土地不平、渠林不整，应重新规划……公安助理关心的是治安，一听没有案件松了一口气，回去告诉领导说没什么大事，柴春泽想提建议。公社领导当时最担心的也是怕知青点出事，知道未发生迫害女知青的案件，也就放心了。至于重新规划农田，显然还未列入日程。再者，我一个小小的普通知青提这么大的建议，也很难引起重视。

1973年6月24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找到新调到玉田皋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黄珍，向他汇报了重新规划玉田皋渠、林路，平整土地并试种水田的想法，得到黄珍和旗、盟、省领导的支持。黄珍是个实干家，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到公社不久，就深入大队实地考察，还特地深入到各知青点调查。当地群众说“新来的书记有两下子，踢蹬开了”。他多次鼓励我学点政治经济学，安心农村工作。1974年下半年，我们曾多次研究怎样改变玉田皋。他多次对我说：“你可是知青典型，全国都看着呢！要朝思暮想，这个地方怎能变？”

这年9月，上级号召组织大会战，我当时已担任玉田皋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玉田皋大队支部书记，黄珍主持的党委会上决定：从玉田皋实际出发，集中力量，重新规划玉田皋的渠、林路，党委会上还通过了试种水稻的建议。决定在我所在的玉田皋大队的一队划出一块地搞实验，群众不同意也要把工作做通。结果会议订了250亩，最后落实下来只有50

亩。

10月5日至10月28日，利用14天时间集中全大队和下府孤山子等兄弟大队的部分人员搞大会战。从玉田皋大队入手，除掉旧的不合格的林带四条，总长5700米；平掉旧渠四条，土方量两万余方；迁坟104个。将全大队5200亩耕地按主带方位角64.15度、副带154.15度规划，建成四位一体和三位一体的16个正方，10个斜方林网地。新开支渠六条，总长9300米；新开斗渠六条，总长5944米；排碱渠一条，2100米，总计土方量为67365万方。新营造防护林主带六条，长6494米，宽10米，占地五行；副带六条，长9380米，宽8米，占地四行。

重新规划渠、林路，改种水稻，比较难办的有两件事：一是重新规划土地需迁坟。在农村，一说挖祖坟，是会被骂祖宗的，104个坟头的工作难做极了！当时我也挨了骂。如今群众吃上大米，不但他们说好，他们的子孙也说好了，都非常感激。再一个困难就是水。种水田，无水，简直就是空想。

女知青刘立新当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分工在玉田皋大队一队蹲点，因50亩水稻实验田都无水，她和生产队长找我，又找黄书记，最后决定从下府的林场引水，保证水稻实验。

到了秋天，这50亩水稻终于实验成功了，这是玉田皋历史上第一块水田。过去怀疑种水稻的干部、群众服气了，说："真没想到这里能长大米。"多年躺在炕上的老人让子孙用毛驴车拉着去看水稻，不少人说："这下玉田皋乡可能要大变化了，它就是一块铁板，也要改变了。"得到群众的认可，阻力减少了，可大面积种水稻，水从何来？玉田皋位于红山水库下游，红山水库于1956年动工修建，1960年9月主坝截流，1965年竣工投入运行。它以防洪为主，兼顾灌溉、发电、养殖，总库容量为25.6亿立方米，是内蒙古自治区最大的一座水库。在防洪方面，保护着下游600多万亩耕地、十几座城镇、几百万人口和六条铁路干线的安全。玉田皋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在每年春季红山水库向下游开闸放水时，用于一次春浇地。在玉田皋下乡的辽宁"五七战士"[1]徐凤臣，搜集到这样一句民谣："一条大渠春天乐，夏秋无水干没辙。"

1975年4月，时任辽宁省委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农业工作的刘盛田和沈阳军区参谋长杨迪到翁旗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当时任公社副书记、大队支部书记，汇报工作时向他们和随行的辽宁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翁牛特旗农牧组组长王文早提出，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以解决玉田皋改种水稻的要求。刘盛田说："没有水，可以在水库捅个窟窿。"他又问："公社有什么乡镇企业？"黄书记说："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广播

站。”刘盛田说：“他妈的，广播站算什么乡镇企业！”他对在场的一些领导说：“快想个办法，把他们的乡镇企业弄弄。”我说：“解决水是最主要的。”杨迪参谋长对公社书记黄诊说：“柴春泽在你这里，可不能墙里开花墙外红啊！”黄书记当时似乎很拘束，连声说：“是，是……”

有一次我去沈阳开会，听说省水利局局长张久祥在软卧车厢，就去见他，谈了在红山水库搞引水工程的准备情况和存在的困难，他说：“这个工程，干得过。”意思是搞这个工程值得，可以解决玉田皋种水稻的问题。他答应回去催催这件事。

年底，经盟旗有关领导和时任盟农牧组组长才吉尔乎等人的努力，辽宁省特批40万元工程款，用于“白玉引水渡槽工程”。1976年10月1日，全长400余米、七个土墩柱五个跨拱、横跨南北可容六个量的空中引水渡槽竣工了，并在第二年的上半年交付使用。26年来，红山水库的水通过这个渡槽源源不断地流过来，保证着玉田皋现在近三万亩水田的用水。

如今登上红山水库的大坝，极目玉田皋大地，眼前是蓝天、碧水、绿荫、沙滩以及水库下游秀丽的塞北江南风光。

回过头来再说说1975年9月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召开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及市、地、盟负责人参加，国务院知青办确定了12名知识青年代表上会：天津邢燕子、云南朱克家、河南薛喜梅、河北程有志、黑龙江高崇辉、陕西戈卫、新疆肉孜古丽、江苏曾昭林、广东林超强、安徽张登龙、四川刘裕恕，辽宁省是我。其实参加会议的，不仅这12名知青，各省、市、地、县与会领导中也有不少知青，只是把这12人作为知青代表。



1975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青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陈永贵，后排右一为柴春泽）

国务院知青办奚中生同志代表国务院知青办召集这12名知青座谈，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也参加了。我在座谈会上说："我挖了一捧大寨虎头山上的土，要带回去，让大家看看大寨人是在这样的土地上创高产的。"后来，我把虎头山上的这捧土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农村的一对新婚夫妇。

陈永贵在讲话中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搞一个超大寨的点。会后，12名知青和陈永贵、郭凤莲合了影。当会议转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继续召开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联合召开采访座谈会，请与会的知青代表谈体会。邢燕子、朱克家发言后，《人民日报》记者点名让我发言。这时，河北的程有志说："柴春泽，你那里是不是一年迈了三大步？"他听别人介绍了我们重新规划方田、林网又试种水稻的情况。我在会上讲，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越深入，生产领域的变革越显著。邢燕子提议与会全体知青联合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表示学大寨的决心。由谁起草呢？大家推举朱克家和我，我对朱克家说，请你执笔，写出后咱俩共同商量。起草信的过程中，朱克家请我到云南代表团驻地他的房间去过两次，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七林旺丹住在一起。



在知青代表会议上的合影（后排右二为柴春泽）

就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话后，一些省代表说“讲得挺实在”。邓小平同志说“我讲三句话”，他的讲话通篇没稿，会场很静。江青讲话时说代表毛主席，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鼓了掌。邓小平讲话中说“现在农村一些地方不如解放初期”，江青大声说：“那是个别的。”邓小平说：“个别的也得注意。”我们当时都是从积极方面理解江青插话，认为中央领导之间讲话十分随便。朱克家曾说：“邓副主席讲话有水平，有一次开会，等电梯，见到了邓副主席，没敢和他说话。”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头版全文刊发了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中央电台也同时广播，各省纷纷转载，宣传声势很大，辽宁省团委、知青办联合召开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曾绍山等领导都出席会议，我在大会上传达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

后来我们听到传达，邓小平同志在我们的信上批示说：“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毛主席的批示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动力，我曾为玉田皋变化太慢急得哭过几次。1975年末，我利用开会机会，几次找旗、盟领导，催促尽快上引水工程，想借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东风，加快工程的进程。

三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旋涡中

1975年末，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华国锋同志做报告，邓小平同志讲话，动员全国普及大寨县，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回到公社，连续召开各种会议，认真传达会议精神，按照已有的规划，为改种水田、加快引水工程进程做准备。可是不久，报刊宣传的调子就变了。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极“左”舆论是极富煽动力的。开始传达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所有的知青典型都面临着一个共同任务：一旦来了新的运动，就被通知去旗、盟、省开会。新闻单位就来要表态稿，不及时表态就是立场问题。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政治上态度不明朗，对知青典型来讲是大是大非问题，谁也不敢有半点消极。

1976年初，辽宁省知青办经盟、旗知青办找到我，要我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我说，那样的文章写不好，湖北武汉下乡知青张静的来信，提出了六个问题，特别是对理想、前途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重要，正研究这封来信并写回信。

辽宁省不久又传达毛主席对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信的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拟宜专题研究开一个会，然后给予解决。”如何解决知青问题？我不可能知道。

辽宁省领导在一次知青座谈会上讲话说：“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写的信，邓小平的批示是‘建议全文或摘要发表’，而主席的批示则是‘应发表，可惜来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些’，这明显的就是批邓。”还有人说：“辽宁青年意识形态革命还可以，大有作为还不行，这些都是对着你们这些辽宁知青典型的。因此，需要你们写文章批邓。”这些舆论使我们的思想越来越乱。

1976年4月5日，报上公布了“天安门事件”，说邓小平性质变了。不久，辽宁省团委、知青办通知我到沈阳军区招待所参加全省知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座谈会”，会上要求知青典型带头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我给张静的信的内容，就由讨论理想、前途问题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新闻单位向我要表态稿，我说没时间写，可把给张静的信当做表态稿。这样，我给张静的复信先后刊登在《辽宁日报》、《湖北日报》、《光明日报》上，还有一些省报转载了。[2]

1976年，辽宁省委由李伯秋主持工作，毛远新当时已不在辽宁。我是在1974年初辽宁团省委召开的“学习吴献忠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毛远新的。当时，《辽宁日报》和《人民日报》已发表了我给父亲的回信。

毛远新、李伯秋在座谈会上讲话时，都赞成我给父亲回信中的观点。李伯秋说："黄帅出来把老师吓一跳，张铁生出来把教授吓一跳，柴春泽出来把老干部吓一跳。"毛远新说："柴春泽，你现在还没有发言权，在下面干三五年就有发言权了……"我对毛远新的感觉不一般，因为他是毛主席的侄子，我觉得虽然没有亲眼见到毛主席，能见到毛主席的侄子也是幸福的。特别是1975年访日回来后，他让秘书通知我和魏礼玲（时任辽宁团省委书记），听取汇报后，留我们一起吃饭。我想，60年代，毛主席请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是他们的幸福，同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一起吃饭也是我们的幸福，因为这些都是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吃饭时我曾提出，马克思说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要发生革命变成社会主义，日本资本主义这么发达为什么不发生革命，变不成社会主义？我问了两遍，毛远新说："这可能与国际环境有关吧。"

210　　5号

柴春泽同志：

你好，我是一个下放还不到三个月的知识青年，有些问题不知怎么办，看了《广阔的路》上所选载的日记和事迹，便想向你请教！希望你帮助我。不对的请你严厉批评我。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与自己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我一般平时政治上还能要求进步，也常看些学习材料，和同学们在一起也常谈些远大理想，但实际行动却对不上号。下放以后，受了一些影响，学习放松了，有些混日子过，想到大家都是如此，不知怎么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共产主义的实现离我们太远了。”

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怎么个学法。我下乡时带下来许多马列毛主席的书，有人问我学了有什么用。我说：学习能提高思想水平，提高识别能力，以便不上当受骗，不执行错误路线，为革命事业多做贡献。没等我说完，她就打断我的话说：“这些大道理我懂，我不学还不是可以。我凭良心干事，既使学习了，有能力识别出修正主义来又有什么用，上面我们又改变不了。党内有人要修还不是修了。”我认为这不对，可是又驳不倒她的论点。我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好的风气，心里也想这是改变不了的。我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后来分开了，下放时，她主动提出要下艰苦的恩施，下去了以后，我接到过她的一封信，说实话我很敬佩她，但没有决心向她那样。我还想到就这么几个人下山区，到艰苦的地方去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没有多大用处。当我对别人讲起这事的时候，有人说这是有用意，有目的的，有的说：“是想早点抽回武汉”。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可自己也是为我所占领的。现在谈怎样学习，带来了马列毛主席著作，可不知该怎么学习，究竟是怎么个学法，要求自己的标准是什么？达到什么水平？谈谈你是怎样学习的。

1976年湖北知青张静给柴春泽信的原件

我见毛远新只有这两次，以前只是听过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例如，1972年辽宁省知青讲用会上，他说：“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大自然充满着矛盾，培养自己的子女不适应这个矛盾，就会碰壁。”毛远新不可能个别对我讲什么。听会上的讲话，感到他对毛主席的书学得很好。

1976年6月，辽宁省委召开全省知青工作会议，通知我和部分知青代表参加。省委书记李伯秋在会上讲：“这次开会要请知青放炮，要吵一吵。”当时，一些报刊正在发我给张静的信。会议认为，光有我给张静的信还不行，要有全省知青典型的共同表态，会上确定由刘继业起草

一封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后来这封信在《辽宁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信发表前，由刘继业念了一遍，我感到刘继业的写作水平很高，我不如他。我自己写不成那样的信，只能写出给张静复信的观点。

辽宁省知青工作会议上决定，各地要仿照省会议的开法，层层召开会议。议题是落实毛主席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搞好知青战线“反击右倾翻案风”。

昭盟仿照省委的搞法，召开了全盟知青工作会议。会后，我按公社的安排和我们公社书记黄珍带着感谢信和锦旗去辽宁省营口大洼县，感谢大洼县派两名水稻专家帮助我们改种水稻。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春，新任昭乌达盟委书记高学忱（原来在盘锦工作）和副书记许宏文来玉田皋检查工作。我向他们汇报说，试种了水稻几千亩，但是没有人懂种水稻，急需技术员。高学忱当即起草了给盘锦大洼县赵玉礼的电报稿，我跑到邮局发出。没过几天，大洼县就选派了农场副厂长常跃宗和生产队长赵甲臣来到玉田皋，他们的到来帮了大忙，我们非常感动，因此，决定亲自登门答谢。

我们途经锦州时，不知什么原因，由锦州知青办的车把我们接到了锦州市革委会招待所。原来盟知青办在我们出发后，给锦州知青办打了电话，大意是柴春泽去大洼县，途经锦州，因为是知青典型，希望给予关照。锦州知青办无意中得到这个消息后，知青办主任一定要我在锦州知青工作会开幕式上讲话。在当时那种舆论的包围下，我能讲什么呢？只能讲毛主席如何对知青工作做批示，辽宁省以及昭盟如何召开知青工作会议。锦州是全省知青典型的所在地，更应重视知青工作，因为以前吴献忠在省里开会时，曾讲过她在锦州不太受重视，她做报告，市委书记离开会场去休息室听等。因此，我在讲话中就指责锦州市领导不重视知青典型。

锦州知青会开幕后，我就和我们公社的书记黄珍离开锦州，前往大洼县送感谢信。在大洼县开完会，阜新市知青办派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知青工作会，因为他们也在传达省知青会的精神。

在阜新，我接到新华社记者苏树翘的电话，他说：“新华社要写纪念‘八一八’[3]的稿子，需要采访辽宁省知青典型。”他找到了张铁生、刘继业，听说我在锦州，就一同赶到锦州找我，没想到扑了空，希望我立即返回锦州。就这样，我又第二次返回锦州。这期间，锦州驻军和锦州工会先后召开欢送知青下乡大会，听说我们这些知青典型在锦州，一定要我们参加会议。参加会议，又必须讲话，讲什么？还不是会议那一

套。

由于参加锦州知青会的知青与锦州市委领导发生了严重对立，锦州知青会已不可能像辽宁省委知青会那样的开法，我到锦州后听了吴献忠在锦州知青会上哭着发言的录音。因此，在一些会议讲话中继续指责锦州市委不重视知青工作。接着，锦州知青刘香玉等带着吴献忠哭着发言的录音找到辽宁省委。省委书记李伯秋连夜听了吴献忠的讲话录音，并指示说：锦州市委没有认真研究毛主席的批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要做检讨。锦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请在锦州的辽宁知青典型都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和几位副书记在会上做了检讨，表示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批示，专题研究知青工作，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紧接着，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立即返回公社。

10月初，我接到盟、旗、知青办通知，要我去铁岭参加辽宁省铁岭农学院毕业典礼，与此同时，我也收到铁岭农学院发来的邀请电报。张铁生就在该校上学，是应届毕业生。有一次在省里开会，我对张铁生说，我们那里改种水稻，缺少专业人才，请他介绍几名懂水稻的大学生。张铁生回校不久就告诉我，只动员到一名学农机的宋慧媛，确定毕业后分到翁旗玉田皋。我们去参加毕业典礼，既为了接大学生也是为了向校方表示谢意。昭盟党委认为这是件大事，就决定由昭乌达报社王栋同我一起去铁岭。10月6日，我正在玉田皋一队割稻子，接到电话通知后第二天赶到赤峰，8日同王栋乘车赶往铁岭。

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曾整理过一个讲话稿，主要内容是中国和苏联有“七个不同”，因此，中国不会像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逝世后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在铁岭农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批准张铁生等25人大学毕业后当农民。安排我大会发言时，我讲了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铁岭知青办听说我到了铁岭，就派人到铁岭找我，分别去康平县法库、开原等县为知青讲中国和苏联的“七个不同”。在开原县，我接到省知青办电话通知，要我立即赶到省里。

10月16日，省知青办主任王海峰和军代表向我和随行的王栋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同时传达了省委意见，要求我作为知青典型，做好广大知青转弯子工作。听到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我非常震惊，这种震惊如同1971年听说林彪等驾机外逃坠毁蒙古温都尔汗一样。但我是共产党员，党的纪律必须遵守，我当即表示拥护以华国峰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同时表示回去后做好知青们的工作。

四　重塑人生

1976年10月17日，我参加了昭乌达盟委召开的县处级传达中央打招

呼会议。会议中，盟知青办召集全盟的知青典型召开座谈会，由我做知青转弯子的工作。我起草了给盟委并转辽宁省委的决心书，内容是"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署名有柴春泽、王冬梅、王银刚、汤永东、张洁、姜宝泰、王东升、梁晓宾、毛德宝、朱义国、曲广荣、朴春香等。

12月4日，中共翁牛特旗委派人向我宣布，开始给我办学习班。吃、住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宣布了几条纪律：不允许和外界联系来往；不准告诉外界办班地点；如果有知青对给我办班不理解闹事，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做好知青工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与外界隔离的生活，每天写交待材料说清楚。一些过去的"功绩"转眼间变成了吓人的"罪名"；一些过去心目中党的化身的领导人都成了"反革命野心家"；一些和自己交往较多的知青和各界朋友都成了"有牵连的人"。我的确有些蒙了，同样一句话从别人口里说出的都算了不什么，而对我来说就得说清楚；同样一件事别人参加了都是受骗上当，而我就成了"主谋"。1977年四五月间，我被拉回玉田皋乡批斗。

代表公社党委发言的恰恰是我后来的爱人刘立新。我们当时的恋爱关系还没有公开，但在一些人中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74年底，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内容是动员我不要在农村找对象，他已决定在城里为我找对象……我理解父亲，一直关心着身在乡下的儿子，可我这时已身不由己。在城里找对象，无疑意味着为回城做准备，那样全国知青都会骂我，因为我已说过"扎根农村，争取奋斗60年"。

这时，回族女知青刘立新已向党组织表示决心扎根农村。一个少数民族知青，在生活不方便的情况下表示扎根农村，我很赞成。立新在知青点的表现也很出色。一次，我找不到放牛的，她就自告奋勇，当了十几天"牛倌"，得了急性阑尾炎，在乡镇医院做手术时，硬是在无麻醉药的情况下完成了手术。大队开会研究消灭农田虫害，刚散会她便和一女青年带着农药去灭虫……作为少数民族的她，在农村安家很难找到尊重她生活习惯的汉族，我应当以实际行动帮助她，因此，我就决定选择刘立新。一则证明我的确真心扎根农村，二则与少数民族结合也是与旧观念决裂。我还建议她把原名刘惠贤改为刘立新。

这次公社批斗会上看到立新代表党委发言，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她没被牵连到不许工作的程度。因为，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有问题的人是不会出面做大会发言的。

1978年4月29日下午，我正在翁牛特旗经济林场工地劳动，监督我

的人到工地找到我："柴春泽，有外调。"这是常事，开始我每天关在屋子里写检查，后来被告知可以和林场的工人一起劳动。我很高兴，认为自己的问题可能很快会解决，盼着回玉田皋。这次走到林场大门口，看管我的人说"把铁锨先放在门口吧"，我丝毫没有感觉，进到院里见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周围站满了林场的工人。从这些朝夕相处的工人脸上，我感到似乎要发生什么事。

刚迈进我住的那间屋，一左一右站上来两个便衣，对面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纸。专案组的人说："柴春泽，听着下面宣布对你的处理。"站在我对面的人念起逮捕证……我像是在做梦，不是说只要说清楚就可以解脱吗？！不是说党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青年吗？！"给他铐上！"一个人上来给我戴上手铐。"这是你的行李吗？带上。"我被人架到大卡车上，心想，在电影上看到的监狱不是稻草铺地吗，怎么还带行李？

到了翁旗看守所。一个人坐在那里审问我："叫什么名？"我突然想起，这不是几个月前我到一个公社做报告，旗里派出的负责安全保卫的那个同志吗？他怎么能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只好回答："柴春泽。""犯什么罪？""……"我真不知自己犯的什么罪，如果说是"反革命罪"，我怎么能成为"反革命"呢？他也不再问了。吩咐我把裤带解下，鞋带解下。原来监号内怕自杀，我一一照办。"咣"的一声，我被推进一个监号。一个长条土炕上端坐着八个秃脑袋，脸像白纸。我一眼看到贴在墙上的"看守所人犯守则"："不许说话，不许喧哗……"我仍像是在做梦。"喂！什么犯呀？"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儿的犯人问我。我不敢说话。"没事，小声说，没关系。"他们见我不说话，互相小声说，"他这样是什么犯呢？黄上衣，蓝裤子，是不是转业军人？转业军人会是什么犯？""是不是个强奸犯？"我听了大声说："什么强奸犯！"站岗的战士听到了，来到铁窗前大声说："柴春泽，不许说话！"

犯人们一听"柴春泽"，立即小声议论开来，"哎呀！我跟柴春泽一起蹲大狱来了。""咱们这小小刑事案，三年、五年，没大事，他那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我心想，啊！人间还有这样一个地方。静静的夜里，月光穿过铁窗斜射在土炕上……

一天，我被押送到喀喇沁旗批斗。到会场时，武警一人揪着一只耳朵，场内一个女青年见后吓得大声喊"妈呀……"我只觉得昏沉沉的，像是在做梦。

5月，我被押回玉田皋游斗。远远地看见很多乡亲们围在公社院内。走近时，只剩下一些席地而坐的中小学师生们。我是很想见见乡亲

们的，可他们怎么都躲远了呢？中午饭是在公社食堂吃的，大米饭炖肉。我带着手铐的双手捧起大米饭时，泪水无论如何也止不住了，年轻的武警大声问："你哭什么？"回想我们下乡时吃大米饭的情景，公社书记大声宣布，为欢迎知识青年，公社特意从粮站领回大米……而现在的大米，是用我们知青和乡亲们的血汗凝结而成的。

监号里潮湿，管理干部问我的毡子、厚被褥在哪里，我说"在农村时给困难户了……"公社领导当即决定，从公社取，多亏了公社领导给了我帮助。

在看守所关押时，我非常羡慕那些同监号犯人出去干零活儿。其中有各种刑事犯，盗窃的、强奸的、诈骗的……出去干零活儿的人，可以多吃一顿饭。监号内春夏秋冬都吃两顿饭，犯人们轮流用手刮粥盆，轮到我时，我就说："不刮了，下一个刮吧。"犯人们说："行，不愧是知青典型，在这里还为大家着想……"后来，允许我出去干零活儿了。用水泥压瓦时当小工，压瓦需要用旧报纸，我有机会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报道，报上还介绍了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事迹。有的大块儿文章舍不得用，就偷着带回监号看。"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14岁，到1976年，我24岁，这10年里，我们是在批判老干部的舆论包围下长大的。老革命前辈那么多的丰功伟绩，我们怎么能知道呢？这样我就开始写反思体会，一个月一份，手纸不够就用香皂、牙膏换同监号犯人的手纸，没有笔就用铅制的牙膏皮。

后来，我当了监号学习小组长，组织犯人学习。有一个偷骡子的，大家都叫他"骡客"。我问他偷了多少头骡子，他毫不掩盖地说"五十多头"。我问："为什么偷那么多？"他说："偷一头犯法，偷两头也犯法，我犯个值得。沈阳去了，天津、北京去了，也玩了。我这事也就判三年。到这里来，还带出个嘴呢！"意思是说，进了监狱，不用吃家里的饭。我做强奸犯的工作，他反倒说："你柴春泽完蛋，如果是我，像你那样出名，挑好看的，搞他十个八个，进来也值得，人生就这么回事。这下你完了吧！听说一个都没搞过……"耳闻目睹，我才知道，原来一些人是知法犯法，看来真应加强法治。在这里，我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有一点，我自己心里有数，无论何时何地，明知危害社会、违法的，决不能去干。

后来，中央广播电台学习节目播出批判极"左"理论的学习讲座。偏偏是给监号播完新闻联播、关掉广播后才开始学习节目。小小有线喇叭只能传出很小的声音，我就把耳朵贴近小喇叭，坚持听完，收获很大。我在人生路上走了弯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监号里，我又通读了《世界通史》、《中国通史》、《马列选

集》。这些不仅对我纠正极“左”思想影响很大，而且对我平反后考上广播电视大学帮助很大。

1979年12月13日，我正在监号内学习叶剑英建国30周年的讲话，听到所长喊“012号”，我立即答应：“到。”“搬行李。”不用问，又是调号。为防止闹事，看守所经常互相调号。我问：“去几号？”“搬出去……”我不禁大吃一惊，“搬出去”就意味着离开监号，还没宣判，怎么直接给弄到劳改队去了？在提审室，昭乌达盟公安局的两人端坐在那里，其中一人念材料。近半个小时，我的脑子乱极了，什么也听不清，只想着会怎样处理我。“依据党的政策撤销案件，对柴春泽予以释放”，这句话我可听清了。“有什么意见吗？”这还能有啥意见，我马上签了字，又像是在做梦一样。公安局的人说：“以后有事，不要再找我们，要去找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一听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的组织，说明党还管我。公安局的人又说：“你先不能回家，我们送你到翁旗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到。”

中午，在翁牛特旗公安局食堂吃饭。我又习惯地面对着墙去站着。公安局的人说：“快来吃饭。”怎么，我还能和公安局的人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我半天不敢坐，胡乱吃了几口，就说饱了。

回到赤峰后，到西大桥停车。公安局的人说：“我们送你去家里不方便，你自己回去吧。”从西大桥到家，不足两华里，我停下来四五次，像是在做梦，因为在监号内经常梦着中央来通知说柴春泽是错案，为我平反。现在是真的吗？我去翁旗纪检委，纪检委人说：“你没什么事了，就是开除党籍。”我一听，这是最高处分啊，怎么能说没事？我不能离开党。

我总觉得时时处处有人监视我。回家的第二天，刘立新带着鸡蛋和白面到我家看我。第一句话解释为什么离开农村，接下来就哭了。我心里想：她是党员，现在来看我一定是试探我，是不是真心拥护党中央。我就对她说：你去告诉组织部，我不反对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她一听，觉得我精神有问题，回家跟她母亲商量，要我去她家住（当时我父母去吉林治病，不在家），她请假在家护理我。我坐在那里嘴里不停地说：“我相信党，忠于党。”

（此页无正文）

中共翁牛特旗委文件

翁党发〔1980〕67 号

★

关于对柴春泽、周忠民二

同志所犯错误的复查结论的批示

各公社、镇、国营农牧场党委、旗委各部、委、办、旗直各党、办局党组、总支、支部：

旗委同意旗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柴春泽、周忠民二同志所犯错误的复查结论，按有关政策规定，对柴周二同志均定为政治错误，恢复党籍，免于处分。

根据这次复议的结论，撤销翁发（1977）32号、33号文件，即《关于新生反革命分子周忠民的罪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新生反革命分子柴春泽的罪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对柴、周二同志所犯错误事实以此复议结论为准。

给柴春泽落实政策的文件

有一次上街，有人认出我，说："那是柴春泽。"吓得我跑到公安局，面对墙站着。当时我心里难过极了，但哭不出来，只想笑。这时我想起关押时有人告诉我，如果心里难受，就要哭出来，可千万别笑，一笑出来就完了。我就忍住了笑，过了一会儿，心里好受多了，头脑也清醒了。心想：跑到公安局来干啥，赶快回家吧。一个人如果20年前因五两大烟得了精神病，20年后他嘴里还会不停地说"五两大烟土"。我那时只会反复念叨："相信党，忠于党。"

立新非常着急，去问医生。医生说："不要吃药，给他讲故事，不要老想那事。"她就给我讲一些书上的爱情故事。开始我根本听不进

去，后来听进去了。不久我提出："咱们结婚吧。"她答应了，但遭到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柴春泽一无党籍，二无工作，今后怎么办？"立新说："过去他受了刺激，现在刚好些，拒绝他，他精神就崩溃了。我个人的事，我个人定，今后要饭，我给他提篮子……"就这样，她背着家人在单位开了介绍信，我到知青办开了介绍信，准备结婚。

结婚前，我就惦记着第二故乡玉田皋。1980年3月8日，我只身回到玉田皋，一住就是八天，乡亲们争着让我去家里吃饭。这月的24日，我和刘立新办理了结婚手续。结婚后才发现，我成了女职工的"家属"。因为立新在辽河工程局有正式工作，我则成了回城待业青年。我不甘心这样，几次去盟、旗知青办，向领导提出：不能待在家里等，现在乡下还有知青点，我可以回知青点。6月4日，昭乌达盟知青办为我开了介绍信："翁旗知青办：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下乡知识青年，望安排劳动场所。"我拿到信后非常高兴，因为看到介绍信中称我为"同志"，我是为"同志"两字而高兴。见到熟人就给他们看这封介绍信。看信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好"的，都说：这怎么行？身体不好，再下乡能行吗？后来我发现，朋友们关心的是怎样安排我的工作，才不管称不称"同志"呢。由于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旗里决定我到广德宫窑砖厂青年点。就这样，我于6月15日第二次下乡到了南窑砖厂青年点。

烧砖压瓦真累，特别是砖瓦出窑时，连裤衩都湿透了。但我很高兴，每次出窑还带头进去。7月1日，我提出找砖厂厂长、党小组长凌宝泉同志谈谈。我对他说："我不能离开党……"老厂长一听脸转过去，流泪了。事后他说，我以为柴春泽找我请假回家，没想到他谈不能离开党。9月的一天，接到通知，要我到翁牛特旗纪检委。纪检委的同志说："盟、旗正讨论恢复你的党籍，为你做复查结论，你自己要实事求是地谈谈自己的情况。"很快，旗纪委对我的问题做了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8月19日，旗知青办在致盟知青办的报告中写到：柴春泽系1971年赤峰市下乡到我旗玉田皋公社的知识青年，至今已有10年时间了。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和内蒙古人民政府［1980］147号文件中旗县不再列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范围的指示，我旗1977年前下乡的知识青年基本招完，1972年前的老知青只有柴春泽一个人了。我们的意见是，将柴春泽招工回赤峰市。

招工回赤峰确定了，但到什么单位一时定不下来。1980年6月第二次下乡前，我把立新安排住到她舅舅家的一间防震棚内，以便使已怀孕的妻子有人照顾。其实她是不赞成我第二次下乡的，但她知道我的性格，我认准的事，一般人说服不了我，她怕我精神上再受刺激，就违心

地说："去吧，我支持你，我有工资，可以给你寄钱……"8月下旬，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我为此急了好多天，立新哭着说："你要党籍，不要孩子……"

正在商量我招工回赤峰到什么单位时，自治区知青办主任高玺明和杜志毅到昭盟检查知青工作。他们利用休息时间打听到我们的住处，我和立新都不在家。知青办主任用手摸摸炕、摸摸墙，高主任握着立新舅舅的手说："谢谢你，你替我们做工作了。"我和立新听说自治区知青办主任来家里看，非常感动，跑到宾馆看望他们。知青办领导非常热情，关心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习惯地说："挺好，没什么困难。"立新打断我的话说："什么没困难，要实事求是地说，连房子都没有，这不是困难吗？"高主任问："辽河刚盖完楼，怎么没房子？"立新说："分房以男职工为主。"知青办主任说："以男为主，男的也去。"后来又经分管盟长阎福荣和盟劳动局局长丁占成具体过问，我真的给分配到了辽河工程局。

10月4日，我正式到辽河工程局报到，局里同志说："是工人到劳资科报到，是干部到组织部报到。"我在农村时虽然是经盟、旗委组织部考核正式任命的干部，而现在我的身份则是招工的知青，劳资科决定我当配电安装工。立新担心地找到领导："春泽精神受过刺激，搞电太危险了。"局里领导解释说："电工是工人当中的好工种，算是照顾了。"不久，我们分到了辽河工程局院内的一间平房。虽然没有给楼房，但我们仍十分高兴。

11月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到辽河工程局管房产的行政科门口围了好多人，一个上海知青喝醉酒，手里拿着大木棒骂个不停。行政科的人都躲在屋里，有的还用木柱顶住门。见谁也不敢劝解，我过去劝了。上海知青回头喊："谁？"看清以后说："哦，柴春泽，你别管这事，我和他们拼了！人家这几年整你，你不知道吗？"我到底把他劝住了。发生事故，对谁都不利。这下，辽河工程局行政科的人非常受感动，认为我不是传言中的那号人，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第二天，行政科长就到我住的平房，解释为什么没有分给我楼房。没过多久，行政科通知，分给我一套两室的楼房，立新高兴极了，跑到楼房扫了个干干净净，连夜动员全家帮忙，搬进了新楼。

在辽河工程局，我名义上是电工，其实什么活儿都干。当时没有大工程，各大工种都不能按工种上岗，遇到什么任务就"打破工种齐参战"。严冬季节我为推土机工地看过油，秋冬季节为安装盟文工团余热管道钻过地沟，盛夏曾为工地推过水泥板，在技校施工时布过照明线……

爱人见我还是拿出下乡时那股劲儿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就对我说："干这活儿年轻时行，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能撑得住吗？现在讲知识化，我水就水了吧，咱俩不能都水，你也学一个什么大吧！"恰逢我听说广播电视大学决定在赤峰招生，立新立即跑到局里找，开始，局里规定只许报理科，不同意报文科，如果报文科只能保留工职自费学习。

尽管这样，我还是坚持报考电大。从1982年2月12日到3月5日，我利用不足20天的时间昼夜突击复习。我的记忆力不好，家里的墙壁上贴满了历史等科目的名词解释，把名词解释用录音机录下来，反复播放。女儿元元1981年7月20日出生，到第二年2月刚好六个月。由于缺奶，哭声不断，都和中国通史名词一起录下来了。当录音机播放名词"元谋人"时，总伴随着幼儿的哭声。3月6日开始第一场考试，4月1日获悉，我以超出录取线15分的成绩，被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班录取。同年2月，立新又怀孕了。按规定，在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是可以要两个孩子的，但为了我上电大学习，她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

1985年电大毕业前夕，辽河工程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辽河工程局是水利施工单位，工程师有一百多，你学的是中文，回来不一定好安排，如果什么单位需要你，我们可以放行。"赤峰电大孙可澄校长同意我到电大工作，对我说，这件事你自己不要去找，由学校为你办。不久，社会上就传出柴春泽要留在电大工作的说法，一些朋友也纷纷到家里询问。过了些日子，孙校长又找到我说："没想到你这事真难办。都承认你柴春泽不错，可谁也不敢办，你还是自己找一找吧。"由于我一时确定不了工作，局里决定按50%发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几元。为此，我不得不从妹妹处借了20元生活费，立新急得犯了头痛病。

一个雨天，我在赤峰市政府门前久久徘徊。当时处在一种十分矛盾的境地，要不要进去见市长？不见不谈，到电大工作的事已搞得满城风雨，如知现在何必当初？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迈进了才吉尔乎市长的办公室。他正在批阅文件。我在外面被雨浇成了落汤鸡，我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自我介绍说："才市长，我叫柴春泽。"真没想到，才市长非常热情："柴春泽，知道，知道，快坐下。"我拘谨地坐下。才市长拿出烟递给我："抽烟。""不，我不会。"其实我早在下乡时就是"烟民"，不仅抽香烟还抽"蛤蟆"旱烟。见了市长，我竟不知从何说起，费了好大劲儿才说清楚：电大毕业后，学校要留我工作，调转工作遇到了困难。市长问："整党时是否登记？"我说："已登记。"又问："身份？"我说："是按招工到辽河工程局的。"市长让我回家等通知。9月16日，我正式到电大上班，孙可澄校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真不容

易，总算是来了……”事后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才吉尔乎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我调电大的问题，获得一致通过，同意劳动局、教育局负责办调转，市人事局负责办理转干手续。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广播电视大学的奋斗。



在毕业典礼上放歌一曲

---

[1]1975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里提倡工、农、兵、学等各行各业都应该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毛的这一观点，被誉为“五七指示”。随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把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集中下放到农村，兴办所谓“五七干校”，干校成员称“五七战士”。

[2]柴春泽前后给张静写了七封信，集中收在1976年7月17日国务院知青办下发的《柴春泽同志给知识青年战友张静等同志的信》中。

[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检阅红卫兵。此后的三个多月，又连续七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八一八”因此被视为“文化大革命”的盛大节日。

“我拥有这么丰富精彩的经历，真不枉来人世！”

——安海燕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邵学忠

时间：2002年8月22日

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枫露花园

［采访前记］　在做知青口述史过程中，曲折、刘晓航、柴春泽好几个朋友向我推荐过安海燕，说她是当年内蒙古的知青典型，阅历很丰富。但我的工作时间很紧，对采访对象不能不有所选择。再说，采访的知青典型已经不少了，还是留心其他类型吧。所以，对他们的建议我只是敷衍，并未付诸行动。直到有一天晓航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跟海燕提起采访的事。面对朋友如此的热心，还怎能推三阻四呢？

海燕的口述真是太有价值了，尽管整理出来的文字多达五万，仍不足以概括她丰富的人生。难怪有一位导演曾对她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我衷心感谢上面提到的几位朋友，使我没有错过如此难得的采访对象。我也要感谢“中国的阿信”将起伏跌宕的前半生坦述无遗。

海燕的家庭出身就够典型的，她父亲是内蒙古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死一生，做过大量地下工作。只是因为他的“上线”和“下线”都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以致中断了与地下党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倒也罢了，偏偏他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档案仍保留完好。这样一来，他就由一个本该“红得发紫”的共和国功臣，一变而为“黑得发臭”的政治贱民。1957年的运动，又凭空给他扣上一顶右派帽子。父亲成了双料的“黑五类”，出身这样的家庭，海燕的人生道路怎么可能一帆风顺？但过早品尝苦难与贫寒，也磨砺出她顽强的意志和超乎常人的谋生手段。海燕13岁时，父母双双被关入“牛棚”，海燕一面上学，一面靠捡破烂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

1971年4月，刚刚17岁的海燕下乡到了离呼和浩特市二十多公里的太平庄村，命运之神忽然青睐上这个一直苦命的孩子。海燕凭着一根银针、一个药箱，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涯。特别是当她用针灸把一个瘫了13年的青年农民扎得重新站立行走后，有关她高超医术的传闻就在农民嘴里越传越神。很快，她的事迹被有关部门挖掘出来，成为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

海燕的口述谈到给农民医病带来的成就感和欢愉，也提到成为“典型”后的种种苦恼和不安。村里的地痞流氓造谣说她“作风不好”，而她“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表态又使自己成了知青群中的“一只孤雁”。外界的种种压力，促使她在1974年3月向上级申请，落户到条件最艰苦的山区。在这个陌生的村落——小井公社苦草坡大队，海燕经过一年多努力，居然实现了全村二百多口人的免费医疗。但是，正当她想喘口气时，那些足以置一个姑娘于死地的谣言又从原来的村子追上来……

1975年，呼和浩特市委专门为她组织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结论将泼洒在她身

上的所有污言秽语一扫而光，海燕因为突出表现成为内蒙古的知青标兵。然而，谣言可以澄清，出身上的"污迹"却是板上钉钉，海燕的入党申请因此一拖再拖。1976年，经当时的副总理、主管知青工作的大寨老农民陈永贵亲自批示，她才算入了党。

80年代，海燕上了大学却没得到文凭，当了医院院长又不安其位。90年代初，她阴错阳差到海南创业，最困难的时候，花五块钱买了10包方便面，竟吃了10天。为还债，她不得不一头扎进妓院里为"小姐"们美容……

海燕的人生路没少遇到陷阱，奇就奇在每一次总能化险为夷，似有神人暗助。如今的她已是颇有成就的生产化妆品的企业家，致富的法宝仍是当初在农村行医时积累的知识。

海燕的口述，是一部充满艰辛的创业史。她的人生，闪烁着一个强者不懈的追求，也展示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一　我的一家

我的经历在同龄人里比较少，确实比较少。十多年前，太原有个写了一部片子还获奖的导演找到我，我给他简单讲了一下过去的经历，他说："我想给你写个电视剧本，就叫《中国的阿信》……"

先从父母讲起吧。我的母亲是一个工作狂，事业心特别强。她是30年代北京农大的学生，日本人来了以后，学校搬迁到了陕西武功，现在叫武功农学院。在那儿她认识了我父亲，以后就一直配合父亲搞白区工作。

父亲叫安吉人，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在学校就是一个活跃人物，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他常讲起在北京搞"飞行"集会的事，比如说定好几点钟大家都到什么地方集合，把标语预先准备好。时间一到，大家都集中起来，按照分工，有的干这，有的干那。口哨一吹，横幅一拉，一个队伍就出来了。大家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游行去了。一会儿警笛一响，水龙头一冲，再抓走一批，就算完事了。这叫飞行集会。那会儿主要是执行王明路线，要求这些进步学生，你要想入团、入党就要接受组织的考验。怎么考验呢？比如规定你几点几分到天安门去贴几条标语，你就要去贴，你在前面贴，后面就有人去检查，看你贴了没贴。以此作为组织的考验。其实贴了以后，很快就被敌人给撕掉了，很多人就因为贴标语被捕了。我父亲入团、入党就是这么入的。入团一年以后自动转为党员。

有一次，父亲被国民党抓了，说他是共产党，差点没被打死。可共产党却说他是国民党，以致解放后也没有确认他的党员身份。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员。因为啥呢？他做的是白区工作，与上、下级都是单线联系，上边介绍他的人牺牲了，下边他发展的那个人也牺牲了，中间只剩下他一个，上下线全断了。所以，直到他去世，还是一个民主

党派。



全家福，左一戴红领巾的是海燕

出狱后，他为了寻找党组织，听说黄埔军校有地下党在活动，就利用一些同学在国民党内担任高级将领的关系，打入到军校担任了政治教官。“文化大革命”中，他那张扛着大洋刀在军校门口的照片就成了罪证，差一点没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证明他是国民党有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却没有证据。那会儿，地下党都是一举拳头就入党，不允许留一个字的东西。后来，他和地下党的联络被发现，胡宗南亲自下的手令：“共党要犯，立拿。”就给父亲抓起来了，关到西安的一个窑洞里，派一个班的士兵看着。上刑灌辣椒水，灌成了严重胃溃疡。又被蚊子咬，得了疟疾，瘦得皮包骨，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时，我妈通过一些熟人关系，拿钱买通士兵，用一具同样干瘦的尸体把我爸换出来了。然后跟胡宗南报告说，这个犯人已经死掉了。既然如此，不能再在那地方待了，赶快跑吧，一跑就跑回老家——内蒙古归化的丰镇县，以后又到北京藏过一段时间。

在北京，办过一个叫《北方红旗》的杂志，他在里面担任重要职务。为了传播革命火种，和我妈经常化装外出。我妈年轻时长得挺漂亮，是学校的校花。当时，我爸妈和苏某某在一个活动小组。有一次，苏某暴露了，敌人包围学校，把他逮捕了。上午带走他，下午又来抓我爸。郑天翔跟我爸是同班同学，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领导和高法院长。他岳父当时是那个学校的校长，连忙把我爸藏在床底下，晚上混在放学的学生、老师的人群里才跑出来。

抗战时期，父亲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动员北京的学生到延安去。他跟我讲过，那会儿动员的净是些有钱人家的小姐，打扮得漂漂亮亮，有的还穿着高跟鞋，就到延安去了。这一拨一拨的人，不是直接送到延安，而是送到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父亲把人送到西安，然后转回来，再动员下一批。这就是他的工作，是由薄一波领导的。解放战争后期，董其武准备和平起义，又有点儿犹豫、害怕。那会儿傅作义已经起义。我爸通过私人关系找到董其武，交代一些党的政策。父亲的大学同学中，有一部分在共产党里面，有一部分在国民党里面，但是大部分在国民党里面。小的时候，我爸老跟我们讲这些，因为我不懂这段历史，总是听得稀里糊涂的。

“文化大革命”中从上面派来专案组，在内蒙古住了一年多，逼着我爸写苏某叛变并出卖他的证明，他不写，说不知道这件事。专案组说：“我们已经从国民党档案里查出来了，可以给你看。从时间上来说，确确实实是上午抓的他，下午又来抓你。这就证明他是叛徒。”他还是不写，就因为这个，又在牛棚里关了好长时间。

父母被抓进“牛棚”时，我13岁，也就是1967年。家里有一个弟弟六岁，妹妹比我小一岁，哥哥比我大两岁，加上我四个孩子。奶奶八十多岁了，一双小脚。就这么几个人，突然之间一点儿生活费都没有了。因为家里人口多，根本没有一点儿存款。在父母被抓的前前后后，红卫兵到家里破“四旧”[1]，能砸的就砸，收音机也好，缝纫机也好，包括被褥，几乎都被抄走了。

家里别的没有，就是书多，可多可多的书。我们从内蒙古大学被轰出来以后，租了呼和浩特美术馆附近的一间半平房临时住着。在抄家以前，父亲就把一大堆他保存的已经发了黄的照片和底片整理后送到我姐的集体宿舍保管，说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父母被抓，我姐被审查，我又将照片拿了回来。有一次，听说造反派让母亲辨认一张照片，她没有讲对，被打成重伤，我一害怕，将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文物一把火烧了。

红卫兵抄家时，就因为烧我家的书，把房东家好大好大的一个葡萄架都烧完了，那火苗蹿得像小山似的。他们还递给我一根大竹棍子，让我翻那些书，净是大厚书，可难烧了，结果把一根大长竹竿烧得只剩一小截了，还有一大堆书烧不完。一不翻火苗就要灭，只能不断地挑着、翻着。红卫兵在旁边站着看，我们就在那儿烧，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爸，一个是八十多岁的奶奶。我爸是右派，给他戴了顶大高帽子；奶奶是地主婆，脖子上挂着个牌子，写的是“地主”；我没有啥牌子、帽子的，还是个小孩，啥也不懂。

当时，我叔叔也遭了难。他是被监视居住的“军统特务”，实际上，他是打入军统的地下党，“文化大革命”后作为“无名七杰”之一平反。他死时，因为背着“特务”的罪名，连骨灰都没地方放。13岁的我只身一人背着他的骨灰，照父亲画的图找到坟地，总算掩埋了。

父母被关的的两三年里，我特别懂事，也特别能干。为啥呢？我出生40天就给送到奶妈家里去了，是吃农民奶长大的。我和妹妹差一岁，她是娇生惯养的；弟弟是小儿子，不懂事，更是娇生惯养；哥哥也是家里的宝贝。只有我是在农民家长大的，五岁才被接回来，住到奶奶家。

奶奶家当初也是地主，是农村的那种土地主。她的娘家很穷，但婆家富有。奶奶年轻时长得漂亮，爷爷家就看上了这个漂亮孩子，要娶她。奶奶家不同意，说进有钱人家受气。结果我爷爷娶了两房媳妇，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两房媳妇都死了，第三次说亲还是我奶奶，当时她才19岁。奶奶一嫁过来就当妈，带着好几个孩子。她是在穷人家长大的孩子，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土地主就是有点儿地，雇几个长工干活，她要做这些人的饭，每天还要带着前边留下的孩子和自己生的四五个孩子，她就是这样一个朴朴实实的老农民。奶奶去世时86岁，临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外面洗菜，妈妈说怪凉的别洗了，她不高兴，说年轻的时候你们也不嫌弃我，现在我老了，你们嫌我脏？咳，你不让她干活儿她就生气，就是到了八十多岁了还是要干活儿，闲不住，特别朴实。

我跟着奶奶做一些辅助性家务劳动，另外几个孩子都在上学，按时回来吃饭。奶奶每天做三顿饭，我帮着拉风箱、弄煤、挑水，有杂事就帮着干。他们都是娇生惯养的，不会干活儿，也不懂得干活儿，那我当然就是应该干活儿的。邻居们老是对我说，我是被家里奶出去的，所以大人们不喜欢我，总给我灌输这些东西。我也注意到了，比如过年穿新衣，家里虽然很穷，大家都有，就是我没有。我仍然穿得破破烂烂的，脏了就自己洗一洗呀，涮一涮呀。

我从小就怕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在学校我的学习可好呢，是班长、三好学生。但是过完春节有个返校日，我记得特别清楚，每年就愁这个返校日。一年里从不逃学，就那一天老想逃学。为啥？过年大家都穿得干干净净，都是新衣服，只有我还是那身破衣服，就怕别人笑话我，老早就愁上这一天了，愁怎么能混过去，是装病还是用什么别的方法逃过去？

父母被抓起来以后，全家没办法生活了，我们得吃饭呀。我能干啥呀？就开始捡破烂。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去捡破烂，但是绝对不敢在家门口捡，因为上学都是就近，周围全是同班同学。在没有经济来源的

这一年多里，靠我捡破烂也卖了不少钱。

有一个老头是个收破烂的，他是个山西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怎么喊："烂口袋，烂麻袋，兔子皮也换钱，杏核核也换钱。""皮鞋、雨鞋、塑料鞋，牛羊骨头烂皮鞋，换钱啦——"他一喊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我老盼着他来，他来了，我假装是拿家里的破烂卖给他，他不来我捡了不敢卖。那会儿不是到处都有收破烂的，只有新城区北街有一家收破烂的，是公家的买卖，可院子里住着个我的同班同学，我怕碰上不敢去。捡回来的破烂我可会分类了，纸可分成报纸、杂志还有烂纸几类，都是卖不同的价，杂志卖得最贵，烂纸卖得最便宜。金属类里，铁是一种，铜是一种，还有铅是一种，铝是一种，金属是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捡得很少。再有就是各种鞋，球鞋、雨鞋、塑料鞋，还有烂皮鞋，球鞋一个价，雨鞋一个价，分类收。我知道分开类放在那里，存够一种卖一种。那个老头知道我老有破烂，也知道可能是我捡来的，但是我老是假装卖家里的东西。有时，实在等不来那个老头，就骑自行车跑到离新城十多里的旧城去卖。

那会儿学校停课了，不怎么去上学。每天怎么个捡法呢？天不亮4点多钟就起来捡煤渣。冬天有的地方烧锅炉，我和一群蓬头垢面的人去抢。煤渣出来的时候是湿的，我都不懂为啥这煤渣出来是湿的，冒着热气还不烫手。我看人家拿铁丝绑一个"三抓子"，啥叫三抓子？就是三根粗铁丝绑的铲煤渣的工具。我也拿布条缠上那么五六根铁丝做了一个。一车的煤渣刚倒完，呼啦的一群人过去就抢，先把一堆渣土抢到自己一边，然后开始各捡各的。黑的煤渣能看出来，都是能用的。天没亮我就把煤渣捡回来了，家里烧火做饭就不用买煤，而且还存了很多。到了秋天一刮风，我知道能捡很多的树枝子，出去捡一大捆回来。捡树枝子干啥？生炉子、点炉子用。完了再扫很多树叶回家，用麻袋装回来放到那里，生火做饭点火用，一秋天捡的树叶就够整整一年用。当时八分钱就能到木材厂买一麻袋锯末，点火用，可好点了，但是我们没有钱呀。

捡完了煤，天亮以后再捡一拨菜叶。我记得最好捡的是大头菜，圆圆的那种，也叫洋白菜。农民赶着马车来送菜，他们站在很远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这边扔、那边接，中间肯定有叶子掉下来。叶子掉下来，就会有一群人跑过去抢，抢几片叶子回家熬汤，也有的是弄回去喂鸡，我们家是自己吃。我记得一个月一人是半斤油，没有多少油可以炒菜，就拿这点儿叶子煮汤喝。偶尔买点儿菜，是等到晚上的时候，人家处理菜，两分钱三分钱一大堆，和很多坏菜堆在一起。剩下的时间，除了上学校，就骑个车子到远远的地方捡破烂去，都是从垃圾堆里捡的，都是人家不要的、扔出来的东西。走街串巷，到处都有一些倒垃圾的固定地

方，到那里刨叉刨叉，到这里刨叉刨叉，看有点儿啥东西。

父母都关在“牛棚”，工资全部停发，我每星期探一次监，常给他们送点儿东西。给母亲送块肥皂呀，牙膏呀，卫生纸啊。还有一种叫“大生产”的烟，白皮儿，没商标，那会儿不好买，还得走“后门”，好像是九分钱一盒。破烂捡得多的时候就给我爸买一盒“太阳”，捡得少就买一盒“大生产”，“太阳”烟比“大生产”烟贵。有时连买整包烟的钱都不够，就几根几根地买。烟是20根一盒，事先三根五根地存起来，什么烟都有一大堆，探视的时候给他拿去。

那时，根本没感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对家中的变故也是蒙蒙眬眬的，除了有一种羞辱感就是害怕，怕造反派来抄家，怕他们砸东西，怕我的父母自杀。有一次我实在太害怕了，探视的时候，就偷偷挤到我爸排队打水的队伍里，低声说：“爸，你千万不要自杀。”他却笑着对我说：“爸还等你捡破烂给爸换好吃的呢。”听了这话，我强忍着眼泪跑到外边去哭。最可怕的是内蒙古又出了“内人党”，听说打死了不少人，又听说爸爸也是“内人党”的头目。因为他解放前是做白区工作的，后来回内蒙古做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工作，至于他到底是什么党我也不太清楚。妈妈呢？说她是特务，还有编号和暗号。一间只剩几个孩子和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的破房子，窗下还经常有人监视、偷听。全家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刚开始有点儿怕，后来连怕都不怕了，因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次，他们看我们家什么都没有了，就要把睡觉的炕给砸开，看里面有啥东西。我就递给那人一把斧头说：“阿姨，给你个斧头砸吧。”这么一说，她倒不砸了。因为炕里确实没东西，我才敢给她。以后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只要他们想砸墙呀砸炕啊，马上给把斧头让他们砸，他们就不砸了。

我奶奶住的院子特别逗，一共三家人，一个资本家、一个大右派，一个历史反革命。不管来谁家抄家的，准得把另外两家捎上。旁边围观的孩子都会说，这家是资本家，这家是右派。最后惨到什么程度？家里吃饭没碗没筷子，筷子都被他们用铁锹砍了，全砸烂了。来的全是中学里的红卫兵，有时候街道上来一群人，提议说：“咱们今天抄家去。”有人响应说“好。”就来了。谁也不敢惹，他们就那么胡闹。吃饭的时候到邻居家借碗借筷子，用完以后慌慌张张地赶快还掉，因为被砸烂了赔不起呀。被子上面绣有图案，说是“四旧”，也给抄走了，家里只剩下两三床被子，晚上只好凑合着盖。没有东西也不怕抄了，抄家抄成家常饭了，只是我奶奶一看见穿黄衣服、戴红袖章的，就拉得满裤子都是屎。没人打过她，但是她吓得不行。你想想，八十多岁的人了，都是我给她洗。

房东家的院子挺大，种着个菜园子，种菜卖菜。他家有两个地方可以解手，一是一口埋在地里的水缸，口和地是平的，干啥用呢？要让屎和尿流到菜地去，叫"奶地"，就是浇地。另外一个厕所是个很大的方坑。奶奶八十多岁了，又是小脚，标准的三寸金莲，蹲不了方坑，怕掉下去，就在这水缸的角落蹲。结果有一天她没蹲住，往后一仰，四脚朝天就掉进去了。大家帮着把她拔出来，一用劲，奶奶的手成了粉碎性的骨折，手上的骨头都扎出来了。

我家连吃饭都供不起，哪有医疗费呀？我实在没办法，根本不上学了，捡破烂为生，挣钱给奶奶看病。那会儿看病花不了多少钱，离我们家两公里的地方有个接骨匠，是个私人诊所，记得他还有外号叫"三空子"。奶奶一点儿的小脚，吃不上喝不上还经常饿着，那么大岁数再有这手伤，根本就走不了路。没办法，我就背着她去治病。也不敢让邻居帮忙，那年月，谁敢背个地主婆呀，那可不得了呀。好在路过的胡同，每个门洞的两边都有块石头，后来我想可能是当狮子用，有钱人弄狮子，没钱人弄块石头。我先背起奶奶，走一段，挑一块儿高点的石头把她放在上面歇会儿，低一点儿的石头不敢放，怕起不来。我们歇一歇，走一走，再歇歇再走走，反正每天要用两个多小时，背过去，然后再背回来。

我护理奶奶，始终就跟她住在一起，后来哥哥、弟弟、妹妹他们几个在另外一个地方住，离我们有十多里地呢。跑了这么十多天，每天两次打针换药。有个女大夫觉得我可怜，就说："孩子，阿姨教你打针，你就不用把奶奶背来了，你在家给她打针换药。"她就在我奶奶的屁股上拿油笔画了个十字，指着十字的外上角部位说："你拿棉球擦擦这儿，针扎进去，把药水推进去，再把针拔出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她又用消毒布包把消毒好的两支注射器和一点酒精棉球交给我说："你每天打两针，完了以后，你就来这里换消毒好的注射器就行了。"就这样，我学会了打针。两支注射器，居然成了改变我命运的秘密武器。

给奶奶换完药，用四块板儿这么一固定就行了。如果每天不给她松松的话，血液不流通，手肿得很厉害。我就每天给她松一松板儿，再给她包一包缠上。最后，奶奶的手长得乱七八糟、疙疙瘩瘩的，总算是长死了，能活动了。奶奶的手好后，我去还注射器，那个大夫说："不要了，送给你吧，以后你奶奶只要有病，别背着她来，阿姨到你家去，或者你来，阿姨告诉你怎么治。"我奶奶大部分时候胃口不好，经常吐；还有一个病就是感冒。在阿姨的帮助下，只要奶奶感冒发烧就给个安痛定，拿着注射器去换，回去一打就行了。我在护理奶奶的过程中，学会

了这么一招，就这一招，让我以后走上了学医的路。您说这不是阴差阳错吗？

周围的学生都知道我是个“狗崽子”，小学这样，到中学还是这样。我小学是在呼和浩特东街小学上的，中学是十九中，都是就近入学。那会儿升学不考试，离哪儿近就上哪儿。那年代，“狗崽子”也多，只是我们胡同里面的“狗崽子”没几个，在这片居民区里，像我爸我妈这么高文化的人少。我爸不是一般的右派而是大右派，那会儿让他劳动改造掏大粪。我爸骑个自行车，一边挂一个大粪桶，外面都是脏的，里面靠自行车一面却是干净的。他告诉我：“你看，干什么东西都有讲究，你得动脑子，你看你爸这个大粪桶，靠里边永远是干净的，我身子永远是干净的，外面是脏的，盛的时候从外面脏的地方往里盛，倒也是从这儿倒，你看爸的身上没屎吧？”可是他一回来，周围的一群小孩还是围上去，跟着喊：“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汉儿掏茅房。”他们一喊，我就知道我爸回来了，也习惯了，我爸总是笑眯眯的。当右派以后，先让他掏大粪，后来跟马车，一级一级地往上升。夏天，学校安排他去给学生食堂种地，冬天就跟学生食堂的保管员去买东西，跟车当搬运工、装卸工，就这么干，一直到被抓起来。

解放以后，我爸先是在四所中学当校长，后来从这四所中学抽出来一些老师筹备师范大学，那会儿叫师范学院。筹备完了又让他筹备内蒙古大学，筹备完内大就成了“右派”。父亲没有恢复党籍，也没有要过，一直就是进步人士。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你应该要你的党籍，问题是能够调查清楚的。”他说：“我不能要，因为有个苏某某呢，他们一直认为是苏某某出卖了我。我本身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存在出卖问题。我是个进步人士，他出卖我干啥呀？”苏某某的案子把我爸纠缠得没完没了，后来苏某某就因为这个叛徒问题一直解放不了，最后还是我爸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我们那边有个医学院的书记跟华国锋是山西老乡，通过这个关系，把信经华国锋之手转给了胡耀邦，才把苏某某解放出来。父亲83岁的时候，我带他到北京见了见这些老哥儿们。我爸没谈那些往事和他付出的巨大代价，那会儿他也有点儿老糊涂了，就知道“嘿嘿”地乐，高高兴兴就行了。

我爸落难了那么多年，心态一直还可以，就是爱说一句话：“打烂牙齿和血吞。”但是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我不懂，一直都不懂。但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好像这个政权是他们家的。我的父母一直都是这样的感觉，好像共产党的天下是他们家打下来的，是他们的。我的父亲是右派呀，右派永远都是右派，摘了帽子也是摘帽右派呀。

我母亲是第一任呼市妇联的副主席，妇联主席和她是同班同学，原

来是一个被窝里钻着的好姐妹。母亲一直受我爸的牵累，这党员也是后来重入的，快70岁才入党，入党时高兴得哭了：“我终于入党了！”当时，成立妇联就像小孩过家家似的：“咱们俩把妇联给成立了吧。”成立时，妇联什么都没有，就有一间办公室，从这家拿个水缸、沙发，从那家拿个立柜，大家把家里的东西搬来凑了个办公室，这就是呼市的第一个妇联。

我妈干了一段妇联以后，乌兰夫找到我妈，他跟我妈关系很好，就说：“老郭，咱们内蒙古都是这么一点儿大的小酸果子，没有大苹果，你给咱们研究一下果树的改良，改良咱们内蒙古的苹果，咱们弄个果园吧。”我妈说，行，就带了几个临时工开始搞果木研究。当时我爸正在筹办内蒙古师院，问：要建个大学在哪儿建啊？乌兰夫说：“离咱们党委不要太远，方便点儿的地方，你选一块地吧。”“选多大？”“咱们内蒙古跑马圈地，你骑上匹马转上一圈，这就是你的了。”这是句玩笑话。结果就在那儿圈了个圈儿，建成了师范学院。我妈搞果园，问：“我们在哪儿搞？”“你离老安近一点儿就行了。”于是，我妈就挨着我爸，弄了现在的内蒙古林业科学院，那会儿叫林业研究所。总之，在这一大块荒地上，我爸圈了一块地，我妈圈了一块地，中间空下一点儿地，后来又搞了一个内蒙古农牧学院，就是现在的农业大学。中间是两条马路。等筹建内蒙古大学的时候又说，内大挨着师大吧。最后，就成了现在这么个格局，当初的荒地变成了大学区。当时，父母就是这么没白没夜地工作，结果，建完内大，父亲就成了“右派”。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父母都是在“牛棚”里关着，后来一些“有问题”的内蒙古干部，包括我母亲，一列火车全拉到河北唐山去了。当时说我母亲是特务，为啥啦？父亲除了“右派”以外，又成了“叛徒”。你这么重要的人物，胡宗南把你弄进去的，你不叛变怎么能活着出来？你肯定是叛变了，肯定是个叛徒了。叛徒都是特务。你们俩是一对嘛，他是特务你肯定也是特务。就这么推论的。在他们的一张合影照片里，有一个人是特务，一张照片一大群人，哪能都记清呀？又是多少年前的事情，非让他们说明照片里的人都是谁，是在什么场合照的。我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人家说她不老实，因为照片中间有一个人是特务，就把她也牵连上了，说他们是特务组织。对特务当然要严格看管。

除了国民党特务，还说她是苏联特务。为啥呢？她曾给苏联的米丘林果园写过一封信，要来25个耐旱高寒品种。内蒙古也是高寒地区，我妈把这些品种给嫁接成功了。结果，就说她把修正主义的苗种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是苏修特务。现在内蒙古吃的大苹果都是从这儿发展起来的。造反派不但打她，还把好多“修正主义”的苗连根砍了。我妈被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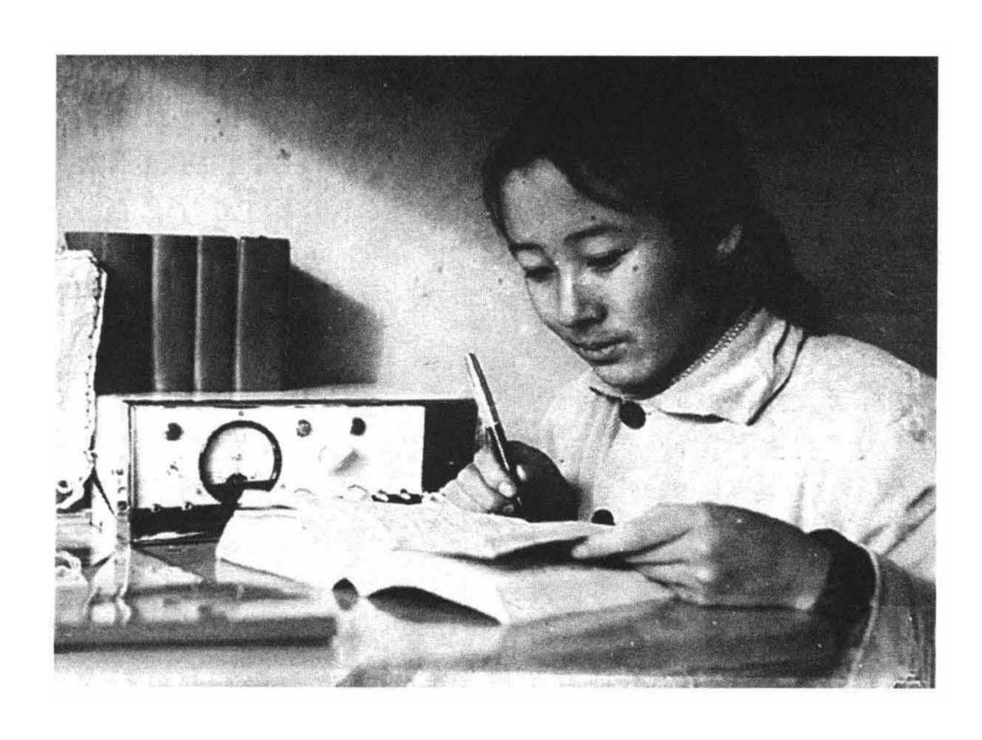
鼻青脸肿都没掉过眼泪，听说把那些果树砍掉以后她哭了。她偷偷地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画了张图告诉我们，果园的果树被砍倒了，要盖防空洞。那会儿，林业研究所的防空洞是全呼市的战备重点，里面可漂亮了，安着电灯，组织人们去参观。防空洞的材料好呀，因为都是很粗的大果树。那时的科研单位不跟外面结合，果树都在这个院子里，如果砍掉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妈就让我们把那些树枝子拿回来。我跟我哥像做贼似的，我哥在那儿剪，我在边上哆哆嗦嗦地放风，就怕被抓住。“偷”了一些果树的枝子，我哥连夜骑自行车把苗藏到他们下乡的那个村的菜窖里，第二年春天再嫁接到村里的果树上。就这样，把“修正主义”的苗保存下来了。

从“牛棚”里一解放出来，我妈就把这些“修正主义”的苗全部弄到农村去了。她说，为了保存这些品种不能只在一个地方种，这是一个经验教训。她开始四处嫁接，几十里、上百里地，风尘仆仆地去亲自嫁接苹果和梨。她天天背上嫁接的苗，拖拉机一来接上她就走了，老太太每天可高兴了。刚开始她戴着黄军帽，晒得像个卖雪糕的。肩上挎着个特别大的军用书包，里面剪子、胶条什么工具都有，一大堆，可沉了。她到农村去，一住就是好长时间，帮农民嫁接，培育新品种。她去世前培育的杏儿跟桃儿那么大。带的徒弟她不放心，70岁的老太太还要亲自爬到树上去看那些花粉。“文化大革命”以后，她又创办了一个果树研究所。

我们家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水果，我们都不敢吃。母亲是拿回来照相、搞科研的，你要是吃错了她回来可要臭骂你一顿呢。有的水果快放烂了，我们就问：这个能不能吃啊？她说能吃我们才敢吃。吃的时候，她在旁边看着你吃，让你把果核十个不剩地吐出来，绝不能把核儿吃了或者丢了。她是个特别敬业的老太太，1990年去世的。对我们的生活她是不管的，她所谓的“享福”，一个是在政治上不受歧视，另外是能多做点儿事情，天天像农民那样有事干就行。

平日，父亲要求我们穿打补丁的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你稍微讲究一点儿他就不高兴，包括后来时兴穿高跟鞋，他不允许你穿，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他革命得厉害着呢，订了二十多份报纸，每天看，报上说啥他说啥。毛主席去世，他哭得死去活来的。我说：“爸，我们哭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想不通，您为什么哭？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儿，您还哭啊？”“咳，你爸是打烂牙齿和血吞了。别的不说，我对国家的热爱是没法改变的。过去黄埔公园有个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你说现在咱们的国家谁敢欺负？谁敢小看咱们？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老头儿啊，没有这个老头儿确实就没有新中国呀。你们没经过战乱，这算什么呢？你们起码没有遇到战争呀。我们那个时候，今天打到这

儿，明天打到那儿，到处乱七八糟的。”父亲是1997年去世的。父母对国家和共产党有着非常淳朴的感情，打死他们都没有怨言。



海燕夜读

二　太平庄里不太平

我1970年初中毕业，第二年3月准备下乡啦。刚刚17岁的我，对于下乡与我的前途有什么联系压根儿没想过，就好像那是大人们的事。而我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多么新鲜多么好玩啊。考虑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我有一个想法，不和同班同学一起下去，不想让人知道我是“狗崽子”。我把下乡看成是人生的转折，我要入团、入党，摘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2]的帽子，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欢声笑语中生活。

初中毕业的时候，我是学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已经是学校的典型了，老师和校长很关心我，最好的工厂分配我去了，这15个人里面大部分是红代会的委员，其中只有一个“可教子女”的指标，给了我。但是，后来这一届毕业生又不分配工厂了，百分之百下乡。学校规定，“根红苗正”的全部分配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是属于半军事化组织，一般不要“可教子女”，但是也有几个指标。我们学校的应届毕业生里分配兵团的有480多人，里面只有一个“可教子女”指标，又给了我，我却死也不去。兵团是大家抢着要去的地方，班主任为了我去兵团的事儿争取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把我弄进去了，我却不去，这个老师把我臭骂了一顿：“你没出息，没志气。”我说：“480个人教育我一个人，我什么时

间能被教育好呢？我一辈子得背着‘可教子女’的名声。我要到农村去，而且绝不跟我们班同学一起走。”

就为了这个下乡，老师又帮着我转学，转到师范学院附中，就是我哥哥上的那个学校。不是有个投亲靠友政策[3]吗？我就按这个政策转到哥哥那个学校去了。所以下乡走的时候，一车的知识青年里面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整个是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别人下乡想家，可是还有同班同学在一起呢，因为我受的伤害太大了，才选择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要不然干什么都会想起来你的家庭来，很沉重很沉重的负担背在身上。

几经周折，1971年4月，我下乡到了离呼市二十多公里的太平庄村，那会儿交通不方便，二十多公里就觉得很远了。这儿离哥哥插队的地方大概有五里。到农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房子，知青们早在汽车上就商量好了，“咱们几个住一个屋”，都是谁跟谁好住一个屋，人家都互相认识。我跟谁住呀？谁也不要我，再说知青的房子有限，也不是人人都能住进去的。最后就剩下我们几个外校的没人要，只有和贫下中农组合啦。



下乡前与老师的合影

我被分到一个七十多岁双目失明的大娘家。她住着一间房，我和她同睡一个大炕。我下乡时最不放心的就是八十多岁的奶奶。爸爸在“牛棚”，妈妈在唐山，七大八小的这么一群，奶奶成了壮劳力了，做饭啥

的都靠她。我在家里面是“大拿”，那会儿已经有父母的工资了，但是不全发，给一点儿生活费，起码买粮钱买菜钱有了。可是她八十多岁没人照顾，我就担心这个，别的不想，老是琢磨我下乡了她怎么办。到了农村以后，遇见这么一个老大娘，我一下子就把她当成我奶奶了，可亲可亲这个老奶奶了。哎呀，她这么可怜，莫名其妙地就把对奶奶的感情转移到她身上。一个瞎子，又是一个人住，能不脏吗？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嫌她脏。你想想，跟贫下中农相结合，把你往哪儿弄呢？这地方是最合适的。一个女孩子住到谁家去呢？哪有单独的房子让你住呀？全家几口人、几代人都在一个炕上，到哪儿安置你呀？确实队里也没法安排。

头一天，老奶奶的炕上也不知道是些啥东西，把我身上咬得全是红点点，又没有灯，她瞎子不要灯嘛。天亮以后，我对她说：“大娘，你坐在地下，我给你扫一扫。”我把炕全扫了一遍，又拿着被子到外面去晒。把这个家从头到脚弄得干干净净。老奶奶浑身上下都是虱子，都能看见它们来回窜。我先烧了一大锅开水，还没见过那么大的锅，能跳进去洗澡，开始给老奶奶挤头上的虱子，然后给她洗澡，先洗头，后洗身子，把里面的衣服扒下来放到锅里面煮，除虱子嘛。我把老奶奶弄得里里外外干干净净，都挺高兴的。没想到，晚上她就发开高烧了。烧得不行了，她说：“孩子，阎王要收我走呀。”她讲迷信，从来不得病的，也从来不用药。我一想，是我给人家弄病了，内蒙古的3月很冷，我那份折腾，整整折腾了一天，尤其是不应该给她洗澡洗头，换换衣服还行。结果我也不敢声张，因为院里还住着她的儿子，她的儿媳妇人也可好了。

第二天，我悄悄到卫生所买了一支九分钱的安痛定。给我奶奶治病的那两个注射器不是带着嘛，临下乡的时候我去问过那个大夫：“阿姨，到了农村以后，我这个注射器怎么用啊？到哪儿消毒？”她说：“你把它们放到锅里煮半个小时就行了。”我把注射器煮好，就给老奶奶打了一针。她的病很快就好了。这跟她从来不用药、不打针有关。大娘感激得不得了，逢人就宣传开了：“哎呀，这个孩子不得了呀，真神了，我病成那个样子，一针就给我扎好了。”这样，就开始有人悄悄地找我看病：“你给我们看看病吧。”伸着胳臂：“你给我摸摸脉吧，你们家是不是祖传的？”你越说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越说：“哎呀，不要保密了，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扎一针完了。”我就琢磨着回去买了本《红医疗手册》，小小的，红塑料皮。里面讲紫药水、红药水怎么用。和那些同时下乡的娇生惯养的知青比，吃惯了苦的我，很快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再加上那一针的神传，不久，我就被推荐到大队卫生所当了卫生员。



在老农家

我们这个大队特别大，有三千多人，八个生产队，村里举办“赤脚医生”[4]学习班，学期三个月。一个生产队出两个人，主要的宗旨是在田间地头为人民服务，那会儿就宣传这个。还安排了一个月上山采药，说是用一根针一把草药治病。我们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公里，住在穷山沟的一个村子里，准备第二天采药。

这个采药队伍将近20个人，只有两个女的。正赶上我们房东家的媳妇生孩子，点名要个女大夫。哪有女大夫呀？我才17岁，和我一起的那个女的比我大点儿，是农村的，傻呼呼的，人家也不愿意让她去。有个男大夫带队，他懂接生，但是房东又不让男人进去，必须是女的。在农村生孩子请接生婆，他儿子要骑着驴走50里路才能找到接生婆，时间来不及了。那个男大夫就说：“海燕，你去接吧。”哎呀，把我吓得。我说：“怎么个接法？我不知道啊。”“没事，我在窗户外面，我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我说：“做点儿什么准备呀？”“人家都懂，锅里面煮上一把剪子，煮上注射器。”煮注射器我知道有用，煮剪子干啥却不清楚，还以为是讲迷信呢。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那孩子是从哪儿生出来？”因为这个问题过去问过我妈，她说有的是从耳朵眼儿钻出来的，有的是从肚脐眼儿钻出来的。从耳朵眼儿、肚脐眼儿能钻出来这么大的人？我就老琢磨不透，但是大人不说我也不知道。那到底从哪儿出来的？我这一问，笑坏了他们。有个农民说：“屙出来的。”我一想：“哎呀妈呀，屙出来的，这不到处都是屎啊？”我说：“那孩子出来到处都是

屎怎么洗呀？”他们就笑：“没有。”我说：“不是嫌脏，我不怕脏，是怕把孩子洗坏了，告诉我怎么洗就行了。”“你别问了，我让你干啥你干啥就行了。”我能干啥？人家有妈妈和婆婆都在那儿守着，我在旁边看着，紧张得要命。

男医生在窗外指挥，屋里有两个阿婆助产，其实我一点儿忙也帮不上，但她们总觉得有个“大夫”在身边放心些。我所有的工具就是在锅里煮的两样东西，一把剪子、一个注射器。一会儿，孩子很顺利就生下来了，我很兴奋。看见有一根肉绳子连着另一头，我不懂那是脐带，马上向窗外喊：“生下来了，是个儿子。生下一个，还有一个，有一根绳子连着呢。是俩，是双胞胎。”旁边的婆婆忙说：“孩子，没有啦，就一个。”我不信，说：“还有呢，那个绳还连着呢。”我不知道这是根连着胎盘的脐带，还一个劲地喊。大家都笑了：“别说啦，没有了，就一个。”我说：“明明有根绳子连着嘛。”

半个钟头过去了，产妇的胎盘下不来，哗哗地大出血，可危险啦。我也不懂呀，外面那个男大夫急得团团转，但是主人就是不让他进去。这家的婆婆就开始讲迷信了，喊外头的儿子：“上房去，往下冲。”于是他挑了一挑水顺着烟洞往下倒，一倒水就哗地流到炕洞子里了。我们听得清清楚楚的。外面喊：“下来了没？”我这边一拽脐带说：“没下来。”人家想让我说“下来了”，虽然不是我接的生，但我是主角啊，我是医生呀，这话必须让我说才准嘛。婆婆一听急了：“哎呀，这个愣孩子，这桶水白倒了，不能这样说。那明明冲下来了，你没听见哗哗地响？”啊，原来说的是水下来了。“你可不能说没下来啦！”我终于琢磨过味儿来了。这时外面喊着：“让你说啥你说啥。”“好好好。”接着就倒了第二桶水，听见哗哗的水声，我赶紧喊“下来啦”，同时，阿婆将产妇的长辫子拆开，把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往她嘴里猛塞。产妇一恶心一用劲，还真灵，胎盘真的就“下来了”。

大伙高兴极了，非要让我给孩子取个名字。他家姓石，我说这周围全是大山，全是石头：“那就叫石磊吧，身体硬朗，全是石头，四块石头。”那是1971年。我17岁时接了这么一个孩子，现在他已经31岁了。

从学习班回村后，已经是农闲，我爸给我联系到内蒙古医院的针灸科学针灸，那会儿不管你有没有学历就可以去学。半年以后，能盯门诊了。针灸不需要太多的理论，知道哪是经络、哪是穴位就行。大夫告诉你怎么量，怎么扎，一天好几十个病人我都能处理。这样的针道，你想想到了农村还不好使吗？农村的病人，腰腿痛、胳臂痛的特别多，一般都是扎针。

我扎针的效果可好啦，因为他们很少治病。农民是最现实的，疗效好他就愿意找你。这时，我发现村里有一个瘫了13年的32岁的农民，就跑到他家去了。因为我在内蒙古医院学习的时候，正好上了个截瘫学习班，学习治疗各种煤矿事故外伤造成的截瘫，我想：能不能用那一套办法扎？于是开始给他试扎。说起来也怪，我去的时候这人惨到什么程度啊？敲他的腿当当当响，除了骨头就是干皮，没有肉，整个像木乃伊。他是第九胸椎以下痉挛性的瘫痪，没有知觉，大小便失禁，稍微动一下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或者捅他一下，他就像触电一样，开始抽，开始抖，抖得你根本就按不住，越按越抽，一直抖过去那个劲儿他才松弛下来，又软得不行。平时，他在炕头上用两个手扶着能坐起来，也能睡，但睡的时候要慢慢地睡，就怕痉挛。在炕上坐着，要想挪动一下都不行，身体虚弱，很怕冷。他自己说："我是一个又软又硬的活死人。"

来到他家，遇到一个孩子过生日，正在灶上蒸糕。那灶连着炕头，他在炕头上坐着，灶火烧得太大了，满屋子撩毛味，再一看他屁股底下，早烤得脱了一层皮。赶紧给他挪开。烤到什么程度？皮都焦了，往外流油，他都没有痛感，不知道痛。

我看他太可怜了，还这么年轻，就说："我给你扎扎试试。为啥敢给你扎呢？因为你不痛，你要痛我就不敢给你扎了，你这么重的病人我没有把握给你治好，还白让你受苦。"他同意了，高兴得呜呜地哭。他说从来没人理会过他。我说我刚刚参加了这么一个学习班，咱们试一下。他非常配合，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所有的穴位都扎上了针，把我那一包针全都扎进去了，把他扎得像个刺猬。谁知道哪一根针顶事？扎了以后就拿个本子记下来，今天扎的是什么穴位，明天扎的什么穴位。卫生所里的营养药给他拿点儿来吃，还有维生素B12，对神经有好处的营养针也给他打，进行穴位注射，反正是能上什么就上什么。通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治疗，我把能翻的资料全翻了，能掌握的"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天天把他扎成个刺猬我也不怕，主要是他没知觉不痛，而不是我艺高人胆大。

说来也怪，没多久，眼看着他那两条腿长出了肌肉，开始变粗，有腿肚子了。家里人高兴极了，天天揉一揉，摸一摸，逐渐有了水分，有了感觉。大小便虽然不能控制但有了知觉，解小手出来他知道热乎乎的。全身的痉挛也减轻了不少，他能够在炕上用手扶着很轻松地移动，后来慢慢地他自己能从炕上移动到地上站立，最后又能扶着小车迈步走了。他推着个底下安了轱辘的椅子，在地下很艰难地迈开步了，一步一步地能走这么十几步。

这摆在眼前的"大变活人"惊动了全村，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

神："哎呀，这个孩子神了，一针把那个史家的妈给扎好了，又把这个瘫子给扎好了，肯定是祖传的不露，有绝招的。"几十里、几百里甚至市里的病人都来找我看病，什么样的人都有，我都敢扎，来者不拒，也都不要钱，是合作医疗嘛。每天，卫生所里大队人马挤得满满的，天凉的时候在家里，天热的时候窗台底下坐的都是人。胳膊腿伸出来就扎，有时实在没办法，也不消毒，隔着衣服也扎。有的老头很迷信、很封建的，他不让你摸他的肉，隔着棉袄就扎。一包不够，两包，每天用的针可多了。

回家我跟我爸说："您知道我每天干啥呢？"我爸说："你每天干啥呢？"我说："我们那个卫生所养的全是刺猬。""为啥养那么多刺猬？""都是让我扎的，反正他们哪儿痛我就扎哪儿，有多少针都能用完，什么时候针不够了才少扎两针。"我爸说："这个愣头青。"那会儿真的是把我传神了，恨不得让我摸他一下，他的病就能好。我爸说怪了，人家原先有一句古话说："宁找鸿医不找神医，你现在就是鸿医，你现在就是走鸿运的这种鸿医，你就放心扎吧，危险的地方注意，别乱扎。"

我那会儿的心情特别好，每天就像玩儿一样，要是能扎好一个病人可高兴了。有点儿时间看看书，病人来了就给他们扎针，忙忙碌碌的一天很快就这样过去了，啥也没想过。越扎来的人越多，越扎技术提高得越快。那会儿知识青年不是要树先进典型吗？这事传出去很容易的，说有个神医可神了，是个知青。郊区团委听说了我的事，来了一个小伙子采访我。不巧的是，他来的那天我正好到市里买药，几十个病人正等我回来给他们看病，有的是从外村来的。小伙子就向这些人了解我的情况，热情的人们围着小伙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啥的都有，把我说神了，简直成了神仙了。因为他们全是我的病人，农村人特别朴实。

这个小伙子回去后激动得一晚上没睡觉，连夜写了篇报道，第二天早晨送到郊区广播站就广播了。记得那天中午，我们一人抱着个饭盒在知青大院的木头电线杆子旁吃饭，因为没地方坐就蹲在那儿吃。正抱着大馒头在那儿啃呢，就听见电线杆上捆着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是郊区广播站的中午广播……开始广播新闻，接着就播到了我。"哎，戏匣子里说你呢。"知识青年开玩笑。"胡说，说我干啥？""安海燕，太平庄的赤脚医生……"一下子我就吓傻了。那会儿的第一感觉就是完了，我不能吃这碗饭了，我是个"可教子女呀"，怎么能给贫下中农这么乱扎呀？因为那会儿没有人知道我，我等于是瞒着呢。我那会儿连个入团申请书都没敢写，因为写了申请一政审又曝光了。原来我是想入团入党，后来一想算了，能够平平静静在农村当个医生也不错，一入团政审知道

你是个“狗崽子”，不就全完了？这不，躲来躲去还是躲不了呀。这下子全完了，这一弄肯定要政审。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赤脚医生当不成了，我这种家庭出身能干什么？思想压力非常大。



在知青代表会上发言

没过几天摄影记者来了，各种各样的记者也都来了，报纸上你写一篇，他写一篇。我爸遇着报道我的就买一张，很多报纸还没有弄到，买到的只是一部分。大报小报写啥的都有：海燕高飞，海燕穿云飞，整版的文章登了好几次。[5]大报小报越写越神，居然把医学院的白发老教授给传了来，要总结医疗经验，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我是怎么解决的？他要研究。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全部经过，并把我的治疗笔录给了他，告诉他：“全在这里记着，到底哪一针哪一招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你拿去总结吧，我留着也没用。”居然连姓名都没问就把资料给了他。

我从一贯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乡村医生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浮在上面、被涂上重重政治色彩的典型人物。主宰我的人很多，知青办、妇联、团委、卫生部门等等。我属于党，属于革命，革命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干的。需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让开什么会就开什么会，总结先进材料，大会小会，什么会都让我去，我简直成了会虫子。很快，我就入了团，所以各种团代会肯定要去；我是个女的，妇女会肯定要去；我是

赤脚医生，卫生方面的会也要去；知青会更甭说了。这四个会都是娘家的会，我肯定得去。能沾上边的会，我是正式代表、主席团成员，沾不上边的我是特邀代表。

当时的会议，有几个人是必须参加的：一个是过去在林彪部队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一个叫浩特落，是部队的战斗英雄；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玉荣经常去，龙梅正上学呢，不去；再有一个就是我。有的时候还叫一个做过童养媳妇的人去，那个童养媳妇忆苦思甜特别会哭，哭得特别让人感动。基本上我们这几个人常在一起，大红花一戴，稀里糊涂“光荣”上几天，隔几天再来一次。我的发言稿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不断润色，今天骂林彪，明天骂孔夫子，后天骂宋江。大部分发言稿是预先打印好的，我不用过脑，上台一念，革命任务即告完成。

有时，一些与我无关的会我都不知道说的是啥。一次开会，我觉得烦得不行，因为我在村里劳动干活儿不觉得一天天的难熬，开个会怎么这么难熬啊？贴的标语跟你也没什么关系，这个讲话那个讲话，结果还把你弄到主席台上。我坐在那儿困得不行，又不敢睡，就跟玉荣说：“咱俩去跳皮筋吧，我书包里拿着皮筋呢，拿皮筋拴在树上咱俩就能跳。这会是大人的会，跟咱俩没关系。”玉荣说：“你忘了？我有一个脚是假脚。”



与知青代表在一起（中间为战斗英雄）

我这个“公众典型”受到了许多部门的关怀。一次会议上，有位领导说我“太嫩”，马上遭到了批判，说他要“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结果惹恼了这位领导，以后不止一次给我“设障”。到底设的什么障我一概不知，都是他们自己在说。有一段时间，发言稿必须要写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特别是当领导的知青典型发言稿上好加这些内容。我的材料上净是些治病呀，采药呀，不大好加这些内容，最多骂骂“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怎么残害贫下中农、造成农民缺医少药之类的话。

我一个月最少有10天在外面开会。有些病人都是有疗程的，尤其是从很远地方来的病人就住在村里等你呀。但是多会儿开会，开多长时间的会，都不是我能掌握的。久而久之，村民们不干啦。你说去吧，村里人骂你，说你漂在上面啦，脱离群众啦；你说不去吧，上头说你骄傲自满了，翘尾巴啦，请不动啦，把你夹在中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个个都盖着大红公章，都代表组织，代表革命。这事儿最后给弄到自治区党委去了，为了保护先进，决定不经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同意，不许外出开会，这样才解脱了我。当时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是自治区副主席沈新发，他批了我才能去。这下子才卡住了。后来，除了知青会，我啥会都不参加，我说我就是个知识青年，其他啥也不是。

本来挺高兴的，没想到，稀里糊涂就搅到农村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了。从此我就开始倒霉了。

我们卫生所是负责给三千多人看病的，一共有五个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夫姓赵，他是个真正的地主，但是因为懂点儿医道，就让他在卫生所。这个人是什么人都不得罪，生怕触上霉头，见面三分笑，点头又哈腰，要啥药我给你开啥药，反正你不骂我不批斗我就行。还有一个四十多岁姓崔的大夫，原来是县医院院长，就因为跟军人家属乱搞上了，落了个破坏军婚罪，差点没被判刑。就因为这作风问题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发配回了农村。他是村里的医学“大拿”，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正经的中专毕业，实实在在是个懂医的。药房里有一个男的姓石，是拿药的，三十多岁。还有一个搞计划生育打针输液的女护士，姓李，四十多岁。再有一个是我。

这三千多人都是免费医疗，所有的医疗费都是队里出，只要挂个五分钱的号就可以随便开药。个别的营养药是自费，但是营养药一般的人也不开。队里的医疗费平均起来一年一人四块五毛钱，让大夫掌握使用。那么，你当大夫的笔杆就不能瞎开了，就得卡着点儿。大夫既是个肥缺又是个非常难掌握分寸的工作，这里就免不了当权的人、有面子的人吃点儿好药，普通老百姓吃的药就差一点儿了，有时候还克克扣扣，有好多的人得病就是拿命扛了。

卫生所的大夫是技术型的，没人敢惹。但是药房确实是个肥缺，能进药房里掌握药，这是三千多人都盯着的一个岗位。药房里那个男的为了保护他的位置，也是出于一种生存的本能需要，就不得不维护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我们药房的什么木耳呀银耳呀枸杞呀，只要是能当菜吃的，都当处方给开了，人参鹿茸也经常是一部分干部吃的营养药。问题的焦点还有啥？去痛片过去叫索米痛，这里面有一些吗啡成分；还有一种叫安纳加。这两种都是限制供应的药。去痛片每个月能给1000片或者2000片，一般村里人腰腿痛的比较多，老年人都喜欢吃一片去痛片，吃了就精神了，也成不了瘾，但是不吃还难受。经常有人来开这个药。我们卫生所就控制了，老撒谎，今天说没有了，没开回来，明天又变出来了。有的时候开的本来是去痛片，就不说是去痛片，不敢说出去，怕大伙闹意见。主管药房的这个男的老婆跟他打架、闹离婚，把他在药房给谁开的什么药在全村都给抖搂出来了，群众意见当然大了：当官的吃好的，我们的医疗费都让他们给占了。因为呼声太大，就让他回家劳动去了。

这么一个肥缺谁来干啊？谁没有个三亲六故的，都要抢这个位置。在实在找不到平衡点的情况下，最后决定：还是让安海燕去吧，她是个外乡人，又是个先进知识青年，让她去谁都不能说什么吧？这样，把那姓石的炒回家去，把我弄进来了。

我根本就不懂这里面的道道儿，非常原则地按卫生所的决定办，那几种镇定药该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什么银耳木耳、人参鹿茸的，谁吃呀？根本就不进。买药计划里就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一下子就伤害了一批人，一部分是当官的，一部分是地痞流氓。村里人称后者叫“灰菜旗杆”。农村的地痞流氓比那电影里的活生生的还厉害，那么大的村子里有几十个。你知道都是些什么样的流氓？他们在旧社会的时候是大烟鬼，大部分都有大烟瘾，离不开去痛片和安纳加。他们把药片放在烟盒里面的锡箔纸上，把一根自行车车辐条或者火钩子给烧红了，再拿到锡箔纸下一烫，药片就冒烟了，再拿张纸卷个筒吸进去。吸进去以后还不舍得吐，死劲憋着这口气。身边放着一碗水，顺着就把这碗水给咽进去了，实在憋的不行了这口气才出来了。当地还有句俗话，这叫“水推云，上西天”。吸完以后人特别精神，说是可舒服了。有的时候还说让我吸一口，我可不吸。

这些人不吃饭可以，不吸这个难受得不行，就跟我闹，我就是不给他们。在卫生所里我就说了，以后药房就不进这种药，安纳加不进，去痛片是病人才能用呢，谁吸大烟他自己弄去，卫生所是贫下中农的，怎么能让这些人捣乱？！我单纯到只知照章办事，连住在一个院的老两口

的去痛片也给断了顿。实际上，多年来此类药品早已成了少数人的特供品。我只认处方不认人，一下子就给卡死了，他们能不恨我？恨不得把你一脚踹出卫生所，就是拿你没办法。你又是个先进，又谁也不怕，怎么弄你呢？你要是想回城，拿回城指标吓唬吓唬你，或者干脆给个指标把你弄走，但我就是不走。曾经给我一个上大学的指标，我硬是不走，当时真有一种腹背受敌孤军奋战的感觉。让你走你不走，弄不出去你，你说这不是个眼中钉？天天大烟瘾一上来就恨死你了，恨不能把你杀了。这帮人干吗呢？没事干就坐在那里研究怎么害我。我说编电视剧都是非常生动的，我既然敢写出来敢说出来的都是有真名真姓的，而且这一切都是市委组织调查组了解过的。

开始整我的一些情况，还是我离开那个大队两年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是蒙蒙眬眬有些感觉，但是并不了解具体内容，包括造我的一些谣言。有一天，郊区团委的一个副书记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市里去谈话，说："你要注意政治影响，你现在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我那会儿对这几个字还不是太理解。"比如说你现在骑的自行车是谁给你买的？"我说："我自己买的呀。"他又说："真是你自己买的？"我说："真是我自己买的。"我确确实实是用头一年下乡分红的钱买的自行车。为啥？村里三千多口人，村子南北1.5公里，东西2公里，这么大的村子，我一会儿在村子东边，一会儿在村子西边，如果没有一辆自行车哪行？大喇叭里喊："安海燕，赶快到村东头，×队的，××家，有急病。"就这么反复喊上几嗓子，你心里就跳啊，这"急病"两个字和人命有啥区别？就得跑着去。你想，一个人满村子跑，能跑过来吗？那个年代，自行车是奢侈品，哪好意思跟人借，谁家嫁、娶能有辆自行车，那就是好人家。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上，全大队一年给的几个自行车票都是抓阄来决定的。



海燕在学习

不过，我为了借自行车确实出过一件事。姓崔的大夫是被开除回来的，他爱人有点儿神经质，凡是跟他接触的女的她都怀疑，就是从来不怀疑我。我也没往这上面想，因为我太小了，才17岁，她怎么能怀疑到我这儿？我比她儿子还小，他儿子都快娶媳妇了。我把他们当长辈，在卫生所叫他崔大夫，在他们家叫他崔叔叔，跟他爱人叫阿姨，我怎么能往这上头想呢？他们那是大人的事情，离我可远了。我知道他爱人有病，怀疑这个怀疑那个，老听人家说那些笑话，但是从来没想到这事会跟我有关系，谁能往一个17岁的孩子身上想这些事情？尤其又是在那种年代。我的家庭、父亲是非常正统的，家里老是因为报纸上和新闻联播里的国家大事、国际大事争论不休，生活中没有那些琐碎的事，更没有谈论过男女方面的事。

崔大夫有辆自行车，他自己常骑车满村跑，有时正赶上他在卫生所我就临时借用一下。因为卫生所就那么几个人，他开了处方，我得出去打针，骑上他的车子打上针就回来了。没想到，这辆自行车就给我找上了麻烦。

卫生所控制的那些药，有些人天天吸，老农民几乎都吃不上，都供了他们。我一下子给他们断了顿，这一群流氓就冲着我来了。当时我不知道呀，因为他们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又不惹他们谁，执行的是卫生所的制度，药房是我的正常工作，跟他们是不搭界的。

有一个老头叫“鬼来红”，六七十岁了。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家伙最鬼，也是村里的老光棍、老地痞，只要有酒让他干啥他干啥，农村叫这种人“灰菜旗杆”，是没人敢惹、没人敢理的这么一个人。有一天，有个地痞用一斤散酒唆使他到崔大夫老婆那儿，告诉她崔大夫跟我“不干净”，还对她说崔大夫把自行车送给我了，我经常骑着车子满街转。

崔大夫的老婆不相信别人但是相信我，对我不太怀疑。她不相信但也没办法呀，想自己到卫生所问又怕她男的，于是就让九岁的女儿巧珍不去上学，天天在我那儿守着我。我问：“巧珍，你咋还不上学？”“我妈不让我上了。”那会儿上学不用交学费。我说：“你妈为啥不让你上学了？”“不知道，不让我上了。”实际上，她妈安排的任务她都知道，就是监视我，看看我和崔大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她妈妈说：“阿姨，你怎么不让她上学了？什么年代了，你们还这样重男轻女？你不让她上学干啥呀？”如果那会儿她要是真的没有学费，我肯定会赞助她呢，看着那么好的孩子真可怜。我又跟崔大夫说：“你还是个中专生呢，你是在外面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能不让孩子上学？我就想不通你们。”我给巧珍出主意：“要不然你回去天天闹，天天哭着要上学，她就让你上了。再不然你把书拿来，阿姨帮你复习。等哪天你妈高兴就让你上了，别拉下功课。”她每天拿课本来我就教她，一个多月以后这孩子回去上课了。我还以为是我努力的结果呢，闹了半天是人家挑拨完了，她妈让她跟踪我，我走到哪儿她跟我到哪儿，我走到哪儿把她领到哪儿，我觉得她愿意跟着我，跟我挺好，我也挺喜欢这个孩子的，她是个小孩嘛。她每天跟她妈汇报我干了些什么，见到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她妈就排除了怀疑。以后这事就平息了。

借着巧珍监视我的事，“灰菜旗杆”开始在外面宣传了：“你看那两个人混着呢，人家孩子都没法上学，跟踪她，监视她。”四处造舆论，我呢还傻乎乎的啥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是借自行车出了问题，就再也不骑崔大夫的自行车了。第一年的分红我分了一百多块钱，那会儿自行车买不上，我还托人到别的公社的罗家营村弄了张票。我不敢跟队里要自行车票，因为我是先进，我要搞特殊化又该让人说了。我们村都是抓阄，谁抓上谁买，很难弄到。我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没舍得骑，就让给我哥了。我说，骑也骑不出个好来，每天满村跑。换回来一辆旧红旗，反正也有交通工具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来。这次领导找我正式谈话，问我骑的自行车是谁给我买的。我说：“自己买的呀。”“真是你自己买的？”“真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是用分红的钱买的。”“有没有你骑别人自行车的事？”我

说："有，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还因为骑自行车闹过一次误会。"他就让我注意。你说，我那么点儿的一个孩子我受得了吗？那时就想到肯定是有人给我造谣了，这市里传的比村里还快。我只听说传我"作风不好"，开始没当回事，因为许多先进都会遇到这种事。结束谈话出来，我还在生气，骑着自行车一边哭一边往回走，走到外面的荒郊野地没人的地方就放声大哭，哭了有一个多小时。把我这两年多的苦水使劲地往外吐了吐，觉得这下心里舒服多了，就跟出了一口恶气似的。那是第一次感觉到受侮辱了。其实，人家领导找我谈话没说什么，就问了问自行车的事。联想到曾经有过的误会，我就想，还不知道他们说我啥呢，我错在哪儿啦？借用一下别人的自行车就给我扣上"作风不好"的帽子，我怎么也想不通，真受不了。那会儿一气之下如果想不通真有死的可能。

这件事在我的心上重重地戳了一刀，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单纯活泼了，自己也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性格一下子变了，不爱说话了，也不爱笑了，从那时起我就怕所有的男的，特别注意回避他们，跟他们躲得远远的，就像变了一个人。我不愿意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我借了几十本人物传记，尤其是关于女强人的，看看她们有没有和我同样的遭遇，她们又是怎么想的。这个风波过去以后我还不知道，他们还在算计我，只要有一点点能够利用的东西就会利用起来。

卫生所里那个负责计划生育的女护士李果桃，崔大夫的爱人怀疑她一点儿也不错，他们确实有这么回事。崔大夫和李果桃他俩都四十多岁了，整天在那儿动手动脚。让我给撞上过，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但人家不怕我，觉得我这个傻瓜什么也不懂。有一次，那个女的说："崔大夫，你看我这个手烧的。"这个崔大夫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先是摸她的胳膊，顺势就摸到她的脸上了。我一见，刷的弄了个大红脸，一下子把装注射器的盘子盖给扔了，把门一摔就走了。还有一次，李果桃病了，躺在家里的炕上输液，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实际上也用不着输液。我守在那儿给她输液，崔大夫也在跟前。她躺在炕上，就穿了个小背心和小三角裤衩。一会儿，哗的一下就把那被子给踢开了，我赶快给她揪上，心想，一个男的在这儿坐着，你怎么这样呀？你又不是昏迷不醒又不是发高烧，就是个普通的小感冒，如果你嫌难受穿上衣服嘛。觉得这个女的怎么这样？挺不自尊的。后来，他们开始装修卫生所的房子，搭了个小阁楼子。本来一间不太大的房子，没必要那样搞，干啥呀，弄得黑咕隆咚的。再一想，由你们折腾去吧，我又不是这儿的主管。一次我进去了，两个人就在那儿抱着，被我撞上了，把我搞了个大红脸，扭头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就不敢直接进卫生所，只要一进大门离卫生所还有十几步远，就喊上了："谁在卫生所呢？"那就是告诉他

们，你们俩要是搂着呢就赶快分开，我要进去了。要是有别人的时候我就大胆进去了，没有别人的时候我就不敢进那个屋，就怕撞上。我知道他们俩肯定是不对劲的，但是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是不清楚。

有一天，“鬼来红”又被人拿酒灌了，去分管卫生所的卢所长家。当时他是卫生所所长，但是不到卫生所上班，是村支部委员，现在还在那儿当大夫呢。他的爱人叫玉莲。“鬼来红”对玉莲说：“你家里的可是跟海燕不对了！”玉莲说：“咋不对了？你看见啥啦？你给我滚出去，我知道你想干啥了，海燕是个啥孩子我还不知道？你要是再这样胡说八道，看我把你的嘴撕烂！”她是我的老病人，她的孩子也常有病，我老到她家去，我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

“鬼来红”走了以后，玉莲觉得我住在卫生所太危险，因为她听到的太多了。可我不知道啊，还蒙在鼓里。她跟儿子两个人也没跟我商量，就把我的行李抱到她家去了，说：“你别回去了。”但是她也不跟我说啥。为什么不让我在那儿住？她说：“这么大的村子里什么样的坏人没有？半夜三更的，砰砰砰一敲窗户，你跟上人家就走，把你领到哪儿去了、干啥你都不知道。我男人是负责卫生所的，你是个先进，你要是出了点儿啥问题，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男人负不起责，上边来跟我要人我怎么办？一个是跟你的家长我没法交代，另外一个我们跟上级也没法交代，你就住在我家里。”

我们本来关系挺好，另外，环境的复杂也使我真的不想在那儿住了。为什么我住卫生所而不在知青大院住呢？我刚开始是跟那个老大娘住，后来有一些老知青走了，腾出来房子我就住进去了。作为知青先进，“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个态度肯定要表的，表这个态时心里真犯嘀咕。我下乡时已不是主动要求下去的那个年代，而是不由分说百分之百送下去，许多人不是笑着下去的，而是哭着下去的。全村一百五十多知青，大家为回城指标，各找各的路子，费尽心机。你一个人在那里喊扎根，唾沫都能淹死你，但不喊又不行，革命需要。我这个表态遭到了冷嘲热讽，压力很大，甚至到食堂吃饭都要受气。很自然的，我在知青队伍中成了一只孤雁。我本来就是孤雁，下乡时就没和本校的同学住在一起，同来的知青一个不认识，下乡住在老乡家，卫生所工作又比下地劳动看着清闲，这许多的因素，决定了我在这个村知青队伍中的孤立是难免的。

好大的大院子住了六十多个知青，一大排房子，一模一样，都一边大，白天都分不清，别说晚上了。经常半夜三更有人找我看病，不知我住在哪屋，便扯着嗓子大喊。农民他不管那一套，他需要大夫，他想怎么喊就扯着嗓子怎么喊。当我赶紧穿衣服出来时，已经把全院子六十多

人都吵醒了。女青年还好，有些男知青很野，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你一天风不吹日不晒的，爷们一天劳累得要死，晚上还不让睡？”我多少次暗暗地流泪，但也不能怪他们，人家劳累了一天心情也不好，半夜三更谁不烦？没办法，我就跟大队商量，让大队给我安排个住处，队里也没有地方住，就让我住在卫生所。

卫生所给我安排了半间房，一间房子中间隔了一堵墙，我住的这个房子后半部是药房，有个窗户，就是农村的那种大窗户，差不多一米五长，宽度也有六七十公分，要打开，一掀拿木头支上就行了。我放了一张床就没有一米宽的地儿了，弄了个小小的小桌子，这就是我的家。我便成了全村24小时全天候值班的惟一一个人，24小时随叫随到。那时村里的医疗真方便，比现在城里人看病还方便得多，大部分是出诊，尤其是输液，一守几个小时。我经常是昼夜不分，熬得血压经常是高压70—80，起床猛点儿就眼冒金星，白天还要咬牙坚持。没有环境和时间让你用来补充睡眠。我1.65米的身高，体重才八十多斤。只要有口气我是能坚持的，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激励着我，打心眼儿里没有怨言。



海燕在知青代表会上（1974年）

卫生所独门独院，隔壁院里住着老两口，有七十几岁了。那个女的是一辈子当妓女，男的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穷得没办法娶媳妇，解放后就从妓院领回来一个，所以他们没儿没女，村里把他们当了五保户[6]养起来了。他家就成了扑克房，全村没人敢惹的“灰菜旗杆”大部分晚上吃完饭就来了，聚集在这儿打扑克，一直到天亮。天亮以前睡觉的

时候很少，白天再回家睡觉。那个老太太玩扑克的时候，腿放在别人的身上暖着。我很少到那屋子去，觉得乌烟瘴气。你想要睡觉？看看这个环境，你能睡得好吗？

这次玉莲正好让我在她家住，住就住吧。但是我傻到什么程度？人家才三十多岁，我和他们睡在一个炕上有一年多，我一点儿也不懂还有应该回避的事情。我旁边是玉莲，那边就是她男人，这边是她刚上小学的六七岁的儿子，我睡觉的时候搂着他，挨着我睡。我稀里糊涂地就在人家睡了一年多，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睡觉。后来我听到一点儿风言风语，又有人说他男人和我怎么了，可是这位卢支委在村里名声极好，威信极高，属于邪不压正的那种人，我在他家睡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谁能把屎盆子扣到他头上。我觉得这样下去对人家不好，执意要搬回卫生所，死活不在他家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确实是救了我一命，如果我这一年多不是在他家住，真的要出事了，因为那些人就是要害死我，想尽一切办法想把我置于死地。

上边领导找我谈话，问我自行车的事，那些日子我像个精神病人。有一天早晨起来一看，我住的屋门大开着，窗户大支着，电灯亮着，我和衣而卧。更使我不解的是卫生所里发了水灾，所里的水缸和所有的盆都装满了水，更怪的是我住的房间凡是口朝上的东西，包括墨水瓶、鞋和暖瓶盖里也都是水。而且这么大的大窗户掀开，窗帘掀开，门开着，我却在里面睡觉，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啊。我门前有个辘轳井，挑一挑水要摇四次，把卫生所里所有的水缸全挑满了你知道要跑几次？怎么也得四五担水。哎呀，有了鬼了，真有了鬼了，我想世界上真是有鬼了！头一天这样，第二天这样，第三天我睡前在纸上写上：“某月某日某点关灯关窗锁门，缸里半缸水，盆里鞋里均无水。”早晨起来依旧全是水。我又不敢说，就老想这是什么样的鬼。肯定不是我干的呀，肯定是鬼干的。到了第四天夜里，我挑了个担子又往出走的时候，一头撞在那铁门上了，这下把我给撞醒了。我见自己挑着个空水桶正要往外走，才发现是自己脑子出问题了，这就叫夜游症。我就开始吃安眠药，吃了好长时间的安眠药，并对外说我太累了，为了躲出诊，到知青院里住了几天缓了过来。这事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否则又要编出什么离奇的故事。你说半夜里神志不清醒，打那么多次的水也没掉到井里去，悬不悬？现在想起来真命大！

有一天，“鬼来红”拿了一张赵大夫也就是那老地主给他开的输液用的10%的葡萄糖处方来取药，我说：“你好好的输什么液呀你？”他说：“爷当糖水喝的，你管得着吗？”他交了五分钱就要拿走葡萄糖。我就不给他，说：“你去改个自费处方去，因为营养药是自费的，拿来喝

可以，开自费处方去。”他就开始大骂，骂得很脏很难听，实际上他是故意来闹的。我就去找那个老地主，他是谁要什么药就给什么药，他才不管呢，我把处方摔给了他，说：“你为什么给他开这样的方子？是你开的让他拿来喝的？”“啊呀，我没办法，这种灰人我得罪不起的，快给他吧。”我说，就是不给。这是卫生所第一次吵架。

隔了没几天，我早晨5点钟就起来了，因为有好几个炉子呢，我就早早地把炉灰掏了，把炉子点着，把水给打满了，这一折腾啊，天就亮了。天一亮，这病人就要开始来了。院子里的那个当过妓女的老太太冯根娣先来了，她早晨从来不起来，因为刚入睡，这一次很反常。她说：“给我拿200片去痛片。”我说没有了。她说：“昨天刚买回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昨天刚买回来的？”“果桃告诉我了。”“刚买回来1000片，我拿200片。”“全村才拿了1000片，你就拿200片？不可能。”“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你不给我当时就给你死下，我反正这么大岁数了，没有这个片儿我活不了，我现在就给你死下。”院子里黑乎乎的就我们两个人，这个老太太是当了大半辈子妓女的人，她自己讲她是没有不能干的事。我怕出事呀，连个证人也没有。被逼无奈，给她包了100片，并要她补处方，我说：“先这样吧，黑天半夜的，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按说我没有权利给你，现在先给你拿上100片，天亮了以后你让大夫给你开处方，开了处方你再交钱，现在我不收你钱，你拿着100片走吧。”她拿上100片走了。

天一亮，卫生所的人都来了，我就要求开会，把卫生所卢所长也叫来了。我说：“前两天出现了开葡萄糖喝，不给就闹事的事。我们内部已经定下来了，去痛片是敏感药，买回来以后不能跟任何人说，如果有要止痛片的病人就给他开上点儿，这样胡要我们招架不了。怎么我头天买回来药，第二天就有人知道了？早晨就跟我闹，不得不给她100片，如果不给，就要死要活的，我知道她要干啥？”因为批评了李果桃，她在里边痛哭流涕。我说：“我没到药房以前，不知道这些事情，你们这不是故意给我出难题吗？有意见咱们公开说，桌面上说，别这样啊。”“啊呀，我不是故意的，她问我呢，我就告诉她药来了，没有别的意思。”李果桃赶紧解释。

没想到那个老太太根本没睡，就站在门外偷听，她就不干了，一下冲到屋里，说她不活啦，用头对着我就撞过来了。我赶紧一躲，她就戳在那儿了。那时人都上班了嘛，病人也来了不少。她爬起来连撞了我好几下都没撞着，我就跑出来到了院子里，她满院子追我。这院子不大，墙上房上都是看热闹的人。“不活啦，不活啦”，她一边叫着还一边骂我，骂我的那些话我也听不大懂。好不容易一帮人把她给弄住了。旁边

一个老太太快80岁了，她是我们村长的妈，就在隔壁住着。老太太特好，我也老给她看病，这老太太说："姑娘，别在这儿待了，都是一群灰人啊，啥事做不出来？村里人都怕他们，你住在这儿可太危险了，不要在这儿住了。姑娘，你赶快回家找你妈去吧。你听听她骂了些啥？这要是村里的姑娘，人家能把她的嘴撕了，人家可不让她呀。只是你们是城里来的，家长都不在这儿。你赶快回吧，不要在这儿住了。"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我真的应付不了啦。就因为我是"先进"要注意"影响"，有气不能撒，有话不能讲，这一群"贫下中农"对我的"再教育"真是刻骨铭心！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经常被噩梦惊醒，梦见的总是这几个恶鬼在干坏事。

我回到家，第一次把在村里的处境讲给了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右派父亲，那时我母亲还被关着。我真不忍心再折磨他，实在是无处诉说，我快要憋疯啦。父亲听后气得直发抖，满地打转说："士可杀，不可辱；士可杀，不可辱……"一句话没完没了地讲，我真后悔不该回来就跟他讲这些。天刚亮，他要骑车到村里"找他们算账"，我跪下求他："爸，你千万不能去啊，你一个牛鬼蛇神找'贫下中农'算账，他们把你打死都是你不对呀！"父亲哭了，这是我见到他惟一的一次哭。红卫兵打他，批斗他，他受尽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来没哭过。

父亲答应不到村里去，我也决定暂时不回村。不料，父亲还是偷偷地骑上他那辆破车跑了二十多公里到了村里，找到了村支书，要求冯根娣解释她讲的话和骂的话。村里召开了村干部会，把冯根娣找来，她一进门就扇了自己几个嘴巴子，一个劲儿地解释她骂的不是我，骂的是崔大夫，崔大夫是她的远房外甥女婿，并说："咱是灰人（坏人），干了一辈子灰事，人家海燕是棱瓣也没开的好闺女，咱儿花、女花没一花，修个好死得了。"自己把自己骂得体无完肤。村长书记一个劲儿地给父亲赔礼，围观的几百号人怪叫着轰走了冯根娣。回家后，老爷子讲那是一群流氓无产者，是人渣，同时也为我的安全担心起来。这一场折腾总算过去了，暂时风平浪静地过了一年。但是他们公开不闹了，背后还在闹，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第二年，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复杂，但是想走也走不了，因为我是标兵。我不想当先进，也不想当标兵，就是走不了呀，党不让你走，你能走吗？你死都得死在这儿。吃苦受累我都不怕，今天需要我去要饭，拿上打狗棍就要饭去，都没有怨言的。但是今天造谣，明天污蔑，这种打击我受不了呀。他们背后弄你，我不知道这些人要干什么，我那么一点儿经历对付不了他们，他们要干的事情我不懂，骂到我头上我也听不懂，我怎么能应付得了这帮人？

后来，我就老想着离开这个地方。怎么个离开法呢？1974年3月，我向郊区知青办递交了一份申请：“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我哪儿也不挑，你们就给我安排吧，只要是最艰苦、最缺医少药的地方我就锻炼去，我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并不是想离开农村不扎根农村了，但扎根我也得有块土壤才能扎下去吧，在这儿我没法扎下去，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知青大院不要我，住到农民家里像个什么？住到卫生所旁边有一群狼，连命都不保了，还怎么扎根？但是当时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那个背景没人知道，因为我不这样提出来就走不了呀。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不怕艰苦，我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群狼，我要躲开这个狼窝，我那会儿就是这样想的。

我的要求很快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3月份递上去，4月份就批了，报纸上头版头条做了追踪报道[7]，在内蒙古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又是我没想到的。我原本只是说换个地方就行了，这一下又变成了政治典型来抓，作为政治事件来炒作。紧接着又来了一篇《新的步伐》，报道了我在新环境的情况。

两年以后我才得知，就在我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又阴差阳错地躲过了一场大难。事情是这样的：崔大夫和李果桃的事，让果桃的男人给逮住了。果桃为了摘清自己，又去找药房被开除的主管商量对策，想陷害崔大夫，并澄清自己。这个前主管本来就想为被开除的事报复崔大夫，他的报复心特别强，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他还是想报复。这位先生可能一宿没睡觉，一夜之间将整个村里用黑、白两种涂料粉刷了百十条大标语：“崔毛驴”、“崔流氓”之类可多可多的脏话，满村都是。天一亮，村里就闹翻了锅。最后给崔大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

想不到是，这件事把我给澄清了。李果桃本意是想把责任推到崔大夫身上，她一不想离婚，二不想张扬，没想到这么一闹，全张扬出去了。她又开始憎恨那个被开除的前主管，最后哭哭啼啼地跑到村干部家，把那群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想陷害我的那些阴谋全抖搂出来了。其中说了一件让我心惊肉跳的事：我是4月20日离开太平庄的，头天夜里村里开了好几个欢送会，一直闹到凌晨。天快亮了，我就在知青屋里睡了几个小时。就在那天夜里，一场更大的陷害在等待着我。原来那个姓石的药房主管纠集了另外两个人埋伏在卫生所外，还带了两根绳子。他们预谋等我一回宿舍先把我捆起来，而后再到崔大夫家，撒个谎说那儿有急病人让你去，等他到了卫生所也给捆起来，号称把我们捉了奸送到公社去。不料等到快天亮了我也没回去，这三个人冻得实在受不了就回家了。

如果要是这样害成的话，我还能不能活？那天幸好我没回去，就没害成。这个李果桃还说：“你说歹毒不歹毒？差一点儿把人家海燕给害了。刚开始是造谣污蔑，造谣污蔑不成就想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点子陷害，海燕能活到现在可真不容易，那会儿我不敢说，怕他们杀了我，那群人真有动刀子的心。”

药房主管这一闹，崔大夫以上吊自杀了结了他不到50岁的生命，把个本想解脱自己的李女士搞得臭名远扬，她一气之下把陷害我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以表明她自己也是个受害者。那是两年后我才知道的。这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命真大！

三　落户山区

1974年4月20日早晨8点，我步行七十多里到了我的第三故乡——呼和浩特市郊的小井公社苦草坡（德胜）大队，一个养育了大青山游击队的革命老区。听说村里要来个女医生，全村上下别提多高兴了。村里派了一名比我早下几年乡的老知青牵着头驴到离村四十多里的山口等我，我很不好意思地上了驴，就像电影里演的回娘家一样。他牵着驴让我骑着，他在旁边走着，走着走着我说：“要不你骑吧，我下来，我牵着。”他说不用。我就下来走一会儿，骑一会儿。我也不会骑驴，骑驴也挺累的，我们走走歇歇就回村了。

我原来插队的太平庄是平原，条件特别好，是呼市郊区最富饶的村子。在这儿完全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到这儿以后，就想着今天干点儿啥，明天干点儿啥。实际上，那地方青山绿水，风景特别漂亮，就是离城太远，人没有文化，没有交通，过的是近乎原始的生活，但是生活得很平静。



海燕在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前

刚到村里，给我安排在一个革委会副主任也就是副村长家里住。你说那晚上一家人睡觉吧，按当地的风俗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可能是怕虱子咬，全家老老少少睡在一条炕上。男的四十多岁，还有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我们六个人挤在一条炕上。那边是男的，中间是女的，这边就是孩子。我在孩子边上，只好和衣而卧，永远是脸朝着墙，晚上翻个身也是睡着后的无意识动作。当时也是因为村里没有空房，让我跟这一家人住了几个月。

头一天晚上在他家吃晚饭，喝那莜麦面糊糊煮土豆，饿极了的我这么大的碗喝了好几碗，那会儿我可能吃呢，吃也吃不饱。天刚黑，没有电，全家都躺下睡觉。临睡的时候女主人告诉我，晚上不能出去，这几天正闹狼，刚咬死几只羊。你说你还敢不敢出门？哎呀，还没睡着就想上厕所了，不敢出去，四周鸦雀无声，又不好意思让女主人陪我去，因为我刚来这儿，全是生人。人家的地上放了一个大瓦盆当尿盆，全家人一会儿这个下去尿，一会儿那个又下去尿。他们不尿我还好受一点，这条件反射把我憋得更难受了。我不敢出去，又不敢在这个盆里尿，我怎么能在人家地下一点儿遮拦也没有就这样尿啊？我憋得浑身冒汗，好不

容易挨到了天蒙蒙亮，管他有没有狼爬起来就往那很远很远的没人的山沟里跑。其实，村里房前院后都是厕所，人拉下来的粪便猪狗随时就吃了。男的小便就找个墙角，女的就找房后没人的地方，咱们知青哪儿能这样啊？打那以后，晚上我再也不敢吃饱了，渴得不行也不敢喝水。

全村二百二十多口人分布在方圆70里的两条沟里，共有七个自然村。最少的一户人家只有老两口，有的村也就是三四户人家。我待的那个村是大队所在地，最大，有13户。两条大山沟中间隔着可大的大山，我就在这七个自然村里转。村里规定，谁家有病人我就跟谁走，吃百家饭，住百家屋。这是一个很穷的山沟沟，是全市郊县惟一的一个无电村，连电灯也没有，粮食是用石磨加工的。村民大部分是文盲，男的多，女的少，男的大部分是光棍，一个劳动日的分值就是五分钱到一毛左右，吃粮靠返销。这里特别闭塞，没有交通，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驴。有的人根本就不认识钱，你给他拿一张新版的人民币他都没见过，他们不花钱，就吃一把盐，酱油和醋之类的作料是没有的，连菜都不吃，夏天能挖点儿野菜吃也就不错了。土豆、莜面、盐，就这么简单的食物，油也很少。

我给你讲我吃的最恶心的一顿饭。我们一辈子吃多少饭，有几顿是能记住的？这顿饭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村里有个六七十岁的乞丐，旧社会就是讨饭的，他就喜欢讨饭，他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人家还说他是赤贫。他偷偷地出去讨饭，队里看都看不住他，他不在周围村子讨饭，到别的县里去讨饭。他就不愿意在这儿劳动，不愿意在这儿生活。他是个五保户，队里给他点儿生活费，但是他出去不讨饭就难受。他走了以后村里就四处找他，觉得他是在给共产党丢人了，怎么能让贫下中农讨饭去？我们现在的社会能出现讨饭的？就让人往回找他。但是他不回来谁能找到他？有一次他回来了，回来干啥来了？病了，是肺结核吐血，那个病最传染了。但是我是先进，我不能怕脏，我要是怕脏就是政治问题了，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做文章呢，为了革命为了党我也不能呀。



背着枪的海燕（摄于知青屋旁的羊圈前）

我给这个老头看病去了，原先受那“忆苦思甜”阶级教育时见有拿半个碗吃饭的，这人就是这样，半个掉碴儿的破碗，那双筷子是拿树枝子掰的。他就拿这筷子、碗招待我。这地方只有莜麦，高寒地区长不了别的，要想吃小麦得拿莜麦换，换回来过年过节来客人吃点儿，一年也就能吃两三顿。

这个老头也不洗手，他一辈子都没洗过手，你说脏不脏？他和了一块莜面，和完了面，就在自己的胳膊上弄成个片，撕下来放到那儿，再弄一片再撕下，摆满一个盖子了，放在那个锅里蒸。怎么蒸？他穿着件紫红色的绒线衣，你能看见那虱子刷刷地在他身上跑动。他把绒衣脱下来。我说：“大爷，你别脱，天这么冷，小心感冒还得咳嗽。”“哎，傻孩子，你不知道。”他哗的一下就把衣服盖在锅口上了。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没有锅盖，就拿它捂气。”虱子一遇热，都钻出来了，在那儿满世界地爬啊，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乱窜。我想这虱子可都得掉进锅里去了。等到掀起来的时候，那莜面是红色的，原来他那绒衣掉色，把莜面染成紫红色的了，虱子死了以后也都掉进去了。

村里有几个小伙子，其中有一个小学老师可坏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儿也没得罪过他，可他老看着我不顺眼，老想琢磨琢磨我。他和人打赌，打一盒太阳烟，那烟挺贵的，两毛二一盒，如果我吃了这顿饭，其中一个人就要赢一盒烟，一个人就要输一盒烟。他们一会儿就进来了，好像挺关心的：“吃了没？”我知道这两人有事，心想，这是敌敌畏也得喝进去，非得吃，让你们看看。那个老头拿了半个碗给我拌了一

点儿莜面说："姑娘，你吃吧。""大爷，您吃吧。"两人推让了半天，我就想，虱子也是肉，要不然怎么能吃进去呢？我咬着牙赶紧吃了半碗，紧接着就顺着那山沟跑呀，出去把胆汁都给吐出来了。哎呀，恶心得简直就是不行，你想能不恶心吗？这样的饭我都能吃进去，我把这些都当成政治任务了，就为了不给党丢人呀。村里人从来不洗脸，早饭后刷锅的水就这么一口，那抹布臭臭的、黏黏的，投完了以后这擦擦，那擦擦，一拧滑滑的。"海燕，你们知青爱洗脸，擦一把吧"，就递给你了。你还不好意思不擦，不擦是嫌贫下中农脏呢，擦吧，这么一擦，满脸都是臭味，黏糊糊的。山底下就是泉水，但是那会儿哪有香皂呀？根本没有香皂，怎么洗也洗不掉，一天怎么闻身上都是那股馊抹布味。就是那样，你也不能搞特殊，你也得人家吃啥你吃啥，人家住啥你住啥，从来也不说个不字。我时时提醒自己是个先进，不能丢人，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做文章。我活得很累，跟别人的累不一样，身、心都累。

上山后，我就像一只逃出笼子的小燕子，生活非常快乐。那里很穷，穷得像过原始生活，很多人家平均不上一人一床被，一件衣服从新穿到破，不洗一次。孩子上学翻山越岭，一至六年级在一个屋同时上课，一块木板，几块木条，几张破桌子，十几个孩子，这就是学校。缺医少药，甚至根本就没医没药。这地方的人对我特别好，在这儿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我觉得这才是一群原汁原味的人。再看看小孩子们衣不遮体、天真可爱的小泥脸，一种原始的情感在我的心中产生：这将是此生永远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们，这山、这水、这人将伴我终身，我要改变他们！

一年多里，我生活得很好，很平静。汽车上不去，进不了山沟沟，很少有人让我开什么会。我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种药、采药，把村里给的五亩地全部种上了党参。那党参长得特长，有小孩胳臂那么粗，我拿到市里去，全部是特等品。有人问我是怎么种出来的，我说是挑大粪浇的，每天就折腾这五亩地。拿着卖党参的钱，再到市里去换成西药。



上山采药

我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山头，哪个山哪个沟有什么药我都知道，山头就是我的大药库。我还到市里的中药厂、西药厂学习简单的制药技术，丸、散、膏、片什么都做。在呼市我的名气可谓家喻户晓，到哪儿一听是我，厂长、工程师都来见，非常认真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解决技术和设备问题，让我因陋就简生产中药。一个生物制药厂的工程师给了我十几套压片机上用的管状材质，像冲子一样的压片模具，教我用斧头砸，砸一下一片药。我回去将黄连、黄柏、黄芩按他们教的方法制成了“三黄片”，用于消炎、败火、解毒，治好了不少病人，节约了不少经费。许多中药，如果能用新鲜的，比用干的效果好。工程师们又教我保鲜方法和简单的提炼法。我先后走访了十几家制药厂和医院制剂室，用土办法制了几十种药，全部是中草药或中药西制。这点儿技术，为我后来下海办化妆品厂打下了基础。



在合作医疗站（1975年）

我们二百多口人的合作医疗，每人平均交一块钱加入，可以分三次交，凑起来办了个“合作医疗”。二百多口人就是二百多块钱，到最后有的人还是交不起。

办起来“合作医疗”后，我就天天拿个镢头背个筐，装条麻袋在山上采药。我常牵着头驴驮上两口袋草药到市里卖，卖完了换点儿西药或其他医疗用品，就这样，把二百多口人的合作医疗费给解决了。折腾了一年多，居然实现了免费医疗。后来好到了什么程度？农民下山住院治疗，我都给报销，是名副其实的公费医疗啦！1975年呼和浩特市合作医疗现场会还是在我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卫生所开的。

就我这一个人在折腾，但折腾得特高兴，没有任何骚扰，到哪儿人们都那么热情，给你吃，让你住，家里没鸡蛋借鸡蛋去，给你炒鸡蛋吃。那孩子就黑不溜秋地站在旁边看。我可不忍心了，给这个吃点儿，给那个吃点儿，但是那种淳朴的心，你很容易跟他们融在一起。我说我是知识青年的贵族，一点儿没有被迫劳动受迫害的感觉，觉得比他们强多了，有人照顾我，我是上宾，我穿得比他们好，吃得比他们好。

因为寂寞得不行，每次回家我都要背20斤书。那会儿，我爸已经到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重新工作了，当时还没当馆长。老头儿特呆板，一个书卡可以借三本书，我就只能借三本，不让我多借一本。我就说：“您能不能跟他们说说，我的路实在是太远了，好长时间也回不来，因为我要步行70里地回去。我一次就能背20斤书，我拿秤称，够20斤你给我我

也不要了。”但是我爸就不借给我，说那是原则问题。我就找我爸的同事：“阿姨，我爸能借三本，您也能借三本，您能帮我多借几本吗？”“没问题。”我每次去内大图书馆就背20斤书，除了医书以外就是人物传记，我爱看那些东西。看完这20斤书就回去换，每次到城里面都是为了换书，而且都是背着我那当图书馆长的父亲偷偷借的。

看到村里的人太可怜了，每次从家回来就多背点儿东西。10户人家我背10个茄子，一家一个，多了背不动呀。有一个小孩是哑巴，我让他拿了个茄子去给他妈。他走到半路上，把茄子吃了，因为他以前没见过，以为能生吃。

老书记是解放初就当上书记的，人非常好，一看就是电影中的正面人物形象。我主动找书记商量，咱们干点儿这，干点儿那，罗列了一大堆想干的事。老书记慢悠悠地讲了一句话：“咱们村什么时候能通上电、有了路就好啦。”电，第一要解决的是电！邻村都有电，一打听，全县只有我们村没电。一个革命老区，一个日本鬼子一次就杀了四十多人的村子，一个孕育了大青山游击队的地方，至今还没电。我到城里四处跑，到处呼吁，最后县政府拨了两万元钱。全村男女老少在电工的指挥下人拖马拉，硬是把五十多根高压电线杆立在了山头上。一个个软伤、硬伤，到处都是伤，那真是累呀，但累得高兴！电灯一亮，全村欢呼。我的眼泪刷刷地往下流，这是高兴的泪，这是幸福的泪！

我想要在这儿生活一辈子，就得种菜。我到奶妈家要了一堆菜籽，因为她是菜农嘛。菜籽种上了，也活了，就是长不大，但是能吃。葱也能种啊，很多夏天的菜都能种。我就教农民们种菜。我还让我妈给弄了好几百棵苹果树苗，用汽车送到山口，又用驴驮到山上去。我一家一家地告诉：第一层种什么，第二层种什么，完全按我妈写的那些程序种。种下去，你给它浇点水不就活了？但他们不浇水，不信这个地方能种果树，结果后来全死了，没活一棵。

在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责任感支配下，我在山沟里的日程排得满满的，非常忙。外面的世界很少了解，村里惟一的文化生活是公社放映队。毛驴驮着个放映机，一至两个月轮一次，一块大布往墙一挂，就地盘腿一坐，看得有滋有味。《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几个片子，反复看都能背下来啦，我还是带上十几个孩子翻山越岭去追着看。

也许是看的次数多了，还真看出点儿名堂来，《地雷战》中老乡用毛驴压碾子做地雷启发了我的灵感。当时学大寨组织大会战，挖沟造田，砸得满手裂口，成效却不大。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地雷炸石头修沟

呢？我琢磨，那个年代的农民能造地雷，我们现在为啥不能做啊？拿地雷轰多好呀。我跟谁也没说，背着干粮就下了山，直奔城里找到警备区，一名作战训练科的尹参谋接待了我。我拿着报纸说我是安海燕，他们都知道安海燕。我说："我现在到了最艰苦的地方，现在那边农业学大寨，你们看我的手，全是裂口，是刨沟刨的。我们要用土法做炸药修沟。"尹参谋听了很兴奋地说："行呀，小丫头子，我支持你。"他给我列了一个采购单，有硝氨化肥、锯末、柴油这几种东西。我备了约两吨的料。他还送给我一个起爆器、一大堆电线、1000只电雷管。

第二天我去警备区取了1000个电雷管，捆到自行车后面。临走前到自治区知青办去了一趟，知青办在内蒙古党委大院里。当时我不懂这雷管的危险性，到了党委大院门口，站岗的不让我进去："这是啥呀？""雷管，雷管你不认识？"他说："雷管？你敢往这儿拿啊？"我说："怕啥？亏你还是当兵的呢，我都不怕，你还怕？这是电雷管，不炸的，有电才炸，没事的。"他说："你进去可以，自行车不能推进去，也不能放这儿。""那我放远一点儿。"就把自行车放到旁边说："你给我看着啊。"我就进去了。

第二天，知青办给弄了辆"130"车，好不容易把原材料拉上山，尹参谋亲自上山教我制成了炸药。打上几个炮眼，按计算盘上的数据填上炸药，放上雷管，连上电线，人先藏起来，一拧那起爆器，只听一声巨响，"咣"的一下，土就扔到一边去，一条沟就出来了。定向爆破真过瘾，高兴得我们叫啊，跳啊。

有一次，我在人家炕上坐着，看到这个老农民存了一冬天的垃圾肥要运到地里去，主人用镐刨，一刨一个白点，冻得挺厉害。我说："有的是炸药，我帮你一炸不就炸松了？"我急忙回去拿了个雷管，抓了把炸药，从肥堆里捅了个洞装进去，按炸石头的方法这么一计算，拉上电线坐在他家的炕头上，一拧起爆器，一声巨响，一堆粪炸得全没了踪影。笑得我呀肚子都痛了，把主人气得鼻子差点没歪了。原本好意帮他往松里炸一炸，谁知炸药安得太多了。就这样，我们把一千多个雷管，二千多斤炸药炸得干干净净。要我说，还没炸成缺胳臂少腿的，还都活着，真够走运的。现在想起来多危险，多害怕，那会儿就敢干。

有一次，我从外村看病回来，肩上背着个出诊包，里面有注射器、听诊器，铁盒丁零当啷地响。看见了一只狐狸，挺寂寞的，我爱玩，就跟那狐狸玩，用石头"梆"的打它一下，"梆"的又打它一下，它跑我就追，一追这出诊包里的东西就"哗哗哗"地乱响。我跑它也跑，我坐下它也坐下。从这个石门子村到我们村是八里地。傍晚，要进村了，我见到田大爷，他正背着一捆柴往家走。我说："大爷，从石门子这个狐子就

跟上我了，到现在你看它还在这儿呢。”他一看忙说：“那是个‘怕怕’，哪是个狐子呢？”他们那儿的人管狼叫“怕怕”。他这么一说，那狼好像能听懂，嗖的一下就跑啦。我听田大爷说那是只狼，浑身软得看见家门也迈不进去了，就地找了块儿石头坐着，缓了好长时间才起来。你说我这个命大不大？以前我在动物园看见过狼，那是有数的几次，对狼的感觉就跟狗差不多。真正野外的狼有点儿像狐狸，腿特别短，贴着地皮走，你能感觉到它的尾巴是夹着的，不是像狗那样是翘起来的。我想像中的狼可高可大的，像狗一样。

后来我们村有了六七个知青，很热闹，有几个是主动要求到村里和我一起奋斗的。他们的素质很好，很团结。我们几个孩子没事瞎琢磨，想起啥就干啥，村里也由着我们折腾。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上山采药，故意不带干粮，看看能不能生存。我们学古人“钻木取火”，从棉衣袖子里撕出点儿棉花，拿起块石头猛砸也不出火花，又把一个知青的大厚眼镜摘下来对着太阳烤，也点不着，最后饿得实在不行了，一人弄了点儿生蚕豆嚼着吃还很香。村周围山上桦树林很大，喜鹊成群。馋嘴的我们什么肉都吃，喜鹊、乌鸦、野鸡，套上什么吃什么。每年春天掏喜鹊蛋能吃两个月，直到小喜鹊出来我们还掏来吃肉，气得许多喜鹊都搬了家。

我这样的典型在山沟里，知青办的主任怎么也得上来一趟。知青办弄了辆“212”吉普车就来了。全村十几条大狼狗围着这辆吉普咬，不是咬人而是咬车，它们没见过呀。把轱辘、后视镜咬得乱七八糟的，那车的帆布篷不是软的吗？好几条狗就在那上面，他们被吓得一个劲出汗，不敢下这辆车。最后村里的人都出来，把自家的狗给制住了。我说，村里的狗把这辆车当成动物了，它们没见过这大家伙。就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

公社离我们三十多里，由于交通不便，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虽然知识青年订了点儿报纸，但半个月、20天的才由一个邮递员把报纸和信件背过来，这报和信就是我们惟一的信息了。村里人几乎没有信，他们不跟外边人通信；报纸呢，村里人也看不懂。我实在憋得不行，就买了一个半导体。这村里人可奇了怪了，“这人在哪儿啊？怎么说话呀？这么点儿的东西里面怎么能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也给他们解释不清。我就防备着那些孩子，他们老想打开看看里边的人，还说：多小的人呀，怎么能装进去？他们对这个戏匣子稀罕得不行。我就说：“这样吧，大家轮着听。”但是它是装电池的，哪儿能供的起那电池呀？听上两天就没电了。我回城时买上电池，回来再轮着听。但是，一不注意戏匣子，小孩们就打开了找人，你看就到了那种程度。

有一次，月食，有个老头就敲了个烂盆，边敲边喊：“社员们，快出来救月亮，月亮让狗给吃啦。”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无聊地跟着起哄，敲着个饭盒也喊：“社员们，快出来救月亮，月亮让天狗给吃啦。”我完全是跟着起哄，觉得这么好玩。不想这就成了政治问题了。“知识青年的标兵带头讲迷信？”上边的领导就对我说：“听说你还带头喊救月亮。”“村里的人那样喊，我就跟着闹。”“别人能闹你不能闹，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我心想，我是啥身份？我不就是个小孩？！我从来就没想到我是啥身份。“时时处处你不能忘记你是啥身份，一旦忘记了你是啥身份你就要犯错误。”但我毕竟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脑子里没有那种政治概念。我是个什么？什么也不是。在当时那种体制下，作为知青典型，对你出身好与不好也不那么计较，但入党你是入不了的，提到入党就该计较了，所以我始终入不了党。1973年我的事迹见报，不久就入团了，后来还当了团支部书记。团书记当然要写入党申请书了，一直对我考察，到1976年才入的嘛。前后三年时间。那会儿，要是我这种先进，本来是很容易入党的，也许这个月报上去，下个月就批了。我就是沾了出身的“光”了。

最后怎么入的党？说来话长。到1975年的时候，我上这山沟沟一年多了。天天就这么高兴，就这么干，啥也不想，根本就把太平庄的那群王八蛋全忘了，但就是回不到原先那种状态了。掏鸟窝、上房，就像“小兵张嘎”那样干的。我能把全村的烟筒都塞上，就剩一家的烟筒不塞。让人家弄得满屋子都是烟，把我高兴的，觉得特好玩儿。我到一家说：“给我烧点儿水，渴得不行了。”我一说要喝水，他们可高兴了，赶快给你烧。我就说：“你们先烧吧，你家太呛，我先走了。”到另外一家又要水喝，又是那样的，把那么个小村的人都给熏出来了。最后我在一户没被堵烟筒的人家坐着，那家不呛。这时有人找过来了：“海燕让我给烧水，她人哪儿去了？”别的人也说：“她也让我烧水了。”结果这几家的人都出来啦。“哎呀，我们全上当了。”他们就找我，还追着打我，我就满山跑，就这样玩，全村关系处得特别好。后来，不管谁做的恶作剧，他们老往我身上猜，我解释也解释不了，啥坏事都是我干的了，哈哈哈！

在那儿待的几年，是最高兴的几年，人和人相处得很单纯，从来不往坏处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常常半夜三更跟上一个从深山老林来找我看病的人，提上一盏小马灯就走，十几、二十几里山路从没怕过什么。他们很热情，尽管他给你吃了带虱子的莜面，因为他也吃的是那个呀，他没虐待你呀，他把你当上宾。山区条件苦，但人们非常朴实憨厚，我到谁家都是座上宾。有的家满炕都是土，不扫还好一点儿，

一扫全家都是土，但是他们还是热情地赶快拿笤帚扫两下，“坐吧，坐吧”，招呼你，让你坐下。有的女主人为了招待我，恨不能从母鸡的屁股里掏蛋给我吃，我真的不忍心吃。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75年年初，谣言就从我们原来那村追上来了。这是因为一个啥小插曲呢？我本来早就把那些事情淡忘了。刚上山的时候我在革委会副主任的家里住，没有房子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是人家对我都特别好。可我觉得老是这个样子很别扭，我就想要个房子能够自己住，或者按知青的待遇安排我一下。另外，到这儿我没有口粮，村里规定我吃百家饭，到谁家治病就在谁家吃饭，可要是哪天没有病人我到哪儿吃呀？因为我是从别的队调去的，所以没有粮食指标，我就是特殊情况派过去的一个赤脚医生。

我去的时候，忽视了这些问题，因为这么一个先进典型，大家都顾的是政治炒作，生活问题没考虑到，因为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稀里糊涂就走到这儿了。那个穷山沟，谁也不愿意去，当时就是没想到我这个先进还要吃饭。现在口粮成了大问题，队里讨论了好几次，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下来。队干部坐在一起商量，原则上是你落户在哪个队，哪个队给你留口粮。你还没落户在哪儿呀，因为你是大家的呀，你是大队的呀。我的口粮问题哪个队都觉得是一个大负担。全村二百多口人，七个村，上哪弄啊？穷得就连我这三百多斤口粮也成了大问题。他们吃的是返销粮，一个工是五分钱、一毛钱。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说给全村的人看病就吃百家饭，住百家屋，你给谁看病就在谁家住，给谁看病就在谁家吃。

我遇到这么个问题，也不敢说呀。好几个月了，呼市团委有一个副书记问我：“你现在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的？”我没想那么多，说：“别的倒没什么，最好能有个房子住，我虽然不长住这个房，毕竟要清理一下卫生，或者是今天我没有病人了，我到哪儿住去啊？再有吃饭的问题，如果今天没有病人我到哪家吃去啊？”这位副书记当时就火了，说是这么一个典型到了你们那儿，连这么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他就从政治上给上了纲。其实我的意思是让他敦促解决一下，没别的意思，更没想把谁怎么样。这个副书记不知道在什么场合的一次会上把我待的那个公社给点了，说公社不善待这样一个典型，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支持。

点了名以后，公社分管知青的领导气势汹汹地就找我的麻烦来了。他说：“我女人现在差点儿神经病了，我等着坐监狱呢。”我说：“你咋啦，出啥事儿了啊？”他说：“你还在这装孙子呢？”我就知道他来找我跟这事有关系。他说市团委副书记在会上点了他，把他女人吓得到处找

他。他女人在山下的一个村里，他在山上呢，他女人全家都哭成一锅粥了，以为他会被抓起来判刑，全家吓得到处找他。他说："我来找你是赔不是来了。"你说我能说啥？我说："我啥也没说啊，就下了一趟城，他们问我有啥问题，我就说我的房子和口粮问题，能帮我解决解决，别的啥也没说。"因为这件事，就给我的入党问题带来了障碍。

可农民不管那些呀，他们从上到下都亲热地叫我燕子，还说："爱他谁嚼啥舌根子，别理他们，我们燕子是啥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就喜欢我们的燕子，爱他说啥说啥，让他们'瞎撇'去吧。"那边把胡说八道叫"瞎撇"。后来我的入党申请报上去以后，个别人坚决不同意，提出来啥了？"这种人出身不好，属于政治上投机，必须在关键时刻考验，必须是着火了，她往上冲，发大水了她往里跳的那种考验。"我们的老书记可不干了，他接着说："那如果我们这辈子不发洪水，不着火，是不是我还得回去放火，我还得回去砸水库是不是？要不然我们的燕子就永远不能入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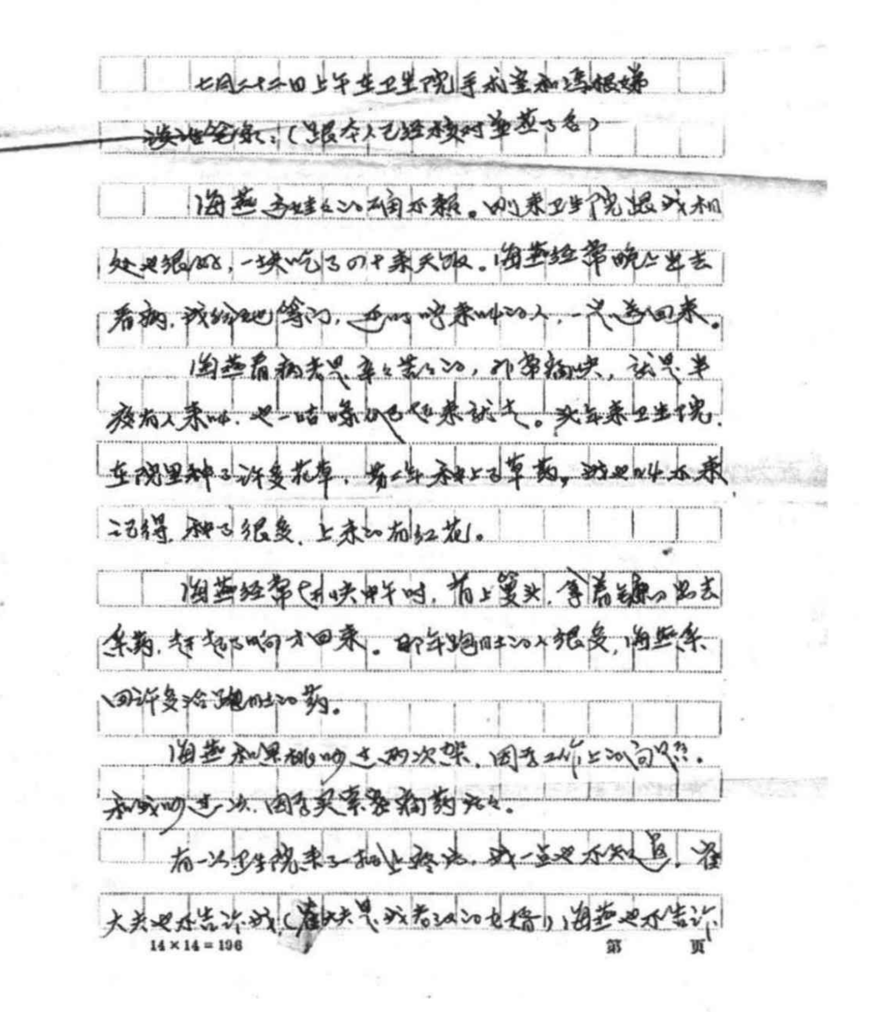
后来有个没见过面的知青，是个大青山游击队的后代，赶上上山下乡运动了，准备把户口落到我们那儿。但是他本人不来，就是在形式上要到我们革命老区也就是到我们村里镀镀金，算是个下乡知识青年，等到半年以后，占个队里的指标入党再去上大学。这么个任务交到我们队里，老书记坚决不要："我告诉你，入党的事情跟我免谈，我们村排好队了，我们燕子排第一，我们燕子入不了党谁也别想入，我们村不发展党员了，卡死了，再也找不出来燕子这么好的娃娃了。"

自治区要开一个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选几个代表参加。其中一个先进典型代表决定让我去，还有后进变先进的典型，还有一些过去打砸抢、偷东西的人变好啦，也都是些知识青年和社会青年的典型，还有劳改释放犯的各种类型、典型做报告。我们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就站出来说了一句话："安海燕不能去。"别人问他为啥啦？"她生活作风有问题。"这句话从老百姓嘴里怎么说都行，你是个市委副书记，怎么能胡说？而且是在会议上，当时就有人站起来跟他吵："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是我们树的一个典型，而且我们多次了解，确确实实是谣言，她在大队得罪了一帮地痞，他们给她造谣，陷害她，你作为市委副书记这样说，这不是给人下结论了？"他不吱声了。但是这个会议最后还是没让我去。其实，当时没让我去我也不知道，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

就因为这件事，市委专门为我一个19岁的知识青年、一个小孩儿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并为我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大致内容是：根据市知青总指挥部指示，为做好即将下乡知识青年安置工作，并为8月份内蒙古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会议做好准备，结合了解安海燕同志的主要事迹和存

在的问题，澄清社会上流传的一些舆论，我们和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常委张鹏林同志、市团委副书记雷善元同志、郊区党委常委孟绍成同志、郊区团委书记张秉荣同志及郊区安办共六名同志，于6月25日去到小井公社……

这些人到我过去待过的太平庄多次召开座谈会，登门拜访了贫下中农，召开知识青年座谈会征求意见，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后的结论说：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报道的事迹完全真实，不但无假，而且很不完善，没有把全部事迹报道出来，同时对安海燕同志在上边活动多也提出了意见。7月17日，市革委会副主任张鹏林又带队到了太平庄大队。公社党委对这次调查很重视很关心，夏收大忙季节派团委书记跟着召开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座谈会、贫下中农座谈会、知青座谈会、合作医疗所的座谈会共四次会议。个别访问了15名有关人员，三次走访了瘫痪13年的贫农社员王培文，并索取了旁证材料三份。旁证材料都是那些给我造谣的人自己写的，把自己骂得可难听了。调查完了，写了厚厚的一沓子材料。后来他们没用了，都给了我。这些材料，我一直保存至今。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在卫生院手术室和冯根娣

谈话笔录：（跟本人已经核对并签了名）

海燕[illegible]。她来卫生院跟我相处也很好，一块吃了四个来月饭。海燕经常晚上出去看病，我给她等门，她叫来叫的人，一只[illegible]回来。

海燕看病是辛辛苦苦的，非常痛快，就是半夜有人来叫，也一咕噜爬起来就走。她在来卫生院，在院里种了许多花草，有些[illegible]种上了草药，[illegible]记得，种了很多，上来的有红花。

海燕经常到快中午时，背上篓头，拿着镰刀出去采药，[illegible]晌午才回来。[illegible]很多，海燕采回许多[illegible]的药。

海燕和[illegible]吵过两次架，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和我吵过一次，因为[illegible]药[illegible]。

有一次卫生院来了一个[illegible]，我一点也不知道。[illegible]大夫也不告诉我（[illegible]），海燕也不告诉

14×14=196　　第　页

海燕调查组的笔录原件

1975年的调查有了定论，才确认把我树为自治区的标兵。当时要树八个标兵就有我一个。上边说，安海燕这个人一定要树成标兵，一定要大宣传，特宣传。一下子就把原来有些看法的，都扭转过来了。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去调查的，我也没参加。而且去的是我离开了两年的地方，那里的社员说都是他们给我造谣，队里也说那些说我坏话的人是一群流氓、地痞。

我是忘了谁也不能忘太平庄卢所长一家，他们为我背了多大的黑锅，我还傻乎乎地在人家的炕上睡？！外边的人天天说他家男的跟我混着，卢夫人天天在外边跟人吵架。我不知道这些，知道了我可不给他们找这个麻烦。我就是不懂，原先跟他们家住在一起时老想，男的跟女的

住在一个炕上，是不是会有啥东西爬过来就能怀孕，怀孕是咋怀的我不知道，我害怕怀孕。可又一想，没事，有他爱人和孩子，隔着两人呢。刚开始老这样想，后来也就忘了这件事，也不害怕了。我结婚以后反思，自己也暗自脸红，世上哪有我这么傻的人？我觉得很内疚，很对不起这两口子，无意之间给人家找了那么大的麻烦。我跟我爱人说要办一件事情，咱俩回去认个姐姐和姐夫，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经常回去，前年给他们买的房、电视机，反正啥都想着他们。我永远忘不了他们，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们，我那一年多不知道被人怎么害了，也许连命都没了，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位姐姐一点儿都不在我的同胞姐姐之下。

那阵子，我自己在精神上走不出这个阴影，一碰到知识青年，不认识的还好，认识的一说这是安海燕，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心想这个人还不知道怎么看我呢，那么多的传言，谁知道他把我想成啥了？

一直到1976年，当我听说他们要用绳子捆我，还要捉我的奸，心里压抑憋闷得难受，就想和他们拼命。他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狠？要这样害我。我又没挖你们家祖坟。从这时起我就得病了，不想吃东西，心里边恶心，但是那儿也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药治，又黄又瘦。回到家，我妈一炒菜我就往外跑，恶心得不行，闻不了油味儿。我说不对了，准是得肝炎了。去医院一检查，转安酶500以上，加号都是四个。赶快住院，可住院又没钱啊，知青办说他们给花钱。我在内蒙古医院住了四个月，加号全是四个，就是下不来，检查了几次动也不动，后来就怀疑是肝癌。

既然说是肝癌那就没有多长时间活头了，后来说到北京治吧，把我送到了北京地坛那儿的传染病院。那真是党的关怀啊。知青办给我花钱，又住了四个月。我的腿肿得老粗，都有了腹水，脸可大了。我说这是快死了，就回内蒙古了。

回去以后又住到内蒙古医院，住了没多长时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回家过了个星期天，第二天早晨一去，医院不要我了，说没有病床了，把我所有的东西全丢到走廊里，说“四人帮”树起来的典型肯定是小“四人帮”，就因为“四人帮”，把我从医院给轰出来了。

我是个传染病人，又不愿意回家，到哪儿去呢？我没吱声，跟家里啥也没说，只说不想住院了。自己坐了火车，步行70里地，回到山里去了。你想那么重的病，我也不想活了，要回村里去死，到最高兴的地方去死。到了山里面，没医没药没吃没喝，我到哪儿都拿着自己的碗和筷子，怕传染别人。我说我快死了，到山上多采点儿药，多带几个徒弟。

天天跟那儿的孩子在山上玩，越玩越想吃饭。那会儿想的是啥？不能就这样死，我要报仇！是他们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我说我得的不是一般的病，这是气的，被气成这个样子的，中医说是肝气不舒。我从民兵营弄了杆枪，天天打活物，所有的活物都变成了那些人的脑袋。打的这个是这个地痞，打的那个是那个流氓，我到处跟人家要子弹，存子弹。我姐夫是吉林军分区的团长，我到姐夫那儿，他给我弄了点儿子弹，我在那儿打，我说我吃不上肉打野兔子，弄了好几百发子弹。我天天练，脑袋里想的就是这些活靶子。死物一个不打，就打活物，我想我要在临死的时候把这帮子王八蛋全突突了，然后给自己留下一颗子弹自杀。我最初打酒瓶子，后来瞄准石头打，再后来就是打活物，兔子、麻雀、喜鹊，什么都打。谁都不知道我练这是干啥，以为我是淘气玩的，实际上我瞄的都是坏蛋脑袋，就想回去报仇，我临死也要拉着他们，然后再写好遗书："是我把这些坏蛋全杀了，不能让他们再危害社会。"



在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留影



内蒙古知青共大第二期学习毛选五卷培训班全体学员合影（1976年）

结果在山上一玩儿，停了所有的药，身体却越来越好了，越来越能吃，精神也越来越好，人也胖了。四十多天以后，我想回呼市再检查检查，看看离死还有多长时间，如果还有日子活，我就要在山里多为乡亲们干点儿事，到了最后的时间去报仇，然后自杀。人都到了那种地步了！一回去化验，所有的指标都正常了。给我治疗的王大夫说："海燕你吃啥了？""没吃啥呀。""你的病怎么治的呀？"我说，告诉你我是怎么治的吧……

从这以后，我一下就把这个世界看开了。因为我是快死的人了，什么都不在乎了，碍你说啥了，我就是个女流氓又怎么样？我再到太平庄，就说女流氓回来了。我怕什么？一个快死的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来，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没有干过一点点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坏？这样害我？

1976年在我住院的时候，知青办给陈永贵写了一封信，陈永贵当时是中央知青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信里说，我们这儿有这样一个知识青年，是知青的标兵典型，给她造了那么多谣，为此还做了正式结论，把事实都澄清了，最后入党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要在烈火中考验，在发大水中考验，这辈子要不发水、不着大火，这个人就永远入不了党。我们内蒙古都在为这个知识青年安海燕抱不平。这样，经过陈永贵的批示我才入了党。所以有时候我老想到大寨的虎头山上烧两张纸去。原文我没见过，但确实是批下来了，那些人一见害怕了，就批我入党了。1976年7月1日我入的党，10月粉碎的"四人帮"，要不以后我又入不了。

你说这一入了党，我就更高兴了，心情也好一点儿了。原来人家会说，为什么这个人入不了党呢？是因为作风不好，我就老往这上面想。你说我是反革命，说我杀人放火了，什么我都能忍受，就是这个谣言忍受不了，气得我要死要活的。后来心理压力非常大，就怕见人，不愿意出席会议，不愿意提到安海燕这个名字，甚至于想改名字，但真要是改名字了，又觉得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又怕人更说我。



陈永贵与知青

但是我不想找对象这是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能证明我是清白的。人家一辈子都会想着你过去是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我受这个气干吗呢？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永远不要跟我谈这些事，我不嫁人。过去我有没有喜欢过人？当然喜欢过，在先进知青中我确实有过一种暗恋，但从来没跟任何人表达过。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障碍。

四　我想有个家，温暖的家

我的病好了，癌症也不是了，我不当这个先进了，跟谁也没打招呼，1977年报考了大学，结果考上了内蒙古医学院。数学考了个一塌糊涂，但语文还行，政治也行，就把分给拽上来了。

考上大学以后，一想这得向知青办汇报一下，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不能悄悄地走了呀。我对知青办还是很有感情的，那些人都向着

我，老想为我干点儿什么，就是使不上劲。我找到知青办，知青办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辜负党对你的培养，标兵的走与留不是你个人说了算，必须经过讨论。"最后，内蒙古知青办开会讨论不同意我走，必须扎根农村，标兵怎么能走呀？！我说："我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能稀里糊涂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走，是为了更好地回去为人民服务，我一定要走，我的户口可以不动，但我要上学。"他们说："要不这样吧，你要上大学是计委的指标，户口就要动，你就拔根了，不是扎根了，我们没法交代。你呢，知青办给你花钱，作为特殊学生培养你，就像龙梅一样，你算党培养的特殊学生，不占计委的指标。"这样，我被他们送到医学院培养去了，一年1500块钱，知青办给医学院1500块的培养费，叫代培生，跟着本科走四年。结果学到第三年，知青办要撤，农村的地要分给农民。走不走？不走，你是农民了，知青全部回城了，再也没有知青了，你自己扎根去吧。我说我要回去；我也不是对这个先进有瘾。

1979年3月份，我被招工到精神病疗养院，分配我的工作是护理员，就是擦地板。我那边还念着书呀，可谁给你学历？知青办没人管你了，我又没有计委指标，续不上。实际上我1977年考大学考了半天白考了，没上嘛，那个指标就作废了。我就算是个代培生，不算学历，没有文凭。学到了第四年是实习，我就不实习了，因为我那儿有工作。白天来上课，晚上回去值夜班，我就把别人的夜班换到我身上。

要提我当市卫生局副局长是1976年没得肝炎以前的事，填完表我就住院了。住院以后身体不好，没有了革命的本钱嘛，就没有提升，放到那儿了。我就说我好多次是因祸得福，如果我没得病，如果我被提升，"四人帮"一垮台我肯定就完了。

回城后是一个月23块钱的熟练工，职称是护理员，这边上的是本科大学，上了大学又没文凭，等于白上，可我还是舍不得呀。党不培养你了，没人给花钱了，学校没再跟我要钱。老师同学都熟了，他们也不管我。我白天去上课，晚上值夜班，凑合着把这三年学下来了。

上大学后，我曾在产科学习，越学越后怕。当初的知青先进材料中我还是如实写的，可材料组三改两改的就变成了我给产妇做胎盘剥离，用毛主席的革命卫生路线救了产妇一命云云，这发言稿我也念了好几年。胎盘剥离是年轻医生都不敢上手的活儿，更何况我？那时真是好笑，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说。

学校里大家都各奔东西实习去了，我是个护理员，就回去上班，勉强能在那医院当医生，但是不伦不类的，这怎么办呢？我妈那会儿已经

解放了，找到一个市委书记，是我妈的好朋友。怎么办呀？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想法给解决一下。市委讨论了一下，责成卫生局解决吧。卫生局怎么解决的？那会儿有老中医带徒弟，可以带自己的孙子、带自己的儿子。他们说，你就在你们医院随便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吧。我们那儿的老中医没有什么名气，但还是找了个老大夫带我，签了个假合同，学三年，这样又熬了三年参加了出徒考试，弄了个技术职称，还不是文凭。等于是前后学了六年，给我定了个中医师的职称，但是如果你要想考主治医就难了。

我始终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1985年评技术职称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是个徒弟。没多长时间我就当了医院的副院长。就连那十七八岁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孩背后也是嘀嘀咕咕的，说我这个人怎么作风不好。他们都是听说的，因为我的名声太大了。把我烦的，到了医院里我谁都不理，就是拼命地工作和学外语，学外语是为了考研究生。医学院的一个教授对我特别好，他说："我出题考你，你还考不上？"但最后有了规定，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不允许考研，就是从我那年开始不能考了，考研究生这条路又堵死了。

当时我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开展的一个人生价值的讨论，每天都有人写这的，写那的，我拿起笔来很随意地写了一篇《如何恢复我青春的活力？》，写了几百字，我说我曾经是个标兵，但是被造了很多谣，连市委副书记都这样说，好像给我下了结论。我现在不爱说也不爱笑，整个像变了个人。我写的文章给发表了，来了上千封信，其中有许多是鼓励我的。你看我那个单位，我收到的信都是有邮票的地方被剪掉了，或者是剪得乱七八糟的，有的信被拆看了，有的有皮没瓤，有的有瓤没皮。我的单位就是这么一个单位，有些人就愚昧到这种程度，不懂得尊重人。

我的医院是精神病疗养院，是民政系统办的。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大街上拣回来无依无靠的疯子、傻子，是收留性质的；一种是杀人犯，一看他是精神病，没办法了，放在这里治疗，也就是终身监禁。整天跟这些没有任何治疗价值的人打交道，他们闹得厉害了，电打一打，安眠药上一点儿；闹得不厉害连药都不给吃。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整理卫生和检查卫生。我一到医院心里就烦，觉得不如在我的山沟里，那地方多好呀，在那里，起码是青山绿水，在这里每天臭烘烘的，还得去抓屎抓尿。就在我老想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还让我当了院长。既然当了院长咱每天就得尽职尽责呀，每天都是些事务性工作。干了几年以后实在不想干了。

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插曲，1979年抽上来以后，在1980年的时候，

家里说我这么大了，也该张罗找对象了。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特别多，就张罗着帮我找对象。今天领来一个，明天领来一个，烦得我都不想回家。有很多我爸我妈的朋友来了以后就是："给你姑娘介绍个对象，他爸是谁，他妈是谁。"因为我妈我爸那个圈里的大部分人是高干，一张口就是这个。我把门一关，我爸叫我出去，我根本不出去，我爸就骂我。我说："我是找他爹呢还是找他娘？一进门说他爹是谁，他娘是谁，我一听就烦了，以后像这样的弄远点儿，那是找你们的，不是找我的，以后不要把他的爹娘给带来。"

我就老穿着这条有十几个补丁的裤子，上下班一个样，就这么烂，也不懂得换。穿个烂球鞋也给洗白了，前面露了脚指头又缝上，穿的衣服就是中山服，蓝布衣服洗成白的，肩膀上全是补丁，就这么一身，够烂的吧？我妹妹老说："你穿这身别跟我上街去啊，人家把你当要饭的看呢。"我那会儿在医院里找了个四面透风的仓库复习功课，住在那里根本就不回家。拼命地学习，想着怎么着也要离开这个医院，不在这地方待了，学中医的一辈子治不了一个真正的病人。

有一次，跟我一块儿值班的刘大夫问我想找什么样的人，我说平平常常的，最好是工人。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我可有一个人，他叫邵学忠，每天到我们家玩，是我老头的同事，父母都是工人，山东人。"我那会儿说过，找对象就找外地人，就是种地我也愿意到外地去，远远地离开这儿，让人们忘记安海燕就行了。只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一听是山东人就感兴趣了，我说："行，见个面。""真的？"我说："真的。"

跟一个男的坐在那儿搞对象还是第一次呀。我抓着衣服不敢抬头看他一眼，两人坐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的时候，刘大夫问："海燕，这小伙子长得怎么样？"我说："刘大夫，压根儿我就没看见。"刘大夫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好几次想抬头看一眼，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眼睛一撞，弄了个大红脸，马上把头给低下去了，谁都不好意思。我是说了一些话，但没敢看他，就看见背影尺寸还够。我提出看看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他的家是什么样的，同时附带了三个条件：一不在他们家吃饭；二不能像农村那样，门上窗户上全是看我的人，我说我受不了。他们家不就连他三个人吗？不能有第四个人看我；三我不跟他在一起走。那个厂子我认识，叫他几点钟在厂门口等我，我过去，他跟我最少得离50米远。这些条件他都同意了。

第二天我就去了，远远地看见一个人，他"嗖"的一下骑自行车就跑啦。我就追呀，追进去以后，厂子里一大片平房，都一个样儿，他突然从中间钻进去了。我进去以后就不知道是哪一排了，找不着他了。我就

站在那儿等着。过了一会儿，钻出来半个脑袋，马上又缩回去了。我一看这人还真老实，就跟他进去了。他妈给我的感觉就像李向阳他妈的那种感觉："姑娘，吃吧，喝吧。"他爸高兴得就知道笑，我又想起来山里那个老书记的形象了。一看他们就是特别朴朴实实的那种人，这可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我就想在这么一种平平静静的环境中生活，暖暖和和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个家了。与其说看上他不如说看上他的父母了。

我去的时候就穿着一身旧衣服，他父母也看上这身烂衣服了。我的同学说："相亲去呀，咱借给你一条裤子穿行不行？"我说："我本人就这样，他要是嫌我这身衣服破，我还不是他们家的人呢。"快到中午了，他妈跟我商量："姑娘，跟你商量个事。"我说："啥事？"他们说："咱们山东人是送客的饺子，迎客的面，你这么大老远地来了，不吃别的，喝碗面汤行不行？"我说："行。"看我同意吃饭了，他们就高兴地开始和面，那么大岁数我能让人家和面？我动惯了，别人一动我就坐不住了。我说："大娘，我来帮您和。"我开始和面、擀面条，跟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家就有一件家具，是个木头箱子，底下拿砖头垒着外边挂着个布帘，你说底下藏的啥呀？是罐头。左一个，右一个，他爸像做贼似的，一看我没注意，就偷偷地拿出来一个启开，放到盘子里去，一会儿看看我没反应，又拿一个出来，我当时不是说好不吃饭的吗？他们就不敢给你一下子搬上去，怕你不高兴，一会儿偷偷地摆了一大桌子菜，我一下子就看上他们这朴实劲儿了。

他也没有多的话，我们认识了半个月，见了两三次面。每次我都是提上大包小包的去看老人，就觉得那个家特别好，特别温暖。半个月以后，我腿痛，说是黑色素瘤，要做手术。我说这下完了，刚刚开始又要结束了。我跟邵学忠说："我是学医的，我懂这个事情，医学院泡着个标本，一个小脚老太太的脚底下有一个瘤，就是因为那个瘤，那个老太太死掉了。我跟她的情况一样。"我对给我治病的大夫说："你不用隐瞒了，我能正确对待，你不要写得这么复杂，写个皮肤癌就行了。第一，我要跟医院请假做手术；第二，我刚谈了个男朋友，我要结束这件事情。我不能害人。"他们同意了，就给我写上皮肤癌。我拿上这个诊断证明马上就跟他谈了："咱俩应该结束了，我是个要死的人了，我不能害人。"他就说："你啥话也别说，先看病，别的事以后再说。"我说："不行，必须说清楚，我三年五年不死，也不能害人，我绝对不会嫁给任何人。"后来我跟他的父母说清楚，我是这个病，明天要去做手术了，您们没有姑娘我把您们认成干妈干爸，以后就是您们的女儿，我好了出院就来看您们。哎呀，老两口哭得呜呜的，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做手术是邵学忠签的字，我父母都没告诉。我到一个朋友家住，她是个护士，晚上护理我。紧接着邵学忠来看我，我说："昨天已经说清楚了，咱们已经完事了。"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守着你。"他给我买了个女娃娃，我最后生了个女孩可能就是这个缘分。他把这娃娃放在我的边上说："以后你病好了咱们要个孩子，你要活着咱们就过，你不在了我就跟这个孩子过。"我难受得不理他，一句话都不跟他说。他坐在那儿抱着我那不穿的皮鞋一句话也不说，没完没了地擦。他一来我特别难受，我让他走，他不走。最后我把很难听的话说给他："不是这个原因，我根本就不是这个病，我骗你呢，我开了个假证明。今天给你说实话吧，我根本就没有得癌症，我是看不上你们，不门当户对，我父母都是高知，你父母都是文盲，咱们没有共同语言。你们家那么穷，就有那么一个破箱子，啥也没有。"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这个原因，你说什么也不行。"正好我爸在那儿，他说："你不要这样，太伤人，你说话说得那么难听。这样吧，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同志关系，同志来看你了，你就不能这样了吧？"我说："就因为他不是同志关系我才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为什么伤人家？跟别人来往都行，就跟他不行，我就不想见到他嘛。"我对邵学忠说："以后你就不要来了。"结果，他几乎还是每天来，他妈做好吃的，他就往我这儿送，也不上班了，每天就守着我。结果半个月以后，病理切片出来了，不是黑色素瘤，是血管瘤。我不相信，怕他骗我，就把那个片子借出来，一看确实不是，我就安定下来了，说："我今天宣布一件事情，我决定嫁给邵学忠了。"那会儿我们还不太熟，根本就谈不上了解，可就这么简单。我说："定下来吧，明年'五一'结婚，你回去宣布去吧。"

我曾对家里人说过："我谁也不嫁，你们嫌我，我就不回来，到单位去住。"我们家担心我嫁不出去没人要，只要有个人能把我娶走就行了，那会儿我26岁。现在我决定嫁给他了，见了两个月的面就不见面了，又给人家约法三章："你不许到我们医院找我，不许给我打电话，我有时间会到你们家去。"我们两个没有单独在一起谈话呀，看电影呀，上街呀，一次都没有。我就上我的班，说要考研究生，要抓紧学习，时间很紧张，没时间谈情说爱。你也在事业上、前程上奔，有时间你就学习，你要是不求上进我永远看不起你，结婚也是麻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我们俩不见面，他也不敢给我打电话，也不敢去找我。

这样一直到4月底，临结婚的前一个星期他找我来了，说："我妈天天哭。"我说："她哭啥？我也没让你家大操大办，咱们吃一顿饭不就完事了吗？没钱就不办，哭啥？""咱俩还没领结婚证呢。""哎呀，真的，咱俩没登记。"我那会儿已经是政工科长了，结婚介绍信就在我这儿开

呀。我马上盖了个章说："行，明天来取户口，我给你写上。可是我舍不得那点儿时间，马上就要考研究生了，一天的时间都不能耽误。反正也不要照片，拿上户口，名字是我的，你随便找个人跟你登记不就完了。"他拿着就走了，找谁谁不跟他去，最后找了他们院里一个老师的孩子大霞。他说："大霞，走，跟大哥登记去，穿好点儿。"大霞就去了。临出门让她妈碰上了："大霞，干啥去？""跟大哥出去。""干啥？""登记去。""登啥记？""结婚嘛。"给她妈气的："回来，大姑娘胡说什么？"山东人可封建呢，她妈说："大姑娘逮啥说啥，什么结婚登记？回来，回来，怎么回事？""海燕没时间，让我帮他登记。"她妈说："图个吉利你也不能这样嘛，这种事怎么能让别人代替呢，不行，让她自己去。"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笨呀，这点小事办不成"？"确实找遍了也没人跟我去。"后来我还是跟着他登记去了。

"五一"结的婚，4月30日我还上班呢。单位40%的调资，我是调资领导小组成员。全要我给走后门，全要给我送礼呀，我结婚理所当然要收多少礼？我可不想惹这麻烦，一个都不能告诉。我悄悄地跟我们书记请的是"五四"青年节那天的假。那天有活动，我说我不能去，5月5日再来上班。书记送给我一个保温杯，是我结婚时惟一的一份礼。

结婚的那天晚上，紧张得不行，送亲的一走，我就觉得一点儿都不习惯这个家。我就要在这个家里住呀，两个老人和一个男的，而且变成人家的媳妇了。就在那天才开始想到结婚是怎么回事，以前没想过。他妈他们在大屋的大炕上，我们在里屋的小炕上。我一个劲想哭，老想跟送亲的走，想回去住几天再来，也不敢说。

那天晚上，他说我生理不正常，是个男的。我一下子就想：自己可能就是男的，不然，怎么那么反感男的？从小人家就说我的性格像男的，爱和小男孩在一块玩男孩子的东西，打球、上墙、上房，老爱玩危险的东西，女孩子的玩意儿不爱玩，不爱那些东西。我说：我确确实实不是骗你，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个男的，而且我确实是没做过检查。你不是要开证明吗？我就让医学院的同学给盖了个章拿来了。我要是知道我是男的还结婚干啥呢？

新婚之夜，我们俩说的就是离婚的事。我坐在那儿想哭也不敢哭，外面还有两个老人。这事儿恨的我呀，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说我怎么一次一次地就不死呢？那会儿我真想马上死，有个车祸也好，飞机掉下来让我轮上也行，让地震正好把我给漏进去正好。命运为什么这样捉弄我？怎么连自己是个男的都不知道？我悄悄闷着不就完了？后来我就跟他商量："咱们俩闷三个月，三个月以后离婚，我不让你有任何经济损失。我用过的东西，包括今天晚上盖的这床被全部拿走，是多少钱

都给你家拿来。但是我一下子没那么多钱，每个月有收入，陆陆续续都赔你。只是有一点，我用人格保证我确实不是故意的。他说：啊呀，你真混呀，外面传说你不知生了多少次孩子了，闹了半天不知道自己是个男的。我跟他说好了，三个月以后离婚，求他跟任何人不要说，对外就说是两人感情不和。他说：我不会跟你离婚的，咱俩抱个孩子就行了。我说：我不会害人，保证三个月以后跟你离婚。这三个月是给老人一段时间，要不然老人受不了。你要跟别人说咱这件事的话，我就不能活了，只有死掉。我们的新婚之夜就是这样过的。

第二天去医院检查，去找我的同学，说："我真不知道要怎么个活法？我生理上是个男的。""不会吧？"我说："真是这样的，我自己不知道，人家男的可知道我是不是个男的。"结果一检查，人家说："你胡说八道什么？你简直是开玩笑。"当年，我已26岁，还是个学医的，自己却愚蠢到如此地步。我爱人也纳闷，一个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的"作风不好"的女人，居然是个"中性人"。

五　下海后的闯荡

下海的事也是阴差阳错。我后来学了整容，也就是玩刀子。1988年，我从精神病医院调到呼市中蒙医院，领导也不当了。就因为行政工作我不想干，医疗工作又干不成，学的东西一辈子没有用。我调到中蒙医院干啥了？医院准备拆完平房在原地盖楼房，时间是三年，就留守了几个人，其他的人这三年都出去学习，工资照发，我就回家待着去了。我怎么能闲得住呢？就学习整容，给人做双眼皮、隆鼻子。因为我以前在农村时在当地学过，在北京也学过。其实真正地、正规地学整容不难，我的手挺好使，绣花什么的都会，这都是基础啊。

1990年10月，我们内蒙古在海南办了个门诊，亏了点儿钱。领导派我去，说："那儿的妓女特别多，做美容特别赚钱。那儿什么设备都有，你给他们带点儿徒弟。"我说："那得多长时间？"他们说三个月。我想都是医生嘛，一教就会，电影里演的海南那么漂亮，去旅游一趟，玩一趟多好呀，那么遥远的地方像出国一样，要不然一辈子也去不了啊。我就带了点儿夏天的衣服，提着个小包去了。到那儿以后一了解情况，确实没有整容的人。

我风尘仆仆赶到海口，刚到那个门诊，发现那儿什么设备都没有。我说门诊的负责人：你怎么骗我呢？他嘻嘻一笑，说："不骗，你能来？我现在很困难很困难。"我说："工作开展不了，工资也发不了，既然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做手术，咱们的技术没问题，咱们就共渡难关吧。"他问买设备需要多少钱，我说差不多一万块钱。他说："我现在没

办法，你能不能跟你们医院商量？”我就跟我们院长商量，能不能由医院出一万块钱，两家医院合着办门诊，肯定赚钱。院长说：“你到海南是偷偷走的，我都没跟别人说，我怎么能拿出来这一万块钱？今天拿出来，明天就有人到卫生局告我去了，你自己能不能借一万块钱？”我借的这一万块钱有多难呀，从内蒙古借到山东，都借到他弟弟那儿去了。300块、500块的好不容易凑足了一万块钱，和门诊负责人签了个合同，营业额三、七分，我占三成。等设备买回来，海南这边又说不行了：“医院没有人跟你去开这个门诊，你自己在外面赚了一万块钱，你说赚了100块钱也没人知道。”我说：“那你看怎么干？你愿意怎么弄？”他说：“这样吧，你给500块钱承包吧。”我说：“这对你太不合算了，500块钱一天就能挣回来。”他说：“不怕，我要500块就行了。”我说：“那你起草吧。”我们又写了份合同，我签了字。



下海经商后的海燕（1994年）

签完字的第三天他又变卦了，他说：“我们医院不同意，我们这么大的医院不在乎你那500块钱，你要是出了医疗事故谁负责？”我说：“确实是那么个理，那怎么办？”他说：“两条路，一条路是把你调到我们医院来，给你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你算我们医院的职工，一

个月给350块钱，包住不包吃。”我说：“我本来是来出差的，没有想到来这儿挣多少钱。这样吧，我给你带徒弟。我的设备是一万块钱买来的，还没开封呢，设备你们还是收回去。咱们的合同已经变了三次了，都是你提出来的，我任何意见没有，我都签了字。这设备怎么办？”他说：“两条路：一条路是你自己拿着设备走人，爱到哪儿到哪儿去，另外一条路就是调到我们医院来。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设备和技术，我们才要你的，要不然我们医院怎么能想着调你呀？怎么能给你房子？”我说：“我在我们医院也挺好的，住着三室一厅的房子。”他们的态度，我觉得特别接受不了，我已经借了这么多的债，一个月才挣二三百块钱，借的债要还半辈子。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了就这样逼我？！

我的性子犟，从门诊出去以后就打了个车。司机问，“你到哪儿？”我连东西南北都不知道，语言又不通。就说：“你就把我带到一个妓女最多的地方。”他又问：“你是要干什么吧？是记者采访还是干啥？”我说：“都不是，我要给妓女做手术。”他说妓女分好多个级别，你是找最高的还是最低的？我说：“我现在穷，你给我找一个住得最便宜的地方，而且周围的妓女多就行了。”他就把我领到海口市中心的一个旅馆，他说：“这里不是嫖客就是妓女。”

这是一个农机招待所，几乎就是一个妓女院，里面住了七十多个妓女。我那会儿身上只有300块钱，随身带着我的技术职称证，写的几篇论文，一些获奖证书，还有我给人做手术前后的照片。我拿着这些东西，一家一家走访，介绍我做的手术，把这些给妓女们看。

我住的402房间，一上楼梯正对着大厅。一般的房间里放一张床或者两张床，这里放了四张床，门口住着个保安。我当时害怕呀，这里又是妓女又是嫖客的。四张床我扔出去两张，空出来的地方支了个大镜子。我将一张床做手术用，另一张床自己用。中间钉了一块白布，一拉帘，里面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我怕妓女怕得要命，不知道性病是怎么回事，大学没学过，妓女碰过的地方我不敢碰，妓女坐过的地方我不敢坐，怕性病。我想，要是得上这个病该怎么办呢？后来我找到她们说：“你们来做手术我全部免费，你们感觉好就把你们的朋友带来，我做一个手术收100块钱，给你50块，我只要50块。”因为我没有营业执照，害怕工商局抓我，自己又没有钱办执照。

第二天就开张了，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每天都有进项，我及时把钱汇回去，身边根本不留钱。为啥？一个是害怕，另外还得还账呢。我就是想把这一万块钱挣出来以后赶快回家。孩子从来没离开过我，想孩子想得要命。那会儿正好演的啥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就不敢看那个电影，一到街上播的就是这个。我是这样想的：“妈妈好啥呀，把

孩子都扔了，来到这儿。”孩子九岁了，在家里我亲孩子亲得要命，睡觉都搂着睡，孩子想我，我也想孩子。那会儿没有直拨电话，有时为了跟孩子讲几句话，半夜到邮局去排两三个小时。那边也要带上孩子跟我通话，一次大雪天把孩子冻坏了直哭。

我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这一万块钱挣到手赶紧回家，一分钱都不想多要，哪天挣够了哪天回去。没有营业执照就偷偷干。有一天只剩下15块钱，来了个内蒙古老乡，他是瞎打工混饭吃的。找到我说："大姐，咱们是老乡，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一天没吃饭，你能不能给我点儿钱？"我说："我刚刚把钱邮走，只剩下15块钱，我留5块钱，给你10块钱吧。"这个人千恩万谢地走了。

事也凑巧，第二天早上10点多了，楼里没有一个人。我就问服务员："今天这些人是怎么了？睡得不起床？""大姐，我告诉你，整个这个楼就剩你一个了。你猜都哪儿去了？昨天晚上'扫黄'抓走了三汽车，也有跑掉的，一个叫'茉莉花'的光着屁股跑到楼顶上逃跑了。"我说："为什么不抓我呢？"他说："人家公安局的早调查好了，就你一个不是妓女，她们全是妓女。"到了傍晚，我就只有这五块钱了，给我急的，就对服务员说："你能不能帮我给家里打个长途？说我把钱丢了。"我没敢跟他说我被困在这儿了。

终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我还有一袋细长条的榨菜，五块钱出去买了10包方便面。我想，这招待所知道我要买设备，他们不会太着急要钱的，估计收到家里汇来的钱最少也得10天。五块钱买的10包方便面得吃上10天，我计划好了一天一包，等到什么时间来钱就熬出来了。因为当时不可能再有任何收入了，这里人去楼空，又快过年了，逃跑的妓女也不会回来了。

头三天，一天吃一包方便面还好一点儿，到了第四天，饿得没办法，不能把方便面往桌子上放了，看见就想吃。每次掰一个角，倒上一大碗水，放上几根榨菜，喝下去一会儿又饿了。每天一包方便面能泡四五碗水喝，一直坚持了10天，正好钱到了，这才有办法了。

我有时候吃亏就吃在性格太硬，有些事情又不爱跟人说，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就是硬扛着，不吱声。我那会儿曾经想写书，我的文笔不好，但是接触的那些妓女她们对我没有任何戒心，什么话都跟我说，因为我又是个女的。你说我最后干了什么了？她们得了性病以后，我买了可多可多的书，到底有多少种性病？性病是怎么回事？就看书，看完书就不怕了。以前怕妓女怕得摸都不敢摸一下，我知道这几种常见病的菌是怎么回事了。以后就买了几个妇科清洗用的扩阴器，我在妇科也学

过，我说："你们要洗呀，不洗太脏了。"

有一个妓女跟我说，她一天最多能接10个男的。我说你们怎么活呢？简直就像动物一样，不理解你们。有一些人已有人格变态，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很无知很无知的，都没有文化，也不知道廉耻，也不知道个卫生不卫生，啥也不懂，觉得就是一份职业："我们村的谁谁都干了。"很简单，你问不出什么来，她们就是吃饭挣钱。很多是一家几个或同村同族几个，一个一个拉出来干的。完全是一种肉体和金钱的交易。我问她们以后怎么办，她们说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就跟她们胡说：把我弄到妓院去，抓到妓女窝里去，我要在那里待一个月，写一本书叫《鸡（妓）窝历险记》。保证我待一个月，你放我走我都不走。一个月以后我再声明我不是妓女。

后来我没法儿在这宾馆住下去了，就去找低下一点的活儿，完成我一万块钱的伟大理想。我出去找房子，找到了一个小房子，对面是一条小街，我看上了那小房子上写着"美容"两字的小窗口，再添上两盏灯，这个地方不错。我进院子去问：这个房能不能租？他说有一个小姐下午搬走，你可以住，一个月100块钱。我说行，就进去看房子。那个小姐没走，姓蒋，是贵阳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到海南四年了。我跟她一说自己的打算，她就说："大姐，咱俩合作吧。"没有一小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因为我这个人最好合作了，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我那会儿还不知道怎么样叫做合算，只要人家能提出来的想必就是公平的嘛。我说："我有设备，有技术，咱俩添一点儿药也花不了多少钱。"缺什么？我缺钱，租房子要押好几个月的钱，你来交房租，再把营业执照办上，这些费用咱们以后算完了对半分，就这么简单。"她说："行，有个老板给我投资。"就领我去见那个老板了。

约好第二天晚上见老板。他在夜来香酒吧等我们，蒋小姐在这个酒吧服务。酒吧在三楼，一楼是大排档，楼梯是铁的，滑溜溜的，我就怕滑倒。以前我从来没进过什么酒吧呀歌厅呀，进去以后一看，外面有个吧台，里边有盏绿幽幽的小灯，再往里一看，那些人都俩俩地抱着呢。我头发都立起来了，第一感觉就是被卖掉了。为啥呢？杂志上看到过大学生被卖掉的事。我就想怎么不动声色地往外退，拿什么东西能搏斗。

我开始往后退，小姐约的那个投资的老板从里面看见我，因为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来来来，进来，喝杯咖啡。""咱们在外面说会儿话就得了。"他出来以后，让我坐在酒吧吧台前一个能转的凳子上。我以为那是个桌子，是拿酒放在上面喝的，没注意过那个东西能坐。他说："来，来，坐这儿。"他自己就先坐下了。说实话，我对这人的第一印象不好，他一定不是个好人，他怎么能坐桌子上喝酒呢？我说："我

不坐，你坐吧，我就站在这儿跟你说几句话。”

我将自己的情况简单地一说。他说：“行，我投资，你和蒋小姐干吧。”说了几句话我就走了，他跟着把我送出来。我想，最起码现在没有发生危险了。他说：“你什么时间认识蒋小姐的？”我说：“昨天去看房子的时候。”“噢，我知道了。”“我要租她的房子，她要搬家，所以我们俩就认识了。”他说：“我告诉你，你不能跟蒋小姐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她已经学坏了，她在当‘鸡’，我看你目前还没学坏，还没有被污染。”我一想我们见面的地方，不对呀，她不好你好呀？我们在这么个地方见面你就是个好人呀？他又接着说：“我来给你投资。”我听这个人说话也不像没有文化的，可能不是个坏人，因为还说我没变坏，还提醒我注意。他说：“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投资。”我说：“我不需要钱，我有钱，现在就缺一张营业执照，其他都不缺。因为，确实是那一万块钱搞得我没法回家。您要是能帮我领到营业执照，怎么合作都行，执照的费用我都花。开一段时间或者带几个徒弟我就走都可以，只要挣到一万块钱我就走。”那个人说：“你要一万块钱就走？行行，三天给你办下营业执照。”

我老老实实的没搬家，就在那宾馆里等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十多天他还不来，实在没办法，就按名片上的地址好不容易找到他。他说：“你没有停薪留职、辞职的证明，执照不好办，这样吧，我借个车，带你去我的老家，那儿的中医院院长是我朋友，开个假证明回来不就得了。”我跟他去了，要找的人不在，可他借人家的车当天就要还，这样，他把我留在他岳母家，自己回了海口。

第二天见到院长，院长说：“我们这个小县城80万人啊，没有一个美容院，你在我的医院做，你是不用上税的。如果你同意，明天装修装修，后天一早开张，你一个月交150块钱房租就行。”我说：“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海南一般的要500块钱的房租呀，这太便宜了。”第二天，我就把家搬到中医院，开办了美容专科。以后，我挣了一笔钱，还清了外债。后来又和朋友合作在海口创办了“海华化妆品厂”，用我当赤脚医生积累的偏方验方和制药知识很容易地掌握了化妆品生产的技术，并研制出了小有名气的“古裂特”、“古丽特”系列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好评。现在已通过美国FDA认证并出口美国和世界许多国家。

从16岁走上社会到现在，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生活得很不平静，但总是一步一个台阶，步步往高走，好多次的得福是因祸。我的生命力特别强，意外、陷害、疾病，几次大难不死，不管遇到多么大的挫折，我都能坦然面对，并且总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在等待着我。细细一想，均来自生活的炼狱，尤其是八年知青生活，给我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我拥有这么丰富精彩的人生经历，真不枉来人世！

---

[1]1966年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号召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破四旧”），并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简称“立四新”）。

[2]“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文化大革命”初由官方提出的对一切“黑”出身青年的泛称，“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此称最早见于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328—329页。

[3]“文化大革命”中有关部门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制定了“投亲靠友”政策，即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但是，一些青年和他们的家长千方百计利用这项政策，选择到条件较好的农村、特别是大城市郊区插队落户。针对这种现象，有的大城市又做出补充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原籍在当地或有直系亲属在当地。参见《中国知青史——大潮》，第177页。

[4]指农村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所谓“赤脚”，是指他们同农民一样，打赤脚、下水田，一面参加生产劳动，一面为农民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文化大革命”中，在农村广泛普及“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状况，起了一定作用。

[5]参见《海燕心里装着咱贫下中农的事》，载《内蒙古日报》1973年5月4日；《海燕高飞》，载《内蒙古日报》1973年10月13日；《海燕展翅》，载《内蒙古青年》1974年第3、4期合刊。

[6]在农村，长期实行“五保户”制度，即对无子无女、生活无来源的老年人和无劳动能力、无依无靠的病残者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后事处理）。给五保户的开支出自生产队的集体积累。当五保户去世以后，其所有遗产（主要有住房）归生产队所有。

[7]《知识青年安海燕主动从平原迁到山区落户》，载《呼和浩特日报》1974年5月17日；《海燕穿云飞》，载《呼和浩特日报》1974年12月21日。

不再颤抖的灵魂

——郑梦彪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日本大学博士生绵贯哲郎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9—10日

采访地点：福建省泉州市航空酒店

［采访前记］　2001年12月7日至14日，我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老三届知青文化周”、老三届知青文化论坛，出席了《命定——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影集》、《震撼与反响》两书的首发式和厦门老三届知青老照片展等一系列活动。其间，结识了许多新的知青朋友，其中就有郑梦彪。

在会上，梦彪很快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作为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知青联谊会的代表来参加会的，别看安海只是东南沿海的一个镇子，“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大批知青下了乡。近年来，他们一改以往的涣散状态，组织起充满活力的知青联谊组织。联谊会是在地方政府正式注了册的，据说在香港、福州还设有分会，因为有一些像梦彪一样热心的知青和海外捐款的支持，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包括为当初落户的农村兴办文教、铺路搭桥、架设电线；为知青子女提供奖学金、给去世的知青送葬，抚恤他们的家属。这些充满人情味的义举，让我们这些来自大城市的人为之动容。和我一同赴会的定宜庄女士感动地说：“没想到一个镇的老知青的联谊活动就搞得这样有声有色。中国知青史要补上安海知青这一块儿。我想去安海看看，感受知青情结。”



在福建晋江安海镇与当地知青联谊会部分成员的合影

说去就去，11日中午，我和定宜庄、李南一行三人前往泉州、福州进行学术考察途中，特意弯到古镇安海。知青联谊会在镇东街中海大酒家摆下宴席，为我们接风洗尘。南北老知青济济一堂的机会并不多。那一次，我们喝的是四川产的“知青酒”。曲酒的醇香，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说呀，唱呀，痛快无比。

梦彪近一米八的大个子，外刚而内秀，撰文作诗，无不笔下生辉。会议期间，他送给我三本书，《永恒的回忆》、《岁月如歌》是安海知青回忆文章的结集，还有一本是他为当年语文老师编辑整理的《夕阳集》。这几本书让我大开眼界，真正懂得了“文化古镇”的含义。没想到，一个小小安海镇，居然荟萃了这么多的文人墨客，各个才思敏捷，笔力雄健，足以令我们这些读了不少圣贤书的北方佬感到汗颜。

梦彪为人豪爽，好调侃，有话没话，总爱跟别人开几句玩笑。我后来得知，他是伟大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孙，却因为受到父辈的政治株连，遭受过很多的苦难。他后来对我吐露心曲：“我不愿意把结痂了的伤口再揭开，那会很痛的，会有血从心底涌出来。所以，我爱神聊仙侃，把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当成笑料来说，把不正经的、不严肃的、不沉重的当成正经的、严肃的、沉重的来聊。这样做就轻松，不会累身，不会苦心，还不会误事。”在沉重的压力和残酷打击下，许多人的人格扭曲了，变得逆来顺受、唯唯诺诺，能够像梦彪这样依旧笑面人生的又有多少？梦彪的特殊家世与成长历程，不能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

因此，2002年初，当我为知青口述史选择采访对象时，马上就想到了他。在给梦彪的信里，我是这样写的：之所以选你为采访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我选择的采访对象都是大城市的，惟独你是文化古镇的。在1700万知青中，县、镇知青实际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却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你是郑成功第九世孙，族大支繁，文化、政治、历史渊源深厚，有挖掘记录的特殊价值。第三，你说过，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少将军医，后来无辜被害，自己从小就受尽歧视、欺凌，是“血统论”的受害者。为此，你拒绝“忏悔”。你说的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望能有所阐明。第四，你们的知青联谊会很有特色，值得介绍。你做口述，是否可以以上述几点为基本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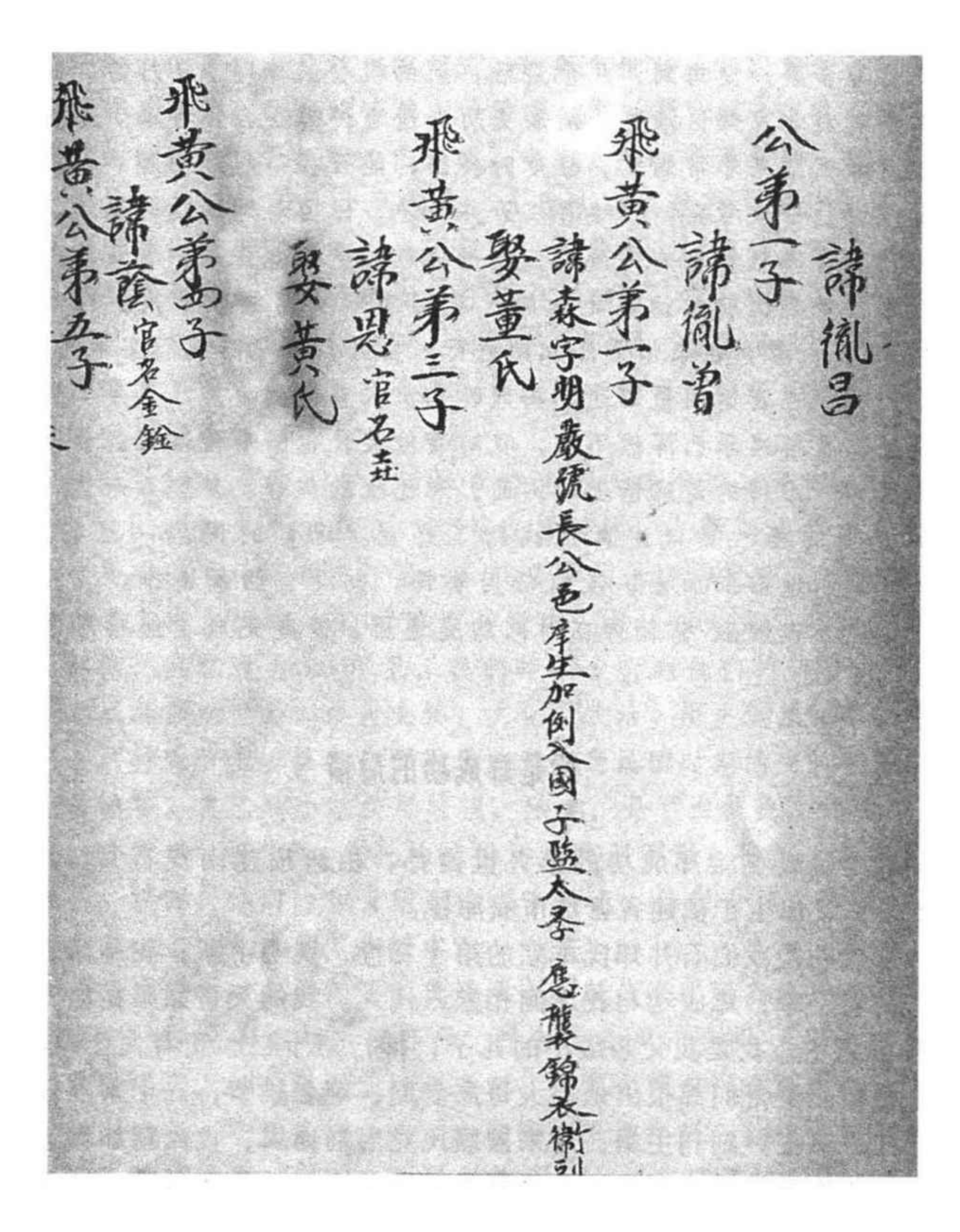
我采访每个对象，都要做现场录音，其他人或距离较近，或居住比较集中，实地采访都比较容易，惟独梦彪是个例外。从北京到福建，路途遥远，何况我刚从福建返回，短期内难有机会再跑一趟，于是我想出这么一个权宜的办法，由我寄去采访提纲，他根据提纲做一个口述，然后把录音带寄来。对我的要求，梦彪很痛快就答应下来。没想到，两个月过去，音信全无。最后不得不去信催问，他却抱歉地答复说：自己在乡下时受了很多苦，还自杀过两次，每次一提起笔来，就陷入痛苦的回忆，根本写不下去。他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做口述的事就这样搁浅了。

好事多磨，没想到，几个月后，新的机会又来了。9月份，我和日本学者对北京郊区清史、满族史历史遗迹进行了合作考察。一位老先生对考察结果非常满意，临走时提出，能否在年底赴福建、两广地区继续进行一次考察。福建晋江石井等地，保留着郑成功的墓地、祠堂，还有许多跟他相关的遗迹，于是我堂而皇之地将泉州晋江纳入考察计划，梦彪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我们实地考察的联系人。12月9日到12日，考察在泉州晋江如期进行。白天，梦彪陪我们实地考察；晚上，我俩在宾馆内做口述。头天晚上，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半。谈到兴奋处，喜怒哀乐已浑然不觉，我陪着他笑，也陪着他落泪。男儿有泪不轻弹，难得的是感情上的沟通，思想上的契合。梦彪后来说，多亏那晚上的酒，使口述真正找到了感觉。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不可遏制地汩汩而出，没有任何矫饰，也没有丝毫造作。“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徜徉在时间的隧道里，梦彪完成了他精彩的口述。

一　我是郑成功的后裔

我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第九世裔孙，祖籍福建南安石井，1949年5月2日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郑成功是我们石井郑氏本宗的第十二世，属明字辈，我是第二十世，属君字辈，郑成功与我之间相差八代人。我的大哥如果在世，是82岁的人了。我是我父亲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二。我有九个哥哥，三个姐姐。哥哥们都很出众。大哥郑梦周，笔名姚紫，二十来岁任厦门《江声日报》副刊主编，后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亡命新加坡。他的文学创作成就很了不起，有八百多万字的作品。他逝世后，被誉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奠基人。当时介绍我大哥，都说他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后裔。


諱衜昌
公第一子
諱衜曾
飛黄公第一子
諱森字明儼號長公邑庠生加例入國子監太學 恩襲錦衣衛
娶董氏
飛黄公第三子
諱恩官名垚
娶黄氏
飛黄公第四子
諱蔭官名金銓
飛黄公第五子

最近发现的明末本石井郑氏族谱，飞黄公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小时候，我说我是郑成功的后裔，同学们都取笑我，说我拉大旗做虎皮。我说，我哥哥是，那我不是？我是不是我哥哥的弟弟？他们还是不相信，说你是安海人，郑成功是石井人。我说，我爷爷从石井来安海教堂做杂工，我奶奶挑水。小伙伴说，你真爱臭美。我很气，就不说了，说也没用。再说，郑成功也没给我什么好处，不如糖果饼干这一类的东西。

四十多年来，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和镇上的人很少知道我是郑成功的后裔。2002年元月，我在报上几次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杜撰历史、编造历史、篡改历史后，泉州的记者抖出了我真实的身份。新华社的记者们到石井认真地核对一番，才确认我不是江湖骗子，是目前海内外石井郑氏辈分最高者之一。他们到石井，听到郑氏宗长称我叔，把在宗祠里居中的位置让我坐。八九十岁的人唤我公，称我爷，与我同龄的人竟然与我相差四代人，理应尊我太公。

郑成功陵园在1929年5月12日被盗。石井族人赶来安海找我父亲，我父亲立即率领石井郑氏族人百余前往护陵，同时请来国民党驻军许卓然（靖国军军长，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在福建的干将）部派了一个连驻扎。我父亲郑时雨当年在泉州一带很有名。他是孙中山警卫营的排长。陈炯明叛变的时候，子弹打穿我父亲的腹部，肠子外流，伤势很重，就在广州治疗。孙中山和许卓然看到我父亲不能从军了，安排他就地读书。就这样，父亲上了广州中山医学院，成为医生。后来，父亲回到安海，创办“安海平民医院”。虽然他一心一意行医，不再参加国民党党务，但凭他的资历资格，还是被授予少将军衔。陵园被盗没受大的损失。墓桌四周被撬起，盗贼没进墓室。父亲建议，与其投入人力物力，天天守护，防止陵墓再一次被盗，不如由本族人先挖掘陵墓，把郑成功陵墓中最有价值的遗物按房份分别保存，把不值钱的、剩下的卖出去，所得的钱作为修墓的费用。他的提议获得通过。郑成功的玉带、玉带头、头发，团龙绣补服，郑经、郑克的墓志铭，都是在这一次被盗事件中出现的。

小时候哥哥常提起这件事，后来，在福州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寄来1937年《逸经》半月刊登载的旅行家谢云声写的《郑成功墓被掘始末》，其中对我父亲的形象描写极为出色。谢云声说，从我父亲的性格特点和言谈举止中，可以想像出郑成功的样子。小时候，我家的旧厝大厅中间悬挂着郑成功绣像，壮实，魁梧，两耳垂肩，目光很亮。郑成功的一些诗，我都会背诵。如：“只有天在上，而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故国河山在，孝陵秋草深。寒云自来去，遥望更伤

心。”“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度，不信中原不信朱。”一把据我四哥说是郑成功遗物的鞭锏，也由我的八哥交给“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至今不知去向。

1962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00周年时，安海郑成功纪念馆向我四哥借去郑成功的玉带头。展览后，并未归还，后来，转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我父亲在临解放前被当地游击队枪杀了，解放后，我们这一杆子人全成为镇压家属，能说啥？敢说吗？人家斗你批你，你还得说声“谢谢群众的帮助”，远远地看见居委会的小组长，就得凑上笑脸，不然会说你仇视政府。

据我的调查访问，父亲不该死。从他遗留下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父亲是爱国的。抗战时期，他发明药膏的商标是“9·18”。商标的图案是：在中国版图上有只雄狮。那时，我大哥和他的同学（一些人是地下党的负责人）都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属进步的知识青年。父亲看不惯他们整日游东串西，不好好学习，见大哥带同学来到我家，经常骂他们没出息。大哥没面子，同学也没面子，对我父亲的意见很大。后来，大哥受到通缉，在我还没出世即1947年亡命新加坡。

大哥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当时他如果及时赶回安海，父亲就不会死，因为地下党的负责人不是自家亲戚就是同学。但是刚要启程时，遇上了台风，赶不回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三舅黄锡隆（留英医学博士、脑外科专家，原厦门中山医院院长）带领我们兄弟，一直为父亲的冤案向各个部门提起申诉。1983年，当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胡平在申诉书上做了批示。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

我认为，父亲是在社会激烈大变革中的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解父亲为什么而死。头颅掉下来了，总接不上的。万幸的是，当年我父亲死后，对我们兄弟并没采取斩草除根的措施。解放初期，地方政府也没抄我的家。我父亲留下来的财产没受到侵害，我们这么个大家子的人还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没落到沿街乞讨要饭的地步，因为家中的大缸里还装着银元。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说，在“血统论”以及“阶级斗争天天讲”还没盛行的时候，我没有因父亲的死而受到株连。

我的七哥是革命烈士，解放初牺牲的，证件是毛泽东签发的，还有效，或多或少让我家以“红”抵“黑”，遮掩遮挡一下。我想，如果这烈士证是刘少奇签发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家受到的迫害会更加悲

惨，更加凄凉。

解放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日子，我们一家子最挂念的事，就是县里和街道什么时候来慰问军烈属。临近春节，我家把大门冲洗得干干净净，把桌子和椅子抹得一尘不染，欢迎领导为我家大门贴红联，为我母亲递送抚恤金。但是，薄薄的、破旧的一张烈士证怎样能抵挡“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呀。当大风大雨扑来时，我拿出烈士证，想证明：郑梦彪是烈士的弟弟，郑梦彪虽然出身反动家庭，但是郑梦彪以他的七哥为榜样，背叛反动家庭。知青办和“四面向”[1]的人，把烈士证往桌上一摔，冷笑道：“你的七哥是烈士能抵过你父亲被镇压？另外，我告诉你，你的叔叔也是被镇压的。你说，一个烈士怎么能抵得过两个被镇压的人呢？”我晕头转向了，要是我家只有父亲一个人被镇压，那用七哥的烈士证做抵押，还能行，如果我还有一个哥哥，也是烈士，多好，不就能以“两红”盖“两黑”了吗？我太天真了，既然“血统论”的株连是浩劫年代的产物，就绝不是用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可以解答的。

我的叔父郑选卿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没调查，没发言权。我只知道，叔父是民国时期的石井镇镇长。每逢祭奠郑成功时，他是主祭人，因为他的辈分很高，属石井郑氏“维”字辈，与郑成功仅相差七代人。对于他，我连模糊的印象也没有，可是，在我的档案中有他的影子。这影子、这亡灵一直陪我走到旭日东升、邓小平同志灿烂复出的时候，才慢慢消逝。

谈家世，自然会说到我母亲。提起母亲，我心头就发酸。不避讳地说，我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老婆，也就是令我们中国人反感的“三姨太”。因为凡是年轻的姨太太，大都以其青春美貌讨老公的欢心而霸占家产，恶骂正庶的儿女。母亲进我家时，我二妈已和父亲分手了，去厦门鼓浪屿独居，母亲的年龄比我大哥仅长一二岁。我上幼儿园时，一个阿姨捉弄我，问我，谁是你父亲？当我错把父亲的名字说成四哥的名字时，这位阿姨呵呵地笑，还讲给其他的阿姨听。时至今日，我不饶恕她！因此，那个时候，我的哥哥们，无不对母亲怒目相对，摩拳擦掌。

听哥哥说，父亲被枪杀不久，我母亲患肠炎，卧床不起，以三哥为首的哥哥们准备把母亲扛到厝后，由她自然死亡。母亲感到异样，抱病起来，上厨房煮饭，才免遭一劫。我很清楚，那时，哥哥们不服我母亲，看不起这个为偿还她爹欠我父亲的医药费而嫁给我父亲的农村妇道人家。再说，我大妈的亲戚们以及七姑八姨担心我母亲熬不了日子，改嫁去了，有辱家风。

母亲没文化，不懂众亲戚冷言冷语中的含义。她默默地挑水、煮

饭，扫地，为哥哥们洗衣服，做针凿。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婚娶了，母亲高兴地为媳妇坐月子，带孙子。当孙子叫她一声“奶奶”时，母亲笑了。我的嫂嫂亲切地唤她一声“婶阿”（我也是用“婶阿”称我母亲的），母亲笑了。从父亲死后直到现在，母亲从没离开郑家，守寡50年，这容易吗？

由于母亲的淳朴厚道，我和我的八哥、三姐自自然然地融入郑家九男三女的大家庭之中。母亲、哥哥和姐姐都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深度和方法宠爱我。擦脸，三姐递来毛巾；上学，由八哥背上。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形成多元化的性格，张狂、冥顽、厚实、耿直、狡猾、不怕硬、只怕软等等兼而有之。不过，男人血性是郑成功后裔的共性。在石井，你会发现，郑氏文文弱弱的人，一被激怒，便会卷起狂风落叶的。这大概和大海的性格有些相同。

不是吹的，我的天资不笨，小学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在95分以上。我学习好，表现一贯不好。爱闹，爱打架，曾有把铅笔尖死命戳入同学手臂的劣迹。而直到今天，这位同学的右手皮下还留有黑色痕迹。不过，我也曾勇敢地替他承担了偷割邻居的猪尾巴的责任。尽管我的小学毕业成绩优良，可是安海没有一所中学敢要我。原因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少将的最小的儿子还想进中学读书？这是1962年发生的事情。

还没懂事的我简直懵了。不知为何，初考落榜了！那几日，家里笼罩愁云，时时听得到母亲轻轻的抽泣声。看到母亲湿了一大片袖管，我无声无息地躲进小楼。这时，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哭。四哥不停地在庭中来回走。夜里，他房间的油灯一直亮着，人影茕茕。隔日，四哥刚进门，母亲焦虑地问：“行吗？”

四哥颔首，唤我上楼。在大理石圆桌旁，四哥说：“我们比不上别人，你啊，要好好读书。”我似懂非懂，点点头。同学们已上课一个月，哥哥们才为我走好了后门，我才走进养正中学初一（五）教室。

我的母校养正中学很了不起，1928年创办，是福建省的名校。每个学生在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桌和昂贵的显微镜等教具。1965年，学校的高考录取录率超过百分九十。关于养正中学的光圈，我是在离开母校后才体会到的。那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只觉得中学比小学大，人多，好玩，树木、花草繁密，容易躲藏。就这样，我好动、好打架的本性发挥得相当好。

没想到，这时候我已经被政治老师盯上了。课堂上，政治老师不但把我父亲被镇压的这件事抖搂出来，还要求全班的同学要和我划清界限。同学不理我了，班主任把我扔在最后一排，单独一个人坐。这件事

我不敢告诉我母亲和哥哥，怕他们骂我，打我，罚我站四方砖，平举双手。在这种环境里，你说，我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成绩一落千丈是自然的。

不久，我害了一场大病，患乙型脑膜炎，昏死了近两个星期（请注意，这是第一次没死成，下去还有两次没死成呢）。初一学年结束，我有五门功课不及格。其实，没有这样差。五门功课都是差一二分，政治这科，竟是59.5分。我留级了。留级，这在我乃至我的哥哥们是从没出现过的大事。

1963年除夕，二哥回家，我心中有鬼，整天东躲西闪，害怕见到他。在兄长中，二哥最有威仪，我怕的就是他。他的眼睛好像总能看穿我的小伎俩。吃过年夜饭，等着分压岁钱。这时，二哥突然发威，拍了桌子，说，不能给梦彪，他的新衣收起来。明天，他不能吃饭，不能穿新衣，去捡牛粪狗屎。留级，有辱家风！我说了算，谁也不能违背！他说着，狠狠地瞪我母亲一眼。

大年初一，我颤颤抖抖地拿起二哥早就为我准备好的小铁耙和粪斗。我在前面走，二哥在后面跟。我哭，他就踢我的屁股。二哥赶着我，在郊区转了一天，骂声至今还在我的耳边"轰轰"响。中午，没吃，饿了。傍晚，饿极了，我趁二哥不备，眨个眼，溜进厨房，舀了一碗肉汤，正要喝，"啪"的一声，手中的碗掉在地上，鸡汤溅了一身。我大吃一惊，猛抬头，二哥凶神恶煞的脸上两个滚圆的眼珠直盯住我，说：不读书，留级生能有肉吃？哼！你没吃饭，我也没喝汤。你饿，我也饿，但是随随便便就有饭吃吗？只有把书读好，才有饭吃。家里的人全围上来，靠在二哥的身边，没人敢插话。除夕春节发生的这一事件，对我在那个时候和今天这个时候的刺激都非常大。二哥有效地遏制我向冥顽发展，激励我告别不学无术。二哥已走了好些年了，我怀念他啊！

打这以后，我安分多了，各科成绩突飞猛进。1964年，我的一篇《远足》（闽南人把春游称为远足）的作文平生第一次变成铅字，登载在《儿童文学》上。这件事，我的语文老师高兴，我也很牛气，走起路来，胸部挺得很高。我急忙把这篇文章寄给二哥。二哥说，很差。但我分明看到他嘴角掠过几丝笑纹。我把留级生常遭同学和老师白眼的颓势扳了过来。

二　我远离了上帝

我家的藏书很多。《台湾外纪》、《海上见闻录》、《延平王护官杨英从征实录》、《郑成功传略》、《岳家军》、《史可法》、《张煌言》、《徐霞客游纪》、《石头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

首》、《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都有。那时，我懂也看，不懂也看。见到插图好看的，就偷偷塞入书包。岳飞的字帖也有好几本。现在记不起来了，到底是不是真迹，我不敢肯定。帖子是装裱过的，有霉斑蛀洞，很烂。岳飞的字好看极了，哥哥们临摹，我也描红。“还我河山”这四个字，我写得特棒。“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帖子被抄走，我可惨了。因为在帖子里，在我的日记里，有我写的“还我河山”字迹。这还得了？惨了！镇压家属想反攻倒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大字报糊满了我家大门墙壁，糊满了我母校的操场，我的班级教室，我在教室里的椅子，害得我不敢坐下。我们兄弟真的没有反共和反攻倒算的想法啊。只是敬仰民族英雄岳飞，痛恨汉奸秦侩。十六七岁的我，哪有力气去复辟变天？再说，也没有人把我拉入反革命的复辟队伍。这时候，我家的话，我的话，谁听？苦，自己捶胸膛吧，或者掏开心肺。

1966年6月中旬，我被揪出来了。这一年，我17岁。

一个同学揭发我在英语课本的“毛主席”词组下面注上谐音：“千人骂”（无中生有！这位老兄现在与我的关系还不错）。这还得了？“现行反革命郑梦彪罪该万死”、“打倒郑梦彪”、“郑梦彪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等革命标语和大字报糊满校园。工作组进校了，我遭殃了，方寸大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工作组负责人在没有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便在教室前的操场上正式宣布：对镇压家属、现行反革命学生郑梦彪可以继续揭发和批判。我们对郑梦彪的揭发和批判仅仅占全校不到千分一的比例。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于是，我的二十多本日记被抄出来了。写日记是语文老师一再强调的，不写就扣分。日记里，有我读郭沫若的《为曹操翻案》、《蔡文姬》，田汉的《李慧娘》，王蒙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的新人》，还有什么人的《广陵散》、《改选》、《本报内部消息》等等的读后感。最要命的是，我在日记里、在课本上，还大量摘录了丁玲、陈企霞等“右派”的言论。这些东西我是从旧《文艺报》、《文汇报》合订本上抄来的。如“一个人只要有一本书，谁也打倒不了你”、“我像一块石头被人踢来踢去”、“放下你的鞭子”（延安时期的剧目）。同学们不清楚这些话是谁说的，全归在我的“黑话”中了。

上千张大字报把“郑梦彪”三字倒过头，上面打上红叉，有的大字报中间还画着血红的大勾，就像是枪毙犯人的样式。大字报确实是一切牛鬼蛇神的显微镜和照妖镜，我的“罪行”被放大了几十倍。我的毕业相片被接上牛和蛇的身子，牛鬼蛇神的样子非常丑陋（其实，在37年前，我的体高已1.75厘米，长得并不丑，女同学还给我传过纸条）。大字报多得难数。

一个同学在我的椅子上贴了大字报，让我整天站着，腿脚颤抖发麻。这事，我至今还记得。这位同学现在是山区中学特级教师，副校长兼市人大教委主任。25年前见了他，我总想要揍扁他，被人劝开了，没揍成。感谢同学看见我还能老实交代，没戴我高帽子，揪去游行示众，没在班上搭台批斗我。但是，他们要我读毛主席“老三篇”[2]中那一篇纪念张思德的文章。战战兢兢中，我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是可忍，孰不可忍”，同学们被我的猖狂激怒了。（上帝爷啊，如来佛祖呀，我在这个时候哪敢猖狂呀！找死？！）我夺门而逃，他们在后面追。遇上老师，老师不敢说话，更不敢救我。

“文化大革命”浩劫时，老屋前门被贴满大字报，开不了，进出都得走后门，而且随手把门上闩后，顶上石臼。夜里，早早熄灯。老屋静寂，只有放在埕围蜂群的“嗡嗡”声响。一个晚上，我又被唤去写交代材料，很迟才回家。敲门时，听到母亲、长兄下楼的声音。“回来了，回来就好。”在庭院中，母亲搂住我，长兄拉着我。家的温馨抚慰着我的惊魂。那年头，老屋是平静心灵的港湾。

在工作组的关心下，养正中学的“四家店”开张了。表哥、表嫂当老板娘，我的语文老师任掌柜，我成了他们豢养的马前卒。一天，我正在学校餐厅写交代和揭发材料，工作组组员呵斥我，要我跟他走。我就这样地走入县看守所。自己一个人一间，房间很大，一张草席，一条薄薄的、小小的被单，很凄凉。我没日没夜地写揭发材料，知道的都交代了，不知道的就编造。甚至把表哥也给揭发出来了。我编造表哥（我大妈的侄儿，我的英语老师）梦见蒋介石，还说他说过“日有思，夜有梦”。实在没词了，我知道表哥家对面是邮局，就给他来了这么一个段子：蒋介石反攻开始，表哥说，我先占邮局。

我之所以把表哥端出来，因为他时常流露出我是后娘养的、不是他姑姑亲生的那么一种不屑一顾的冷漠目光。而且每回照面，他总不和我打招呼，不和我说话。在禁闭室里，我把老师教给我的记叙文的写作方法全部发挥到一流水平，上纲上线，无中生有，弥天大谎，无所不用其极，都上了。一听到工作组组员在廊道的咳嗽声，我就打颤；一看到他们走入禁闭室，我就低头服罪，完完全全没有往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狂。那时，我只会唯唯诺诺地点头，说，是是是。我交代，我揭发，再深挖，争取早日回到革命的队伍，坚决与罪恶的家庭决裂。

1966年10月18日之后，我被放了出来。回到家里，我只会掉泪，好像失语了，整天呆呆的，两眼无光，临窗发傻。当晚，我八哥告诉我，表哥揭发母亲藏父亲的血衣，工作组领一搭人来，要母亲交出来。母亲

交不出，被踢倒在地，又踩上一只脚，被斗了好几回，回来后，服了断肠药，被抢救过来。家里的衣柜被砸，庭中的石板被撬翻，挖地三尺，花岗岩铺成的庭院，一塌糊涂。我静静地听，眼泪流到天明。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敢上街，只走小巷。遇见同学，头一低，闪开。红卫兵不要我，如果要我，他们就成为不纯的组织了。革命大串联没我的份儿，我真羡慕同学们点燃古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把，到全国各地去传播革命的红色种子，舞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个时候，我异常失落。没办法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就在房间里挂满毛主席和林彪的大幅照片。我好像已经变成红卫兵了，和同学一样，手捧毛主席语录，捂在胸口，虔诚地高声朗读“最高指示”。我不敢大声，只能默念一段又一段语录，害怕邻居揭发我“打着红旗反红旗”；害怕语音读不准，冒犯伟大领袖毛主席。

小镇的游行静坐开始了，我去瞧了一回。糟了，第二天，街上的大字报强烈地谴责我，警告我不准上街，不准混入革命小将的队伍。往日十分要好的同学见到我，如避瘟疫，逃之夭夭。虽然镇上两派的观点不一样，但是在我的问题上，看法一致，那就是不能让郑梦彪混入“红卫兵”的革命组织。有个高三的学长，悄悄地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让我激动好几个晚上。我每天用最干净的绒布虔诚地、轻轻地拭去像章上的灰尘。

古镇的“文攻武卫”开始了。一派占医院，一派炸医院，战斗非常激烈。医院就在我家厝后。子弹“嗖嗖”擦墙而过。隔三差五地有武斗队战士从我家后门巷子走过。一天。母亲和哥哥听到有人说，要不要给郑梦彪也来一枪，让他去见他爹？母亲和哥哥都吓坏了，我更是屁滚尿流，湿了外裤和内裤。我很紧张，母亲倒镇定，说，有人敲门，你马上躲在阁楼的大橱里，我已把橱腾空了，别吭声。躲了几天，平安无事。但母亲和哥哥们还是放不下心来，轮流为我望风。

半夜寒风紧，我母亲的侄儿从离安海30公里的金井镇后安村赶来接我。母亲已经为我准备好行李。临走时，我从琴桌下的密室里，取出《红楼梦》和王力的《诗词格律》，放入行囊，惊慌地逃离安海，如丧家之犬。天蒙蒙亮，到了后安渔村妗娘家。中午，姨妈来，说我长得英俊，像父亲，也像我母亲。小舅舅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别回安海了。一位长者，左瞧右看我，连声说，不愧将门之后。村里的文书拉着我的手说，好呀，红卫兵小将来了。欢迎！晚上，你可以给我们贫下中渔讲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带我们学好、用好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惊魂刚刚定下来的我，不敢说话，一直露着笑脸。大姨抱养的女儿、我表妹也来了，她与我同岁，很开朗。她牵着我的手，辫子

一甩，拉我往海滩踏浪去了。连续几个晚上，我都为在夜校的贫下中渔读毛主席著作和两报一刊的社论。我不敢再读“老三篇”，害怕又把“重于泰山”读成“轻于鸿毛”，把“轻于鸿毛”读成“重于泰山”。有一回，福建前线歌舞团到后安慰问演出，我还上台朗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那个报幕的女战士一个劲地夸我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小将。这一夸，使我又把尿湿透了内裤。幸好，天黑，没人发现。

小舅舅、表哥和表妹都是基干民兵。夜间，他们带我到海边巡逻放哨。海风吹来，打乱我的头发，但是我昂扬挺胸，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定坚决、彻底地歼灭胆敢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金井后安村，我一待就是两年。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仿佛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了。我不想回安海，家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会引起我伤心的泪。再说，我和表妹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那天，到海滩去，碰上大雨，表妹和我躲在礁洞里，她抖得厉害，依偎在我的胸前。我们这两个年轻男女，虽然不敢超越雷池半步，但是双方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是挺诱人的，挺让人躁动的。

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平静些了，我回安海过春节。有一天，在路上遇上我的体育老师（好老师。他前年撒手走了），他说：“下午我们谈谈好吗？谈你怎样说你表哥梦见蒋介石，还要夺邮电局的事？”我不吭声。“你说呀。两年前，你年纪小，不懂事，做错事，不是你的事。”我不吭声。“你要说，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工作组诱骗你的还是你编造的？你说，老师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乖乖，说实话，你是好学生。你说，老师听着呀。”我依旧不吭声。“你说呀！你别坑害人呢。他是你的老师。还是你的表哥啊！”“不是我亲表哥！”“那他是谁？”我不吭声。“你不该捏造啊！”“他捏造我母亲藏着我父亲的血衣。我母亲差点儿为这事死了。谁的危害大？我17岁，他40岁……”我走了。路上，我发现嘴角流了血，是自己的牙咬的。

这次的谈话传开了，传得很广。混蛋、薄情、不义，出卖亲友等等全部扣在我的头上。现在一些“老三届”的知青提出要忏悔。我是老三届知青的一分子，我要忏悔吗？你、我、他都忏悔吗？跪着对谁忏悔？谁是我们的教皇教主？谁有这个资格？忏悔了，上帝会赔偿我们的青春年华？我认为别奢谈什么忏悔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体现。高举忏悔大旗的人忏悔了吗？他忏悔啥？谁听到？郑芝龙的脑袋被砍下来，你要他忏悔降清吗？

我和我表哥谁也不向谁忏悔，但是事实到底怎样，大家心里明白。我不改口，这是我的权利，我的性格。他不改口，这是他的权利，他的性格。为什么我不揭发别人而揭发他？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人平时做人

的准则。同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同样在一个问题上，忠孝诚信仁爱的人与残暴薄情寡义的人给人们造成的危害程度大不一样。现在表哥不理我，我也不和他讲话。照面了，他点点头，我也点点头。他微笑，我也露个笑容。他不点头，我就不向他露笑脸。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舅，是一个医生，我病了，请他看病，他说，你别找我，去找你的亲舅舅。表哥的儿子、女儿和女婿遇见我，连招呼也不打。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直到现在，我没告诉我的下一代有这么个事梗着。我也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这种隔阂，你有责任，总不能全归当年17岁的我。有本事你从我的身上踏过去，去控告吧。在历史的判决书上，我是无罪的，而当年胁迫我的人也无罪，也不是他们自觉要这样干的。我还记得一位李老师拿饭给我吃，上面还放了两片肉。无罪的人忏悔啥？不过，也别到处向你的同事、你的学生、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宣传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劣迹。有头脑的人会帮我去反思。谁对谁错，自有公论，一直梗在心上，对谁的身体都不好。更何况，你老了，我也不再年轻了。但是，一句话，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揭发材料这个事，永远不忏悔。

我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个“老三届”的学生和他父亲的观点不同，就卡死了他的父亲。这人中邪了，有血债，要负刑事责任。但是，当枪口贴在他的后背心口时，你说，他要怎样忏悔？要向谁忏悔？面对人类的苦难，我们下跪……词句很美，但是跪下忏悔的内容是什么？你来罗列还是他来罗列？或者我来罗列？大家齐声高喊：主呀，我有罪。或者大家心里默诵：三宝祖佛啊，我有罪。主和三宝佛听见了吗？茫茫的苍穹之下，有一群傻头傻脑的人跪着……这有些滑稽。

可能还会这样说，忏悔不要形式上的忏悔，而是要从思想深处去忏悔。这更摸不着，猜不透了。我讨厌当着众人的面，举起酒杯，热泪滚滚地向老师道歉，说：当时我不该戴您的高帽，抄您的家，偷您的书。我错了。于是，老师也泪流满脸。这种场景其实是在做秀。忏悔者合理地利用喝酒容易动情，是煽情的最佳时段。如果我也登台，凭我10岁就在教堂洗过礼，凭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凭我背诵过莎士比亚长篇对白的基本功，我敢保证，如果要这样忏悔，我具有一流的水准。

我表哥在很多场合都说，凡是有郑梦彪出席的场合，我就不参加。如果我知道他有这样的说法，就打电话过去，先关心他的健康，又赞扬他儿女的成就，再请他来参加同学联谊会。结果，他来了。我端起酒杯，说，大家干杯。他也高兴地回应。你说，我这样做秀一番，能消除我和表哥之间的疙瘩吗？

关于忏悔，我写过一篇《远离上帝》，大意是这样的：我的长辈和

哥哥们都信教，惟有我说不清楚到底是拜佛还是信基督。回想起来，童年时的那一碟炒花生是其中的一个缘由。七八岁时，我就不傻，排行又最小，便得宠，受宠的待遇之一是客人来时可以上桌就坐，吃得到哥哥姐姐吃不到的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不过，我得跟客人们做忏悔。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见有三辆自行车停放在庭中，知道有客人来了，书包一放，溜进餐厅坐在我的位置上，守候着，嗅飘来炒花生的香味，听锅中"啪"的声响，嘴唇翕个不停。

客人谦恭上座了，炒花生，炒豆芽，还有豆豉上敷着的薄薄的肉片也上桌了。我的眼睛盯住还在"啪啪"作响的炒花生。这盘炒花生不是平时那种泼盐水翻炒的，而是搅猪油搀蒜泥的，颗颗粒粒，油光焕发，黄中透红。"主啊！"轻轻一声，四哥、六哥和客人们都闭上眼祈祷，忏悔开始了。不知道为啥，我的眼皮被香味四溢诱惑住了，闭不上。眼珠溜左瞧右，只见四哥、六哥和客人们浸濡在静穆之中。说时快，那时迟，我的小手不由自主地向碟中抓一把炒花生放入口袋里，没人知晓。又一把，还是没人反应。真想再一把，可是，祈祷忏悔结束了。大家举箸夹菜时，我埋头扒饭，不敢正视他们。一位上年纪的客人从桌上的边沿挟起一粒花生时，用慈祥和蔼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吃完饭后，我从裤袋里掏出炒花生，分几粒给三姐和八哥。

放学后，我贪玩，直到太阳下山才回家。"回来啦！"六哥冷冷地说。我看娘，娘不睬我，上厨房。"你上来！上来！"四哥在楼上吼我。我大惊失色，因为我最怕的就是他。"站好，不能超出这块四方砖，听到没有？举起手，平伸！你不忏悔，还偷炒花生，当我没看到？你呀，你！"四哥胡子直了之际，正是我哇哇大哭之时。我一抹鼻涕和双行眼泪的惨状使娘用袖角擦泪。三姐说："是那个上年纪的客人告你的状。"我摸着发痛的屁股，大喊："羞羞啦，假慈祥，他也没祈祷，也不忏悔，他眼睛也没闭起来。不然，哪知道我偷炒花生呀？"

发生"偷炒花生"事件后，客人来，我不上桌，让八哥上。我逃避忏悔了。长大了，遇到很多风和雨，我就慢慢地远离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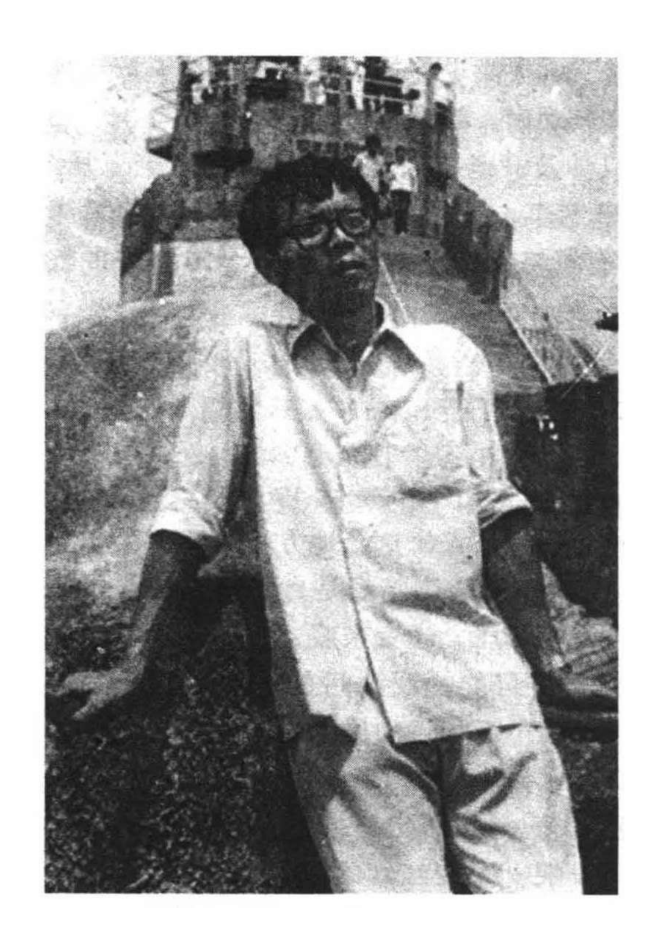
提倡忏悔的人说，忏悔只涉及"老三届"红卫兵，与"老三届"知青无关。那好，就当我没事惹事，因为我根本没资格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是，我有资格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　永福十年

安海镇"老三届"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是从1969年秋开始的。老实说，我想去，想尽快地逃离安海，安海这个地方不是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当时，"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都是自愿结组到农村独立门户的。

同组的，不是同学就是邻居，或者亲戚，或者同一个战斗队。没有一个同学愿意和我结组，可能怕我玷污他们小组的革命性吧。我只好跟我五哥的小舅子和两个不相识的男性社会青年结组，也就是永福知青中极少的“和尚组”。

一个蓝色的木箱、一个脸盆、一张草席、一条棉被就是我离乡的全部家当。迈出老屋时，母亲没哭，眼睛红红的。我也没红着眼眶。八哥和九姐送我到母校操场上。操场上彩旗飘飘，锣鼓“咚咚”。有人哭，还有人把车上的知青拽下车，抱在一起哽咽。这时，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金井后安的表妹和我表哥赶来送我。表妹给我捎来一把板胡，她眼眶好像有流过泪的痕迹。两年后，她到我插队的县城来找过我。我赶去小旅社，没几句话，她就哭得像泪人一样。她说，大姨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长她15岁的男人，问我该怎么办。她的意思很明白，只要我同意，她就嫁给我。我承认，我拥抱过她，吻过她，和她一起流了很多的泪。但是现实就是现实，悬在半空中的我，生死未卜，怎能再拉上一个人一起跳岩投潭？我离开了她，回到村子里那个用塑料布当门扇的家。她回去后，不到三个月就出嫁了。



插队时的梦彪

我是1969年10月23日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在农村，我干活儿很猛，180斤的担子，50华里的山路，对我不再沉重。每晚上还能频频地手淫一番。我每一年的出工都在300天以上。我当过民工，拉过板车，背着竹箩驮煤炭，系着麻绳在悬崖打石头，点炮眼，放炸药。虎口被打烂，坚持扶钢钎。我的体会是，能干活儿就能吃，能吃能干就壮实。

知青们的日子都苦，苦中相濡以沫。在苦日子中，人们自然不会计较你的出身、你的“反动”了。上山下乡使我重新融入“老三届”知青之中。我很高兴，很惬意。大概这就是我愿意为知青做事的一个原因吧。

村民不关注我是否是镇压家属，或“右派”学生，或者曾经揭发、编造过什么黑材料，他们认为只要能出工，能做事，能帮他们写信、写楹联的就是好同志，好知青。你帮我，我帮你，讲义气，凭良心，这就是我当知青时形成的脾气。有两个知青谈恋爱，因为那时没地方弄到避孕套，一不留心，女的有身孕了。这事出了，两个知青很快结了婚，在山区扎根，这就意味着永远走不出大山了。于是，我应他俩的邀请，走了30里弯弯山路，和他俩喝酒。仗着酒性，我看着这位男知青一前一后用力踢女知青的身子。女知青忍着痛，喊，再来，用力。呀！那夜，雨大雷响，知青点落在僻静的山凹，没人听见这呼天抢地的哭声。一团黏糊糊的血肉团踢下来了。当把这堆肉团投掷到深潭时，酒醒了，我异常恐惧，像是杀了一个人，有罪恶感。可惜，后来这两位知青离婚了。

苦日子，知青都能合着一起过，幸福之神降临时，知青的日子却乱了套。招工开始了，知青之间倾轧较劲相咬也就开始了。为了一个招工名额，尔虞我诈，大打出手。你抖出我的家底，我说你奶奶驼背。王五检举张三体重不过100斤，因为兜里藏着秤锤。我冷冷地看着，跳出场外，凭我的家庭出身，凭我的黑档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一场场的竞逐。由于我不是任何知青的对手，或者打击的对象，所以，大队的知青们都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我为很多知青写过“自我鉴定”之类的文字，炮制过许多贫下中农的“推荐表”和“推荐意见书”。反过来，知青们关心我，他们走上工作岗位，离开村里时，都把吃的、用的送给我，而且时不时寄信来安慰我。

刚开始的那几年，我还能平静地看待招工，但是一年年过去了，知青一茬茬走了，人少了，我慌了。这时，我感到一种恐惧的阴影逼来，压得胸口缓不过气。一个知青偷偷地告诉我，龙岩地区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说，我们让被镇压的郑时雨的小儿子当农民、当知青，已经是落实党的“给出路”政策了。郑梦彪想上师范学校？哼，等到全部知青都调出

来，都招工了，再考虑他的问题也不迟吧。这一席话传到县里，县里传到公社，公社传到大队，大队传到小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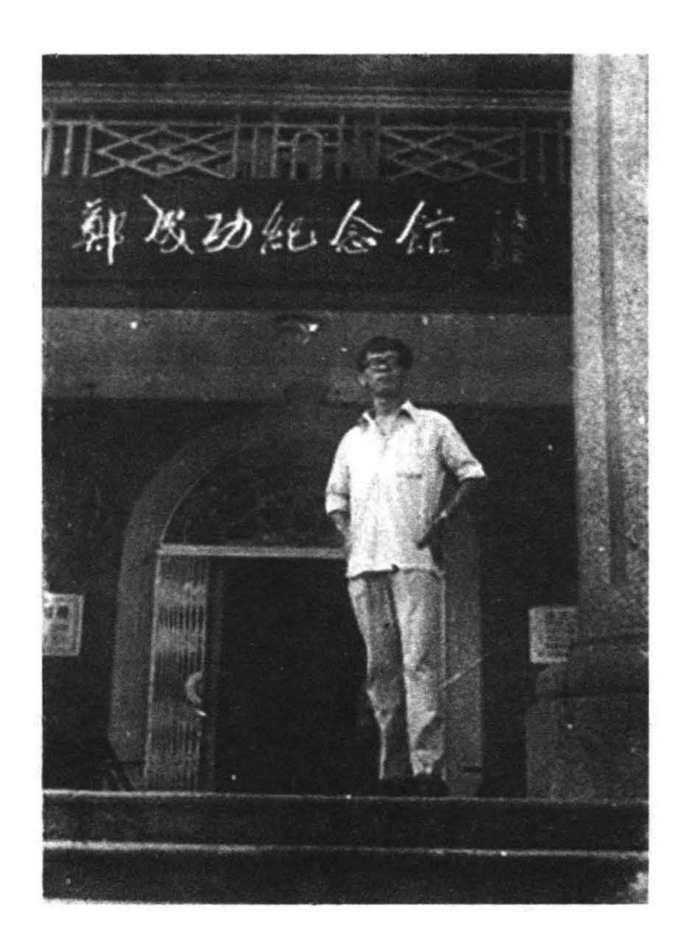
我今生今世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注（主）死"无疑了。我想到死，想到自杀。一个人想死，想自杀时，头脑很清楚。我积累了四十多粒安眠药。1974年，整个大队只有我没回家过春节。除夕那天，大缸仅剩四五天的口粮，袋子只有4.8元。我向村民借了辆自行车，去吕坊（相邻大队）买竹叶青酒。半路上，两瓶酒掉落，酒往外直流。我待在原地很久，"死了吧"的念头油然而生。当晚，村民送来米酒，我边喝边想，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远。没有任何牵挂，和着酒，慢慢地把四十多粒安眠药送到肚子里。想吐，吐不出来，头很昏，但思路特别清晰。迷迷糊糊中，有人架住我，头一沉，什么也不知道了。原来是村民夜里出来关鸡舍，看见挂在门上的塑料膜还亮着光，以为我没睡，想和我聊天。结果，我第二次没死成。

这一年初，任大队党支部支委的老农花很大的力气推荐我到后盂小学当民办教师。恰好，永福学区的负责人是泉州人，他点了头，我就把民办教师当上了。每逢暑假，我都不敢回安海，总是怕有人把我的位置夺去。我是教书的料子，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唱歌，什么都教。我一边自己认真地复习，一边认真向高三学长求教，知识水平不因上山下乡而荒废，反而有所进步。学生爱听我的课。经我调教的学生成绩不错。在他们之中，现在有的当了官，当了作家，当了企业家，日子混得不错，还经常惦记着我这个王先生。



与永福知青的合影

说来也好玩，当我西装革履地出现在已成为作家的学生眼前时，他认不出我了。因为我长胖了，眼镜是金丝边的，衣着是名牌的。后来，我说起当年在小学的细节和情景，他恍然了。他说，郑老师胡子拉碴，毛发长长，散乱。冬天没穿鞋，赤脚，常年一套褪色军装。夏天，脊背胸前黑黝黝的，烙印着黑灰的背心模子。这位学生，把我当时潦倒和现在富态的形象写进他的小说里。



插队时摄于郑成功纪念馆前

学校有篮球，有乒乓球桌，知青来了，可以玩一玩，消除烦恼。后盂小学成为大队知青的联系中心。我教书，我读书，好好的，没招谁惹谁，还写了个小歌剧《一支小扁担》，让学区的头头剽窃得了奖，我也没吭声。可是，在1976年春，公社的一位副书记要我回小队重新接受“再教育”，他想把他远房的亲戚顶替我。这时候，如果我回小队，自留地没了，鸡舍也没了，还有锄头、劈刀、耙子等工具全送给贫下中农了。原来在村里的住房养着牛，我一无所有，能去哪儿？人到无路可走时，大无畏的精神和狗急跳墙的本性就会爆发出来。我站在大队部大骂

这位副书记，骂了个天昏地暗。我叉着腰，顶着天，立着地，横在副书记的这位远房亲戚的家门口（与我同小队），大声地骂娘。我的学生也随着我的骂声起哄。还是不痛快，难消心中的愤怒，我就从大队部骂到小队骂到学校，一路骂开，一路发狂。谁都抖缩不敢回应。当天晚上，我把火线接在左手，把地线接在右手，开关一拉，抖了一下，保险丝断了，电压不够220伏，我在愤怒中在激动中又没死。这位副书记和他的远房亲戚退却了，卷起铺盖溜了。这次的自杀抗争行动好得很，就像是“狼牙山五壮士”拿着冒烟的手榴弹，喝退了日寇，然后跳崖。他们被树枝钩住，没牺牲。“阳痿”的电压恩赐我，第三次没死成。

开门大笑夜间雨，满地桃花满地红。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我怕情，我珍惜义。情义无价！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不都是重情重义的人吗？我说，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可以把心中的喜怒哀乐相互倾诉的人，就是可以相互帮助的人，不然，交朋友结知己干啥？我不相信“我有可以排了一条街的朋友”的说法，这种泛泛广交的朋友，一冲就溃了，就没踪影。那酒，那饭，那肉，统统被白喝、白吃、白拿了，很浪费，会使人心痛几天几夜。

1975年10月，突然有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招工名额下达到公社。我和他都是候选人，也就是说，我和他，二者必居其一。我和他的成功、失败的概率都在百分之四十九以上，五十一以下。这很残酷。我俩是肝胆朋友，有事都相互托付，他会演戏，我会写戏；他会打球，我会当裁判；他出工率高，我是贫下中农儿子的老师；他一身蛮力，我的三角肌也有三团肉；我俩的父亲都被镇压，但我比他的家庭背景要黑得多，因为还有一个叔叔也被镇压。那时，什么都颠倒了。谁最“红”，谁下；谁最“黑”，谁上。知青的招工有时也搞“形象工程”。我的七哥是烈士，如果我上比较“形象”，既“黑”又“红”呀。

这事咋办？我俩都想不出办法，再争取一个名额是不现实的。“形象工程”搞多了，就没形象。我不敢说你下、我上；反之，他也不敢说我上、你下。谁上，谁就是活路一条；谁下，谁就是死路一条。那天，我俩喝酒，都没说话，默默的，突然，他眼睛亮了，握了双拳。我会意了——打！摔跤！谁输，谁下。我说：你赢，我下；他说：我输，你上。一种相互的意会是很美妙的。我关上学校的门，他扫庭院的地。他赤膊，我穿三角裤。回忆当时的情景，这时我的脊背还有一股冷气飕起。我的眼睛闪着青色的光，他的牙咬得“嘎嘎”响。为了找活路，两人像两头野兽对峙着。

这时，有人敲门，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是女人的声音。我俩惊讶，呆着不动。喊声越来越响，门敲得越来越紧。我套上外裤，他跑去

开门。原来是一个女知青找他来了，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我俩练拳呀。"异口同声，配合得很好。我偷偷地问他，她是不是你的……他点头。我也点头。我说："你上，我下。"他不吭声。"我下，你上，听到没有？"他拉着我的手，很久没放松。后来，我俩都下海经商，他把我弄到一个集团的一个公司当老总，他也在这个集团的另一个公司当老总。我俩磕磕碰碰的事时有发生，有时竟闹得不可开交，任什么人如何做工作，都调解不了，但我俩的关系直到现在总是闹不翻。这种关系成为安海企业界和安海知青的一道解不开的谜。

我死不了，就乐观起来，养成神聊仙侃的习惯。有人说，女知青爱幽默的男知青，这话不假。T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蛋脸杏眉樱桃唇。看她那用红头绳扎紧的辫子在后脑勺晃来荡去时，是一种享受。那天大雪纷飞，T穿一件鲜红的花格子衫，走在雪地上，很靓，很像一幅"雪梅"图。当晚，我说，T真美。这话被伙伴们哄哗起来，说什么我移情了，爱上T，说我抄的宋词"……堪恨归鸿，情似秋云薄。书难托，忘了前时约"是送给T的，等等。在一灯如豆的草棚里，同伴的笑闹撩去许多烦闷。

可是，小道消息越传越甚，害得我现在的老妻Y赶了五十多里山路找我，说要和我摊牌。"她怎样？"Y问。"长得漂亮呀！"我直说。她辫子一甩，走了。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追了上去。

下雨天是知青们最无聊的时候。买酒，没钱；煮大锅饭，米缸空空如也。"上T家去，她爹总会让我们这些女婿都有饭吃的。"此话像一道阳光照得大家心坎亮堂堂。"别，别这样。"话犹未了，我就被大伙儿架走了。一进T家的门，同伴指着我，对T的爹说："他想来，又不敢来，我们陪他过来坐坐。"说罢，狡黠地眨眨眼。"来客人啦！"T的爹唤T，T应声，见是我，脸颊飞起红晕。大伙儿啃了鸡喝了糯米酒之后，腔更油调更滑。微醉时，T的妹妹捂我的耳朵，说："阿姊说她明天中午要去学校。"

第二天中午，T穿那件鲜红的花格子衫来学校。我问："找谁？"T蹙眉，说："你忘了？"我"哦"了一声，恍然大悟，记起T的妹妹替她说的话。"我，我——"我很尴尬。说什么好呢？揭发同伴骗吃骗喝的底细吗？知青的日子苦，能不消遣消遣？虽恶作剧，但不抢不偷呀。想到这儿，我释然，坐怀不乱。"哟，是你们俩呀！"声音很清脆，且挟带讥讽。Y不知从何方飘来。我一愣，T一怔，问："她？"我如获救兵，急忙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来，你们认识一下。"说罢，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Y是我的老妻莹莹，T是永福回乡知青秋桃，这事的经过是真实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都是知青们调侃惹的。1999年，回永福，我请镇上的头头为我了解秋桃的情况。头头们说，有这么个人，她疯了，瘦骨嶙峋。我心酸了一阵子，没胆量去看她。如果是因为我没娶她，她才疯了，那责任的问题说也说不清楚。不过，在山里，我从来没有娶当地姑娘为妻的念头，因为我属于大海，是大海的儿子，不是大山的后人。为了留下一段记录，记住在山区里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我在去年写下这篇东西，报上发稿后，我寄去永福。

说到秋桃，我的老妻也有一番感慨。她说，那天假如她没撞上秋桃，那事情难说了。我苦笑，真的不好说。当年，老妻说，一辈子要为我洗碗。我说，好，事情就这样定了。我的经历虽然坎坷，没死是我的福分。那么，自己找点儿快乐，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生活就不会太沉闷了。如果我没有爱的心态，爱的相随，可能就在破罐破摔的同时，把自己也给毁了。有了心上人，有了责任，我学会了乖巧。

1976年夏天，工作组到我大队组织“夏收夏种”。我知道，他们是劳动局和计委的，有意靠近他们，隔三差五地抓狗杀狗焖狗肉与他们共享。恰好，不久粉碎“四人帮”，形势大好。工作组回去不久，给我电话，说，要招工了。好机会，我上县城活动。他们说，县竹藤厂要人。我说，我会编藤椅。他们不信，我拉着他们到厂里去，现场编藤椅。结果，行了。70年代的最后一天，我被招工了，九死一生地跑出大山。凭这一关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把未婚妻也弄出来了。大队党支书讹诈了我两斤猪油后，才在我未婚妻的招工表上盖上大队革委会的印章。结果，我和老妻把床板加宽，用我的棉胎当垫子，买了新床单，缝密了老妻原来的棉胎，又买了一对新枕头套，一张新蚊帐，花了140元把婚结了。我和她很满足，新帐新衾度春宵。老妻躺在床上说，好洁白的纱帐啊。我说，好漂亮的你呀！

四　回归安海

工作有了，老婆也有了，我的惨烈知青岁月结束了，小命没丢在山沟沟里，还有幸遇上新时代。哈哈哈，好玩儿。回头一看，惊怵百感生，真的不敢再看多一眼啊！从离开永福的那一天算起，整整22年，我从来没想去看看原来插队的地方，虽然从县城到插队到地方只有45公里的路程。

到了县城，我和手工业管理局一位未脱掉“右派”帽子的生产股长同租一处民房。不久，他平反改正，摘了帽子，当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他不时地拉我一把，我顺得多了，编藤椅改为做电工，电工改为供销

员，参加过好几回“广交会”，供销员成了业务主任。

1983年，县里筹建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的大项目，调我去负责编写《项目可行性报告》和《扩充设计计划》。“老三届”知青怕的是碰不到机遇，机遇一来，便会紧紧扼住，不轻易放手。作为“老三届”初中生的我，对于这一重任，心中惶惶不安，但面对领导，脸不改色，一口承诺下来。本来这种活儿是工程师和经济师干的，但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结果写得乱七八遭，上报地区和省城的主管部门，不但被刷下，而且挨了骂。我仔细地研究他们的失败原因，他们的失败就是我的成功。我天不怕地不怕，拿着报告和计划上省厅，向专家学者大侃特吹引进西德（1983年的称谓）生产聚酯混凝土设备和技术的种种好处及依据。报告通过，我赢了。一个竹藤工出身的小小工人干了件大大的事，我脸上有了光彩。可是，出国考察时，我被拉下（还是家庭问题。怕我叛国当汉奸）。我恼极了，一甩手不干了。把两个40英尺的集装箱从厦门拉到漳平火车站后，我跳槽去工业局当生产技术科科长，充分地享受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水一张嘴的安逸工作。局长是老高三学长，他和我的关系外紧内松，唱双簧后，我们哈哈大笑，很开心。这几年，我和年轻人玩起围棋来了。

改革开放伊始，东南沿海的钱好赚，我经不起诱惑，在1989年辞职下海，到石狮、厦门和安海当老总。从1989年到1996年的七八年时间里，我从未看过一出完整的电视剧、一张报纸、一场球赛。晚上当“鬼”，泡舞厅，吼卡拉OK；白天也当“鬼”，拉关系，诱客户。不是西装革履，就是皮衣大哥大。风流而不下流是我惟一的警戒线。看到我八哥在安海公园唯唯诺诺地看守着游戏车的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论才气，论文笔，他远在我之上，我为他在困境中的孤独养成的怪癖而伤心。有时候我想，假如我没上山下乡，没和知青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偷鸡摸狗，我也会沦为不伦不类的人，甚至比我八哥，比我的八哥们更惨。因为在浩劫年代，素称文化古镇的安海容不下我，会把我的脊背扭断，把我的灵魂扭曲，至少不会让我自由自在，嬉笑怒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到大山，逃过一劫，起码个性没变，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990年，老妻和儿女回安海了。一大车的家具，一大堆的电器，跟20年前一张草席、一个脸盆、一个木箱的反差太大了。我不是说我有了钱，可以吹牛了。我是想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站了起来的人了。在安海，在异乡，可以放心走大路，不必像20年前或者30年前，躲躲闪闪，净走小巷道，而且低着头，不敢多看他人一眼，担心他人会啐我口水，踢我的腰，压我的头，扭我的手，押我进看守所。那时，我戴不上“红卫兵”袖章，参加不了战斗队，被踢出“革命”队伍，现在我参加了福建

省各级各类的协会，甚至当了一个南少林五祖拳学会的顾问。这谁挡得了？人，最有价值的是，朋友承认你是有益于朋友的人，社会承认你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便有些人还在我的背后喋喋不休地说，33年前，他是一条可以随时呼来喝去的狗。说这话的人，我为他可怜。有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至今依然抱残守缺，那张脸，苍老了，而思想仍很苍白，丝毫没有进取心，说不定，再过些时日，他的心身会突然崩溃，“砰”的一声，倒下。说不定，看在“老三届”知青的份儿上，我和与我同命运的“异类”们还会为他送终。

最让我痛心的，是我的三哥。1957年，他在广东政法学院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到三水劳改农场，在农场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后来，他平反改正脱帽，42岁才结婚。当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满嘴马列语言，没有自己的语言。我说他患了失语症。他大怒，写了长达万字的信，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上下五千年，骂我个痛快。他骂我在接受“再教育”时，没有扎根农村的信念，不走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骂我辞职跳槽是背恩忘义；骂我搞知青联谊会是纠集一群无法无天、教育不好的人喝酒划拳；骂我离开老屋，在外买房是忘祖行为；骂我揭发编造表哥的材料是“文化大革命”的罪人，等等，不一而足。他说，他死后，要学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骨灰撒在珠江，撒在石井江（祖籍地石井），撒在鸿江（出生地安海）。

不久前，他走了，我哭了，哭的内容很复杂。根据他生前的遗嘱，骨灰葬在了石井。彻悟了，可悲！我知道他可能想起，在清初的时候，郑成功的祖父郑士表的坟墓被掘；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惨死于满清人精心设计的火药之中，尸首二地，凄惨地离开了人世，家眷和儿子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十一人被斩杀；我的父亲能保护郑成功的墓，“文化大革命”中却保护不了自己的一杯黄土，他的墓被受蒙蔽的革命小将用大铁锤砸开，我们把他的遗骨连夜下葬在石井，等到浩劫平静了，才偷偷地把墓碑矗立起来……在宗亲的帮助下，我为他在祖籍地石井找了一块地。这祖籍地，将抚慰一个被扭曲的灵魂。在三哥的骨灰盒前，我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一代人，不了解我，我不是张狂，你应该为我在磨难中还保留一种锐气、一种积极的心态而高兴。如果我沉沦了，天天处在诚惶诚恐中，那才是我的悲哀和你的悲哀！我跨过两个世纪，活下来不容易，过了2002年，是53周岁的人了，但我的心态不老，白霜的鬓角稍微让老妻梳染化妆一下，还挺年轻的。

1969年秋，安海计有一千多名“老三届”学生和社会青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插队落户，分散在18个大队、124个知青户。返城以来，知青们长期像一盘散沙，他们中既有“老三届”又有社会青年，既有因

在“文化大革命”时同一派而后来经常聚在一起的，又有因不同学校而形同陌路的。再说，安海是个千年文化古镇，满街都是圣人，你不服我，我不买你的账。在原来的知青中，有当官的，有蹬三轮车的，有企业家，也有打工的、看大门的，各个阶层都有，他们之间的地位、贫富相差悬殊。你不服我，我能听你的吗？你“老三届”有啥了不起？你们还在读书时，我们已经闯荡社会了。由于没有形成一个轴心，因此，你一群，我一伙儿，一直散散的。

1996年以前，安海周边的泉州、石狮、青阳知青已举行了很多次团拜会，我们应邀参加，很脸子，想做又做不来，相当多的知青很苦恼。1996年正月初二，安海知青吴端养找我，说林志滔从香港回来了，想找我们谈谈关于成立知青联谊会的事。

林志滔是六八届高中毕业，和我同龄，出生在古镇的一个儒商家庭，在养正中学上初中后，因上不了母校的高中，只好到外地上侨校。他很聪颖，有才气，学生时代德智体的成绩很好，字也写得漂亮。“文化大革命”和下乡期间，他熟读哲学著作，很有心得，在他内向的性格中，透出一种英气。我说他“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很多知青都说准确。他在1978年去了香港，又当了一回“洋知青”，在地铁、码头、街市扛货、卸货，当苦力。后来他成功了。

成功后，他依然不露声色，很低调。深圳、山东、石狮、安海都有他投资、独资的企业。当他蹲在地上和我们聊天喝酒时，提到的是上山下乡的事，从没说起他的成功。在安海知青中，他平民化的个性和任何人没有距离。有一次，他参加安海的一个庆典活动，身穿牛仔裤和一件不是名牌的衬衣。镇长端茶时，闪过了他，只是一个手势——请用吧。后来这位镇长问，香港的林志滔先生来了吗？志滔兄说，我就是。镇长连忙说，不好意思，您这么年轻啊。志滔兄冷笑道，嘿，如果我是当年的红卫兵，你就会认识我。我不失时机地插话，红卫兵当年见的是毛主席呀。镇长很是尴尬，众人大笑。

志滔兄说，当年我们打球没输过石狮、青阳的知青，他们成立知青会，我们安海知青这么多年没成立，脸没地方搁。我在香港、在大陆很少参加社团活动，但是对成立安海知青会很感兴趣。上山下乡，空前绝后，我们同命运，共呼吸，有知青情结，成立起来可以互相帮助。成立联谊会不在于谁当头，谁过去是哪一派，“老三届”和社青都是知青，不分彼此。我想，发扬奥运精神，重在参与。他一再强调，不当联谊会的头头，为了启动，先拿出10万元，不够开支，以后再投入。

安海知青开始行动起来，1996年正月初三成立筹备小组，4月26日

在安海东海酒家隆重举行“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章程》，选举产生组织机构的名单，规定每年正月初三为安海知青的团拜日。澳门安海知青颜延龄、颜康龄和颜鸿龄三兄弟捐赠135平方米的商品房，作为会址。林志滔荣任会长。为了会长的事，我们差点儿与他闹翻。他坚决不干，说，这改变了他的初衷。直到成立大会的前五个小时，他才被我们赶上台前。苏永安、高增仁、高铭宣、黄木林、吴端养等任副会长；黄旭晁任理事长；陈永兴、张世源、李柏万、萧清萍等任副理事长；我任秘书长；林炯明、陈志成、黄少凡等任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1996年6月5日，晋江市民政局以晋民社证字第（96）002号发给我会《福建省社会团体登记证》，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依法成立。



福建省社会团体登记证

(晋民)社证字第(96)00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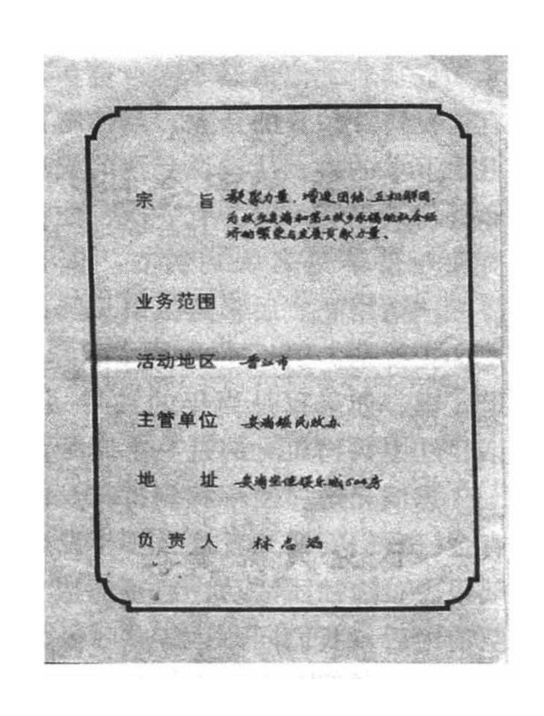
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 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团体登记的有关规定，准予登记。

登记机关：晋江市民政局

批准人：颜才毅

发证日期： 五日

安海镇知青联谊会执照



宗　　旨　凝聚力量，增进团结，互相解困，共同发展，为安海和第二故乡永福的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力量。

业务范围

活动地区　晋江市

主管单位　安海镇民政办

地　　址

负 责 人

知青联谊会执照

我们认为，联谊会的成立不是权宜之计，要想得到会员的拥护，应该制定规章制度，按制度办事。我们的制度是——会员资格：（1）于1969年到福建省漳平县永福公社上山下乡的知青；（2）承认本会章程即“凝聚力量，增进团结，互相解困，共同发展。为安海和永福两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贡献力量”。会员的义务：（1）每年缴纳50元会费；（2）参加本会活动；（3）缴交在每年正月初三团拜日餐桌上的费用（由各分会统一缴交本会）。会员的权利：（1）因本人去世可向本会领取1000元及分会1000元左右的补贴及布幔；（2）父母、家属去世可向本会领取400元的补贴及布幔；（3）子女考上大专院校可向本会领取奖学金（本科1000元，专科600元）。

六年来，知青联谊会（含个人）对安海和永福两地的教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捐献，主要有兴建科学楼的300万元，艺术馆的100万元，铺路搭桥架设电灯的100万元，增添教具的20万元，在永福造“知青桥”、修建校舍、铺路、架设电力线200万元，在永福设立知青奖学金（永福籍考生文理科前10名）10万元，在安海设立知青奖学金（会员子女）20万元，同时还组织了春节前慰问已故知青会员家属，组织会员参加送葬等活动。

1999年，我们组织六百多名知青及知青子女重返第二故乡永福，同年出版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岁月如歌》（香港瀚华出版公司）。2002年，组织厦门、漳州、泉州、石狮、晋

江、安海溪边知青农场的团拜会。可以说，我们安海知青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两个故乡的父老乡亲，对得起自己的知青兄弟姐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安海知青在港澳台及国外的有近百人，他们的捐资占知青联谊会资产的百分六十以上，没有他们的慷慨解囊，联谊会就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本来担心，联谊会成立后，会虎头蛇尾，热闹一阵，喝喝酒，猜猜拳，也就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搞联谊会是几个人想出名，想得利，后来看了我们一伙儿人做的事，心服口服了，重新积极参与活动。联谊会从没冷清过。每年的正月初三，在安海最豪华的酒店餐厅，排开五六十酒席，真个痛快！

一个社团仅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去做，要搞好，不可能，而且吃力不讨好。我们安海知青有一大帮子的人，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我们也有争论，有时也为非原则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解决的办法是：以“知青的名义”——猜拳。谁赢了，听谁的。做起事来，你呼我应，声大些，呵斥了谁，谁就咽下来，不吭声。有一次，常务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黄少凡实在忍不下去了，才说，如果不是知青的事，在安海，谁敢惹我？！副理事长张世源每年为知青本人、知青直系亲人奔丧达30次以上。你知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很忙的。

我的同学林炯明绝对是中国知青典型。在他手机里储存的电话号码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安海知青的。每年他为知青的事打出的电话费何止千元？他别想拿一分钱的补贴。最近，炯明认为联谊会没会歌，很遗憾，说罢，第二天就把歌词给写出来了。虽然这词得好好商量一下，但起码他尽力了。他把我会的会徽放大上色，别在挽幔上，在送葬过街时，让安海人知道，安海知青是团结的、重情义的。日前，炯明又来了一手，说想在明年正月初三的团拜会上提出，购个地皮，建个二三层楼，搞个“安海（永福）知青活动中心”。我答应写这个《建议书》，并在会上提请审议。他很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川菜。炯明正经而严肃地说，我死了，身上就盖有“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会徽的水被。座中无不动容。

联谊会成立后，我当了秘书长，更离不开一枝笔了。离我10年的笔因染了中国知青的浓墨重彩，好像不那么生涩，那么僵硬了。说来好笑，当初我写联谊会1996年度的工作汇报时竟然忘了报告的文体，累得满头大汗，后来还是由理事长、老高三的黄旭晁改定。当时，我满脸羞红，心想，笔不能丢，要捡回来，为自己，也为知青。到1999年即安海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和陈仲初编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时，我落笔流畅多了。1997年至2002年，我每年的发稿量达10万字以上，得过一

些奖项，加入了省、地、市的一些文化学会，历史研究学会，俨然是个文化人。后来干脆离开企业界，进入文化界，拿笔玩儿了个什么“晋江市海峡文化策划中心”。这两年，我编《安海楹联》，与他人合编《安海百年文学选》，为古镇文化人陈方圆（已鹤归）编辑《丁酉纪实——我的“右派”岁月》，为我的语文老师蔡尔辇编辑《夕阳集》。

本以为，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人都温良恭俭让，相逢时，问个好，鞠个躬，唤一声老师，回一声先生，心痒痒的，满足极了。有时候，邀请几个评论家，你吹我捧，大家欢天喜地。交往中，我发现有的搞文学的、搞历史的、搞乡土史的作家、专家学者特爱趋炎附势。今天写的，明天改写，后天篡改。臧否前人，今天说好，明天说不好也不坏，后天看哪门子有谁当官了，哪方富得流油，便说好，而且是好好好。有个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工作干得不错，为了跃上新台阶，不惜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扬施（施琅，本地的一个历史人物）贬郑（郑成功），把以前褒扬过的郑成功及其后代骂得一文不值。更让我寒心的是，今年年初，在东南沿海某市文化部门的一个年轻人竟追究起谁在搞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纪念，并说，也不看看是谁的地盘？纪念郑成功得到南安石井去，这里是施琅的故乡。难道明代人的地盘，到今天还拥有产权证？

郑成功和施琅都是泉州人，郑成功祖籍南安石井，七岁从日本回国，在安海星塔村读书。他三分之二的生涯是在安海度过的，现在还有他战斗生活的遗址。施琅祖籍晋江衙口。他俩原先一为主，一为臣，祖辈关系很好，施琅的宗叔施福是郑府的管家。郑和施都是泉州人值得骄傲的历史人物。郑成功不卖国，不当汉奸，从荷兰人手上把海峡东岸的疆土挑回华夏；施琅率领清朝水师把漂浮的台湾平复了，反对清王朝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就是郑成功和施琅两个历史人物值得纪念的原因。

作为郑成功对手的康熙皇帝没骂过郑成功，他向郑成功赠了“忠臣”和“孝子”的匾额，写了“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个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的楹联，并准许郑成功在台湾的灵柩回迁南安橄榄山，也就是现在的郑成功陵园。说准确些，这陵园是郑成功与其先人的合葬墓，在墓里，埋有郑芝龙、郑成功和郑经的骨骸。可知在清朝统治下，石井郑氏人家的无奈。一代天骄的郑成功，竟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杯黄土。



在九世先祖郑成功的雕像前



在覆船山郑氏墓地的祭祀大典上

从辛亥革命开始，中国人纪念郑成功的活动一波连一波，永不停歇。可是，还有人说“郑成功抗清，破坏民族团结”、“假如郑成功没有驱荷复台，那他就不是人”。对于这种说法，回应之声很少。郑成功骂不倒，有人就骂他的儿子郑经，说他搞“台独”，并从野史坊间查出郑经搞“台独”的所谓证据。其实，康熙平台时，郑经死了近二年了。郑经要搞“台独”，早就搞了，不会在郑成功死后的21年里依然奉明永历为正

朔，不改明朝国号。有人骂郑经后，再骂郑克塽，说他是“可怜的阿斗”。1683年，郑克塽13岁，他懂什么？郑经死后，在台湾的郑氏集团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刘国轩等人的手上。郑克塽只不过盖盖章，圈阅一下罢了，完成一项“形象工程”。一些人真的没词了，就说郑成功杀人如麻，妻妾成群，或借艺术创作之名，假施琅之口，大骂郑成功后代是“小子”。

我因为反对这种不尊重历史、杜撰历史、篡改历史以及热衷于“影射史论”和“影射文学”的现象，就以私人信件的形式，把上面的意见提出来，希望在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上不要太过分。收信人把我的信件抛了出来，不好了，我捅了“马蜂窝”了。但是，这个马蜂窝该捅，为了还原历史，为了弘扬爱国精神，为了忠和义。

我喜欢刺激，喜欢压力。不刺激，没压力，长大不了。一股扬施贬郑的歪风让我冷静下来，仔细地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我打开被捆绑的旧书籍，开始整理书柜。石井乡亲看在我父亲、我哥哥的面上（他俩都是医生，救了很多人。也治好很多人的病），由商会会长出面，办了10席酒欢迎我回祖籍地。治学严谨、有良知的专家学者认为，歌颂施琅，假如有益于国家的统一，无可非议。但是，简单的类比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方法。康熙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其实是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的残酷镇压。说到底，郑氏的抗清是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王朝之间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是形式上的类似，而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做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扬施贬郑的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颠倒是非，使忠奸不分、爱憎不明。我们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所以说，扬施不必贬郑，扬郑也不必贬施，历史是真实的，镀金镀银的人物总会褪色。

我保存的《大众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发霉破旧了，可是重新翻开读，很有心得。我回石井，对我的宗孙、宗侄们说，在纪念郑成功时，不要数落施琅二度降清，重请荷兰人攻打郑成功，要把“明郑成功集团叛将施琅”改成“明郑成功集团旧部施琅”，最好也请施氏来参加活动。第一点，石井的郑氏宗亲做到了，第二点还没做到。但我想，总会做到的。

历史上，郑施两姓关系密切，后来由于误会，加上郑成功和施琅性格冲突，造成了两家的流血事件。政治上的冲突引起掉脑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无聊的食客、闲士就编造“郑施不通婚”的故事传说。今年，我

也去了施琅的墓茔，去了施琅的家乡，也去了施琅纪念馆，还和施氏后人在施琅的石雕像前照了相。施氏后人硬把我拉在中间，使我很感动，也使我更加看不起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聊文人，伪学者，伪君子。这么几个人，今天到南安石井去，饭饱酒酣，夸郑成功，骂施琅；明天到晋江衙口去，夸施琅，骂郑成功祖辈三代人。如果跪在岳坟边的秦桧送红包给他，他会骂岳飞，骂岳云；如果秦太太和他去跳舞，喝咖啡，开房，一番满足后，他会仗着酒胆色胆，趁夜把岳飞的坟墓给挖了，顺便把史可法的墓也砸上一大锤。第二天一早，叫醒大汉奸洪承畴与汪精卫共进早餐。我向石井、衙口的郑氏、施氏说，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吃饭。酒喝多了，红包拿习惯了，会用死人制造矛盾，来压活人。这不利于团结，更不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郑氏和施氏后人都笑了。



重返农村时摄于后盂村前（1998年）

当我花很多时间研究郑成功和施琅时，刚好碰上今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的活动。我是郑成功的后人，而且辈分居高，自然能够参加许多活动，这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机会，还可以接触很多的历史资料。我不懂就问，当然，懂了就不装着谦恭的样子请教。老前辈教我许多研究历史的招法，比如说，要把历史事件时间硬背下来，要把史料中的虚词吃透，要以新的切入点，在同一史料、文物遗址或者旧书籍中发现新的价值。古镇有一位文化老人，92岁了，当我把张三说成李四时，他很不高兴，几天不理我，见了面就说我不长进，说我不学乏术，说我的下盘不稳，东摇西荡。这些指点，一些善意的骂声，让我受益匪

浅，感恩不尽。

今年初，我代表郑成功后裔批评电视剧《康熙王朝》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新华社做了报道。我发现了时间最早的郑成功族谱，被各种传媒广泛报道。我还写了有关郑氏家族的论文、报告文学、散文随笔、楹联。

给郑成功庙的楹联是：

英雄身后诠释中华魂魄，
人杰眼前分明石井地灵。
登鳌峰送目，顿时弥漫英雄气
入祖庙叩头，
即日萦回忠孝心。
鳌峦月圆，长向静心照佛镜，
井江潮满，化为甘露济苍生。
鳌山峰接云天，西天渐近，石井江流沧海，南海如前。
三鞠躬，对地对天对社稷，
九叩首，祈神祈佛祷成功。
兵屯扬子山功满，
泽庇百姓家月圆。

给郑成功族谱修编工程写的楹联是：

中原南渡，纵横半壁河山应是荥阳衍派，石井西亭，挥斥大
江台海本为郑氏人家。
继先祖雄风，星月一肩期一统，迎嘉宾英发，炎黄同脉溯同
根。
怀列祖列宗，名扬四海，喜盛时盛事，香远千秋。
炎黄后裔百家姓，华夏子孙千首诗。
宗祠入世艳阳日，俎豆登堂尧舜天。
振宗振族振风范，树德树言树典型。

当我写的文字发表了，被刻在石头上面时，虽然白了一大片的头发，但是，我认为：值。我想倾诉时，就去漳平市，去永福镇，去厦门、泉州、青阳、石狮的知青家里；去石井镇，或者上华夏知青网，老

三届知青网，聊天，上帖子。最近，我很想去后盂村，看茶花，看瑞香，看兰花，锄锄草，施施肥，过得休闲些。我有些累了，不过，休息一会儿，还能出工，讨小海，还能干活儿，还能教书，因为每餐我还能吃三碗干饭。哦，我还有一首老知青之歌，要在明年正月初三团拜会上唱的——《安海老知青之歌》：

青春经风雨，
一肩星月向谁诉？
放逐大山品尝辛酸苦辣，
折磨身心遭遇世态寒暑。
柔肠寸断啊，望故园，
山重重，重重雾。
听不到大海呼唤，
涸辙的鱼儿啊，相濡以沫。
家国入梦魂，
几许肝胆尽情抒。
抚平生命中的累累伤痕，

修补共和国的断裂族谱。
两鬓霜华啊，回故乡，
艳阳日，喜团聚，
再活个天晴月圆，
春满的华枝啊，朝夕相守。

唱唱歌，握握手，喝口酒，再跳个舞吧，自由自在的，因为我的灵魂不再颤抖！

---

[1]1966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按着毛主席的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后来把这个批示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一些地方还把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称为“四个面向办公室”，简称“四面向”。

[2]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尊奉为“老三篇”，提倡“天天读”，完全流于形式。

版纳知青在行动

——丁惠民口述[1]

采访人：刘小萌

地点：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316室

时间：2002年8月2日

［采访前记］　丁惠民这个名字，对许多知青来说都不会陌生，他是1978年末1979年初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的总指挥。这场运动几起几落，其间还穿插了签名公开信、罢工、请愿、车站卧轨、进京上访、中央领导接见等诸多事件，最终是以知青大返城为结束的。请愿运动前，云南农场知青至少还有五万人，一年后，据说只有70名知青仍留在当地。[2]尽管媒体竭力封锁消息，云南农场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还是风驰电掣般传遍全国。使上海、新疆、浙江……许多地方的知青从中得到了鼓舞。于是，更大规模的返城风在各地兴起。

在此以前，知青为了争取返城权利，曾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努力，像云南农场知青这样通过群体抗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有多方面，如知青的团队精神与勇气，高层领导的审时度势并对知青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等，而丁惠民作为五万知青的总代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把运动引向胜利，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新闻媒体塑造过形形色色的知青典型，但是只有在云南这样的请愿运动中，才会涌现出像丁惠民这样属于民间、代表民意的知青领袖……

我和惠民初次结识，是在2001年冬厦门知青文化座谈会上。头天晚餐，朋友们聚在一起胡吃海餐，惟独惠民坐在桌边发愣。问他哪儿不舒服，回答出人意料："想起那么多下岗的知青在贫困中煎熬，这饭我吃不下。"平常朋友相聚，免不了吃吃喝喝，何况如此难得的场合？但是听了他这番话，在座的诸位还是难免有些尴尬。那一顿饭，惠民只吃了三个丸子，盘子里剩下的三个，他叫大师傅端回去，第二天早上热了接着吃。这本来是件小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与丁惠民的合影

那次会上的人挺杂，作家、官员、学者、自由职业者……惟一的共性是大家都当过知青。当地记者来采访，请在场的几位给读者各题一句词，多数人的题词倒也四平八稳，惟独惠民的话掷地有声："我是知青我怕谁！"第二天报纸出来，别人的题词都散发着油墨的香气，惟独他的题词踪影全无。原因不言而喻。这又是一件小事，同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惠民的言语和做派跟别人的确有些不大一样。俗话说：非常人做非常事。不然的话，五万知青的领军重任，怎么就落到他的身上呢？因此，在做知青口述史时，他是绝对不能遗漏的。

2002年8月1日，惠民带着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欣然从重庆赶来北京。我事先与他约定，请他做一个口述，重点就讲知青请愿上访那段历史。可巧他在这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份自述性的稿子《在激流与旋涡中》，同意给我参考，这样一来，工作量减轻了不少，采访重点就放在补充一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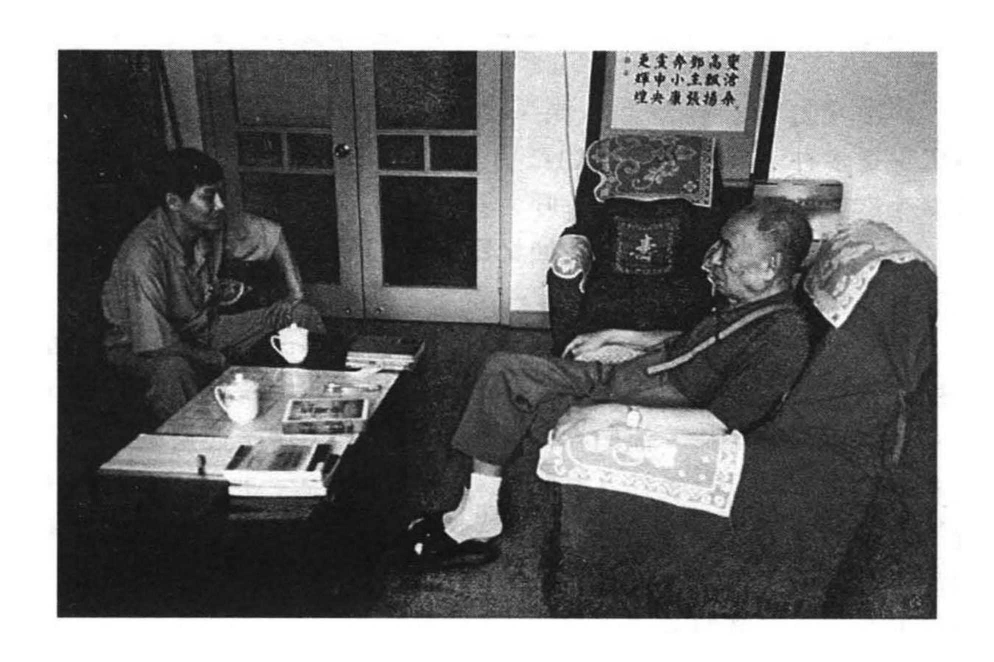
这天下午，我和惠民不顾赤日炎炎，去月坛南街拜访赵凡老人。23年前，赵凡作为中央派赴云南的调查组组长，在圆满解决云南知青问题上起过重要作用。当时，勐定农场知青举行大罢工，赵凡闻讯赶到，面对的是一千多名跪在地上的知青。他们有节奏地高喊着"我们要回家"的口号，全场哭声震天。赵凡被眼前的情景深深打动，他向知青们表示：一定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相信知青的合理要求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场景，已成为知青史中最悲壮的一幕，赵凡也因此博得云南知青的敬重。

如今，赵凡已是8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谈起往事来滔滔不绝。当年，丁惠民是五万知青的领袖，赵凡则是中央的代表，两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但在这以前，却从未谋面。23年后，他们终于在北京相聚，像老朋友一样地叙旧、谈话。显然，经过那场远逝的急风暴雨，他们早已熟知彼此。

对于赵凡当年为知青做的好事，惠民首先表示了感谢。赵则谦虚地说，允许云南知青返城是中央的决策，是中央对知青的关怀和照顾，自己和其他同志只是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要感谢就要感谢中央。"你和你的那些知青代表来到北京，当时我不在，去了云南。中央派了两个兵团司令（笔者按，指王震和程子华）接见你

们，确实是很重视的。当时叶帅（叶剑英）也很关心。国家需要安定团结啊！”

赵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农垦部门的主要领导，对当年中央解决知青问题首先是农场知青问题的态度应该了如指掌。我不愿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有意把话题转到新疆知青问题上。1979年，在云南等地知青胜利返城的消息鼓舞下，新疆农场的数万上海知青曾掀起旷日持久的上访请愿运动。他们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去新疆的老知青，尽管他们的返城要求有着充分合理性，但请愿却没有获得圆满的结果。关于这段历史，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已有概括的说明。于是我问赵凡：同样的背景，同样的要求，为什么中央对新疆的上海知青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策？他的答复很干脆：“新疆的上海知青问题与云南知青问题性质不同，当初上海的学生初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王震同志把他们招到新疆去，有吃有穿，是件好事情。他们自己也很高兴……”但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小小年纪就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为什么在他们中间，出身不好的又占了多数？听了他的一席话，这些问题立即就到了嘴边，但转念一想，出于对老人家的尊重，还是就此打住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观念也不相同，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又怎么可能一致？



23年后的拜访（2002年丁惠民在赵凡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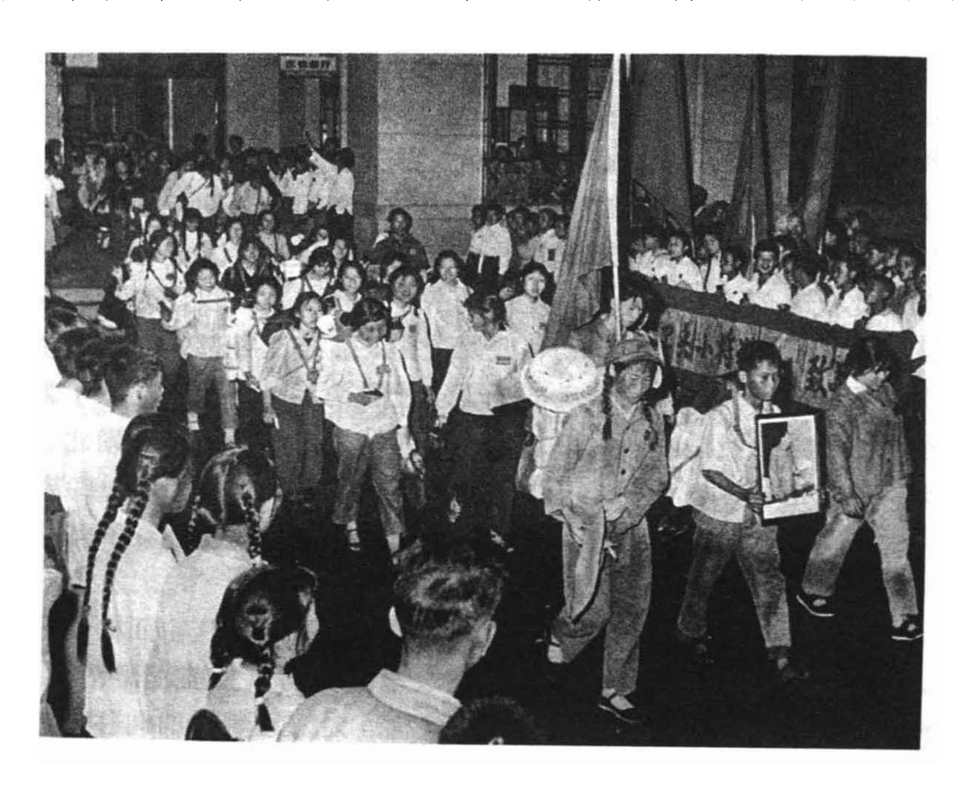
从赵凡家出来，我和惠民就分手了。惠民告诉我，回到重庆后准备办一家公司，很有信心的样子。这些年来，他的事业一直不太顺利。一个在大风大浪中娴熟驾驭过航船的人物，在琐碎的生活中有时却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中间可能有多种原因，与他不愿随波逐流的秉性是不是也有一定关系呢？

一　我就是好打抱不平

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可以说是多种矛盾积久必发的产物。从我个人来讲，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为广大知青的利益振臂一呼，并且始终置身于这场风潮的风口浪尖，也不是偶然的。我想，在回忆那场风潮前，还是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和经历。

我的父母都是上海南汇县人，父亲是大团镇的，母亲家在海边的三灶镇，大概相距几十公里路。他们怎么认识的？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因为大轰炸，他们在农村待不下去了，逃难往大城市跑。父亲到上海当学徒工，学什么徒呢？就是在南货店，也就是小杂货铺，卖些蘑菇啊干笋啊烟酒啊等等。母亲到上海，就像现在农村打工妹进城市一样，她进的同兴袜厂，也算是民族工业。这样他们就认识了，结婚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父亲生性耿直，看不惯的事就要说，可能我也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他还有个特点，很勤快，这一点我可没继承下来。父亲读过几年私塾，有点儿文化，字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毛笔字，和左邻右舍比起来还是可以的。到了“反右”的时候，不知什么缘故，就把他搞成了“右派”。按说他不够“知识分子”标准呀，怎么就能打成“右派”呢？不过，当时的年代和现在不一样，他的文化至少是高小嘛，接近初中这个水平了。好在打成“右派”以后报到上面没批下来。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父亲和母亲把家里的积蓄买了一些鞋子、衣服，都准备全家发配到大西北去了，最后又不让他走了，就差那么一点儿，可能是有一些小的原因在里面。



重庆知青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母亲是解放后通过扫盲运动学习文化的，那时候人才不够，而且她学习努力，成绩很好，有篇作文还得过什么奖，后来就调到上海南市区

尚文路小学当老师去了，一直当到1971年，全家离开上海。父亲虽说没当成“右派”，但后来马上是经济困难时期，城市大批减人，就把他第一批下放回了老家。他当了一个什么生产队长，当了几年农民。他很尽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把他的事迹作为基层干部的典型播了好几天。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国家的经济有所恢复，因为他是熟练工人，搞电工的，技术比较好，大概是四五级吧，就又把他从农村调了回来。

我们兄弟姐妹三个。上面一个姐姐，她比我早一年下乡，1969年走的，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她比我大两岁，今年51岁了，叫丁惠芳。她在兵团开推土机，叫什么斯大林100号吧，姐夫也是拖拉机手，是北京知青。我是1953年9月出生的，1971年，作为六九届中学毕业生，从上海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我一走，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叫丁惠建。1971年，他马上要中学毕业，父母亲就有想法了。那时候内地进行三线建设，上海动员一批熟练技术工人去支援，父母亲决定全家搬迁到湖北，目的很明确，就是不让最后一个孩子再离开身边。这样，全家调离了上海，几经辗转，最后调到湖北仪表厂，是属燃料化工部的一个厂子，在武汉市西南的咸宁地区崇阳县，是个山区。当初，我对上山下乡还是能够接受的，现在当然是两回事了。父母为调动的事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同意了，父母总要有个人在身边，所以弟弟现在还在湖北，父母亲也在湖北，好多年以前就退休了。等于我们家在上海就没有根了，就是一些亲戚了，堂兄啊什么的，父亲的哥哥已经死掉了，我的舅舅还在，可能也有80岁了吧，家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从1970年到1979年，我在云南一待就是10年，这中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漫长枯燥的生活，沉重艰辛的劳动以及前程渺茫无望，使当年热情活跃的知青逐渐变得消沉忧郁，对家乡城市的向往愈来愈感到遥不可及，回家的念头深深地埋在几近绝望的心底，一些务实的知青匆匆结婚，更多的人则无精打采地消耗着时光，混一天算一天。整个农场到处弥漫着压抑沉闷的气氛。这就是1978年返城风潮前夕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真实写照。[3]在这里，只想重点回忆两件事，因为这两件事对我后来发起版纳知青赴京请愿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3年还是1974年记不太清了，那时候，云南兵团还没改制为农场，现役军人领导，一些干部素质差，工作方式粗暴，糟蹋女知青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问题连中央都发了文件，李先念等领导人有批示，把几个首恶枪毙了，这些资料都有的。我的脾气就是好打抱不平，有人说这在上海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有一次，为知青打抱不

平，把连指导员揍了一顿，我也是忍无可忍。那时候，农场每个营有个武装连，兼职的，就是配一些枪、子弹。营长是现役军人，指导员告到营里，他就带了一个班，开着拖拉机，那时候还没汽车呢，咱们国家很穷的，“嘟嘟嘟”就开来了，把我五花大绑，然后吹哨子，紧急集合，当众宣布把我抓起来。

关了我整整九天，每天就是挑大粪、劈柴火，用重体力劳动惩罚我，叫我认错写检查，可我就是不写，最后还是由副连长出面，把我保出来的。为什么放我出来？主要是因为身体被他们打坏了。当初抓我的时候，他们用枪托狠狠打了一下，把我第四和第五节中间的腰椎打断了，到现在还是这样，背有些驼，就是打的。打坏了也没个说法。当时腰椎痛极了，还要挑大粪呀，大粪桶本身就有三四十斤，加上大粪一百多斤还得挑。我咬着牙硬挺了九天。睡就睡在地下，没有被子的，就是睡稻草，条件简直比“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的“牛棚”还要糟糕，“牛棚”还有个塑料布铺一铺，我就那么睡在稻草上面。当时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其他连队的知青，他们后来都成了我最可靠的战友。

1974年回家探亲，跟父母亲讲了一下这个事情，我说腰痛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母亲要我去照片子，看看哪里出了问题，结果发现腰椎中间有道裂缝，虽然已经自然吻合，但断碴儿没接好，因为腰椎错位，影响到体型。父亲不服气，前后写了六百多封上告信，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挂号寄的。那时候挂号信便宜，大概两毛钱几毛钱的就可以了，一封平信才八分嘛。他不让我回农场，到处告状，但是都石沉大海了。我在崇阳县医院看不好，又转到上海大医院检查，那些片子现在都在。

我大概在家里待了一年多两年的样子，就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了，“四人帮”一个月以后被逮捕。我觉得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跟父母商量。他们那时的工资都不高，我说老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还是回农场解决吧。

农场有一个老干部，姓陈，叫陈运保，“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没权力的，等到“四人帮”打倒以后又恢复职务，担任场长。那时候，云南兵团已经改制为农垦总局。1976年他写信给我：“你回来，只要我在这儿，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你不回来，有些问题确实不好处理。”这样我就回去了。陈场长把问题摊到会议上，讨论了几次，阻力比较大，一些干部认为我这个人不听话，讨论几次都没形成决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经济上给我一些补偿，补发工资；把我调出连队，到学校搞总务；名义上不再搞什么平反不平反。这是他们互相妥协的产物，我也表示接受，因为当时那种情况不能要求太高，能做到这步已经算不错了。就这

样，我调到学校去了。

到学校一段时间，工作比较熟悉了。我干工作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这工作有一个好处，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我比较轻松，就是领一些教学用品，发发粉笔什么的。等大家放假了，才开始忙，到处出去采购。那时采购不像现在拿钱拿支票就可以买东西，还有一个什么社会集团购物证，凭这个证，买些纸啊办公用品呀，学生的铅笔、课本，包括老师的备课本，哪怕一分一角的用具，都是我去采购的，有个拖拉机拉着我到处跑。我就利用这个条件，走遍了西双版纳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广泛了解了各地知青的真实情况，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

1976年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就是现在的太太，叫陈文先。她有一个女同学小Q，关系特别好，两个人都是重庆知青，又住在一起。她跟我讲，小Q的父母在想办法给她办病退，请你帮她跑一跑。因为我经常去景洪，景洪离我们有将近40公里路，我答应了。不久，小Q调令过来，我就帮她去跑手续。她在连队里，不好批假，而且搭拖拉机走也很不方便，而我因工作需要经常去景洪。

农场团部管这个事的叫章彬，我们习惯称他为军务参谋，实际上就是人事科长，五几年的复转军人，农场当时有这么一批复转军人。有一次我又去找他，有点儿不耐烦了，人家的调令早来了，你怎么老是拖着不办？！他说：你回去吧，让她本人来办。意思是，这事这么重要，你不能代办。我想这可能也是对的，就回农场给她捎了一个口信。我的学校是一个总校，每个连队都有小孩在我这里上学，就写个便条，找一个义务通讯员，带给小Q，让她第二天早上来。

第二天一早，一个男知青骑自行车把她带出来了，因为她不会骑自行车。我们连队离场部还有大概五六公里路，步行的话一个多小时，骑自行车大概20分钟就到了。来了以后，我就把她带到营部去，找个去景洪的拖拉机把她带走了。大概到下午四五点钟，她回来了，到我学校来了，两个眼睛红红的，情绪很低落，我当时很忙，没太在意。她说要回去，我说也行，吃了饭再走吧，过一会儿就开饭了。她说不了，就走了。

半夜，来了两辆自行车，把我从睡梦中敲起来了。一个叫田士强，上海闵行区的知青，还有一个叫黄根洪，是重庆知青。他们喊我小丁，他们说“小Q回去后饭也不吃，就一个人关着门哭，男的女的都劝她，她不说话，最后就说了一句话，要把小丁叫来。”我马上穿上衣服骑着自行车就进连队了。一见面，她还是不说话，那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有些

问题了，就把其他人都喊出去："你们都出去一下，我跟她个别谈谈。"一谈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个章彬军务参谋说，你的手续可以办，你要陪我睡觉。我立刻感到问题很严重。

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抓贼要抓赃，捉奸要捉双。你没造成事实，能怎么办呢？这事情我一定要管，但没证据，是很难说清楚的。他可以否认的，还可以倒打一耙诬陷她。我是完全相信小Q的，她这个人很老实，我很了解她的，她在农场都不找朋友的，很多男知青都想跟她套近乎，但她就是想回家。

天亮的时候，我已有了一个计划，就把几个知青叫起来，说：你们起来一下，把我和小Q送到营部去。我们一个晚上没睡啊。拂晓，就把我和小Q两个送到营部。因为我对农场比较熟悉，又找到了一辆车子，就到了景洪团部。我在农场里有两个好朋友，一个上海知青，姓詹，叫詹文仪，现在在上海，也是南市区的干部，他外号叫阿弟，我们是同学，他是农场的青年干事；阿弟还有一个好朋友，是云南退伍兵下来的，是保卫干事，叫康平，云南曲靖人，他们两个住一个宿舍。我先把他们找到，把情况谈了，他们也感到很为难，我们三个商量了很久很久，最后就定了个主意。他们说，农场现任的书记，我们管他叫政委，是个老干部，叫朱政红，也是刚刚恢复职务的，为人比较正直，他们建议我们找个机会去找他谈，把问题反映上去，但是白天千万不能去，因为那是家属宿舍，都连在一起的，如果小Q一出面，就会引起章彬的注意，而且不能让其他人代表她去反映问题，那样的话，真实性和和感觉就差得多了。

一直拖到晚上八点以后，阿弟、康平两个人先去侦察一下，看看章彬睡了没有，后来他的灯黑了，就该我们了。我不认识朱书记，平时跟他没有工作往来，就待在门口，小Q一个人就悄悄进去了。一直等到下半夜了，大概有两三点钟，小Q出来了。我看她情绪比较好，知道问题有希望了。那晚，我一直在芭蕉林待着，等着她出来。师部离团部很近，最多半公里路。我们就在师部开了两个房间，那时一晚上才三四毛钱。在路上她就给我讲了，朱书记让她放心，看来这个问题朱书记想管，而且很气愤，"怎么这个时候还要这么搞？以前枪毙好几个了！"

第二天，我和小Q又悄悄到了阿弟、康平的宿舍，他们两个去上班。中午的时候，康平回来说："小丁，这个事情看来有眉目了，朱书记早上就把章彬喊到办公室去，一直没出来，然后又把政治处的人喊进去了。"到了下午，事情全部明了，宣布章彬停职反省，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问题，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最后的处理结果我很不满意，给他撤职，下放农场当工人。对他的问题，专案组搞了很长时间，资料可以去

查的，肯定在他的档案里边。后来农场里都知道了，说是一个姓丁的把他告发的，这个上海知青胆子真大。因为当时没有任何证据啊。

通过这两件事情，你就知道知青为什么不愿意留在云南。其实，生活中这样的事很多。我连一个知青，开会时放了个屁，指导员就追上去，让他低头认罪，逼他站了几个小时，说他影响了开会。那时候吃什么？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容易产生气，吃多了，就容易放屁。因为放个屁就要拖上去站两个小时。唉，这种事实在太多了，促使我越来越关注知青的命运。我觉得社会对我们这一代人太不公平了，应当设法改变这种状态。那么，改变知青命运的最好办法是什么？是落实政策，增加工资，还是改善生活劳动环境？都不是。最彻底的办法只能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让知青们回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想法无疑是痴人梦呓。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谁敢公开反对？不过，多年的学习积累也使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我相信，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任何政策和方针路线都是人为的产物，是可以调整改变的。

二　掀起初澜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拨乱反正”的方针路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政治口号。报刊、广播每天都有新的消息：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形势证明了我的判断，使我有了信心，开始考虑争取返城的具体方式。

是耐心等待上面按部就班地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采取行动向上面反映知青的强烈愿望，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选择了后者。自己都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你们想回家呢？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来充当“领头羊”吗？万一事情搞砸了会有什么后果？这很像哈姆雷特“死亡还是生存”里的著名独白，是一个必须面对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曾犹豫过，但很快就做出了选择，不禁暗自发笑：丁惠民，你好糊涂啊！我们知青的现状与劳改农场的囚犯有何区别？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最坏的结果就是去普文劳改农场种甘蔗，有什么了不起？！《国际歌》给了我很大启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知青要想改变命运，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依靠一个人、十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100个人也远远不够，必须凝聚成千上万人的力量，才可能达到目的。为此，我决意放手一搏。

目标确定后，我开始陷入更深层的思考中，这一过程漫长而孤独，没有丝毫的欢欣，充满了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己也记不清考虑过多少次，一次次地提出各种方案、假设，又一次次推翻否定，进入新一轮

的思考……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采取循序渐进分阶段实施的策略：

第一是发动阶段。首先采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联名信的方式，诉说知青多年来的不幸遭遇。这一较为温和的形式能为多数知青接受，达到唤醒知青生存意识进而发动起来的目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模仿解放初期农村的诉苦大会，只是少了斗地主分田地这一条，但确实有效。给中央写信如同孩子向父母诉说委屈，合情又合法，旁人不敢说三道四。实践证明，这一策略的应用非常成功。

第二是赴京请愿阶段。前提是广大知青已充分发动起来，返城的呼声和愿望日益高涨。此阶段将着手建立运动的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把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的行动协调成一个整体，统一部署，统一行动，造成声势和规模，将运动推向高潮。这阶段可能会有一定风险，因为知青成立组织，自成体系，给外界的印象是与上面分庭抗礼。但关键在于：知青确实没有任何政治要求，只是希望返城回家。这一点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我当时设想：光靠写信签名恐怕很难引起高层的重视，赴京请愿则可以把声势迅速扩大到全国，引起各地知青的响应。上山下乡是一项已实行十多年的既定政策，背后牵涉到复杂的经济、政治因素，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仅凭版纳五万知青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把全国近千万知青都带动起来，形成南北呼应、星火燎原之势，情况必将改观，知青们才有望回城。

我还打过一个借势借运的小算盘：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上面有可能对版纳知青网开一面。当年许多知青代表还记得我在会议上讲过的一个比喻：贫困的父亲面对一群因饥饿而吵闹不休的孩子，他把闹得最凶的孩子打了一下，以镇住其他小孩，背过身，却悄悄地把家里惟一的一粒糖果给了那个挨打的孩子。

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运动将进入第三阶段，即决定成败的关键阶段。这将是一场力量、意志和耐力的大拼搏。我看过一些兵法书籍，深知两军对垒胜败关键不在于兵力众寡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主要是看谁能掌握主动以及战略战术的应用是否得当。一旦请愿无效，我准备立即组织五万知青自行撤离边疆，向各自的家乡城市转移。具体构想是：（1）各农场知青按原有建制集体撤离，徒步向昆明进发，同时开走农场所有车辆，用以装载妇幼病弱者和途中必须的粮食辎重；（2）指挥部成员一分为二，分别率领知青乘火车回上海和重庆两大城市，北京和昆明知青太少故不予考虑，返城以后，知青们仍按原建制，以团为单位，八小时一班轮换在市政府前静坐请愿；（3）同时动员知青的父

母、兄妹、亲戚好友及社会各界给予声援支持。这样，在衣食无忧并有家庭依托的情况下，进行一场持久的非暴力的和平请愿运动，不提任何政治口号，就是“回家”两字，看谁耗得过谁。

所幸，这一计划还未实施，知青们便如愿以偿了。事后我亦感慨万分：我们的党确实英明伟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优良作风没有丢。在知青问题上，千错万错都是林彪“四人帮”的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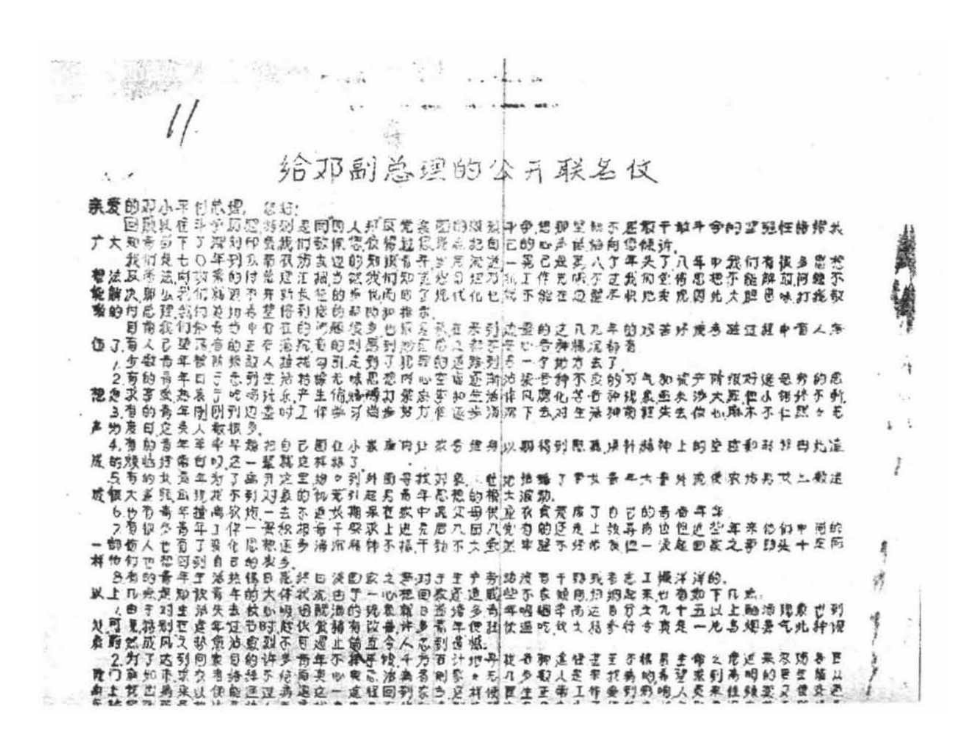
在发起请愿运动之初，我已物色了两个出色的左膀右臂，一个叫胡建国，一个叫刘先国。我和建国是结识多年的朋友。西双版纳是少数民族地区，和平解放的，对土司、头人比较礼遇，给他们保留一定的特权。每个寨子依靠少数几个骨干分子，呀，谁家的情况怎么样？凭着印象定个贫农、中农，虽然划了阶级成分，但水分很大。1972年搞了一次阶级成分复查运动，从农村抽调一批知青进了工作组，我也参加了，搞了一年多。那时和我在一起的就有胡建国，他是上海知青，二连的，我们俩很谈得拢。他这人比我聪明，这点应该承认，但就是胆子有些小，做事仔细谨慎，是典型的上海人，我这人做事比较粗糙。我把争取返城的计划跟他一商量，他认为计划很庞大，风险难测，但是也深知这么下去没有出路，都是不甘寂寞的人，不如一起干吧！俗话说：“脑袋砍下来，不就是碗大的疤”嘛。

刘先国是在运动起来后才参与到核心里来的。我考虑重庆知青在西双版纳占了大概50%左右，还有50%左右是上海的，各有两万多人，至于北京和昆明知青加起来大概就是几千人。先国是重庆知青，所以把他吸收进来，作为重庆知青的代表。必须考虑群众的心态，你如果完全让上海知青领导，大家难免会有想法。

“一个好汉三个帮”，胡、刘二人自始至终都是我最得力、最可靠的助手。如果没有他俩，我根本无法支撑起领导运动的重任。在运动期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面临多么危急的局面，他们都毫不动摇地同我坚守在指挥岗位上，为我分担压力，处理各种事务。当我亲自率队北上时，胡建国毅然承担起留守版纳的重任，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刘先国则随我赴京，鞍前马后风尘千里，途中诸多的事务均由他出面处理，使我有更多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版纳知青胜利返城，胡、刘两人功不可没！另外，我手下还有一员大将，叫朱一平，上海知青，是胡建国推荐的，后来担任请愿团的秘书长。这么一个领导班子就搭起来了。

1978年10月16日，我的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正式公布了。定稿前，我广泛征求场部和附近连队知青们的意见，把我的想法和将要做的事告诉大家。因为这注定是一场知青们广泛参与的群众性运

动，用不着隐瞒和故作神秘。结果得到了一致的赞同和支持，所有的联名信刻印散发等工作都是在众多知青参与下完成的。



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亲爱的邓小平副总理，您好：

给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北京知青钟阿成与我同在一个学校，他也参加了最初的讨论，由于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过冲击，使他比较谨慎，担心我的行动最终会触怒上面而招致镇压。令我欣慰的是，尽管阿成没有介入这场运动，返城以后，他通过自身努力，以版纳知青生活为背景，一口气写出三个“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名蜚中国文坛，也算为中国知青争了光。

第一封联名信立即得到各连知青的签名响应。因得地理之便，二团（东风农场）知青最先闻讯赶来，他们嫌重新刻印太费时，干脆索取底稿连夜返回抄成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在团部门口。

我的住处很快成了联络中心，各地各农场知青纷纷前来串联询问交换信息，探讨范围远远超过返城问题，说明知青同样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并不局限于自身利益。我这里成了知青的民主论坛和会议中心，时时刻刻都聚满了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我也从中受到许多教益。学校的知青老师自动组织起来，帮着烧水煮饭，接待前来的知青，下面连队的知青则源源不断地送来大米、蔬菜。真有点儿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气氛。

记得有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六团（勐腊农场）的两名知青浑身泥浆闯了进来。他们受农场知青的委托，骑自行车赶了二百多公里，途中车坏了，就徒步推车；干粮吃完后，饿了就向寨子乞讨剩饭，硬是走了两天两夜才赶到。进门第一句话："你是丁惠民吧？我们找知青的真理来了。"令我嘘叹不已，愈发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

奇怪的是，我这里天天门庭若市，人来人往，农场方面却视而不见，保持沉默。没有任何领导出面干涉过，但从他们躲躲闪闪的眼神中，我猜想是在等待上面的指示。终于有一天，农场党委书记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大意是：中央领导很忙，最好不要去打搅，有意见、有想法可以通过各级农场组织部门转达反映。我未置可否，含糊地说：我们知青的问题恐怕只有中央才能解决。事后我心里更有底了，联名信方式是正确的，农场无法正面干涉。

这时，又得到一个可靠消息：中央将在近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知青工作会议，对执行多年的上山下乡政策做一次全面的总结检查。这显然是一个极好的时机，知青们应该用行动来影响中央对知青问题的决策，我决定加快运动的进展。

11月18日，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了。如果说第一封信只限于诉苦，起个发动群众的作用，第二封信则有所不同，直接对上山下乡政策提出了质疑。我的用意是，促使知青群体中思想认识比较先进的那部分行动起来，他们是最终支撑起这场运动的基层骨干力量，也是决定运动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曾有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的英明论断，我所寄予厚望的这部分知青，有一些共同特征：工作学习刻苦努力，在逆境中能洁身自好，极少沾染不良习气，为人处事公道，在本单位知青中有较高威信，其中许多人已入党、入团和担任了一定职务，如连长、排长、指导员、团支书等。当然，他们的思想顾虑比一般知青多一些，对运动还处于观望阶段，正在犹豫之中，一旦介入进来，就会带动一大片，影响非同小可。这次运动能否走向高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部分知青的投入与否。

说来也巧，在这节骨眼上，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地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步。至于如何解决，什么时候解决，却没有明确的说法，不外乎让广大知青相信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会"统筹解决"。[4]即便如此，这篇文章与我们的联名信十分吻合，说的都是一个意思：知青问题不容忽视。于是，更多的知青打消了顾虑，有些知青甚至拿着报纸找干部们辩论。联名信活动一下子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11月下旬，在景洪城郊的江边旅馆，召开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的有二十多个农场（营级）的四十多名代表。这么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间里，上下铺坐得满满的，门窗紧闭，行动诡秘，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警觉，几次借口送开水或打扫卫生入室探看。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加上地处边疆，这也难怪。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午，把会议转移到县汽车站的停车场内继续进行。我把下一步开展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交给代表们讨论，获得了通过。这次会议解决了运动步入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把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农场知青签名活动初步协调起来，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此时，距后来震惊世界的知青大罢工还不到20天。

三　走向高潮

有人曾考证说：1978年底的云南版纳五万知青大罢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其人数、规模、时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其实，这对版纳知青来说并无多大意义，知青的目的就是要求回家，不想和哪级政府过不去。罢工也没有事先列入我的计划中，纯粹是形势所迫的意外之举。

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一些地处深山、紧邻国界的边远连队也行动起来了，各农场知青成营成连地互相串连，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时机日趋成熟。

面对大好形势，我却感到有些隐隐不安。随着运动的深入，知青内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表露出来：盲目乐观，夸夸其谈，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思想准备，在组织纪律方面则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缺乏全局观念，自行其是。这时期，一些农场相继发生少数知青无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以致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事情。对此，我极为忧虑，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大家以全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发生矛盾，凡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我知道，这是由于知青多年来在农场受到了太多的压制和打击所造成的，但这种势头若不加以控制，蔓延开来，极易损害运动正常进行。

在一次会议上，我告诫大家：罢工是我们最后的合法抗争手段，当时宪法还未取消公民的罢工权利，但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易动用。举行罢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一些小事轻率罢工；第二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有相应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鸭子似的，说声罢工就什么都不管了；第三必须是全体知青统一行动，只有大家一起罢工，才能产生震慑力。

没过几天，四团（橄榄坝农场）几个北京知青跑来，要求把罢工权利下放到各个农场，让各农场知青自己决定是否罢工。当即被我拒绝。他们进而要求我把指挥权交出来，由他们几个来指挥领导这场运动，理由是他们有渠道可得知上层的态度和消息。即使我同意了，版纳知青会有几个听从他们的？这几个人还不罢休，竟然将我事先下发到各农场骨干手中、供酝酿讨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用大字报抄贴在景洪街上，还刷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回家，不要总指挥。"我的意图被过早暴露，陷入被动状态。这种公然分裂知青队伍的行径立即引起大家公愤，许多知青提出组织人马去扫平他们，我没有同意。搞分裂的只是少数人，策划这一事件的绝不会是知青，背后一定有人在操纵，就是想挑起内讧，以达到破坏运动的目的。我当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只是让人用相机把标语拍了下来，作为见证。

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1978年12月8日，中国知青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地正式召开，这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大决战由此拉开了帷幕。七十多个农场（营级）一百二十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决议，并选举产生了这场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并在各农场设分组、小组；我被推选为总指挥；会议通过了由我执笔的凝聚版纳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联名信。

当天下午，筹备总组发出成立公告，向社会各界说明该组织的职责与功能，并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该组织将自行解散。同时发出警告：如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击，筹备总组将酌情做出必要的反应。至此，版纳知青羽翼已丰，锋芒毕露。

会议进行的同时，我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政府和农垦分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要求为请愿团赴京出具途中所需的通行证明，以及在请愿团出发时的欢送大会上请公安部门帮助维持秩序，当时曾计划召开万人大会为请愿团之行壮声势。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取主动，同时也算给地方政府打个招呼，以后到了北京总不能怪我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吧。至于所提的要求，我心里根本就没指望会得到什么满足。

知青回来报告说，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都没找到，就连理应在家战备值班的副职干部都没有，让人感到蹊跷。我率众亲往州委，果然，整座大楼空空荡荡，每间办公室的门都紧闭着，只有知青办有两名工作人员，也是一问三不知。在我们要求下，他们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回来总说找不到领导，这显然是托词。我得到消息说，地方政府和各部门的

大小头脑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开紧急会议。我不想逼得太急，就请工作人员转告：如果领导们确实工作忙，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只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当天夜里，直到半夜时分才来了一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我们又重复了来意，他愣了会儿，摇摇头便走了，再也没有下文。可怜那两名工作人员，一直陪我们守到天亮。

第二天整个白天，仍是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消耗掉了。没有任何回复，也没有任何稍有级别职务的干部出面，仿佛所有领导是铁了心躲避我们。夜幕重新降临，代表们已等了近30个小时，这不是单纯的受冷落的问题，一百多名代表的背后，是五万版纳知青企盼的双眼。长期以来，农场知青问题堆积如山，各种冤假错案令人发指，各项政策得不到落实，这里面除了个别知青自身的一些原因外，当地政府官员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否则，区区我一个普通知青何德何能，凭几封信就能将数万之众发动起来？现在，知青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诉说冤屈，他们却一味躲闪回避，连个照面都不打，这样做只能使事态扩大，矛盾激化。

"官僚误国！"我不禁仰天长叹。八年来的满腔怨恨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想挑起任何事端纷争，已经做了最大的克制忍耐，但总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事情总要有个了结。于是，我决定：上街游行。口号声响彻了夜空，附近农场的知青闻讯赶来，为代表们助威呐喊。师部（农垦分局）警卫通讯排的知青也携枪赶到现场，生怕代表发生意外。

在电影院台阶上，我和胡建国、刘先国两名副指挥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罢工的决定立即得到通过，先国激动得直搓手，下面的代表和围观知青已安静下来，他们猜测总组将采取行动了。当场，由我口述，建国记录，不到两分钟《罢工宣言》便拟定。先国代表总组宣读了总罢工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筹备总组决定：从即日起，全体签名知青举行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州委少数领导无视我们知青正当要求的官僚作风……"总组又决定：首批请愿团将于15日正式启程北上，同时命令现在景洪的代表立即返回农场，传达落实总组的罢工命令及相关的措施，迅速募集经费，选举请愿代表，收集控诉材料……

短短的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部瘫痪。如同当年"一切权力归农会"，知青们迅速接管各自农场、连队的实际指挥权，按照总组要求，公布罢工纪律，成立执法纠察队伍，维护罢工秩序和治安，再三强调不准损害老职工利益。以往时常发生的偷鸡摸狗现象随之销声匿迹，农场变得纯洁起来。知青们捐钱捐粮（票），热情高涨，空前团结，平日互相不和的也摒弃前隙，变得亲热起来，人们的灵魂得到了净

化升华。人人喜笑颜开，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中。

罢工一举成功，五万知青放下劳动工具，在“回家”的旗帜下凝聚在一起。这时，我却遇到了困扰。由于临时决定罢工，打乱了原来的部署，形势发展太快，一夜之间，什么事都变得匆忙紧迫，不允许按部就班从容行事。各种事务性工作如潮水般涌来，我一时有点儿手忙脚乱，问题是总组内部的职能机构还没来得及组建，全靠我和胡、刘等少数几个头头勉强支撑应付。急中生智，也顾不上组织程序，我干脆直接从自己农场调了一批平时熟悉的知青，跟随左右，遇到事情当场指派某人去执行落实，这样居然应付住了局面。为防止忙中出错，我采取以量取胜的办法，本来一个人能做的事，往往派好几个人同去，便于互相监督又可互相商量，人多办法多嘛，以拙补巧。反正罢工了，有的是人手。大家也乐意听我调遣，倒不是因为我是总指挥，而是每个人都想为知青做点儿事出点儿力，真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

13日，我率人到达景洪，指挥部仍设在景洪农场招待所，这是一座可以容纳二百来人食宿的四合大院，四周胶林围绕，距市中心仅一公里左右，位置环境均较理想。第二天是代表们报到集中的日子，各项准备工作繁忙紧张。这是我一生中最忙碌的日子，不分昼夜地召集会议，会见代表，听取汇报……

14日，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五万知青大罢工，州委胆子再大也不敢隐瞒不报。省委感到事态严重，火速命省知青办、省农垦总局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星夜赶赴版纳，了解情况，稳定局势，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劝阻知青不要去北京，就地解决问题。



在景洪的知青集合

工作组到景洪后，不顾鞍马劳顿，立即听取州委和农场方面汇报，才发现事态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罢工已成事实，知青已自成体系，所有行动都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纲领地在进行，声势规模前所未有，哪里是以往个别农场少数知青的“闹事”，简直是集体造反了！知青们提出的回家要求，莫说工作组，就是省委也没权力回复，这又如何“就地解决”呢？除责怪地方干部无能，以致养虎成患外，别无良策，遂决定先与知青接触一下，看看几个为首者何许人也。

我估计工作组此行目的不外乎起个劝阻、降温作用，对知青的回家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但毕竟代表省委，如不予理睬，将来中央批评下来会很被动。知青已和地方闹僵了，省委出面调解处理也在情理之中。见就见一下吧，有理有节嘛，尽量不要授人以柄。

在农垦分局双方见面，气氛很平和，没有出现争论对峙的局面，倒是陪坐在场的几名地方领导此时反而成了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工作组讲明来意，表示一定会在职权范围内尽量满足知青的合理要求，共同把事情处理好。态度无可非议。知青们主要强调两点：首先，引发罢工的根本原因，责任全在地方领导；其次，无意与云南各级政府为难，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和条件，惟一希望能够回家。如果省委答复不了，请让我们上北京直接向中央反映。

当晚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工作组已有所准备，提出一个初步意见，双方很快达成共识：这次罢工，事出有因，暂时不去追究谁的责任，今后由上级部门来做处理，知青方面可以继续罢工，农场和地方政府不得干涉，其余问题双方继续商议。工作组已将我们的回家要求向省委汇报，省委表示将向更上层请示，问题是可以商量的，门并没有关死。

我之所以同意暂缓北上继续商谈，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工作组透露：他们刚刚接到省委通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已经结束，最近一两天内将公布正式消息和会议的具体精神。其次，就在晚饭前，我得知一个意外情况：请愿代表中有人暗携匕首和自制火药枪，声言这次到京，如中央不让知青回家，就不想活着回来了。一副“荆轲刺秦王”的架势。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知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前段时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使知青最大限度地发挥热情，而忽视了对代表自身素质的要求。当时在部分农场有这样一种倾向：谁的言论最激烈，就选谁当代表，谁最勇敢不怕死不怕坐牢，就选谁去北京。我未能引起重视，认为这仅是个别问题，语言粗鲁些，纪律散漫些不会

出大格，大多数代表还是好的。孰不知，“一粒耗子屎能坏一锅汤”。赴京请愿带刀带枪干什么？一顶帽子扣下来，谁能承担得起？所幸发现及时，当即考虑了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个别谈话，晓以利害，劝其主动交出武器。但这几个知青本性鲁莽，思想一时难以转变，即使交了出来，也难保不从其他渠道寻找武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其驱出请愿团，以除害群之马，但这样做势必引起冲突。当时，景洪城内汇集了成千上万各农场知青，一旦发生争执内讧，后果不堪设想，危及整个运动。再三犹豫，我始终下不了决心，真是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又没有更多时间深思熟虑。

当晚，我宣布明天推迟出发，时间另定。顿时，大家议论纷纷，各种猜疑指责接踵而至。我完全可以轻松地同意明天如期启程，但那将是对五万知青最大的不负责任，必须等待中央的消息。

事隔多年以后，我在回忆总结这段历史时，已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何一场群众运动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发表比领导者更激烈的言论，这些言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作为领导者，却必须承担起整个运动成功或失败的责任。这就是领导者和群众的区别。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关键时刻，我经受住了考验，把握住了时机和方向，没有随波逐流。

四　率团北上

12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重要新闻：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顺利闭幕，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接见全体代表。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并在《试行草案》中规定，今后各国有、军垦农场的知青不再纳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而作为一般的农场职工对待……[5]你见过马蜂炸窝时的情景吗？当时知青的情绪比这还要猛烈100倍。“什么狗屁决定？老子受了八年罪，现在连个知青名分都没了。”“拼了，反正活不下去了，大家拿起武器，到缅甸打游击去！”“对，我们有这么多人了，怕谁？”一时间，群情激愤，沸沸扬扬，我敢说那些举手通过决议的人如在现场的话，非被扯成碎片不可。

天天说要恢复发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口口声声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岂能当儿戏？几十个人关门开会，就决定了千万人的命运？事先征求过知青和家长们的意见吗？……当我冷静下来后，感到中央可能受到蒙蔽，各级地方政府长期以来隐瞒真相，报喜不报忧，使得中央判断失误，决策失当。这就需要我们

尽快赶赴北京，直接向中央面陈实情，表达知青的真实愿望，协助中央纠正错误重新做出正确的决定，以利于安定团结，共建“四化”大业。

可是，面前这支队伍的素质结构和目前的情绪能承担这一重任吗？整个行动只要稍一出错，必将导致全军覆没而不会有机会东山再起。我突然感到肩上的责任变得无比沉重，几乎快要支撑不住了，但我决不能退缩半步。这是生死攸关之际，五万知青的命运啊！

尽管还未理清思路，局势的迅疾变化却没有给我留下更多的回旋余地。一些对我推迟北上大为不满的知青，此时背着我擅自召集全体代表到饭厅集中，还做了胡、刘两人的工作，试图与我摊牌。当时形势确实比较紧张，我迅速盘算了一下，凭我的威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估计还会有半数左右的代表能信任、理解我，那就冒险赌一把吧。

我走进会场后，暗嘱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要避免内讧。会场变得异常寂静，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我。我当时只说了几句话：“我决定暂时不走，一定要走的，我不强留，可以先走，每个代表自己决定吧。”局势很快明朗起来，代表们当场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要求第二天走的43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代表表示听从总组决定。情况比估计的要好，一场可能发生的内讧化解了。

此时，工作组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说我因不同意北上而遭到围攻，便派出车辆佯称有事商议，把我接走了，弄得我莫名其妙。当晚，为防意外，我确实采取过紧急措施，但不是为了个人安全，而是指派我农场几十名男知青把负责财务知青的住处保护起来，以防有人趁乱抢劫捐款，那是一万多元的大数目，岂能掉以轻心？

回到招待所，我把第二天要走的代表负责人上海知青黄玉海、重庆知青刘庭明叫到房间里，一一交代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让财务拨出4600元经费交给他们。从他们游离不定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们的心早已在路上了，我的话都成了耳边风。

16日早上，在数千知青的夹道欢送下，我把他们一直送到澜沧江桥头，大家在请愿团大旗下合影留念，互道保重，一一握手告别。望着远去的身影，心里涌起一股苦涩，他们中有不少人是第一封联名信刚公布时，就勇敢地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响应支持的。也许是多年的劫难和不幸，使他们变得急躁起来，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他们此行将非常艰难，前程坎坷难测。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分裂给知青造成了多大的损伤，为了全局，有时必须放弃局部。现在，主力毕竟保存下来了，思想更统一，步调更一致，只要总组旗帜不倒，人不够可以补选代表，钱不

够可以再次募捐，这就是胜利的根本所在。

送走第一批代表，不禁如释重负。一方面召开会议稳定留下代表们的思想情绪，另一方面秘密安排人员重新制作请愿团大旗，购置必要的器材物资，为随时北上做准备。同时，继续与工作组周旋。

第一批代表走后，工作组似乎并不在意，以后的几次会谈中，他们态度有些强硬，再三强调：上山下乡是中央既定政策，不可改变，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如国营农场的知青算不算知青，则可以逐级反映，甚至暗示：不要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我心中有数，尽量避开探讨具体事宜，说些漫无边际的话题。拖延时间，等待机遇，暗暗计算着新的大旗做好了吗？宣传资料是否汇齐？第一批代表该到哪个地方了？离昆明还有多远？当时从景洪到昆明需四天车程，留点儿余地，五天该到了吧？最迟20日该到昆明。那时我就该动身了。问题是，如何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摆脱工作组的纠缠。



赴京请愿团的代表们

17日晚，已近午夜，正准备熄灯休息，从二团来了十多名上海郊区的知青，男男女女站了一地。原来他们农场领导在当天广播中说：这次知青闹事，上面给定性了，是反革命事件，丁惠民等一小撮坏头头，已经被抓了起来，正在办学习班交代问题，所有知青明天必须复工，否则一律按反革命分子处理……知青们不明就里，心里又害怕，就跑到景洪来找总组问个究竟。真是天助我也！我当即指派几名代表带他们去工作

组驻地反映此事，并通知工作组：由于农场方面违反原先协议，知青决定终止谈判，立即赴京。

按我原来计划，请愿团将由副指挥胡建国带队北上。此人心细精明，爱动脑筋，遇事沉得住气，惟一弱点是不敢拿大主意，与我的性格相得益彰。但目前局势严峻复杂，为确保此行成功，我临时改变主意，决定自己率团亲征。由建国代我坐镇版纳，看守好大本营。我交给他的任务只有四个字：坚持罢工！决定做出后，我俩欲言又止，他知道我这次要拼命了。半晌才吐出几个字："让先国跟你去吧。"多年的情谊尽在此中。

代表们连夜收拾行装，沉浸在大战前夜的兴奋中，而我已极度疲惫，只能靠在床铺上发布一道道指令，交代各方面工作。我从代表中挑选了56人组团北上，其余的留在农场坚持工作。代表们背后自行商量决定，为我配置一副担架和一名专职勤务，负责照料途中的饮食起居。同时还让一名当卫生员的女知青代表携药箱随团出发。这名女知青结婚不久，已有身孕，后因途中疲劳过度，到京后即出现流产征兆，大家知道后，马上派人送她回重庆老家治疗休养。

18日早上8点，请愿团正式出发。在街心花园举行了庄重的宣誓仪式，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上万知青热烈相送，从此踏上了风尘万里的北上征途。

当我躺在担架上，被战友们抬着跨过澜沧江大桥时，先我两天出发，距我仅三百余公里的第一批代表遭到了灭顶之灾。那个地方叫通关。18日早上，他们正在吃早餐，管钱的知青突然发现装着全团经费的手提包不见了，那四千多元是知青们一角一元凑起来的，凝聚了多少知青的血汗。通关只是个百来户人家的小驿站，整条街道不足百米，仅七八家小食店小商铺，坐落在山顶上，两边都是陡峭的悬崖。除了过往车辆，街上很少有人闲逛。事发前后似乎没有什么陌生人接近过知青，而几十个凶神恶煞的知青在一起，天下再胆大的窃贼也不敢下手。慌了神的知青到处搜寻，差点儿没把小小的通关翻个底朝天，却毫无线索。后来传闻，是公安部门奉命派出便衣干的，目的是阻止知青去北京。我想不会的，我们的政府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但这笔钱确实在通关丢失了，成了千古之谜。

当天晚上，我们到达思茅。这是一个拥有十几万人口的边疆重镇。由于此行匆忙，我决定在此停留一天。在思茅，我把全团整编成几个职能小组：指挥机构为团直组，我自任团长，刘先国为副团长，还有秘书长、司务长、财务出纳、卫生员等，下辖宣传组、写作组、纠察组、后

勤组，暂时没有安排具体工作的代表统一编人机动小组。这样一来，全团上下人人明白自己的岗位和职责，行动指挥更加简捷灵便，适应长途行军。晚上，由我填词，一名懂乐曲的代表谱曲，《请愿团团歌》便诞生了，由纠察组长李长寿充当临时教官，不到一小时，全体都学会了。



版纳知青在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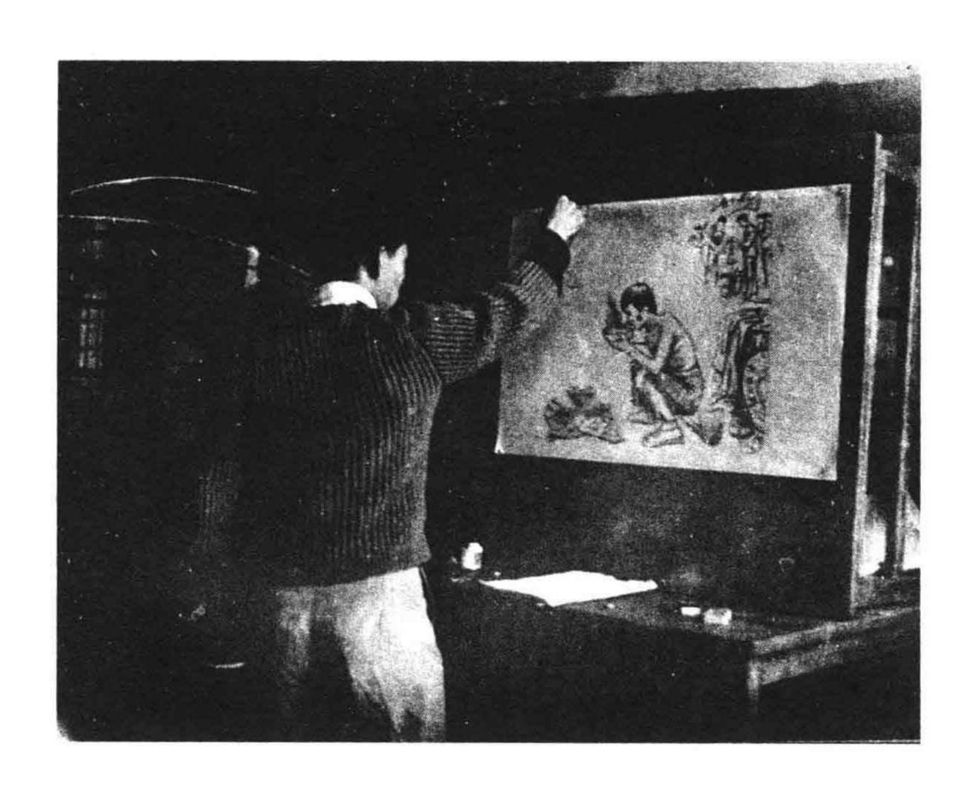


请愿团途中小憩

21日到达杨武，此地距昆明仅一百七八十公里，也就是说只要再有一天时间，便可到达省会昆明，到了昆明就可搭乘火车直驱北京。连日来队伍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体力消耗极大。从地处亚热带的景洪出来后，越往前走气候越冷，代表们身上几件单衣是无法抵御北方严寒的。两天前经过普洱县城时，我看到一种两尺见方的婴孩棉被，即令司务长悉数购下，共二百余条。按我设想，把两块棉被合拢来就是一件棉背心，一块棉被卷过来就是一条棉裤腿，样式是有些怪异，但穿在身上照样暖和管用。

途中，从昆明探亲返农场的知青口中得知，第一批代表丢失了经费，正在昆明闹得不可开交，遂决定在杨武休整一天。特意关照司务长提高伙食标准，改善生活，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儿，以尽快恢复体力。同时组织大家去附近温泉洗个澡，换洗衣服。又硬性命令所有人员必须按照我的设计，制作一套棉衣棉裤，未完成者将遣返农场。我不想有人冻病在半道上。

刚听到第一批代表丢钱消息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真想痛骂他们一顿：四十多条男子汉，居然连一个钱包都看不住，还怎么去完成请愿重任？生气归生气，事情还是要管的。我询问财务得知，尽管一路省吃俭用，账面上已不足六千元了。现在还没到昆明，离北京还远着呢。我盘算了半天，咬咬牙让财务划出700元。那知青满脸阴云，磨蹭很久才勉强拿出钱来，临走时嘀咕了一句：“他们自己把钱弄丢的，怪谁？”



我把小L叫到房间，准备派他去昆明送钱。说起小L，这里有个小故事。他是二团重庆知青，上唇蓄一撮斯大林式的胡须，身体壮实威武。他本是“走派”中的一员，16日临出发时有人要他“潜伏”下来，暗中监视我是否会“叛变”，我心中明白但未动声色。18日我离开景洪时也没有借口留守农场把他甩掉，就是想让他亲眼看看我这个总指挥够不够格。这些天他态度明显转变，私下对人说：他歪打正着，留下来留对了，跟人跟对了。派他去昆明向第一批代表转达我近期举动，要比其他人更有说服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曾查过财务登记，没有看到该农场知青捐款的记录，估计这笔钱还在他身上，让他单独去昆明，希望他借此机会弥补过错。我让小L转告昆明的代表，要么回农场，叫农垦总局派车，要么在昆明原地等待我的消息。昆明不是版纳，万万不可莽撞行事。

第一批代表受挫，给我平添几分困扰，看来昆明是不能去了，否则，即使省里不阻挠，第一批代表也会与我纠缠。而我自己也面临经费不足。再三权衡，决定不再过多考虑他们的问题，有小L送去的一明一暗两笔钱，至少可暂缓食宿之虞，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22日，在杨武召开的会议上，我宣布了新的行动方案。全团分为三个组，一、二小组分赴上海、重庆两地，任务是向家乡父老乡亲解释知青返城运动的目的和要求，争取社会舆论支持，广泛宣传，扩大影响，为今后实施第三阶段计划提前做准备；28名代表组成的赴京小组由我率领隐蔽行动，力争尽快到达北京，一举完成请愿大任。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一致通过，大家都明白当前的局势和时间的紧迫。

23日清晨，上海、重庆小组的代表们依然佩带醒目的代表标志向昆明进发，而赴京组代表则偃旗息鼓，乔装成一伙结伴探亲的知青，从离昆明还有一百来公里的峨山县境内穿插到成昆线上的一个车站，当晚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就这样，我们从各方面的视线中消失了。

事实证明，杨武的策略调整是及时必要的，兵分三路，主力暗渡，使我们快刀斩乱麻地摆脱了所有不利因素的羁绊，确保了主力快速赴京。其作用直接关系到整个运动的功败垂成。



请愿团的卫生员

滞留昆明的第一批代表情况，比我在杨武的估计更为糟糕。通关出事后，他们本有两种选择，或返回景洪，通关距景洪仅三百来公里，距昆明反有五百公里之遥，或原地等待，派人与我联系再做打算。也许是男子汉的自尊，或是知青代表的使命感，促使他们不计后果地继续前进，但丢失经费的窘困不是凭勇气能解决的。18日晚，他们到了墨江。由于找不到外部线索，就把视线转向内部，怀疑内部有人里应外合共同作案，于是成立“专案组”清查内部。这是很大的败招。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一失策使请愿团立即陷入混乱，大家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大冷的天，每个知青脱光衣服进行搜查，幸好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其实，此举也属多余。当时还没有发行百元面额的大钞，4600元可是好大一堆，谁的身上藏得住？抄查无果，又有人提议，大家先把自己的零用钱集中起来，赶到昆明再说。

这批代表到昆明后已弹尽粮绝，无奈之下去找省委和省农垦总局，被安排进旅馆，免费提供食宿。虽然条件简单了点儿，毕竟比露宿街头要强，还不至于饿肚子。这种寄人篱下进退两难的困境，使知青们非常难堪。省里领导同代表们谈过几次，他们不忘使命坚持要去北京请愿，要求省委提供方便，即免费乘车，但谈判毫无进展。为了筹款，他们举着大旗上街讲演募捐，围观者云集，声势颇壮，但真正掏钱的不多。那是半饥饿的贫困年代，人们可以同情你，精神上安慰你，但不一定有多

余的钱来资助你。连我们号称五万知青也总共只募得一万多元。个中滋味只有我当总指挥的才能体会到。

知青在昆明也向公安部门报了案，据说公安部门回答：只要你们不去北京，这笔钱以后一定会找回来还给你们的。我想，所谓公安便衣偷钱的传闻就起源于此吧。

四处碰壁，知青们把一肚子的怨恨都集中在几个“嫌疑分子”身上。在“专案组”的房间里，不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一团九营有个姓叶的上海知青被打得最惨，欲跳楼自尽，正好小L赶到，实在看不下去，便出言阻止。小L本来就是“自家弟兄”，又专程雪中送炭，自然受到救星般的欢迎。但他心里早已凉了半截，把身上所有的钱交出来后，第二天便不辞而别，直奔成都与我会合。

姓叶的知青后来在景洪遇到我，涕泪交加大诉其苦，他曾到省公安厅报案，但对方不想插手知青内部的事，给他买了张车票，开了一张沿途免费吃住的证明，让他回农场处理。我也无话可说，劝他还是赶紧办理户口手续回上海吧。第一批代表后来告诉我，姓叶的在路上煽动去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发动什么“全国知青大行动”，什么大行动呢？就是往苏联跑啊，造反啊。有人“左”，他比人家还“左”，是极“左”，惹人生厌，所以大家借机狠狠“修理”他一顿，然后宣布开除出团，撵到大街上去了。

知青们在昆明待了几天，筹款无望，很快失去耐心。为了完成光荣使命，决定以敢死队精神孤注一掷，即强行冲站登车。如果他们能冷静下来，在当时的困境中还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比如隐蔽身份，分散行动，五分钱买张站台票就能轻易混上列车。昆明每天有数百上千名知青探亲往返，谁知道你是什么代表不代表。至于途中查票更不足为虑，当时全国各条铁路线上无票乘车的知青不计其数，只需一句：“老子是知青！”谁奈你何？

24日下午，知青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行冲进车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省委立即命令停发列车，情况上报国务院。车上车下双方僵持着。25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云南省委：尽量做工作，教育知青以安定团结为重，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此时，局势对知青很是有利，如处理得当，这是一个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代表们未能把握住机遇……

知表们下车后，与省里交涉赴京事宜，提出至少要去15名代表，而且当晚就走。省里认为人数过多，并说丁惠民早已到了杨武，正在休整，提议等丁到昆明后再一起商议。知青们强调：“我们是首批代

表。”省里却不理会“首批”的含义，在他们看来，知青是一个整体。双方当即谈崩。

知青们举着旗排着队来到火车站。这次，车站已有准备，远远看见，马上关闭了检票口，换一个地方检票；等知青赶过来，又关上门，把先前的检票口打开，双方如同玩捉迷藏游戏。几个回合下来，疲于奔波的知青没有了耐性，搭人梯翻进站内，打开大门一拥而入，里面的民警和工作人员迎上来阻止，双方扯扭成一团，情景可想而知。结果，混乱中各有多人受伤，有名姓张的上海知青受伤较重，处于昏迷状态。知青们吃了亏，情绪相当激动，当有人提议卧轨时，居然得到全体一致赞同。于是，七手八脚地把不省人事的知青抬到列车前的轨道上，再盖上鲜红的请愿团旗帜。每个人都处于亢奋状态，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无票上车赖着不下来是一回事，政府对你也无奈，最多是个教育问题，卧轨阻截又是另一回事，性质完全不同。

开往北京的列车被截后，车上旅客纷纷跑到其他轨道上，并声称：要让大家都走不成。结果进出昆明的各次列车都停了下来，上万名旅客滞留在车站，事情闹大了。消息传开，舆论哗然，震惊朝野，终于触怒了中央高层。很快，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五名中央领导人联合签发的“三点紧急通知”迅速传达下来：（1）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2）殴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3）现在昆明的农场青年职工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请愿团在天安门广场

车站反复播放“三点通知”，知青们躺在铁轨上就是不动。当天夜里九点，昆明车站戒严，候车室里的旅客全部疏散。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把车站广场围得水泄不通。省委准备动武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莽撞的知青终于清醒了，豪言壮语顶不住钢铁的枪口。他们拖着疲乏的脚步无奈地离开了车站。一场流血惨案避免了。



在天安门广场请愿

五　金水桥畔

一夜之间，局势骤变。版纳农场广播喇叭反复播放“三点紧急通知”，大家不明真相，只知道代表在昆明出事了，情绪受到严重挫伤。当时正准备进行对越自卫战，军车来往频繁，部队云集，边疆形势非常紧张，搞得人心惶惶。更有谣言说：部队是来镇压知青的。面对种种压力，知青们咬紧牙关默默承受着，没有一个农场一个连队因此而复工。大家都焦虑地盼望着我们的消息。

此时我们已在四川境内，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24日晚到达成都后，又立即登上向北的列车，下半夜在德阳下车，住进车站招待所。天一亮，全体代表便忙碌起来，为赴京请愿做最后的准备，开足马力印刷传单，抄写大字报等。我亲自起草了《告全国人民书》，再一次表明知青不想与政府对抗、只要求回家的态度。当晚，全体代表登上直达北京的列车，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27日晨，请愿团到达北京。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代表们展现了两幅布标：“我们要见华主席，我们要见邓副主席”、“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按预先布置，讲演组的知青各自为战，拉开圈子进行讲演，宣传组负责散发传单资料，纠察组维持现场秩序，一切井井有条，忙而不乱。当天晚上，消息灵通的境外电台发出头条新闻：中国云南的知青请愿团到达北京……版纳知青从短波收音机里得知了消息，兴奋不已，连夜奔走相告，精神重新振奋起来。

傍晚时分，我们被接到农林部招待所，那时农垦总局刚刚组建起来，由农林部副部长赵凡兼任农垦总局局长、党委书记。刘济民副局长很快赶到，再三抱歉来晚了，他告诉我们，赵凡已奉命率中央调查组赴版纳，同时埋怨云南方面没有事先通知我们会来，还是接到天安门广场管理局的电话，才知道我们已到了。

代表们在北京受到了热情真诚的接待。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先与我们接触，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以便最后决策。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各种会议不断，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全国妇联、劳动部、民政部等中央部委都派员与我们会谈。劳动部部长赵志坚还亲自参加了其中一次会议。双方共同讨论知青问题，尤其是针对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通过的几个政策性文件，我们提出了不同看法，强烈要求中央及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地重新审视知青实际情况。我以请愿团团长的名义，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建议书，列举了知青应该回家的六条理由。经多次会谈交流，双方有了充分的沟通理解，气氛愈来愈融洽。

30日，刘副局长和办公室主任贾大秦来跟我们谈，他们起草了一个文件稿，里面说丁惠民等28位同志上来反映问题是正当的，反过来，丁惠民等同志应该动员农场知青尽快复工。最后作为农垦总局1979年1号文件向下传达。

中央内部情况，我们不清楚。在知青返城这个重大问题上，赵凡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可能起了很大作用，这点应该承认，他可能把自己在下面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如实地向中央做了反映。最近听刘晓航说：直到1979年1月23日，中央才正式同意云南知青返城。他是拜访赵凡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在紧张的工作中，迎来了1978年岁末，第二天就是元旦佳节了，晚餐时，我破例让司务长每桌上一瓶葡萄酒，以示庆贺，祈望新的一年中广大知青能实现返城的愿望。晚上，刘副局长来到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与我进行商谈。双方很快达成一个协议：国家农垦局将以正式文件的方式，确认请愿团的合法性质，作为交换条件，我同意同时下达复工通知。这一实质性的成果表明，版纳知青自发的请愿活动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认可，为下一步知青返城铺平了道路；还表明，通过几天的沟通对话，中央对版纳知青的实际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昆明卧轨事件并不能代表广大知青的真实意愿，只是少数知青的莽撞行为。中央已实事求是地把两者区分开来。

请愿团的首要任务，是当面向中央领导人递交请愿书，其身份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者。元旦刚过，得到有关方面示意：

知青代表在京人数不宜过多，是否可先回去一部分抓革命促生产。这又是一道难题。二十多名代表随我历尽艰辛，才到达北京，留谁去谁都难以取舍，手心手背都是肉啊！最后决定暂时不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后再向这些同志道歉吧。我以加强上海、重庆两小组力量为由，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10名代表，其余人又分成两组，赴上海、重庆工作。3日下午，赴上海的先走了；4日上午，我把赴重庆的代表送上车。刚回到招待所就接到通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接见全体代表。到了王震处，民政部部长程子华、中央一些部委的同志也在座，看样子他们已经等候一阵了。

·赴京代表·

丁惠民	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illegible]	勐捧农场一分场二队
刘先国	景洪农场十分场七队	陈允龙	勐腊农场八分场[illegible]队
朱一平	景洪农场十分场三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十五分场五队
黄有志	景洪农场十分场机务队	赵　兵	勐腊农场八分场六队
[illegible]	景洪农场十分场十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二分场二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illegible]分场二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illegible]分场四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六分场六队	刘　胜	东风农场[illegible]分场二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十三分场三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六分场十三队
王　庆	勐腊农场二分场六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十分场三队		
[illegible]	勐捧农场三分场[illegible]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二分场[illegible]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七分场二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七分场十队		
张秀英	勐捧农场八分场[illegible]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三分场四队		
[illegible]	东风农场七分场六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六分场基建队		
[illegible]	勐腊农场四分场基建队		
李万云	东风农场十分场八队		

请愿团代表名单

一开始进去，气氛比较融洽，大家先说些客套话。在请愿团内部，去以前讲清楚的，由我主讲，其他人不要随便插嘴。王震讲话有点儿听不懂，他是湖南人，用家乡话。我恰恰在湖北待过一段时间，湖北和湖南话接近，懂得多一点儿，有些知青没听懂。王震首先批评我们的做法不对，我们当时都戴着红布条，代表证，他说：你们应该把它取下来。我装傻，没理会。过了一会儿，他又讲了一些其他的话，都他一个人

讲。他干脆弯着身子，两手抱拳，冲着我作揖，说：你们把它取下来，安定团结呀。就这样对着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还是没吭声，停顿了一下，才把红布条上的别针打开，把布条取下来。代表们一看我动手，才一个个把布条取了下来。这个细节，过去没人敢讲。



请愿团在毛泽东纪念堂前合影

接见的过程很简单，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这位老前辈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他也没忘记顺便宣传一下晚婚晚育的基本国策：“晚点结婚怕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嘛。”我想解释一下，又不忍扫他的兴。最后，他让我们知青也讲几句，我感到已无话可说。他老人家已经给我们定下了方向：“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周总理，陈毅，还有我都去过，希望你们要把它建设好……”后来，程子华也讲了几句，不过有句话有点儿没听懂：“回去后，不要说‘我们胜利了’。”什么意思？这里面是否包含着某种玄机？当时来不及细想了。我知道在这种场合下，你讲什么都没用，一不小心还会影响“安定团结”。

回到招待所，我着实费了一番脑筋去琢磨，总算明白了，其实王震什么也没讲，他只是在重复报刊广播里天天说的那些话，这就是政治，它的功能不是用来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让各方都感到自己胜利了。

你看，中央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专门接见知青代表，给予亲切教诲，这足以证明中央是重视关怀知青的；作为知青来讲，不远万里，历尽曲折来到北京，终于见到了想见的人，请愿书也当面递交了。回去后对所有的知青兄弟姐妹们也算有了交待。问题是，五万知青返城的户口找谁要呢？王震肯定是不管户口簿之类的俗事，那只有找云南、上海、重庆的地方父母官去要了。看来，待在北京已没有多大意义。

正巧，这时又来通知：王震副总理请代表去看电影。如在从前，这可是皇恩浩荡般的喜事，多少人一辈子也遇不到这种机会。但我以身体不适表示谢绝，其他代表也各找理由搪塞。来了四次电话，前三次是国务院办公室来的，当时农垦总局派了一位姓董的老同志陪着我们当联络员，就住在农林部招待所，跑前跑后。这次可真的把他急坏了，左劝右劝磨破了嘴皮，一直拖了两个小时。中央领导请你们看电影就是不去呀，这样的事真没有过。当时为什么坚持不去？因为王震讲话老是批评我们这样那样的，我认为不对。王震的讲话，我们安排了两个人同时记录，回来以后把它整理成一篇。官方也搞了一个记录，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最后一次王震秘书亲自打来电话：王副总理将传达邓副主席的重要指示，请你们务必要来。我这时才答应去的，新东西该出来了，你光看电影我是不会去的，我不去他们都不去，这个不算犯错误的。

为什么说“我不去他们都不去”？因为在请愿的过程中，我的权威已经完全树起来了。包括在北上途中采取的一些措施，对那些酗酒的、打牌的、赌烟的，全部开除了。开除了大概十来个人，文章上没提，家丑不可外扬。[6]你应该实事求是，你可以写的。开除的发给路费，回农场工作，不能作为代表去北京。我当时定了六条纪律、四项任务，是经过知青联席会议一致通过的。任务之一是，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意；二是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三是向中央反映云南知青的苦难，资料一大堆，诉苦的，各个农场收集了一大堆资料，有几大包；四是要向中央领导人当面递交请愿书，身份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总理以上，因为我们是代表五万人来的。就这四项任务。还有六条纪律：在赴京期间，外出请假必须两人同行，还有包括财务制度，我都管得很紧。只有组织得力才能拧成一股绳，凝聚力就强了，哪怕10个人都可以当100个人用。如果散漫的话，1000万人都没有用。那些知青管不住啊，打架闹事，偷鸡摸狗，一个比一个厉害，谁服谁呀？就是我把他们几个给管住了。

我从云南出发的时候带了56个人，到了北京，连我在内只有28个人。“兵不在多在精，将不在勇在谋”。该开除的就开除，因为违反纪律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我还要给出路，亲自给每个人写条子：“张

三同志、李四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回农场工作。”不是把人一棍子打死，还发给路费，你认识错误回去好好工作就行了，所以他们对我都没意见。

话说回来，晚上到了王震处看电影。具体什么地方也不清楚，估计是在中南海。放映前，王震很认真地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我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了华主席、邓副主席，并汇报了我跟你们的谈话，他们同意我的讲话。邓副主席指示：一定要把西双版纳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的创业基地，国家要投入资金，没有钱，外汇也要用……”邓小平确实是讲实际的人，短短几句话就点中了问题的要害，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现在给你钱，而且还有美元，这回总该不闹了吧？电影开始了，许多人在那块布上打来打去，还有飞机大炮助阵，很热闹，叫什么《巴顿将军》，我却连他长没长胡子都没搞清楚。坐在王震旁边闭目深思：如果早半年有邓小平今天讲的这句话，就不会有这场请愿运动了，也许知青们还留得住。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人心思归已成定局，中央能看到这一点吗？最终会不会让知青回城？看来要启动第三方案了。





云南知青的心声

电影终于放完了，大家起身准备握手道别时，又发生令人意外的一幕。当天刚从昆明赶到北京的第一批代表刘庭明，突然大叫一声："王震！"一面从后排座位冲上前来，刚跨出两步就被有关人员挡住，在场的人都很惊愕，谁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估计他是想向王震解释昆明卧轨事件。但皇城根下是个讲规矩的地方，岂能容你像在边疆山区那样由着性子乱来？一名秘书模样的人走过去对王震耳语了几句，王震顿时勃然大怒，使劲跺了跺拐杖，厉声道："你要闹别扭，给我小心点！……"我知道，王震这话里面，有一半是冲着今晚我们不肯来看电影而发的火。

第一批代表昆明受挫后，元气大伤，多数代表失去信心纷纷离去，有的回农场，有的回老家。剩下十一二个人还不心甘，打电报回农场让大家再捐钱，供他们上北京，由于钱一时没汇到，就让刘庭明先行一步，没想到晚上看电影，又差点儿捅出乱子来。

六　胜利大逃亡

5日一早，我们准备返回云南，离开招待所时，我吩咐司务长把几天的伙食账结清。又给上海组拍去电报，要他们前往昆明与我们会合。我自己则取道重庆返昆明。沿途，重庆、贵州等地的知青办对我们迎往送来，礼仪有加。他们得到北京的通知，要保证我们顺利返回云南。

到了昆明，立即被安排进旅馆。不一会儿，省委副书记薛涛等领导纷纷前来看望，双方像一家人似的嘘寒问暖，其意融融。我向薛涛问起第一批代表在昆明的情况，立即勾起他满腹委屈："你们那批代表实在

不好招呼，每次谈话不到五分钟，说走就走了，怎么也留不住，这样怎么能解决问题呢？”我几次想告诉他，连我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的。

“你们的问题，中央很重视。”薛涛告诉说，“国务院下了六条意见，[7]责成上海、北京、四川知青办的同志来昆明共同商量解决，但解决问题总要有个过程。赵凡同志本来在你们版纳做调查，前两天，临沧地区的知青闹绝食，省委请赵凡去做工作，上台讲话，他们起哄，什么都不听，就是要回家。”我表示理解省委的难处，他听了很高兴，马上说：“你们那里的知青闹得也很凶，把锄头也烧了，猪也杀了，吃了，希望你们代表下去后，帮着做工作，稳定一下局面，问题是一定会解决的，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表示愿意协助，他当即给我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丁惠民等同志前来协助工作，请赵凡接洽安排。其实，赵凡在临沧一时回不来，那里有近两百来名知青闹绝食，要死要活的，把老头急得够呛。如果说版纳知青是主力军的话，其他地区的知青就像方面军一样，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在云南全省形成遥相呼应的格局。省委、省政府顾此失彼，焦头烂额，哪里的火都没扑灭，反而越燃越旺，最后伤透了心，抱来的孩子养不了家，干脆来个“不愿留的，统统都走”。

晚上，上海知青办的两个同志来到旅馆，他们是接到国务院通知后，马上坐飞机赶来的。“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能解决问题，来干什么？”家乡人见面显得更加亲切直率，“但你们也不要再扩大事态了，这次云南被你们闹得够乱了，又是罢工，又是卧轨，又跑到北京，王震出来接见你们，还不够过瘾啊！”中央确实有意对云南知青网开一面了。

在昆明，云南农垦局给了我六张机票，那时没身份证，只要有机票就可以走。我把六张机票给了六位同志，都是在路上的骨干分子，让他们享受一下。这时我已把第一批代表和我派到重庆、上海的代表都召集到一起了，几十个人包了一辆农垦局的大客车往回开。客车前门口不是有块儿小空地吗？我让他们给我铺了两床棉絮，是躺着回来的。

18日回到农场，要求大家五天后到景洪重新集合，研究下一步行动。我那时的想法，劲儿可鼓不可泄，而且不能拖延时间，准备采取第三个方案，动员大家自行撤离农场，上海的回上海，重庆的回重庆。

23日从学校赶到景洪，在农垦分局门口被几名女知青拦住了，大声叫道：“总指挥，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她们递给我一份电话记录，上面是21日省委书记安平生在昆明四省市知青会议上的讲话：“知青闹事两月多，现在情况明了，办法有了，按国务院六条办，

省委同意……上海困难大，最好多留点儿，不愿留的，统统都走……”[8]

是的，我们胜利了，知青胜利了。刹那间，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第一封联名信时的情景，想起了江边旅馆里秘密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想起了在杨武带领大家做棉衣……狂喜的知青们流着激动的眼泪，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要抬着我举行庆祝游行，被我阻止了。

当天下午，我宣布筹备组解散，筹备组有总组有小组，统统解散，大家都可以回去了。我说夜长梦多，都赶快回去办户口，不要上半年走一批，下半年走一批，明年走两批，不行啊，赶快走！同时起草了给王震的电报。一个是向王震认个错，给中央一个台阶下，一个是为了切实保证数以百计的各农场骨干和代表们的安全，以便不被秋后算账。代表们抢着要在上面签名，与我共同承担责任，理由是：“大家一起坐牢，也好陪你说话。”我骂道：“糊涂！大家一起坐牢了，谁给我送饭？”最后只同意胡建国、刘先国在电报上署名。[9]我相信，即便有那么一天，我们这“三驾马车”是绝不会后悔的。

消息传开，返城风潮迅速席卷版纳，数万知青争先恐后拥向农场职能部门和当地公安派出所，抢着办理户口粮油迁移手续。有些农场干脆把公章用铁丝拴在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局面显然失控了。

那时打电报很便宜，才几分钱一个字。给王震的电报是由秘书长朱一平去打的，花了一百多块钱。那时候手上还有一笔钱，大概一千多块。筹备总组解散后，每个农场留下一个代表，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包了几间房间，一起审查财务账。审查以后，剩余的钱每个农场发了几十到一百。干什么？买了笔记本。我手上还有几个小红塑料皮本，已经没用了，大家都签个字，每个骨干分子送一本，作为永久纪念。

知青大批返城，正好赶上部队开始打仗，来了大批的军车，都是返空车嘛。上面有指示，尽量把知青拉走。当时因为运力不够，没车啊，拖拉机都往昆明开，短短两个月时间，大批军车就把知青全部撤走了。

农场没有因为知青的离去而平静下来。在知青运动期间一直持中立旁观态度的农场老职工们，似乎受到了启发，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沿着亲戚、同乡、朋友、熟人等线索互相串联，密谋策划，拉山头，树大旗。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筹备组”，其目的、要求也是五花八门，因人而异。从总体上讲，不外乎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平反某些历史上的个人冤屈。而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农场当局却未予理睬，认为这是“经济主义妖风”。有本事，你们像知青那样“回家”去吧。其结局可想而知。

当时，农场的堤坝溃于一旦，我却没有走，因为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久，王震给我来了一封信，是农场政治部转给我的。什么内容呢？就是说：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同志，你们来电收到，看了很高兴，相信你们站出来工作的勇气。然后是说，要根据邓副主席的指示，把景洪农场建设好，成为知青的创业基地，并和新上任的王任重副总理商办等等。内容我记得很清楚，但是这份电报不知道哪里去了，我感到很奇怪。什么资料都在，就是这封信没有了，是王震给我的亲笔信，用铅笔写的。

我也给王震回了封信，信上说：胡建国已经走了，他家里有困难，按照国家政策，刘先国也准备走。我准备继续留在农场。

四五月份，大批知青就走完了。这期间，《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两名记者来采访，问我有什么打算。我先把农场骂了一顿，组织不利，搞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是唱高调，我还是留在这里，走不走以后再说，我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因为知青都走了，省知青办很快就取消了。我一直拖到这年12月底，母亲提前退休，才按照国家政策顶替到了湖北。

母亲1971年到湖北以后，就不当老师了，因为那里没有老师可当，就当油漆工，这是体力活儿，不需要技术，拿把刷子就行了。我去了以后，厂里问我干什么，我说，既然是顶替，干脆顶上去就行了，因为油工组少一个人，而且那工作很不好干，对身体绝对不好。甲苯啊、香蕉水啊、汽油啊、柴油啊，很少有人愿意干的，但是我还是去干油漆工了。

我在湖北崇阳县湖北仪表厂工作了六年。1981年结的婚，妻子是重庆知青，1983年有了女儿，当父亲了。夫妻分居两地，小孩在我这里待不好，在她那里我也不放心，干脆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女儿三四岁的时候，通过一个熟人，我调到重庆来了，在李家陀一个工业搪瓷厂工作。有些大锅炉里面要喷上搪瓷，防腐蚀。我们厂就做这个。干了半年多，正好政府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厂里挖出两个贪污分子，一个是供销科长，还有一个是什么科长。立案以后，检察院要求厂里出一个人协助工作。这个厂是个二三百人的老厂，裙带关系比较严重，两个书记想到我刚来，没任何瓜葛，就把我派出去，协助检察院东跑西跑地调查取证，搞了差不多一年。等这个工作结束，我对重庆已经比较熟悉，对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一点儿兴趣，再加上腰部旧伤时常发作，干脆就长期请病假。超过期限以后，厂里给我来了通知，喊我回去上班，我也没理他们。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不干就不干了，这样，厂里就把我除名了。我说除名就除名，现在档案在哪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回到重庆的云南知青有2.4万左右，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状况不好。重庆是老工业基地，经济效益不好，成为直辖市也不行。另外，知青的文化结构跟不上形势发展，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更不要说社会上涌现出了多少新人！很多企业都是整体垮台，我太太四年以前在重庆第三钢铁厂，整个厂都垮了，按一年600块钱买断了工龄，以后就不管你了。二十多年工龄，也就拿一万三千多块钱，等于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每年还要自己去交养老保险金两千多元，要交到50岁。现在我靠吃低保，街道每月给我和女儿各一百多块钱，一共三百来块钱，孩子读书。就靠这三百多块钱。有时候确实困难了，比如孩子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没办法，就找些老朋友支援一下。还有父母啊姐姐啊两三个月寄三百、五百块的给我。父母都七十几岁了，马上就80岁了，身体都不是太好。尽管生活很艰难，但我始终相信，还会遇到新的发展机会。

二十多年过去了，艰辛而漫长。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变换各种角度来回眸审视云南农场知青上访请愿运动，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与命运抗争是这段历史的主旋律，人类社会正是在无数次抗争中不断发展前进的。它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规律：如果社会长时期漠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时，将会爆发震荡，导致秩序失衡，最终社会本身也将受到伤害。

当年，版纳知青表现出的不畏艰难、敢于抗争的团队精神，终于为自己、也为全国知青大返城撕开了一个缺口。每个知青都应珍惜这段历史，它是中国知青史上惟一一次知青群体抗争并终获胜利的典范，是值得我们向世人展示、向后人炫耀的一段光荣。

知青的话题毕竟太沉重，即使当年胜利返城了，这代人命中注定的磨难仍然在延续。在这二十多年里，知青作为社会的基石部分，承受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必然会产生的种种伤痛。然而，改革开放初结硕果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因年龄层次、文化结构等原因，被划入了下岗大军，处在勉强温饱的困难处境。多年来，我常常独自沉思：当年返城孰是孰非？如果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面对处境艰难的兄弟姐妹们，我还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我还有能力为他们做些事吗？

附录：《给国务院、省市委的一封公开信》[10]

我们是重庆市沙坪坝地区六个单位的支边青年家长。在我们的子女——云南支边反迫害、争民主，为前途而奋起战斗，挥戈北上之际，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八年的辛酸，我们要为儿女们喊怨，我们绝不住［是］无声的同情者，我们将喊出数十万支边青年家长的声音，为了迅速落实

支边青年的政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让支边青年参加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队伍，希望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支持我们的正义呼声，拯救我们被拆散的家庭，挽救不幸青年的前程。

在旧社会，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血泪账，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获得了新生，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对祖国的建设充满了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地战斗在自己的生产、工作岗位上，在刚刚介［解］放的经济恢复时期，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大困难面前，我们没有一声怨言，我们以主人翁的精神替党分忧，为国出力。同时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为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而大显身手。

可是，八年前，我们的朴实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那些打着毛主席旗号，篡改毛主席指示和知识青年政策的人，到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游说，他们穿军装，说假话，打着“中国人民介［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牌子，搞70年代的大骗局，把青年们被骗去的地方吹得天花乱坠。他们故弄玄虚，到学校欺骗那些年轻幼稚，心灵里充满憧景［憬］，燃烧着理想火花（的孩子）。十五六岁的孩子被幻景迷住了，他们胸怀宏鹏大志，在感情的冲动下，有的瞒着父母报名下（转）户口，有的哭死哭活要我们答应去边疆，更有甚者，组织街邻、同学围攻家长，召集什么“家庭座谈会”。我们这些饱尝旧社会血雨腥风的老人，在那时的社会的动乱之中，心中的话对谁（说）呢？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们，把云南边疆吹成“世外桃源”的话是相信不得的，但儿女们又死□□缠着我们，就是虎狼窝，又怎敢（如）实相告。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接踵而来，说什么“忘本了”，反对毛主席，“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种压力下，作［做］领导干部的家长，泪水肚里流，岂敢不带头。做工人的家长，敢怒不敢言，谁敢拖后腿。更何况那些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技术权威”、“老九”家长，还得强装笑脸送儿女。

就是在我们这些家庭里，有的父母年迈体弱，恶病缠身，多么需要人照顾啊，可是□一醒来的孩子就要走了，怎么不伤心呢？有的家庭几个孩子当了知青，有的仅仅乘［剩］下一个男孩，又将一去不归，父母又怎么不肝胆欲裂呢？

我们谁都有个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被卖掉，当童工，挨打受骂……而今，我们的子女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悲剧重演，我们都是作［做］父母的人，天下父母谁不疼儿女，为了儿女成人，哪一个不是呕心沥血，操尽心思。我们谁没有家庭，谁不想家人团聚，谁不想儿女的前程充满战斗、幸福与欢乐。可是这些仅仅只有高小程度的青年，被带［戴］上“知青”的桂冠就要离开，汽笛声声扣人心，母女抱头

痛苦［哭］，难分难舍，哭干泪水的老奶奶拉着孙子的手，随着缓缓移动的列车而发疯似的颠跑喊叫，拄着拐棍的爷爷，满脸皱纹的父亲泪流满目，低头咽呤［吟］。这些情景，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山城人民又谁不知。

八年来，孩子们背井离乡，我们在多少不眠之夜里，祝愿他们健康成长，然而，事与愿违，封封家书撼人心，他们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被卖掉了，他们到了陌生的原始森林，住进了简陋的竹棚。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子女在蜜水里成长，艰苦的生活到［倒］能使他们懂得创业的艰难。但是，八年来，他们像奴隶一样地干，确［却］看不到希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沉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文化娱乐活动，连仅有的文娱宣传队也下令撤消了。盐水送饭一日复一日地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当地的专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自由，天真活泼的性格没有使他们少挨皮鞭，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遭到的是罚跪、捆绑、毒打、批斗……孩子被逼疯、被□□、被奸污而致残致死。他们没有起码的医疗条件，医生不敢从人道主义出发诊断病因。就（是）家里的人病危、去世，拍电报请孩子回来，也经常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探亲假超过一两天，就可以随意决定，不报销路费，扣工资，作［做］临时工，扣下次探亲假。儿女们含着泪写信给家里，相距数千里，除了只言片语劝他们想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伤心落泪，无可奈何！

八年来，孩子们每回一次家，给家里都增添了繁重的经济压力，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支边青年回一次家，家里像遭了强盗。"我们平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子女经常吃白水菜，甚至借债度日，将油、肉、盐、菜之类物资送去边疆。多少孩子边吃边哭："我们不能孝敬父母，倒剥削他们的血汗……"在□年的漫长岁月中，多少青年想着前程伤心落泪，怀念故乡，怀念亲人，后悔青春虚度，烦脑［恼］人生。因此一部分青年走上了歧途，但更多的青年则在苦水中磨炼，盼望新生的一天。

同志们：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的精神面貌向［象］征着民族的兴旺，尤其是这批青年，正是学习、出力的黄金时代，他们必将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支有生力量，难道让他们失去战斗的资格，让他们在新长征中袖手旁观吗？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迫害青年的罪魁祸首——"四人帮"，为支边青年开避［辟］了一条美好的前景，我们相信，支边青年的问题，一定能迅速解决，我们要求让他们回归山城，选择他们学习、工作的自由。我们一定和孩子们一起，紧跟华主席，在新长征中做出更大的成绩。

重庆机械模具厂　　　重庆灯泡厂

重庆国营无线电厂　　重庆标准件工具厂

重庆第二针织厂　　　西南政法学院

签名

1979年元月6日

---

[1]本口述征得丁惠民先生同意，引用了其自述稿《在激流与旋涡的中心》中的部分内容。

[2]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738—741页。

[3]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663—667页。

[4]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是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形成的两个文件《全国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最后作为中发［1978］74号文件传达到全国。文件提出，逐步解决在乡插队知青的问题，而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则采取稳定方针，"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因为给农场知青返城的口子开得太小，与插队知青明显两般对待，一下子引起前者的强烈反应。这是政策的制定者事先所没有预料到的。

[5]关于这次谈话的官方整理版本，由国家农垦总局列入［79］16号文件，下发各农场传达。另外，云南农场知青还油印了自己整理的谈话记录。

[6]此处文章指《在激流和旋涡的中心》。

[7]指国务院知青办1979年1月18日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主要有：农场知青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已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的子女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城市招工，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知青；在云南农场的上海郊区青年，允许返回原籍。六条意见，实际是对中发［78］74号文件有关条款的修正，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

[8]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747页。

[9]这封电报于1979年1月23日发出，直到2月10日才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第二天，《人民日报》还登载了云南农垦总局负责人谈话，说：许多知识青年已开始认识到停工闹事、聚众上访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少人还做了自我批评。

[10]本附录引用文献，系重庆知青徐裕铭先生提供，特此致谢。凡文献中错字，在［　］内注出：遗漏字在（　）内注出：模糊不清字以□代替。

阿克苏事件始末

——欧阳琏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3月13日下

地点：上海市卢湾区崇德路66弄

［采访前记］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边疆地区国营农场知青掀起过两场波澜壮阔的争取返城活动，第一场是1978年底至1979年初丁惠民领导的云南农场知青请愿上访活动，另一场则是1979初至1980年底欧阳琏领导的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请愿上访活动。关于丁惠民其人其事，这些年陆续有不少报道，而当年为三万多上海知青奋起一呼、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欧阳琏其人其事，除了在新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生活过的十万知青及其亲友，恐怕就只有新疆农场的那些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弟还略知一二了。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通过互联网查找一个人的资料似乎已不费举手之劳，“google”的强大检索功能，可以在分秒间将你感兴趣的资料从四面八方尽收眼底。但网络的极度扩张也令我感到困惑，在许许多多平庸至极的人物占据着大量空间的同时，欧阳琏——这样一个值得大写的名字，却居然没有一席之地。真让人不由得发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慨叹。

我对欧阳琏的了解，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撰写《中国知青史——大潮》开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了新疆的“阿克苏事件”：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有十万知青被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约20年后，留在当地的还有三万多人。这三万多老知青，献了青春献儿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坚决要求回上海！”为了这个基本的权利，他们不断上访，不断请愿，却始终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为了断绝他们的返城之念，当局甚至搞出指鹿为马的伎俩，把他们“知识青年”的称谓改换为“支边青年”。这些人愚蠢地以为：只要称谓一改，他们就被划为“知青”的另类，“知青”的名分没有了，还要求什么返城的权利？

此举激起知青的强烈不满，在投诉无效的情况下，矛盾迅速激化。1980年12月，知青们铤而走险，齐集阿克苏，举行3000人的百小时绝食活动。除了当局的压力，还有风寒雨雪的侵逼，为了显示必死的决心，知青们在绝食现场摆放了三口棺材……如此惨烈的场景，不仅在中国知青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

当我刚一接触到这个事件的模糊轮廓，就不能不为它的悲壮所感动，后来多亏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知青朋友的帮助，使我掌握了关于这次事件始末的第一手资料。根据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研究，我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第一次对新疆上海知青返城活动的合理性以及“阿克苏事件”始末做了概括的说明。但是，到此为止，我还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甚至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真实状况的了解，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我是这样写的：“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一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

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这段话的前两句，我是根据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想到却是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并非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也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当然也没有什么“半条命”的绰号。后来有上海知青看到这段话，对我的这段不实之语颇为不满，找到欧阳琏，想与我交涉，而欧阳琏却轻轻说了一句话：作者写这本书已经很不容易，他为上海知青正了名，不要再为我个人的一点儿名声找他了。这事是我后来听其他上海知青讲的。

当我决定撰写《中国知青口述史》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了欧阳琏，不仅是为了弥补我多年的遗憾，更是为了给中国知青留下一个在历史关键时刻方显出英雄本色的魁伟身影。感谢我的好朋友，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的赵令如大哥，在他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欧阳琏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结识了一批当年为知青返城披肝沥胆的兄长。



相见恨晚——与上海知青赵令如夫妇的合影

2002年3月13日下午，在上海市卢湾区崇德路66弄，我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欧阳琏。欧阳大哥的相貌太普通了，花白的头发，简朴的衣装，饱经沧桑，皱纹纵横的脸上，一双总是眯缝着的笑眼。如果走在街上，绝对就是个退了休的老工人，甚至是郊区进城的老农民。谁会想到，在他平凡的外表下，掩盖的竟是那么刚强的性格，充溢的竟是那么崇高的正气——在绝食的最困难时刻，正是他做出了不惜自焚一死以昭示天下的决心……为此，他个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此，他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不仅是当年那些共过患难的知青，甚至当初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些人，也不能不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如今，你随便询问一下那些在新疆生活过的人们，对欧阳琏是什么印象，老的也好，少的也好，十之八九会夸上一句：“那真是条汉子，就是不简单！”

我和欧阳琏的初次见面是在畅饮中结束的。在座的有赵令如、徐达、张宝璇、叶国民、谢敏干等几位兄长。酒酣耳热之际，诸位给我留下了几句肺腑之言。

欧阳琏："中国知青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徐达："谁能领悟历史？！"赵令如："力求无愧于'知青'。"张宝璇："理想主义大厦倒塌起于知青运动。"我希望把这几句话留给历史，供人们回味。

我请欧阳琏做口述，重点谈阿克苏事件始末，其次是被捕入狱一直到返回上海以来的情况。欧阳大哥不仅做了详细的回顾，还把珍藏多年的历史文献、一百多张图片提供给我。

3月17日在浦东新区严丰路晶晶饭店，新疆上海知青三十余人，都是阿克苏事件中各团场的知青代表，讨论进疆40周年纪念筹备活动。欧阳琏盛情邀我参加，在场的有王良德、杨清良、张鸿兴……都是些当年在官方挂过号而为我耳熟能详的人物，一时间群贤毕集，高谈阔论。会上，欧阳讲了话，我也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初次见面的拘谨随之荡然。最热烈的一幕还在后头：原一师二团的知青代表王宝全当众解开裤腰带，取下一块墨绿色和田玉质魔鬼护身符，执意赠我留念，我推让不能，只好如此效法，也当众解开裤腰带，把护身符套上。一时间觥筹交错，歌声呜呜，好不畅快也！



采访上海知青领袖欧阳琏时的合影



难忘的盛会——与各团场知青代表欢聚于晶晶食府

“阿克苏事件”中，曾有三名上海知青在前往乌鲁木齐请愿途中遭遇汽车翻车事故，不幸罹难。20年后，在欧阳琏等人的组织下，老知青们又集资数万元，派代表陪同家属远赴新疆，将三位烈士遗骨火化后迁回上海，重新安葬。许多知青生活拮据，依旧慷慨解囊，体现了知青的凝聚力。既告慰了死者的英灵，也升华了生者的境界。不久，欧阳琏把根据这次活动实地摄影整理成的VCD《英名永存》寄来，为上海知青运动续写了新的篇章。

12月初，在上海，我再次会晤了欧阳、令如等一批知青，重点请杨清良回忆了1980年在北京上访的一些情况。清良是上访团团长，他的回忆，为了解上海知青请愿全过程补充了重要内容。上海知青已商定，将在2003年举行进疆4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更多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坎坷经历、面对困难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一　进疆始末

我出生在上海，妈妈死得早，后来有了继母，继母又生了娃娃。我的初中是在上海市有名的重点中学向明中学念的，毕业后为了投靠哥哥谋生，万里迢迢转到重庆念高中。我的哥哥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在部队做军官，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但是我到了重庆不久，他就成了家。说句难听的话，吃父母的饭可以睡在床上吃，有嫂子了，吃哥哥的饭就难。我念书是要花钱的，何况哥哥很快又有了娃娃，经济压力是蛮大的，所以，1961年我从重庆市第一中学毕业时，尽管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还是没有报考大学。

当时是三年灾害后期，国家正动员大批城市人口到农村去，我就报名了。我前后三次下农村，这是第一次。80年代初，我因阿克苏绝食请愿一案在法庭上受审时，就说过：说我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信徒，是叛

逆，我不承认！我受党教育多年，哪一个人有我这样的经历，三次到农村？

1961年，我到了重庆市郊广阳坝的市直机关农场。农场里的人，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右派，一部分是所谓的“右倾”［分子］。一年半以后，国家经济政策有了改变，提出“巩固、充实、提高、调整”八字方针[1]。农场领导很关心，支持我回城，但我这么大一个人，显然不能在哥哥家落脚了，领导就说：“你回就回老家吧。”这样，我在1963年初回到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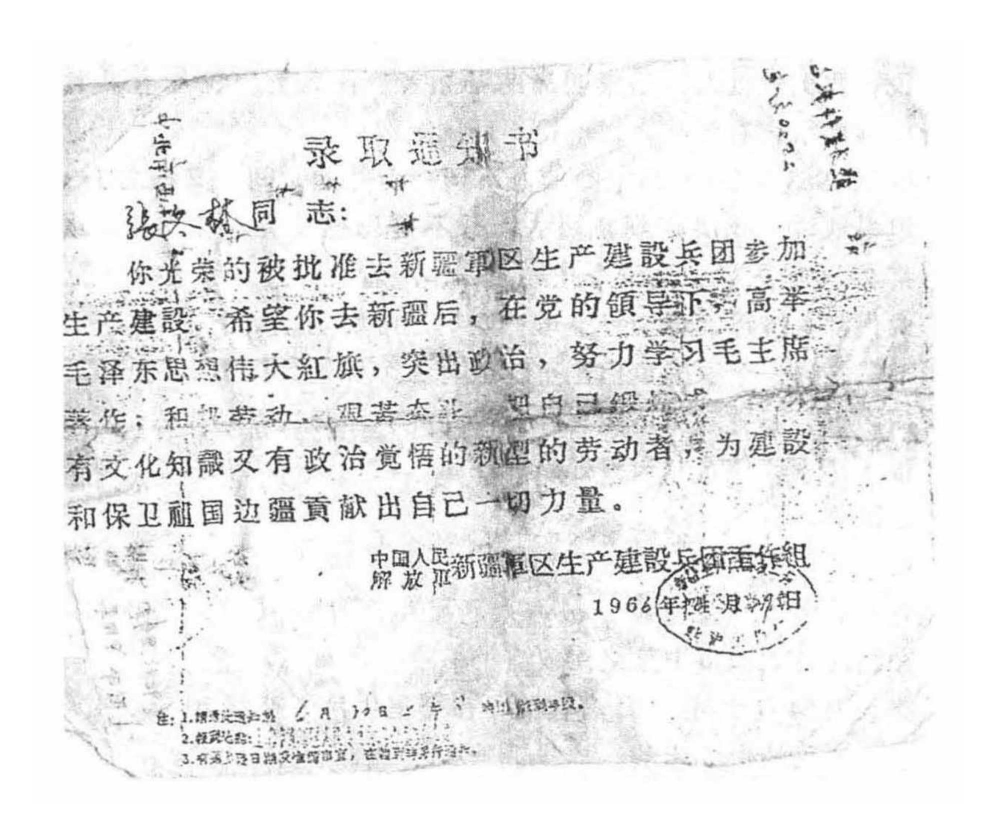
二十多岁的人嘛，在家里闲晃，增加了父亲的经济负担，不是长久的办法。正赶上上海市开发崇明岛，我毫不犹豫响应号召去了，每天的劳动是在海滩上砍芦苇。当时上海要求，每个区都在崇明办一个垦殖场，经过几十年建设，现在那里已经有很多现代化农场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批人，是崇明岛的开拓者。在岛上，我苦干了半年，把身体累垮了，右肝肿大，不得不回到上海。

我是1963年10月回上海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报名去了新疆。坦率地说，我决定到新疆去，并不是思想境界有多么高。你想想，都24岁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工作，跟着父母过，那滋味好受吗？家中两代都是继母，母亲是继母，奶奶是继奶奶。两个哥哥，一个在四川部队，另一个家庭负担也重，他有三个娃娃，帮不上我的忙。在经济压力下，不去新疆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当然，新疆来人的宣传也起了很大作用，什么“边疆处处赛江南”啦，说得天花乱坠，听者无不热血沸腾。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里，一共有10万知青离开繁华的上海，到西北艰苦的戈壁滩，被编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样大的规模，在当时各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是1964年5月23日进疆的，在那里生活了整整20年。对新疆这片热土，我是很留恋的，那里洒有我的血汗，印有我青春的足迹，甚至埋葬了我的爱。我的第一个妻子同为上海知青，就是在那里去世的。所以，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问题出在哪里呢？知青到了兵团，不仅在生活、劳动上遇到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人格上往往受到歧视甚至迫害，因此造成许多遗留问题。

我落户的地方，是兵团农一师十四团十八连，在阿克苏东南面，塔里木盆地北，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是位置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一个团场。苦到什么程度？每天干活两头见月亮，清早起来月亮挂在天上，晚上睡觉月亮已悬在天上。劳动强度超过20岁左右的人所能承受的，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都吃不饱。



录取通知书

张[illegible]同志：

你光荣的被批准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建设。希望你去新疆后，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突出政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illegible]劳动、[illegible]把自己锻[illegible]有文化知識又有政治觉悟的新型的劳动者，为建設和保卫祖国边疆貢献出自己一切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軍区生产建設兵团[illegible]

1966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注：1.[illegible]

2.[illegible]

3.[illegible]

兵团战士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吃了12年的杂粮，说得难听点儿，一年里就是逢节过年吃一顿肉和大米饭。在南方长大的人爱吃大米，到新疆后大米饭一年只能吃七顿，国庆节呀、元旦呀、春节呀，也就是这么一碗。每个月都是吃包谷馍，90张馍馍票，10张是白面的，80张是包谷面的。大锅菜烧好了把盐一撒，大师傅再往上倒几滴油，那油花浮在上面不是有圈圈吗？开饭钟一打，女同志排在前面，她们要见油星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男娃娃打饭排在后面，他们不要汤水，要捞稠的、干的。上海青年三年后探亲，回新疆时，基本没有带其他东西，全部是吃的，大米、挂面、肉。瘦肉一定不要，全部是肥的。我们的油一个月100克都保证不了。



上海知青的陋室

住的是红柳编的“房子”。先把大约两米长的红柳砍下来，扎成捆，一捆一捆接好，然后竖起来，把两端各埋进地里20公分，照这样做下去，你要接多长就可以接多长，形成一个拱形的窑洞。两面用泥巴一糊，就是墙了。屋顶是不能糊泥巴的，空隙太大容易掉下来，一般就是糊一米多一点儿。

喝的水又苦、又咸、又涩，含有硝、氟。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上海青年，你这个连队的人到我这里来，是不喝我这里的水的，喝了就要拉肚子，因为不习惯。

有些事情，说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知青吃不饱，晚上点着马灯，到马号、猪圈去找东西吃。猪吃的饲料，是把包谷和芯子碾碎搀和在一起的，有的青年偷吃猪饲料，受不了就吐了，吐得哪儿都是。好，让领导知道了，不但大会点他名小会点他名，还要他站出来挨斗。最可恨的是什么？第二天就吩咐喂猪的老同志把牛粪拌到饲料里。他要干脆说明，也就没人去吃了，可恨的是他做这个事还要瞒着人。小青年吃不饱嘛，还要偷，回来说：“怎么今天的味道跟昨天不一样？”再拿马灯过去一看……那年我24岁，在知青中是很大的，年龄加上学历，再加上阅历，都决定了我不可能跟着他们去偷，但是遇到放牛粪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忍啊？！

兵团人员复杂得很，分几大部分，复员转业军人、盲流、知识青年。复转军人，说是三五九旅老军工下来的，实际上老军工没有多少，大多是新疆和平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兵[2]，有些是老兵痞，跟三五九旅的作风不一样。我们师有个陕北人杨二娃，是老红军，保卫延安的有功之臣，据说救过毛主席，毛主席亲自送给他一把枪。他的脑子受过枪伤，身上有枪洞，一米八十几的大个子，黑黑的。他对知青很好，连里没油了，团场拿不到，他就跑到农一师去找师长："我是杨二娃，你不要当师长了，我是老前辈，革命比你早多了！"说着，拿把凳子往门口一摆，"有本事你出来"！师长不敢惹他，紧着打圆场："老杨，你进来进来，有话好好说嘛……""你批呀，批五桶油给我。"最后带着油回来了。像杨二娃这样关心知青的干部不是很多，所以他的口碑好得很。

在团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国民党遗留下的人，怎么能管理好我们这些从繁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呢？用现在的话说——代沟很深。指导员是共产党员，时间长了一了解，他当初是国民党哎，是兵痞哎，和平起义后又入了共产党。高强度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再加上愚昧的领导，现在想起来都要流泪。说个笑话，干部是大老粗，没文化："同志们，你们笔有没有哇？晚上开会，你们得带笔！"笔，跟我们上海的粗话"×"音是相同的。"带笔"，"没毛笔"，"光笔不行"，"铅笔"，"笔、笔、笔……"这样引得青年发笑。有事也要谈，没事也要谈，晚上不到9点、10点，是不让你睡觉的。

如果兵团的那些领导能够对我们有一点儿关心，有一些人情味，如果他们能够给我们讲道理，正确地进行引导，可能大家还安心一些。实际情况是，知青一到目的地，就没人管了。当时有个顺口溜："上海娃子呱呱叫，上火车不要票，下了火车没人要。"这种生活环境，艰苦得不得了，再加上领导的愚昧，麻木不仁，知青有苦没地方诉，积怨越来越深。用一句毛主席的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那边压迫得最凶，所以反抗得最厉害，"文化大革命"中也是闹得最凶的一个团场。

二　"文化大革命"初的造反

"文化大革命"初，在全国形势影响下，新疆的上海青年也起来造反了。我参加了红二司，是造反派组织，成为里面的一个头头。当时造反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的：跟当权的人斗。直接原因是到新疆后种种遭遇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我们被封闭在一个大笼子里，只知道团里的团长、政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就整治这个，写大字报，学习政治。当时群众中分什么保皇派啊造反派，大部分上海青年都加入了造反派，遭到另一派的殴打、镇压，许多人跑回上海。知青中也有站在场领导一边的，

人数很少，其中有捞稻草的、拍马屁的、受了好处的，有的是为了一官半职。



最高指示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反党小説——“保卫延安”和王恩茂

《保卫延安》

反党小说出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二年

六团革命职工造反司令

“文化大革命”初上海知青办的小报

我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另一派抓起来打，但是我仍然坚持写文章、大字报。后来，农场内无政府主义者、流氓团伙以“偷钱”为借口毒打我，我受了重伤，小便失禁，头肿得像个小脸盆，卫生所和原连队不收留我这个造反派。我怕再次挨打，跑到女朋友处，她是和我一同到新疆的上海知青，由她照顾我的饮食和大小便，晚上就睡在一个床上，用一个帐子挂起来，与同宿舍的女知青隔开。伤好以后我打报告申请结婚，很快批下来了。

不久，形势更加险恶，我和妻子决定到内地避一避。1968年9月先把她送上车，11月我才离开农场。从乌鲁木齐到南京浦口，坐车逃票，到了浦口，翻墙出站。在南京，与一上海知青用一张票混进车站，到苏州站深夜下车，沿着铁路线走了一里多路才绕出站，最后买了从苏州回上海的车票。

我的岳父是病休的区民政局干部，岳母是后续的。岳父对我说："女儿嫁出去就不要住到家里来，住到家里邻居要看笑话的。"再说她家经济也困难，容不下她住，这样，只能随我。我父亲是工人，家里负担重，弟妹尚在读书，继母没有工作。父亲没有办法，把住的大房子换小房子，换些钱给我生活。

我当时29岁，不能再依靠父亲生活，更不能靠他抚养我的妻子。我有个朋友，是长航船员，我帮他们买上海商品，他们帮我逃票上船。我们先到重庆，又到武汉，我到处做泥水小工，给人家和泥巴，勉强度日。我是不敢回新疆的，在我之前，许多知青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回到新疆，一去就被剃光头、阴阳头，斗啊、打啊，受到种种迫害。我们团有个造反派组织，取名叫"无法无天"，有两个头头，一个女知青外号叫"石头"，是机关干部，一个男的叫邓丹，这两个人领着全团的上海青年闹，最后全军覆没，全被打了。"石头"的两条腿也拐了。许多青年新疆不敢回，上海又不能回，只好在长江沿岸漂泊。

1971年，中央军委派了许多戴着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到兵团各师、团担任领导。我们团政委陈光是空军军官，他来了以后，我还在上海，给他写了信，不久收到来信："你回来吧，不会有事的。"这年7月，我携妻子回到农一师十四团，结束了长期的流浪生活。

全国知青的第一次返城风是从1966年开始的，不久，上海动员倒流的知青回新疆，打的旗号是所谓"回家闹革命"。80年代初，我因为领导阿克苏上海青年请愿绝食活动被捕，在法庭上我这样说过："上海青年，'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的人离开新疆回到上海，后来又回来。为什么打倒'四人帮'后，国家处在'拨乱反正'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愿意在新疆了，这个根源在哪里？不在我欧阳琏，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提请法庭注意这个问题。"

几十年里，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最后发展到请愿、静坐、绝食，不是哪个人可以煽动得起来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除了前面提到的环境艰苦、领导水平低外，缺医少药、医疗条件太差也是一个原因。我前妻的病故，就是一个具体例子。

结婚以后，她常闹肚子痛，医生说是阑尾炎，打个针，吃点儿药，

回家休息休息。她的病时好时坏。1972年5月30日，我正在写广播稿子，她急着叫我："快来看！身上摸到了鸡蛋大一个疙瘩！"我一看就急了，第二天赶紧陪她去看病。医生怎么说呢？"这是气块，你老婆一定是受气了。"我老婆她从来不生气的，我说："她根本不做家务事。""好，那她就是怀孕了。"他们诊断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胡乱推测。我们又到总场医院，同样没有结果。我一时性急，说了句："实在不行，我们就回上海。"医生一听，很不高兴："你要回上海，就回吧！别来看了！"我们当时年轻，有点儿火气，说走就走嘛，谁知那个医生故意把农场转院证明下面的图章给裁掉了。

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把证明放到口袋里，赶快回农场，跟领导请假，再往上海赶。紧赶慢赶到了上海，经确诊是晚期卵巢癌。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哭得不得了。医生责备说："你现在着急了，早干啥呢？！你老婆原来得的是卵巢囊肿，按照医疗文献说，这种病百分之九十九是良性的，只有百分之一是恶性的，你耽误这么长时间不治，现在转成恶性，又哭了，你早一点在哪儿呀？！"我连忙跟医生解释："在新疆那里看病，医疗条件差，给耽误了。"医生一听，不吭气了，同情了。

妻子是6月10日去世的。该结账了，医生问："你这个转院证明怎么连公章都没盖？"我说："有的，给他们撕了。""哎呀，你有这个公章，医药费不要你解决的。"没办法，我找到驻院军代表，诉说了困难情况，他很表同情，让我先打一张答应分期付款的条子。要不，遗体都拉不出来。医院有规定，人死了停在太平间，你要先结了账，才许把遗体拉走。事后，十四团不愿承担这笔医药费，数年后，上海的医院按有关政策核销了这笔账。

三　**1979**年的返城风

我重点讲一讲上海知青在1979年的事情。当时全国知青掀起回城风，年初报纸报道了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领导的请愿活动，消息流传很广。信息很快反馈过来："弟弟，从黑龙江回来了"；"妹妹，从江西回来了。"这样的信息很多。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阿克苏垦区十四团的上海青年首先动起来。[3]在十四团，我们十八连又是第一个行动的。我们连的青年多数是各连领导不喜欢的人。拿我来说，我屁股上是"没毛"的。所谓"没毛"，就是受处分呀，警告呀，关禁闭呀，大会批评呀小会批评呀，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过，但是因为爱提意见，打抱不平，还是成了领导的眼中钉。连里一些青年，还有过小偷小摸、打群架行为。总之一句话，是领导不愿意

要的人。我们连又是全团条件最艰苦的连队，出门就是沙包，连指导员不好管理我们，也没办法管。整天开荒造田，就是把红柳刨出、挖走，至于粮食能不能种出来，水能不能灌进去，他就不管了。

1979年1月，《人民日报》和新疆的报纸上登了王震和农垦系统领导接见丁惠民的消息，他们跟丁惠民说："你回去，不要说罢工胜利了。"这是中央要解决云南知青问题的明显信号，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团里有个青年叫吴淼，他到上海探亲，回来后把知青回城风的情况大讲了一通，他口才好，煽动性强。在这种情况下，有个连写了张小告示贴出去，小告示也叫小字报，上面质问道："云南知青返城了，为什么我们新疆问题没解决？"团里很多上海知青看到了这个文章，我也在场。

于是我们写了一张海报："现决定：2月4日礼拜天，上海知识青年全体在团部集会。"集会的目的是什么？谁都不清楚，反正一下子贴出去了。到了这一天，整个团部都沸腾起来了。十几年来，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自发参加集会。各连队知青都是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去的。我们说："威虎山"的人嘛，谁服你呀？！只有十四连和十六连，是排着队整整齐齐到团部的。说明他们有组织，比较守纪律。

举行这么个集会完全是自发的，具体议题也没有，谁愿意跳上去，就讲两句，主要是诉十几年来的苦，并要求团长、政委接见。有人质问："我们今天这个集会符合不符合宪法？"尽管当时的宪法允许集会，但团长和政委却谁也不敢说"你们集会是合法的"这句话。会场上乱哄哄的，这个青年跳上去讲讲上海知青的情况，那个青年跳上去讲讲云南知青的情况，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整整热闹了一天，傍晚才散。没建立什么组织，也没形成什么决议，说得难听点，就是出出气，究竟下一步怎么走，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天，乌鲁木齐自治区农垦总局[4]派下来两个处长解决问题。我们说："灭火队来了！"两个处长，一个姓刘，年纪五十多岁，是上海人。还有一个四十多点儿，姓汤，是南方人。他们不来，我们请愿上访可能还要有个过程，他们一来就发脾气，反而激化了矛盾。我们团知青把这两人请到连队，"你们去看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的劳动强度、我们的军旅生活，去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把他们请到十八连，请他们看看我们住的窑洞，把我们吃的水舀给他们喝，他们一直不敢喝。他们的到来，教育了我们，开始把各连队的青年串联到一起。

十四连是排着队参加会的，比较有纪律，里面有几个人比较积极，我们就主动到十四连开会。会上有几个同志提出来，你们要当头头，可

以的呀，记住，屁股后头有“毛”的不要当头，担心被抓住“小辫子”，说你这个流氓是被关过禁闭的。所以好多人就说，欧阳，我们支持你。这样，在团里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核心。

我们早就考虑一个问题：丁惠民到北京请愿，我们也到北京嘛，我们也要上访。当然，阻力还是很大的，上海知青在新疆17年了，谁敢这么做？！

农场职工工资低，我们提出，全团每人募捐一块钱。就是说，每个连队200至300人，可募捐200至300块钱，并选派一名代表。3月5日上访团出发，一共13个代表，包括我在内。上访团正团长杨东海，副团长杨清良。我的态度很明确：像杨清良，他的口才、肚才、笔才，样样都比我强。上访团打出的旗号是“农一师十四团赴京上访团”，当时的规模还比较小。

同时，我们到附近十三、十一、十二、九、十等几个团场点火，离开阿克苏时，十二团赴京上访团也赶到了，我们的旗号改为“农一师塔南上海知识青年赴京上访团”。

到阿克苏农垦局办交涉时，压力就来了：“不准你们上访。”通知公交车，不准卖票给我们，任何车子不准夹带。当时实行通行证制度，外出要开通行证，我们也没有。在这种高压下，我们只好化整为零，三三两两走，搭便车的也有，买车票的也有，反正自己想办法到乌鲁木齐集中。这样，经过一个多礼拜艰苦跋涉，到了乌鲁木齐。随着其他团代表的陆续加入，我们的旗号又改了，不是“塔南”了，是整个农一师上访团。

在乌鲁木齐时，代表们在农一师招待所开会，意见出现了分歧。有的同志提议到上海去。在场的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表示反对。理由是：第一，这违反了广大上海知青的意愿，“我们跟上海知青提的是到北京去，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第二，违反了上访的宗旨，“知青问题非得要找中央解决呀，到上海怎么解决呀？”第三，上海知青回到上海，私心杂念容易作怪。会议上争论很厉害，我们持反对意见的人退出了会场，不参加了，让你们几个头头商量去吧！最后结果如何呢？兵分两路，一路由我、杨东海、罗志超等六人组成一支小分队到上海，另一路大部队四十多人到北京上访。途中，我和罗志超等人商定了几条纪律：第一，到上海后不准单独与政府部门接触；第二，不准以“赴京上访团”名义只能以“小分队”名义活动；第三，不准参加民间的民主运动；第四，演讲不要涉及政治问题，只讲新疆知青的遭遇、要求；第五，不再募捐钱粮，以免引起不良影响。这样，就把小分队的活动方

式、宣传内容和口径统一了。

到上海后，先找市委、市政府、市劳动局，申诉我们的遭遇，提出落实知青政策，要求与全国的知青一视同仁。劳动局一个处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回上海，只要求落实知青政策。我的理解，知青政策包括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符合政策的人，一定要让他回城，如家庭多子女务农的，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属于统战对象的，“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平反昭雪的，本人有病的，家境困难的等等；第二部分，对留在农一师的知青，尽量上调工矿企业；第三部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使留下来的人待遇得到提高。

临行前，组织各团场写了一个万民折，56米长，用白布做的，前言讲述我们的遭遇、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要求，“同意的请签字”——几万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个万民折，我带到上海后，在人民广场上拉出来展示过。

在上海待了六天。当时，我家里很困难，父亲死了，一个妹妹独身，另一个弟弟刚结婚，难得很。我不愿加重他们的负担，离疆时把自行车卖了120元，吃的是两毛钱的面包，一天三个面包。街道、团市委等部门知道我的困难，就说：“欧阳，你有困难，给你些补助好不好？”我不敢要，也不能要。“你有啥困难提出来，好解决的了。”这些话都出来了。我希望尽快摆脱这种处境，就跟北京的大队人马打电话联系，4月4日单身赴京，加入上访团。

上访团到北京，受到国家农委、农垦总局负责人张秀山、张修竹等人接见，张秀山还有个讲话。[5]本来农垦总局通知，××要接见我们，我就提出，准备当着××的面对他讲：你自称“人贩子”，事实上确实就是个人贩子。农垦总局的接待人员当即劝我不要这么说，否则，××是要骂娘的。我说：中央首长骂娘，我也会骂。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后来，因为中央派××赴云南接对越作战凯旋归来的将士，没有接见成。

我们一共49个人，在北京停留了52天，一直等到中央答应派工作组到新疆了解情况，才离开北京，这时已经5月份了。他们说：“你们几个头头回去，乘飞机吧。”我们不愿意，还是跟大家一起坐火车。

从1979年3月份北京上访，到1980年12月26日我被逮捕，严格说起来是21个月。知青运动长达21个月，几起几落。他们认为我后面有黑手，有黑线。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接受审判时跟他们说了：我背后没有黑线，如果有黑线的话，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我们都是受党教育多年的热血青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这是最根本的一

条。我们一直相信党中央能妥善解决上海知青的问题，所以不断上访。一旦政府有个消息来了，“要给你们解决问题”，我们就盼着赶快解决。等啊、等啊，到后来等不及了，“哗”的一下又起来了。起来以后你们又来了，于是又等……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知青运动几起几落。

6月份，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和办公室贾大秦，领一个工作组到了阿克苏。他们兵分两路，刘到我们十四团，贾大秦到十二团。我们上访时在北京见过面，这次是钦差大臣来了，亲人来了，解决问题来了，我们对他们热情得不得了。[6]

对刘济民，我们是抱了很大希望的。他来到阿克苏，确实也想认真地做些社会调查，但形势的发展却使他难以开展工作。他到了一个连，就被上海青年围住了，从一个连到另一个连，他前头走，后面千军万马跟着，有哭的也有闹的。没人限制他行动，但是客观上行动又受到限制。他不走呢？各连队的上海知青就统统找到他这个连队里来。后来，上海知青就被扣上“围攻工作组”的罪名。[7]

刘济民到我们团，我担任纠察队长，负责他的安全。上海青年人多嘴杂，情况比较复杂，我要求把他安置在指导员家，要求指导员细粮供应，不行的话，我们杀鸡、送罐头给他们吃。但刘济民是绝对不肯吃的，他跟我们一样吃饽饽，就吃半个，不是不敢吃，是吃不下呀。

刘济民跟我见面，谈得很好。中央打电话问他：你受委屈了没有？围困你、打你了没有？刘说：“没有，就是不便行动。”中央首长行动，老百姓限制他，敢吗？不敢。就这样待了六天。临行会上，刘济民流着热泪说：“我一定如实地向中央反映你们的问题，不会有水分，不会作假。”到十二团的贾也有类似遭遇，据事后了解，他的处境可能比刘济民差一点儿，有人推推搡搡，不给他吃饭等等，刘济民是绝对没有的，碰都没碰他一下。[8]

刘济民走了以后，我们又偃旗息鼓，继续等待。等呀等呀，一直没有消息，因此又发生第二次上访。

当时各团的头头包括我在内，在上访问题上有分歧。我们的意见是暂时不要去，中央总是要统筹安排的，国家这么大，我们就再等一等。或者给中央写封信，问什么时候派人来，如果不来，我们又要去了。可有些团场的青年比较激进，不愿意再等下去。

当时上海知青没有统一组织，都是以团场为单位行动，于是一些团场推选代表再次上访北京。7月下旬，他们先后抵达乌鲁木齐，打出“第二次赴京上访团”的大旗[9]。当局劝阻不要进京，代表不听，个别人已

登上进京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留在乌鲁木齐的上访代表被强行收容。[10]对已经在途中的代表，从南京开始抓，在上海抓，一路上发现了就抓，统统送回乌鲁木齐。

这次上访，共有八个团场的73名代表。我们没有参加，知道强行收容消息后，我和杨清良组织人到乌鲁木齐营救，与当局交涉，最后由各团场派人将他们领回。此后，我们多次组织上访。我到北京去过一次，到乌鲁木齐去过三次。每一次上面答应解决问题，我们就等待，等来等去等到了1979年底。

1980年1月初，我们开了一个各团知青的联谊会，在六团开的，就目前形势、当局的态度、我们的任务等问题发表意见。会上决定组织人到上海去，给当局施加压力，对要求返城的青年放宽限制。会后组织了42人的小分队，由我带队，先到阿克苏，再到乌鲁木齐。在那里得到消息，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已带工作组到达[11]，就向农垦总局提出，跟工作组见面，但他们非要我们回阿克苏。如果我们撤回，工作组坐飞机回上海怎么办？考虑再三，决定兵分三路：12个人回阿克苏，12个人留乌市，我带大部分人去了上海。

四　进驻阿克苏地委大楼

1980年1月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接着，《阿克苏报》连续发表五篇评论员文章，对上海青年扣大帽子。[12]他五篇，我们也五篇，针锋相对批驳他。

关于上青联组织，就我自己的经历，没有正式插过旗号成立过。但是这个旗号有，我们怎么称呼自己呢？上海青年联合会，简称“上青联”。各团场各自为政，之间的联系很松散，联席会议不定期，章程什么的都没有，各团场有个核心，派出代表到阿克苏提出问题，这次是你十四团召开会议，下次八团召开会议。当然也有这种情况，有一些人，有一些团场，打出过这个旗号。但就我亲身经历，没有正式成立过。当局夸大“上青联”的情况，就是为了施压嘛！所以这个《通告》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我没这个组织，也没担任任何职务，没有的。你取缔就取缔好了，反正我们上海青年开会了，我不叫它“上青联”，就说张三李四我们碰碰头吧。而当时是借这个非法组织来取缔你，来压迫你，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

《通告》发布后，知青之间的联系比以前还密切。那时的通讯手段相当落后，比如说这次要在哪个团场开会，就发封信。电话是没有的，公家的电话我们不好用的。信上写着：某月某日召开会议，希望你们准时赶到。有时是你发信，有时是我发信，然后几个团场响应。这个发展

过程完全是自发的。正因为没有形成一个集体，各团有各团的意见。上海知青怨声载道，骂头头的也有，灰心丧气的也有，回到上海搞不成调动回来的也有。

严佑民等人来到阿克苏后，召集知青座谈会，产生了《二月座谈纪要》，内容是给上青解决问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部分知青可以转回到上海市郊农场；符合条件的回去，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回去。这是原话，当时知青的情况就是群龙无首，各唱各的调。座谈《纪要》发表后，又坐等中央解决，一直等到10月底。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阿勒泰农垦局几个团场的八名上海知青，利用公费回到上海，向劳动局咨询《纪要》执行情况，并声明：《纪要》不是儿戏，《纪要》重点讲的是以农调农，允许上海知青从新疆调到上海郊区务农，知青上访就是要求落实这一条。

消息传过来，我就找一些同志商量：既然他们这样做了，我们也要求用公费去阿克苏，看看农垦局的态度。团党委同意去六个人。以我为首的六个人到了阿克苏，找到原农垦局局长、党委书记赵国胜。他的态度很明朗："不是我们新疆不放，是上海不收，要关门了。你们不要闹了，没戏。"听到这话，我们也不跟他谈了，回到各团场把消息告诉大家："上海不给解决，我们咋办？"



非法組織"上青联"必須立即解散

本报评论员

《阿克苏报》的评论员文章

11月5日，各团代表集中到我们团开会，大家心里没底，想听听我

们的意见，我们提出：从8日起组织上海知青大举进入阿克苏，向地区党委提出要求。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上海知青如果愿意继续干下去，我们就豁出去当这个头头，如果半途而废，我们也就不当这个头头了。两年来，我一直在为上海青年的事奔波，几乎没工作过，自然没有收入。连队里有出勤卡，一天不工作扣一天工资。我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又没啥嗜好，抽烟还是后来在牢里学的。

我们最早提出的要求是，能不能考虑让我们的子女回去一个？这是在1979年。当时考虑到自己年龄大了，回去没多大意义，希望把一个子女的户口办回上海。兵团是怎么一种情况呢？农场职工子女不能考阿克苏市的学校，因为你的娃娃，是农村娃娃，上海知青的娃娃，只好在农场念书。但农场学校教学质量不行，家长担心娃娃的前途，希望至少让子女回上海。这样提，也是为上海政府分忧。娃娃小，治安不成问题，将来就业不成问题，住房不成问题，惟一的要求就是读书。原来小学里一个班40个人，现在增加到45个，也可以，不成大问题。可见，当初的要求很低。我们到北京提，到上海也提，但是他们不接受，只是一味地压、压、压。压到后来，知青就提出回上海了。就这么个简单要求，干脆就是一锤子买卖，其他要求都不提了。

我是8日离开农场到阿克苏的，第二天，各团场知青就大规模上来了。我们要找地委谈，他们不对话。11日气温降到零下20℃，当晚开会决定：第二天进驻地委大院；把被子、行李带上，晚上睡在院子里；不要进入地委办公室。

第二天，集合了数千知青，排好队后要选派代表进地委大楼谈判，我自告奋勇说，“我去，我们几个人去”。好多知青不同意：“你们不要进去，被他们抓了咋办？”就选派了几名临时代表。他们进去，到会议室一看，烟缸里的烟还没抽完呢，人都不在了，哪个房间都没有，就跑出来喊，“都找了，人不在，不在”。知青们一听，气愤得很，就冲进去了，拦都拦不住，进去后就自发撬门。看到这情景，我立刻跟负责纠察的同志说：“赶快跟我进去，凡是重要的门不许进，不但不许进，纠察要待在门口。”怕“二丘货”嘛，你不叫我进，我非进去咋办？这样，纠察队就上去了。整个大楼里面，机要室呀、档案室呀、干部科呀等等重要房间都没有撬。撬的就是工会、计生委、共青团这些一些无关紧要的办公室。进去以后我要求：把办公桌上的东西全部放到柜顶上，用报纸盖上，还要写个封条封一封。整个大楼全部安排人睡觉，留一间房我们办公用。

这里有个小插话，在这个关头，我跟团里的一个朋友俞志成争位置，争头头。按说，他的条件比我好——新疆生产战线的标兵，又是拖

拉机机长。上海知青的前期活动他没有参加，回家探亲了，到后来却一下子冒了出来。我虽然当过排长，但那是在号称“威虎山”的十八连，该连调皮捣蛋的知青多一些，我的形象也受到一定影响。不过，我在各团的影响比他大，两年来为上海知青的事投入了很大精力，各团场好多人都认识我。我对他讲：“关键的一点，你上有父母，下有老婆、娃娃，两口子身体又不行。当这个头头，将来总是要拉清单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少数人闹事，存在问题要解决，闹事的人要法办，父母官要撤职。这是早定下的原则。你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有，我的妻子没了，父母也死了，我没啥，豁出去了！”这一番话，加上他妻子的干预，最后他答应了，说：“好的，我听你的！”我们争当头头，不是争名逐利，争的是风险。

13日晚，为了统一领导在阿克苏的知青，各团场一致推举我为总代表，领导班子共有七名成员：我，副总代表王良德，代表冯晶保、俞志成、张鸿兴、陈双喜、陈加春。代表各有分工，领导班子基本成型了。

代表是由我提名的，都是一些比较有能力又甘愿为知青利益奋斗到底的人。我在提名时还要考虑代表的广泛性，必须哪个地区的都有。我还提出，对内部的智囊团千万不要暴露，他们一般是党员或专职干部，很能干的，说白点，都是高智商的人。我尽量保护他们，不让他们露面，开会也不出头。是这样一股无形的力量始终在捧着我，支持着我。

说我是总代表，前面还应该加个“代”字，因为总代表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三团吴鸿飞，一个是七团周荣华，他们已经被关在监牢里面。在这以前，抓了三个知青头头，吴鸿飞、周荣华，还有王良德，他们都是参加2月阿克苏上海知青座谈会的代表，《通告》发布后陆续被抓，罪名天晓得？！是以“违反《通告》”的罪名逮捕的。王良德判了拘留半年，5月份被抓，11月5日放出。我带人上阿克苏时，他已经出来了，一出来就接着干，8日跟我见的面，15日成为副总代表。另外两个人一直没宣判，还关在里面。我们就选他俩为总代表。

跟王良德见面时，他从牢里带出来周荣华等人意见：“总结过去的经验：船老大太多要翻船，这次是一定要破釜沉舟的，就只能有一个老大。”大家都表示同意。各团上海知青选我为首，搭了一个领导班子，一直坚持到最后。



欧阳琏在知青大会上发言

进入阿克苏后，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出质问：为啥要抓胡、周二人？！强烈要求释放他们。我们找公安局要人，要评理，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周荣华在七团影响很高，有很多上海青年试图冲进监狱抢人，一道门、两道门都冲进去了，就剩第三道门了。这么冲很危险，公安局派人找我。我吩咐七团的人："赶快到监狱里去劝阻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撤退！"这样，冲进去的人又退出来了。公安机关有规定的：第三道门，你冲进来他先对天鸣枪，再往里冲就要开枪了。抢救吴、周的行动没有成功，周被判一年半，发送劳改农场；吴被关一年，出来时发给判决书，判刑一年。

上海青年在新疆十几年、二十年里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就是在进驻阿克苏的五十多天里过了一段扬眉吐气的日子，人权得到了张扬，主动性和创造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需要什么就有什么，连维语翻译也有，要让维族人了解我们干啥，以免引起民族纠纷。维语广播，官方有一个喇叭，我们有四个喇叭。他不是有《阿克苏报》的五评和自治区《通告》吗？说我们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施加高压嘛。你念你的《通告》，我念我的文章；你要停电，我们把发电机拉出来。就是针锋相对了。



维族老大爷为上海知青募捐

而地委的态度呢？按照我说的话，就是放任自流，让你们自己去触这个法网，先让你钻进去，再秋后算账。那个时期，地委里任何一个领导都找不到。甚至发生过这种情况：阿克苏的维族人抓到“绝瓦子”（小偷），他不往公安局送，送到我这里来了；开结婚证书，也跑到我这里来：“头头，你这个头头蛮好嘛，给我开个结婚证书吧。”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局势失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民心所向，实事求是讲：他们信任我们。

我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我欧阳琏这个总代表当得很难，事情办成了，我是当局的罪人；事情办不成，我是上海知青的罪人，没有一点儿好处可得的。当然，我现在可以打退堂鼓，也可以乘机为自己谋点私利，但我不是那种人。所以请大家牢记毛主席的一句话：“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我们在阿克苏的这段活动，就是擦着法律的边缘走，他们一时找不到有效手段对付我们。

五　惊天动地大绝食

13日接到王震打来的电报，大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垦区集体上访总代表欧阳琏收：上海青年是我亲手组织带领进疆的，数日之

内我进疆赴阿，依法全权处理解决上海青年问题。我把电报向上海青年宣读了，大家欢欣鼓舞，很高兴。

王震电报中说“数日之内”，按照我们的概念，什么叫数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内叫数日，到第11天就不能说“数日”了。他是13日早晨签发的电报，那我们就耐心等10天吧。

五六千知青集结在阿克苏，这段时间咋办？今天游游行，明天开开会，总要弄点活儿给他们干干。当时有人提出堵交通，把交通一堵，南北疆的联系就中断了。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议，都被我们否定了。我们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取的下一个行动是——绝食。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大概只有绝食是最有效而且很难被抓住什么把柄的，因为它是一种自残行为，是弱者通过自残表达自己强烈愿望的极端做法。接下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了解有关绝食的知识，在知青中进行思想动员。报名绝食的人必须身体好，完全是自愿的。

22日，大约5000名上海知青在人民电影院门前召开“坚决要求落实政策誓师大会”，实际是绝食动员大会。我又把王震的电报读了一遍，宣布10天的期限将到，如果王震明天不来，我们就开始绝食。各团场代表都在会上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上海知青的罢工队伍



绝食现场的棺材（棺材上贴着标语：“坚持到底至死不渝”）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带领五百多人到大十字街开始绝食。在誓师大会上我就表了态，带头参加绝食，绝食期间由王良德担任总指挥。参加绝食的人胸前都别有“绝食”字样的牌子，带着行李。还抬去了三口棺材，在棺材上写着“调职回沪，至死不渝”的口号，四周是知青纠察，不许围观群众接近。安装在街旁楼房阳台上的扩音喇叭不断播送“绝食声明”、“绝食歌”、“思乡曲”，以及上海知青致中央的电报。大家群情激昂，请愿活动走向高潮。

三口棺材怎么来的呢？这中间有个插曲。我们这边几个团已经进驻阿克苏了，沙井子地区的一、二、三团还没上来。他们派几个头头过来看，这次行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要再像2月份那样，我们人上来，你们又走了，不了了之，扰乱民心。”一个头头跟我这么说。我当时睡在地委大楼，就说：“我不跟你多说什么，你看我现在在什么地方，还不明白？！我现在要睡觉，不跟你多说了，愿意的话，赶紧下去把人带上来！他二话没说，掉头就走，半夜带着八个人回来了，说后面的大队陆续动员上来。接着，又狠狠叮了我一句：“欧阳琏，如果你这次再像某某人的样子，我要你死！”我说：“你可以呀，我骑在老虎背上，只能进不能退的，现在的局面你没看到吗？”“好，这样子吧，我去搬两口棺材，你如果退后一步我杀了你，我自己留一口棺材，我死。”我说：“可以的，你去。”他就去弄了两口棺材来。后来，代表小

组的冯晶宝听说有棺材在那儿，就说："我也去搬一口。"他又去搬了一口。这样，在绝食现场就搬来了三口棺材。这样视死如归的坚定决心，这样动人心魄的悲壮场面，除了我们阿克苏知青，哪个人见过？在中国知青史上，这确实是值得记载的一页。



严冬里在阿克苏街头静坐绝食的上海知青

我们绝食两天多一点，也就是五十多个小时，地委一直没人出面过问。我绝食了，王良德是总指挥嘛，继续动员知青参加绝食。他想给地委施加压力，迫使地委赶快出面。那么冷的天，气温零下23℃。我们就那么躺在露天的马路边。绝食到72小时，各国对华广播都在报道阿克苏事件，外台广播，大家都在听嘛。他们怎么知道的？当年我在法庭上就说过："共产党里面有叛徒。"外台不但讲阿克苏的事，还能把我的历史讲得一清二楚，什么我三次到农村，是共产主义信徒了，共青团员了……莫斯科电台、和平与进步电台、欧洲之声电台等等，都在广播阿克苏的事情，都提到了我。

这时已经绝食72小时。按照外台的广播——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国

际红十字会有个章程，凡是签字国，国内发生了集体绝食，夏天气温在35℃以上，冬季气温在零下5℃以下，时间是72小时，可以不通过当事国进行人道主义抢救。国际红十字会给中国红十字会打招呼：我们要进行抢救。因为我们国家大，有能力组织抢救，所以我国的红十字会谢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建议。这以后，阿克苏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救护车在绝食现场等着，几个路口都有，白衣护士也上街了。头上的直升机来回直转。

绝食到八十多个小时，第四天也就是26日，知青广播站广播了我的遗言、王良德下达的集结待命的命令，并宣布要坚持绝食100个小时。晚上，政法书记卡哈尔书记（维族人）代表地委到绝食现场进行慰问，遭到上海知青围攻。知青的心情也能理解，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现在都四天了，绝食昏迷的就有一百多人了，你才出来！其实卡哈尔书记也是好人，代人受过。他现在退休了，在土耳其，女儿在上海，常到我家来。他女儿嫁给了上海青年，来到上海后又跟男的离了婚，现在带着一个丫头，有困难也来找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文件

阿地行署发(1980)173号

各县革委会、人民公社，各农垦团場、連队，地直各单位：

現将国务院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复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并轉告上海上訪支边知識青年的电报轉发給你們，請立即向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和支边知識青年传达，并将传达貫徹情况及时反映，迅速上报。

阿克苏地区行政公署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附复电原文：

一、上海支边知青在六十年代志愿到新疆，为支援边疆建設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很大貢献。

二、今年一月的座談会紀要是有效的，应当継續认眞貫彻执行。

三、当前他們生活上存在的一些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是关心的。他們可以推选出若干代表，由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指定負責同志听取他們的意見，协商解决問題。

四、要告訴他們，解决問題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驟。采取集体上訪和絕食行动是不对的，也不利于問題的解决。希望他們要爱护自己的身体，絕食的立即复食，聚集在阿克苏的全体上訪青年要立即返回工作崗位。

1980年11月25日国务院复电

绝食人数由当初的500人增加到后来的一千三百多人，可以肯定，这么多人里，没有一个人吃过粮食。吃零食是有的，深更半夜吃巧克力、可口可乐、麦乳精……我估计，一千多个人里像这样的人连100个都没有。在绝食者中女知青大概占30%。我跟王良德交代过：每个绝食的人旁边，设两个纠察。绝食的人那么冷，蒙在被子里，看他半个小时不动了，你们边上的人就推一推他，看他醒不醒。本团看本团的人，千万不能死人。我们通过文献了解到：绝食，滴水不尽的绝食，零下10℃以下，男的最多坚持七天，女的坚持十天。绝食期间不能活动，只能躺着，越活动能量消耗越大。

27日晚上，绝食队伍人心已乱。我在现场看到，一个绝食的人昏过去了，救护车开过来，用担架抬上去，但也有人是自己爬进去的。绝食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没人过问，这是望着我们死啊！



抢救绝食者

对于这种情况，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绝食初，本来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我是一号头头嘛，每天早晨在现场兜一圈，给大家鼓励鼓励。晚上再兜一圈，鼓励鼓励。这时已经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就叫纠察队员扶着我在现场转一转，他们要背我，被拒绝了。我要求每个绝食青年抓紧时间写个条子，是上海哪个区，哪个街道，哪个居委会，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连队，放在身上，以防不测。我这是往最坏处打算，不想却加剧了人们的恐慌。

头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广播曾宣布过一道紧急命令："同志们、上海青年们，请注意，绝食总指挥王良德讲话了。"然后他宣布："紧急命令，从现在起，阿克苏上海青年只准进不准出；阿克苏的居民不准出入。主要道路交通严格执行命令。各团场机动车，全部集中在地委大院待命。明天下午两点钟，将有重要事情。"大家都议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啊，人都不能出去？

知青本来已经很紧张了，再加上我布置写条子，就更惊慌了。深夜一点，我看到绝食的人们明显动摇了。家属在旁边哭呀，拉着要走啊……我赶快让纠察通知王良德、参加绝食和不参加绝食的代表，到地

委楼上开会。我说："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已上了楼顶，这个楼梯怎么下？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我们不攻自垮，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那些人会说，原来你们就是这点本事，根本成不了气候。我们知青休想再提什么要求。"

"有什么办法吗？"大家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都不吭声，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我说："我们头头的行动都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呀，我们在上面谈，下面可就更乱了。现在咱们先下去，两点钟上来，在座的每个人都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样，都下楼了。两点钟不到，再把人召集起来谈，还是没有结果。我就开口了："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死人，死了人，我们再从楼梯上下来。"那么谁去死呢？我说："我去死，现在应该是我死。"

开始绝食的时候，我就估计到可能会出现这个后果，预先带了一个两公升半铁桶，里面装满汽油，放在枕头底下。我说现在必须得死人。王良德跟我说："这样不行。不如你明天从二楼阳台上跳下去。"我说："就是平常的人跳下去，腿都不会断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假的，把自尽当儿戏，不起作用。"俞志成又出主意："欧阳，你这样，明天就在三口棺材边上自焚，我们纠察队派几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在棺材里躺着，你一点火，他们就用被子把你身上的火扑灭，好不好？"我就对他们说了："我已经问过医生，自焚只需30秒钟，人就死了。但有个前提，汽油必须从头上往下浇，如果浇在身上，是可以救活的。你们不要管我！"我又补充说："不要再争了，我是老大，要听我的，就这样决定了。明天两点钟采取行动。我死以后，你们在座的几个人，一定给我做到一点，宣布上访结束。然后把我临死前的情况，照片也好、骨灰也好，带到北京去，要一个说法，继续向他们反映上海知青的要求。"

这样决定以后，心里平静了。当时我正和一个女青年谈恋爱，回到绝食队伍后，她就在我的边上哭了。我跟她说："这样走，也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一了百了。"事情就有这么巧，从楼上下来半个小时都没有，哒哒哒，一辆三轮摩托车开过来，下来一个军官过来向纠察问："哎，同志，欧阳琏在哪里？你们总指挥在哪里？"我没睡，脸上盖个帽子，躺在那儿正想自己的心事呢。听到他找我，连忙爬起来。军官敬了个礼，然后对我说：收到国务院打来的机密电报，一份给刘裕如书记，一份是给你的，是通过中央军委机要室打来的，希望你签收。我签了字，他就走了。来电的开头同以往一样，承认我为新疆上访知识青年总代表，大意是：请即刻复食，中央国务院即刻派工作组抵阿解决问题。

现在来看，如果27日我真的死了，恐怕就要乱，事情没有人管了，

知青的眼睛也血红了。有人就对我讲过：“我们矿里来了人，带了一盒炸药。”当时的口号是：“户口不到手，死在阿克苏，坚决回上海。”许多上海知青认为已经没有退路了。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绝食达到100小时，我们在大十字路召开庆祝绝食胜利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上海知青加上围观群众有一万多人。周围工厂鸣汽笛五分钟，喇叭播送国际歌。我宣布绝食胜利结束，全体绝食人员一千三百多人开始撤离现场，部分病员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阿克苏地委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给周围各县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下文件：党、团员不准第二天到阿克苏去，工人不准旷工，团场职工也不准离岗。尽管这样，阿克苏还是人山人海。

11月27日宣布复食后，我们又翘首等待中央来人。等呀等，又没有消息了。

12月初，阿克苏上映印度电影《大篷车》，受这个大篷车的启发，我们决定组织一支数十辆卡车组成的大篷车队前往乌鲁木齐。当时的形势是：自治区正在开人大、政协会；过去，全区只有阿克苏一个点在闹，现在各地知青都在闹，奎屯的上海知青派人来阿克苏串联；农二师上海知青把农垦局占了；北疆的石河子、奎屯、玛纳斯，六、七、八几个师知青都在闹。

我考虑，知青闹返城，过去是点，现在是面，要想把各个点串连起来，只有利用现代化交通工具，也就是用汽车进行长途跋涉的宣传和串联。组织二十多部车子，每个团场一部车、二十多名代表，车上还载着粮食、燃料、锅子。要摆出个架势来，不达目的誓不回家。只要车轮一滚，那些领导一定会来阻止。不管他是当兵的，还是政府官员，谁来阻止，谁就是我们的对话台。一句话，希望通过大篷车队活动，迫使当局对话。他们天天了解我们的动向，给上面打电话、电报，请示、汇报，大篷车一出动，他们立即就会反映，中央也许就派人来了。

在这种想法指导下，大篷车队在12月11日出发了，500名代表，每个代表胸前别着“上访请愿”的胸章，每辆车上写着“上访车”三个字和“请愿赴乌市，迎亲返阿城”、“上访请愿，调职回沪”等口号。车队从夹道欢送的人群中穿过，围观的群众很多。

出发时，我收到农二师上海青年打来的电报，说9日这天，巴州地委发出文件，开始给上海知青发户口了。我叮嘱车队的人：你们车轮滚滚，要慢慢走。一再叮咛。

早晨7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5点钟，我从睡觉的招待所往地委去，

遇到两个上海青年，其中一个是俞志成。他们告诉我一个新消息："欧阳，地委联络员齐秘书来通知，阿克苏地委也要给上海知青发户口了。"旁边有青年搭腔说："哎呀，你们不要轻信，阿拉吃糖吃得太多了。"我跟两个头头讲："不要多说了，大篷车队按原计划出发。"

意想不到的是，车队行至拜城县察尔其农场附近，一辆卡车翻车。造成事故的原因是：这辆车是由修理工驾驶的，技术不过关；王良德带队，车速太快，把队形弄乱了；驾驶员们在公路上开起"强盗车"，比速度，比技术，路况又不行，造成翻车。这次车祸死了沈伯年、奚志军、樊德根三名知青，伤十七八人。

车队上午10点出发，晚上5点5分就翻车了，关于给知青发户口的阿克苏地委232号文件是4点55分发下来的。文件一定是经过自治区批准后发下来的，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下级政府不可能擅作主张，何况是对知青户口这样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呢？如果文件早一点儿下来，还会有翻车死人的惨剧发生吗？！

人一死，我觉得有责任到现场去，处理善后事宜，但很多同志阻止我："你不能走，你一走，阿克苏局面更乱，谁也压不住的。这样吧，还是我们去，请你放心。"我就派了一拨人去，现场还有个临时班子嘛，大篷车指挥部。事情越闹越大，到半夜，农垦局局长找我，要一同前往出事地点，当时我又恨又气，边哭边骂："你们早一点儿出面，不会出这个事的，现在死人了，你们着急了，要我去，我没办法去！我要去，阿克苏再出事情咋办？！"最后是由其他同志陪着去的。

12日凌晨，在地委遇到一个熟人，北京农垦总局的一个科长，是我们上访农垦总局时的接待人员。他说："欧阳，你不要多说了，告诉你，中央工作组已经到了，现在陪你去见一见。"我说："现在来不及，事情闹大了，死人了，今天根本没办法跟他们见面。你跟中央首长说，不是我不见面，实在没办法。到地委闹事骂娘的人都有呀。"听说这个消息后，我一再对知青头头们强调："中央工作组来了，你们赶快向上海青年宣布。工作组来了要解决问题，千万不能用死人闹事。"作为我来说，打这张牌是为了安定民气不要闹事，工作组的到来，附带帮我把情绪激动的知青稳定下来，总算没有出事。

当天晚上，工作组来人问我："明天见面怎么样？"我说："明天不行，要到察尔其去，离阿克苏87公里，把车队迎回来，三个人的遗体也接回来。不然的话，他们二百多人，再把车子往前一滚，麻烦就更大了。"他又问："14日怎么样？"我说："14日也不行，是礼拜天，要给牺牲的三人开追悼会。"[13]"那15日怎样？"我说："这几天来我一直没合过

眼，15日要休息休息，先睡一觉。”

一直拖到15日下午6点钟，我和王良德等才跟中央工作组见面。工作组成员有农办副主任张修竹等。我们几个代表出发时，上海青年数千人夹道欢送，他们担心我们被抓，自发坐了两卡车，满满地开过去，到了红旗坡农场。武警站在一边，我们的知青也要站在边上，中央工作组的领导干脆说：大家都后退50米，武警也一样。随同他们来的新闻记者要拍照片，我提出我们也要拍，你有录音机我也有。



知青领袖王良德在追悼大会上发言

座谈开始，张修竹宣布：“现在谈判开始。”我忙出来纠正：“不对，首长，我不是跟你们谈判来了，不存在谈判问题，我们是知识青年，听党的话的，是来向党反映我们新疆知识青年的问题”，“说座谈也行，说反映情况也行，但不是谈判。”“喔，对对对，你讲得对，我们不是谈判。”接下来反映情况，我们说我们的，他们说他们的，没有任何结果。

以后几天又谈了几次。坦率说，我是在有意拖延时间。阿克苏垦区从11日开始发户口了，我要求各团知青头头，把主要精力放在办理户粮关系上，办户口停人不停笔，换着来，两个小时你写得手酸了换你下来，千万不能由我们自己填，不能像云南兵团那样，把图章挂在墙上，随便使用，一定要他们填，并热情招待。头头们要杀个鸡呀，擀个面条呀给干部吃，热情招待他，要他给我们办手续。

从11日到19日共九天，知青们的户口应该开完了。你开完了户口，再想把人留在阿克苏已是不现实的了，因为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这理想就是回上海，所以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如果你给办了户口再中途变卦，人家能不骂娘？！



“大篷车”事件中死难知青遗属

19日晚，中央首长对我说：“欧阳，我们现在谈个问题好不好？你先把地委大楼里的人退出来，让他们开展正常工作怎么样？人撤出来后我们再谈，好不好？”我表示：妨碍工作的责任不在我们，是以地委书记刘裕如为首的政府机关人员自动离开的，但是本人愿意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户口已经发放，再闹没什么意思了。

接着我召集各团头头开会，会上意见分歧，一部分人同意撤出，另一部分人认为不能撤，“人一撤，他们就会抓人的”。我说：“不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你们一定在20日把人撤出大楼。”同时布置在这一天召开大会，宣布集体上访结束，并要求阿克苏军分区汽车营123辆卡车全部到位，把知青运回各团场。

六　铁窗生涯

集体上访结束后，我向中央工作组提出回团场，他们不同意，说要召开知青问题座谈会，参加者除我们原来七名代表外，每个团场再选派

两名知青，还包括各团团长、政委。为此，发给我们的代表证写着：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座谈会代表证，我的代表证是0001号。这样，以我为首的代表继续留在阿克苏农垦局招待所。

以后几天，各团场上青代表陆续到达，但团长、政委却没有按时到。当时，各团场第一、二把手跑到哪里去了谁都不知道，有的借这个机会回老家去了。他们害怕群众，所以找不到他们。一直等到25日吃中午饭的时候，自治区谢高忠和中央工作组张修竹等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我们，亲切握手，问寒问暖，问吃得怎么样，被子干净不干净，厚不厚，真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当时，我们特别感谢党的关怀。谢高忠代表中央工作组说："我们不等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在农一师胜利饭店会议室召开知青座谈会好不好？"我表示一切听从中央安排。

当时，阿克苏垦区专门派宣教科干事、一个姓丁的上海青年负责我们的生活起居，他给我们买了第二天的电影票。谁能想到，就在26日凌晨两点钟，我们突然遭到逮捕。当时的情景现在仍历历在目。全副武装的军人带着机枪，先上房顶，把窗前、窗后、院子里控制了，都是子弹上膛、如临大敌的样子。各团知青代表都在招待所睡觉，待命嘛，明天要开会嘛。我还没有睡，房间里有俞志成、张鸿兴。

当时我正在考虑一个问题：这么多的青年将要回上海，对当地社会会产生很大影响，包括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治安问题，还有子女读书问题等等，怎么解决？我想到可以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南泥湾创业精神，把回到上海的知识青年中会做工的、有手艺的，分别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还想到要加强管理，不能因为大批人回到上海，引起社会动荡。

正在思考这些问题，就听到院子里传来"啪啪啪"整齐的跑步声。连忙爬起来，出门一看，迎头遭到当兵的枪托子，"扑"，打在我的屁股和大腿上，又把我打回屋里。这个时候，玻璃窗也被打碎了，机枪架起来直对着里面，紧接着，就对我们宣布：奉中央命令予以逮捕。[14]被捕的有我、王良德、俞志成、张鸿兴、冯晶保、陈双喜六人，两点一刻被带走。长达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从此开始了。[15]

他们为啥逮捕我们？目的是为了取消已经发放给上海知青的户口。这几万张户口，不是我们偷来的抢来的，是阿克苏地委经过上级政府批准后正而八经发文件通知办理的，包括工资介绍信、党团关系、粮油关系、户口迁移证等等，这样一整套手续，都是通过合法程序办出来的，怎么能出尔反尔、昼夜之间又宣布作废了呢？！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我们这些头头定罪为"反革命"，统统抓起来。

阿克苏行署公安处
阿克苏县公安局 **公告**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际，以欧阳琏、王艮德等为头子的极少数人，煽动、組織、胁迫大批上海支边知識青年擅离生产崗位，到阿克苏聚众鬧事．他們搶占党政領导机关，围攻、綁架、扣留領导干部，冲击政法机关和看守所；惡毒攻击党和政府，敌視社会主义制度，煽动絕食，堵塞交通，公然践踏宪法，刷大标語，貼大字报，散发传单，进行蛊惑宣传；組織“糾察队”、“特糾队”、“打狗队”、“敢死队”，残酷迫害上青，致残致死人命；策划停工、停产、停課；强占国家財物，搞非法募捐，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結，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他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搞的那一套，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已触犯了刑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7条、158条、159条，我公安机关奉命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依法逮捕了欧阳琏、王艮德、俞志成、馮晶宝、陈双喜、张鴻兴、胡大鈞、馬新順等八名罪犯。

逮捕欧阳琏等八名知青代表的《公告》

我被关进去以后，他们在审讯中不断质问：“你把人带进地委大楼，占据地委大楼，这个行动是不是反革命？把农垦系统打烂，是不是反革命？你们提出‘反对官僚’、‘官逼民反’、‘打倒法西斯’等口号，是不是反革命？！一句话，你们这次集体上访，几十天里面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反革命行为？！”我刚进去时耍了个小聪明，上海人嘛，爱耍小聪明，怕被他们打，在审问中就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当时我认为，逮捕我只是阿克苏地委的私下行动，目的是把矛盾激化的责任强加在我的头上，好向中央有个交代。我想得很天真，中央工作组已经跟我见过面了，过几天他们一来肯定会问：“咦？欧阳琏呢？哦，被逮捕了。”就会出面把我保出来。所以，在头六天的审问中，我一直承认自己是反革命。

这中间，我逐步知道了一些情况：我们几人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而且是以“反革命颠覆罪”逮捕的；阿克苏已经宣布戒严，各团场已由野战部队直接实行军管，在塔里木河口，机枪都架起来了。了解到这些消息后，我再不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因为我问心无愧，思想意识里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包含这一点，我坚信自己是有血有肉有志气的青年。我们是党和毛主席培育最成功的一代，不可能反党。再说了，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仅对自己不负责，对上海知青也是严重的伤害，这意味着他们要求落实知青政策，也成了反革命行

为。这是我至死不能承认的。

于是想到翻供，但这样做难度很大。在每一天的审讯记录上，都有“笔录无误。欧阳琏”的签字，而且要打上手印。现在要翻供，哎呀，心里想想觉得真难呀！

12月31日这天，专案组提审中问到了一个细节，我乘机要求把记录看一看，记录一到手，就把它撕了。他们当即阻止我，不许撕。有个干部问我：“党的政策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说，这是一个，但党还有政策。我说：“党的政策很多，我不知道指哪一个。”他说：“好，那我告诉你：我们的党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从不放过一个坏人。你以前的供词，有很多部分不是你的责任，你却全部承担下来，这是不对的。”

供词虽然撕了，如何翻供，仍是一个难题。你说屈打成招？他们并没有打我，没有打我也就谈不上逼我，不能够无中生有说他们逼供。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想到了两个字：诱供。对于审讯人员来说，搞逼供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说他们诱供，却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因为这是个技术上的问题，无法准确把握的。

31日晚9点多钟，我提出：几天来我的供词，都是在诱供情况下承认的，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反革命，要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我承认有错，但不承认有罪。再一次强调，我在阿克苏收到王震和国务院的电报，都承认我是新疆自治区阿克苏垦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集体上访总代表。中央都承认我们是集体上访。既然是上访，何罪之有？反革命又从何谈起呢？！

尽管翻了供，接下来的状况却很糟。一些审讯人员在合法的名义下，干着非法的勾当。他们确实没打过我，手指头连捅都没有捅过我，但是却可以任意使用戒具折磨我。我国法律上明文规定，对于不老实的犯罪分子，可以戴刑具，也就是手铐脚镣，至于刑具怎么戴，没有具体说明。说罪犯老实或不老实，全凭审讯者一张嘴，根本没有什么标准，不像算术上的一加一等于二，是明确无误的。你交代得再好，他也可以认定你不老实，使用刑具，滥施刑罚。

我在牢里戴过一段时间刑具，受的那份罪不多说了，再说下去连我的头发都要竖起来了。

因为我是知青第一号头头，要严加监管，有意把我关押在阿克苏地区偏远的温宿县，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看守所管教只有一个小青年是汉族人，其他都是维族人。像王良德啊、俞志成啊他们都被关在阿克苏县看守所，那里是汉族人管理，在语言各方面容易沟通。我被关在温

宿县，与维族看守语言不通。后来才明白，公安系统有一个寄存制度，就是把本地犯人羁押在异地，以便加强看管。温宿县看守所的维族管教都知道我是“钦犯”，是中央下命令逮捕的，所以管教很严。一直是单独关押，伙食很差，根本谈不上放风，他高兴就叫你放一放风，不高兴就让你拉屎拉在监牢里。在牢房里的一举一动，全在看守的监视下，只有门后头一点儿空间看不到。

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头发在这段时间里都变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实在受不了了，决定一死了之。阿克苏绝食时我本来就是要死的，没死成。在牢里给我戴反铐，戴得血都出来了。我没有罪呀，却被往死里整，那就让我死吧！

寻死的举动被值班战士发现了，又给我戴上反铐。但他们的态度也促使我反思，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我罪在哪里？！为什么要白白去死？人一死，什么事情都说不清了，所以，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的煎熬长达20个月，一直到开庭审判以后，把我转到阿克苏地区看守所，境况才有所改观。

在监狱里，我也闹了几次。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被拘押的人犯，必须在半年内结案，也就是说公安局用一个半月、检察院一个半月、法院三个月。我在狱里关到半年，他们就来告诉说，边境地区情况特殊、路途远，要延长三个月结案。到了第九个月，还没消息，我又闹。看守是没办法管我的，我是阿克苏那边寄存过来的，人又是上面点名抓的，不好打我的呀，隔壁犯人他可以打。他们只好打电话到地区公安局，公安局来人问一问情况：“干啥？九个月了怎么样？好，好，我们向上汇报。”过上一个礼拜，他们拿来上头的一张通知：案情复杂，延长一年。这样拖到一年多，还没有动静，我又要闹。公检法里本来就有人同情我，只是敢怒不敢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就跟我说了：“欧阳琏，你不要闹了，这个问题拖得越长对你越有利。当初要判的话可能就枪毙了，不是有人想要你的脑袋吗？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你不要吵，好不好？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就这样，拖到第20个月才开庭。为什么拖这么久？背后还有原因的：地区公安局知道我的案子棘手，想推给县公安局审理，县公安局不接，“这又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人不是我抓的，你们抓了人要我审，我不干”。互相扯皮。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从阿克苏请来的律师对法院讲得很明白：你们要我做欧阳琏他们的辩护律师可以，但只能做无罪辩护，如果让我做有罪辩护，我就不干了。哪个有良知的律师不珍惜自己的名声呢？开庭的事就这么拖下来了。

最后决定由地区法院审，律师也确定了，审判长又迟迟不能落实。庭长们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有的就找借口说：“我有病，要住医院了。”最后落实到一个人，叫王××。他现在是江苏扬州地区法院副院长，20世纪50年代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生，被错划为右派，他不服，判10年刑发配新疆劳改，到新疆后仍不服，再加判五年。“文化大革命”后平反，他就留在阿克苏地区法院工作。当时，扬州地区来调令要他走，阿克苏地区法院不放，理由是：我们这里是边疆地区，人才要留。王××接手这个案子时就跟法院领导讲明：“我来审这个案子，但是你得把调令给我开好，拿到我手上。把这个案子审理完了，我走。”这才叫学法的，办起事来就是滴水不漏。

他是扬州人嘛，家里方方面面都有关系，想方设法调他回去嘛。等调令拿到手，他来做审判长，跟我见面，做思想工作：“欧阳，200万右派，哪个不是冤枉的？我的经历讲给你听。”讲给我听了，又开导说：“你要想通一点，你再顶也要判，不顶也要判，这是革命的需要。你如果不跟我顶，顺顺利利地过去，我对上面有个交代，说你态度好，就能从轻判。我从重判你10年，没人说我坏；从轻判你半年，也没人说我好，因为这都在法律条文里面。”“你一定要配合我，一定不要闹。你不闹，我绝对以最快的速度、最理想的结果给你结案。你一闹，我想帮你也帮不上了。开庭时，自治区、中央部门都会有人来旁听的，我要帮你，人家会出来阻止说，他态度怎么这样坏呀？！”

在法院宣判前，看守所所长、指导员就对我说了：“欧阳，你不要闹啊，你的刑期我们听说了，判了八年。你不要闹，就那么认了，你再跳、再闹、再骂，还是八年。你不闹，回来后，就留在看守所，不送你去劳改队，我有这个权，以后每年给你减半年刑，判八年，关四年多一点点，就放你出去，我向你保证。”

在法庭上，对我不是按政治犯而是按刑事犯宣判的，一共五项罪名：破坏社会治安；破坏公共场所治安；堵塞交通、破坏交通；扣留人质、侵犯人权；非法募捐、强硬摊派、敲诈勒索。当王××念到：“五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8年”时，气得我在底下一下子就跳了起来：“啊，又上当了！”大庭上的人们听说判我28年，顿时鸦雀无声了，好静啊。王××停顿片刻，才把后面的一句话说出来：“经研究决定，改判有期徒刑四年。”哈哈，他给我卖了个关子。接下来宣布判王良德三年，俞志成两年。因为已经关了20个月，计人刑期。还有五个人，或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我没想到会判得这么轻，事前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说八年，我基本上也认为是这么个刑期。

判刑后把我转到农一师看守所，处境大大改观。按民间的话说："老鼠掉进米缸里"，吃饱啦！为啥呢？这个看守所有个特殊情况：十个干警中有九个跟上海人沾亲带故。关系最近的是老婆，接下来的是儿媳妇、女婿，最远的一个关系嫂子是上海人。一到看守所，他们就过来跟我握手，关心地问："八年吧？"我说："四年。""怎么四年的啦？我们早听说你判了八年。"

看守所领导很照顾我："欧阳啊，派你一个事，给干部食堂烧饭。""哎呀，我烧不来。""烹调书给你，烹调师你去干。"他说："我告诉你，仓库里面有米有肉，什么都有，用完了告诉我。11点钟开饭，你10点钟以前得把饭烧好放在蒸笼里边。烧好一个菜先尝一尝，油够不够，有味道没有，咸不咸，就这么简单。"我说："好吧，我来慢慢地烧。"午饭、晚饭各值一个班，午饭有十个人吃，但总是不全，有的出差了，有的开会了，有的休假了。我的日子比在连队里还舒服。

不久，看守所买了个电视机，那年月电视机很贵重，也交给我管。我说："我是个犯人，一会儿当兵的要开，一会儿当官的要看，我咋管？"好了，开支部会做了个决议："过去我们买过录音机，一个月不到就坏了，没人管。现在支部决定：交给欧阳琏来管。管得好鼓励，管得不好加他刑。"这样我拿到了尚方宝剑，有时不愿开，就说："哎，今天不要看了，我头痛。"很快，我人也长胖了，许多知青啊、老工人啊都来看守所看我。

王良德判刑后关押在阿克苏县公安局，处境当然没我好。后来经过我的努力、他自己争取，也调了过来。我给干部烧饭，他给犯人烧饭，但他吃的是干部饭。每天晚上闲着没事，我俩就对着喝黄酒，三天喝一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中級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書

阿地（8 2）法刑一字第36号

公诉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付检察长江一。检察员郑旭初。代检察员张知非、熊秀合。张义江、曾建军、汪[illegible]龙。

被告人欧阳[illegible]。男。汉族。现年四十岁。上海市人。原农垦十四团八连农工。现在押。

被告人王良德。男。汉族。现年三十五岁。上海市人。原农垦八团三连农工。一九八〇年五月因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现在押。

被告人俞志承。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上海市人。原农垦十五团机耕二连拖拉机驾驶员。现在押。

被告人冯晶宝。男。汉族。现年三十九岁。上海市人。原农垦六团八连代课教员。现在押。

对欧阳琏等人的刑事判诀书（第一页）

王良德判三年刑实际关了两年半，我判了四年刑实际关了37个月。1983年8月，当时的总理到新疆视察工作，在农一师[16]会议上，他提出一个问题："上海知识青年问题解决了没有？"农一师政委路略回答："全部解决了。"这时坐在底下有个人冒出来了："没有！""谁在讲话？！"在这种场合，等级意识本来是很强的，不该你讲话，你就不能讲话。"我是新华社驻新疆记者，这次总理视察新疆，我奉命随队采访。""什么名字？"我记得姓韩，韩信的韩，叫韩什么记不清了。总理

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到监狱里，去看了欧阳琏，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讲了一段话，大意是对上海青年要加强正面教育，发挥他们的优势，对我的问题尽快加以解决等等。他的讲话，阿克苏公检法系统很快就知道了，看守所指导员跟我讲："欧阳，地委书记刘裕如，总理不知道，你的名字总理知道。""你的问题看来快解决了，还需要什么帮助？"我提出做两个木箱子，走的时候装行李。



出狱后的欧阳琏

看守所领导说快放我了，好呀，我就等着。我的身份是犯人，又不能去催问，只有耐心等待。再说，日子过得蛮好的，阿克苏放电影，他就给我送张票来："欧阳，今天放电影，票子已经买来了，你骑我的车子去看，两点钟三点钟回来都不要紧，你不要不回来。看完电影，去城区哪个上海知青家里吹吹牛、喝喝酒不要紧，可是不要喝醉啊。"

一直到了1984年1月份才放我出狱。1980年的阿克苏事件让农一师的头头们丢尽了脸，不能不对我耿耿于怀。总理在农一师讲完话就走了，口头指示并没有形成红头文件。他们不执行也算不上犯错误，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呀，所以还是不放你，就这么拖着。那为什么到这时才放呢？原来，国务院解决上海知青问题有个［1981］91号文件[17]，因为我是丧偶的，按照这个文件规定，可以从新疆调回上海，但是规定的截止期限是1983年12月31日，新疆方面故意在期限过后放我，就是不想让我合法调回上海。在上海，公安局跟我说得挺明白："文件的政策性很强，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也不会赶你走。"我终于意识到，这是农一师头头们给我穿的小鞋。

七　回到上海

就像我自己嘲笑自己的："抓"是革命的需要，"放"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能怎么办？找谁讲理去？不过反过来说，也没有人因为我坐过牢就对我另眼相看。我还图啥呢？咱平平庸庸地过个晚年吧。

我是1984年回到上海的。我的一个同事，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们是邻居，比较熟悉，跟我介绍了她。我结过婚，经历又坎坷，这些情况她都知道。她双目失明，但是我们两个交流得很融洽。她什么都比我强，就是没有眼睛，我什么都比她差，就是有眼睛。1986年我们结了婚，我想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两人的缘分。那时我还没有上海户口，1988年市里出台了一个新政策，照顾夫妻分居，我才把户口办回。按照当时内部规定，分居八年以上才可以回来，但我这个人身份比较特殊，政策就松动一下，把我办回来了。这样，我的户口落在新疆整整20年后终于又迁回上海。回想起来，为了那张薄薄的户籍卡，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又承受了多少苦难？！好在一切都成了过去，无论是一连串的噩梦，还是我们的抗争。

回到前面的话题，出狱后我也做过点儿生意，1986年就有十几万了，1989年破产。1989年底，我到新疆买核桃，跟我接头的是原张钟翰秘书，张是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他的秘书就因为我叫欧阳琏，提供了方便。给我的薄皮核桃，每公斤2.98元，一共两节车皮90吨。我拿着样品到上海虹口区烟糖公司，他们很满意，答应每公斤给5.6元。如果做成这笔买卖，一下子就能大大翻个身。我把定金付了，回到上海。这么一大批货，需要从银行贷款，没想到银根收紧，贷不出钱来。

我跟兵团签的合同是在新疆交货付款，贷不到钱，只好打电话说，我没办法了，拿不到钱了。如果稍微有些商业头脑，我完全可以告诉对方，自己工作忙走不开，请他按时发货，再派两个人乘飞机过来，由我负责飞机票，到上海后交货付款。我跟上海订有协议呢，只要货到上海，我一个电话，他们到车站验货合格，交钱取货，我再把新疆的货款交给来人。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嘛，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个性决定了我不具备商人气质，又没有把握好机会，赚了钱，很快又败了，而且败得一塌糊涂，于是又回到起点。我想，这也是命运安排的吧。

钱没有了，要生存嘛，我就出卖劳动力打工。这中间有个农二师的上海青年，是电缆厂厂长。知道我的遭遇后，很同情，就说，你干脆到我单位来吧。我到他厂子里干了几年。厂里除了少数农民工，都是新疆回来的上海人，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新疆人"。他们都知道我欧阳琏，所以我的处境好，工作也比较开心。后来这一任厂长调走了，接任的还

是“新疆人”，我心里就考虑了：只要“新疆人”当厂长，我就可以有饭吃，如果调来了一个不是“新疆人”的厂长，我这个饭就不好吃了。为啥呢？我在厂子里不是个普通工人，是负责供应科的，不是科长的科长。这个工厂年产值一亿多，一年里有六七千万经我手上走，是很重要的岗位，换了新厂长是不可能用我的。这样就有了危机感。

1996年我到劳动局去，想反映一下将来的劳保问题。阿克苏事件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不仅领导对我淡忘了，上海青年对我也淡忘了，许多年里我也没有张扬过自己。一到劳动局，立刻引起政府部门注意：“欧阳琏来了……”“上个星期欧阳琏又来了……”听话听音，好像在讲“狼来了”的故事。劳动局里有许多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的上海青年，一些人就像在不要钱的茶馆里一样，喝酒的，骂娘的，哭哭啼啼的，接待人员多半是敷衍了事。看到这种情景，我又忍耐不住了，说：“你们这是在自己糟蹋自己！都五十多岁了，政治上应该成熟了。你们要加强纪律，要有组织。”好了，无意之中又站出来了。

你管这些事情干吗？这全是我的个性决定的。“擒贼先擒王”，市里知道后以“拘留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起来，关了56天，直到1997年的大年三十才放出来。这次是市里面布置抓的，单位想保都保不出来。

电缆厂新一任厂长是个从海丰农场上来的37岁小青年，他一到任果然就不用我了，跟当初的估计一样。这么重要的岗位怎么能要你？他来了要带自己的亲信。这是个肥缺嘛。我在这个位子上，是从不受贿的。惟一能通融的，你送茶叶我要，送我的烟，“红双喜”牌的不要。为啥呢？我跟对方说明了，我500块的工资，抽不起这么好的烟。我不想给自己的领导、上海青年脸上抹黑。但是新上任的领导还是把我一脚踢掉了。

这下子咋办？政府就把我安排到一个机关下设的饭店看门。1997年签了一年的合同，谁知好景不长，一年不到，政府又规定，国家机关不许办企业，这个饭店被承包给了个体户。18岁丫头都会做服务员，要我干什么？签订合同时，劳动局特意跟个体户讲好：其他的人都好说，惟独欧阳琏要让他做到合同满了为止。做足了一年，个体户就不要我了。

后来政府安排我到一个居委会看弄堂门，一群带红袖章的老头、老太太，我现在就是干这个。人家是12个小时一班，我是6小时一班，收入是一样的。说是照顾我，爱人是盲人嘛，心里明白，因为我叫欧阳琏。

现在住的这个旧房子是爱人的。去年10月，政府又照顾给我一室一厅楼房，在浦东新区，不用交钱。朋友们都很羡慕，对我说：“欧阳，

这是对你20年前所受委屈的补偿。”



与欧阳琏夫妇的合影

我爱人去年11月份退休了。因为长期病假，退休前每月只挣280元，退休后养老金七百多元。今年5月我退休后也有七百多元。我们没有娃娃，衣食不用发愁，晚年生活是比较顺心的。

22年以前，阿克苏大篷车队前往乌鲁木齐请愿途中，翻车死了三名上海知青，举行追悼大会后安葬在当地。对于有良知的上海青年来说，这场事故成为心里永远的创伤。特别是近年来，我们这些人陆续返回上海，只有他们的魂魄还孤零零地留在遥远的边疆，这增加了我们的愧疚和不安。因为这三名青年是为上海知青的共同利益贡献出宝贵生命的。

去年3月份，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遇难者之一沈伯年的父母在上海川沙县，八十多岁了，父亲已经半瘫痪在床上。两位老人一直思念着22年前死去的儿子，只有一个心愿：“活的时候儿子没在身边，死的时候希望埋在一起，陪陪我们。”这个愿望通过上海青年转达给我。我把许多要好的朋友召集起来，把老人的心愿告诉大家，当时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愿意管的，这是我最大的心安和欣慰。好多上海青年都说：“这件事要办的”，“是应该的。”

问题是怎么办？家属提出要求无非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迁坟、买墓地需要不小的一笔钱；一个是身体原因，年事已高，无力长途往返。

考虑到大张旗鼓进行募捐，政府可能会干涉，决定只在最小范围内

进行宣传和筹集资金，即使这样，政府还是知道了，并施加了压力。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们犯法了吗？！犯法的事我是不干的，不犯法我就要做到底，要了结大家的一个夙愿，让三人魂归故里、叶落归根。你说有什么企图吗？什么都没有，就是为了迁坟而迁坟。但是我们处理这件事还是非常小心，避免招惹麻烦。虽然募捐范围只限于很少一部分人，很快收上来3.6万块。我们先按照家属意愿，在上海郊区为三人买了墓地，然后派代表陪着家属远赴阿克苏，把三人遗体从墓中取出火化，再把骨灰送回上海。

去年12月16日，我们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在冬至前的一个礼拜，举行了入土安葬仪式。许多上海青年希望参加，因为资金有限，包车子是要付钱的，就这么一点点钱，我只好把人数限制在三百多人，除了亲属、生前友好，还有各师、团的代表。这件事圆满结束，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许多上海青年事后听说了这件事，反响很大："你们早应该通知我们，我们也要来呀！"但客观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通过这些活动，本来一盘散沙的上海知青加强了沟通，一人有困难，大家来帮忙。在目前环境下，我们不能有统一的联谊组织，都是各师、各团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以我、王良德、俞志成、杨清良等人为中心，形成了联结各个团场的通讯网。明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请你到上海来。明年是上海知青赴疆40周年，我们准备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入疆30周年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宽松条件，如果拖到50周年，我们都七十多岁了，精力不行，干不动了，所以40周年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我们的主题思想是："欢聚、庆祝、回顾。"

要说我这一生挺苦的，11岁没的妈妈，30岁没的老婆，40岁差一点儿被枪毙，直到晚年处境才有所好转。但是我永远无怨无悔，因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既承受了苦难，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附录：《我们是怎样进疆的》[18]

在新疆的上海知识青年的问题，现在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为了使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必须把我们是如何进疆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是被欺骗进疆的。然而，有的同志不甚理解，以为我们言过其实。下面，让我们用事实一一阐述吧。

上溯到1962年，由于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

济困难，为了度过这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及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诸如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屯垦戍边等。

此时，身受老“左”倾分子柯庆施之害的上海，出现了一大堆社会问题，大批青少年失学、失业，痛苦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柯庆施支持下的原上海市委不是积极地配合中央，克服困难，度过这一非常时期，而是采取卸包袱的消极态度，为了转嫁危机，像人贩子一样，用做买卖的手段，把几万名青年，推到了新疆，造成如今积重难返，带来严重的后遗症——这便是如今的知青问题。

一、上海是如何卸包袱的？

1.对出身不好的青年，尤其是资产阶级子女、右派子女采用断绝出路的办法，指出惟一求出路便是到新疆去，在动员中大谈什么：“18年安排到新疆，方针不变。”这些青年占进疆知青中的70%。周总理在六八年五月对原新疆建设兵团同志谈话时，分析新疆成分复杂原因，批评上海卸包袱的错误做法，增加了新疆成分的复杂。

2.对在社会上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青少年，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抓住辫子，公开威胁：“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进牢房，去了后以往的事情一笔勾销。”对他们予以人生的侮辱，称之为负号青年，发的是蓝衣服，分成所谓的“四百四”、“二百六”代号威逼进疆。

3.在招生工作中，美其名曰“自愿报名”。实际是对父母采取高压政策，施加压力，恣意停止父母亲工作，什么时候子女报了名，什么时候恢复父母工作。此种情况，不胜枚举。

4.在招生工作中，口口声声是组织批报，但为什么对残疾青年如拐子、独眼、精神病者、傻瓜、羊癫疯患者及患各种严重疾病以致生活上不能自理的同志（占进疆青年中5%）也同样作为包袱，不予放过？如农垦七团三建专门编制了傻子班。试问：这些同志到边疆能干什么？也是组织批准的吗？

5.对于一些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的青年，也当作包袱卸掉。农垦十三团二建知青蔡希联进疆前父母双亡，当时本人才十四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妹。生活上依靠里弄补助，勉强度日。而里弄干部私自做主，将他们的祖居房屋以200元变卖处理掉，作为他弟妹路费，强行将三人骗进新疆而草草了事，类似情况俯拾即是。

6.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委不择手段，在继续安排知青进疆时，对外谎称说是“革命大串联”；对内强行规定：不许带行李，不

许父母送，不穿黄军装。火车过了南京，才发军装，行李由民政局统一托运。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又表明什么呢？

7.为了达到卸包袱的目的，不惜丧失原则，公然用团票、党票作为诱饵。农垦六团知青侯仁瑛，当时用入团作为进疆的交换条件，结果，从申请到批准入团，前后仅四天。那时，风行一时的“车下是青年，车上是团员”便是指这一情况。

8.在招生过程中，为了凑数，完成指标，人数不够，千方百计从农村中凑数。这样，大量从上海近郊川沙、奉贤、南江等县的青年农民中招生，仅农垦六团达40%。更有甚者，从郊农中招生进疆的青年，还有许多血吸虫病患者。

9.除了以上的凑数外，还把不该动员进疆的独苗，在校学生也动员进疆。如上海电缆工业中学六四届一个班52名学生，就有48名进疆。此外，有些从江西共大去的青年，也不安置户口、工作，硬要进疆。甚至连户口在外地，人住在亲戚家的外地青年，也作为凑数数字。总之，为了完成指标施展各种手法。

10.在招生中，大施卑劣手法，事先物色一些人，答应上海安排工作为条件，要他们假意带头报名，说漂亮话，达到纯宣传之目的。结果是，前面进疆刚刚上火车，后面马上安排工作。正是“先进的进疆，后进的进厂”。

二、受上海之影响的新疆，则采取了扩大的做法

1.在招生中，由于上海的影响，新疆在宣传调子上加高，把远景说成现实。说什么进疆后是种桑养蚕、大力发展丝绸事业，青年进疆安排在七十座巢（缫）丝厂当工人。其实呢？哪里有什么种桑养蚕，连原有的桑树，也被砍树刨根，糟蹋光了。

2.大肆吹嘘工资待遇及福利，说什么每月工资起码是46元，结果呢？供给制：“三、五、八”元后，接着是下延级，连起码的工资级别都没有。什么是三年探一次亲，有的同志回不了家，父母病重，不准探亲，往往探亲是奔丧，还执行土政策，如超假降级、降薪，扣发口粮等。

3.说得天花乱坠的生活水平。在宣传中不谈边疆生活艰苦，交通不便，使青年毫无思想准备，却多（侈）谈什么：早上喝牛奶，晚上吃甜瓜，牛羊肉随便吃，衣食住行全包下。又说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方便自己，有利国家。幼稚单纯的青年人，被这些宣传弄得神魂颠倒，事实上与宣传的格格不入，纯属骗人的鬼话。

4.为了迎合青年的心理和兴趣，招生组讲是参军，给每人一套黄军装。但是，欺骗是不会长久的。农垦七团九连王柯礼，六四年六月进疆后，由于所见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当年八月，便组织班里同志逃回上海。事发后，被强加“投奔苏修”罪名，开除团籍，被戴帽子达七年之久，对王的处理，也是给安心的边疆青年一点颜色，杀一儆百而已。

通过以上这些，我们到底是如何进疆的，不是也昭然若揭了吗？由此可见，所谓“自愿报名”的原则，不过是上海市委的“十八年不安排工作，去新疆惟有此路可行”。加上强行手段下的自愿。所谓“组织批准”说穿了就是有组织有步骤地卸包袱。

从招生这个窗口，可以见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屯垦戍边工作带来极其严重的干扰和破坏，而柯庆施的这种做法，绝不是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而是乘此机会，为了掩盖矛盾，转嫁危机，但是问题非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在上海方面错误做法影响下，造成知青人心不安，农场动荡不息。成为新疆垦区连年巨额亏损，农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新疆知青问题作为上海遗留下来的问题，到了该彻底解决的时候了。只有实事求是，合情合理，落实政策，解决问题，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稳定局势，促使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疆阿克苏垦区联合上访团

---

[1]1962年3、4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国民经济工作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2]1949年，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先后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出通电，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陶峙岳所率起义官兵计3个整编师、10个整编旅，共7万人。

[3]阿克苏垦区的前身是兵团农一师。1975年3月兵团体制撤销，同年5月成立新疆自治区农垦总局，原兵团各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成立地、州农垦局。原农一师所属团场改归阿克苏地区农垦局。阿克苏地处南疆西北部。原农一师共十六个团场，分布在阿克苏地区的一市（阿克苏市）五县（乌什县、温宿县、阿瓦提县、柯坪县、沙雅县），沿塔里木河南北两岸分布。农一师是上海知青比较集中的地区。1962年冬至1965年底，先后接收安置了四万余名上海知青。除历年因种种原因调离、逃跑者外，截至1978年底，还有上海知青近2.9万人。这些人成为闹返城风的主力。载《中国知青史——大潮》，第752页。

[4]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央11号文件改变体制，兵团撤销，各师、团成建制归入地方，在自治区成立农垦总局，在地区成立农垦局，至1984年重新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按国家农垦总局（79）国垦办字232号文件，4月28日张秀山的讲话要点是：当年上海青年进

疆是正确的，回上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大力宣传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农场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上海青年中个人和家庭确实有特殊困难需要解决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新疆和上海协商，个别解决。

[6]刘济民关于此行的回忆《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载《纵横》2002年第6期）与本口述多有出入，可以参考。

[7]1980年1月6日阿克苏农垦局《关于阿克苏地区上海青年闹事情况的汇报提纲》称："当刘济民同志带领的调查组到垦区以后，他们立即有组织有计划地将刘济民、贾大秦二同志分别以1000人和500人之多围困在十四团、十二团五天半和两天半之久，甚至不让吃饭，不让看病。"

[8]刘济民《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一文则声称受到知青围攻甚至推搡。不过，文中最触动人的还是6月30日上海知青及其子女向他"跪哭"的情景。刘写道："全场一两千人全都跪下了。人们号啕大哭，哭声连成一片。面对这样的场面，铁石心肠也会动情的，我也哭了。"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1979年云南知青向中央调查组组长赵凡跪哭的场面。然而，刘将上千人向他跪哭归结为"几个头头"的"策动"。

[9]7月19日至22日，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他们在红山商场、火车站等闹市区组织演讲。演讲场地用一米宽30米长的白布围成圆圈，布上签有一万多名上海青年的名字。7月21日，他们扛着"第二次赴京上访团"大旗，肩披"走、走、走，坚决走"等白布标语，列队上街游行、讲演。还打着十面颜色不同的旗子，上书"为知青铺路"等口号。一幅27米长的"万民折"则书写着"热血不为亏损洒，壮年回沪献四化"。参见《中国知青史——大潮》，第754页。

[10]7月22日晚，国务院某领导向新疆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对已离疆的上访人员沿途进行劝阻、收容、遣送新疆；对在乌市准备来京上访人员，要坚决劝阻。深夜12时，乌鲁木齐有关部门组织警察、民兵三百余人，在阿克苏地区驻乌办事处强行收容了72名上访代表。收缴旗帜、证件、袖章、油印机、照相机、喇叭、万民折等。当时，许多围观群众站出来为上访青年说话，其中有一工厂采购员（也是上海青年）责问警察、民兵："你们为什么抓人？这些人犯了什么罪？"结果，也被当场抓走。

[11]严佑民这次到新疆，主要目的是参加1月下旬在自治区召开的"关于做好稳定新疆上海支边青年工作座谈会"，参加者还有自治区、农垦部、劳动总局领导和阿克苏地委、农垦局、团场的负责人。

[12]《通告》发布于1月21日，2月4日《阿克苏报》转载。《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为配合《通告》，《阿克苏报》在2月4日、6日、11日、13日、15日接连发表五篇政论文章，斥责"上青联"成员为"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利己主义者"，信奉"四人帮"鼓吹的"闹而优则仕"谬论，以及"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安定团结"、干扰"四化"建设等等。

[13]追悼会于14日下午4时20分在胜利饭店门前举行，参加的上海知青约有8000人，送了126个花圈，治丧委员会30人，欧阳琏在会上致悼辞。为了救济死者家属，在知青中进行募捐，每人五元。

[14]逮捕证上，给欧阳琏安的究竟是什么"罪"？对于我的询问，欧阳琏是这么答复的："逮捕证上说什么罪，记不清了，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社会上公布的逮捕令通告之类是'反革命颠覆罪'。"

[15]关于此事，官方文献是这样记载的："12月25日上午，地委接到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24日紧急电报指示，立即作了研究和布置，根据电报指示精神，取消了知青代表座谈会，由公安部

门于26日凌晨，按照法律程序，依法逮捕了上青闹事头头欧阳琏、王良德、冯晶宝、俞志成、陈双喜、胡大均、张鸿兴、马新顺等八名罪犯。”见《新疆阿克苏垦区上海知青聚阿闹事大事记》，第31页。另据《阿克苏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称：1980年12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逮捕农垦团场进城闹事的“上青联”总部为首分子9人，收审骨干分子43人。就在这一天，阿克苏行署公安处、阿克苏县公安局发布公告。12月29日，阿克苏行政公署、阿克苏军分区发布戒严令，对阿克苏城区、塔河渡口、农垦14团实行戒严。

[16]1981年6月王震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信中，提出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同年12月兵团建制恢复，自治区农垦总局及各地、州农垦局撤销，在此基础上恢复各师建制。

[17]全文为《国务院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市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报告的批复》（1981年5月28日）。文件在强调“坚决把上青的大部分稳定在新疆”的同时，实际放宽了上青返沪的条件。根据附件1《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和附件2《关于解决新疆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的具体规定》，当时在新疆的上青尚有4.88万人，其中符合文件规定条件可以返回上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外地农场的约为1.5万人，对这部分人拟在三年内分期分批给予解决。其余3.38万人因不符合文件规定的条件必须继续留在新疆。从后来20年的情况看，这三万多人的返沪之路要坎坷得多，许多人倒流回沪后在生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遇到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一些人的户口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18]本文献未署日期，应在1979年春季。

“把面子留给母亲，把理智留给自己”

——杨清良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在座：欧阳琏

采访时间：2002年12月5—6日

采访地点：上海国际饭店724室

［采访前记］　在20世纪70年代末新疆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中，杨清良起过重要的作用，他是北京上访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大名，我早有所闻，但2002年3月的上海之行过于仓促，在晶晶酒家的聚会虽与他结识却未深谈。同年12月，我利用出差机会再访上海，经欧阳琏联系，终于有了对清良专访的机会。我主要请他回忆了1979年率知青代表到北京农垦总局上访的全过程。这次活动，对后来爆发的“阿克苏事件”是一个铺垫。

无论是以丁惠民为代表的云南农场知青，还是以杨清良为代表的新疆农场知青，当他们上访到北京时，负责接待的都是国家农垦总局赵凡等同一批人。尽管新疆农场上访的时间距离丁惠民等人上访时间很近，但官方对他们的态度却有明显的不同，其背后的原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完整地记录这次上访的情况。

一　进京上访

［杨清良］关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请愿上访活动的始末，欧阳琏已经讲了很多，我这里只就1979年第一次进京上访做一些补充。因为我是那次上访的总负责人，了解情况多一些。



与上海知青领袖杨清良（左）、欧阳琏的合影

自从70年代末全国知青返城风波及新疆，上海知青就开始不断上访。我们逐级上访，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后来认识到知青问题在新疆不可能解决，才决定到北京上访。

1979年2月，各团上访代表集中到乌鲁木齐，住在农一师招待所。自治区秘书长王××代表自治区党委来找我们谈话，意思是叫我们放弃到北京上访。我们问他："你，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他回避我们的问题，而是说："我，代表自治区党委，不允许你们到北京去。"他这人很直率，早年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老革命，他在农一师三团工作过，当时担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上海人。就因为是上海人，所以他觉得对付我们这些"小赤佬"、"小瘪三"不成问题。他自以为是到了我们住地，一直闹到了半夜两点还不走，讲来讲去就是一句话：我给你们讲明了，我的任务就是不让你们走。

半夜，他的闺女和警卫员跑来了，劝他说：你的工作已经做了，人家又不听你的，你回去吧，跟你无关了。可他就是不肯走。后来我就用激将法："首长啊，我现在问你，你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坦率地说明一下。"他说："我不能解决你们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解决问题，很好，你很直率，那我们就到北京去了，我们已经通过你了。"他说："小伙子，你们不能走，你们要走的话，我绝对不允许的。"我说："这不是你所能决定的，我们非走不可。"他的闺女和警卫再一次来找他，已经两点钟了。我说："×××同志，我对你有一个评价，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听？"他说："你说吧。"我说："你到最后不要打我。"他说："你说吧。"我说："我……我还是有顾虑，不敢说。""你说吧，不要紧，阿拉也是上海人。"我说："我对你评价有两个字，皮厚。"他真的跳起来了。我说："我们要走，你不让走，我们要你解决问题，你不肯解决问题，所以说你这么死皮赖脸地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工作。刚才你的闺女和警卫员已经说了，你帮不了我们的忙，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就应该回去了，可你迟迟不走，这不是赖皮嘛，这不是皮厚嘛。"他怒发冲冠了，要跟我对着骂了。还没等他骂呢，两个警卫员和他闺女就把他拖走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我们已经做了决定："走！上北京。"在火车站得到消息，自治区已经下命令不卖给我们票。我们就化整为零，自己想办法买票，如果买不到，就请解放军同志帮助买，或让别的同志给我们带。不是全部买到北京的票，有的到丰台，有的到石家庄，有的到天津，反正都是去北京这条线，到了车上再补票。最后讲定，在北京火车站见面。

我们是2月24日离开乌鲁木齐的，3月2日到达北京。听说邓小平为上访的人盖了个上访大楼，据我们了解，那里已经人满为患，走廊里面都是人，去了也没容身之地。怎么办？所以，到北京的当晚，我们就住在了火车站。当时的北京火车站里，聚集着许许多多上访的人。在我们这些外地人眼中，北京是很伟大的，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嘛，“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全国的心脏。可到了北京以后，看到车站上那么一幅凄惨的情景，我们的感触相当相当大。

第二天早上，我们四十多号人直接去找上级主管部门——国家农垦总局，那个地方在西单砖塔胡同。在他们没有上班前，我们就浩浩荡荡到了。总局门口有站岗放哨的，不让我们进，让到边上一个小房子登记，那是个信访接待站。



上访请愿团的袖标和胸章



上访请愿团部分代表的合影

进了屋，我们都东倒西歪地睡着了。等他们上班来了以后，问："你们是哪里的？"我们说是新疆的。"哎呀！我们昨天就到处找你们，没找到。"他们以为我们拉着虎皮当大旗，目标一定挺明显的，但我们没那么做，旗子是带了，可是没有拉。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要缩小影响，没有必要那么声张。我们还带了一个600米的万民折，分别用六个64公分的大旅行袋装着，上面的签名可能超过了两万人。

［欧阳琏插话］当时北京已经出了民主墙，在全国都刮起了一股民主风。我们上海小分队一行六人。离开乌鲁木齐时杨清良跟我们讲：我们要求你们到上海只能够强调一点，就是谈知青问题，谈知青的遭遇和要求，什么民主呀，什么政治活动呀都不要参与。因此，我们到了上海只诉知青的苦，只要求给我们落实政策。我们把万民折带到上海人民广场，也就是现在市政府的东边。原先那儿都是高高的铁丝网，后面种的树，我们就把万民折在这个铁丝网上拉出来，引起的反响很大，包括好多老外都来看。因为这个东西由我保管，上海市政府就派人找到我。

我在上海待了一个礼拜，因为种种压力，不好在上海了，就跟北京的杨清良联系，要求上北京。杨清良说："你来吧。"这样，在清明节左右，我离开上海到了北京，万民折也随身带着。

［杨清良］这里要讲的是万民折，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威慑"，我知道这个东西的分量和厉害。农垦总局也知道我们带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为了母亲的面子，不能真的让它亮相。为什么？我就跟大家解释：在谈问题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不妨做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样子，假装的："不行我们就要拿这个东西出去了！"作为谈判时施加给对方的压力。但是呢，不能真的亮，真的露。我们惟有这一点"核威慑"，如果露出去，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作为儿子，你把老娘的脸皮给撕破了，最后不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代表农垦总局跟我们会谈的主要有刘济民、贾大秦，还有一个戴眼镜、个子高高的阎处长，是二炮下来的；还有于定栋，是农垦总局知青办专门负责知青工作的，是个老革命，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对这个人，我绝对不会忘记。欧阳琏是他的"克星"，因为有一次他讲漏了一些话，给欧阳抓了把柄，他说："欧阳，欧阳，你不要笑我，你不要笑我。"这个老头太好了，是个好人，最后他非常同情我们。他说，你们这些知青太伟大了，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的青年，这么理解国家、理解母亲。所以他对我们的感觉，我们对他的感觉，都是相当好的。后来，在1979年底最后一次国务院知青办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鱼姗玲讲话的时候，他说："讲得好，讲得好，多好的青年哪。"太激动了，当场突发脑溢血死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那天早上，在农垦总局信访站，他们说：我们到处找你们，就是没找到。我就跟他们说："这个样子懂不懂？我们悄悄地在你们鼻子底下过来了，你们不是阻拦我们，阻止我们上访吗？""哎，没有没有，你们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这一天，我们就等着你们来了。"他们极力在表示热情。我说："你讲的话好像不够真实。我们是怎么上来的？打着弯儿上来的，既然来了，就要找我们的归宿地。"有人就连声说：好，好，并马上用电话汇报："他们都来了。"

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怎么还不给我们安排呀？"我就向负责接待的人提出，"我现在有几个要求，现在不能谈什么话，我们经过长途跋涉，几天几夜没睡觉，需要休息，要一个住地给我们清理，给我们洗洗涮涮，因为我们有的同志身上已经长虱子了，希望你们能够考虑。"他说："可以，可以，你不要着急，我给你联系。"将近10点钟，开来一辆大巴。他说："哎呀，杨清良同志，现在已经联系好了。你们也了解，中央信访接待站已经不能住了，安置不了你们，既然你们来了，我们还

是比较欢迎的，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地方，第五机床厂。”这厂子在德胜门往北的西三旗，实际上就在昌平县党校，以前是中越公社党校。我问离这里有多少路，他说有三十多公里。我说：“你说话可当真啊，我们一万多里路都不在话下，你如果把我们安排在那里不管不理的话，我们可是还要回来的。”“小杨，你误解了，你刚才不是提了几个条件吗？你们要洗洗涮涮整理整理嘛，我们苦苦联系的你还不领情？我们把你们安排在那个地方有吃、有住、有洗，满足你们的条件了。”我说：“好，现在其他都不说，我们休整，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睡了。”他说，你们现在走吧。大家都提醒说：“老杨，不要再次上当。”我说：“上当？适度上当受骗是正常的现象，无所谓的，我们那么多人来了，再一次上当受骗也无所谓，这么近的距离嘛。”

当时我和欧阳琏这一批有四十多人，不久第二批十几个人就赶上来了，他们是来支援我们的，上访代表增加到54人。阿克苏本来还准备派第三批、第四批，每一批都是十几二十来个人。但第二批人一到，农垦部的×××就找到我们，把脸抹下来说这个话：“希望你们不要再派代表来了，好不好？你们再来人，我们不接见。”这样，第三批、第四批就留在阿克苏待命不动了。

在我们后面，到农垦总局上访的人很多。我们有这么多人，他们却是单个的，人家对他们的态度就跟对我们不一样。我们怀着自信、自豪的心情乘着大巴，到了中越公社党校。

休整了一个晚上，我们走马观花地四处转了转，见到原昌平县组织部部长，他就住在我们房后面第二排第一幢。他看到来了这么多小伙子感到很惊奇，就问：“来，来，来，小伙子，你们哪里来的？噢，上年纪了，都白头发了。”我们说是新疆的，并把情况简单地跟他说了：“哎呀，小伙子，你们早两个月来多好啊，你们跟云南的丁惠民在一起，这台戏可热火啦！”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欧阳琏插话］我们比云南的丁惠民晚了两个月。如果没有丁惠民的上访，我们也许不会这时到北京来。客观地说，这事情的发生总有那么一天，但是从时间上来说不可能这么快，我们当时是受了社会上回城风的影响，导火线就是云南的丁惠民。

［杨清良］以后的几天，阎处长他们三个人代表农垦总局，轮流着跟我们联络，我们有什么问题什么要求请他们转达，他们记录下来，反映上去，下一次见面，再把总局的答复讲给我们听。

来京之前，我们曾要求各团场把有关资料整理汇总。会谈的间隙，我们在宿舍里做了进一步整理，整理好的材料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

部分，大概有40公分厚吧，包括各个团场存在的问题和受害知青的典型案例，都用文字写下来，注明时间地点。我们事先提出的要求很明确，要写的有骨有肉。并且一再强调，不能弄虚作假。全部材料整理好以后，交到我们十四团陈绍武手里，由他执笔再整理一遍。

二　难忘的会谈



部分上访代表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大概五六天以后，农垦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来到我们驻地，在一个小房间里把全体人员都召集在一起说，今天跟大家见见面。他寒暄了一番后说："这样吧，今天我想听听你们到北京有什么要求和想法。"他开场白讲了以后，我就慷慨陈词，把我们怎么到新疆去的，到了新疆以后遭遇怎样，现在有什么要求，讲了一通。我说，根据中央104号文件、74号文件[1]，我们应该享受的待遇却享受不到，中央政策在新疆不能实施，我们没有沐浴到党的阳光。我举了个例子，在我们连里，符合"双顶"条件的商调函[2]从上海寄来后，他们说这是非法的，不接受，退回去。我们说，都是自己的同胞，国家允许他回去，为什么不让他回？"双顶"政策是劳动部1977年141号文件提出来的，按照文件规定，30岁以上的知青不能顶替，我们中很多人都超过这个岁数了。许多人的父母早就退休了，也使他们丧失了"顶替"[3]机会。这都

是“文化大革命”给耽误的，这责任不在我们，而在于政府，所以大家一下子就哄起来：要来一起来，要走一起走。

［欧阳琏插话］这中间有一个情况：当时在新疆农场有一个土政策，农场知青的娃娃不能进城读书，不论是阿克苏城区里的技术学校也好，高中也好，没有农场娃娃的份儿，也就是说我们的子女没办法进城读书，我们的娃娃永远在农场。当时我们向中央提出，对能回去的知青都要放，30岁的年龄界限是不对的，希望知青家庭能够有一个娃娃回上海，都是娃娃嘛，对上海的治安、对住房、对就业都不成问题，就是去读书。那么我们安心在新疆工作，到将来等我们老了退休回家，也有个归宿。我们是这样跟自治区、农一师提的，都没用。我们当时思想很单纯，并不是想全部回上海。一直到1980年阿克苏事件，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求落实知青政策是。我记得很清楚，上海市政府问过我，到北京，贾大秦也问我：你们说的知青政策是什么？我们理解的知青政策：有条件的回城，能招工的进厂，积极改革当地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些人一意孤行，使矛盾越来越激化，激化到最后，知青们万众一心，就是回上海，其他要求都不谈了。

［杨清良］在跟赵凡谈话中，我代表大家发言，把我们怎么到了新疆，进疆后的坎坎坷坷，很多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都讲了。说的时候自己都掉眼泪了。我的叙述引起了所有在场者的共鸣，上访的人都掉眼泪了，赵凡听得掉眼泪，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掉了眼泪。

陈述完毕，赵凡就讲：“我听了这个讲话深感同情，而且也深深感动，你们为保卫国家保卫边疆建设祖国立下了功劳。”接着又说：但是，国家有困难，这样困难那样困难……等他讲完，我又说了：“听赵部长的意思，地富反坏右、‘臭老九’[4]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都是在困难时期解决的，惟独我们新疆知青要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困难好像是不可能解决了，我感到愤愤不平。黑龙江的知青、云南的知青都好解决，惟独我们新疆知青的问题不好解决。这太不公正了！我倒有个解决的办法，可是不敢说……”他说：“你说。”我说：“我不敢说，我害怕，我说出来，你要抓我辫子打我棍子的。”他说：“你放心，你已经在母亲的怀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说，不会抓辫子打棍子穿小鞋。”我说：“好，你说话算数吗？当真？那我说了啊，在我们新疆有一个世界上最低的地方叫塔里木盆地，就是吐鲁番和艾丁湖地方，比海平面还低150米。把我们10万上海青年全部派在这艾丁湖、吐鲁番盆地，一人交一毛钱，不就全部解决了？”他问：“怎么解决？”“哒哒哒，无声无息的，还填不平这个盆地？”

他听了这话，一下子怒发冲冠，脸发紫了："小杨——你怎么能把党看成这个样子啦？"我说："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地解决了吗？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吗？最简单的花一毛钱的事情嘛。你说这样困难那样困难，我们只能是这样的喽。""你把党看成什么？把母亲看成什么了？"我说："我不轻易说这个话呀，我刚才是有前提的，因为我感觉到已经无路可走了，只能这样解决的嘛。"他还是说："哎呀，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我说："我是违心的。我是相信党相信母亲的，所以我们才到这里来。可是，听你这么说，我绝望了，是逼我说出这些话。"

他听了我的话感触很大，也没再跟我争论，也没有再指责我，然后说："小杨，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不能这样看待母亲，看待政府，看待党。"我说："首长，我今天还是这么讲，我相信政府相信党，一定会按政策圆满解决我们知青的问题。我们来的54个代表，代表新疆阿克苏的上海知青，是满怀热情和希望到这里来的，要求、请求、恳求政府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希望沐浴党的阳光，因为在新疆没有享受到党的阳光，所以现在我做这样一个陈述。"他说："这样吧，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们回去把你们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汇报，到一定时间我们接着再谈，希望你们一定要听党的话，要守纪律。"他给我们关照了几条。因为那时西单民主墙还在，他希望我们谈自己的问题，不要跟社会上有什么联系。他这么说了，我们也没有表示俯首听命，当然也不可能那样去做。

会议结束以后，我再一次跟同志们解释：我们正在解决问题，我们不能跟社会上的许多问题挂在一起，因为如果挂起来，性质就变了。我们就是落实知青政策，解决我们该解决的问题。我告诫每一个同志，千万不能跟他们挂在一起。当时外面一些人也来跟我们联系，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援（欧阳琏插话：还有民主墙那儿的人也跟我们联络，说要与我们合在一起给政府提意见），都被我婉言谢绝了。

［欧阳琏插话］我在上海人民广场时，有人在背后叫我："欧阳琏！"我一看不认识他。他一直走到我的面前："你们现在这样很好，需要什么帮助？经济上的，舆论上的，你们要什么帮助，我可以给你们帮助。"我站一下，问他：师傅，当时还没提倡先生嘛，我就称他师傅，你是哪个单位的？他跟我说：我是哪个单位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要支持，我们可以支持你。我听了这话，就说：师傅，我们在谈我们新疆的问题，谈我们新疆知青的遭遇和我们的要求，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们也不需要任何帮助。看到我这样的态度，这个人就走了，这是第一次。第三天，又有两个人跑来找我。1980年冬往阿克苏聚集时，也碰到过类似情况，也有人提出：要经济帮助吗？要钱吗？有啥困难你提。我们只

要求落实知青政策，这是宗旨，外面的问题都不要插手，对这类情况我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阿克苏事件”以后，他们始终没有办法把我拉到“反革命”或什么政治上的问题。

［杨清良］在乌鲁木齐街头，我们演讲为什么要上访时，就有所谓外国记者拉着我们一个小伙子外号叫“牛鼻子”的，对他说：“小伙子，你们要经济支援吗？要舆论支援吗？要武器支援吗？”小伙子一听吓坏了，回来马上向我汇报。我说，你马上追出去，把那人抓住。我说的抓住，就是请他进来，我们倒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国内的人成心诱导我们朝歧路上走，还是真正的外国记者。所以，我再一次告诫大家：像这样的人，绝对不能放过他，要把他找来，鉴别他的真伪。如果是真，要说明我们对祖国是忠诚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支持，我们仅仅是想要沐浴党的阳光。我们对政府没有丝毫对抗之心，我们没有这样的企图。我们始终把握住了这个方向。

接着再说北京上访的事。那一天，来了专车把范文成、张一娟和我三个头头接到农垦部小会议室，在场的有张修竹、刘济民、贾大秦、赵凡。他们已经把我们54人的政治面目全部打印好了，逐个来对。问：“哪一位叫张一娟啊？”张一娟说：“我。”“你叫张一娟，几岁啦？”又问范文成，最后又问，“哪位叫杨清良？”我说：“我。”“几岁了？”“40岁了。”张修竹说：“40岁还算什么知青？”我说：“首长，你说得好，如果再不解决，我们就变成老知青了。”他戴了副墨镜，当时把墨镜取下来，对我深深地看了一下：噢，好样的，你小子……这时，刘济民就对赵凡讲，他们兵团的负责人到了。来的是我们新疆农垦总局的副局长，姓杨，原阿克苏农一师副师长，后来做阿克苏农垦局局长，又升到自治区农垦总局副局长，我们还是把他叫杨副师长。因为我们是新疆的，所以必须把新疆的头儿找来嘛。

赵凡继续给我们讲大道理，讲国家当前的形势，问我们有什么要求。张一娟、范文成都说了，最后我由陈述。我说：“我们进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要求党、政府制定政策，对我们新疆的每一个上海青年，应该享受的东西都必须要享受，我们没有给党提出过分的、不合情理的要求。”当时还没有讲“法”，对不对？我就说了，我们今天提这个要求，没有任何过分的地方，我们从下面一级一级上来，从程序上讲也没有违反上访的原则。当然，我也说了，作为母亲这里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里我代表大家表示感谢。

赵凡说：“小伙子，你们来到北京也不容易啊，有机会我们帮你们安排一些活动吧，你们说你们身体有很多的毛病，皮肤病啊，生虱子啊，刘济民，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到哪里去活动活动，洗洗澡。”他表

示对我们的关心嘛。我就插话了："首长，承蒙你们的关心，这些都不是主要的，我们现在迫切要求的就是解决我们的问题，能够按政策解决问题。我们今天既然到了农垦部，就需要农垦部的首长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完整的答复。这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时不可待嘛，我们不能再等待了。"

接着，刘济民向赵凡、张修竹汇报上海知青在新疆采取的所谓"大兵压境"举动，目的是给北京的上访助威。还讲到底下许多团场领导对知青们百般压制，造成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件。赵凡、张修竹一下子恼火了，当场就骂："这些王八蛋，我们在这里灭火，他们还给我们添乱！"

那时候，我收到我爱人代表十四团上海知青联打来的电报，给我们再三的忠告："把面子留给母亲，把理智留给自己。"实际上是告诫我们，不要做过火的事情，一定要克制自己。

我们每天晚上也是争争吵吵的，知青就是这样，尽管是各团场的代表，实际上对问题都是各有各的看法。所以，我只能用这些最简单的例子跟他们讲。他们就说：我们听你的，听你们十四团的。

和上边翻来覆去谈了几次，最后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就是他们听到我们的陈述以后所表示的：连锅端，绝对不行！不能全部来全部走，一定要有条件的。他们还列举了对云南知青的解决办法。我们就强调说，进疆的上海青年中包括不同的情况，里面有一部分，是不到年龄的童工，十三四岁、还没有砍土镘的把子高就送来了，搞滥竽充数，把缺胳膊、断腿、瞎子、痴呆也送来了，每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有，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做法完全是上海在卸包袱，是错误的。特别是1965—1966年间，人数最多的一批是上海十个市郊县比如青浦、川沙等县的农民，也给送到新疆来了。赵凡当时就明确表态，这样做是错误的，本来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城市青年的问题，他们已经在农村了，还把他们送到边远地区来，这个做法是绝对错的。他还举了云南的例子，因为在云南农场，也安置了一批上海郊县的青年农民。这部分青年后来都给退回上海了。他又讲："你们提的知青连锅端的办法是不行的，解决问题要符合政策。"

我们就说了："政策是谁制定的？政策是人制定的。有些政策已经过时了，还提要符合政策，这对我们不公平。因为搞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嘛。作为政府、作为党，应该弥补我们这些损失。"

我们还提出澄清身份问题。我们当初到新疆，究竟是一种什么身份？到底是参军？是支边青年？还是移民？这三种身份应有的待遇我们

都没有享受到。口口声声说我们穿黄衣服，吃官饷，但三年吃的是萝卜干饭，领的是三块、五块、八块津贴费。你如果说我们是移民，我们又没有移民的安置费。如果算我们知青，又没享受知青的待遇。那我们到底算什么？

赵凡明确说：你们是国家的农业产业工人。我说：你们既然那么说，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到所谓产业工人的待遇？反正你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是参军呢，我们应该复员了，已经18年了嘛。如果按照知青，我的子女也可以顶替回上海了，每年按照10%的比例上调工矿，这是国务院74号文件里边规定的。所以我认为，这跟你们说的回城风完全是两码事。请问，王震的干女儿，张闻天的儿子，陶勇的儿子，上海著名沪剧演员石小英的儿子等等这些人，为什么在“拨乱反正”以后都回去了？而把我们这些同志留在这儿？他们那些人，不符合政策的都回去了。来呀，请他们一起来共同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呀。我认为这样做是没道理的，看人下菜碟嘛。何况我们有许多同志是符合政策的，都不能回去，因为没有什么关系和背景。

最后我讲，希望政府考虑到我们确实是老知青，要从老知青的角度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既然你说不能连锅端，那么我们今后再谈这个问题，可以不提连锅端，但我们可以做到不连锅端的连锅端。创造条件嘛。你有病退条件，凡是不适宜在新疆工作的、有伤残的、侨居的同志，就应该先让他们回去。当时我提出，要广泛地、多渠道地安置这些人，希望政府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这样来回多次叙谈，他们最后答复说：连锅端是不行的，但是具体情况我们会具体对待。根据你们新疆知青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与有关部门如知青办、共青团、妇联共同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你们要给我们时间，现在你们要我们立刻做出这样那样的承诺，可没那么简单。因为这是关系到两地三地的问题，上海啊，新疆呀，我做老娘舅的不能发号施令啊，要体会我们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困难。我们只能是给你们想办法出主意，与两地政府联系，你说对不对？给我们一个了解你们具体情况的过程，然后我们再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看到这种情况，我就给大家做了总结：情况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离开家已经一个多月快两个月了，有五十多天了，问题是你要让政府马上拿出解决办法来是不现实的。他要下去调查，还要与两地联系，他举的例子也是很有道理的。比如云南和上海之间的矛盾，云南农场知青因为闹得厉害，最后橡皮图章挂在那儿随便盖，造成了上海的安置压力，这样的问题不能再出现了。农垦部的同志底下给我们讲：赵凡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场合犯了错误，他亲自到云南去调查，到了丁惠民那里给扣住

了，给他施加压力，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发火了嘛，就说："放！"他一说放，云南政府也放！后来中央通报批评他了：你怎么能放弃原则呢？这么一放，一下子把上海的、四川的和北京的全都给放回去了。你应该坚持原则，你这么一放，造成很多地方对中央有意见了。云南讲，你赵凡同意放我们就放，你赵凡承担责任嘛，要不人家不敢放。这一放，放出事情来了，所以云南的知青，凡是愿意回去的都回去了。



部分上访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合影

通过请愿上访，我们没有达到这一步，但是真正解决问题，可能新疆比他们解决得要好。他们当时还没解决到子女，我们把子女的问题都解决了。1980年2月，中央、上海、新疆三方首长在阿克苏会谈，形成《二月座谈纪要》，提出广开门路，多渠道创造条件，解决上海青年的问题。这句话看似空洞，实际上包含了很重要的内容。后来知青子女都能在上海报户口，包括那些跟上海知青结婚的外地知青或当地青年，也都回到上海了。最后还放宽条件，把不够条件回上海的一部分知青安置到海丰农场。[5]实事求是地讲，他们是尽了心，尽了力，这是不可否认的。当然最终解决问题，还是在于上海。

北京谈判快要结束时，我们提出要邓小平接见我们。贾大秦和刘济民是主要联系人，他们说恐怕做不到，要来也就是你们的老部长来。张一娟就说了："我们不要他来，如果他来，我们要骂他人贩子。"贾大秦

就对张一娟直说了："小张，你党性在什么地方？你敢对部长说这样的话？"我们的张一娟同志很坦直："党要我讲'三老四严'[6]，如果说党叫我讲话都不行，我宁可退党。"他说："你敢？！""我就敢！你如果不让我讲真话，我就不参加这个党，我马上退党。"这么僵持着。

4月28日，在农垦部小礼堂，用大巴把我们全体人员都接过去了。他们把70岁的老头、中共中央农委主任张秀山给抬出来了。他耳朵背，戴着助听器，我估计预先也没给他讲好，稿子他也没审阅。从座位排序上，我看到他们等级是很森严的，张秀山坐在中间，赵凡离他两个座位，其他人坐得离他更远。刘济民、贾大秦都是在边边角角上落座了。

赵凡说，既然你们有这个要求，部长繁忙不能来，由中共中央农委主任代表我们农垦总局讲话。主任开始讲话了，我们大家洗耳恭听。他先寒暄了一番，接着说：最近社会上刮了一股回城风，相当不好……回城风闹得满城风雨，打乱了邓小平的战略部署。什么104号文件？都是回城风，我本人就不同意104号文件的执行。

我举手说："首长，你讲完了没有？我能不能说两句话？"赵凡说，你说吧。我说，首先觉得有点儿不知道好说不好说，我听了刚才张主任的讲话，感觉不是个滋味，这个104号文件他可以反对，可以不执行，讲104号文件是错的，张主任可以凌驾于党之上，可以不执行党的文件？！我认为中央的文件是党的光辉形象，既然文件颁布了，谁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时张主任知道讲漏了。赵凡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就"啪"地一拍桌子，冲着我说："放肆！杨清良，你有什么权力指责老红军、老干部？"我当时很气愤，但是压住了自己的火，我说："全体起立，向右转，齐步走。"我不跟你说了，你用这个气势和权力来压我呀，讲错了还不好好说。我认为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不能跟他们对着干，你用那样的态度对待我，我不跟你说了，可以吧？张主任感到自己惹祸了，惹了大事了，你别看这个老头啊，他也精明得很，马上说："小伙子，别发火，坐下来，坐下。我说错了，你们不要走。"我们已经走了几步，他跑下来，硬叫我们坐下来。那个时候，刘济民就使使眼色："小杨，人家首长已经这个了嘛……"当然了，我还记得那句反复说过的一句话，要给爹娘留面子。我就说："我们的情绪也太激动了，向首长表示歉意，好吧，我们坐下来再谈。"然后，张主任把他的报告做完。[7]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时也使用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强硬的话语，如说现在国家正在复兴时期，困难多得很，不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他们这么说，我就拿出那个万民折，放在院子里晾晒晾晒，让他们觉得我们

要“蠢蠢欲动”了。他们一看我们把这个拿出来，就感到紧张：“你们拿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时民主墙还在，我们说如果不行，就要让人们见一见我们的心声和我们的要求，我们要呐喊。如果我们回去不能给父老乡亲一个交代，那就只能迎刃而上，将这些公布于众。万民折的前言是七团张保发修改的，结束语引用“四五”事件[8]中“鬼哭豺狼嚎”那句诗，他把问题提得比较尖锐。

上访到了这种程度，他们也做出了所谓承诺。对于他们的承诺，我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我一次次地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哪怕再上一次当，我们再来，也在所不辞嘛。我们不可能一次就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一次我们来就是敲门，登记注册了。承认我们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前提已经有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最后，我们动了一些歪脑筋，有意小题大做。在我们临出来的时候，阿克苏地委书记刘裕如，就是阿克苏的当家人说：就是你们上访胜利了，回来以后我还是要抓你们的。我就把这句话给有关领导反映了：“你要给我们做一个鉴定，你不给我们做这个鉴定，我是无法回去面对我们的乡亲，面对我们的父母官刘裕如的，他要拿我们兴师问罪的，他认为我们在北京胡闹了一顿。”在我们的共同呼吁和请求下，临走前，在农垦部大礼堂，他们把所有在北京的同志都叫全了，给了我一个大信封，里边给我们54个人做了鉴定：新疆阿克苏上海知青赴京上访代表人数之多是上访之最，时间之长54天，是听党的话的，是守纪律的。我拿了这个上方宝剑。

他们又说：“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我们给你买车票。”我说还不行。“啊？你们的要求我们基本上都满足了，你们还要什么？”我说，我们还是心有余悸，如果说没有你们的保驾和你们的尚方宝剑，恐怕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穿小鞋抓辫子，甚至于还有磨难。我们共同的呼声，希望有关领导跟我们一起下去，你们不是说要核实情况吗？我们可以为你们的核实提供相当的条件，如果你们在下边单听官方的，实际问题是了解不到的。我们的共同呼声，是部长们派代表过去，要不然我们不走。他们说，我们研究研究给你们答复。

过了两天，给我们宣布了：你们前边走，我们后边到，你们坐火车走，后面我们乘飞机马上到，恐怕跟你们一起到。我说，说话当真？如果这话当真，部里的领导你去买车票，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走，我们不敢走。后来他们就给我们讲笑话了：你们太小心眼了，你们把党、政府，把领导和我们看成什么了？而且里边还有一个笑话，贾大秦指着我：“小杨，你们用的这套办法，就是我们当年给国民党斗争的那些办法，你们全部用上了。可是你们用错了，现在是共产党，是自己的党，

你能这样做呀？哎呀，小伙子们，你们太单纯了，用这个办法要看对付谁。”

然后他就提出，要我们付几天的饭费。我说：吃饭就应该付钱，但是我们到北京上访，都是靠同志们募捐的，我们自己的生活费都没着落。作为一个工人，经济来源就是工资，他现在把我们的工资都停掉了，我们哪来的钱给你付饭钱？一旦他发给我们、补给我们了，我一定全部补上。他说：“那么这样，你们吃了饭，登记一个统计数，写个借条。”这可以，根据我们每次领的饭票、菜票，每个人打了欠条。

三　不是尾声的尾声

5月初，我们就踏上归途了。一到乌鲁木齐，刘济民和贾大秦也到了。确实是言而有信。

前些日子，刘济民写了篇回忆，有很多都不是实情。[9]巴州二十九团开会，他本来是要我和我的爱人参加的，他在我家里住过。等到开会了，我们两个没有去，都是他请的上海青年中的一些干部、党团员们。我们去了个徐志根，也是党员。他们请的这些知青代表，都是他们认为可靠的，我们这边上访的人一个都没请。

在这次会上，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兵团司令员、原农二师师长谢××点了我的名，说我盗看盗抄国家机密文件，宣布我的罪行。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是回到了乌鲁木齐嘛，原来他们给我们许诺，说自治区农垦总局会有人来接待我们，但是到了以后并没有人来，我们就傻了，没方向了，到底到哪里去？一气之下，就派了10名代表，有我、范文成等一些同志到了自治区农垦总局。当时是陈×主持工作，他是兵团副司令，看到我们来了，办公室有两个门，他马上溜进去了。我紧跟了进去没找到他，他从另外一扇门跑掉了。

这是农垦总局的行政办公室，里边有两个上海青年，一个是办公室主任，一个是科员。桌子上压了一份文件，上面写着“绝密”，是新疆农垦总局发给自治区党委、公安厅、农垦部、国家公安部等单位的文件，里边两个内容，一个是现有上海发来的商调函三百多封，我们认为会影响上海知青的情绪；第二个是说要把这些上访代表全部抓起来。

办公室里那两个上海青年早已回避走掉了，他们把文件留在那儿可能是有意的。我们的人看到这个文件都很气愤，当时就要拿走，被我立刻制止：“同志们，这个东西不能拿，你一拿肯定就钻了套了。”但是我们怎么跟刘济民、贾大秦交涉这个问题呢？很简单，10个人，每个人背一条，反复背几遍，出来以后按记忆复写了三份，张一娟一份，范文成

一份，我一份。我吩咐，这个东西一定不能扩散，一扩散就会造成上海知青的思想混乱，我不是怕负责任，但这是一个相当有煽动力的东西，公布出去，这就是闹事的根源了。这个文件多亏放在了桌子上，但谢××还是要拿我兴师问罪。

我认为，这件事应继续跟他们交涉，就把农垦总局的保卫科科长请来，对他说：这件事，你们已经严重泄密，这个责任你们是要负的。我严正指出，你们这是搞的阴谋诡计！怎么一回事？他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说，这个文件我们复写了三份，但是不会交给你的，我们要跟钦差大人刘济民交涉。你们的初衷就是设置障碍，讲话不算数，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你们有什么权利不执行党的政策，还要把上海来的商调函退回去？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们要抓我们？

半夜里，自治区公安厅的一个什么处长来了，“哪个叫杨清良？”他说，“我们只叫你一个人。”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好几个公安厅的人说：“你要把复印的东西交出来。”我说：“不可能交给你，我不跟你说，你还不知道你们已经犯了最严重的错误了，是我在给你们拨乱反正，你不要搞错了，你休想要我交出来，不可能交的。我可以给你讲清楚，只复写了三份，不可能多一份，我杨清良负这个责任，如泄密出去了我负责，造成重大后果我负法律责任。但是我必须严正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你们这样的做法太可悲了，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他们说：“今天你非要交，不交出来不行。”“我给你讲明了，今天不可能交给你，永远不可能交给你，要交就交给刘济民这些同志。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我们见过面。你们说的嘛，不穿小鞋，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可是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大概到深夜三点钟，他们一看不行，甩下一句威胁性的话就走了：“杨清良，今天给你严正地说，你不交，出了事，你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我说：“你们放心，我杨某人已经豁出去了，任何责任我负，绝对不会造成任何后果的，放心好了。”

所以，在巴州二十九团会上，谢××就点了我的名，“杨清良，盗看盗抄国家机密文件”。实际上，这次会上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他们以为，上海青年是安心的，只是少数人在闹回城风。没想到，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那些党员干部们，大家共同一个呼声，指责兵团和农一师不遵循党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我们本来是想好好在这里干一番事业，但是对于这种状况感到害怕，我们也想回去。”后来我们打听了，与会青年的发言，使自治区领导最终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不是自己生养的总是养不住。人家是家羊，我们是野羊，我们是野种……他们认为最能为他们讲话的那些人，这回都不为他们讲话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感到很无奈。

当初，在分析我们会不会上访的问题上，国家农垦总局就存在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肯定会来的，现在没来，是因为还不知道云南农场的事。另一些人却断言，不可能的。他们还派了巡视员、社会调查员到上海火车站，向上海市委了解情况：新疆上海知青回家探亲带点什么？看到有的青年买了家具带回新疆，一副安居乐业的样子，还拍了照。等到我们进了北京，他们就说：你看看，他们不是来了吗？不可能不来的，这是势在必行的事。这样一来，那些判断失误的人，就显得有点儿灰溜溜的。

为了争取返城，我们付出过长期和艰苦的努力，1979年的上访，只是其中的一段插曲，充其量只能算不是尾声的尾声吧。第一次上访不成，以后才有第二次上访的创议。第二次上访失败，以后才有“阿克苏事件”的爆发。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有它的前因后果，这使上海知青在历史的年轮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

[1]国发［1978］104号文件指《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其中《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中发［1978］74号文件包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两个文件。文件规定，在强调对国营农场的知青采取稳定方针的同时，也允许通过顶替或商调等途径回城。

[2]《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草案）》（1978年7月11日）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需要招收的子女，原是城镇知识青年，现已是国有农、林、牧、渔场正式职工的，可以商调，国营农、林、牧、渔场应给予照顾。

[3]顶替政策是特殊时期的产物，其沿革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第815—818页。

[4]“臭老九”，“文化大革命”中歧视和迫害知识分子的蔑称。他们被放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这八类人之后，因称“臭老九”。

[5]详见《国务院对新疆自治区和上海市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问题报告的批复》（1981年5月28日），即国发［1981］91号文件。

[6]“三老四严”是大庆油田职工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口号。“三老”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指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7]按国家农垦总局［79］国垦办字232号文件，4月28日张主任的讲话要点是：当年上海青年进疆是正确的，回上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要大力宣传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农场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是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上海青年中个人和家庭确实有特殊困难需要解决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新疆和上海协商，个别解决。

[8]1976年清明节（4月5日）前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和

专制主义的抗议活动。

[9]刘济民：《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载《纵横》2002年第6期。

“中国的事，‘哀兵必胜’”

——庄伟亮口述

采访人：刘小萌

时间：2002年2月24日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北里18号楼

［采访前记］　20世纪7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并不意味着知青问题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一方面，大多数知青陆续返回城市；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留在当地就业。知青留在当地后，在住房、工资收入、医疗、子女教育、婚姻等方面遇到许多新的问题。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坚定了他们返城的决心。但巨大的阻力和障碍，又注定了返城之路的艰难。

20世纪80年代中叶，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掀起的要求返城活动几起几落，前后持续两年之久。他们采取上访、请愿、写公开信、组织万人签名、集会、静坐、游行、出版刊物、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加快了遗留问题的解决，最终圆了返城梦。在中国知青史上，这是最后一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

1994年，因为编写《中国知青事典》，我尝试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事件。第一次采访是在我家，参加者有尚焰、庄伟亮、李世和、黄和平以及陈君远、孟庆辉、曲守国等人。守国是我小时的同学，同校不同级，经常在一起玩“官兵抓贼”的缘故，混得很熟。“文化大革命”后上山下乡，我去了内蒙古，他去了山西，人各一方，因两家住在一院，仍断不了见面。跟山西知青的关系，就是他帮助搭上的。尚焰曾任原平县肉联厂厂长，作为干部，不便在请愿活动中抛头露面，但背地里为知青出谋划策，提供方便的事没少干，属于“高参”一类人物。世和是致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公开信的第一签名人，对活动的发动起了积极作用。和平是知青的“九评”——《历史的回顾，深沉的反思——上山下乡如是说》一文的主要撰稿人，为从理论上论证知青返城的合理性做出了贡献。伟亮为人正派，敢说敢干，是重要的实干家；善于交际，在上访过程中，甚至还交了些“不打不成交”的官场朋友。有关资料，包括一些照片、小报、录音带，大部分都是伟亮提供的。后来，我根据这些资料和访谈写成《山西省原北京知青的返城活动》一文，载入《中国知青事典》。[1]尽管篇幅有限，应该说，在正式出版物中，这还是第一次正面记录并肯定了北京知青的活动。



在李世和家（右起王莹、门冰、李世和、庄伟亮）

1995年，在丰台路口55号杨存承包的饭店，与山西知青第二次聚会。那次与会的人较多，大约有十七八个，在山西各地插队的都有。杨存也是请愿上访活动的一位重要人物，有名的“铁嘴”，与当局办交涉，以言语犀利、反应灵敏闻名。

2002年2月3日，在王府井北口李世和家，我们再度聚首，在座的有庄伟亮、王莹、陈君远、杨存、周云安、李世和夫妇。王莹是我景山学校的老学长，他是老高中毕业生，后来在当地任中学老师，知青第一封公开信就出自他们几位学究的手笔。云安是伟亮的夫人，返城后做会计工作，虽然是初次见面，但通过伟亮平日的言谈，早知她是位颇不简单的女性，在请愿活动中，夫唱妻随，始终是活跃而坚定的人物。新老朋友济济一堂，自然高兴异常。这次聚会的目的，是给当年上访请愿的过程“梳一梳辫子”。毕竟是十六七年以前的事了，个人的记忆已有些模糊；再说，当年大伙都是一边上班一边参加活动，分身无术，难免顾此失彼，某甲参加了上一次活动，某乙参加了下一次活动。为了比较全面地记录这段历史，需要当事人坐到一起，把情况凑一凑。这次访谈，我做了现场录音，为这段历史理清了脉络，补充了一些珍贵史料。

除了三次大的聚会，平日里与伟亮、尚焰等人保持着来往。伟亮返城后，先在某汽车公司做过劳资，后来与几个知青在郊区合伙办过养殖场，以后又搞销售。事业上的发展似乎不是很顺利，但他每一次面对困难挫折时的勇气，以及为朋友侠肝义胆的作风，都很令我钦佩。尚焰办事勤恳塌实，有能力，能吃苦，返城后从街道的市场科长干起，一路升到区劳动保障局局长。尚焰的祖上在清雍正朝做过内务府总管之类的大官，据说后来受人陷害败落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到清末还维持着世家大族的架势。今天朝阳区三元桥北有个“尚家楼”的地名，就是他家的祖坟地。尚焰是真正的八旗子弟，喜欢清史，而清史、满族史又是我研究的领域，这成为联结我俩的又一条纽带，因此来往不断。我写的一些清史方面的书，尽管很学术，总是送他过目；他也翻箱倒柜，找出珍藏的《尚氏宗谱》残卷，供我研究……

在这种不断的交往中，使我对这一知青群体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当然，集体式的访谈与个性化的口述并不是一回事。2002年2月24日，为了完成《中国知青

口述史》一书，我又请庄伟亮单独做了一次口述。

北京知青的这次请愿，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个像丁惠民、欧阳琏式的领袖人物，而是由若干核心人物遵循民主原则进行指导。这是这次活动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代知青在政治上更趋成熟的表现。但这种状况，也给选择口述对象带来一定难度。我所以选择伟亮，除了赞佩他的人品外，还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他是这次活动中参与核心工作时间最长、态度最坚定的一位。为了知青利益，他频频往来于京、晋，奔走于基层，因为长期误工，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至于政治上的风险，更是人所共知，但他终不为所动。伟亮的另一优点，是有功而不倨傲，始终强调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我想，这也是客观描述这段历史的必要前提。

北京知青的请愿活动持续时间长，一波三折，其中重要事件如1984年12月第一封公开信的起草、签名和第一次进京上访；1985年4月下旬在北京市委门前的请愿静坐和当局的施压；1986年春节前夕知青代表到北京市政府“团拜”以及随后的羁押；1986年4月第二次公开信的发表与征集签名；10月26日在省会太原举行的知青大游行和省委门前的请愿集会，以及许多饶有趣味的插曲，在伟亮的口述中都有翔实、生动的描述。[2]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山西北京知青的请愿上访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早在1982年春，一些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就开始串联，筹划集资到北京上访，要求返城。提出返城的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广播报纸天天宣传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产物，该不该否定？既然“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就应该让所有知青返回北京。当局的答复也很干脆：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提出的，与否定“文化大革命”挂不上。[3]1983年6月4日全国六届人大召开之际，陕西的北京知青金克刚等六人到北京市政府集体上访，声称代表一千多知青，反映地方病、父母年老无人照顾等问题，强烈要求返京。他们还到其他省区串联。不久，在延安工作的北京知青再次派代表到北京上访。[4]与此同时，在东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也不断有知青进行各种形式的请愿上访。

相比之下，山西省北京知青掀起的请愿上访活动，更有规模、更有组织、更有理性，所以才能后来居上，为中国知青史上最后一波返城风，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一　“不幸人”的陈述

我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在1968年的11月29日离开北京到山西去的。这里插一个小段子：后来由北京市劳动局给我签发的回北京调令，盖公章的时间正好是1988年的11月29日。这就是说，我整整在山西待了20年，一天都不带差的。

我们插队的地方在山西省忻县地区忻县秦城公社前秦城大队，地处山西省五大盆地之一的忻定盆地。抗战时期著名的“忻口战役”[5]就是在这儿打的。历史名人中最杰出的一位是元好问[6]，可谓人杰地灵。

我们村有七个男生，都是同班同学。在村里的几年，大家相濡以沫，至今仍保持着纯真的友谊。在招工问题上，公社、大队让谁走，谁就走，绝不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我们有一个明智的决定：大家

都送礼，等于谁也没送。

进村第二年，来了军宣队，关系始终挺对立。他们抄过我们家（知青点），抄走几本书，记得有《红楼梦》、《幽谷百合》等，不过把《水浒传》之类的书留下了。抗议了好几天，无济于事，也不出工了，一怒之下就回了北京。后来，在几个公社联席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军宣队头头臭骂了我们一顿："……逃跑了，逃到哪儿去？逃到台湾去？我们还要解放台湾呢！"逃跑是指我们没请假就回了北京。

人员变动基本上是从1971年开始的，参加国家分配工作的走了几个人，还有几个投靠父母干校的，1972年又走了几个。我记得，1973年招工有过一次"冻结"，这一"冻结"就把一些人给"冻"在这儿了。[7]这个期间，只有几个女生通过各种渠道回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仍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都在当地就业了。当时来说，山西省的工业基础也还可以。

关于自己这段时间的经历，不想多谈了。要说坎坷，许多知青的经历比我还坎坷，这里想着重回顾的，是80年代中叶仍然留在山西的北京知青为争取返城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到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作为这场民间活动的亲历者，许多激荡人心的场面就像发生在昨天。在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泥沙沉淀了，闪光的东西却永远光照后人，在中国知青史中，不能缺少我们这一段荡气回肠的篇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共有三万多知青到山西农村插队[8]，同期，还有七千多天津知青在当地落户。70年代末，他们大部分返回了原籍城市，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被就近安置在当地。知青就业后，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婚姻等方面遇到不少实际困难。有的人已年近不惑，长一级工资后才挣38.4元。不少基层企业经营不景气，职工收入低且不稳定。每年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抠出一部分"赞助"铁道部（采访者按，指回北京往来路费）。不少北京青年曾尝试通过对调途径回北京，但对调一个户口按常规要付给对调方3000元，这对月收入只有三四十元又肩负养家餬口重担的人来说，显然是个近乎天文的数字。久而久之，不安其居的念头愈演愈烈，不满情绪也在滋长。[9]

影响深远的北京知青请愿活动，最初是从我们忻州地区发动的。

1984年10月，山西电视台播放了根据梁晓声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今夜有暴风雪》，东北兵团知青昼夜间大举返城的壮观情景使我们这些仍旧留在忻州的北京青年浮想联翩，长期蛰伏心头的思乡之情一下子迸发出来。

我们认为，在前些年里，在当地插队的高干子女基本上“靠权”都回了北京，家境富裕者“花钱”回去了，善于“出卖灵与肉”者“走后门”回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无依无靠、无门路可走的普通百姓子弟。此外，生活中一系列具体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是引起我们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

适逢其时，中共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既然“文化大革命”都被“完全彻底”否定了，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为什么不能否定呢？1984年11月，首先由忻州地区原平县的北京青年开始酝酿返城的事。第一次会议是在原平中学开的，在原中任老师的王莹是原北京景山学校的老高中生，由他担任会议召集人。会上，大家提出：应根据众人意见，写一封致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公开信，强烈要求返城。会后，王莹、陈君远（铁路中学教师）、范立人（铁路中学教师，回京后继续教书，毕生兢兢业业从事教育，已于2001年病逝）等人执笔，几易其稿。

原平是忻州地区14个县里最大的一个，工业基础比较好。原平距忻州市（原忻县）很近，所以这个信写出来以后很快就传到忻州来了。传过来时，已经有260多个人在信上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是李世和。[10]

在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及领导的这封公开信中，知青们自称“曾经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信中提出了要求返京的五条理由：（1）知识青年“再教育”运动，完全是“文化大革命”产物，必须彻底否定。（2）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当初是被迫下乡的，应该给他们落实政策。（3）同样是知识青年，结局却迥然不同，实在不公平。（4）不能与老父老母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尽儿女的孝心。（5）留在当地就业后，遇到许多实际困难。一天不回北京，一天不能摆脱辛酸悲凉的处境。

这封信道出了北京知青的心声，要上访、请愿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忻州，这封信也在知青中广为传播。11月初，我和王有利去了趟原平，决定在全地区知青中发动签名。以后的日子里，忻州知青频频在我家聚会，一般时候四五十人，晚上，排在楼下的自行车车把，在灯光映照下，白花花一片。我是不怕的，领导也不是没有找我谈过话，山西人讲话：“你这是闹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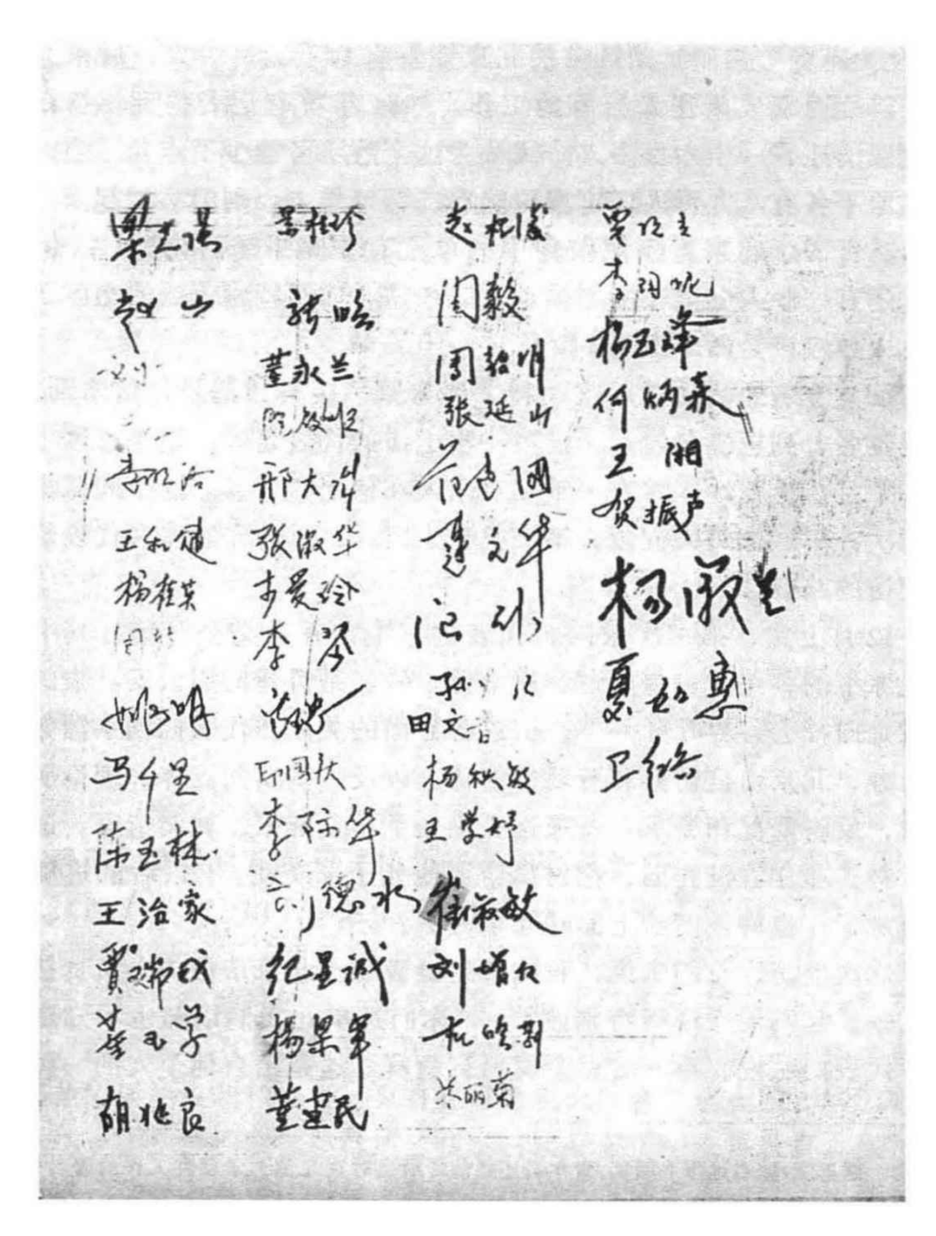
忻州地区共14个县，90%的北京青年集中在忻州、原平和定襄三个市、县。别的县也有知青，但路途特别远，坐汽车要一天。因此，忻州地区的请愿活动始终以这三个县的知青为主。

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

公开信

忻州地区存档（注意切勿丢失）

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



公开信上知青们的签名（其中的一页）

“文化大革命”初到忻州插队的北京知青有八千二百多人，后来大部分人陆续返京或调往太原等地工作。1984年曾有记者提到，留在当地就业的还有一千六百多人。我认为这个数字可能少了点儿，当时忻州和原平各有八九百人，定襄可能有二百来号人，别的县加起来也就是一二百人。北京青年比较集中的单位有铁路系统、化肥厂、钢铁厂，还有一些人分散在基层供销社、粮站，以及特别偏远的地区，估计总人数应该是两千出头。

征集签名的活动进展很顺利，从与原平接头，把公开信拿回来，组织签名，到把签名收回，定第一次上访的代表名单，整个过程也就是一

个月。忻州地区共有一千二百余人在信上签了名。这中间募集捐款两次，第一次每人五角，第二次每人两元，作为印刷费和代表们进京上访的路费。

12月上旬，第一次派四名代表进京上访并递交公开信，其中三名是原平的，王莹、赵广财和褚培德，一名是忻州的周云安。去的目的就是向社会各界呼吁一下，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代表们到了国务院信访办、北京市信访办和劳动部信访办以及一些新闻媒体、理论研究单位，反映情况和要求。还通过关系去了邓立群家、林涧清家，递交了材料，邓立群没露面，把材料给了他儿子邓英淘。[11]以后的进展就不清楚了，也许他们给上面呼吁了一下？

这次上访，总的来说，我们感到挺满意。北京市信访办负责接待的老张，起码他表现得特别热情："你们这事儿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他听代表们一说，再一看那个材料挺新鲜。这是出自他个人的一种同情心，出自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他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们一定及时准确地向上反映，具体以后怎么办，要等上面回话。实际上，这只是一位具体工作人员对知青命运的关心同情，但大家听说后都特别感动。因为这是第一次上访，不可能给你什么答复的。

四名代表返回山西的第二天，由刘文琦带到我家四个临汾知青。大概这四个人都是打篮球的，个个五大三粗，都在一米八五以上。他们是来了解忻州知青活动情况的。临汾也在传播原平的《公开信》，大家很关注事情的进展。我们把此次上访情况及忻州知青的状况介绍了一番。从此，山西一南一北，两大阵营初见端倪。

这时，在忻县、原平、定襄的北京青年间，基本上已形成一个联络网。代表们回到山西后，我们通过网络传达了这次上访的信息，并动员忻州知青给省内其他地区知青写信，寄上有关资料，积极扩大各地知青间的横向联系。同时规定：尽量不要跟外省的知青串联。因为在官方眼里，"串联"毕竟是件犯忌的事，本省之内虽然也叫串联，怎么也好一点儿。事实上，我们从始至终确实没有主动跟外省联系过。

另外，在第一次上访之前，我们还定了一条对外宣传的统一口径：强调知青被送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要用"上山下乡"这四个字。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你如果扯起来就扯不清了，因为从50年代就已经有了。再往远了说，从秦皇汉武那时就有了，屯垦戍边是历朝历代都做过的事，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秦皇汉武那会儿没听说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再说了，任何一个阶层，都没有教育其他阶层的权利和义务。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属于中断学生学业，把他们整批整批

地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性质上来说，这种下乡跟“文化大革命”前的下乡确实不一样，以前的学生，在分数面前基本上还是平等的，至于出身方面的歧视，是从1962年以后开始强调的。20世纪50年代，你要是有本事考上大学，一般来说政府还是让你继续深造的。

1985年元旦，在原平县租了一个大礼堂，召开忻州地区知青会。大会组织得挺好，拉着横幅大标语。忻州地区知青到了好几百人。会上王莹他们都讲了话。当时属于宣传鼓动期，把知青的要求强调一下，主要是增加大家的信心。

会开完，决定派第二批代表进京上访。这样的上访在以后几年里几乎没有中断过。在知青历史上，第一次上访是肯定要提的，因为它具有开创意义。第二次上访为什么要提一下呢？因为这次上访的结果，把整个知青群体都激怒了。

第一次上访时，只不过是个别接待人员对待代表的态度比较好，情况反映上去以后，意见很快就反馈下来了。一月初，第二次进京上访，代表换了一拨人，一共去了四五个。我们忻州去的叫李志平，是运输公司的。有关部门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整个都变了。给代表的答复实际上就只有一句话了：“你们已在当地就业，不是知青了。”北京市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都是这么答复的。他们还说：“你们要回北京，只能走劳动部门内的职工对调。”

关于对调，劳动部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照顾夫妻两地分居，如果夫妻都在外地，基本上就没这个可能。当然，如果你是搞高科技的，北京某个科研单位或大学需要你，也没准儿给你两口子网开一面。但这是另外一回事，跟我们这些人完全搭不上。

第二次上访等于挨了一闷棍，代表们回来一说，大家很气愤。把牵涉到全国两千多万人的知青问题，像割阑尾一样割掉，就轻而易举地没事了，天理不公啊！看来，单纯依靠上访申诉这个途径，要想达到目的很难，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刺激一下。具体日期虽然没定，但是在北京搞静坐这事已经基本确定了。这期间，一是在全省各地知青间加紧串联，二是在本地知青中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这里牵扯着一个什么问题？你到北京去参加游行上访，一去几天，要到单位请假，还可能承受各种压力甚至打击报复，所以提出这么一个口号，目的是让那些留在本地的人为去的人承担一部分经济损失。

我们在忻州体育场租了场地，召开动员大会。原定由两个知青在会上做主要发言，临开会，这两人却作蜡了。我是大会主持人，并没有安排发言，一看没办法了，说：“我来吧！”就硬着头皮讲吧。主要提出一

个观点：采取这次非常行动，就是要“砸锅卖铁”，反正咱们也不过了，好歹就是它了，剩下的事，只能走着瞧。会上还提出了类似“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有枣一竿子，没枣一竿子”的论点。孰不知，会哭的孩子还老挨打呢。政府毕竟不是枣树，对平民只有“给予”的恩赐，决没有让你“争取”、也就是把枣打下来装进兜里的可能。这些都是以后几年陆陆续续明白的，虽然晚了点儿，但明白总比不明白好。当时心里只是明白，采取非常行动以后，很可能会“折”进去。但这些后果实在不能多想，想多了咱干脆都回去上班得了，谁也别干了。

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展开集资，集来的钱绝对是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在北京的行动，当时还没决定行动的具体方式。一个知青集10块钱，忻州市集了将近5000块钱，就是说有将近500人各出了10块钱。全市估计顶多也就是800北京青年，还有一些在基层乡村的，那些人加起来也得有一百多号人，说明在市里的知青有80%的人出了钱。

在北京的行动，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作为个人，你有多大的应对能力，又有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知青形象地把此次行动比喻为“麻秆打狼两头怕”。我也说了这么一句：知青这件事，是“炒了豆子大家吃，砸了沙锅一人赔”。

二　“小平同志救救我”——北京市委前的八天静坐

整个3月我们都是比较忙的，天天出去开会、串联。25日，以太原为中心召开了一个小型秘密会议。迄今为止，关于这个会，除了我们几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会议是在太原市一个知青的宿舍里开的。全省各地区都有代表参加，每个地区一两人。这次会上，把组织静坐的时间、静坐规模，包括怎么应对官方逮捕措施，都定了下来。这个会是知青活动中非常关键的一次会，后来发生在北京的大规模静坐活动，产生了轰动效应，这次会议是始作俑者。[12]

在全省统一行动前，我们忻州决定提前搞个大规模上访活动，祈望能在这次上访中得到有益的答复，这样就可以避免全省活动，造成直接的对峙。

4月15日上午8点，我们忻州地区二百多人来到北京市信访办，地点在长安街南正义路，路东第一个门，正义路1号。在那儿待了一整天，也没人搭理。说没人搭理也太冤枉他们了，还是信访办的那些人。我们进到东屋第一个门，当时就提出：我们这次来，你们就别糊弄我们了，我们要求见市级领导。这样就僵持住了。市级领导不出面，我们也不愿意再跟底下的人谈。二百多人中的一部分待在院子里，一部分在外头转悠。直到下午四点，一看仍没有动静，我们就让大家整好队，两人一

排，贴着正义路东边的墙根，转向市政府大门。

到了市政府门口，我们贴着墙根站好了，向警卫声明，我们是山西的原北京知青，要求市长接见。那段路没有马路牙子，就是很窄的一条马路。一会儿到了下班高峰，路过的人多起来了，有骑车的人也下来问一问情况。《中国青年报》有个叫马北北的记者，在现场采访了一些知青，这篇报道后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内参上。[13]入夜，我们这些上访者各自回家，准备第二天早晨重新到市府门前集合。

16日一早，临汾和长治的一些知青加入进来了。但他们没有组织，有的是到信访办要求解决一些问题，有的纯粹是路过。互相一介绍情况，他们也挺兴奋，就参加进来。他们的人数很少，不会超过20个人。

上访是件艰苦的事，要耐得住寂寞。有个叫刘春鹏的知青，他有点按捺不住了。我们当时讲："只要市级领导不出来，咱就天天来！"他振臂一呼说："甭跟他们废话，咱们上市委门前台阶上坐着去！"一下子还真带走了三四十人。

上午九点多钟，市委终于传出话来，说封明为副市长准备接见我们。最初允许我们派五名代表，但别的地区也要求有代表参加，这样我们就提出派九名代表，他们挺痛快就同意了，这样九个人就去了。这九个人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我们忻州地区有何德全、刘旭东、章润林、于焕生、周云安。

封明为接见九名代表，公开宣布"三种人"政策：即婚后两地分居者，未婚者，双方均是北京知青而一方丧偶者，可以调回北京。[14]此前的五个多月里，滞留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曾五次派代表进京上访，十一次发出请愿信，均无明确答复。至此，"三种人"政策的明确出台，首先满足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愿望，但这类人毕竟不多，对大部分人来说，仍旧返城无望。所以，封副市长话音刚落，刘旭东就说："如果必须是三种人才能回京的话，我回山西就自杀。我自杀以后，爱人不是就算丧偶了吗？就可以带着孩子回来了。"封副市长急忙说："你可别价，可别拿这个要挟我。"

代表们事先有一个准备，谈到解决知青户口问题时，如果北京市认为困难太大，就提出让我们的父母与我们的子女对调户口。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个设想，封副市长听罢哈哈一笑：这可能吗？你们的孩子在北京，你们留在那儿。但是也不排除考虑，现在还不能给你们答复。

特别重要的是他当场宣布：针对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北京市

决定派一个调查组到山西去。我们去找你们，咱们在山西坐下来好好谈。

这是一个挺令人振奋的消息，北京市委也是咱们的父母官，现在父母官主动跑到你那儿去，和你们这些小民们去谈，解决你们的问题，大伙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代表出来把谈话内容传达后，大家特生气。因为他把回城的口子给你封了，说回北京是不可能的，就只限于“三种人”，当时忻州地区参与上访活动的几乎没有属于“三种人”的，所以都很不满。即便如此，还是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回去后向大家如实传达，好好做一些准备工作，把要求一、二、三条详详细细地列出，等候北京市调查团的到来。

正好有临汾两三个知青凑过来，我记得有一个人说：“我们临汾地区现在在北京的知青，不上班在北京泡的，或上访、找对调、找路子的，这些人不下千人。我们稍微划拉划拉，至少弄他500人到市委来。北京市说派调查团去山西，绝对是个缓兵之计。”我们的意见是：“他再是缓兵之计，你也得让他缓这一下呀。”他们又提议：“一个礼拜之后，就是4月22日，我们就在北京游行、静坐。怎么样？”一听这话，咱也不能说你们别搞这个，你们愿意来就来吧，当时只是答复说：“我们肯定要配合你们的，那边北京市委调查团，我们也得接应着，这边你们临汾知青要到北京静坐，我们肯定要策应的。”

4月16日下午散了以后，我们忻州八九个知青，在东单公园里开了一个会，基本上定了一条：一部分人继续留在北京，另一部分回山西，如实传达跟封明为的对话情况，还包括临汾知青的计划。准备到时候给他们策应一下，定的人数就是100—200人，有这点儿人就够了，他们不是号称最少500人吗？咱们也别显得太没人。事情就这么定了。

但是这个事儿后来给闹拧了。有个代表回去传达说：“咱们得接着闹，两丁抽一，两个知青就得去一个。”这情况咱当时也不知道，用当时知青的话，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1日是个礼拜天，下午1点，准备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中山公园举行所谓“南北会议”，“南”指临汾，“北”指忻州，这两个地区知青将是请愿静坐的主力。我在天安门广场，老远就看见王莹过来了，一副兴冲冲的样子，握着我的手说：“这回组织得特好！我们原平出三百多人，你们忻县也得三四百人。”当时我就愣了，说：“人家临汾闹，咱们策应一下，来这么多人干嘛呀？”我觉得人家封明为已答应派人上我们那儿去，你这儿又大闹，于情于理，有点儿说不过去。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

在中山公园参加会议的“北边”代表有王莹、君远、世和、杨存和我，“南边”代表有五六人，大家齐集来今雨轩，后来发现有人跟踪，担心他这儿安个窃听器，那儿给你弄点儿什么，就向西转移，坐在一个空旷的草地上，起码50米内，人过不来。我们十来个人围成一圈坐下，对第二天静坐做了最后部署。

从4月22日到29日，在山西的北京知青在市委门前共进行了八天静坐。这是山西知青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为什么说影响最大？因为这次事件上报了，上广播了。你再怎么折腾，也不如上回电视上回报纸，全国都能知道。否则，你自己再造声势，影响面也小得多。

4月22日上午8点，我们集合在正义路一号市信访办门口，清点一下人数，一共是七百多人，而且这七百多人里，六百多人是忻州的，别的地区加起来也就是百来号人。当时真有点儿撮火，我们是让人家给耍了，他们咋呼半天却没来多少人。不过话又说回来，24日以后，他们的后续人员又陆续来了一些，正好抵补了我们忻州知青人数越来越少的空当儿，使静坐人数始终保持在每天300到500人。这都是后话。

清点完人数，我们按头一天计划，把队伍从信访办拉到市委门前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是走东交民巷，一条是走长安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没有走长安街，而是领着队伍头朝南到了东交民巷，往东折到台基厂，再往北一拐就到了市委门前。

到了市委门前，大伙儿一下就把台阶上坐满了，台阶上坐不下，剩下的人也都特别有秩序地在两边儿站着。队伍从正义路一号起动时，说实话，我们几个心里都有点肝儿颤。他万一派军警阻拦你怎么办？我们给大家交待：如果阻拦你的话，就地站住，他不让你往前走，你就别走，千万别愣闯。如果他要把人带走，把谁往警车上架，跟他走就是了。剩下的事儿咱们只能走着瞧了。但有一条，咱们几个头儿，一定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意思就是：遇到情况，尽量别让知青兄弟受伤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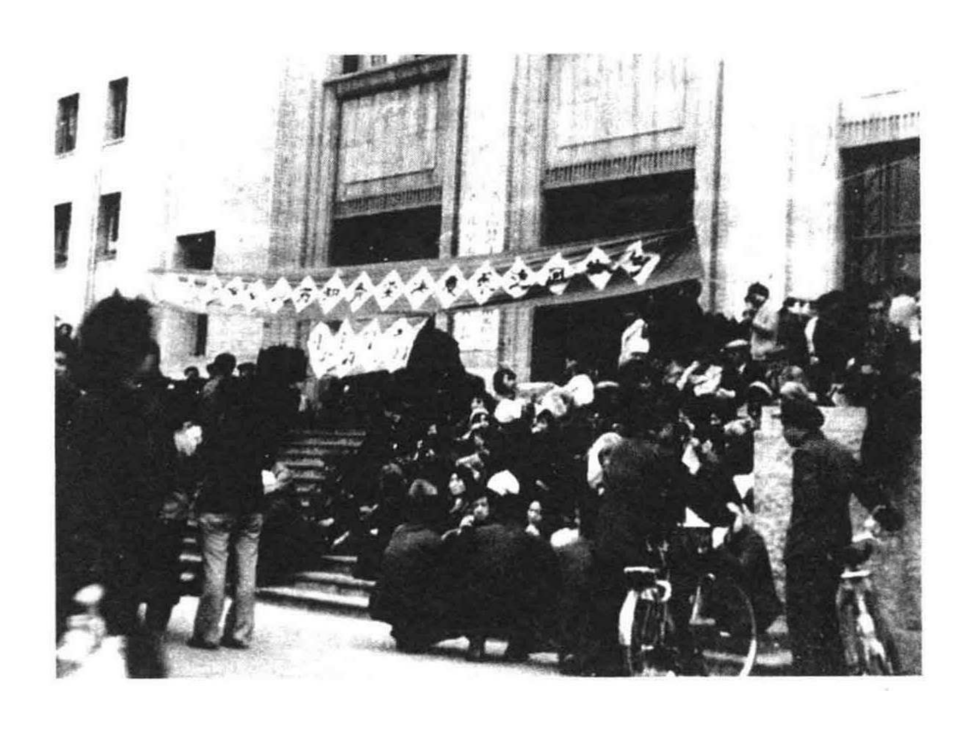
哎，还挺好，一路上没人阻拦。往市委门前台阶坐的时候也肝儿颤，人家路上不拦你，“好哇，你坐到我们家门口来了”！这人家可要说话了。当时就把台阶坐得满满当当的，连个走道的地儿也没留，里面进出的人就这么跨来跨去。

这样坐了一天。你看那些知青，男的女的，穿的服装，又不统一，什么打扮的都有。市委大楼前那条马路通过的103、104路电车，终点是北京站，无论是从北京站出来的还是进站的，客流量挺大，好多行人也停下来看，有的问：“这是旅游团？”说旅游团也不能坐这儿呀！大家坐在那儿也不说话。当天就有国内的新闻记者采访，我记不得是什么报

了，好像是经济类报纸，记者就跟知青聊：你们是哪儿的呀？到这儿干什么呀……

下午两点，副市长封明为、市劳动局长龚树基等接见九名知青代表。封讲道："今天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九个负责。"九名代表出来后，站在台阶上向大家介绍刚才接见的情况，令大家最不满的是封明为说的一句话："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的？"这句话本来也有前言后语的，现在被单摘出来，就被赋予了"你们活该倒霉"之类的意思。中国人不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但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知青听了能不生气吗？

在八天静坐期间，我们每天都和上班一样，上午8点到，下午5点散伙。散伙后，我们几个还要到东单公园开一个总结会。总结当天的情况，再把第二天的活动安排一下。在22日的会上就商定了，第二天要挂出大标语，内容是："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强烈要求返回故乡！"这横幅是委托我们忻州知青去做的。那字写得真漂亮，来来往往的人谁见谁都夸。据说笔者是书法这方面的世家。



在北京市政府前请愿

第二天上午就把横幅挂出去了。说实话，什么都怕第一次，横幅是我、褚培德、刘旭东几个人挂上去的，挂得时候也肝儿颤，人家不让你挂怎么办？等你挂完了，人家把你拧巴拧巴抓进去怎么办？市委大楼前面正好有两根柱子，一边一拴，上边一勒，拉直就行了。

这天有个什么伤心事儿呢？第一天七百多人一下子骤减到三百多人，少了将近一半儿。实际情况是：好多属于“三种人”的知青参加了第一天静坐，第二天就忙着办手续去了。饶了他们来回还挣你的10块钱车钱。我们当时集了将近5000块钱，各县报销各县的，人家来了哪怕一天，你也得给他报销车钱。我们忻州定的是，参加静坐的知青给报销往返车票。每天中午，用集资款给大家买个面包、买根肠、买点儿饮料。大家到这儿来，一是挺辛苦，二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风险来自各方面，不是单纯让警察逮捕抓走的问题，回去后还可能受到单位的压力，这都是风险。所以，我们用集资款给大家买这再简单不过的三两块钱的一顿中午饭，使大家心里感到有点儿温暖。当天，市委还抬出来个保温桶，让静坐的人有口水喝，挺有人情味儿的。

从第二天开始，还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外国记者开始进入现场，看老外那个架势，来了不下十拨，真够多的，人家互相之间配合默契，咱当时也看不懂，见他们手里举着一个“锅”，估计那是做现场直播呢。当时心里特紧张，因为咱们毕竟是受传统正规教育长大的，深知两个“无小事”，一个是“京城无小事”，一个是“外交无小事”，您这回可是两个“无小事”都占上了。马上就宣布了一条纪律：不回答外国人的任何提问。这点大家基本上都做到了。别到时候再弄上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那天，从市委大楼上面掉下一块大玻璃，正好掉在人群中。大家起初以为是挑衅，后来见大楼里跑出一干人，嘘寒问暖的，紧着问伤着人没有，态度挺真诚的，不像是在表演，也就没再追究。我们知青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嘛。第二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三天是24日。在大红标语底下又挂了一个小标语，上面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是我们忻州地区挂的。临汾地区知青在两个侧面也挂了一些标语，可惜具体内容记不太清楚了。这天，知青的情绪有些波动，一部分人决定要到天安门去。既然市委认为我们是“赶上‘文化大革命’了”，是活该倒霉，那“三百两纹银”也不要了，找该算账的人算账去。原话应是“找死人算账去”。市委里有领导出来喊话，厉声斥责到天安门去的行为。警告知青们，承担一切严重后果。

每天都坚持着坐下去，到了26日是最惨的一天。早起8点一看，几乎都快没人了，就剩下一百多人了。到下午，从运城和临汾直接下来一二百人增援。那场面现在想起来也挺激动的，知青从火车站出来后都风尘仆仆的，直奔静坐现场而来。有些人从山西来时，先得换汽车，然后才够得着铁路呢。这是那边组织好后，赶来增援的。我们忻州也派人回去组织，在26日、27日增加了一二百人的力量。

这期间，官方一直没采取什么强硬措施。只不过在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驰过来一队警用摩托，在现场外兜了个圈子，“嘎”的往那儿一停，好像要抓人似的，突然又调转头，“嘟嘟”地开走了。

26日那天有这么个事儿：我们每天都是早上现挂标语，傍晚再收下来。这天几个人一嘀咕：“咱们总得出点儿新鲜的，今天就不收标语了。”然后派人专门留下，观察那标语到底让不让过夜。结果夜里12点，几个人出来把标语给收走了。当时，外国记者都没走，拍下收标语的镜头。这些记者比你来得早，比你走得晚，要说真够敬业的。

27日早晨我们向市委要标语，知道他们肯定不给，但也不能不吭声呀。这就是4月29日李锡明讲的：你们往我脸上贴了张纸条，我把纸条揭下来。你们说：还我纸条。

到了28日，我们考虑到要过“五一”节了，他们肯定不会让你“五一”节还坐在那的，“五一”节肯定要有纪念活动的。当天下午，我们在东单公园碰头，商量第二天怎么办。最后，决定派代表递一封信，信当时就写好了，大概内容是：为了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五一”劳动节，我们要回山西了，节后我们还来。

当时就是走一步说一步，你都在那儿待了一个礼拜了，也没人搭理你。你再坐下去，说实话，待一个礼拜和待两个礼拜是一个道理。借着“五一”节撤回。

这时有件事，可以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每天都会有消息从大楼里传出来，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看着像工作人员。他有时在那转悠转悠，有时凑到你身边，几天下来，谁是核心人物他也摸清楚了，那天就说了：“你们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今天你们来，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别攻击呀、打砸抢呀。里头正开着会呢，研究讨论解决你们的问题。口不是说封得那么死。”还有人透露：“里面有两派意见，起码有一派还答应要解决你们的问题。”“你要是采取什么过激行动，就给人家脸上抹黑了。”说实话，从第一天就得知里面的一些信息，不断有人把消息反馈出来。我们定了一条纪律，千万不要突然间脑子一热，干出什么莽撞的事情来。

29日，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原本计划散伙后派代表进去递信，没想到中午一上班，市里就通知我们首长接见，整队入场。当时我们太幼稚了，还幻想有什么好消息，兴奋、激动、感慨。但一进到会议室，首长、工作人员个个表情肃穆，满腔压抑不住的怒气。会前，首先宣布会场纪律，反正是好几个不准。李锡明、陈希同先后讲了近两个小时，全面彻底否定我们的行为，说这是“文化大革命”遗风、造谣、污蔑、蛊惑。几十年做法的老一套，无非是有少数人如何如何。[15]

30日的广播和报纸都报道了这件事。我听完广播，还是到市委大楼外观察了一番。只见几十名知青在大楼附近转悠，大家见面惟一的一句问话是：下一步怎么办？

我碰上的几个知青大部分都是前一天进去挨过骂的，他们说起当时挨完骂被轰出来的情景，有种走在大街上老想踢人那种宣泄不出的感觉。我在那儿转了一圈儿，大家交流了一下，就骑着自行车找我们忻州的几个人。找完这个找那个，大家一商量，都买当天的火车票往回返。

三　“中国的事，‘哀兵必胜’”

整个五六月份，组织静坐的核心分子都处于被监控之中，一举一动有人监视。我回到单位后，党委书记和党办主任找谈话，不断施加压力，让写检查。我们几个人碰了一下头儿，究竟写不写？要写咱就都写，统一口径怎么写；要不写咱就愣扛着都不写。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写，但是不认错，甭管他入不入档案，把真实想法写上去，至少作为一个纪念。

当时我是怎么写的？我记得第一句话是这样的：“1968年上山下乡，我确实不是被迫的，但我始终有一种被愚弄、被驱使的感觉。”当年动员去山西插队，我在班里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个报名的。为什么？一来是“底儿潮”（指出身不好），不愿给倒霉到家的父母再增添麻烦。另外，那时17岁，那么多同学一块儿下去，觉得挺好玩的。

我在所谓“检查”中写了这次活动的真正目的。单位的书记和党办主任找我谈话，估摸着我8点上班，7点50分从家走，他们提前几分钟把我堵在家门了。一敲门，我爱人也正要上班，他们说：“你上班去吧，我们跟他谈谈。”我跟他们没什么好谈的。他们走了以后，过了好几天，我发现两个沙发中间有一卷纸，掏出来一看，那上头记的全是揭发我的材料，原来他们在找我谈话前，已经找了玻璃厂几乎所有知青，让他们检举我，是如何造谣蛊惑的。上头写着某某揭发：“庄伟亮说了，咱们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把这一关闯过去，天就亮了。”我一看，挺寒心的，伤感也是有的。他们无意中把这材料丢在我这儿了，后来我们心照不宣，谁也不提这事儿了。那些检举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从来没提起过。

任何一个政府，在决策的时候，都应该同情所谓弱势群体，政权才能得以生存、得以发展。作为现在的政府，也应该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考虑紧迫的社会问题。现在下岗问题，作为政府应该有一个统筹安排，起码让这些人衣食不能太忧了。这都是后话。

话说回来，当我承受压力时，特别要感谢一个人，就是忻州地委秘

书长杨友军，他是地委常委，在此后几年落实知青政策的过程中，顶着压力，为知青做了大量的好事、善事，并开创了当地政府与知青平等对话的先河。任何一名知青，有困难找到他，他从不推辞。在忻州十几个县，有口皆碑。我们之间就知青问题有过一次长谈。他很客观地分析了这件事，强调指出：知青是利益集团。他说：现在报纸上或者上头文件说什么“少数人操纵”，咱们先不说它。知青绝对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政治集团，所以应时刻把切身利益挂在嘴上，切忌卷入政治。利益集团和政治集团有什么区别？利益集团，利益到手，集团就瓦解了。但是只要利益不达到，有个风吹草动，遇到个机会，它又能积聚在一块儿，这是利益集团的一个特征。

当时，中央认为“静坐事件”有上头的黑手操纵，所以，从“五一”开始，调动一切职能，只为“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最终确认根本没有“黑手”，纯粹是知青太想回家了。

在监控最严的二十来天里，很多知青为我们牵挂，有的人每天临睡前总要到我们楼下转一圈，看看是否还有灯亮。看到灯亮着，就放心了。

在接受审查的同时，我们觉着越在危难时刻，越要建立信心，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经过几次彻夜长谈，理清了以下几点，作为今后知青活动的理论依据：（1）首先确认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不是闹事。（2）坚持“不否定知青‘再教育’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不彻底的”。（3）中国的事，“哀兵必胜”。争取全社会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要收敛“气势”。（4）切记急功近利。要有十年、八年的心理准备。知青问题牵扯到几千万人的利益，要允许政府多几年考虑时间。但我们必须“动”，才可能尽快考虑，否则没人会想起你这个已经被扔掉的“盲肠”。（5）认定现政府必须解决知青问题，这届不行下届接着找。当官就必须把百姓的疾苦放在首位，而不是光忙着盖高楼、建大桥。

接着，山西省出台了解决知青困难的六条措施[16]，几乎囊括了知青在山西所有的问题，从工资、住房，到农转非、两地分居。可见，中央的意思，还是要把知青稳定在地方。经过“六条”恩泽的三晋大地，一派喜气洋洋。很多人不光长了工资、分了房子、调了工作，更有甚者，入党提干。我们的压力明显减轻了。

原平县离我们有80里地，那边要说压力也不大。很快到了八月十五，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邀请几个知青骨干到县里，像一家人那样过个团圆节，他说：“我的家不在这儿，也是外乡人，今天咱们一块儿过节。”这个人也挺不错的，给知青木材配额，自行车票。后来担任了山

西省体改委主任。

在新华社通讯里曾提到：晋北地区就是所谓雁北地区十几个县，无一人参加静坐。确实是那么回事，山西省六个地区都有人参加，惟独雁北地区是个例外。当地某领导对知青讲："你们分析这是什么原因？"几个知青还没来得及答话，他自己说出了答案："实际上就是一句话，整个雁北地区没有一个领袖式人物。"人家给的就是这个结论。

到了6月份，忻州地区知青内部风传中央领导万里、胡耀邦等人在5月19日的讲话。到今天为止，我只见过我们自己印的那个讲话，红头文件谁也没见过，但是咱确信讲话是真的。万里的讲话态度最好，他说：发生点事儿，不要老以为是什么少数坏人操纵、有人造谣。问题发生了，先想想我们有哪些事情处理得不够，有不妥的地方，如果我们做工作都这么去想，问题就好解决多了。这是大概意思。[17]

然后，就是劳动部正式下文，知青插队期间计算工龄。[18]在这之前，有的单位已将知青插队年限算入工龄，但这还是"土政策"，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计算插队工龄涉及到上千万人，究竟有没有用？对长级、分房子可能有点用，还牵扯到长工资问题，文件下来以前，这些人的工资肯定偏低，所以可能要长一级工资。[19]

高压政策解除的同时，山西省出台了"六条"，我们又都还阳了。此时，仅就忻州而言，知青对返城活动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先热衷于此的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迫于压力，淡出知青活动，大家都能体谅他们的难处。在现实生活中，能有几个人把用很大精力到手的功名当小曲唱了，当小酒喝了？从此，山西知青的返城活动带上了鲜明的平民色彩，生力军也从忻州转移到了临汾——这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

自"四二九"以来，山西省知青运动属于低潮阶段，大家也没精力去跟北京市接触，但是封明为那次接见留了一句话："你们以后只要来上访，只要是点到我的名，要见封明为，我肯定见。"我提议，不妨再找一趟封明为，于是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上访团，只限于我们地区忻、定、原三县知青，每县出两人。那是1985年8月15日的事儿，一共六个人去了北京。

我们在信访办登记，说找封明为，里面很快就答复说见。进了院子，有一个小楼，楼里有一个挺大的会议室，还是接见九名代表时的规格，在场的除封副市长外，还有劳动局长龚树基，信访办主任赵祐。赵是信访办的一把手，二把手叫秦正安，他们每次都出来。

那次接见安排得级别很高，我们带了一份《人民日报》发表的沈阳军区刘政委的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提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对干部和知识青年的迫害。我们用这篇文章跟他们继续探讨知青"再教育"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再教育"问题，始终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一张什么时候都好使的牌，一张没人接招的牌。知青问题要最终解决，必须在理论上百分之百站住脚。

你想回北京，想回北京的人多了，你得找出一个理由来。你找任何别的理由都不能成立。只有往政治迫害这条靠。但是你一说这个，他就给你弄到50年代的上山下乡去，你只能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也就是我们跟他们讲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好比一列疯狂的火车，当时下乡的知青就是被它强拉着走的，而在这以前下乡或在这以后下乡的知青都不属于这种情况。

这次接见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封明为挨个儿介绍了一下，说这位就是袁立本，新来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当我们提到《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时，袁立本站起来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把那张报纸找到了，拿在手里看。看完后，他们互相传看了一下，谁也没吭声。惟独有位某处长站起来说了一句：这篇文章是他个人写的，文责自负。我们争辩说：发表这篇文章肯定是一种政治导向，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说自家的破事，他给你发表吗？那可是党报！再说文责自负，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人民日报》上把我们的观点写上？那责任肯定是我们自己负。他没词了，只好说："那你找《人民日报》去吧！"与他们谈，无非就是交上一封信，重申一下我们的主张：必须否定"再教育"理论。从请愿开始的第一封信，直到最后，对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撒过手。他们不是老说你是上山下乡吗？我们就强调是接受"再教育"。但无论你怎么强调是"再教育"，他还是把你说成上山下乡，反正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

最后，袁立本站起来讲了一段话，他当然不会离开官方的那个主线，但是从他的谈话里我们还是听出了一些新意，包括对知青的同情。他还说，应该考虑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困难。我们是这么想的，你只要承认有困难，这事就好办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嘛。

当时我就提出来了："袁秘书长，您是新来的，我们以前也没接触过，通过今天谈话，咱们就算认识了。我想这次上访结束了，明、后天咱们约个时间再聊聊？"我还真是打算第二天、第三天再找他一次，在信访办登记一下找袁立本，他出来不就完了吗？他当时没答应，但也没说不行。

那天晚上，下了当年最大的一场雨，是倾盆大雨。我正在屋里做晚饭，“噔噔”有人敲门。我一看，是市委信访办的两个负责人，他们说开着车在三里屯楼区转了半天了，我们楼区的楼号不挨着，不是29楼过去就是30楼，29楼过去没准是13楼了，他们找不到我家，最后没辙找到派出所，是警察把他们带过来的。实际上，他们冒雨来就是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回去以后还准备干什么？第二，找袁立本想谈什么？我说：回去以后干什么？你问我，我还不知道呢。忻州地区知青提出了一个口号：知青问题不解决，知青运动不停止。事情没有完，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以后怎么着，还得回去以后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另外，想找袁立本谈，是看他人挺通情达理的，想作为个人再跟他交流一下怎么解决知青问题。在解决知青问题上，不是说无路可走，只要政府想解决，该走的路还是很多的。他们在我家里待了一个多钟头。他们一走，我就赶紧去找刘旭东，想把情况通报一下，结果没有找到，顺便把车票买了，第二天就返回山西了。

可以说，8月15日上访，是我们山西知青所谓“二次革命”的开端。在遭受“四二九”重创后，各地区知青活动都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这种事总得有人再挑起来。


知青简报

第六期

知青们办的简报

从北京上访回来后，我和旭东进行了一次省内大串联，这次行动特别保密。当时还在编简报，简报实际就是通讯，比如北京那边有什么信儿了，或者本地有什么动态，举行什么集会，都及时登在上面。通过简报凝聚知青，坚定返城的信念。这简报旭东留得可全着呢！都是不定期的，各地搞各地的。这样，我们俩背着两大包忻州的简报，就上路了。

先从忻州到太原，跟太原的知青谈完后，到的晋中榆次，从晋中到临汾，从临汾到长治，基本上在山西省转了一个圈。我们每到一地，都跟他们说：“我们就是到你们这儿来的，不去别的地方，然后就返回忻州。”实际上是准备下一站或往南或往西，但是不能跟他们说，怕走漏

风声。人家那边知青特热情，说："怎么也得给你们送到车站哪。"我们就说："你们就别送了。"有时，他们执意给你送上车，这车也开了，到下一站还得下来，再往回走，找长途站、火车站接着往下走。

在一个地方一般待两到三天，先找到核心的人、认识的人，给他们一天的时间召集人，在哪儿都要开一个几十人的会。一是散发资料，鼓起大家继续把知青活动搞下去的信心；二是要求大家陆续组织一些集会，在县城里头找个街心花园或十字路口，贴海报，制造点儿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地方上有个风吹草动，肯定要往上报，如果全省几十个县市都报上去，肯定要当做一个动向引起注意。这是为了让上头知道，知青的事还没完。

这次走了十几天，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一顿吃六碗面。从9月份到年底，忻州、太原、晋中、临汾、运城、长治各地知青纷纷举行集会、讲演、上访、对话活动，说死灰复燃也好，如火如荼也罢，离胜利的日子总归是一步步地接近了吧。这里有个笑谈。临汾有个胡其贵，在广场一次几百人的集会上演讲说："知青返城不解决，历史的车轮就嘎巴一声，不转了。"因措辞不当，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这里必须着重提一提临汾知青。这一阶段，知青活动的重点在临汾，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中坚力量，二秋、万昕、胡其贵、杨长生、田野等等。每召集一次集会、游行，都会有几百人参加，无论其规模还是深入人心的程度，都是其他地区望尘莫及的。临汾知青活动的崛起，鼓舞着全省知青。任何一个人，只要到临汾去走一走，看一看，无不被知青的激情所打动。纵观这种现象的发生，有三个原因：其一，临汾知青大部分属于产业工人，产业规模大，人员集中，以临钢、临纺、冶建三大企业为核心，容易造声势，一呼百应。其二，有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基本核心。成就任何大事，没有牺牲精神不行，成天计较个人恩怨，追求名利，即便在今天搞市场经济，做老板，也顶多做个小老板，更何况搞知青返城活动？大家都明白，事情成功了，人人获益，后来的"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成员，不也是臊眉搭眼地调回北京了嘛。其三，"四二九"讲话激怒了广大知青。很多知青原本对返城活动淡漠、观望，是"四二九"讲话的"激励"，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活动中。直到今天，我们仍视临汾的知青哥们儿为一生中最亲近的朋友。

四　春节团拜会

1985年底到1986年初，我们连续组织了两次全省统一的上访，一去就是二三十个人，是袁立本、赵祜、秦正安出面接待的。在谈到单独解

决子女问题时，袁立本问：“你们提出的这个建议能不能代表广大知青？”我们说：“能代表。”他说：“这事作为一个问题汇报上去，但是你们别说北京市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很通情达理：就是回去一个孩子，可以把我们父母的户口与孩子的户口对调。这建议以前跟封明为就提出过。

春节前，山西各地知青代表在忻州开了个会，会上定了一下：今年大家必须利用春节探亲机会，给北京市委团拜，日期定在腊月二十九。当时有个什么背景？北京市政府通过街道，发给仍留在外地的知青每人一本挂历，表示慰问，还有相册什么的，反正每年给点儿东西。副食本上的节日补助如瓜子、花生、芝麻酱也有知青的了，个别知青家庭生活困难的，补助个一二百、二三百的，送到家里去。在这些事儿上，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

腊月二十九，知青再次来到正义路一号集合，可能有一千多人。总指挥是临汾的杨长生。人们排好队后，他走在最前头，通过长安街到了市委门口。袁立本等人闻讯，立刻从大门迎出来，显得特别着急，当时就让队伍解散。大家说：“那不行啊，我们给你拜年来了。”还带了点儿年礼：17个土豆、5斤红枣、2瓶老陈醋以及小米。据说，红枣是寓意“颗颗红心向着党”；陈醋和小米暗喻知青不忘第二故乡。年礼是忻州知青预先准备的，只有土豆是从定襄拿来的。说来好笑：带土豆的人是我送上火车的，一看弄了一大袋子，我就说：“背着太沉。”随便找了一个小袋儿，用手挖了几把，放在里头，谁知道正好是17个。传说北京市常委是17个人，知青无意中送了17个土豆，这不是影射吗？谁能想到，事情就有这么巧！

袁立本接受礼物后，希望知青尽快散去。知青却表示，还有给市委的慰问信需要宣读。信是杨存写的，文字挺优美，还引用了古人表示思乡的一句古诗。念罢慰问信，又在大门口燃放了不少鞭炮。这次活动，名义上是给市委拜年，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接着，代表们打出“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给中央及北京市各位首长拜年”的横幅，当场就被没收了。某领导那天的态度不太好，情绪比较对立，引起知青的不满，临走时又嚷嚷了一嗓子：“咱们初五再来。”

一听说初五再来，市政府着了急，当天晚上开始抓人，有腊月二十九抓的，有大年三十抓的，被抓的人基本在初五以前都放了。究竟抓了几个人？总数不太清楚，因为别的地区没做过统计。我们忻州被抓了三个，有杨存、刘旭东和田德才，临汾杨长生也被抓进去了。

杨长生是被丰台分局抓的。在“号子”里，他和警察针锋相对，把盛

饭菜的碗往自己头上扣。他爱人也是不要命地抗争。

田德才是因为不听入室警察的劝阻被朝阳分局抓的。那年春节，北京市对知青做工作算是做“到家”了（重点是山西），一心把知青堵在家里。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平时能到知青家里走访走访，那知青的老父老母、兄弟姐妹们，当然还包括知青本人，还不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现在登门拜访，好像不那么受欢迎了，大过年的不让人出门，任谁也接受不了啊。田德才太实在，非明告诉“官人”要去市委参加活动，人家就提前下手了。

杨存是当晚在家里被东城分局弄走的。他在知青中很有威信，是知青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最大特点是善辩，有人称他为诡辩奇才。每次集体上访，都是“首席代表”。他进了分局，首先是例行检查，检查得那叫仔细。然后提审，据说是从市局来的预审员亲自审，无非是“谁谁组织策划的”之类。你猜杨存怎么交代？他说：“天亮了，鸡一块儿叫，谁知道是哪只鸡先叫的？”真绝了！

刘旭东被抓时，在大街上与警察大喊大叫，惹得行人驻足观看，愣给塞进车里带走的。其实他们家离东城分局顶多200米，坐哪门子车啊。进了局子，他在头里走，手叉在裤兜里，天冷啊，号子里更冷。后面押解的警察让他把手拿出来，当然是呵斥的态度，旭东没搭理他，结果招致一顿暴打。嘴里流了血，往地上吐吧，是人都会这样。警察却不让吐，非让往肚子里咽，否则还打。说到这里，心情很不好受，我们每一个知青，受益的千千万万知青，有几个知道旭东所遭遇的污辱、伤害？！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才赢得后来的皆大欢喜。事后，分局的头儿知道惹了祸，稀里糊涂又把人放了。旭东一出来，先到市局信访，紧接着就回原平了。山西知青一听旭东挨了打，从北到南如旋风般齐集原平，大家认为，如不给予反击，是知青群体的奇耻大辱，是对法律尊严的肆意践踏，一场暴风骤雨即将倾泻在肇事者头上。

正月十五刚过，北京东城分局政委就带着人来了，公开向旭东赔礼道歉，拿出一个对打人警察的处分决定，好像是拘留几天，记个过之类，还有一封道歉信。原平知青给来人照了相，还座谈了一次。大家见来人态度着实诚恳，也就谅解了他们。态度决定一切嘛，当即表示，打人之事就此了结，不找后账，并对其他知青进行说服劝阻。多么深明大义啊，不知道北京市公安局领情不领情？想必在后来解决知青返城的类似“听证会”上，公安部门是提出有利于知青的动议的。

2月份，我们去了信访办，点名让市委负责人出来，还真出来了。我们在信访办的一间小屋里谈了一天。我向市委抗议了春节期间的抓

捕、打人行为，并真诚希望今后不要发生类似的事件，敬告他们："毛泽东别的话是对是错先不用说，有一句话我坚信不疑：'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他一听脸儿都白了，一时又说不出什么来。你说这句话有没有道理？绝对有道理！什么时候镇压群众运动，都是一笔历史账，尤其是别死人，一死人就结死疙瘩了，要形成几代人的深仇大恨。最后他大概是气糊涂了，来了一句："那也未必。"

这里应该着重提一下：从1986年3月份开始，山西各地知青形成了一个例会制度，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各地代表必须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到临汾开例会。从这年3月到1987年春节，始终没有间断过。参加例会，我们忻州地区一般派一个人，最多不超过三个人。因为路程特别远，去一天，来一天，还得在那儿待两天。

五　"四方团"的尴尬收场

由于上访风不断，有关方面于1986年春节前夕精心组织了山西省"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简称"四方团"），到山西、北京、天津等地巡回报告。汇报团成员都是60年代末从京、津两市赴山西插队，"文化大革命"后继续留在当地的知识青年。他们按照统一的调子宣讲自己坚持留在山西，建设"第二故乡"的事迹。

1月8日，汇报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专场报告会，受到中央书记处胡启立、郝建秀等人的接见。郝建秀的讲话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少数人借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上山下乡是错误的。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的做法，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内容虽然没有什么新东西，一时间的调门却很高。[20]

依我们分析，成立"四方团"，始作俑者是山西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只不过山西又一次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中央。"左"倾遗风在山西是盛行的，迟早会受到教训，这就为后来"十·二六"太原大游行埋下了伏笔。

"四方团"的人选，山西省委颇费一番周折，他们太低估了北京知青的觉悟。按照内定好的名单，地方官们一一找选定的对象谈了话，晓以利害。始料未及的是，遭到了绝大部分入围者的抵制。说到抵制，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抵制下，才流产而寿终正寝的，绝不是中央主动放弃这一政策。据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还有人在高呼"上山下乡万岁"！为什么说农民也抵制呢？因为农村并没有因为知青的到来而增产，反而增加了额外负担，农民耷拉着脸说："往本来就很稀的大锅饭里又加了一瓢水。"我们估计，内定名

单中同意加入“四方团”到全国游说的人，不会超过10%。正应了那句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明摆着，进这个团对自己有好处，经济上、政治上的好处都会有，但是知青正在进行一场命运攸关的运动，组织汇报团就是冲这帮人来的。人最怕的是出卖同类，这是最可气的，何况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有不少知青，你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哪？！

我们在第一次例会上，商定了对付汇报团的办法。当时他们还没回到山西，正在北京等地宣讲，中央领导接见他们时的讲话也已经发表了。我们决定，一旦他们到达本地，就针锋相对地组织一些活动。没有什么统一的办法，各想各的高招。

汇报团来到山西，分为南、北两路。南边一路到临汾，知青送上了两盆昙花，意思是说他们“昙花一现”。北边一路，按计划，忻州是第一站，然后是原平，再往大同那边去。但是，汇报团在忻州就搞不下去了，宣讲那天，知青去得特别多。他们在上面，知青就在底下鼓倒掌，喝倒彩，后来就有人往台上冲。那天是武警维持秩序。

活动的高潮在散会以后。知青们提前出来，把汇报团的小车、中巴围住了，不让车走。一辆车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几百人，拼命往车窗上啐唾沫、敲玻璃、敲车顶子。我想，这些汇报团的人，触景生情，应该会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羞愧。如果到了今天，他们还认为自己当年做得对的话，那真是一星半点的良知都没有！要知道，这些人从政府那儿得到的好处，是纳税人孝敬的。

汇报团有一个女的来自雁北地区，在报告中介绍，自己是老高三的，在农村找了一个放羊娃，比她小了好多岁，讲着讲着，还摆了一个挺“酸”的姿势：“啊，我们终于相爱了。”知青们哄堂大笑。其中一名汇报团成员在现场就休克了。据说她以前没什么病，纯粹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晕了以后，先送地区医院抢救，又连夜送往太原。知青们闻讯，派代表到医院探视，送了水果、罐头，“亲不亲，故乡人”嘛，人道主义应该是第一位的。

忻州地委组织的这个会，闹出了这么个结局，觉得对上面不好交代。咱也管不了这许多，由他们对付去吧，这叫自作自受。正是在知青的有力抵制下，汇报团没再接着往下走，提前打道回府了。这是建立例会制度后，发生的一段小小插曲。

1986年影响较大的一次活动是4月份以运城地区京、津知青名义发起的《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征集万人签名活动，因此这封公开信也称“万民折”。



知青们编写的各种宣传品

临汾、运城和长治地区，原有天津知青插队，尤其是运城和长治比较多。北京知青搞活动，比如集资、集会、上访，他们也参加，这样一提就是“京、津知青”了。发起签名的初衷，一是为了向社会表明，“四方团”并不像官方封的那样，是什么“山西知青的真正代表”，请愿活动也不是什么“少数人闹事”；一是为了向中央及有关省市、部门表达最广大知青的真正愿望。

这个动议是刘宏利提出来的，大伙儿都觉得好，于是由他执笔，起草了“万民折”。写“万民折”，是效仿古代为民请命的做法，对朝廷极具震撼力。今天，没有人为我们请命，中国的脊梁既然不肯出面，我们就自己给自己请命吧。刘宏利，运城拖拉机厂职工，很有个性，古道热肠，很多知青誉他为“运城知青的骄傲”。他首创了“例会制度”，二创“万民折”的形式，另外还有三、四、五创，反正是个人物。

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得不太好，虽然面面俱到，但力度不够，还是在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在一个新的阶段，文章应该要有新意，思想上要有一种提升。但是，时间挺紧，也就没工夫修改了。[21]

文章复印后，都用白纸装订好，开始一个一个地找人签名，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发动起来，当时也想把雁北的人拉上，但联系几次都没成功。前后一个月，共有六千多人签名。每个县都有人专职组织签名活动。一来完成了“万民折”，一来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像我们县，有计划地一天找上50个人，15天就完成了这项浩繁的工程。

公开信一共复制了四十多份，前面是文章，后面附全部签名。19日，派三十多名代表进京，向中央和北京市共42个单位递送，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中央顾问委员会、国务院信访局、北京市委、劳动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天津知青还向天津市委等六单位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文件。[22]

知青运动的发展，需要理论上的阐述，没有理论的依托，就站不稳脚跟，难以坚持下来。知青例会时，授权太原两名知青黄某某、顾某撰写《历史的回顾，深沉的反思——上山下乡如是说》。全文撰写历时三个月，两万多字，是迄今为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再教育”理论进行剖析的最全面、彻底、激昂的文字。在送达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时，专家、学者们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当官的不一定说好，有的直皱眉头。文章搜集了翔实的资料，揭示了“再教育”理论的荒谬和对历史的反动，为山西知青再添“文采”。这篇文章对知青影响巨大，犹如一股春风，将许多消极的因素一扫而光。

六　太原大游行

在5月的例会上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5月18日那天，在全省二三十个县市同时举行游行集会，第二天派代表进京，递交“万民折”，继续请愿上访。这两个活动要遥相呼应。还有一件事，忻州地委成立知青工作指导组。指导组组长是杨友军，成员有劳动局、工会、卫生局的干部，还吸收了四名知青代表。开始，他们提出让“四方团”一个姓马的女知青进指导组，她是忻州化工厂的，遭到我们一致反对。最后定了四个人，地区指导组有周云安和王二水，李世和在原平，每天上班就到县信访办，隶属地区指导组。还有一个叫李志平的，负责联系定襄知青。成立指导组的目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山西省的“六条”安抚知青政策，虽然“六条”下达快一年了，基层企业普遍执行不力。另外，也想通过指导组，加强与北京市在解决知青问题上的沟通。

“指导组”成立以后，的确为知青做了不少实事。指导组成员在崎岖的西八县山路上终日颠簸，调查了滞留在河（曲）、保（德）、偏远地区的北京知青现状，写成报告，向地委汇报，然后再跟当地政府沟通，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山西全省，只有忻州地区成立了指导组，说明阎广洪书记、杨友军秘书长对北京知青的同情与关怀，对此，忻州知青永志不忘。

我们忻州原平知青，在享受山西省“六条”的同时加紧了与北京市政府的对话、沟通。这里需要补充一句，我们几个所谓的“少数坏人”，没

沾上“六条”一点儿光，充其量就是档案里多了几年工龄。1986年夏天，我们拟定了一个致北京市政府的“十一条”，全是关于返城方案的，同时交给北京市和忻州政府。忻州知青工作指导组可能觉着知青成天在家门口游行、集会，到哪儿算一站啊，终于上了一趟北京。具体他们与北京市政府怎么谈的、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此行对知青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有所推动的。

指导组在西八县地区的调查，使北京知青的现状明晰了，李锡铭在“四二九”讲话中曾用挖苦的口气说：“好像你们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起码讲，有一部分知青确确实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城里人喝着可口可乐，坐在沙发上举着遥控器的时候，他们却家徒四壁，除了当年插队时配额购买的印着语录的木箱、柳条箱，就只剩“四揭盖”的纸箱子。当然，当地的百姓并不比他们好多少。但是，造成北京知青现状的根源，是那场万劫不复的“文化大革命”产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青工作指导组成立不久，省里来了说不清名堂的一些人，是调查组？是慰问团？只知道是省委副秘书长武正国带队。到了忻州后，下到各基层单位，找知青谈话。他们把我叫到厂办公室谈话，内容无非是了解知青现状和要求。倒没给灌输什么大道理，态度不卑不亢的。几天后，通知我们到地委会议室开座谈会，武正国主持。知青们推举杨存主谈，在回答武正国几个问题后，杨存情绪激动了，灵感来了，批完“文化大革命”批上山下乡，接着批“四方团”，最后诉说知青的现状。谈着谈着，武正国哭了，抑制不住地抽泣。随行官员们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知青们更是满头雾水，不知泪水为哪般？最后武正国的结束语是：“大家抢着买肉，结果谁也买不上。排好队，一个一个地买，很快就买上了……”让知青们好好排队，别瞎挤。这倒也是大实话，有点儿人情味儿。

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件震动全省知青的不愉快的事。山西知青的一次集体上访，是由赵祜接待的。万昕回到临汾后，模仿赵祜讲话声音，录了一盘带子，在临汾广场的集会上，向几百名知青播放。内容大意是：北京考虑到知青的困难，正着手研究知青返城问题。万昕的初衷，是想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坚定返城信心。当时，会场上群情激昂，可算熬到头了！每次公开集会，都有官方的人监视，他们听了，心里不能不犯嘀咕，这和历来的精神不符嘛。这么大的事，怎么能通过上访人员传达呢？刻不容缓，马上和北京方面联系，结果可想而知。万昕是个歪才，模仿人讲话是一绝，学毛泽东、学林彪都像极了，平常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娱乐娱乐嘛。可是，这次模仿赵祜讲话是要惹大祸的。不说你

搞假冒伪劣，就是人家赵祐起诉你侵犯人权，就能把你万昕送上法庭。万昕也后悔了，全省各地知青马上聚合到临汾，一方面对万昕提出严厉批评，另一方面安排好善后，坚决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具体定了几条措施，还派两人专程到北京向赵主任赔礼道歉。北京方面也没纠缠，很大度地了结了此事。

1986年“十一”适逢粉碎“四人帮”十周年。在10月6日这一天，全省十几个市县同时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十周年”的游行，同时重申“知青问题不解决，知青运动决不停止”的决心。10月19日例会上，我们策划了太原大游行。



1986年10月6日，山西省忻州市原北京知青自发组织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十周年

这次游行是怎么引起的？说起来有个背景：9月12日，山西省委办公厅信访局发了一个晋办信字（86）第8号文件，大意是说：现将北京市信访办公室（86）京信办7号来文印发给你们，来文表明，北京市是一如既往坚决按照中央精神，要求在山西工作的原知青安心做贡献，根本不存在原知青返京问题上再开什么口子的问题，请将此精神向有关干部传达，并向原京、津知青认真宣传，引导广大原京、津知青，不要受谣言的干扰，安心在本地区、本部门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山西省信访局的8号文件。这个文件还附了一个北京市信访办致山西省信访局的信函，内容是说：在知青中流传着各种信息，皆属于极少数人弄虚作假，造谣中伤。

这个文件一下达，山西省特起劲儿，他这一起劲儿，就连地方上那些知青所在单位的头儿也跟着来了劲儿，他们心说了："这下可该收拾你们了。"对我们这些所谓骨干分子的高压手段真是立竿见影，见你的面儿也绷着个脸儿，说话也倒背着手了，当时的压力确实特大。每个人都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文件传达的肯定是中央精神，不会只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意图。他们现在把口子封得那么死，咱们这种闹法，说实话还真有点儿黔驴技穷的样子。

这个文件对知青情绪肯定是一个打击，他知道闹也是瞎闹，上头给你封了口了，明告诉你了，回北京一点儿戏没有。你还闹什么劲？但是我们要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万一回不去，李立功以后肯定要找你，他不用公安局整你，就用单位领导整你，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这个事对于我们来说，实际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秋后算账这把斧子就架在脖子上。

后面的结局明摆着，已经没有了退路，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决一死战了，大家讲，只有"臭鸡子儿磕了"，也叫"瞎子害眼"，就是要教训教训山西省的某些人，这些人是我们通往北京最大的绊脚石、拦路虎。在10月19日的例会上，大伙儿基本上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再说，从"六条"的实施结果看，我们这些人工资没涨上，省内调动也不需要，"农转非"问题[23]根本不存在，所有好处都是别人的，惟独我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是为了个人得点儿好处。

这样，大伙儿就决定10月26日在太原市好好组织一次游行，就堵到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门口，在太原最主要的街道上，类似于北京长安街那样的街道上，来回走一圈。

例会上分配名额，我们地区摊派到150人，忻、定、原三县各出50人，但是定襄人数比较少，忻州可以给定襄多背上10个人，让他出40个人就行了。回来后赶紧布置，把忻、定、原的知青叫到一块儿，我说这事没什么可商量的，全省已经定了，就凑人凑钱吧。那钱都来不及凑了，回来以后再说。参加游行的人要落实到人头，只要是答应去的，就必须去，不能中途变卦。一分钟内谁都能找出上百个理由为自己变卦辩解，这不成。你要说去，下刀子也得去。拿忻州来说，60个名额很快就落实到人头并且打出十来个人的富余，人多了肯定没坏处。这里还有个保密问题，这种事一走漏风声就流产，加上知青内奸的告密，防不胜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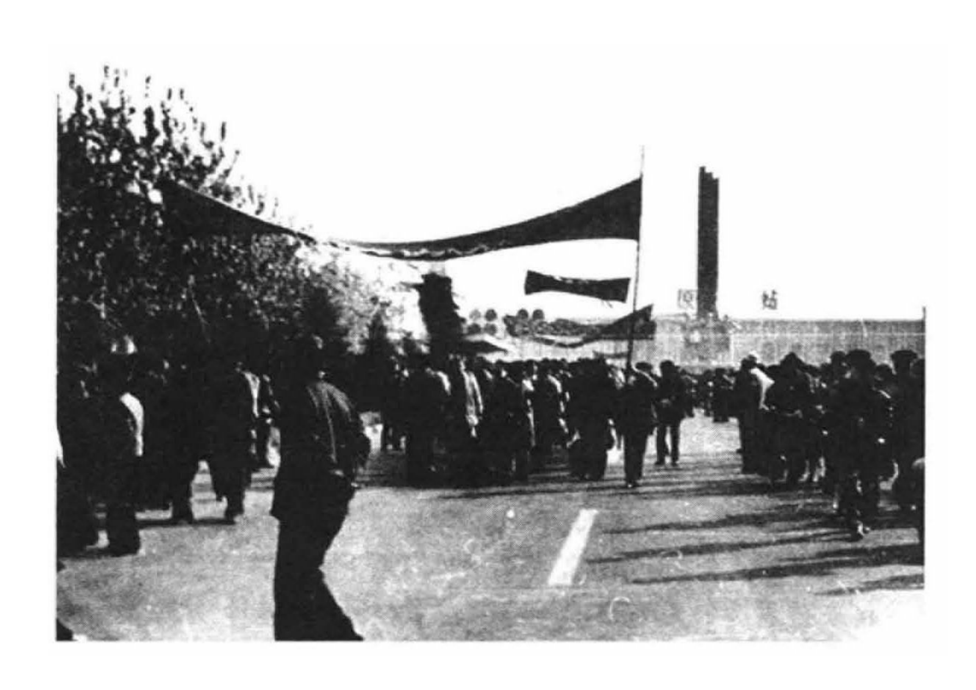
10月26日清晨，大家都是各走各的，规定上午9点在太原车站广场集合。到时候，肯定有大旗拉出来，你往旗子底下一站就行了。我是坐

长途汽车过去的，有160里地。长治和晋南知青参加游行，可能事先就让官方知道了。我们这儿确实没什么阻力，据说我刚出家门，书记就堵我去了，但是我已经走了。

9点钟整，站在车站广场上一看，只见一共竖起八面横幅，横幅上写的标语都是例会上早就定了的。这次游行由临汾的田野当总指挥，他往车站广场的果皮箱上一站，用高音喇叭一喊“集会”，“哗——”第一面横幅底下立刻聚集了好多人。那次游行的秩序特别好，作为前导的第一面横幅打起以后，人们就开始往太原的迎泽大街走。太原火车站正对着迎泽大街，这条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是太原市的标志性街道。我们下了车站台阶奔迎泽大街走去，知青很自觉地四人一排、四人一排地跟着走。一面横幅下面的人走完了，第二面横幅举起来接着走，后面的人跟上来，这样一共八个方阵，浩浩荡荡。



太原街头的请愿游行（1986年10月26日）



集结在太原火车站前的知青



太原请愿游行中知青向民警散发宣传品



太原市民声援请愿知青



上午10时至12时，近千名知青在山西省政府门前请愿

那天游行队伍号称一千多人，从太原火车站出发时，我大概数了一下，可能不到900人，但是，随时有插进队伍里的，其中有各地区来晚的人，也有太原市的知青，他们中有组织来的，也有大礼拜天逛街偶然遇到的。

队伍这么一拉，就拉出去二里地。沿途高呼“还我户口”、“知青问

题不解决，知青活动不停止”、“四方团代表不了知青”等口号。太原市民那天也特兴奋，明显能感觉到老百姓对我们的同情。马路两边的居民楼上，老百姓在阳台上照相的，大声喊好的，竖大拇哥鼓励的，特别热闹。这时，民警来了，马上对游行队伍实行“保护”，一是保证游行队伍的行进，还不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呀，二是防止太原市民搀杂进队伍里。他们一看这人不像北京知青，就把他拦住，但始终没有阻止游行队伍。

从迎泽大街东头往西，快到迎泽桥时北拐，就上了太原市的主要商业街解放路。解放路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两边都是林立的商号。我们从南到北把解放路走了一遍，再往东一折，来到府右街，也就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

大家一到省府门前，队伍变成弧形，把省委大院来了个扇面包围。知青代表裴肖华当场宣读《剖析再教育》文章，递交致省委书记李立功、省长王森浩的公开信。在省府门前停留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撒传单、呼口号、念文章，把一年多来对省委省政府的愤懑狂泄出来。散会后，南来北往的知青都认识，十个八个地凑在一起下馆子。找地儿吃饭去了。

我们事先还有一种思想准备，如果警察强行阻拦的话，就按以往规定的办：停止前进，任由处置，他把你带到哪儿，就跟他去哪儿。不过另外还有一条：如果他抓人，那么剩下的人全部上北京。甭管哪次车，只要是往北京方向开的就行。上车也不买票，出了站就直奔天安门。到了那儿，就说山西省抓人了。咱们是这么计划的，幸好没出现这种情况。

10月26日的游行，参加的人数多，影响的面儿广，很多人都是刚刚加入知青活动，起到很大的振奋作用。整个山西省，上上下下，再也没人跟北京知青叫板了。

事后，山西某领导气急败坏，严令彻查，大话、狂话说了一大堆，结果呢？文件下到市、县一级，压根就没人去查，连问一句都没有，只是扔下一句“没法查清楚”了事。

七　北京游行计划的夭折

很快，12月例会到了。因为准备头春节去北京游行，所以，将12月例会提前到该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即12月4日举行，例会的地点转移到榆次。榆次离太原50里地，在全省位置居中，离谁都不算太远。我们还计划12月底在临汾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给全国的新闻单位发了邀请函，结果准备了半天，一个记者也没到。据说也有准备参加的，但是被当地公安给阻拦了。

12月4日的例会，定的还是要接着上访，并制定了在北京组织大型游行的计划，会上我也拿出了一些意见。说句实话，通过以往几次活动，对组织游行、静坐，比较有经验了。我印象里头有一套方案、二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提前通知下去，能保密就保密，不保密的让官方知道也没关系。还是在腊月二十九那天，就在中山公园西侧红墙根儿集中，也是跟太原游行一样，10点，第一面横幅拉出来，知青就往上靠。如果没人不管，就跟原先安排的一样，八面横幅一溜拉开奔西，到西单打一个折返，再从新华门对面游回来。当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第二套方案是：假如一部分人在中山公园附近受阻，另一部分人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横幅，完全模仿“十·二六”太原游行，沿长安街行进。

当时的考虑是：今年这个春节是非游行不可了。这都是让那个7号文件、8号文件弄的。这次游行，要确保3000人参加，要充分展示知青否定“文化大革命”、返回北京的信心。这时候就用上了那句话：“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看来，没有一部分知青做出牺牲，知青问题确实不容易解决。一切就在12月4日计划好了。

整个12月中旬到1月中旬，我们都在做组织春节游行的工作，力争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包括制定第二梯队营救被捕知青的计划。临汾、运城等地知青分成若干个小分队，从同蒲路到黄河边，二十多个县，一个县一个县地动员、组织、落实，形势比预期的要好。你别看那些与世隔绝住在深山里的知青，一听说这次行动都特激动，一拍胸脯子：“没问题！这时间、这位置我们肯定能到达。被抓也不怕。”都说得特好。整整一个月，心思全用在这上头了。

其间，有个别知青表示了赴死的决心，我们在敬仰的同时，通之以情，晓之以理，知青高举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与不公正、不公平的命运抗争，为的是明天生活得更美好。

恰在这时，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政府出台了一个《游行法》，好像是12月出来的。虽然游行的时间、地点都定了，在知青当中也进行了宣传鼓动，《游行法》出来后，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递个游行申请。毕竟面对的是法律，批准不批准是政府的事，游行不游行还是在我们。

当时，各地知青都在焦灼地等待那个特殊日子的临近，我们这边是等临汾的通知，临汾那边是等我们的通知，互相之间没有电话联系，信件又太慢，就这么等呀等的，一直等到1987年1月7日（或8日），我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又跑了一趟太原、榆次、临汾、长治，通知他们1月14日上忻州开会，这就是那个所谓的“五比四”会议。

1月14日，临汾的人深夜两点到了我家，那趟车是临汾到北京的车，到忻县正好是夜里两点。其他地区代表都是上午来的。各个地区都有人参加，先商量递游行申请这个事，申请文件当时就起草了。申请人要签名，我代表忻州地区第一个签的名，长治是关雨铭签的，临汾是胡其贵签的，那天参加会的六个地区代表中，有一个地区的代表没签，为什么？来的那人他不主事，只带了主事者的意见。我们说你最好别代签。完事后，估计在四点左右，有人要赶车回去，而临汾这几个哥们儿，还得等到夜里两点返回去。

人全走了，就剩下临汾的两个人，他们也是同意游行的。吃晚饭时，陈君远、王莹、李世和几个人从原平坐火车来了，他们知道有这个会，但是白天没能来参加。他们来了以后，杨存跟君远的意见一致，都认为形势起了变化，不应该再组织游行。在此之前，北京市教育局在报纸上公布了知青子女可在北京借读而不收赞助费的文件。杨存始终对游行充满疑虑，一看来了救星，就开始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他嘴好，跟这个说，跟那个说，说得一些人都动摇了。实际在场的人，除了两个临汾的，就都是我们忻州地区的了。一直吵到深夜。我说不能再吵了，我个人意见不变，在场的人举手表决，少数要服从多数。

每年春节的大好机会不能错过，反正咱们这些人也豁出去了，只要今后知青利益能得到一些保障，做出点儿牺牲也无所谓。不管结局如何，相信广大知青也不会骂咱们。所以我是主张游行的，刘旭东只能是在我的意见上再加个“更”字。

不主张游行的主要有杨存几个人，他们的理由：一是出了《游行法》，计划游行的事儿，北京市已经完全掌握，并做好严密的防范措施，你去了就是送死。再说，北京看了10月26日太原游行的录像后，也会有所顾忌，谁也不愿意吃饱了撑的，没事抓几个人。二是北京在政策上已经有所松动，如允许知青利用三角对调回京，这时候咱们缓一下，给他们一个好感，或许能促成知青问题的解决。

我们争论时，临汾的两人也不言语，杨存一再做他们的工作。我想即使君远支持杨存，他们也是少数。但表决结果一出来，我特失望，临汾两人全转向杨存了。表决主张游行的有：我、刘旭东、王莹，还有一个忘了是谁了。不主张游行的有：临汾的俩人，杨存、君远，再加上世和。这样弄出来个五比四。这个事儿后来上了《内参》，说明我们有人告密。

会上还决定了两件事：一是要求各地区给胡耀邦拍明码电报，就写“北京中共中央委员会胡耀邦总书记收”。电报内容是统一的：“知青

要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今年回家过个安乐祥和的春节。”不游行了，你们放心吧，就这么个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赶紧通知各地区，春节期间停止一切活动。

表决后，扫尾的事没人管了。为了通知全省知青，我写了一封信，又担心寄丢了，你想，万一信收不着，这些哥们儿到时候去了天安门，该怎么办？只好一个人又在全省转了一大圈，亲自把信送到各地知青手里。这封信，我是这么写的：“14日走后，晚上又有人来，经过激烈争辩，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现将不可更改的最终决定转告如下，必须无条件服从、贯彻：春节停止一切活动（包括递申请、散材料），火速告知同学们，平平安安度过春节，尤其是腊月二十九，不要上街。”五比四的结果，按理说有失公允，凭什么在其他四个地区都走了以后，你们再表决？！数十日的艰难困苦，付之东流，大家心痛啊！消息传到临汾，知青们眼都红了，急火攻心啊！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痛打”到忻州开会的代表，两人当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落水狗”。

回首往事，萦绕脑际的惟一疑问就是，假如1987年春节真的游行了，结局会如何？是有利于知青问题的解决，还是阻滞了知青问题的解决？好在历史没有假如，真理与谬误只一步之差。大团圆的结局足以令我们欣慰一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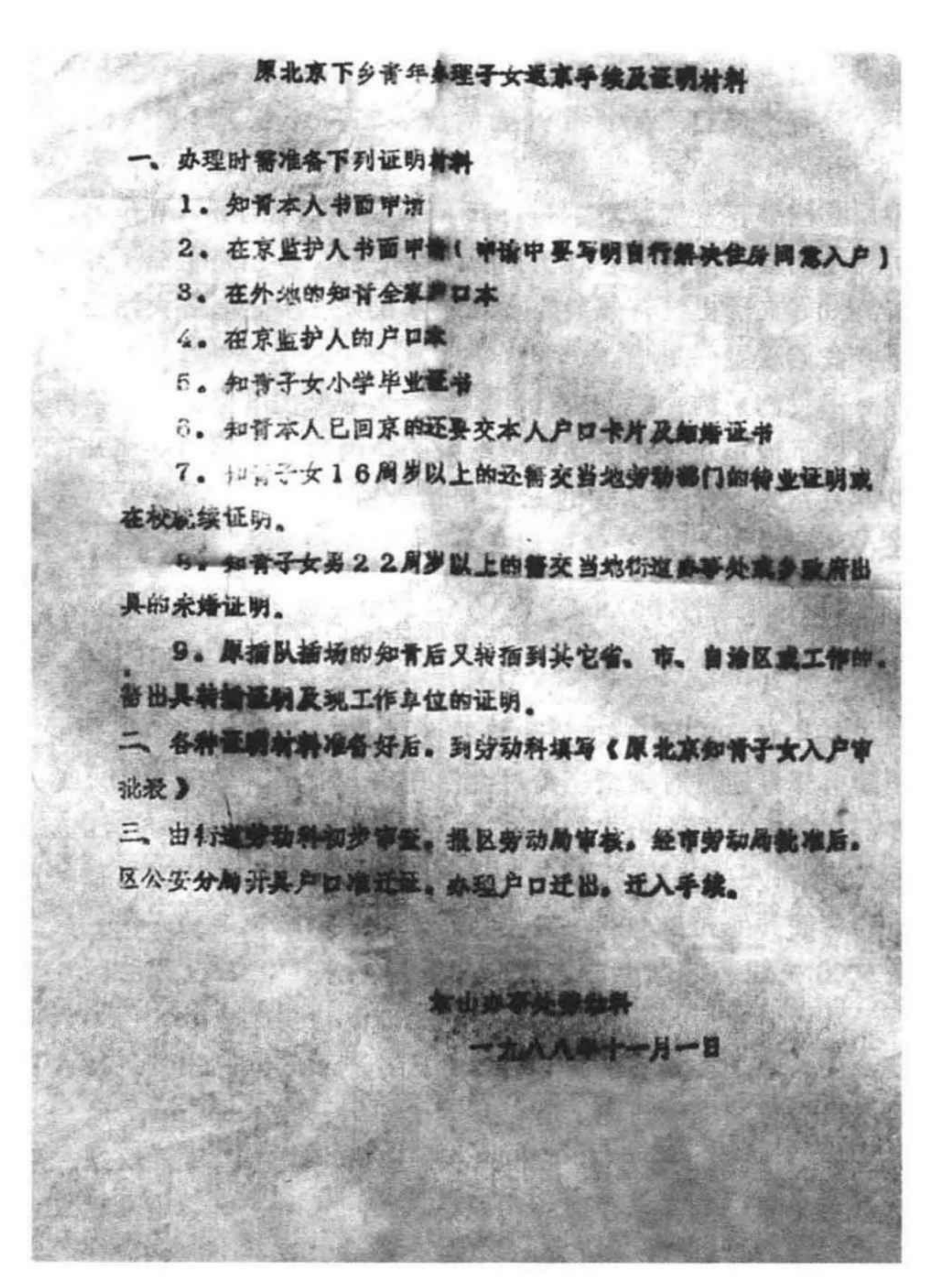
对于我们来讲，中止游行计划、给胡耀邦拍电报，两件事办完以后，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活动就算结束了。当然，南部的一些知青，在1987年还组织过上访，递过游行申请，所以，从全局来看，这场运动还在延续。

八　敞开返城的大门

1987年春节以后，知青返城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在这之前，就不断有知青通过对调或三角对调回北京。那时，城建系统外地人特别多，你找一个要调出去的职工（一般是回原籍），他调往江苏、四川都无所谓，只要劳资科减少了一个名额，就可以由知青来抵补，这空出的名额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当然，你必须跟调走的人说妥，给他大概5000块钱。他调走，你把这指标留下来了，通过劳动局办，然后再千八百地给承办人点儿辛苦费。当时这可是个大数。但是，你只能先一个人回来，夫妻就成了两地分居，剩下的人利用“三种人”政策返城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所以，等于回来一大家子。[24]

另外，“三种人”中有“未婚者”一条。本来，政策规定：离婚者不包括在内。但后来办事的人都睁只眼闭只眼，口子越开越大，许多知青就通过假离婚回到北京。那会儿地方上开一个离婚证还不容易？稀里呼噜

就开出来了，开出来就往北京办。1986年底，北京劳动局恢复了知青处，各区、街道设了知青科[25]，对这种事也是基本开绿灯放行。那一阵子，假离婚在我们地方上成风。先回来一个，剩下的那个心里不就塌实了吗？一复婚，不就属于两地分居了吗？这就是通过假离婚来制造“三种人”。政策是政府定的，总不能下一个文件说：哎，你们统统回来吧！因为还有其他城市牵制着呢。但是他可以给你制造一个借口，就像我们比喻的：他把门开了一条缝，你侧着身挤挤就能进去。拿我们县来说，900人中，就有300到400人是借假离婚办回来的。



原北京下乡青年办理子女返京手续及证明材料

一、办理时需准备下列证明材料

1．知青本人书面申请

2．在京监护人书面申请（申请中要写明自行解决住房同意入户）

3．在外地的知青全家户口本

4．在京监护人的户口本

5．知青子女小学毕业证书

6．知青本人已回京的还要交本人户口卡片及离婚证书

7．知青子女16周岁以上的还需交当地劳动部门的待业证明或在校就读证明。

8．知青子女男22周岁以上的需交当地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出具的未婚证明。

9．原插队插场的知青后又转插到其它省、市、自治区或工作的，需出具转插证明及现工作单位的证明。

二、各种证明材料准备好后，到劳动科填写《原北京知青子女入户审批表》

三、由街道劳动科初步审查，报区劳动局审核，经市劳动局批准后，区公安分局开具户口准迁证，办理户口迁出、迁入手续。

[illegible]办事处劳动科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

北京各街道劳动科为知青子女返京开绿灯

接着，北京市又陆续推出允许留居外地的老知青将一名子女户口迁回北京[26]；两个兄弟姐妹知青中，可以调一个回京；放宽老知青困退回京条件等政策。后来，在远郊十个区县或特殊行业如环卫、纺织等系统找到接收单位的，也都可以回来。[27]这样，返城的口子越开越大。年底，留在山西的一万余名知青大部分返回了北京。留在当地的已所剩无几。

我是1987年开始办返城手续的。但是北京市在这年5月下了一份“名单”，上了名单的人不能调回北京。估计这名单是分两批下的，第一批可能是15个人，后来增加了几个。忻州地区有我、杨存、刘旭东几个人。我调动的事就让北京市劳动局拖下来了。我给市委负责人写过信，对不让我回京之事却一字未提。神侃了一气，“有容为大，无欲则刚”。

关于“名单”，我挺理解北京市的做法，这里报复的色彩很淡，但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占10%吧。堂堂一级政府，犯不上和你一个小小草民置气。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90%是让山西知青、主要是忻州知青招来的。他们一看我们要办手续回北京了，本来办这事很难，想进门缝，只能提口气侧着身硬着头皮挤进去，现在一看事情有了转机，一些人就到信访办、劳动局四处告你，说是受“招安”了。告的人多了，就形成一股气候，市政府也不愿落个“招安”的名，干脆来个一举两得的办法，“黑名单”就出笼了。

知青活动将近三年时间，除了回到北京，还有一个附加值，就是认识了什么叫“人心”。有的时候，越是熟人越危险。拿集资来说吧，两口子商量一晚上，第二天哆哆嗦嗦各交了两块钱，还要你保证他们能办回北京。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等运动跌入低潮，就缠着你想要回集资款。有的人主动找到你，声明一不怕坐牢，二不怕死，胸脯拍得山响；换个场合，压力下面，他却第一个出卖你。“人心不古”，其实人心从来就没“古”过。我是1988年11月接劳动局通知领回的调令，整整冻结了一年半。

回顾知青请愿上访的曲折历程，有几点经验是值得记取的。

第一是要掌握好“度”。在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必须清醒认识对手是谁？政府和单位头头绝不是一回事。如果政府给你定性是无理取闹，是少数人操纵，你还想继续走下去，十有八九是条不归路。从知青问题的提出到最后的皆大欢喜，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在里边起了作用，但你必须有所作为，你不作为，因素也就不起作用。

在各级党政班子中，有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的，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事实证明，同情知青命运的领导干部古有相当的比例，

但是他们只能在适当的时机才能有所作为。“四二九”静坐后，很明显，对知青实行的是“就地安抚”政策，企图使知青返城要求从此烟飞灰灭。这期间，山西知青从未放弃过返城的主张，种种迹象表明，北京也从未放弃过“两手准备”，即“返城”和“就地安抚”。山西知青难就难在掌握好“度”，“度”过了就是“蠢蠢欲动”，“度”不及则错失良机。因为我们与“同情者”从未谋过面，根本没有信息渠道，所做的一切只能是展示“知青问题不好解决，知青运动决不停止”的决心，让领导们去平衡得失。知青回京问题，牵涉到公安局、粮食局、财政局、劳动局、教育局等六七个职能部门，没有这些部门的鼎力相助，知青问题的解决还要费许多周折。

第二是要求必须在政府可能承受的范围内。如果你的要求超出承受范围，结果只有一个：狠狠地被踢上一脚。现在有知青提出，当年政府中断我们学业，强迫我们插队，要求政府经济赔偿。你说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是侵犯人的基本权利，两千多年前就有“有教无类”。但赔偿多少？10万元多不多？一点儿不多。谁要嫌多，嫌没道理，就把他们家上中学的孩子扔“老少边穷”地区去自食其力，10年后再允许参加高考，你看他跟你急不？但“文化大革命”中一千四百多万知青，一人十万，就是一亿四千万，政府多少年的财政收入才凑出这笔钱啊！这就叫超出政府承受范围，有理也别讲。

第三是要想奴隶不起来，就别让他们饥寒交迫。《国际歌》头一句话是什么？“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现在有一句时髦的话，叫逆向思维。什么意思？你要想奴隶不起来，就别让他们饥寒交迫。当然，知青比起奴隶肯定要强点儿，比喻嘛，也就是今天的新名词：弱势群体。当年，从“三种人”到插队算工龄，到山西省落实“六条”，直到最后的大返城，都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安抚。今天，原知青依旧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如果今天的改革，在制造出富翁的同时，又制造出弱势群体，能说改革是成功的吗？

第四是要有知青返城运动的兴奋点。从1985年4月16日起，我们不厌其烦地向北京市委强调，只要同意知青一个子女的户口落到北京，知青问题就解决了，就对政府千恩万谢了。他们总认为这是儿戏，执行起来难度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返城不抱多大兴趣。所谓兴奋点全在子女身上，这是我们几年来甘冒极大的风险，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力量源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知青大部分是自孩子一出世，就由奶奶、姥姥托管了，有的子女曾经回过几次山西，有的压根没回去过。1984年提出返城口号时，正是大部分知青子女面临入学的时机。这一关不好过啊。好不容易上了学，“借读生”的帽子使孩子

的心灵遭受的创伤，歧视、排挤随之而来。而且，将来考大学，外地的录取线比北京要高近100分，录取的概率太低。再说，毕业一分配，又给你分回外地了。别忘了，那是80年代中，北京没什么“打工族”，户籍管理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另外，奶奶、姥姥已经离不开孙子、外孙子了，孩子也离不开她们。你说，仅就这一点，还不够让我们“兴奋”得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吗？

今天的知青，面临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大变革，它的衍生物就是社会的贫富日益不均。知青们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确实很难，但这是社会的转型期，所有人都面临着困惑。要知道，改革蓝图的设计，更着眼于我们的下一代。顽强地忍耐吧，愿我们的下一代前程似锦，跟花儿似的灿烂，这不也正是我们当年的初衷吗？

附录一：《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公开信》

×××同志：

我们是1968年来山西省插队落户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今仍留在山西省，已十六年了。今天，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历尽磨难，曾经被北京市遗忘的不幸人，强烈要求返回北京工作。彻底解决所谓“上山下乡”这一历史遗案。我们提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我们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现陈述如下：

（一）最近，党中央做出了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定，道出了埋藏在我们心底16年的强烈呼声。我们感到振奋，举双手拥护。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要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就只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

（二）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万般无奈，才走上了“上山下乡”这条路。校工宣队欺骗我们说：“下乡受几年再教育，再让你们回来嘛。”“四人帮”的爪牙甚至以“停发父母工资”，“加重父母罪行”相威胁，就连我们当年还幼小的弟弟妹妹们也被另眼看待，然后采用敲锣打鼓、张贴大红“喜报”到街道庭院等高压手段逼我们就范。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被“逼”上山的，是被“赶”下乡的。这和“文化大革命”前的支边和插队的情况有所不同。待我们痛定思痛之时之刻，已是在异地他乡，后悔莫及了。当年和亲人分别时北京火车站站台上、列车里那一片“欢送”锣鼓想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哭喊声，牵动着北京城里多少人家的心，那哭喊声至今还在我们耳边萦绕，还在我们心

头回荡。我们认为，“四人帮”之流对成千上万名城市知识青年的这一迫害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绝无仅有的！我们呼吁北京市政府应当像解决“六二压”[28]人员返城那样给我们彻底落实政策。

（三）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返回北京，如内蒙古、东北、云南的那些同学。就山西来讲，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也通过各种渠道回了北京，高干子女大部分回去了；按照政策能照顾的也回去了；家里富裕的，花一两千块钱也回去了；利用不正之风“打通后门”的也回去了，只留下了我们这些无依无靠、安分守己、无后门可走的人了。同是一类人结局却如此不同，我们越是默默无声我们的处境和结局就越悲惨，这难道是公平合理的吗？

（四）如今，我们都已是三十多岁接近四十岁的人了，父母大多年近古稀。老人们在垂暮之年不能和儿女团聚，儿女们连关心一下老人的饮食起居也不能，我们的心灵在哭泣，老父老母的心灵在哭泣。他（她）们把我们养育成人，但得到的不是家人团聚、骨肉相逢的天伦之乐，而是“儿行千里，父母牵肠”的痛苦。这种精神上的创伤和痛苦，是正常人都能理解和体谅得到的，这难道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符合吗？

（五）我们这些当初十七八，甚至十五六岁在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当年被“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上学深造、留京工作的权利，远离故乡和亲人。十几年来一直身处异地，客居他乡，虽然其后被陆续就地安排了工作，但我们的学历不高（初中、高中），工龄不长（插队是不算工龄的），许多人多次调资没份儿，住房轮不上，只能长年租住客房，多数人的工资相差无几（三四十元），经济待遇远不如北京的，也无法和当地人相比。有的连对象也找不到，有的夫妻分居两地，天各一方；有的被迫和在北京的爱人离婚。岁月的流逝仍抹不去我们在北京故乡人眼中的“老插”形象，填不平当地人和在他们眼中没本事的“京侉子”之间的鸿沟。眼看着以名目繁多的借口调回北京的人从我们身边一个接一个地走掉，剩下来的这些老实人思乡返京之心怎么能泯灭呢？我们一天回不了北京，就一天也休想摆脱这辛酸悲凉的处境，就无法与“北京插队知青”六个大字绝缘！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我们16年来含辛茹苦，天天盼着有朝一日党的阳光照到我们身上，为插队知青平反的春风吹到我们身旁，我们抱着希望等待着、等待着。一直到“四人帮”粉碎了，极“左”路线破产了，三中全会的光辉普照大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钟声终于敲响了。在动荡的十年中，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期，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默默地承担着一切。如今农民富裕了、国家富强了，经济繁荣了，陈永贵所谓“山西粮食不过关，北京知青不能走”的谬

论被万元户们的现实完全粉碎了，政策一个接一个地落实了。现在我们提出“平反”、“返城”，彻底落实政策，难道不是合乎时宜、正当合理的吗？

“北京人口太多，需要控制”，常常是拒绝我们进京的最大理由。的确，“文化大革命”以来北京人口增加了几百万。究其原因，账是算不到我们头上的。1968年来被谢富治之流当做包袱甩出北京的“知识青年”多达几十万。但这之后，以“支左”为名留在北京的人员和家属，以“工作需要”为由在京就业的外地转业人员以及陆续以各种手段进京人员又几乎完全抵消了这个数目！前不久，按照中央指示，数以万计的铁道兵转业人员也能在北京就业，难道再也容纳不下我们这区区故乡人了吗？难道我们只能留在当地就业，连返回原籍的权利也没有吗？我们应该向“五·七”干校人员返城及“六二压”家属返城一样，都有重返北京的权利！

事实雄辩地证明，“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做出的牺牲，他们坎坷的经历，不平的待遇，历尽艰辛的磨难与建设兵团的同志、错划右派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遭遇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北京知识青年（实际上是中学生）插队问题是做定论的时候了，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就该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如果政策不彻底落实到我们身上，我们备受磨难的心灵创伤如何能得到医治？我们长期压抑的大干“四化”的聪明才智如何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将来又以何言向我们的子女解释这段备受迫害的历史？

敬爱的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办事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本着这一精神，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五·七”干校的问题、遣返人员的问题、右派摘帽的问题、支边人员的待遇问题、兵团人员的返城问题、“六二压”人员的问题、“四类分子”的问题及知识分子的问题，不都一个个顺利解决了吗？我们认为，该是为我们彻底落实政策的时候了。我们相信，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身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人的问题是一定会得到妥善安排和解决的，我们的返城要求也是一定会受到充分体谅和照顾的。

上面的话是我们抚着受创伤的心灵，蘸着涌出的泪水写成的，请中央和北京市委有关领导认真考虑，尽快派调查组来关怀一下我们这些一度被忘却的人，从速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吧。

签名：山西省忻州市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全体

1984年12月

附录二：《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

中共中央及各级领导：

您们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对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中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处理错了的历史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促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三届中学生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统一的看法和彻底公正的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1968年的所谓“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运动，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完全错误的，它是在彻底否定“十七年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前提下，以不正当的手段把几十万老三届中学生“一刀切”地赶到农村，与当年大批干部下放“五·七”干校一样，去接受“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运动实际上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极“左”路线的产物。

基于上述历史原因，在党中央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这些至今仍留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向党和政府提出“落实政策、返回故乡”的要求，当然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了。

事实上，18年来，时强时弱的知青返城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中央高级干部到一般老百姓，从高级知识分子、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到港澳台胞，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以各种形式想方设法地把他们的子女、亲友弄回城市。70年代末，中央74号文件又彻底地把尚留在农村的知青迁回了城市。这样，在经过了18年的淘汰和筛选之后（病退、困退、参军、入学、花钱送礼单调对调、离婚、顶替以及各种照顾性的返城，都是通过政策、权力、权术、金钱甚至贞操殊途同归的），目前剩在山西的只是少数，这一事实是社会各界有目共睹的。

因此，“文化大革命”中的这场“接受再教育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前实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无论从形式、内容和性质，我们认为都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地回忆在那举国遭劫的年代里我们曾经走过的蹉跎岁月。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使许多人至今谈虎变色，

不寒而栗。1968年的“插队”二字已成为“改造”和“惩罚”的代名词。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困境不能自拔的知青以自杀结束了他们“接受再教育”的艰难旅程，这都是世人皆知的往事。多少文学作品和文艺作品已经把这段可诅咒的历史牢牢地钉在了“文化大革命”的耻辱柱上。令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18年来在山西的大部分知青以明返城、暗返城都可以被人们默认和理解，东北军垦建设兵团神话般地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大返城也被史诗般地再现于中央电视台的屏幕，而我们现在留在山西的知青仅仅因为提了一个返城的要求，就要受到斥责和警告，甚至被公安部门跟踪盯梢，收容审查，传唤通知，个别知青还遭到拘留所看守人员的殴打和侮辱？我们实在不明白：山西的北京知青到北京有关部门上访，要求落实政策，这种行动究竟属于哪一种性质的问题？对上访的知青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是正确和得人心的吗？

纠正1968年“接受再教育”这场历史铸成的大错，是需要勇气和时间的，也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我们认为：只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一年多来，各级政府、党委的有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北京各界各阶层的父老乡亲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发自内心的同情，北京市公布的“三种人”返京政策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的开端。党中央领导也在认真倾听和考虑我们的呼声。历史的经验证明：在落实知青政策上，离开返城谈落实是毫无意义的，在执行返城政策过程中，与其暗返不如明返。这个拖累了18年的尾巴早一天下决心连根割掉，大家早一天心情舒畅。

我们并不否认，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是有许多困难（因为它涉及面很广），但有困难并不等于可以回避矛盾，可以不正视历史的错误，更不能因为解决起来有困难就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这等于置党和政府的政策信誉于不顾，让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继续误国误民。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毫不迟疑、毫不动摇地给予纠正，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们坚持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是正当的，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行动方式也是合法的。我们这一批知青从来就不是什么“包袱”和“累赘”，更不是什么“社会不安定因素”。相反，我们是一支曾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旺盛精力的生气勃勃的建设四化的力量，是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崇高思想境界和富于牺牲精神的整整一代人。

“云稀未必天无泪，位卑岂敢忘国忧。”请党和政府相信您们的儿

女，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使我们这一代人深深懂得：历史是公正的，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党是洞察一切的。我们坚信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向前看。一切历史遗留的问题都会在正确的政策面前迎刃而解。等待您们落实知青政策的北京儿女。

1986年4月29日初稿

5月15日定稿

第一批签名名单

---

[1]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原山西知青朱吉余《我所参与的知青上访》（载《远方》2001年）叙述了当年上访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考。

[3]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4]《北京劳动大事记》，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301页。

[5]1937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山西省会太原，调集八万兵力，在忻县以北忻口一线与日军展开会战。

[6]元好问（1190—1257），金朝文学家，字裕之，号遗山，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众望。著有《遗山集》。

[7]关于1973年停止招工的前因后果，可参考《中国知青史——大潮》，第486页。

[8]“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1965年，北京市有1505名知青到山西插队；“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1969年，有38506名知青到山西插队。合计40038名。《北京志·劳动志》，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而国务院知青办编印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1962—1979），1981年铅印本第17页记为4.13万名。

[9]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考麦天枢《山西忻州地区千余北京“知青”要求返京》，载中国青年报社编《青运情况》第779期，1985年4月5日。

[10]中国青年报社编《青年来信摘编》第520期（1984年12月7日）摘要转载了这封公开信，题称：《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借否定“文革”返京工作》，末尾署名：“山西省原平县化肥厂、专钢、专机、铁路、财贸系统、教育系统等单位北京插队知识青年李世和等二百六十余人。”这是第一个版本。后来，忻州各市县知青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所以第二个版本改为以“忻州市北京知青”的名义。

[11]据王莹、陈君远等人回忆，青年们还把信寄给当时在儿童艺术剧院工作的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希望他把公开信转给中央有关领导，要求中央将该信和表示解决知青问题的编者按公开在报刊上发表。随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反馈消息，称公开信不宜发表。不久，陈君远等人到北京看望梁晓声，向他表示感谢。梁第一句却说：我还能为你们做什么？笔者曾于2002年2月3日对陈君远、李世和、庄伟亮、王莹、杨存先生和周云安女士做了一次集体采访。本文注释部分所引用的口述材料，均根据此次录音。笔者有幸与诸位朋友结识，最初得益于好友曲守国先生的介绍。守国已于2001年10月不幸病逝，谨在此寄托永久的哀思。

[12]据陈君远、李世和等人回忆，这次秘密会议有各地知青代表十余人（其中忻州代表三人）参加。会议开了整整一宿，一个是统一了口径，提出“原北京知青强烈要求回北京”口号。当时官方不承认还存在知青问题，而请愿一方认为，知青身份是历史事实，不承认不行，所以强调了知青身份，考虑到大部分人已在当地就业，又在“知青”前面加了一个“原”字。一个是决定代表回去后积极做准备，4月份到北京集体上访。此次会议直接为“四一五”大规模上访做了准备，并且形成了以忻州、临汾知青为核心的力量。

[13]马北北：《部分在山西、陕西、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青”聚集北京市政府西门要求解决回京问题》，载中国青年报社编《青运情况》第788期，1985年4月20日。

[14]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1页。

[15]市委书记李锡明的讲话要点：（1）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实行的做法，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下乡知青，大部分已经返城，剩下的也在当地安排就业，所以已经不存在插队知青，也不存在继续落实政策问题。（2）关于“回北京”的要求，从全局看，既做不到，也不合理。（3）这次静坐，“还是按照‘文化大革命’这套搞无政府主义，并且是严重的。长期的搞串联、闹事、集体上访、包围市委机关”。李锡明、陈希同还讲了许多严厉训斥的话，如李说：“你们贴的那些标语，你们自己也想一想，有没有道理？离开北京就得回故乡，可能不可能？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小平救救我’，救你什么？好像你在水深火热活不下去了，是这种情况吗？！”“这都是些煽动性的口号。我想更应该指出来的，就是制造了好多谣言，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污蔑中伤，制造混乱，好多事做得大大地出了圈！”（引自李锡明、陈希同讲话录音）

[16]山西的六条措施是：为知青的农村配偶转户口，省内两地生活的知青往一起调，集体企业职工转为全民，乡镇企业的职工转入国营，调换危险、有毒害工种，改善住房条件。

[17]静坐事件出来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多次开会研究。5月3日，胡耀邦批示：要把山西知青到北京静坐的文章做到底，即山西是怎么安排知青的？山西知青确实表现好的要给予表扬；要揭露他们当中极少数人的煽动性言论；要找上当的人出来讲话，说明上当情况；头面人物要写出检查。以上五条做到了，就算文章做到底了，就是大获全胜。胡耀邦的批示，事出有因。据说，4月间，胡耀邦出国访问，最后一站是澳大利亚，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贸然拿着附有山西知青在北京市府前静坐照片的报纸询问胡：“你们中国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吗？”这件事很让胡耀邦恼火，当即吩咐赶紧对此事进行调查。

5月22日，国务院召开五省一市会议，会议研究了北京市“五一九”球迷闹事，山西知青在市府前静坐以及三门峡移民遗留问题。会上，万里就静坐事件发表了意见，大意是：据我知道，在半年前，娃娃们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哪个地方乱了，不要总以为有坏人操纵，如果总是按照这种思维去处理问题，永远处理不好。胡耀邦也表了态：不要事后擦屁股，把工作做到前头。三天后，万里等的讲话就传递到山西，知青压力有所减轻（按，此处据李世和、陈君远等人回忆）。

[18]劳动部于1985年6月18日发出有关插队知青算工龄的文件（劳人培23号文件），内容有五条，主要是：插队算工龄；前面的不找老账，今后调资与同工龄职工一视同仁。此件发到县、团级。随即，北京市劳动局发出相应文件。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4页。

[19]近年来，有人四处宣传，说中央出台插队知青算工龄的政策是因为×××给胡耀邦写了信。此说不确。在当时，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该问题的知青不少。早在1982年，就有92名原北京插队知青给国务院知青办写信，要求解决插队工龄问题。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09页。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1985年4月29日接见山西知青讲话中也说：“工龄问题、工资和分配房子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听到你们的反映，就

反映到中央去。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中央得做认真的考虑和研究才能定”（根据讲话录音整理）。插队知青工龄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应归功于某个人，而是知青、有关部门和领导共同推动的结果。详见《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209—212页。

[20]配合汇报团的活动，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做了积极的宣传。1月29日，《人民日报》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能否定》为题，报道了会议的盛况。春节前后，是报告团最风光的一段日子。领导的垂青、报章的颂扬、宏大的欢迎，以及各种慰问活动，一时应接不暇。1月29日，《北京日报》为汇报团发了《坚定地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道路》的通讯。2月2日和9日，又连续报道了汇报团与解放军英模报告团亲切会见和参加首都青年向解放军英模赠画仪式的消息。汇报团成员享受到与战斗英雄一样的殊荣。一篇叫做《好儿女为首都亲人上了一堂生动教育课》的通讯声称：汇报团的汇报在北京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原来参加过上访的青年人表示，汇报团进京汇报，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使自己也感到光荣；看到中央领导再次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的道路，看到汇报团受到热烈欢迎，自己也受到了鼓舞（载《北京日报》1986年2月20日）。参见《好儿女志在四方》，北京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21]这封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运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完全错误的，它实际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极"左"路线的产物。基于这种认识，公开信认为，原北京知青向党和政府提出的"落实政策，返回故乡"的要求，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

[22]公开信还被摘要转载在1986年7月10日《中国青年报》群工部《青年来信摘编》第601期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专门就此信做了批示。接着，经有关部门研究，由北京市邀请有关十省、区秘书长，共同研究做好北京知青的工作（参见《北京劳动大事记》，第336—337页）。

[23]指把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即城镇户口的问题。

[24]按照"三种人"可以单调回北京政策自1985年5月开始办理，到1987年末，共批准近万人调回北京。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58页。

[25]参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28、345页。

[26]1988年10月，北京市决定，允许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子女可有一名迁回北京入户上学。截至1994年，全市办理知青子女48500余人回京入户手续。同期，批准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31860余人回北京落户。参见《北京志·劳动志》，第50、52页。

[27]1989年4月决定，将一些在外地生活有困难的老知青安排到在北京招工困难的单位工作。见《北京市劳动大事记》，第379页。

[28]所谓"六二压"，指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被企业精简压缩回农村的城市职工。

附录一　本书人物经纬

1940年

10月，杨清良出生于江苏。

1942年

5月，欧阳琏出生于上海。

1943年

8月，张韧出生于江苏。

1946年

1月，曲折出生于北京。

10月，刘继业出生于沈阳。

1949年

5月，郑梦彪出生于福建晋江安海镇。

6月，吴献忠出生于辽宁抚顺。

9月，张玲出生于北京。

1950年

7月，小月出生于北京。

1951年

7月，庄伟亮出生于北京。

1952年

2月，柴春泽出生于热河（今河北省承德）。

1953年

9月，丁惠民出生于上海。

1954年

8月，安海燕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1960年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口号。

本年，曲折上初一，第一次要求上山下乡。

1961年

本年，欧阳琏从重庆市第一中学毕业，到重庆市郊农场当农工。

1962年

3—4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开始好转。国民经济工作要继续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9月，张韧从上海市到安徽省肥西县袁店公社唐旭生产队安家落户。

1963年

年初，欧阳琏从四川转回上海，不久赴崇明岛农场参加农业生产，半年后病退回上海，第二年5月23日进疆，落户在农一师十四团十八连。

1965年

1月，中共中央发起“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0月1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青在新疆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上映。

1966年

6月7日，曲折和李冬民等人成立“东风战斗组”。

6月中旬，17岁的郑梦彪在养正中学被揪出来，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7月8日，北京市二十五中工作组组织5000人批斗会，宣布曲折、李冬民等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分子”。

8月11号，曲折和李冬民在本校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随即成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曲折负责宣传部，起草了兵团宣言。

10月22日，曲折组织长征串联队出发。途经天津、南京、上海、江西等地。次年3月，返回北京。

本年初，张韧从安徽农村转到团省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把户口重新转回农村。一度受到“造反派”冲击。

1967年

3月25日，首都中学红代会成立。曲折分管红代会政治部，主持红代会机关报《首都兵团战报》。

10月9日，曲折等10人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前往内蒙古西乌旗插队。成为“文化大革命”10年间1000多万城镇下乡知识青年的先驱。

本年，安海燕13岁，父母被抓进“牛棚”，靠捡破烂维持家计。

1968年

3月，曲折担任公社革命委员会常委。以后几年，相继担任公社党委委员、旗革委会常委、盟革委会委员。

7月，小月离开北京，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八五三农场落户。

8月，刘继业离开沈阳，到辽宁省昌图县四合公社插队落户。

9月，张玲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

11月29日，庄伟亮初中毕业，离开北京赴山西忻县地区忻县秦城公社前秦城大队插队。

本月，欧阳琏为逃避派性斗争，离开新疆，逃入内地。辗转于重庆、武汉等地，做泥水小工，勉强度日。至1971年7月，始携妻子返回新疆。

1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城镇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本年，吴献忠自抚顺市第八中学初中毕业，主动要求到黑山县太和公社耿屯大队插队落户。

1969年

9月，吴献忠担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19日，小月在扑灭特大山火中烧伤，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扑火中牺牲的张梅玲追认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李晓军因出身不好，没给任何荣誉。1983年，追授革命烈士。

10月23日，郑梦彪离开安海，到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户。

本年冬，张玲与农村青年李刚小结婚。

1970年

5月，辽宁省昭盟赤峰市红代会成立，柴春泽任市红代会副主任。

10月，张韧离开生活八年的农村，调入《安徽日报》。

1971年

10月，曲折调内蒙古自治区政研室。

12月，柴春泽到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插队落户。

本年，丁惠民作为六九届初中毕业生，从上海去云南兵团一师一团（景洪农场）落户。

本年，安海燕初中毕业，到呼和浩特市郊太平庄公社太平庄大队插队。不久，担任“赤脚医生”。

本年，刘继业从农村抽调回城当工人。

1973年

2月15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吴献忠“扎根农村干革命”的事迹。这年8月，她作为知识青年的党员代表，参加了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22日至8月8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兴城县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长张铁生的一封信。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

9月2日，柴春泽给父亲写信，拒绝走后门回城。12月20日《辽宁日报》以《小将的挑战》为标题报道了他与父亲的通信。同年，柴春泽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在“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标题下，发表了他致父亲的回信和调查附记。

10月，曲折提为革委会秘书处副处长。同年11月起给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主任、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当秘书，直到1978年10月。

本年，安海燕因当“赤脚医生”取得出色成绩，成为呼和浩特市的知青典型。

本年，张韧任安徽省团省委副书记。

1974年

旧历除夕，郑梦彪因绝望在农村自杀未遂。同年，被推荐到小学当民办教师。

4月20日，安海燕因不堪忍受一些人的诬蔑，离开太平庄，转到呼和浩特市郊小井公社苦草坡（德胜）大队插队。

本年，刘继业主动要求第二次到农村插队落户。

本年，丁惠民因在兵团被打，腰椎错位，回家探亲。其父前后写了600多封信上告，均石沉大海。丁惠民在家养病，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返回兵团。

1975年

3月，柴春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日本。

5—6月，呼和浩特市委专门组织调查组，就安海燕在农村的表现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她的先进事迹完全属实。此后，她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知青典型。

10月20日，参加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柴春泽等12名知识青年代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表达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而贡献青春的心愿。

本年，小月经多次推荐，终于以“可教子女”身份上了大学。

1976年

本年春，郑梦彪不堪忍受公社副书记刁难，再次自杀未遂。

7月1日，经中央知青领导小组负责人陈永贵亲自批准，安海燕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13日，《辽宁日报》刊登19名知识青年代表联名致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向“拔根”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姚文元指示，在14日《人民日报》的一版头条刊发此信。

7月17日，国务院知青办将柴春泽致武汉下乡知识青年张静的七封复信下发给各省、市、区知青办，组织学习讨论。

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帮”被逮捕。

12月4日，柴春泽被关“学习班”。

1977年

5月，辽宁省锦州、铁岭分别召开批斗刘继业、吴献忠大会。两地各有170万人收听大会实况广播。两人的罪名如出一辙——“新生反革命分子”。两年后出狱。

本年，安海燕考上内蒙古医学院，自治区知青办坚持把她作为不占招生名额的“特殊学生”培养。

1978年

4月29日，公安机关正式宣布对柴春泽进行逮捕，并开除党籍。

9月，张韧任中共当涂县委副书记。

10月16日，云南农场知青丁惠民等发出第一封致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本月，尤太忠司令员调离内蒙古。此后，曲折被长期停职审查批判。

11月18日，丁惠民等发出致邓副总理的第二封联名信。

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步。

12月8日，云南版纳地区农场知青代表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赴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随即宣布举行无限期罢工。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74号文件很快传达到全国。文件提出，逐步解决在乡插队知青的问题，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则采取稳定方针。74号文件引起农场知青的强烈反响。

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出发。

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出发。

12月24日晚，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强行登车不成，采取卧轨行动，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10时，在国务院的直接干预下，代表们被迫撤离。

12月27日，丁惠民等代表顺利抵达北京站。

1979年

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

见丁惠民等10名云南农场代表。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办在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实际是对74号文件有关条款的修正，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依据。

1月21日，在昆明市召开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有关省、市领导和知青办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商量云南农场善后事宜。

1月23日，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该电报于2月10日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

2月24日，新疆农场上海知青赴京上访团出发，正团长杨东海，副团长杨清良。代表有欧阳琏。3月2日到达北京。

本月，安海燕被招工到呼和浩特市精神病疗养院，当护理员，多年以后担任副院长。

4月28日，新疆上海知青代表受到国家农委、国家农垦总局负责人张秀山、张修竹等人接见。上访团在北京一共停留52天，5月返回新疆。

本月，国家农垦总局刘济民副局长率工作组到新疆阿克苏。阿克苏上海知青及子女一二千人向其“跪哭”，要求回城。

7月19日至22日，新疆上青第二次赴京上访团代表先后到达乌鲁木齐市。

7月22日晚，国务院领导向新疆等十个省、市、自治区发出电话通知：对已离疆的上访人员沿途进行劝阻、收容、遣送回新疆。

12月13日，公安机关宣布对柴春泽撤销案件，予以释放。

本年底，郑梦彪被招工到县竹藤厂。

本年底，丁惠民母亲提前退休，他按照顶替政策进湖北崇阳县湖北仪表厂，当油漆工。

1980年

1月9日至23日，新疆自治区召开“关于做好稳定新疆上海支边青年工作座谈会”。

1月21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发布《通告》，要求立即解散“上海青年联络总部”和“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停止一切非法行动，违者依法处理。

2月，上海、新疆、兵团几方领导在阿克苏召集知青座谈会，产生了《二月座谈纪要》。

5月，张玲作为已婚老知青，被安排进呼和浩特铁路局的“大集体”单位。

7月，吴献忠出狱，后到锦州农业科学研究所当农工。

9月，翁牛特旗纪委对柴春泽的问题做出复查结论：恢复党籍，免予处分，党龄连续计算。

11月5日，新疆上海知青代表开会，欧阳琏等人提出：从8日起组织上青大举进入阿克苏。

11月13日晚，在阿克苏的上海知青一致推举欧阳琏为代总代表，王良德为副总代表，冯晶保、俞志成、张鸿兴、陈双喜、陈加春为代表。

11月23日上午10时，欧阳琏带领500多人开始绝食。以后几天，绝食人数增至1350多人。

11月28日下午2时，绝食达到100小时，欧阳琏宣布绝食胜利结束。

12月11日上午10时，上海知青大篷车队自阿克苏前往乌鲁木齐，途中一辆卡车翻车，三名知青死亡，伤十七八人。

同日，阿克苏地委发出给上海知青发户口的232号文件。

12月12日，中央工作组抵达阿克苏。

12月26日凌晨两点钟，欧阳琏等上青代表被逮捕。20个月后宣判，判处欧阳琏有期徒刑四年。

1981年

3月12日至30日，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在北京召开会议，商讨解决新疆农场上海知青的问题。

1982年

3月，柴春泽考上电视大学赤峰分校，毕业留校至今。

本年，张韧报考了安徽省直机关业余大学。

本年，张玲为把孩子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与农村丈夫办了假离婚。随即，又把丈夫户口转出农村。

1983年

6月4日，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陕西延安原北京知

青六人到北京市政府集体上访，强烈要求返回北京。

9月，小月返回农场，要求为当年扑火受伤事落实政策，农场给她追记三等功。

10月，曲折从内蒙古调回北京，在地矿部政治部工作。

1984年

1月，欧阳琏刑满出狱，同年回上海。

11月，山西忻州原北京青年开始酝酿请愿返城，撰写了《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等有关部门及领导的公开信》。12月中旬，派四名代表进京上访并递交公开信。

1985年

4月16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三种人”政策：即婚后两地分居者，未婚者，双方均是北京知青而一方丧偶者，可以调回北京。

4月22日至29日，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代表数百人连续在北京市政府大楼前静坐八天，最后招致北京市领导李锡明、陈希同态度强硬的训话。

6月18日，劳动部发出有关原插队知青工龄问题的文件，规定：插队时间算工龄，今后调资与同工龄职工一视同仁。

8月15日，庄伟亮等六人再次到上访北京，受到副市长封明为等人接见。回到山西后，庄伟亮和刘旭东进行了省内串联。

1986年

1月8日，山西省“好儿女志在四方”汇报团（简称“四方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专场报告会，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报告团还到山西、天津等地巡回报告，受到知青的抵制。

春节前夕，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代表给北京市领导进行“春节团拜”。当晚，杨存、刘旭东、田德才、杨长声等被公安机关抓捕。春节后放出。

4月，山西部分原北京知青发起《致中共中央及各级政府的公开信》征集万人签名活动。

5月至6月，北京市委、市政府派出调查组，前往留有北京知青的内蒙古、山西、陕西等省区实地调查。调查发现，留在当地的北京知青确实存在不少困难。于是决定从知青子女入手，逐步解决遗留问题。

10月26日，原北京知青1000人在太原市举行游行，要求否定“再教育运动”，满足知青返城愿望。

本年，丁惠民为解决夫妻两地，从湖北崇阳调到重庆。

本年，北京市开始实行允许留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将一名子女送回北京借读的政策。到1988年进一步规定；尚留在外地的原北京知青可将一名子女迁回北京入户。上述政策，陆续为上海、天津等城市取仿。

1988年

夏天，曲折调地矿部部属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11月，庄伟亮将户口转回北京。

本年，张玲辞掉工作，把自己和孩子户口办回北京。

本年，安海燕从呼和浩特市精神病医院调到中蒙医院。

1989年

本年，郑梦彪辞职下海。

1990年

10月，安海燕离开呼和浩特蒙医院，到海南开办美容门诊。后来，合作创办化妆品厂，研制出“古裂特”“古丽特”系列产品。

1991年

9月，曲折辞职“下海”，到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担任副所长。

本年，刘继业的夫人沈庆林考托福去美国。

1992年

张韧从安徽合肥调回上海，任华亭集团宣传部副部长。

1994年

夏天，曲折离开社会调查所，合作创办了“北京市普瑞治信息服务中心”。

本年底，北京市已批准原北京知青31800余人回京落户，已办理知青子女47438人回京入户手续。

1995年

8月，张韧调任上海《新民晚报》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

本年，张玲的丈夫李刚小在农村去世。

1996年

4月26日，郑梦彪和福建晋江安海老知青隆重举行“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成立大会。

1998年

本年初，张玲和知青田晓野集体返乡。田晓野在5月22日《中国妇女报》发表的长篇报道《嫁给农民的女知青》中，专门写了张玲的遭遇。

7月，张韧担任上海报业集团纪委书记。

9月，吴献忠创办辽宁知青食品公司，自任董事长。

1999年

本年，安海知青联谊会组织600多名知青及知青子女重返第二故乡永福，同年出版知青文学《永恒的回忆》和《岁月如歌》。

本年，曲折成立生物技术公司。

2000年

本年，小月面临下岗的可能，再次返回农场，要求享受与张梅玲、李晓军同等政治待遇，农场发给她五级伤残证明书。

2001年

1月7日，一些知青为张玲再婚举办了盛大婚礼。

12月，在欧阳琏等人组织下，新疆返沪知青将1980年12月大篷车队翻车事件中死亡的三名知青遗骨从新疆阿克苏迁回上海，举行了入土安葬仪式。

2002年

5月，欧阳琏退休。

2003年

1月，小月提前办理内退手续。

本年，返沪上海知青在欧阳琏等人组织下举行了进疆4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些知青仍在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着不懈努力。

附录二　名词索引

一画

二画

三画

四画

五画

六画

七画

九画

十画

十一画

十二画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一　书籍

《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

《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3年

《广阔天地献青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志在边疆》，农业出版社1976年

《知青工作文件选编》，国务院知青办1981年

《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

《好儿女志在四方》，北京日报出版社1986年

《好儿女志在四方——北京、天津上山下乡青年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白描《苍凉青春》，工人出版社

1988年

金春明等《“文化大革命”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

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

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

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

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费声《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

龚树基主编《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年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

梁丽芳《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台北万象图书公司1993年

李向前、李丹慧《理想与现实——外国学者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刘小萌、定宜庄、史卫民、何岚《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王江主编《劫后辉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

刘中陆主编《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女性口述史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史卫民主编《知青书信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史卫民主编《知青日记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田小野主编《单身女性独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

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赵予征主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章德宁、岳建一主编《中国知青情恋报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胡发云、刘晓航、何帆主编《沧桑人生——中国特殊群体写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苏永安、颜纯钩编著《岁月如歌》，香港翰华出版社1999年

安海（永福）知青联谊会编《永恒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

王龙才《天涯路》，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0年

王泽恂《逃亡》，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

《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0年

二　文章

史镜、李明启、邢宝玉《赴内蒙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与现状调查》，载《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6期

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载《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法］潘鸣啸《“改造一代人”战略的兴亡：上山下乡运动（二十周年）的分析与总结》，载《争鸣》1989年第1—2期

印红标《当今延安地区北京知青的处境》，载《中国青年研究》1990年第6期

申平《柴春泽其人其事》，载《通俗小说报》1993年2期

刘小萌《“血统论”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载《青年研究》1995年第2期

贾彦长《“劫后辉煌”：口述实录的魅力》，载《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3期

刘小萌《下乡女知识青年婚姻剖析》，载《二十一世纪》1995年第8期

柴春泽《真的是“文化大革命”误我》，载《中华儿女》1995年第11期

李银河《“老三届”女性的青春期》，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

彭希哲、任远《从“知青一代”的职业流动看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田小野《嫁给农民的女知青》，载《中国妇女报》1998年5月22日

关庚寅《知青娇女吴献忠的风雨爱情路》，载《大众生活》1999年第1期

陈意新《从下放到下岗，1968—1998》，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12期

邱新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综述》，载《南加州中国知青

协会会刊》第3期（2001年1月）

田小野《命运让她半生备受艰辛，网络为她张罗特殊婚礼》，载《南方周末》2001年1月22日

朱吉余《我所参加的知青上访》，载《远方》2001年

刘济民《我赴新疆兵团处理上海青年问题》，载《纵横》2002年第6期

后　　记

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知青口述史》终于完成了。本书顺利完成，首先得益于受访者的积极参与。在此，谨向接受过我采访的尚焰、王莹、陈君远、李世和、杨存、庄伟亮、周云安、张玲、小月（化名）、郑维、曲折、赵令如、徐达、张宝璇、欧阳琏、杨清良、王良德、周口福、张韧、鱼珊玲、周公正、刘继业、吴献忠、柴春泽、朱镕尘、刘三毛、姜宝泰、许金萍（已故武汉作家、武汉知青文艺团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何帆先生的夫人）、李伯雄、胡舸、张荆江、喻礼苍、廖世杰、郑汉保、张莉莉、张红军、丁惠民、安海燕、郑梦彪等诸位先生、女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各位知青朋友对我的工作倾注了很大热情，有的采访一次不行，再采访第二次、第三次。初稿整理出来后，还要请每一位过目，核实修改。有时我都不好意思一再叨扰了，对方却热情依旧……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所搜集的采访资料，有些还没有整理完成，有些还需要进一步补充，后续工作仍需努力。

我还要感谢曲守国、田小野、刘晓航、郭晓鸣、冯宁宁、王小立、曹姗、谢春池、杨健、韩志远、李南、张华等许多朋友，热情为我提供采访线索或其他方面的宝贵帮助。我长期从事文献史料研究，对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完全是门外汉，感谢定宜庄女士，利用自己在口述史方面的经验，给我宝贵的建议。

做口述史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作为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与该中心的合作可以追溯到1992年山东威海的乡镇企业调查，而后又参加了该中心《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课题的研究。这一次，当我因经费无着而向中心提出申请时，得到中心主任刘世定和社会学系主任马戎的鼎力支持，并作为中心的科研课题立项。两位是我学术上可以相互切磋的老朋友，当然，他们也都是知青。

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郭沂纹女士，从当年的《中国知青史——大潮》到这次的《中国知青口述史》，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让我高兴的是，以上诸朋友的炽热情谊和辛勤劳动，均已化为油墨的馨香，凝结在这部厚重的书中。

做知青口述史，这只是一个开端，一个尝试。为了把这项工作更好地更持久地进行下去，我真诚希望听到批评、建议，欢迎有更多朋友参与并提供宝贵线索（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所；邮编：100006）。

刘小萌

2003年2月9日

Table of Contents